目　　录

目　　录

序

本书是一部日本外交通史，起自1853年柏利来航、日本开国，止于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凡一百二十年。虽然是一部通史，却并不是对外交史上所有问题等量齐述的概要说明书。本书的目的在于着重分析日本外交基本政策，以此为中心而形成一种史论。

本书是我们八人共同研究的成果。这项研究开始于1969年1月。当时，在要不要延长《日美安全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所谓"1970年的抉择"的问题，作为历史工作者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共同研究就是受到这个思想的推动而开始的。面向未来，日本的外交，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呢？我们终于认为，为了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过去日本外交所曾作过的重要抉择研究清楚，从历史上对日本外交作出一个展望。于是我们就以重要抉择问题为中心，着手对近代日本外交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我们对外交下了一个定义："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形式表现的阶级利益），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所进行的国家对外活动"，把这种国家对外活动的历史称作外交史。我们之所以要对外交和外交史下一个大致的定义和规定其内容，并不是要对外交概念的当否进行争论，而是因为有必要按照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规定它的含义。这就是说，我们认为，要想从对外活动这个侧面解释清楚近代日本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帝国主义的扩张、崩溃和复活的历史时，若把外交规定为和平时期的"交涉"(negotiation)，就不能把在经历多次战争中，闯过发展、扩张、崩溃

和复活这种过程的历史特征刻画出来。本书之所以不是概要说明书，正是由于把叙述集中于刻画这种历史特征上；本书之所以把形成史论作为目的，正是由于本书的存在价值完全取决于对这种历史特征的刻画成功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工作就从划定日本外交史的分期开始。我们把当前的研究对象限定于从明治维新到战败，一面讨论分期，一面勾画日本外交史的轮廓，并计划以这种轮廓为基础着手编述通史。截至1971年5月，在两年零四个月期间，我们反复进行了约五十次讨论。同年5月6日，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春季研究大会上，我们以《近代日本外交史的分期》为题，报告了讨论结果并征求意见。报告的内容和所提意见的摘要已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机关杂志《国际政治》1971年度第一号(1972年4月出版)中，用日本外交史研究会的名义，以《近代日本外交史的分期》为题发表。该文中的分期表，经我们对照全书作了修订增补。为了读者的方便，分别附于全书各卷之后。对分期得出了大致结论之后，我们就着手编述通史，亦即开始编写本书。1971年5月以来，召开研究会约达二十次，每人所分担执笔的原稿均复写分发全体人员，全体人员读了全部原稿，每人加注意见后交还执笔人作进一步修改，然后由信夫清三郎统编，再退回执笔人作最后的修改，这样才完成了原稿。执笔者的分工如下：

序论第1节	第1—2项	中山治一
序论第1节	第3项	藤村道生
序论第2—3节		中山治一
序论第4节		藤村道生
第1—2章		毛利敏彦
第3—5章		藤村道生

第6—7章	中山治一
第8—10章	冈本　宏
第11—13章	安部博纯
第14章	信夫清三郎
第15—16章	谷川荣彦

石川捷治虽未参加本书的执笔，但作为研究会的成员曾参加讨论，阅读原稿和提出意见，还编制了索引，并负责研究会的各种日常事务。

对日本外交上的重要抉择进行历史的考察，这是贯通全书的课题。联系这个课题，作为一部通史，本书特别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着重点是探讨围绕着日本外交的国际秩序原理的对立。很多历史书都把日本的开国过程当作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以及中国和日本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来加以叙述。从结果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揭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把它作为不同国际秩序原理的对立来描述，恐怕就不能明确抓住（日本外交的）抉择问题；从而，也就不能彻底理解开国的过程，以及由此发展到日清战争的过程。这就是，把世界逐步纳入资本主义而不断形成世界市场的，虽然是欧美各国，即本书所谓“西洋国家体系”，但它们来到亚洲后，首先迫使开国的是中国，而中国具有与“西洋国家体系”不同的独自的国际秩序原理，即所谓“华夷秩序”；其次迫使开国的是日本，它也具有与“西洋国家体系”不同的独自的国际秩序原理，即所谓“大君外交体制”。具有独自的国际秩序原理，这使日本在作出抉择时造成了什么样的条件？与华夷秩序方面的抉择相比，它使日本的抉择具有怎样的特征？又使日本和中国的后来发展进程出现了怎样的差异？我们之

所以在序论中论述了《开国前夕的国际关系》，并企图从原理上阐明三种国际秩序，就是希望找出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我们的第二个着重点是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日本本身位于亚洲，在日本外交中，对亚洲各国的外交不论在质或量上都占最大的比重，这一点本来是理应如此的。但问题在于，日本并不想依靠亚洲的联合来对抗西洋国家体系的冲击，而是立即决心加入西洋国家体系，企图作为西洋国家体系的一员，反过来统治亚洲各国。这样，"脱亚入欧"的日本就挑起日清战争，取得胜利，并在亚洲开展了旨在以亚洲统治者姿态凌驾于亚洲之上的外交活动。作用引起反作用，亚洲各民族对于日本侵略的抵抗也随着日本脱亚入欧的过程而爆发，日益激烈，势将迫使日本做出新的抉择。但是，日本却在经过战斗而抉择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而在从朝鲜和满洲（中国东北）开始，直到妄图征服"大东亚"的十五年的战争中，终于遭到失败。现在，日本又在作为"经济动物"① 不断侵略亚洲各国，正在再次引起亚洲各民族的抵抗。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和对历史所应进行的反省，既然主要在于我们与亚洲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之中，那么，系统地叙述对亚洲的外交，系统地阐明其意义，反过来就恰恰可以使日本外交的一贯特点更加清楚。对欧美的外交，今天固然作为经济高度成长② 的结果正在开辟独自的领域，但在过去，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围绕着对亚洲的外交而展开的。

我们的第三个着重点是探讨日本对外机关及外交主体的结构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我们系统地追溯了日本外事机关的状况及其演变，力求把其背后的外交主体的结构阐述清楚。外交政策是通过对外机关来实行的，而对外机关的状况又常常反过来规定政策

① 经济动物：指擅长经济活动的日本人。——译者

② 经济高度成长：战后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提出的施政方针，其实质是与美国资本相结合，迅速发展日本资本主义。——译者

的方向。战前，日本和欧美的自由主义乃至民主主义的学者和思想家，总是批判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外交是"双重外交"，批判产生这种双重外交的政府机构是"双重政府"。但所谓双重政府是什么？双重外交是什么？这与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建成的日本国家机构又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弄清这个问题，应当是理解战前日本外交特点的又一个关键。那末，战后又怎样呢？根据战后日本宪法建成的国家机构又给外交主体和外交政策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弄清这些问题，不单是为了贯通战前战后来理解日本外交的特点，而且对于正确研究外交的统一性和民主管理问题也会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我们写作本书的意图，在叙述中到底实现了多少，有待于读者的评论。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很多争论。关于分期的争论已见于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机关杂志上发表的前述论文，此外，关于对攘夷运动的评价问题，关于战前日本国家机构（天皇制）的性质，以及应否把被占领期间作为一个"时代"来处理的问题等等，意见也有很多分歧，进行了争论。我们八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并不完全一致，有争论是很自然的，我们没有强求一致；有时我们尊重执笔者的个人见解，有时求同存异，只取相互一致点。天皇制问题与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问题密切联系，我们在确认双重外交之存在这一点上求得相互一致，共同倾注全力对双重外交作出准确的叙述。这并不是为了回避解决争论的困难，而是因为我们确信，为了使争论不致流于一无所获的相互争吵，而能取得创造性的解决，首先准确地把握双重外交的事实，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我们采取的一贯方法是首先集中全力于确定事实，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

由于共同研究是一项集体工作，因而也就有相应的困难。共同研究的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理论，在哪些方面应求得一

致呢？如果说这是第一个困难，那么，第二个困难就是，如何把每个成员各自头脑中酝酿着的见解和共同研究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共同研究是互相交流情况，通过交谈和讨论加深各自的理论，它能给研究人员带来关在研究室里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知识。但学问既然毕竟是以每个研究人员的脑力劳动为基础，那么，在共同研究当中，即使探讨共同的主题，每个人也当然会在头脑中不断勾画出自己独特的问题。怎样使这种各人特有的问题和共同研究工作协调起来？这是共同研究中的困难之一；共同研究如果持续太久，反而会妨碍个人单独研究的课题，结果就将导致共同研究本身的失败。因此，必须在一定的期限之内，把共同研究的成果概括出来，就成了最重要的要求。如何设法作到这一点，也是我们绞脑汁的一个方面。现在，共同研究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我们每个人将会各自带着共同研究过程中酝酿已久的课题回到自己的研究室中去。

日本外交史的研究，在日本是一门年轻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战后才兴起的学问。固然，战前也有日本外交史的研究，也留下不少成果，但在缺乏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战前，自由评论外交是不允许的，日本外交史的研究从而也就受到很大的制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以笔锋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过战斗的清泽洌氏，对日本外交的研究状况说过如下的话，这是1934年的事情。

“在日本，最受轻视的部门是外交。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如此，在学术乃至著作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这是一门在日本最不受赏识的学问。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书籍出版方面，据说日本比世界任何一国都占优势，但唯有关于外交方面，我想就不能自豪了。”（《外交时

报》第 712 号，1934 年 8 月，第 20 页。）

在日本败局已定之时，清泽洌氏就严肃认真地考虑日本的未来，计划设立外交史研究所，筹措资金，先办了一个小型的研究会。1944 年秋，我也应邀出席了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一个房间里召开的研究会。我第一次见到长谷川如是闲氏也是在这次会议上。1945 年，又应邀到私邸拜访了清泽洌氏。记得那是在初春季节，根据最近出版的他的《黑暗日记》，是 3 月 2 日。在他接待我的书斋里，桌子上摆着一本1936年出版的拙著《论外交》。在这本小书的序言里，我举出了他的上述文章，并且说"一般国民对外交史的如此无知，几年来就为法西斯主义造成了最良好的温床和孕育它的母胎"。也许就由于这篇序言，他接待我时，才把这本拙著摆在桌上。话题也就由此开始，转到拙著的内容，谈到双重外交；据他在《黑暗日记》中的概括叙述是：年轻的我，初生犊不怕虎，谈到想要写一部与他的两卷本《日本外交史》不相上下的外交史，表达了"写一部标准的外交史"的意图。我带去他的一部著作，请他签上名，心里热呼呼地辞别了他。我表示希望，如果外交史研究所开始工作，一定竭尽全力参加；他也邀我参加。可是，此后不到三个月，5 月 21 日，他竟未等到战争结束，就突然逝世，一切也就完了。如果他能活到战后，并使外交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起来，那么，我在战后走的步伐也可能会不同的。战后二十九年，外交史研究从一切限制中获得解放而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著作和编辑的今天，我想起了清泽洌氏的和蔼面容，想起他当年为了招待我拿出本来就无多的小块年糕①，我们俩每人一碟，一边吃着，一边漫谈外交史研究问题时难忘的情景。

1974 年 1 月 29 日　　　　信夫清三郎

---

① 一种节日食品。日本风俗以 3 月 3 日为女儿节。这天吃用糖和酱油等作料烤焦了的小方块年糕。——译者

凡　例

1.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人都有很多名字。例如，西乡隆盛就有：小吉、吉之介、吉兵卫、吉之助、隆永和隆盛等名字，又号南洲，有时为避社会耳目也叫过菊池源吾、大岛吉之助和大岛三右卫门等等。但是，本书不论他在某些时候用过什么名字，都统一使用最通称的“西乡隆盛”。

2.初次提出人物姓名时，本应记其全名，但为了避烦就简，特别是对欧美人，很多场合只记其姓。全名和原文则写在下册末尾的索引里。索引中未写的则是由于尚未查清。

3.关于人物的敬称，即使是现在还活着的人物也予省略。因为都是作为历史上的人物而写入本书的。

4.编制索引时，朝鲜和中国的人名、地名，除了例如ソウル（汉城）或者シャンハイ（上海），其原语读法已经通行者外，均按日语读法。朝鲜人的“李”，现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读作Li(Lee)，而在南朝鲜却读作Yi(Yi)；至于当时的正确读法，在朝鲜本国未得一致之前，我们无法解决。关于中国，我们未用欧美人的读法，也是在希望由中国规定正确的读音。

5.年代全部使用公元和阳历。在明治5年（阴历）12月3日改为明治6年（1873年）1月1日以前，日本本来使用阴历，但本书已经全部换算为公元和阳历。关于阴阳历的对照，可参考外务省编辑的《近代阴阳历对照表》（1951年出版，原书房于1971年翻印）。

6.引用原始资料用“ ”号标明，并将原文的片假名改为平假

名。至于当时使用的"阿兰陀"，笔画烦琐，则改写为通俗易懂的"荷兰"。在引文中，凡用（ ）符号所加的注释，都是原文所有；凡用〔 〕符号的注释则是本书著者所加。

7.关于出处，仅就有关重要政策或论点在脚注中注明，其余概予省略。脚注所引文献，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都标明了出版社，战前的书籍则不予标出，因为有很多出版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8.日本外交史的基本资料有《日本外交文书》，目前仍在陆续刊行中；本书编写时能够利用的是"大正九年第二册上卷"以前的部分。

9.日本外交史的年表以外务省编辑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最为正确（两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出版；1965—1966年由原书房翻印，两册）。该书收录了条约等主要文书，可以兼作辞典使用。不仅限于外交史的一般年表，以岩波书店编集部编写的《近代日本总合年表》（岩波书店，1968年）最为详细。在辞典中，查阅较便的有，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日本近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社，1958年）；朝日新闻社编：《史料明治百年》（朝日新闻社，1966年）；远山茂树、安达淑子合编：《近代日本政治史必携》（岩波书店，1961年）和日本近代史研究会编：《日本陆海军的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等等。为了查阅有关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以英修道编写的《日本外交史关系文献目录》（两册，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会，1964年—1965年）最为方便；该书出版后，日本外交史的主要概说书有鹿岛和平研究所编著的《日本外交史》（本卷三十三册，别卷五册，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5— ）；具岛兼三郎的《近代日本外交小史》（评论社《教养丛书》第31种；评论社，1972年）和池井优的《日本外交史概说》（庆应通信，1973年），后两本书都附有文献介绍。

序论　开国前夕的国际关系

第一节　三种国际秩序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欧美各国要求亚洲各国开国时，亚洲各国大体上有两种国际秩序。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把朝鲜、安南等邻国作为藩属，形成一个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日本，古代且不说，足利时代（1336—1537年）曾作为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断绝了对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德川幕府就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大君①外交体制”。中国的“华夷秩序”和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与欧美各国所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不同，是建立在特有的原理之上的。因此，中国和日本同欧美各国之间近代国际关系的确立，才特地采取了中国和日本的“开国”这一特殊形态。

一　华夷秩序

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②的日（本）明（朝）战争（1592—1593年；1597—1598年），断绝了足利义满时代以来断断续续保持着的日本和明朝的正式邦交。现在，据判定为1587年明朝的记载是，日本于1381年曾答应每十年向明朝朝贡一次，1403—1551年间，有时朝贡③。这个事实意味着，至少从明帝国方面来看，在一个半世

① 大君：当时日本幕府和西方各国都称幕府的将军为大君。——译者

② 文禄、庆长之役：指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一次发生在1592年即文禄元年，一次发生在1597年，即庆长二年。两次战役均以失败而告终。——译者

③ 费正清、邓嗣禹合著：《清代朝贡制度》，《哈佛亚细亚研究杂志》，第6册，1941年，第151页。

纪多的时间里，日本是以明朝为首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员。

1368年，蒙古王朝元帝国灭亡，作为汉族国家的明王朝建立，不久，便向建设一个超越汉、唐而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强大帝国的方向迈进，这也就意味着要把汉朝以来一直在观念形态上保持下来的中华帝国复兴起来。汉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承的帝国观念，随着明帝国的建成，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国际秩序而明确显现出来。

明太祖（洪武帝）在建国之初就"诏谕"四邻各国，促令朝贡，并对接受"诏谕"的各国国君授以金、银印章，发给勘合符①，并对贡期、进贡土产的手续、对使者带来的礼物所付代价等均有详细的规定。凡接受"诏谕"前来朝贡的国家，既可以得到承认其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安定地位，又可以得到贸易的利益。接着，在第三代皇帝、即成祖（永乐帝）时代（1402—1424年），又征服了安南王国，前后五次讨伐鞑靼（蒙古族）部落，招抚女真族，向黑龙江下游及苦夷（库页岛）地区扩大势力，并先后六次远征印度洋周围各国②。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乃是有名的南海远征，连同第五代皇帝宣宗时期（1430年）所进行的航海，共计七次，每次都派出官兵约两万七千人、巨船六十艘，从东南亚各岛经锡兰、印度西岸、波斯湾、阿拉伯南岸、红海直达非洲东岸中部，这次大规模远征，曾促使这个广大沿海地区大约四十个国家前来朝贡。由此，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都被划入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秩序之中③。

另一方面，明太祖至成祖时期（1368—1424年），在朝鲜半岛

---

① 勘合符：我国史书称为"符信勘合"，见《明史·日本传》，意思是进行贸易的执照。——译者

② 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的研究》中卷，吉川弘文馆，1969年，第6—7页。

③ 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远东季刊》，第1卷，第2号，1942年2月，第140页；马观：《瀛涯胜览》，小川博译注，吉川弘文馆，1969年。

是李朝朝鲜国初建时代；在日本则是足利义满至足利义持时代。这个时期，日本、朝鲜都和明朝建立了册封关系，两者都是以中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员。琉球王国则在明朝建立初年即已成为向明朝隔年朝贡的国家。此外，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及西方各地区的统治者，也有不少接受明朝册封的王号或被授予官职，有的作为朝贡者出入首都，有的往来于边境进行通商①。

总之，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亦即欧洲西部的葡萄牙亲王亨利(Dom Henrique o Navegador)刚刚着手筹备航海探险事业之时，或者说，比巴托罗缪·迪亚士(Bartholomeo Dias)②到达非洲大陆南端还要早一个世纪左右，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其范围之大，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在明太祖的诏书里可以看到："训将练兵，平定华夷……"、"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华夷无间……"、"诸藩入贡，华夷一统"等等，根据这些说法，把这种国际秩序叫作"华夷秩序"，是合适的③。

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④各国接受册封(授与外交文书，承认其地位)，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牵制)后者。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的关系

---

① 中村荣孝：前引书，第8页。

② 巴托罗缪·迪亚士：葡萄牙殖民主义探险家，曾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译者

③ 中村荣孝：前引书，第5页。译者补注：引据《孝陵诏敕》，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六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查《明实录》，日期、文字微有出入。

④ 夷狄：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及我国周围各民族国家的卑称。在这个译本中，凡原文为"夷狄"者，均视情况径译为"少数民族"或"各民族国家"，不再一一注明。——译者

上的投影，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因此，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因此，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如上所述，华夷秩序在明朝初期虽然迅速扩大，但它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继续扩大下去，其缘由也许可以用这种情况来说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形成的近代欧洲国际秩序和这种东亚国际秩序之间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可以说就在这里。

二　欧洲国家体系

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东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东南亚各岛，西至阿拉伯西岸、非洲东岸，北起黑龙江、漠北[①]，南至印度洋的南海各岛，形成庞大规模的国际秩序之时，在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之花正在开放。意大利也建立了自成一体的国际秩序；但那是与东亚国际秩序无法比拟的一个狭小世界。

十四至十五世纪，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由于面临着中世纪以来的神圣罗马皇帝权力的没落和罗马教皇权力的衰微，君临一切的法规已不复存在，在小的局部地方政治权力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其趋势是走向政治统一。这种斗争的确是残暴已极的，经过斗争的淘汰，不久便剩下了五个强者。即那不勒斯（两西西里[②]）王国、罗马教皇辖地、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共五个大国。这些国家竭尽全力也无法消灭对方，只得安于

① 我国古代指沙漠以北地方，大约相当今之蒙古人民共和国。——译者

② 两西西里：指意大利南部墨西拿海峡对岸西西里地区和西西里岛。——译者

持续相互之间权力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状态，这样就形成了以"势力均衡"为生存原理的国际关系体系，这就是意大利国家体系(Italian states-system)的建立①。当然，虽说是五个大国，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以文艺复兴的各都市为核心的蕞尔小国，加在一起也不超出意大利半岛及西西里岛的范围，所以它只能是一种狭小的国际体系。

4 不过，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要求继承那不勒斯王位，侵入意大利之后，米兰公国、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等唯恐意大利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就拉拢西班牙国王、德意志皇帝和英格兰国王等进行干涉，以求恢复意大利国家体系的"势力均衡"。这就是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494—1516年)。二十余年的战乱造成了重大的后果。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以前，"势力均衡"原理的概念只限于意大利范围，经过这场战乱之后则扩大到欧洲范围了；而前此以意大利为舞台形成的国家体系，现在开始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于是，第一次意大利战争便成为欧洲国家体系(European states-system)形成的开端。

接着发生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1519—1559年)清楚表明，"势力均衡"及合纵连横的问题，已经不是以意大利为舞台，而是扩大为全欧洲规模的问题了。因为，在第一次意大利战争中，对抗法兰西的主要人物之一——西班牙统治者(指西班牙王查理一世——译者)于1519年被选为德意志皇帝，成为查理五世，已开始谋求树立其在整个欧洲的霸权。对于这种竭力树立霸权的活动进行对抗，力图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中心势力是法兰西历代国王。他们为了阻挠德意志皇帝称霸(即破坏欧洲"势力均衡")，甚至不

① 路德维希·德希奥：《均势或霸权，对于近代政治史的一个基本问题的考察》，舍尔佩出版社，克雷菲尔德，1948年，第25页。

措借助欧洲以外的异教徒国家(土耳其)的势力。

在查理五世竭力树立霸权失败之后,十六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重新进行了同样的活动。这时,抗拒腓力二世的活动而坚决维护欧洲“势力均衡”的,已经不是法兰西的大陆势力,而是英国和荷兰的海上势力了。继之,十七世纪前半期,在德意志地区发生了国际战争(三十年战争),在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前半期的这些国际纠纷过程中,欧洲国家体系大体成型。这种体系无非是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势力均衡”政策三者为支柱而构成的诸国家联合体制①。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② 可以看作是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标志。当然,在欧洲国家体系成立以后,也还不断发生破坏“势力均衡”的活动。它首先表现为十七世纪后半期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竭力树立霸权。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起约半个世纪,路易十四曾力图掌握霸权;而对路易十四进行抵抗,并坚持维护欧洲势力均衡的,仍然是英国和荷兰,特别是英国的海上势力。英国过去抵抗腓力二世,现在又抵抗路易十四称霸而维护欧洲势力均衡,这时已作为维持欧洲“势力均衡”必不可少的西部柱石,在国际政治上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5

与西欧的这种动向相对应,在十八世纪初,东欧和北欧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因为,彼得大帝(Pyotr I, Alekseevich)的俄国通过北方战争(1700－1721年)取代了瑞典的势力;同时又在南方驱逐了土耳其的势力;其结果,十六世纪的土耳其和十七世纪的瑞典

---

① F.L.舒曼:《国际政治》,第4版,麦克劳·希尔书店,1948年,第74页。

②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威斯特发里亚,德国地名。1618—1648年,西欧、中欧、北欧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三十年战争。《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是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和约,主要内容是各国领土和德国各诸侯领地的重新划分,建立欧洲新的国际均势。——译者

在欧洲国际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现在改由俄国来扮演了[1]。这同时还意味着欧洲国家体系向东方扩张。十七世纪中期建立的欧洲国家体系，大体上不过包括过去的罗马一天主教世界；现在，由于俄国的加入，便把过去的希腊正教世界也包括在内了。总之，此后俄国作为维持欧洲势力均衡不可缺少的东部柱石，确保了与西部英国相对应的重要国际地位。欧洲国际政治的这种基本结构逐渐显现为鲜明形态的最初一个事件，就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欧洲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须由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地处两端的大国即“两翼国家”（Flügelmächte）的意志来决定，这一点，通过这次战争的过程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了。

而且，不久出现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1775—1783年），这意味着欧洲国家体系又向西扩大了。十八世纪后半期，欧洲国家体系已扩大到西起北美大陆东岸，东至乌拉尔山脉这样一个广大地区。“欧洲国家体系”的观念，作为学术上的概念，由十八世纪末期格廷根（Göttingen）学派[2]规定下来，这也决不是偶然的[3]。这种概念超越基督教世界范围而包容了非基督教的一些国家，则是在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和巴黎会议[4]（1853—1856年）的过程以后。[5]

通观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后半期近三个世纪欧洲国家体系

---

① 路·德希奥：前引书，第93页以下；哈约·霍尔博恩：《欧洲政治制度的崩溃》，科尔哈默，1954年，第19页。

② 格廷根学派：以德国格廷根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学派，主张科学的自由研究，是十八世纪后半期大学革新运动的先驱，新人文主义的核心。——译者

③ H. 巴特菲尔德、M. 怀特合编：《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理论论集》，爱伦·昂温书店，1966年，第147页。

④ 克里米亚战争和巴黎会议：1853年10月，俄国与土耳其战争，英、法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支持土耳其，俄国战败。1856年3月，战争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译者

⑤ I.C.Y. 徐：《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至1880年外交的一个侧面》，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3页。

的形成和扩大过程，可以看出，这个体系结构上的特点在于，它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相互之间横的关系所构成的。在那里并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中心，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的各国间的并列关系。上述东亚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和以国家体系为主体的近代欧洲国际秩序相比，最大的不同之点即在于此。简单地说，前者是向心的上下秩序，而[6]后者则是离心的横的秩序。

这第一个特征立即联系到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这个不断以“势力均衡”为原则、凭横的关系构成的欧洲国家体系，其自身内部包含着一种可以称为扩张机构的东西。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十六世纪以来，凡是企图在欧洲称霸的强国，都是向欧洲以外扩张，从那里吸取物质的能量因而强大起来的国家；而反对霸权，力图恢复欧洲“势力均衡”的强国，也是从欧洲以外的世界吸取物质的能量，从而使自身得以更加强大起来。所以，作为欧洲国家体系的总体，每当其内部出现试图称霸的努力，以及每当对这种企图反复进行抵抗而力求恢复“势力均衡”时，其结果都要导致扩张。

在这一点上，东亚的华夷秩序也同欧洲国家体系显然不同。诚然，前者有时也曾显出向外扩张的现象，但那不过是出于“中华帝国”的皇帝或宫廷（王朝）的需要而产生的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与此相反，欧洲国家体系则如上所述，其内部就包含着必然要扩张的机构，它向欧洲以外扩张势力乃是势在必然的。这样，欧洲国家体系同东亚华夷秩序以及同大君外交体制的接触，前者向后者的逼近，可以说只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

三　大君外交体制

大君外交体制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种日本独特的国际秩

序，因当时把外交代表人物——将军称作"大君"而得名①。建立大君外交体制的德川幕府，其对外政策通常被称作"锁国"。然而，德川幕府的奠基人德川家康却积极振兴对外贸易，对于恢复因丰臣秀吉挑起的日明战争而中断的与明朝、朝鲜的邦交表现了热情。锁国虽完成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1639年，但幕府并没有意识到此后长期处于锁国状态。

锁国这种说法，使人觉得仿佛是把国家完全封闭起来，不同外国发生关系，但所谓锁国令的着眼点其实在于垄断贸易和情报，从未使用过锁国这个词。当时执政者所用的词，在新井白石②是"异船御禁止"（意为禁止外国船往来——译者），在近藤守重③则是"海禁"（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和走私贸易）。

锁国一词首次见于文献，据说是十七世纪末年来到日本的检夫尔（Kämpfer, Engelbert）④所著《日本志》一书所附的论文，题目是《关于采取目前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长崎的兰学家志筑忠雄于1801年把它译成日文，题为《锁国论》，"锁国"一词即始于此⑤。锁国一词的广泛使用，是十九世纪以后即意识到幕府的对外政策乃是日本发展的桎梏以后的事。

德川家康在1603年建立幕府时，围绕日本的国际关系是：随着丰臣秀吉的日明战争而来的大混乱仍在继续，同明朝和朝鲜的

① 中村荣孝：前引书，下卷，第465页以后。

② 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时代中期政治家，曾任幕府将军德川纲丰的侍讲，参与幕政。——译者

③ 近藤守重：即近藤重藏（1771—1829），江户后期书目学者、探险家。曾多次到日本北方领土进行勘察，促使德川幕府重视北方领土问题。——译者

④ 检夫尔（1651—1716年）：德国博物学家，日本问题研究者。1690年任日本长崎商馆医生，三年之间，曾两次到江户访问。——译者

⑤ 板泽武雄：《日荷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59年，第552—554页。

战争状态尚未解除。德川家康在国际政策上特别注意了以下三点。

第一，获取海外知识。德川家康重用了1600年漂流到丰后[①]的荷兰船礼福德(Liefde)号上的英国职员维廉·亚当(William Adams，日本名：三浦按针)和荷兰船员耶杨子(Jan Joosten, Loodensteijn，日本名：八重洲)，聘为外交顾问。

第二，在扩大通商范围的同时，把通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604年，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所开创的朱印船[②]制度，积极奖励商船航行海外。从1604年到根据锁国令禁止渡航海外的1635年，大约三十年间，朱印船的数目达到三百六十五只之多，盛极一时。朱印船的贸易额超过了荷兰以及中国商船的贸易额，东南亚的日本人街一直保持了繁华热闹。然而，德川家康的奖励贸易方策，其中含有一个矛盾，即西国[③]大名[④]贸易活动的畅旺和经济力量的蓄积，反而显然成为幕府统一权力的重大障碍。于是，德川家康力图介入贸易并统制贸易。1604年，他在继承朱印船制度的同时实施了"丝割符制度"(即生丝凭证采购制度——译者)。从中国输入的生丝叫作唐丝或者白丝(未经染色的丝)，需要量很大，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所谓"丝割符制度"，就是堺、京都、长崎三地——后来又加上大阪和江户，共五处——的有势力的商人结成丝割符行会，对外国商船载来的生丝规定价格，整批加以收购，然后才允许进行其他商品的交易。整批收购的生丝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国内各地。幕府就这样把贸易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排除了自由交易。不仅如此，幕府还进而参与生丝的贸易，垄断收购了大量生丝。幕府

---

① 丰后：今九州大分县一带。——译者

② 朱印船：江户时代领有盖红色官印的许可证，从事国外贸易的船只。——译者

③ 西国：有时指九州地方，有时泛指中国、四国等地。——译者

④ 大名：日本德川时代称有封地万石以上的诸侯或幕臣为大名。——译者

垄断收购的生丝被称作"公方[①]之丝"或"皇帝之丝"，给幕府带来巨大利润。在军需品方面，因直接与增强军事力量有关，家康的态度更为严厉。1609年，他采取了没收西国大名的载重量五百石[②]以上的大船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使之不致成为对幕府的威胁；1616年，限定平户和长崎两港为外国商船的停泊地点，同时，把制造枪弹原料的铅的贸易集中于长崎，并以凌迟之刑严禁铅的走私贸易。

第三，恢复与明朝、朝鲜的外交关系，重新建立因日明战争而同样断绝了的与琉球的邦交。

恢复与明朝的邦交，也是为了扩大通商范围必须解决的最大课题。然而，要与明朝开展通商，就必须取得明朝皇帝对于勘合贸易的许可，而要取得勘合贸易的许可，又必须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川家康首先和朝鲜，接着和琉球分别恢复了邦交，以此谋求与明朝接触。

与朝鲜复交的谈判，在日本从朝鲜撤兵后立即开始。推动复交的是对马藩。很久以来，对马藩与朝鲜有特殊关系，靠同朝鲜进行朝贡贸易所获盈利和朝鲜国王赐与的岁遣米，勉强维持自己的财政。日明战争使这些收入断绝了，因此对于对马藩来说，复交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由于后金（清朝）[③]的崛起，朝鲜为了防卫北方，就有保障南方安全的必要。为了探听日本政情并要求遣还俘虏，早已希望讲和。德川家康想通过同朝鲜恢复邦交来实现与明朝的讲和。对马藩作中介人，伪造了一份日本国王的国书——这是朝鲜作为复交条件而提出的要求。由于对马藩的这一诡计，朝鲜政府于1607年向日本派遣了国使，称为回访使（答复德川家康

---

① 公方：指天皇皇室机构，在幕府时代实际由幕府控制。——译者

② 石：日本木船的容积单位，一石为十立方日尺。——译者

③ 后金（清朝）：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于1616年统一建州卫女真各部，建国号为后金。1636年，后金太宗称帝，改国号为清。——译者

国书的使节)。1609年，对马藩与朝鲜缔结了《己酉条约》，约定每年派出二十只运载朝贡物品的“岁遣船”，恢复了朝贡贸易，并被允许在釜山堆集贸易物品和设置倭馆，供常驻事务官员之用。对马藩主成了朝鲜的外臣①。

幕府恢复了与朝鲜的邦交，在日朝之间建立了互通信义的“通信”关系②。日本的国书由对马藩代任国使，呈递朝鲜国王；朝鲜的国书则由信使带到日本。信使前来日本，起初曾借各种理由，如平定大阪、祝贺昇平、将军得嗣，等等；到1655年以后，变为只限于祝贺将军袭任。信使来到日本时，幕府命令沿途各藩尽力接待使者一行，试图通过豪奢华丽的接待方式，装潢幕府的国际仪容；对于国内，特别是对于西国大名，则以此夸耀幕府与外国有邦交并受到国际上的承认。朝鲜国王把明朝（1636年以后为清朝）尊为宗主国，把与明朝之间的关系称为“事大”③，以示尊重；把与日本的关系称为”交邻”，以强调平等之意。德川幕府虽然继承了自古以来视朝鲜为日本属国的传统观念；加上日明战争中军事上的优越意识，对朝鲜具有优越感；幕府的理论家林罗山等人有“朝鲜，进贡来！”的说法，但是，朝鲜国王与将军的地位仍然是对等的。1607年对马藩伪造的国书，称德川家康为“日本国王”，到了1635年终于暴露为伪造。幕府于同年规定，征夷大将军在外交上的称号为“日本国大君”，此后直至幕府末期，只有新井白石有一次改称“日本国王”。于是幕府末期开始和幕府发生接触的欧美各国便称将军为大君，大君一词即渊源于此④。

---

① 外臣：我国古代有此词，是中国官员对外国君主的自称，与此有所不同。——译者

② “通信”关系：指两国间尚未建立正式邦交而仅仅互通“信义”的关系。——译者

③ 事大：意思是以小事大，弱者臣事强者。——译者

④ 中村荣孝：《日本与朝鲜》，至文堂，1966年，第218页。

但是，与朝鲜的复交，对于同明朝复交并未立见成效。第二步的策略就是通过与琉球修好来与明朝接触。

9 当日明战争时，琉球王国拒绝丰臣秀吉征收军粮，从此便与日本断绝了关系。德川家康先是要求琉球王国前来进贡，和为日明复交作媒介。琉球王国又拒绝了。于是，在与朝鲜缔结《己酉条约》的1609年，德川家康便准许萨摩藩主岛津氏征伐琉球。岛津氏用武力征服了琉球，把与论岛以北作为直辖领地，以南作为琉球国王的封地。幕府以正式文件确认岛津氏领有全部琉球。琉球的中山王从此成了岛津氏的家臣，享受大致相当于岛津同族的私领主① 的待遇，即设置独自的领主馆、行政机构和家臣团等等。国王仍然住在首里城，下设行政机构和家臣团以维持国家的外表，但行政权和司法权却都缩小了，受制于萨摩藩。为了从对明朝的贸易中牟取利润，萨摩藩命令琉球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册封关系，用萨摩藩的资金进行朝贡贸易。琉球虽然成了萨摩藩的"附庸"（属国），但在它与日本整体的关系上，幕府则按"异国"对待，规定对"异国"琉球的关系与日朝关系一样，即是一种具有正式邦交意义的"通交"关系②。在这种虚有其表的地位上，琉球王照例每当（幕府）将军袭职时向江户派庆贺使，每当琉球国王袭封时则向江户派谢恩使，谒见将军。

通过朝鲜或通过琉球来实现对明复交的意图全告失败，幕府别无他策，只好直接交涉。1610年，即缔结《己酉条约》和征伐琉球后的第二年，幕府对渡航来日的广州商船，发给许可在沿岸自由贸易的"朱印状"，以示好意。同年年底，以德川家康的执政本多正

---

① 私领主：指原来就有固定领地的领主，以别于本身没有领地，受封国家领地（时称公领）的领主。——译者

② "通交"关系：指派国使互通往来、交换国书的正式邦交关系，比"通信"关系更进一层。——译者

纯的名义，委托来日的南京商船致书福建总督。

本多正纯的书信实际是林罗山草拟的。他开头就声称"日本国主源家康[①]"统一了全国；强调"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以上即越南），暹罗（即泰国），吕宋（即菲律宾），西洋（即新加坡以西各国），柬埔塞（即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介绍了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国际关系的建立。安南等国，在1601年至1610年间，曾以私函形式与日本互通来往，所谓向日本进贡，和对朝鲜的说法一样，都是夸大其词，不过，这也表明了德川幕府对扩大通商范围极为热心。这且不提。林罗山继又卑辞陈述："我国僻处海隅，虽曰日出，实乃谚称蕞尔之国（小国）"；"继前世之绝，兴当年之废，修遣使之交，求勘合之符"，要求继承足利幕府的外交，恢复勘合贸易。林罗山的文章，前段与后段是矛盾的。后段要求恢复勘合贸易，从明朝角度来看，勘合贸易就是朝贡，准许朝贡就要以明朝皇帝对大君（将军）加以册封为前提，从而，就只能是日本加入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成为宗属关系。但是，前段却宣称各国向日本朝贡，在华夷秩序以外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换言之，这等于向华夷秩序宣布挑战。前段所表现的夸张，以及前段与后段之间的矛盾，林罗山都是一清二楚的。大概倒正是博学的林罗山，唯其熟知勘合贸易的前提是对中华帝国的宗属关系，才认为更有必要宣告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吧。律令[②]体制下形成的传统国际意识是以中华帝国皇帝和日本帝国天皇的对等为基础的。而以承认对中华帝国的宗属关系所形成的足利幕府外交体制，其贯彻受到了这种传统国际意识的阻碍[③]。除了这种传统的国际意识以外，德川幕府深知它

10

① 源家康：即德川家康，因德川家族为源氏之一支。——译者

② 律令：日本奈良（710—784年）平安时代（794—1185年）的法令。——译者

③ 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的研究》下卷，第466页。

自身乃是经历了对明战争这种历史性实践而建立的政权，现实情况又是已把琉球王国置于统治之下，并正在创立同华夷秩序对等的自成一体的外交体制。林罗山在为求得勘合贸易而想打进对中华帝国的宗属关系时，想必也是明知矛盾，却又不能不首先强调这种现实的。

有的学者对于林罗山起草的这封本多正纯的书信曾否送达明朝皇帝，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林罗山写过"彼国犹豫未复"，但当时明朝海禁森严，托交本多正纯书信的南京商船也许是走私商船，甚至能否亲自交给福建总督也是难以肯定的①。此后，德川家康虽仍然通过琉球、对马等国企图呼吁明朝实现复交，却都失败了。原因大概是，只要按照林罗山的逻辑来呼吁，就终究不能不失败的吧。

同明朝复交的失败，虽然大大阻碍了德川家康理想的实现，但由于同明朝复交失败而未加入华夷秩序，却也带来了好处。使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大君外交体制得以具有明确的自成一体的性格，这在不久之后就显露出来了。德川幕府要主动确立大君外交体制，还需要两个动因，即所谓基督徒危机和"北狄"清朝的威胁。

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向大名和农民传布天主教，幕府担心可能酿成反体制的动向，所谓基督徒危机就是来自这种畏惧。1607年，肥前②有马地方的农民宣称，如不允许信仰自由就拒不收割。倘使农民通过信仰而集结起来，就有从根本上破坏封建制度的危险。德川家康断定，基督徒将成为威胁统治体制的势力，便于1612年首先在直辖领地发布禁止基督教的法令。1613年，把禁令扩大到全国。此外，牢人问题也威胁着德川家康。牢人是失去武士职位的武

① 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1927年，第461页。

② 肥前，今九州佐贺县和长崎县一带。——译者

士，尤其是由于关原之战①失败，很多武士被免职废封以后，有的信了基督教，有的跟随丰臣秀吉开进了大阪城。1614年，基督教徒牢人参加了大阪之战，这就使德川家康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1616年，德川家康死去，但幕府对基督教的戒备心却逐年加强；1635年，幕府终于全面禁止了日本人前往海外和海外日侨归国。盛极一时的朱印船时代从此结束了。1637年至1638年岛原、天草②的武装起义就是牢人领导的农民基督教徒武装暴动。1639年，幕府加强对基督教的禁令，完成了所谓锁国。

11

幕府虽然完成了锁国，但仍继续保持与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幕府认为，派国使相互往来、交换国书的关系是正式邦交；对互通信义的关系，则称之为"通信"，朝鲜和琉球便是这种"通信之国"。通信之国以外，不承认国使往来和受理国书，只允许贸易的国家，幕府称之为"通商之国"，以区别于"通信之国"，荷兰和中国就是这种"通商之国"。

荷兰船几乎和英国船同时来到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被称为"南蛮船"，对于荷兰船则被称为"红毛船"。荷兰和英国都在平户③设立商馆从事贸易，但英国因没能获得预期的利益，便在1623年撤销了商馆；只剩下荷兰。荷兰和英国都是新教徒国家，因为他们是以商人身份来到日本的，所以就不像以传教士身份来日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那样注重传教。荷兰人有时甚至向幕府告密，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想通过传教攫取领土；而在岛原、天草武装暴动时期，荷兰人还支持幕府，开炮镇压武装暴动等等，企图

---

① 关原之战：关原在岐阜县。关原之战发生于1600年。丰臣秀吉死后，他的部下分裂为东、西两派，两派决战于关原，东派德川家康等人获胜，德川成为霸主。——译者

② 岛原、天草：都在长崎县。——译者

③ 平户：也叫庇罗、平壶、飞鸾台，今长崎县平户市。——译者

依附幕府统治，以牟取贸易之利。锁国以后，他们受命从平户迁到长崎，被关在出岛①的商馆里不能随便外出，对此也甘心忍受了。不过，荷兰同幕府的关系，乃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幕府的关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商馆馆长——日本人唤作甲比丹②——为了"觐见答谢"准许贸易，规定几年一次前往江户，谒见将军，贡献礼品，这是与幕府接触的唯一机会。幕府之所以允许荷兰是个"通商之国"，固然是出于输入军需品及奢侈品的必要，但也是为了掌握世界情报。商馆馆长有义务每年提出综合世界情报的《和兰陀（荷兰）传闻书》。《传闻书》与红毛船带来的书籍都是幕府的重要情报来源，同时也是垄断情报的手段。

由于中国——明朝拒绝了幕府关于恢复邦交的要求，日明两国之间未能建立起幕府所希望的"通信"关系。但是，幕府允许"唐船"来往，承认"通商"关系。唐船的来往，对幕府来说，不仅在输入生丝、人参等中国产品方面是必要的，而且在输入由于锁国而断绝的安南、交趾、占城、暹罗等东南亚各国的产品，如军需品的鹿皮，奢侈品的香料和砂糖等方面也是必要的。唐船带来的"传闻书"和书籍，也是幕府的重要情报来源。

明朝于 1644 年灭亡，满族的清王朝代之而起，成了中国的统治者。清朝的出现，使日本重新想起了元寇。清朝在明朝灭亡之前，侵入朝鲜，1637 年，朝鲜国王在南汉山城③降伏。当时清太宗向朝鲜提出的降伏条件包括这样一条：允许朝鲜与日本照旧继续贸易，但要求带领日本使者来朝。这种条件，和当年元朝征服高丽，试图诏谕日本，而当日本拒绝时，便派元寇入侵日本的态度有相通之处，所以日本得悉这个情报后就加强戒备，并通知朝鲜，日

12

① 出岛：长崎海滨的人工小岛。——译者

② 甲比丹：原意为"船长"。——译者

③ 南汉山城：在江华岛上。——译者

本准备出兵赴援①。

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以福建省为基地进行活动的海盗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发起复兴明朝的运动。1645年，寄信给长崎奉行②，请求日本出兵援助。幕府决定姑且拒绝，但不排除在一定情况下出兵的可能，以观望形势的发展。后因郑氏父子的据点福州失陷，出兵一事就没有下文了。

日本把清朝看作“北狄”而感到威胁，曾打算支持反清势力，但还未待实现，清帝国就建成了。郑成功以其母亲是日本人的关系，在其父郑芝龙死后仍继续要求日本出兵援助；1661年，清朝断然下令封锁大陆时，郑在台湾建立独立政权，继续进行抵抗。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就是根据这一史实写的；以郑成功为模特儿的剧中人和藤内③大显身手，博得当时人们的喝采，1715年在竹本座剧场初次上演，取得了连续上演十七个月的空前成功。这个事实说明，东亚形势中清朝统治中国这一变化，曾给日本人以多么强烈的冲击。“北狄”清朝的建立及其威胁，加上基督徒危机，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大大推动了建立一个日本自己的国际秩序的构思。

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大君外交设想，在承认国家之间本来就不平等，主张国家之间有高低尊卑之分这一点上，与华夷秩序的想法是相同的。而且在施行严格的禁止出国令，限定外国船只停泊的港口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然而，两者对于“夷”的想法则基本上不同。中国所说的“夷”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中的“夷”，看作是未开化国，应该使之逐渐沐浴中华帝国的王化而纳入华夷秩

---

① 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的研究》下卷，第502页。

② 奉行：幕府直属地区的最高行政官员。——译者

③ 和藤内：和，指日本；藤与唐同音，暗指中国；内，在日文中与“无”同音；和藤内，暗指“中日无双”。——译者

序之中。清朝和幕府虽然都把西欧各国看作是“夷”，但对待的方式则完全不同。清朝把西欧各国的通商看作是朝贡，要求使节行三拜九叩之礼。《大清会典》曾注明，西欧各国由于远隔重洋，无法确定朝贡之期。幕府则并不认为西欧各国是朝贡国。荷兰商馆长到江户参谒幕府，始于大名轮流参觐已经形成制度之时，因此它是一种轮流参觐，商馆长旅行时的沿途待遇都以诸侯的规格为准。即使在幕府末期，俄国和英国为要求开展贸易而与日本接触时，幕府也并不认为他们是慕日本的德化而来，更没有按朝贡国对待之意。幕府认为他们是冒犯锁国政策的祖法，煞费苦心地把他们挡了回去。华夷秩序的原理是建立在凡欲沐浴王化则来者不拒，一概加以“羁縻”这样一种关系之上的；而大君外交体制则是坚守祖法，力图维持所谓“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一概拒绝”的“定制”①。

13 华夷秩序与大君外交体制原理不同，因而对待“夷”的作法也就完全不同。产生这种差别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四周没有天然障壁，对于来袭之“夷”，用“羁縻”的办法最有成效，华夷秩序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与此相反，日本四面临海，除刀伊②和元寇等“北狄”来犯外，未经受过外寇入侵，而且，这种仅有的例外入侵也全部被击退了，大君外交体制就是根据这种历史经验建立起来的。在大君外交体制的原理中，不存在“羁縻”的概念；因而，对于“夷”只能是，或者坚守“定制”，或者废弃“定制”；换句话说，只能是或者“攘夷”，或者“开国”，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一旦出现固守“定制”已不再可能的局面时，就不能不废弃“定制”，亦即不能不忍痛断然作出“开国”的决定了。

---

① 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的研究》下卷，第552—553页。

② 刀伊：指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曾于1019（宽仁三）年突然乘船五十余只侵犯日本对马、壹岐和北九州一带，被击退。“刀伊”，朝鲜语，意思是“夷狄”。——译者

第二节　西洋的冲击：华夷秩序的崩溃

四　朝贡制度的变质

在东亚构筑了宏大规模的国际秩序的明王朝于1644年灭亡，取代明朝的清王朝，尽管它本身出自夷狄，但仍继承了明朝的“中华帝国”观念，并且由于把外蒙、青海、西藏和新疆等地作为藩属加以统治，于是以清王朝为首的华夷秩序便有了非常大的扩展。它在乾隆时代(1735—1795年)达到最大规模。饶有兴味的是，这个时期在西洋恰好也是前述欧洲国家体系的扩大时期。当时在东亚，北起外兴安岭(Stanovoi山脉)、恰克图(Kyakhta)、巴尔喀什湖(Oz. Balkhash)一线，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跨喜马拉雅山、缅甸、暹罗、老挝、安南和南海诸岛，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国际秩序。

然而，清王朝朝贡制度所规定的各朝贡国的贡期是，朝鲜每年，琉球每隔一年，安南每三年、六年或四年，苏禄[①]每五年，老挝和缅甸每十年，荷兰每八年(后改为五年)一次，西洋(葡萄牙等)不定期。但是，实际实行的贡期又是怎样呢？举例来说，琉球在1662年至1805年一百四十四年间为七十次，1806至1859年五十四年间为四十五次，也就是一进入十九世纪就成了六年进贡五次这样一种比例。还有，暹罗在1662年至1776年一百一十五年间为十一次，而1777年至1853年七十七年间则为三十八次，即平均两年一次，相当于制度所定次数(三年一次)的一点五倍。再说缅甸，到1787年为止，不过三次，而1788年至1853年六十六年间则为十三次，即平均五年一次，相当于制度所定次数(十年一次)的两倍。[14]分别看来是这种情况，再看对清朝朝贡的总数。1662年至1761年

① 苏禄(Sulu)：散布于婆罗洲东北至菲律宾群岛间之列岛，明代称为苏禄，当时为贸易航海之要冲，今仍名苏禄群岛。——译者

一个世纪间是二百一十六次，但1762年到1861年一个世纪间则是二百五十五次。总之，对清朝的朝贡，以1800年前后为起点，大约半个世纪间，次数显著增加了①。

上述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清朝的政治控制能力，至乾隆时代(1735—1795年)达到顶峰，之后就趋向衰退，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上述事实意味着，朝贡次数与清朝政治控制能力的衰退成反比而增加；这还意味着，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前半期对清帝国的朝贡已失去旧时的性质而变成另一种东西。简截说来，这个时期的朝贡已不再是藩属国首脑仰慕"中华帝国"皇帝的"德化"而致敬的表现；莫如说只是靠通商来牟利的表现。总之，十八世纪末叶以后，朝贡已经主要变为进行贸易的手段了。

那个时候，得到通商利益的是朝贡国的统治者和商人呢？还是中国的商人和官僚呢？这可能是个问题，但这里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这些通商几乎都是通过中国商船所控制的贸易渠道来进行的。因此，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前半期对中国朝贡次数的显著增加，乃是以中国商人为向导的海上贸易处于高潮的证据。也许可以这样说，对于构成"中华帝国"华夷秩序基础的朝贡制度，给予第一次打击的并不是拒绝承认朝贡国地位的欧洲人，实际是当时业已进入高潮的中国对外贸易②。而欧洲商人借助这些中国商人侵入了"中华帝国"，眼看不久便冲垮了朝贡制度的堤坝。然而，变成通商手段的朝贡，随着交易的发展而愈加频繁，清朝官方却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这无非是"中华帝国"威信提高的表现，这就使中华优越性的观念越来越强固③。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与现实的背离，把清帝国引向毁灭的深渊。

---

① 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第144页以下。

② 同上，第143页。

③ 同上，第145页。

五　广东贸易

在以“中华帝国”为首的华夷国际秩序中，通商与朝贡本来是单一的对外关系制度的两个侧面。“中华帝国”统治者所关心的是朝贡的道义上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夷狄外邦所关心的则是通商的物质上的价值。然而，通商的扩大，已使朝贡失去内容，却还想只顾保持朝贡的神话，这就当然要发生冲突。在清帝国对外关系的实 [15] 际中，通商已占据优势以后，支配着清帝国当局头脑的却仍然是朝贡观念，满脑袋“王道思想”的官僚们，还想把新的西方通商各国商民当作单纯的朝贡者来对待。总之，清政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①。

可是，看穿中国封锁主义面纱的欧洲朝贡使节不大来了，间隔期长了。现在，查一查 1656 年至 1795 年一百四十年间，欧洲各国向北京朝贡的次数：俄国六次，葡萄牙四次，荷兰三次，罗马教廷三次，英国一次，共计十七次②。而且这十七次中，还有五次是在 1727 年以后，即欧洲国家体系已经形成完毕，对亚洲的压力开始加重的时候进行的；其中，除开 1793 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Macartney, G.）③的情况这一仅有的例外，其他大概都行了三拜九叩之礼。特别是 1795 年荷兰使节的朝贡，完全符合传统的朝贡仪礼。总之，除了英国使节的情况以外，即使通过这些接触，旧有的华夷秩序也还未受到挑战④。

可是，如上所述，十八世纪末叶以来，朝贡已经不是藩属国对中华帝国敬意的表现，实际上毋宁说只是通商的手段了。这里就

---

① 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第 139 页。

② 费正清、邓嗣禹合著，《清代朝贡制度》，第 188 页。

③ 马戛尔尼（1737—1806 年）：1792—1794 年间代表英国来华。——译者

④ 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第 149 页。

出现了观念与现实的背离。清帝国当局无视这种背离，死死抓住朝贡观念；另一方面，葡萄牙和荷兰等古老的重商主义国家，则保持着灵活性，尽量利用对方国的观念和制度，以获得贸易利益。而当时正在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为了维护产业资本的原则，对于对方国这类阻碍本国利益、束缚自由交易的观念和制度的存在则不予承认。清帝国当局却还没意识到，英国是对朝贡制度这种制度本身，并进而对"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这种秩序本身的可怕的挑战者，而把英国也看作不过是沿南海商路前来朝贡的蛮夷之一。

这样一来，清帝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不管实质上如何，官方的说法仍然应是朝贡。既然如此，那么认为其主导权掌握在清朝手里，也就不足怪了。1685 年，康熙皇帝时代，由于清帝国正式准许外国贸易，葡萄牙船和英国船得以到广州、厦门和宁波等地进行交易，但到了 1757 年，乾隆皇帝时代，海外贸易便只限于广州一地（对于俄国则允许在外蒙古北部的买卖城① 和北京进行交易）。所以，除俄国外，要考查欧洲各国同清帝国的通商关系，只以在广州西南城外外侨侨居地区所进行的贸易为对象就可以。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在广州设有商馆，后来美国波士顿的商行也开设了商馆。当时，交易额最大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为该公司从英国政府获得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买进茶叶、丝绸和棉织品等，并向中国出售毛织品和棉花。英国随着饮茶之风日盛，茶叶输入量益增，但没有相应的回头货输出到中国，因而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一直持续入超。为了弥补这种赤字，就想出了将印度出产的鸦片卖给中国

---

① 买卖城：今名阿尔丹—布拉克（Altan Bulak）。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北方国境上，和苏联的恰克图相邻。买卖城和恰克图本为一城，1727 年清政府与帝俄政府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划入俄境，中国商民另建市街于城南，名曰买卖城。——译者

的办法。从1773年左右英国人开始取代葡萄牙人经营鸦片，对华输出量就急剧增加，据说1790年已达到四千箱。于是清政府便在1796年严禁吸食鸦片，1800年禁止了鸦片的输入和罂粟的栽培。这样，鸦片在中国成了违禁品，英国东印度公司便避免由公司本身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利用住在印度的英国商人来销售。通过这种方法，违禁品鸦片流入中国，而且数量逐年剧增，英国以此遏止了白银向中国外流。

据统计，中国消费鸦片的数量，1816年为三千二百一十箱；1825年为1816年的三倍；1830年为1825年的两倍①。就是说，十五年间增长为六倍。因此，中国方面的广州贸易在1826年以后转为入超，中国的白银开始外流。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越来越重要，当时在英国本国，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自由贸易的论调盛行起来，终于在1834年废除了授给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此后，在广州的英国商行和侨居的商人激增，据1837年的统计，商行达1831年的三点四倍；商人大约达1831年的五倍②。对此，英国政府派出了贸易监督官前往广州，使之监督英国商行和商人。这样，英国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就在广州与清帝国的权力和秩序直接发生了接触。

六 鸦片战争与条约体系

1839年3月10日，为了取缔鸦片进口，湖广总督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到广州。他到任不久，就迫使英国商人交出库存鸦片，并将没收的两万多箱鸦片当众销毁。但不久他就认识到，只要不杜绝其来源，就不可能断禁鸦片贸易。因此，他便写信给“英国的统治者”，他以为不论中国人或英国人，人性（从而也包括道德 17

① 增井经夫：《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弘文堂，1956年，第27页。

② 波多野善大编：《东亚的开国》，人物往来社，1967年，第89页。

意识）按理都应该是一样的，在这种期待下，向英国人的“良心”发出了呼吁。就这样，一面采取强硬手段，一面兼行说服，这既是“中华帝国”对待夷狄的传统办法，也是中国传统的统治艺术①。

然而，对林则徐来说，不幸的是，这种方法在两个方面都失败了。因为在使用强硬手段方面，英国炮舰很快就以优势武力进行了报复；在说服方面，英国人并不想承认鸦片贸易是唯一的重大争论焦点。在英国人看来，问题在于外交平等，通商自由，依法保障在华外侨的安全等等；与此相反，在中国人看来，鸦片贸易使日益增多的鸦片吸食者中毒，而且使中国经济命脉攸关的白银外流，唯有这种祸害才是问题所在②。清帝国与英国围绕鸦片贸易的对立，正来自这种论点的分歧，英国要凭借武力贯彻本国的论点，这就是鸦片战争。

如所周知，鸦片战争从1840年英国海军入侵澳门开始，到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结束，1843年10月又缔结了附加的《虎门条约》。战争以英军方面的胜利而告终，所以结束战争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也都是按照英国的逻辑来订立的。即在《南京条约》中首先规定：(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港；(2)割让香港；(3)废除特许商人制度，实行自由通商；(4)赔偿战费；(5)规定适当的关税（丧失了关税自主权）；(6)两国官员地位相当者彼此平等。继而在《虎门条约》中规定：(1)最惠国待遇；(2)对外国人的裁判权问题（领事裁判权）；(3)军舰自由出入上述五港等等。一个标志着条约的特点的事实是，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里，竟没有关于鸦片贸易的明确规定，这就恰恰证明是对英国逻辑的单方面的被迫接受。诚然，《虎门条约》第十二条有关于禁

---

①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选编，1839—1923》，雅典娜平装本，1963年，第23页以下。

② 同上，第23页。

止走私的规定，但这等于具文，向中国走私的鸦片，在鸦片战争后更加显著地增加了。

这样，在1842年至1843年与英国缔结一系列条约之后，清帝国又于1844年7月与美国缔结《望厦条约》，同年10月又与法国缔结《黄埔条约》，1845年7月并与比利时交换了关于贸易的备忘录，1847年3月与挪威缔结了通商条约。缔结这些条约的意义十分重大，并不亚于鸦片战争本身。因为这些条约的订立只能是向内外表明，前此居于华夷秩序的顶峰，而与东亚朝贡国处于主从关系的中华帝国，现在已经与欧洲国家体系各国处于在法律上平等的横的关系了。这在华夷秩序的漫长历史中，是最大的破天荒事件，也是冲击力最大的事实。这意味着，作为“朝贡体系”(the imperial tributary system)顶峰和中枢的唯一独立部分，已被划入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条约体系”(the treaty system)之中①。由此必然要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华夷秩序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然，象华夷秩序这样的庞然大物，是不会因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缔结的一系列条约一下子就崩溃了的。传统的观念和作法等等，至少在其内部还保留着。尤其在清帝国与琉球、安南、朝鲜的关系上，这些观念和作法仍牢固地留存着。正因为这样，清帝国才在1879年围绕着处理琉球问题同日本进行了争夺；1884年为安南与法国，1879年为朝鲜与日本还有过战争。所以，可以认为，以清帝国为首的华夷秩序，从签订《南京条约》到日清战争，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逐渐崩溃过程。

然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帝国与欧洲国家体系各国之间形成了法律上平等的横的关系，这决不意味着清帝国在实力上进入了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关系。如前所述，欧洲国家体系是一种以

① 前引《清代朝贡制度》，第135页。

"势力均衡"为生存原则的国际秩序，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在那里，国家主权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力上各国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并存。就是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平等和强国蚕食弱国同时并存的世界。所以，腐朽的"中华帝国"具有同欧洲强国在形式上平等的横的关系，这倒意味着这个帝国成了列强公然掠夺的对象。清帝国的半殖民地化之所以说从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其原因就在这里。这样，华夷秩序的崩溃和清帝国的半殖民地化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同时进行的。

第三节　西洋的冲击：日本的外来压力

七　日本同西洋的接触

位于东亚世界东端的日本，如上所述，从丰臣秀吉发动日明战争以后，处于以明清两帝国为首的华夷秩序之外。不仅如此，德川[19]幕府还通过萨摩藩把琉球、又通过对马藩把朝鲜作为"通信之国"，把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贸易限于长崎一港，置于严格控制之下，由此便建立了把日本装扮成可以说是小型"中华帝国"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才在东亚国际秩序（华夷秩序）之外的东方，得以置身于"锁国"的孤立状态而自享其成。

西方列强的船舶开始来到这个所谓锁国状态之下的日本，之后不久，有识之士便感到西方列强的外来压力，那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1764年至1854年九十一年间日本同西方列强的接触、交涉和联系。这里说的1854年，当然就是日本被迫实行开国的那一年；而1764年，则是欧洲七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

首先，为了了解总的趋势的变化，把这段时间分为三期：1764—1793年的三十年为第Ⅰ期；1794—1823年的三十年为第Ⅱ

期；1824—1854 年的三十一年为第 III 期，来看一下每个时期日本同俄国、英国、美国、法国的接触次数①，便得出下表：

	俄国	英国	美国	法国
I	2	0	0	0
II	8	8	3	0
III	7	11	11	2

这里的第 I 期，在欧洲来说，相当于从 1763 年签订《巴黎条约》，结束七年战争，由此重新建立欧洲国际秩序，到由于拿破仑战争破坏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时期，就整个欧洲国际秩序来看，是比较安定的时期。美利坚合众国在这时期刚刚独立，当然和日本完全没有接触，姑且不论，而英国和法国在这个时期与日本也没有任何接触，这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第 II 期是，由于法国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十八世纪欧洲的国际秩序遭到完全破坏，接着，又由于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而得到恢复，从而产生了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协调"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即 1823 年，恰好是"门罗宣言"② 发表的一年，可以说美利坚合众国正是从这时起在国际政治上跨出了独立的第一步。不过，美国作为独立的世界强国与欧洲列强对抗，乃是十九世纪末以后的事情，在这以前，美国也还是与欧洲列强并肩，竞相企图向东亚扩张的。 20

最后的第III期，是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侵略缅甸

---

① 田保桥洁：《增订近代日本外国关系史》，1943 年。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年表》，岩波书店，1966 年。

② 门罗宣言：指 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其实质是要求由美国来独霸美洲，通常被称为"门罗主义"。——译者

(1824—1826 年的第一次缅甸战争)和收买新加坡开始，经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时期。

那么，在这三个时期里，俄国、英国、美国和法国各自同日本的接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我们的下一个课题便是对这一问题作些观察。

八　俄国、英国与日本

首先谈谈俄国。在其他西方列强与日本尚毫无接触的上述第 I 期中，唯有俄国与日本有过接触。这已然意味着，俄国在这个时期，已不仅是欧洲的强国，同时也是一个亚洲的强国。换言之，欧洲国家体系的东部柱石，亦即“两翼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亚洲的强国了。

诚然，在上表第 I 期中，俄国同日本的接触次数还不多，但是，一进入第 II 期，就一跃而为第 I 期的四倍。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时期又集中在 1797 年至 1813 年的十六年间，即拿破仑战争时期，而 1814 年以后的十八年间则一件也看不到。这说明俄国向东亚扩张并不是在和平时期，而倒是在战争时期急速展开的。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时期(1854—1856年)也可以看到。可以认为，这是俄国在侵略东亚方面采取行动的一种模式。

到了上表的第 III 期，俄国同日本接触的次数比第 II 期更少了。这一点与后述的英国、美国、法国相比较，是俄国向东亚扩张的显著特点。这意味着，俄国向东亚扩张不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加速度地积极化了，而是在偶发事件的触发之下时断时续地进行的。

第二，谈谈英国。在第 I 期中与日本毫无接触的英国，一进入第 II 期，接触次数就一跃而与俄国相同，这种现象完全可以从它同拿破仑战争的联系中得到说明。也就是，英国企图乘这次战争夺取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和根据地，为此才将战线扩大到远离欧

洲战场的东亚，结果也就和日本有了频繁的接触。而且，这种在战时即已着手的对亚洲的侵略，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仍然继续进行，不仅通过前述第一次缅甸战争和收买新加坡岛等扩大了其活动的幅度，而且一直继续到挑起鸦片战争。

21

进入前表第 III 期，英国同俄国的情况相反，与日本的接触次数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是完全由于鸦片战争以及在本期末尾时发生克里米亚战争的缘故。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在东亚得到些什么，前面已经说过。这次战争之后，英国的关心几乎完全集中到清帝国身上，至少到 1852 年为止，英国的外交部和商人，姑且不谈琉球，对日本的贸易还是几乎不感兴趣的①。可是，英国人通过克里米亚战争认识到日本列岛的战略价值。克里米亚战争当然是欧洲的战争，然而，其战场却扩大到远东和北太平洋海域，由于英法联合舰队在这里对俄国舰队和俄国要塞反复进行了战斗，因而英国强烈要求同日本接触也就不足怪了。1854 年日英首次缔结条约，是由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擅自主持而实现的，从英国立场来看，可以说它不过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副产品②。

九　美国、法国、荷兰与日本

第三，谈谈美国。在上表第 I 期中，同日本完全没有接触的美国，进入第 II 期就有了三次接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除这三次外，实际上还有若干美国船只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租用船而开进长崎这个事实。这是因为，由于拿破仑战争，荷兰被卷入对英国

① W. G. 比斯利(Beasley)：《英国与日本的开国，1834—1858》，卢扎克，1951 年，第 85页以下。

② P. E. 埃克尔 (Eckel)，《克里米亚战争与日本》，《远东季刊》，第 3 卷，第 2 号，1944 年 2 月，第 109 页以下。奥平武彦：《克里米亚战争与远东》，《国际法外交杂志》，第 35 卷，第 1 至 4 号，1936 年，第 42至 68 页，313 至 343 页。中山治一：《克里米亚战争的意义》，《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第20 卷，第 9 号，1969年 2 月，第 53 页以下。

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害怕英国海军捕捉它的船舶，就租用美国船只继续进行长崎贸易。现据调查得知，在这种形式下，开进长崎的美国船只，从 1797 年至 1807 年十一年间，曾有九只之多①。把每只船按一次计算，加上上面列举的三次，计共十二次。也就是，美国在第 II 期与日本接触的次数超过了俄国和英国。不拘怎说，美国人通过这种接触，当然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兴趣。

美国人所以认为必须同日本建立邦交，本来是为了在北太平洋捕鲸和进行广州贸易，现经调查，美国与日本的接触次数，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和二十年代完全没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仅有一次；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起急剧增加，1845—1854 年十年间有十次，平均每年一次。在美国如此积极对日接触的背景中，自不待言，有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 1846 年占有了俄勒冈和 1848 年占有了加利福尼亚，从而使美国西部国境到达了太平洋沿岸。于是，美国在这条向西推进不断扩展的活动线上，逼迫日本开国；日本屈服于美国威力，终于在 1854 年决定开国。不过，美国对日本加速施加压力，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而在 1861 年南北战争开始后，这种压力就迅速减退了，这是颇具特征的事实，在这一点上，美国与英、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二者在 1854 年以后仍然对日本加速度地增大了压力。

第四，谈谈法国。这个国家无论在上表第 I 期或第 II 期都与日本没有任何接触。进入第 III 期，而且是在最后几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才逐渐开始与日本有所接触。这同法国在英国于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影响下，也占领了南洋各岛（马克萨斯、新喀里多尼亚、土阿莫土② 等岛），并向交趾支那和安南等地派遣军队进行威吓等等，大体是同一时期。然而，正如前面谈到英国时

---

① 田保桥洁，前引书，第 302—305 页。

② 土阿莫土，也称劳(Low)或波奥莫土(Poumont)群岛。——译者

所述，法国曾与英国联合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通过这次战争才加深了同日本的接触，尤其是在1855年同琉球缔结亲善条约以后，法国对日本的压力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日益加强的。这同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结成联盟，这个联盟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保持下来，变成侵略清帝国的联盟，以及在此同时法国正式开始侵略印度支那，1859年占领西贡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

最后应该提一下荷兰。荷兰在幕府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期间，一直经常保持通商关系，幕府和这个国家也重新缔结了友好条约（1855年）及追加条约附属协定（1857年），并进而订立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这些事实当然意味着幕府和荷兰当局已经意识到，与过去日荷关系性质完全不同的新关系，现在已经把日本与荷兰联系起来了。

那么，这里所讲的性质不同的新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前述欧洲国家体系所产生的那种近代欧洲所特有的国际法关系。亦即通过缔结安政诸条约①，幕府便把日本纳入近代欧洲“条约体系”之中了。既然如此，那么，日本又如何对付上述欧洲的冲击，如何不仅卷入欧洲“条约体系”之中，而且不久自己也进而学会欧洲 23 “条约体系”的逻辑，把这种逻辑应用于对清帝国和朝鲜等国的交涉，并得以使后者所固执的华夷秩序的逻辑屈服了呢？

第四节　日本的对策

十　大君外交体制与幕府政治

大君外交体制是以日本四周环海，对外敌形成天然屏障为前提而建立的。幕藩体制是认为日本根本不会遭受海外侵袭而形成

① 安政诸条约：英、美、俄、法、荷等国强迫日本开国时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均缔结于安政五年（1858年），故称“安政诸条约”。——译者

的。日本的海防由中央政府即德川幕府负责，但是，以封建割据为原则的幕藩体制，既不能够树立统一的海防政策，也没有想去树立。

德川氏本来不过是有势力的大名之一，在关原之战胜利后控制全国，建立了德川幕府。德川氏虽然身为霸主，负有统治全国之责，但同时也是和其他大名一样的封建领主。作为霸主，其权力的基础是，除分布在全国的四百万石的天领（直辖领地）以外，还统辖着主要城市和矿山，掌握着货币铸造权。然而，负责统治全国的幕府所拥有的用以保卫日本的武力，却只是封建领主德川氏在关八州① 和东海② 部分地区以三百万石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直参③，加上最下级武士"足轻"，仅有三万人左右，这些武士，慢说全国海岸线，就连防守分散的天领也不够。

防卫各大名领有的海岸线，是领有该海岸线的大名的责任，但是，幕府统治大名的政策却又是不使各大名积蓄其防卫力量。幕府是"本"，大名是"末"，为了加强幕府，削弱大名，幕府实行了强本弱末的政策。幕府一方面巧妙地配置大名，使之互相牵制，一方面借助亲藩④ 和谱代大名⑤ 来控制全国，同时尽力削弱外样大名⑥ 的势力。禁止建造大船，或垄断贸易和情报，都是幕府的强本弱末政策的表现。

---

① 关八州：是关东八州之略称，指箱根关以东各藩国，包括现在的东京都和神奈川、埼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等县。——译者

② 东海：指东海道，即近畿以东太平洋沿岸各藩，包括现在京都到东京的沿岸地区。——译者

③ 直参：也称直者，意思是直属家臣，德川时代指直属将军的一万石以下领主或领取俸米的武士。——译者

④ 亲藩：指德川本家的藩主。——译者

⑤ 谱代大名：指在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以前已经臣属德川家的藩主，与幕府关系较近。——译者

⑥ 外样大名：指幕府建成后成了藩主的大名，与幕府关系比较疏远。——译者

幕府的强本弱末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幕府体制的矛盾由此却反而更加深刻化了。外样大名为了对抗强本弱末政策，有的奖励土特产的生产，有的实施专卖制度，以求藩国经济的自立。“雄藩”拥有一定规模的领地，能够形成自己的藩国市场，得以走上经济自主的道路，因而得以积蓄起对抗幕府的经济力量。而小藩由于领地狭小，不能形成藩国市场，经济上越来越贫困。强本弱末政策到头来带来了讽刺性的结果：它使幕府所依赖的小藩即谱代大名极端疲敝，反之，却相对地加强了幕府的潜在敌人即大藩的外样大名。

海防问题本来是全民族的任务，幕府的政策及其后果却使海防问题的矛盾激化了。当欧洲各国凭借发达的交通运输工具逼近日本的时候，这种矛盾就变得极为深刻了。围绕日本的漫长海岸线不仅不再是天然屏障，反而造成了到处都可遭受外国进攻的可能性。幕府的祖法要求攘夷，但是幕府并没有迎击外敌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而祖法又禁止开国。幕府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

幕府是选择开国，还是攘夷，这要看幕藩体制的变革能把幕府的政策改变到何种程度。估计是1727年，儒者荻生徂徕就向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提出过《政谈》，极力主张为了解决武士阶级的穷困，必须变革体制，使幕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从西欧船只来航的第Ⅰ期即十八世纪中叶起，思想家们已经开始明确认识到，必须使幕府绝对主义化。当俄国南下，北方发生了危机时，仙台藩医师工藤平助在1783年写出《赤虾夷风说考》，主张同俄国开始正式贸易并开发虾夷（北海道）。继之，1786年林子平写出《三国通览图说》，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朝鲜和琉球。1791年，林子平又写出十七卷的《海国兵谈》，强调海防是全民族的任务，指出“海国武备在沿海，沿海兵法在于水战，水战关键在于大炮，此海国之当然兵制也”。他还写了如下的名文说：“长崎炮备森严，而安房、

相模[①]诸港却无此装备，此事殊不可解。试审思之，自江户日本桥至中国、阿兰陀（荷兰），水路一望无际，而此处不备，仅备长崎，何也？"[②]次年（1792年），老中[③]松平定信把林子平的主张斥为"奇谈怪论"，禁止出版，并将林子平判刑监禁。但不久，俄国使节拉克斯曼（Laksman, A. K.）持叶卡德琳娜二世（Ekaterina II, A.）的国书来到根室[④]。松平定信拒绝接受国书，拒绝在长崎以外地方进行谈判，发给前往长崎的入港许可证，便遣拉克斯曼回国了。

松平定信后来视察了关东沿海地方，制定了防守计划，但未能从根本上制定出彻底的对策。由于海防日趋重要，幕藩体制的矛盾也就越发明显。1797年，大原左金吾刊行《北地危言》，指出"外寇乃天下（指日本全国——译者）之仇，非仅一国（一藩）之寇"，极力主张为了对付外寇，必须"竭尽天下之智"，"平衡配备"全国军事力量；强调废除等级制并实现中央集权乃是保卫国家的必要前提[⑤]。幕藩体制既然只能在国际条件允许锁国的情况下保持下去，那么，这种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时，幕府的继续存在就取决于幕府能否变革体制了。"北方危机"对幕府提出了在内政方面变革统治体制的问题。然而，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只是少数的有识之士。

25　其中之一本多利明在十八世纪末所写的《经世秘策》中，指出了日本为求得在国际上有所发展的四大当务之急：第一，大量储存火药；第二，把金银铜铁作为国家力量的重心予以重视；第三，大量建造船只，确立海外贸易制度；第四，大力开发日本周围的无人岛

---

① 安房在今千叶县南部，相模在今神奈川县，均在江户湾（今东京湾）附近。——译者

② 林子平：《海国兵谈》，《岩波文库》本，第17、18页。

③ 老中：幕府官员，直属将军，负责总理政务，从食禄两万五千石以上的世袭诸侯中指派。——译者

④ 根室：北海道东北部海港，隔海与千岛群岛相望。——译者。

⑤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第340页。

屿。本多利明主张的重点在于第二点的金银和第三点的船只，他认为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易，取得他国的金银以充实日本的国力，这是国策的根本。他强调如果推行这种“远涉海洋”和“劝业增产”的制度，那么，“东洋的大日本同西洋的英吉利岛”就能够并称为“富强之国”①。从把日本和英国并列这一点可以看出，本多利明已经放弃了夷狄观，并由此批判了锁国制度。

佐藤信渊继承本多利明的国家富强论，发展为体制变革论。在1827年所著《经济要录》中，佐藤信渊举出“流通交易”作为新政的当务之急；又著《垂统秘策》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方策，建议确立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把生产、分配及流通的机能集中到中央政府。佐藤信渊设想凭靠仁德君主的善政，建成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完美无缺的国家，使日本成为世界的盟主，并以“产灵②之神意”这种超越一切的权威，来否定幕藩体制，提倡建设统一的国家③。

这里，否定了国内的幕藩体制和对外的大君外交体制这种政治结构，以扩张代替锁国，以中央集权代替封建割据，作为一个历史方向被提出来了。

本多利明或佐藤信渊等人的思想何以不产生于华夷秩序下的中国，却产生于大君外交体制下的日本？弄清楚这一点，对于认清日本和中国对西欧的冲击所采取的对策之不同，以及由此导致其后发展前途各自不同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清朝的异民族统治与日本的幕藩体制不同，特别是幕藩体制以封建割据为原则，承认多种思想的存在；其次的原因在于，华夷秩序把中国以外的世界看作是“夷”，当作“羁縻”的对象，决不承认是平等

---

① 《日本思想大系》第44卷，岩波书店，1970年，第14、138页。

② 产灵，意为造化万物之神。日本神话说，最初出现在高天原之神有三：天御中主尊、高皇产灵尊、神皇产灵尊。——译者

③ 佐藤信渊，《垂统秘录·混同秘策》，《改造文库》本第66—67页。

的关系，而大君外交体制则由于是在中华秩序的外缘形成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把自己的国际秩序当作唯一的、绝对的东西，而认为是若干国际秩序之一。

十一 锁国的动摇

要完成保卫国土这一全民族的任务，不对幕藩体制进行根本变革是不可能的。然而，幕府却没能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804年，俄国使节列扎诺夫（Rezanov, N. P.）持幕府发给拉克斯曼的开往长崎的入港许可证来到长崎，要求开国通商。幕府恪守祖法，拒绝了开国通商的要求。于是列扎诺夫便策划对日本进行报复，俄国军舰袭击了虾夷各地。幕府因为海防空虚，便反过来放宽攘夷政策，1806年颁布接待外国船只法令，许可对来航的外国船只供给食物和薪炭等，另一方面，1807年，把整个虾夷划为直辖地，设置奉行，并指令奥羽① 各藩加强警备。

26

在欧洲，拿破仑战争开始，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正在激化。日本与西欧列强的接触进入了第II期，不仅俄国，英国船也频繁开来了。最早发生的是1808年的菲顿（Phaeton）号事件。英国军舰菲顿号为了追捕定期开往长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闯进了长崎港，但因荷兰船并未开来，在补充了薪、水和粮食之后，旋即退去。这个事件表明，形势已发展到欧洲战争会立即影响到东亚的地步。日本无力阻止英国军舰的行动，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杀。幕府更加痛感到海防的必要性，为了保卫江户湾，命令会津藩② 和白河藩③ 在相模和房总④ 修筑炮台。

---

① 奥羽：古代为陆奥、羽前、羽后的合称，指今青森、岩手、山形、秋田等县。——译者。

② 会津藩：在今福岛县会津郡一带。——译者

③ 白河藩：在今福岛县白河市一带。——译者

④ 房总：安房、上总、下总的合称，在今千叶县境内。——译者

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和维也纳会议的结果，俄国和英国的压力稍微减弱了。幕府认为外来压力已经减弱，便解除了会津、白河两藩的海防警备，把相模移交浦贺奉行管辖，房总则由代官[①]森觉藏负责。好不容易才开始进行的江户湾防卫准备，为什么又轻易放弃了呢？这是因为，如果动员大名去保卫要地，就等于是把战略要地交给了大名，这样做虽然有利于抗击外来的敌人，却不利于幕府本身的安全，而且强本弱末政策的大名配置也要被打乱。既然仅仅把相模和房总两地交由大名防卫，就认为将使幕藩体制不稳，那么，要建设全国性的海防，不变革幕藩体制就更加不可能了。

认真考虑变革幕藩体制的时机，在1820年过后不久就迅速来到了。当时，太平洋上盛行捕鲸，英国捕鲸船有几只停泊在常陆[②]海面，由于需要粮食和薪炭，船员有时登陆，有时还和日本渔民进行过日常接触。特别是1824年在常陆的大津滨登陆的事件给水户藩和幕府以巨大冲击。1825年，幕府毫无实力依恃，就发布了《坚决驱逐令》，命令对靠近沿岸的外国船只一律予以炮击驱逐。就在这同一年(1825年)，水户藩儒者会泽正志斋把受到大津滨事件冲击时所著《新论》一书提交给藩主。1830年，他的弟子秘密刊行《新论》，畅行全国，据说竟至忧国之士无不人手一册。会泽正志斋在书中虽对幕府表示忠顺，同时却严厉批判强本弱末政策，要求变革体制。

尽管会泽正志斋提出了警告，幕府仍然毫无作为。打破这种死水一潭局面的，是1837年美国籍商船摩理逊号的来航。在前述分期中，摩理逊号来航被列入第III期，该船乘有英国贸易监督官

---

① 代官：管辖幕府直辖领地，掌管年贡、审判、警察等事务的官员。——译者

② 常陆：在今茨城县一带；大津滨，今仍名大津滨，是在茨城县北部海岸的一个小海港。——译者

27 的首席翻译官。贸易监督官义律(Elliot, C.)①企图以送还日本海上难民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开国，但未能得到英国的许可。美国公司获悉后表示愿意提供船只；为了不让美国在日本开国问题上抢先，义律就派首席翻译官搭乘该船同来。这样，摩理逊号就担负了第III期特有的新任务——使日本开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市场。摩理逊号刚刚驶进江户湾，就遭到依《坚决驱逐令》发出的炮击而退走，未能达到使日本开国的目的，但此举却成为使渡边华山的《慎机论》和高野长英的《戊戌梦物语》问世的契机。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在摩理逊号来航的次年，即1838年所写的这两部书，把过去动辄忽视现实的空想海防论，一下子提高到合理而又现实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对幕府的锁国政策进行了彻底批判。

渡边华山是田原藩②的年寄役③兼海防挂④。田原藩是一个小藩，位于环抱三河湾的渥美半岛，有漫长的海岸线，苦于财政困难和沿海防务。渡边华山因职务上"首应审度敌情"，便立志调查西洋情况，由此接近洋学。为了解决当前的实际任务，他对世界的地理、历史以及兵学、测量和炮术等都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渡边华山发现欧洲之所以能以强盛夸耀于世界，乃在于合理的精神及以此为基础的实学，并看出了合理的精神的基础在于社会体制。他强调为了对抗欧洲各国的强盛，日本必须变革社会体制，开展合理的思考；他警告，如果日本不实行自身的改造并谋求引进西欧技术，那么对于"饿虎渴狼"般的欧洲各国来说，便将成为"路上

① 义律：即鸦片战争中，指挥英国舰队入侵我国的英国驻华领事义律，后任海军大将。——译者

② 田原藩：在今爱知县渥美半岛田原市一带。三河湾和渥美半岛，今仍旧名。——译者

③ 年寄役：是江户幕府时代各藩的家老，即藩主下面的最高官员。——译者

④ 挂：指负责某项专职的机构或官员，类似我国的科、股或专员、特派员等。——译者

之遺肉”。渡边华山感到断绝海外情报来源的贸易是(对日本发展的)一种桎梏，从正面批评了幕府，并特别指出，由于日本锁国，阻断各国交通，当外国指责这种状况是“有害于世界各国”时，无言可对，“将为彼等之贪婪提供口实”，要求停止锁国政策①。

1838年，荷兰商馆长向幕府报告了摩理逊号来航的经过和卷土重来的计划。幕府评定所②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如果再来就予以驱逐。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等人为了阻拦这种击攘政策，写了《慎机论》和《梦物语》等书，力图通过代官江川英龙(太郎左卫门)来影响幕府。对此，大君外交的负责人林述斋等守旧派，竟通过林述斋的次子鸟居耀藏，对渡边华山等人③进行迫害，以企图偷渡小笠原群岛的无人岛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渡边华山“蛰居”④，用木笼押回原籍，高野长英也被捕入狱。渡边华山自杀了，高野长英虽一度越狱，但六年之后遭到追捕，也自杀了。这就是“蛮社(即蛮学社中⑤之略)之狱”，在事件中遭受株连的江川英龙曾吟诗说：“故乡仍深夜，富士已晨曦”。洋学——最接近近代科学——，作为打开实际政治危机的手段，在正向统治体制内部渗透之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黑夜仍深，幕府内部的开明知识分子，从此就回避 [28] 了政治批判，洋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成了加强和修补封建体制的学问，仅仅在当局认为需要发展的军事科学这一侧面得到发展。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等所提出的对体制的批判，通过佐久间

---

① 《日本思想大系》第55卷，岩波书店，1971年，第70页。

② 评定所：审判机关。——译者

③ 佐藤昌介：《洋学史研究序说》，岩波书店，1969年，第296页。

④ “蛰居”：江户时代对士人以上施加的一种刑罚，使幽居一室，除因公外不得外出，断绝同外界的往来。——译者

⑤ 蛮学社中：蛮学指西方学术，社中指结社，蛮学社中是西洋学社的意思。——译者

象山，在吉田松阴等人的尊王攘夷运动中被继承下来。

十二　鸦片战争的冲击

鸦片战争于1840年开始，1842年结束。战争爆发的消息通过荷兰商馆传到日本，日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老中[①]水野忠邦的结论是，鸦片战争虽然是外国的事情，但日本必须引以为戒；他决心即使为了对抗列强来犯东亚，也必须设法重建国内的体制。水野忠邦采纳了长崎炮术家高岛秋帆的建议，开始训练洋式炮术，并以同渡边华山交往甚密的开明官僚羽仓下记、川路圣谟、江川英龙等为智囊，宣布天保改革计划；1843年，荷兰船传来了英国舰队计划前来日本的密报，水野忠邦获知后，改变了过去对外国船只炮击驱逐的强硬方针，发布了可以供给薪、水的命令。然而，水野忠邦的改革，终于遭到了抵制。1843年，水野忠邦公布的《上知令》，把江户和大阪周围定为幕府直辖领地，建立以幕府直辖兵力部署防卫的态势，并试图通过加强幕府财政、重划所属领地来强化将军的权力。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它打算超越封建割据，建设举国一致的军事力量，以进行全民有责的国土防卫，应付紧迫的国际危机。但是，《上知令》引起了领有江户和大阪周围地区的大名和旗本[②]的抵抗。将军撤回了《上知令》，1844年，水野忠邦下台了。随着水野忠邦下台，海防方案也缩小了。《上知令》虽曾一度公布，但因大名和旗本等的反对却不得不撤销，这表明幕府的权威已不如往昔了。

在因鸦片战争造成了风云紧急的东亚形势中，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Willem II)给幕府寄来国书，陈述世界形势，指出

---

① 老中：江户幕府的官职名，直属将军，总理政务。——译者

② 旗本：德川时代直属将军的武士，一般俸禄在一万石以下，五百石以上。——译者

日本如拘泥于锁国的旧习，将重蹈中国覆辙，敦促迅速开国。这时幕府的负责人是下台八个月后再度担任老中的水野忠邦。虽然外患紧迫使他得以东山再起，但他的地位已不如以前稳定了。水野忠邦认为，国际交往乃世界大势所趋，维持锁国终究是不可能的，所以应当接受劝告，打破成规，受理国书。然而，将军德川家庆却拒不采纳。荷兰的意图是要取得日本开国的主导权，以维护它的既得权益。如果当时水野忠邦的主张被采纳，日本的开国便大约可提前十年，其后的历史发展也许会有很大不同。然而，继任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却向荷兰商馆长指出，按照祖法，日本和荷兰之间"一向只有通商，并无通信；信与商，各自有别"，拒绝了开国的劝告，并宣称将来也没有与荷兰政府进行商谈之意。

阿部老中的意见是，一面压制诸侯的反对，一面试图调整幕府独裁体制，以推行国内改革，在外交上则采取温和政策，以缓和列强对日本的压力。阿部正弘与前任水户藩① 主德川齐昭、萨摩藩② 幼主岛津齐彬等密商，让德川齐昭对海防问题积极献策，负责充实军备，并通过德川齐昭征求宇和岛藩③ 主伊达宗城、肥前藩主锅岛直正和越前藩④ 主松平庆永等人的意见。1845 年 8 月，幕府内部设置海岸防御挂作为掌管外事和国防的机构。从 1846 年起连续数年，均向幕府官员或负责守卫近海的大名咨询对外国船只的对待办法。咨询的内容是：实行驱逐，恐有招致战争之虞，目前海防尚不完善，必须避免开战。但象现在这样，外国船只不时出没，动辄派兵警戒，造成"诸藩困难，举国疲弊"，也不能听任长此下去，究应怎么办呢？阿部的方针是，对于强硬论者则提倡加强海防，对于和

29

① 水户藩：今茨城县水户市一带。——译者
② 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一带。——译者
③ 宇和岛藩：今爱媛县宇和岛市一带。——译者
④ 越前藩：今福井县一带。——译者

平论者则强调对外船不可草率从事，调和两派，逐渐地走向开国。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起用川路圣谟、岩濑忠震、永井尚志等开明派官僚，并通过咨询，采用了群议上达制度。

阿部的对外政策，具体体现在 1844 年 4 月对法国军舰阿尔克梅讷（Alcméne）号来到琉球时的处理办法上。法国当时准备在琉球传布基督教，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阿部断定，琉球原来属于日清两国，表面上属于清帝国，而实际上属于日本，如果外国先取得清帝国的允许，向琉球要求"通信"和贸易，琉球是不能拒绝的，结论是如果日本加以排斥，日清之间的和平也就不能维持。他采纳了岛津齐彬的意见，"应置琉球于日本范围之外，默许琉球王自己管理通信、贸易二事，这是对日本前途有利的良策"，委任萨摩藩处理琉球问题，并指示说，只要能禁止"通信"和传教，"可以允许贸易"，只是附加了一句："进行交易，要细水长流，绝不能使之成为大宗"①。

阿部的"对外政策"是尽可能地把"祖法"所允许的机动范围加以扩大解释，但仍固守其窠臼，以避免诸外国的压力，在此期间逐渐改革幕政。但是，鸦片战争的消息，使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外的关心，已经从一小撮政治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扩大到全国范围了。

会泽正志斋和藤田东湖等后期水户学②的主张之所以强烈吸引人心，并不单单由于他们的攘夷主张的激烈，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以海防问题为焦点来统一理解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视野。"日本为什么软弱到如此程度，以至不能抵抗西欧各国对亚洲的入侵？"会泽正志斋在《新论》中对这个民族危机感作了回答，指出"东

---

① 胜海舟：《开国起源》下，《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8年，第232页。

② 水户学：江户时代水户藩建立的一个学派。前期提倡尊崇皇室，后期倡导尊王攘夷论，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译者

照宫① 一兴起，他所致力的就是强本弱末”，批判了幕府的“强本弱末”政策，并呼吁说，对此危机的“权宜之计”必须是“本末共强”，借助这种“强”来“向海外宣扬国威，攘除夷狄，开拓疆土”②。水户学的激情，一方面与平田派国学③ 的国粹主义结合起来，成为狂热的排外主义，另一方面，又在理性精神中注入了民族主义热情，产生了对于幕政的开明的批判。 30

佐藤一斋门下的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是后者的例子。他最初倾心于后期水户学，通过自修兰学④，接触到近代科学的合理主义精神，便超脱了狭隘的攘夷主义，开始大胆批判锁国政策，认为“法”之所以为法，在于为了“天下”，反之则无所谓法；否定了以“祖法”自身为目的的观点，强烈要求为了“天下（日本国）之安危”，废除锁国这种祖法。佐久间象山否定锁国而鼓吹开国论，但其目的在于“伐谋”⑤。他看到西洋各国侵略东洋的“谋”在于应用科学上的技术，就强调日本也要应用这种科学，使国力强盛起来，凭靠这种“伐谋”来挫败各国的野心，以求“最终席卷五洲，统归皇朝，皇朝永为五洲之宗主”。⑥

佐久间象山的逻辑，按照思想史家市井三郎的说法，是“自觉的攘夷”论，与水户学的“信仰的攘夷”论是有所不同。由于他摆脱了华夷思想的逻辑，承认“夷”的相对优越，才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要取长补短这种主张。

---

① 东照宫：德川家康死后葬于栃木县的日光，并封以“东照大权现”神号。后来就称德川家康为“东照宫”。——译者

② 会泽安：《新论·迪彝编》，《岩波文库》本，第 71—72 页。

③ 平田派国学：平田笃胤（1776—1843）及其门徒所提倡的国学。主张复古，批判儒学，提倡尊王，神道色彩浓厚。——译者

④ 兰学：按即西学。兰指荷兰，西学最初由荷兰人传入日本。——译者

⑤ 伐谋：语出《孙子·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译者

⑥ 佐久间象山：《省諐录》，《岩波文库》本，第 4 页。

鸦片战争及随之而来的东亚形势的变化，并不是单单在思想领域中引起了变化。以琉球外国军舰事件为转机，萨摩藩也大大改变了关于对外问题的认识。外国舰队来到它所领属的琉球，并要在那里从事明令禁止的基督教传教活动，而萨摩藩对此竟不能提出有效对策；这件事，第一，引起了深刻的军事危机感；第二，产生了一种恐怖感，即萨摩藩的财政收入过去一向依靠通过琉球的对外贸易，今后财政可能陷于危机。

1852 年，荷兰政府告知日本说，美国计划向日本派遣使节。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情报透露，美国决心"以开战强迫通商"。然而，幕府并未很好利用这个情报。《幕府衰亡论》的作者福地源一郎提出"既然阿部伊势守等人到柏利来航前一年就听到这件了如指掌的事，何以竟未商讨防范对策呢？"把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家的一个疑问"写进书里①。为使幕府突破锁国的祖法，单靠阿部伊势守等开明派的努力和情报，是有限度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凭现实力量施加压力。

当幕府大多数领导人实际上面对着柏利舰队的威力，已经知道再也不能维持锁国时，没有"羁縻"方策的幕府便容许了各国的"通信"，加入了条约体系。这种作法之所以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可以允许的，其原因就在于幕府所依据的国际秩序，不是否认多种国际秩序存在的华夷秩序，不是以"夷"为王化的对象，而是把垄断对"夷"贸易和来自"夷"方的情报作为政策核心的大君外交体制。幕府在坚持垄断贸易和情报的条件下，答应柏利的要求，加入了同西
31 欧各国的"通信"关系之中。

自此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焦点，虽然形式上还是集中在开国

---

① 《福地樱痴集》，（《明治文学全集》）第11卷，筑摩书房，1966 年，第 167 页。

还是攘夷上，但实际上则变成由幕府垄断贸易和情报还是开放的问题了。这已经几乎等于是维持幕府还是打倒幕府——进而瓦解幕藩体制的问题了。

第一章　开国

(1853—1867)

第一节　被强制开国

一　柏利来日

1853年7月8日，美利坚合众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Perry, M.C.)率领沙斯克耶哈纳号等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的浦贺，带来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国书。国书讲到新兴美国的辽阔富强，以及横断太平洋的轮船已能从美国到达日本这一现实情况，并以“此接邻两国”之往来乃双方之“大利”为由，要求“改变古来成规”，进行亲善交往，缔结通商条约。浦贺奉行所①按照成例，命其转航长崎。但是美国舰队已作好战斗准备，拒绝转航，强令日本派出负责的高级官员并接受国书。与1846年来日的毕德尔(Biddle, James)舰队的温和态度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

美国政府为什么强硬要求日本开国呢？产业革命后的美国，不断向西发展陆上领地，1846年领有俄勒冈，1848年领有加利福尼亚，终于到达太平洋岸。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掀起了“淘金热”。美国人的视线向着西方，向着太平洋方面伸展，并越过太平洋而伸向东亚。新兴的美国资本主义围绕中国市场，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过去，美国船只是从东海岸启航，越过大西洋，经由好望角，绕一个大圈子，才到达中国。为了克服这种地

① 奉行所：地方最高行政官的办事处。——译者

理上的不利条件，美国商人就着眼于横渡太平洋的航路，力图在中国贸易上占据优势地位。然而，当时的轮船不能装载足够一气横渡太平洋所需的煤炭，需要中途有个补充煤炭的停泊港。这样，日本作为中转地的作用，就成为注目的焦点了。

而且，当时是太平洋捕鲸的黄金时代。大批美国捕鲸船在北太平洋以至日本近海进行活动。当时的捕鲸船缺乏长期持续航行和抵抗风波的能力，需要补充燃料、食品和避难的港口，这也是美国人对日本增加兴趣的一个原因。此外，美国对未来的日本市场也还抱着希望。

于是，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来说，迫使日本开国，结成条约关系，便成了迫切的课题。另一方面，英国忙于侵略中国，没有余力过问日本的开国，也没有美国那种急于要把日本作为中转地和补给港的特殊地理要求，而且，作为一个市场，对日本的评价也不太高，这就促使美国成了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的国家。1852 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准将柏利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并委以实现日本开国的重任。 33

美国国务院指示柏利，要和日本政府就以下三项达成协议：(1) 让日本订立营救和保护美国遇难船员的永久协约；(2)对美国船只保证有提供燃料、用水及粮食的补给港和贮煤站；(3)使日本允许开放通商港口。指示还要求向日本说明：在美国国势繁荣，版图扩大，与东亚各国关系日趋密切的今天，日本继续保持锁国是错误的；美国无意传布基督教；以及美国与英国毫无关系等等，以促使日本迅速开国。并命令：如果日本仍不答应开国，应以武力为后盾，表示强硬态度，至少也要达成保护遇难船员的协定。如果对日谈判不顺利，柏利还准备占领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并设置贮煤站。

德川幕府当局看到柏利的强硬态度与过去的外国使节不同，觉得非同小可。幕府阁僚以下官员紧急集会商讨对策，首当其冲

的海防挂和浦贺奉行所有关人员等，多以“海岸防御力量薄弱”为理由，倾向于只好接受美国国书。然而，也有主张拒绝的强硬论调，幕府会议难于作出结论。下定决心的柏利，深入江户湾内进行了示威性的测量。江户城内一片混乱。幕府终于决定，以日本方面明年递交回信为条件，接受了美国的国书。7 月 14 日，应接挂①浦贺奉行户田氏荣和井户弘道接受了美国总统的国书。这样，锁国的祖法实际上已被冲破。柏利基本上达到了目的，约定明年再来，离开江户湾，开往琉球的那霸。

二　普提雅廷来日

一身承担这种困难局面的是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他为了准备迎接柏利再次来日，竟破例让御三家②的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有关海防的幕府会议。另一方面，他又向朝廷汇报情况，同时还向有司（幕府官员）咨询对策，不仅向谱代大名征求意见，并把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外样大名。这意味着作为幕府体制统治原则的幕府独裁制已经部分地自行修改了。这也许是因为在幕府观念中，幕政本来的对象乃是德川家政的量的扩大，而柏利带来的问题则超出了这个范围，可以说是“国务”。于是，过去无权过问中央大政方针的天皇、皇室公卿、外样大名，乃至一般武士和部分庶民等，现在便在“外交”方面获得能够发言的机会了。

34

对于这种咨询，不仅有司、诸侯，连无职的幕臣、陪臣，乃至民间有志之士都提出了大量的意见书。其中大都是反映了极端不了解外国情况的迂阔之论，诸如姑且拖延对美国的答复，以争取时间；美国的要求虽然难以接受，但也要避免战争之类的愚蠢之论。

---

① 应接挂：即接待使。——译者

② 御三家：德川家康三个儿子，封于尾张（今爱知县一带）、纪伊（今和歌山县一带）和水户（今茨城县一带），称作“御三家”，地位在亲藩之上。——译者

然而，其中也有颇为恰当的开明意见。在诸侯中，彦根藩①主井伊直弼、福冈藩②主黑田齐溥和佐仓藩③主堀田正笃等主张应该允许通商。在幕臣中，儒者古贺增和没有职位、身份低微的向山源太夫、胜麟太郎（即胜海舟）等指出了通商的益处，主张用这种收入充实军备。还有，以西洋兵学家闻名的长崎町年寄④高岛秋帆，对通商会使国家衰退之说进行批判，认为这是“不明商贾贸易之理”，极力主张输出国产品，借以输入有益商品，则既可增加“祖国利益”，并有助“国内周转”，也可成为“庶民生计之基础”。当时，无论主张开国论或采取反对论，其共同之处则是莫不承认日本对外防卫能力薄弱。

面临史无前例的事态，而对以武力击退（美国）又没有信心的幕府阁僚便决定采取“挂起来”的拖延政策。阿部老中的心腹、担任海防挂的勘定奉行⑤川路圣谟和西丸留守居⑥筒井政宪，对主张强硬论的德川齐昭说：“二百年升平，武力衰微”，对美作战，难操胜算，因此，应当“五年十年，对要求既不答复，也不拒绝”，在此期间，充实防务。这是幕府阁僚们处于祖法原则（锁国）与现实外国压力之间，左右为难，迫不得已的办法。

柏利离开浦贺一个月以后，1853 年 8 月 22 日，沙俄帝国的使节普提雅廷（Putiatine, E. V.）海军中将，也率领舰队开进长崎港，带来了沙俄帝国首相致老中要求建立日俄邦交的书信。

---

① 彦根藩：今滋贺县部分地区。——译者

② 福冈藩：今仍称福冈，九州的县名。——译者

③ 佐仓藩：今千叶县部分地区。——译者

④ 长崎町年寄：町，市；江户时代大坂、长崎等地行政负责人称“町年寄”。——译者

⑤ 勘定奉行：江户幕府重要官职，主要掌管财政、税收。——译者

⑥ 西丸留守居：西丸，指江户城堡中央的天守阁西侧建筑物。留守居，也叫奥年寄，担任将军府的警卫工作。——译者

沙皇俄国虽然产业资本发展落后，但受到列强纷纷向海外扩张的刺激，特别是为了追求毛皮资源，就越过乌拉尔，向中亚和西伯利亚扩张领土。十九世纪初，俄国人积极地扩张到黑龙江下游，进而到达库页岛①，不断与日本人接触，日益加深了对日本的兴趣。

在前一年，即1852年，俄国政府得知美国计划向日本派遣使节，便决定先发制人，一面决定派遣普提雅廷的舰队驶往日本，一面派军队进驻库页岛南部的久春古丹。普提雅廷的使命是：(1)调整和划定一向争议不绝的日俄两国间的边界(千岛和库页岛)；(2)与日本建立邦交和贸易关系。

幕府又一次面临了难局。特别是边界的划定具体地体现出胜败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威信，唯其如此，幕府当局把这个问题看得比通商还重要。阿部老中乃任命筒井政宪、川路圣谟、目付②荒尾成允和儒者古贺增等为接待俄使专员使之奔赴长崎。

普提雅廷在长崎停留期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与土耳其开战，英法两国支持土耳其，参加了战争。普提雅廷听到这个消息，为了侦察英法舰队的活动并策划与美国合力促使日本开国，没有等待接待俄使专员到达，就从长崎前往上海，向正在清帝国沿岸伺机的柏利舰队提议共同采取对日行动。然而，柏利唯恐俄国在日本开国问题上抢先，拒绝了普提雅廷的要求。于是普提雅廷于1854年1月3日返回长崎，从1月到2月，与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接待俄使专员)反复进行了七次会议。关于边界问题，俄国方

① 库页岛：原文为“桦太(萨哈林)”。按：库页岛，我国古称苦夷，明代属奴尔干都司，清代属吉林省。日俄入据后，日本人称之为桦太，俄国人称之为萨哈林。本书中的桦太或萨哈林，均译为库页岛。——译者

② 目付：也称横目，日本室町时代以后幕府的职名，负责监察。大目付监察诸侯，目付监察诸侯下属的官员。——译者

面主张，在千岛群岛上，择捉岛各半，以北全部归俄国领有；在库页岛上，除南端的亚庭港以外，全部归俄国领有。日本方面则反驳说，择捉岛全岛本来就是日本领有的，关于库页岛，应在实地调查之后划定边界，并提出库页岛应以北纬五十度线为界的方案，毫不退让。对于建交问题，日本方面的态度也很严峻，仅约定今后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时对俄国也给予同样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俄国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已经提出了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要求。

普提雅廷赶上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个不利条件，又出乎意外地碰到日本方面接待使的硬钉子，不得不放弃谈判成功的希望；并生怕英法舰队的来袭，遂于2月5日退出长崎。占领库页岛久春古丹的俄国军队也撤走了。

三　亲善条约

在清帝国沿岸准备再次开往日本的柏利，受到普提雅廷舰队活动的刺激，又因小笠原岛贮煤站问题与香港英国当局发生纠纷而感到焦虑，于是决心无论如何要在日本开国问题上走在前面。因此，当载有美国赠给日本政府礼品的雷基新顿号一到，便不顾冬季的风暴，提前从香港出发了。这次是七艘舰船的大舰队，1854年2月11日再次出现在江户湾。

幕府以为去年7月去世的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办理丧事作托辞，力图拖延谈判，柏利当然不肯答应。3月8日，接待美国使节专员儒役①林炜、町奉行②井户觉弘、目付鹈殿长锐等人终于在神奈川同美国方面开始了缔结条约的谈判。林炜并非海防挂成员，

① 儒役：也称儒者，幕府掌管儒学的官职。——译者

② 町奉行：江户幕府官职，掌管市镇的行政和司法，例须在町字前冠以地名，如不冠地名，即指江户町奉行。——译者

而被任命为首席代表，这可能是因为对朝鲜和琉球等国的“通信”向例由林家（大学头①）掌管的缘故②，可以说是大君外交的残余。

日本方面已经意识到，除通商以外，还不得不接受其他要求。柏利也认为，首先是建立邦交，并不坚持非立即开始通商不可。结果，日美谈判达成协议，3 月 31 日，两国全权代表缔结了《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缔结的最早一个近代国际条约。持续二百多年的大君外交体制原则从此开始走向崩溃。该条约于次年 2 月 21 日在下田③完成了批准交换手续，正式生效。

36 《日美亲善条约》包括十二条，规定：(1)日美两国永远亲善；(2)为补充“薪水、食品、煤炭和所缺物资”，开放下田和箱馆两港；(3)遇难人员和来日人员的待遇；(4)供应必需品（所缺物资）的办法；(5)最惠国条款；(6)在下田驻领事；(7)交换批准书。下田港预定作为横渡太平洋航路的中转地，箱馆港则用作北太平洋捕鲸船的补给和避风港。实现了开放两港，加上保护遇难船员的规定，柏利所负的使命几乎完全完成了。柏利高度评价这个条约说：“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进展。”④最惠国条款就是它的最大保障。6 月 20 日，又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附属条约》（《下田条约》）十三条，规定了开放下田港的细则。得到满足的柏利于 26 日离开了日本。

在归途中，柏利又于 7 月 11 日在那霸与琉球王国签订了规定琉球开港通商的《琉美条约》（《琉球、合众国条约》）。柏利虽然知

---

① 大学头：日本古代大学寮的长官；江户时代，指昌平坂学问所的长官，负责培养官吏，由儒家林氏世袭。——译者

② 渡边修二郎：《阿部正弘事迹》上卷，1910 年，第 203 页。

③ 下田：今仍名下田，在静冈县伊豆半岛南部。——译者

④ F.L.霍克斯编：《美国舰队远征中国海岸及日本记》，第 2 卷，1857 年，第 185 页。

道琉球是日本的领土，但为了尽量使美国获得更多的机会，还是订立了这一条约。为此，他避开“条约”(treaty)这个词，而称之为“协定”(convention)。然而，琉球方面则使用了清朝的年号“咸丰”。这也反映出琉球属于日清两国的国际地位的特殊性。之后，1855年11月24日缔结《琉法条约》(《琉球、法兰西国条约》)；1859年7月6日缔结《琉兰条约》(《琉球、荷兰国条约》)。对这些条约的缔结，琉球实际统治者、积极主张开国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意图在幕后起了作用。

柏利舰队的成功，刺激了西欧列强。1854年初，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取得联系，计划派遣香港总督包令(Bowring, J.)前往日本，后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而中止。尽管如此，这次战争还是促成了日英建交的开端。9月17日，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史透林(Stirling, J.)海军少将率领温彻斯特号等四艘军舰为搜索交战国俄国的军舰而开到长崎。幕府并未特派接待使，命令长崎奉行水野忠德和逗留在长崎的目付永井尚志相机处理。

史透林向日本方面出示了英国的对俄宣战布告，然后警告说，虽然英法同盟军已大胜俄国，但俄国将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库页岛和千岛，不久还会伸手到日本本土。因而要求日本不要给俄国军舰提供特别的方便，遵守中立国的义务。但是，史透林信函的日译文，却误译成英国方面要求让正在对俄作战的英法舰队使用日本港湾[①]。从而，日本方面主张，决不能同意英国同俄国在日本沿岸 37 及港湾内作战，并表明不能对交战国的任何一方提供方便而保持局外中立的立场，要求英国同意。结果，双方于10月14日，以不为交战目的使用开放港口，不在日本近海作战为前提，签订了《日英协定》(《日本国大不列颠国协定》)，共七条。在协定中约定：日

① 石井孝：《日本开国史》，吉川弘文馆，1972年，第130页。

本对英国开放长崎和箱馆，供给燃料、用水、粮食和必需品等，并承认英国享受只有荷兰和清朝才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协定的第四条虽然规定侨居日本的英国人要服从日本法律，但却规定违法者须交由英国船长加以惩处，实际上放弃了日本方面的裁判权。这也许可以说就是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萌芽。治外法权的承认，作为形成不平等条约的基础，后来酿成了外交上的重大问题；但当时日本当局却并未意识到这些，而认为这不过是沿用了德川家康以来的驭外（统治外）古法，即外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自己来管，日本不加干预，如是而已①。

史透林并非正式外交使节，协定的签订乃是军事行动和误译的副产品。但不管怎么说，日英邦交总算打开了。这个协定获得了英国本国政府的追认，于次年10月9日在长崎批准交换，正式生效。

普提雅廷得知日美缔结了亲善条约，就避开英国舰队的耳目，第三次赶来日本。他搭乘狄亚纳（Diana）号于1854年10月开进箱馆，11月，突然出现在大阪湾，使京阪地区人心惶惶。12月，普提雅廷按照幕府的意思返回下田，从22日开始同川路圣谟等接待专员进行谈判。然而，次日即23日，在南关东地方发生了大地震和海啸，狄亚纳号沉没了。遇难的俄方人员取得幕府的援助，在伊豆国②君泽郡户田地区建造了代用船。不料这件事却成了日本造船工人学习西洋造船技术（即所谓君泽型）的机会。

次年即1855年1月1日恢复因地震而中断的日俄谈判。2月7日，两国全权代表签订了《日俄亲善条约》（《日本国鲁西亚国亲善条约》）九条和附属条款四条。其内容是：（1）千岛群岛中，择捉岛以南归日本领有，以北为俄国领有；库页岛维持原状，不另定

① 田边太一：《幕末外交谈》I，《东洋文库》，平凡社，1966年，第52页。

② 伊豆国：今伊豆半岛一带。——译者

国界；(2)开放箱馆、下田、长崎三港；(3)救济遇难人员；(4)必要时准许俄国官员驻在箱馆和下田；(5)最惠国待遇。这个条约于1856年12月7日在下田批准交换生效。

在日俄谈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接待美使专员和接待俄使专员曾设法调整相互间的联系，试图把外交机关的统一性建立起来并保持下去。筒井政宪和川路圣谟等担心在对美和对俄分别谈判中会发生谈判方式上的不一致，要求幕府僚就接待俄使的要点作出指示。幕府以“同等对待，对于国家至为重要”为理由，命令以接待美使的作法为准。关于批准条约的手续，接待美使专员也同接待俄使专员进行了商榷，互相约定以老中的签字来表示日本方面的承认。这些都显示出一种过渡时期的情况，即在现实的外交实践过程中，当事者对外交方面特有的知识、规则和技术日益加深理解，逐步探索外交部门有别于其他政府机关的独立性。 38

继美国、英国和俄国之后，与荷兰缔结条约问题也提上了日程。此事与日本的海军建设有关。幕府在“黑船”① 的威力面前痛感有加强海军力量的必要。1853年10月，老中下令撤销建造大船的禁令，进而委托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帮助解决购入军舰、武器、兵书和传授海军技术的问题。商馆馆长寇帝斯(Curtius, J. H. D.)于1854年10月答复说，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关系，荷兰出售军舰有困难，但荷兰政府拟先派森宾(Soembing)号军舰驶往日本，给予传授各种海军技术的方便，并希望均霑美国和英国在条约中取得的既得利益。幕府接受了这种要求，同意向荷兰开放下田和箱馆两港，供给必需品和所需物资，但对缔结条约则表示为难。幕府既然已同美国和英国缔结了条约，为什么不肯痛痛快快地与早

① 黑船：指来自欧美各国的火轮船。——译者

就有来往的荷兰缔结条约呢？其理由可以作如下推测，即按照幕府的逻辑，美国和英国（还有俄国）是“新来之国”，由于它们是处于大君外交体制之外的国家，所以可按“祖法”范围以外的问题来处理。而“通商之国”的荷兰则是属于大君外交体制之内的国家，如果把过去的通商关系改变为条约关系，那就要牵连到“体制”本身的变质问题，进而可能导致祖法的全面崩溃，大概幕府害怕的就是这一点。

不管怎样，1855 年 7 月，荷兰国王把森宾号送给了幕府。该舰后来改称观光丸，是幕府所有的最早的轮船。继而在 9 月，寇帝斯向长崎奉行提出了条约草案十一条，催促开始谈判。训练海军的重要性想必是压倒了维持祖法的原则。11 月 9 日，长崎奉行荒尾成允和川村修就以及目付浅野氏绥，为了不使海军训练发生障碍，草签了关于日荷亲善通商的临时协定二十九条，除确认过去荷兰享有的特权外，并使均霑各外国的既得利益，还部分地放宽了对侨居长崎的荷兰人的行动限制，例如废除了过去每当荷兰人越出出岛散步时派人跟随监视的制度。接着，翌年 1856 年 1 月 30 日，签订了与临时协定内容几乎相同的《日本国荷兰国亲善条约》二十七条，并于 1857 年 10 月 16 日在长崎批准交换。

这样，从 1854 年至 1856 年，日本同美国、英国、俄国、荷兰结成了条约关系，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条约体系”大体成型。

四　对于开国的对策

面对亲善条约签订后的新形势，阿部老中等幕僚尽管不断为幕府内外保守派的抵抗所困扰，还是采取了可以说是划时代的种种改革措施。福地源一郎（樱痴）以翻译官身分参与了幕府外交的实际工作，在明治时期，他以记者闻名，他的名著《幕府衰亡论》（1892 年），对于这个时期的改革措施作了如下的概括。

39

“诸如，废除禁止江户十里以内放枪的制度；准许各藩在藩邸内进行操练及向江户运送枪械；解除建造大船的禁令；在大森设立大炮打靶场以资演习；动工兴建品川炮台；扩建长崎海岸炮台；建造凤凰丸等军舰；……又如在江户创办讲武所；新编洋枪队；向荷兰订购轮船；在长崎开始训练海军；录用通晓兰学的人士，创建蕃书调所①；拔擢才智之士担任幕府的要职；凡幕府旧例中属于虚饰的一律省略；无用的献赐则予以废除；锐意矫正积弊；……从墨守成规，把旧例当作金科玉律的幕府旧习看来，这些措施的确不能不说是英明果断了。

“所以，从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船只来日，到安政三年(1856年)，凡三年半，幕府所采取的非常进步的措施，明确载在当时的历史上”②。

从过去的幕府政治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大改革。在各项改革中，尤以开设“蕃书调所”对外交关系最为密切。

柏利舰队再次来航后离开日本不久，1854年7月，阿部老中向有司咨询有关改革制度事宜。在咨询项目中，有一项值得注意，即在海防挂之下设立一个局，不仅从幕臣，而且从各藩藩士(陪臣)中录用具有海外知识的儒者、兰学家、兵学家和炮术家等，由海防挂交下各种题目，使之彻底讨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了这样一种自觉，即海防和外交问题已超出幕府和各藩的界限而成为全国性的课题，必须集中全国智慧加以解决。

在回答这次咨询时，海防挂勘定奉行松平近直和川路圣谟认为担任外交的人员缺乏海外知识，建议首先要研究外语，并在这个基础上设立调查外国情况的机关。阿部老中接受了这一建议，第

---

① 蕃书调所，也称蕃书取调所，是研究洋学和翻译外交文件的机构。——译者

② 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67年，第47—48页。

二年3月，任命胜海舟和箕作阮甫等人为接待外宾专员所属负责翻译兰学书籍的手付[1]，由他们着手筹办洋学所。7月，任命筒井政宪、水野忠德、岩濑忠震和川路圣谟等富于朝气的幕府官员为蕃书翻译专员。1856年3月，原计划的洋学所以蕃书调所的名义开始工作，总负责人是若年寄[2]远藤胤统，实际工作则由头取[3]古贺增担任。如前所述，古贺是在任接待俄使专员时有了外交谈判经验的儒者。在该所的教授和助教中，起用了箕作阮甫（津山[4]藩士）、杉田成卿（小滨[5]藩士）、川本幸民（三田[6]藩士）、松木弘安（后改名为寺岛宗则，萨摩藩士）、村田藏六（后改名为大村益次郎，周防[7]医师），还有西周（津和野[8]藩士）、津田真道（津山藩士）等陪臣中擅长洋学的优秀人才。这样，有组织地引进和研究海外知识的体制建立起来，就有可能在外交上运用专门知识了。

40 由于同外国船只接触的次数日渐增加，提出了制定太阳旗（国旗）的问题。早在1854年1月，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就曾向幕府建议，为了同外国船有所区别，应该制定"太阳"的船徽。起初，幕府曾考虑只许幕府所有的船只使用太阳标帜，不许各藩船只使用。但结果，8月间发布命令，包括幕府和各藩在内的日本国船只，均以太阳旗作船徽。这是象征着处于万国之中的日本这种国家观念

---

① 手付：江户幕府官职名称，处理一般公务的属员。——译者

② 若年寄：江户幕府官职名称，地位仅次于老中，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辅佐老中处理政务。——译者

③ 头取：意思是头目，多半掌管具体业务，现在银行的负责人仍称头取。——译者

④ 津山：在今冈山县西条郡一带。——译者

⑤ 小滨：在今福井县远敷郡小滨一带。——译者

⑥ 三田：今兵库县三田市一带。——译者

⑦ 周防：今山口县东部地区。——译者

⑧ 津和野：今岛根县鹿足郡一带。——译者

已经逐渐占据了执政者的意识中枢的一件事情。

第二节　对外关系的正规化

五　走向通商的趋势

由于缔结了一系列亲善条约，日本向近代国际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向全世界广泛追求市场的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当然不会这样就满足了。由亲善发展到通商关系，只是时间问题。

在开放的港口，对亲善条约中有关供给必需品的规定作了扩大解释，已经在进行尽管规模不大但类似贸易的行为。幕府在下田开设必需品会所，除燃料、用水和粮食外，还供应竹器、陶器、漆器、伞和扇子等手工业品和美术品等。这种经验使幕府内主张开始贸易的论调得到了普及。1856 年 8 月，长崎荷兰商馆长寇帝斯写信给长崎奉行，转达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最近将带着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的使命前来日本的消息，指出日本最好适应世界大势，开始与外国通商，并强调应该迅速在日荷两国之间订立通商条约。这样，通商条约问题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了。

与签订亲善条约的情况一样，在签订通商条约的问题上，掌握主导权的还是美国。英国在欧洲因克里米亚战争不得脱身，在亚洲，为了不使太平天国战争的混乱影响它在中国的市场，已经忙得不亦乐乎。1855 年 8 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任命对亚洲（特别是中国）贸易经验丰富、精通亚洲情况的纽约商人哈里斯（Harris, T.）为第一任驻日本总领事兼外交代表，并负有将日美亲善条约改订为通商条约的任务。

哈里斯于 1856 年 8 月 21 日到达下田。他在日记中说："我大概是文明国家派驻日本的最早的公认代表"，他预测到"这件事，在我一生中是划时代的，同时，恐怕也将成为日本各种事物的新秩序

的起点吧。"①

哈里斯的来日和要求进驻，是出乎幕府意想之外的。下田奉行拒绝哈里斯登陆，要求他离开。但想不到日美亲善条约的不完备之点在这里暴露出来了。该条约无正文可据，在规定派驻领事的第十一条中，日文可以解释为在日美双方同意下，派领事驻在下田；而英文则写成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即可设置领事。最后，幕府参照荷兰语原文，同意哈里斯登陆。7月5日，哈里斯在下田的玉泉寺首次挂起了星条旗。他有长期从事亚洲贸易的经验，认为如果不越过派驻当地的官宪，直接到江户去同最高负责人进行谈判，事情就不会进展，便以"为向日本皇帝呈递总统亲笔信，并将关系日本安危的重大事件直接告知日本政府"为理由，强硬要求下田奉行同意他前往江户幕府。幕府又面临难题了。

41

上年11月18日，阿部老中已将佐仓藩主堀田正睦迎来幕府，把老中首座让给了他。这是因为上层谱代大名们（溜间诘②）在幕政上发言权很大，阿部让出老中职位是为了与他们取得合作，以减少对政治改革的阻力。堀田正睦是号称"兰癖（荷兰迷）"的西洋通，主张积极开国。幕府前已接到寇帝斯的警告（包令来日），现在又接到哈里斯的要求，便于9月命令评定所全体人员、海防挂、大目付、目付以及长崎、浦贺、下田、箱馆等地的奉行对贸易的根本方针进行讨论。当时的咨询书中说："我国海禁已有所变革，并已向各外国派遣船只。以贸易通商之利，充富国强兵之基，此乃顺乎当今形势所当然……"，表明了幕府的意见是倾向于开始通商的。对咨询的回答几乎全都是主张开始通商。箱馆奉行堀利熙主张日本应主动开辟航海贸易的道路；在长崎值勤的目付永井尚志和冈部

---

① 哈里斯：《日本旅居记》上，坂田精一译，《岩波文库》本，第295页。

② 溜间诘：溜间，江户城内大名的办公场所；溜间诘，指当过老中的诸侯。——译者

长常主张，要让国民迅速了解开国大计，以安定人心。

11 月，将军接受了这项建议，命令堀田老中专管外国事务，并任命海防专人按月轮流值班，于是便出现了专管外国事务的阁僚（老中）。接着，除堀田之外，将军又任命若年寄本多忠德以下，大目付迹部良弼和土岐赖旨，勘定奉行松平近直、川路圣谟、水野忠德，目付岩濑忠震、大久保忠宽，勘定吟味役① 塚越元邦和中村时万等为对外贸易调查专员，负责有关通商的调查和准备事宜。当时在指示中有这样的话："近来外国情况既已如此，加之，贸易之事，亦已许可"，可以看出，开始通商的方针在幕府中已大体内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调查专员已经打算靠贸易的利润来重整幕府财政。这样，幕府内部很快就摆脱了锁国的旧习，出现了积极赞助贸易的风气。

六　日荷、日俄附加条约

1856 年 3 月，克里米亚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结束。刚向巴尔干伸手就遭到挫折的俄国，把矛头转向东亚。英法联盟在战后还延续下来，成为侵略清帝国的联盟。于是列强公开侵略的舞台就转移到中国了。10 月，在清帝国的广州爆发了亚罗号（Arrow）事件。事件的起因是，清朝当局怀疑一只英国人租用的中国船亚罗号藏匿海盗，进行搜查。尽管事后清朝方面表示了妥协的态度，英国领事巴夏礼（Parkes, H. S.）却态度强硬。结果英国舰队炮击广州，不久，法国也采取同一步骤。次年 12 月，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1858 年初，又进攻天津和大沽口。同年 6 月，英法政府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取得了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中未能实现的许多权利，如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权、外交使节驻北京

42

① 勘定吟味役：江户幕府官职名称，地位仅次于勘定奉行，但对勘定奉行所的全部人员，包括奉行，都有监督权。——译者

权、长江航行权、沿岸贸易权、治外法权、传教权等，还迫令偿付了大量赔款。于是，清朝由此便允许列强入侵内地进一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化。

1857 年 2 月，荷兰理事官寇帝斯把亚罗号事件告知长崎奉行。长崎奉行认为事关重大，便派部下到寇帝斯那里详细打听事件的经过。寇帝斯以一面之辞说英国人烧光了清朝的广州是因为清国政府不履行条约。他说，因此，日本既已缔结条约，就应该履行，并应从速缔结通商条约；还说，英、法、俄、美等国是世界强国，首先同这些国家发生通商条约关系对日本不利，应该与熟知日本国情的荷兰缔结条约，以此作先例才是上策。

这个消息使幕府受到强烈冲击，3 月，堀田正睦老中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大胆的咨询，他说，必须特别警惕，不要重蹈“广州覆辙”；既然已经缔结了亲善条约，“宽永以来之祖法已经改变”，所以，对待外国人的办法也应该改革；如果“拘泥旧例”，以“细微末节”触怒外国，“万一炮声一响，将难以挽回”；那末，难道不应该“从速改变以前对外国人的旧章”吗？海防挂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在答复中说：开始对外贸易，“化天下之利为公”，使诸侯亦沾其利；派出驻外官员和留学生；开垦北海道；“广泛航行万国，以兴实利”；答应来日的外国使节前来江户等等，这些都是当务之急，应积极确立开始通商的国策，以巩固国家富强的基础。亲善条约缔结后还不到两年，幕府外交当局的见解，已表现出惊人的进步。其中心人物是目付岩濑忠震。他曾在下田与哈里斯多次会见，加深了关于外交通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幕府派水野忠德和岩濑忠震到长崎去和寇帝斯开始缔结通商条约的谈判，然而，9 月，俄国使节普提雅廷又来到长崎，提议缔结通商条约。于是，水野忠德和岩濑忠震便决心赶快与荷兰达成缔约协议，借以对付俄国。10 月 16 日，签订了《日本荷兰两国全权代

表附加条约》四十条，实际上这也就是通商条约。它是幕府主动缔结的最早的条约，除长崎外，还许可在箱馆进行贸易，并取消了对船只数和贸易额的限制。但仍不准“随意贸易”，即日荷商人之间的直接交易；商品的买卖必须通过奉行所监督下的“会所”的中介，亦即把贸易作为“会所贸易”，置于幕府管理之下。并禁止鸦片贸易，允许侨居日本的荷兰人信教自由，废除了踏绘① 的作法。不过，信教自由仅限于荷兰人，对日本人则照旧禁止信奉基督教。

43

接着，24 日，仍在长崎又签订了以《日荷附加条约》为样本的《日本国鲁西亚国附加条约》二十八条。日荷和日俄的两个附加条约中没有对日本不利的片面义务条款，是在自主平等的立场上缔结的。岩濑忠震说，这个条约，“为而后外国提出贸易问题奠定了如何处理的基础，殊堪庆幸”，认为它为今后预料中的对美英等国的谈判制定了蓝本，以此自负。可以看出，幕府的外交已经走上轨道。

七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驻在下田的哈里斯一面一再要求前往江户，一面向下田奉行提出了美国人在开放港口的居住权、调整货币交换比率和开放长崎港口等要求。为了延缓哈里斯前往江户的要求，幕府答应了上述几项要求。1857 年 6 月 17 日，哈里斯和下田奉行井上清直、中村时万缔结了《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条约》(《下田条约》) 九条，规定开放长崎港；美国人在下田和箱馆的居住权和日美货币同种等量交换等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条规定：“日本人对美国人② 有犯法行为时，由日本主管部门按日本法律惩处，美国人对日本人有犯法行为时，由总领事或领事按美国法律惩处。”这种领事

① 踏绘：令人践踏玛利亚像或耶稣十字架像，以试其是否为基督徒。——译者

② 原文为“亚美利加人”，原书对此特加注：“原文如此”。按：所谓“亚美利加”，实指美国，故径译为“美国人”。下文“亚美利加法律”亦径译为美国法律。——译者

裁判权在日英协定中初见萌芽，在日俄、日荷亲善条约中也只有一点影子，而今却对美国明确地承认下来。

尽管如此，日美条约的缔结并未能遏止哈里斯想前往江户的意图。在幕府内部，以御三家和溜间诘诸侯为首，反对论调很强，但10月1日，幕府仍以迎接缔约国使节前往首都乃“万国普通之常例”为理由，宣布准许哈里斯前来江户。从“万国普通之常例”这句话似乎可以看出，幕府外交负责人员正在逐步摆脱华夷意识。11月30日，哈里斯达到了进入江户的目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划时代的重要日子，而在日本历史上也会成为一个更加重大的新纪元吧”；“我是这个首都迎接的最早的外交代表”；“不论我所准备进行的谈判能否成功，这件大事都将俨然长存下去。”①

12月7日，哈里斯谒见将军德川家定，呈递了总统的亲笔信。12日，会见老中堀田正睦，用了两个多小时极力陈述世界大势和通商的必要。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亚罗号事件，进行恫吓，说这个事件以后，英法两国的大舰队很可能要大举驶来日本，要求缔结条约；而对鸦片贸易以来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则又进行谴责，力求给人以一种美国是公正不偏的印象。美国的希望是：(1)公使驻江户权；(2)准许自由贸易，日本官员不得干涉；(3)增加开放港口。还说：“我没有率领一艘军舰，单身进入江户，幕府却肯和我谈判，44 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挽回日本的名誉”，这些话也成了哈里斯进行游说的武器。其实，不等哈里斯游说，幕府的主意已经大体拿定了。

1858年1月25日，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和目付岩濑忠震在哈里斯的住处即蕃书调所，开始了签订条约的谈判。其间虽然还发生了攘夷派暗杀哈里斯未遂的事件，直到2月

---

① 哈里斯，前引书，下，第35页。

25日，连续谈判了十四次，终究议定了《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十四条及贸易章程六款，只等待签字了。其内容是：(1)互派公使、领事，并承认其国内旅行权；(2)神奈川自1859年7月4日、长崎自7月4日、新潟自1860年1月1日、兵库自1863年1月1日分别开放，下田港则停止开放。此外，江户自1862年1月1日、大阪自1863年1月1日开放为商埠，承认外国人的居住权和房屋租赁权；(3)允许自由贸易："双方国民买卖物品，一律不受限制；对支付方式等，日本官员概不干预；对于日本人买卖或携带购自美国人的商品，不加妨碍"；(4)制定协议关税；(5)禁止鸦片贸易；(6)规定两国通货同种等量交换；(7)制定外国人游览规章；(8)承认领事裁判权；等等。

在这里，旨在把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的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日荷、日俄附加条约中所规定的会所贸易方式，由于哈里斯认为它违反国际公法而加以拒绝，结果被否定掉了。于是，确定以征收关税的办法来代替会所贸易方式。

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虽然缺乏国际法知识和外交经验，但不能否认，他们为谈判尽了最大努力。前述福地源一郎所著《幕府衰亡论》作了如下的记述："其后，明治四年(1871年)，余至美国，晤哈里斯于纽约，语及当年之事。哈里斯云：'当时余一面为美国谋利益，另一面亦力求无损于日本之利益。治外法权之类，乃势出于不得不然，固非两国全权代表之本意也。进口关税之类，余虽身为民主党员，主张自由贸易者，但为使日本获得关税收入，乃规定进口税平均为20%，酒类及烟草甚至课以35%之重税。当时，井上清直和岩濑忠震等全权代表逐条仔细推敲，考虑是否有当，曾使余颇不耐烦。由于他们据理力争，余之草案被再三涂抹增删，甚至改动草案主要之处亦复不少。有如此之全权代表，实日本之幸也。……但由于开港后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致使重要条款成为画饼，此余所

痛惜者也。’”①

从幕末到明治初年，曾作为外交官而活跃一时的田边太一也参与了这次会见，他在《幕末外交谈》一书中记述的也大致与此相同。书中写道，据哈里斯说，日本进口关税规定为平均 20%，个45 别商品竟达 35% 的高税率，“仍然留有余地，使日本有关部门积累经验之后，得以修改税率。关于预先约定五年后仍可重新缔结贸易条约的规定，正是为了设想届时再提高税率，以逐渐增加收益……”。② 话虽如此，这个条约既然规定了领事裁判权和协议税率，就不能不被指责是限制了日本在司法权和征税权上的独立自主性的不平等条约。

八 敕许条约问题

幕府当局对局势表现了惊人的适应性，看来幕府外交似乎取得了顺利的进展。可是没想到却遇上了一个绊脚石，即条约的敕许（即天皇批准——译者）问题。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谈判结束前夕，哈里斯在 1858 年 2 月 17 日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日本代表）说，本月 11 日将条约原文如实地提交给各大名，江户城中立即发生了骚动。……幕府说，现在的处境是非经过一番流血惨剧就不能立即签订条约之境地。……最后，我才知道，阁老会议的一个成员（作为谒见精神上的皇帝的特使）到京都去了，在取得皇帝批准之前，他们打算延期签订条约；一俟得到皇帝同意，大名们一定会撤回他们的反对意见，……这大约需要两个月时间。

“听完这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我就问他们，如果天皇拒不答应，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他们立即断然回答说，幕府已经作出决定，天

① 福地源一郎，前引书，第 60—61 页。

② 田边太一，前引书，第 54 页。

皇的任何反对都绝不接受。我问，仅仅为了走走形式，那有什么必要非延期签订条约不可呢？他们回答说，价值正在于这种严肃的仪式。据我理解，他们是说，象上述那样郑重其事地上奏天皇，使天皇的决定成为最后的定论，一切非议就会立即消除了。"①

正如哈里斯所说，幕府为了得到敕许（天皇的批准），要求延期六十天签字。这是因为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强烈反对的缘故。同德川齐昭关系密切的阿部老中已在上年8月死去，从那时以来，幕府同攘夷论者德川齐昭的关系恶化了。德川齐昭试图坚决阻止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并在朝廷中进行了活动。由于朝廷长期脱离社会和政治，不了解社会的动向，一经德川齐昭煽动，便轻易抱住攘夷论不放了。幕阁未"估计"到这一点，只因德川齐昭又是御三家，就避免强行签字，打算取得敕许，使反对者无话可说。因此，幕府派遣儒役林炜和目付津田正路前往京都，求得敕许以签订条约。幕府本以为会很容易取得敕许，但与幕府的预料相反，朝廷态度很强硬。堀田老中认识到事关重大，便在3月间亲自进京说服朝廷，但为时已晚。4月6日，朝廷只答复说，签订条约是国家的重大事件，须由诸侯重行计议而未予敕许。这是由于除了德川齐昭的活动以外，还有岩仓具视、中山忠能等公卿以及梁川星岩、梅田云浜、池内陶所等民间志士在幕后进行策动，反对开国。堀田在取得敕许问题上遭到失败，便陷入了窘境。

本来外交是幕府的专管事务，所以缔结条约并无须特意取得敕许。实际上日美亲善条约以及其他各项条约，未经敕许，也都无碍于签订生效。可是，幕府出于内政上的考虑，竟自己主动申请敕许，而反对签订条约的势力竟把阻止敕许当作了有力的对抗手段。这样一来，本来无足轻重的敕许，就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现在，敕

① 哈里斯，前引书，下，第168—169页。

许被看作是签订条约的重要手续，开始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天皇对条约保有最后的承认权。可以说这是一个征兆，说明在幕藩体制的政治结构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情况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也引起了深刻的疑问，即真正掌握日本实权的究竟是谁？

这时，将军继嗣问题又同上述情况纠缠到一起，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了。当时，决定谁来继承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争论焦点。围绕着开国问题，在幕政的处理上连续出现了按成规和旧习无法处理的问题，这就要求将军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但德川家定体弱多病，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又没有儿子。于是在封建统治集团中间，人们就愈来愈认为需要选拔一个有能力的继嗣来辅佐德川家定。

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福井藩[①]主松平庆永、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诸侯和幕府官员岩濑忠震、川路圣谟、永井尚志等开明的积极开国论者推举一桥庆喜，形成了一桥派。他们企图推举公认为才略出众的一桥庆喜继任将军，以改革幕政和推行积极的政策。在幕府里，阿部老中和堀田老中倾向于这一派。

彦根藩主井伊直弼等谱代诸侯一派则表示反对，策划拥立德川家定将军尚未成年的堂兄弟，纪伊藩[②]主德川庆福，形成了纪州派。在他们心目中，维护德川家的权威是高于一切的。

一桥派和纪州派暗中不断进行了尖锐斗争。阿部老中之死，对一桥派是个打击。为了挽救其劣势，他们在京都朝廷中展开活动，企图让朝廷颁发有利于本派的敕旨，借以对幕府施加压力。纪州派也采取对抗措施，在京都开展活动。这件事和上述条约敕许问题纠缠在一起，遂使一向高高在上、不问政事的天皇不知不觉地被拉到政治舞台上来了。这样，政局愈益混乱，国内分裂日趋严重。

---

① 福井藩：也称越前藩，今福井县一带。——译者

② 纪伊藩：今和歌山县一带。——译者

九　安政五国条约

1858年6月，纪州派政治活动取得成效，井伊直弼突然被任命为大老。他强行决定德川庆福为将军继嗣。但对同美国签订修好通商条约则持慎重态度。可是7月间，美国军舰开进了下田，传来英法联军已战败清朝和订立《天津条约》的消息。幕府当局受到了震动。哈里斯担心英法两国乘战胜之余威前来日本，在美国之前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乃强烈要求日本在已商定的条约上签字。日本全权代表和海防挂都认为这是签约的好机会。井伊直弼虽仍拘泥于未得敕许而迟疑不决，但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作出决断。29日，日美两国全权代表终于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江户条约》)。 47

8月14日，德川家定死去。不久，德川庆福改名家茂，成为十四代将军。前一个月，即7月，幕府任命太田资始和间部诠胜为主管外事的老中。8月，撤销海防挂，新设"外国奉行"官制，其地位在京都町奉行、大阪町奉行以及长崎等偏远藩国奉行之上，并任命水野忠德、永井尚志、井上清直、堀利熙和岩濑忠震等开明派有能力的官员担任此职。这个措施意味着一向混在一起的海防(对外防卫)和外交，从此分离为两种职能，于是专管外事的机构便由此首次建立起来了。

接着，日本全权代表以日美条约为样本，分别与寇帝斯缔结了《日本荷兰修好通商航海条约》(8月18日签订，1860年3月1日批准交换)，与普提雅廷缔结了《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8月19日签订，1859年8月8日批准交换)，与英国使节额尔金(Elgin, Earl of)缔结了《日本国大不列颠国修好通商条约》(8月26日签订，1859年7月11日批准交换)，与法国使节葛罗(Gros,

Baron J. B. L.）缔结了《日本国法兰西国修好通商条约》（10月9日签订，1859年9月22日批准交换）。因为当时日本的年号是安政，所以这五个条约被称作安政五国条约。由于这五个条约，使日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向国际社会敞开了大门。

这时候国内刮起了"安政大狱"的风暴。决定德川庆福为将军后嗣这件事激怒了一桥派。而井伊直弼未经敕许便强行签订条约，也招致了攘夷派的反对。开国论的一桥派与攘夷派尽管在对外方针上全然相反，但两者却形成了反对井伊直弼的奇异的统一战线。他们攻击签订条约是"违敕"。水户藩并策划让朝廷降密旨给水户藩批判幕府，以推翻井伊。这种动向使井伊恼火。他认为一桥派和攘夷派扰乱朝廷和幕府间的政治秩序，损害幕府的权威。从1858年10月开始，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大镇压。当时堀田正睦老中以及川路圣谟、岩濑忠震和土岐赖旨等开明派外务官员因受到一桥派嫌疑大都被罢免，这对幕府正在顺利开展的开国外交是莫大的打击。镇压所及，从公卿、诸侯、藩士，直至民间志士，使全国为之战栗。

幕府当局专心致力于开放港口的对策。首先，把条约所规定的神奈川开港场地设在横滨村。这是因为神奈川是东海道的驿站，生怕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预料不到的纠纷，而且海岸平浅，从地势来看也不适于作港湾。哈里斯则认为横滨不等于神奈川，开放横滨违反条约，如果默认这一点，对今后履行条约就将没有保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幕府不接受这个抗议，在横滨地区设立了运上所（海关）和神奈川奉行所，整顿市街，招徕商人，一步步地造成了既成事实。外国商人也不顾哈里斯的制止，聚集到便于交易的横滨。幕府又征用了横滨附近的诸侯领地和旗本领地，作为直辖地，交由外国奉行管辖，并命令外国奉行兼任神奈川奉行，由他作开港准备。

48

1859年6月28日，幕府颁发布告，说五个缔约国的国民和日本人可以在神奈川、长崎和箱馆三港自由进行交易。与此相适应，外国方面也分别任命和派遣来了外交官。哈里斯晋升为代理公使，把江户麻布的普福寺作为临时公使馆，在神奈川本觉寺设立了领事馆。英国政府任命广州总领事阿礼国(Alcock, R.)为驻日总领事兼外交代表，在江户上高轮的东禅寺设立临时公使馆。法国政府任命伯洛康特(Bellecourt, P. du Chesne de)为驻日总领事兼外交代表，于9月进入江户麻布的济海寺。荷兰理事官寇帝斯作为外交代表，在江户芝区的长应寺设置了临时公使馆，不久，就移交给总领事维特(J. K. de Witt)，但仍以长崎的出岛为据点。俄国政府于9月任命约瑟夫・戈斯克维奇(Goskevich, I.)为领事兼外交代表，驻在箱馆。

日荷、日俄、日英、日法等通商条约均在江户批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则与此不同，是在华盛顿批准交换的。这是日本方面全权代表主动提出的，使哈里斯大为惊喜。岩濑忠震等人想利用这一机会亲临其境地广泛考察一下海外的实际情况，但岩濑因受安政大狱株连，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尽管开港后事务繁忙，幕府还是一再准备向美国派遣使节，10月，决定任命外国奉行兼神奈川奉行新见正兴为正使、外国奉行兼箱馆奉行村垣范正为副使、目付小栗忠顺为监察，其下武士和随从人员共派遣八十一名。这是开国后首次向国外派遣的外交使节。另外还以保卫使节的名义，派军舰奉行木村喜毅和军舰操练所总教习胜海舟指挥从荷兰购入的军舰咸临丸前往美国。咸临丸于1860年2月4日从品川①出发，在惊涛骇浪中艰苦航行，终于3月17日开进旧金山港。另一方面，使节一行则由于哈里斯的关照，搭乘美国军舰宝哈丹(Powhatan)

① 品川：地处江户南部，临海有港口，为江户的门户。今为东京都的一个区。——译者

号，2 月 13 日由品川出发，经由夏威夷，于 3 月 30 日到达旧金山，5月 18 日在华盛顿谒见布坎南（Buchanan, J.）总统，完成了使命。

第三节　外交的混乱和国内政局的急转直下

十　尊王攘夷运动的发生

开港以后，外国贸易迅速发展。横滨开港后半年内输出额达四十万美元，输入额达十五万美元。主要输出品是生丝、茶叶和铜等。输出量的急剧增加，使国内供求关系失调，引起了物资不足和商人的囤积、投机，带来了输出品价格暴涨。随之，其他农产品价格以至各种物价也都飞涨。这是幕府没有预料到的严重事态。

开放贸易还引起了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在锁国情况下，日本的金银比价为五比一，与国际行情的十五比一相比，金价极为低廉。因此，随着开始通商，在短期内就有大约五十万两巨额金币外流。幕府赶紧改铸金币，降低纯金含量，以防止外流，这就引起了币值的下降和物价的上升，造成了物价高涨的原因。

40

经济失调的直接受害者是下级武士和平民。他们憎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苦的开港和贸易。当时的下级武士和部分平民（草莽之士），由于缺乏关于国际形势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其愤怒就以排斥外国人亦即所谓攘夷论这种倒退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论调是不合理的，是不合乎时代要求的，但由于它为生活的实际感受所证实，得到广泛的人心。

攘夷论很快就和主张绝对尊崇天皇的尊王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尊王攘夷论。攘夷论者在朝廷的攘夷论中寻求反对幕府开国政策的根据。攘夷的主张就作为一种尊重天皇意旨的行为而取得了言之成理的依据。立足于神国思想、宣扬日本国体的优越性和独特性的尊王论，又在思想上支持了攘夷论者蔑视外国人为未开化

野蛮人的夷狄观。这样，“为攘夷而尊王”与“为尊王而攘夷”就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井伊直弼未经敕许就签订条约这种行动，不仅成了从攘夷立场攻击的对象，而且也是不能容许的“违敕”行为。而且，安政大狱就这样一下子把攘夷和尊王结合起来。于是从攘夷论出发对幕府的批判，就发展成为从尊王攘夷论（尊攘论）的立场对幕府的批判。

对外关系的发展激怒了攘夷派，攘夷派杀伤外国人的事件不断发生。1858 年 8 月，沙俄帝国的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Muraviyov, N. N.）为批准交换《日俄修好通商条约》和谈判库页岛边界划分问题，率领舰队来到品川。当时，俄国见习士官和水兵为购买粮食在横滨登陆，遭到攘夷派袭击，两名死亡，一名负伤。这是开港后第一次杀伤外国人的事件，幕府当局和各国外交使团都受到很大冲击。事件经英美两国外交代表从中调停，以日本方面道歉、神奈川奉行引咎辞职、逮捕并惩办犯人为条件获得解决，但犯人始终未能捕获。接着，11 月，又有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偶然穿着西服被误认为西洋人而遭杀害。次年，1860 年 1 月，曾在海上遇难的纪州渔夫传吉，归来后在英国总领事馆充当翻译，被认与外国人合谋叛国而遭刺杀。2 月间，荷兰两名船长被杀。对于这些事件，列强外交使团提出强烈抗议，迫令幕府采取有力措施。幕府也竭尽了全力，但犯人却一个也没抓到。

对于荷兰船长被杀事件，荷兰副领事提出对每名被害者给予二万五千美元巨额赔款的要求，据说这背后里有主张持强硬态度的英国总领事阿礼国作后盾。其理由是要以要求巨额赔款来促使幕府下决心严加制止，以防止此种事件的继续发生。结果，幕府 50 给予每人一千两新小判①。这是对杀伤外国人事件的首次赔款。

① 小判：江户时代一种金币，每枚含金一两。幕府中期以后，屡次改铸，含金量降低，称为新小判。——译者

据笔者计算，一千两新小判的含金量，与当时一千二百六十美元的含金量大致相等。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外国人对幕府维持治安的能力、并由此对幕府的统治能力加深了怀疑，使幕府外交陷入困难境地。

尊攘派的恐怖行动逐步升级。3月24日，水户浪人[①]和萨摩藩士在江户城樱田门外杀害了井伊直弼大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暗杀在职大老，使各国外交使团也异常震惊。与此同时，他们对开港所带来的影响之深刻以及幕府处境之困难也有了新的认识。当时已晋升为英国驻日公使的阿礼国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井伊扫部头[②]的遇刺，给首都投下了暗影——疑惑的阴影，使人预感到更大灾难的不安的阴影"，还说："外国公使馆已经明确认识到，公使馆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攻击的目标，这与其说是出自对公使馆本身的敌意，不如说是意图在于使现存政府陷入它同各外国的冲突之中。"[③]

十一 开国外交的苦闷

面对着动荡不安的国内形势，幕府采取了种种对策。1859年10月，瑞士使节林道(Lindau, R.)来到日本要求缔结条约，12月，幕府以国内人心动荡不安和开始贸易后经济失调为理由，予以拒绝。1860年5月，幕府颁发了五种商品运往江户的命令，规定杂谷、灯油、蜡烛、绸缎和生丝的出口，必须经过江户的批发商，禁止从产地直接运往横滨。其理由是，神奈川开港以来，由于利欲熏心的商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致使江户货源减少，各种商品奇缺，居

① 浪人：丧失主君和俸禄的武士。——译者

② 扫部头：扫部寮总管。扫部寮，属宫内省，掌宫廷礼仪清洁。——译者

③ 阿礼国：《大君之都·幕末日本旅居记》中册，山口光朔译，《岩波文库》本，第94页。

民生活困难，所以决定暂时使这五种商品运往江户，以求“府内用品充裕”。不过，这不是修改“贸易法令”，因此，并不妨碍贸易商收买运往江户批发商的商品，然后出口。这种措施立即引起了江户批发商和横滨出口商之间的对立。由于町奉行必须考虑江户居民生活，而外国奉行则重视自由贸易，上述措施竟导致两者之间发生摩擦，于是这项法令便成了空文，未能收到实效。此外，6 月，幕府为了解决开港后的商品奇缺和上下交困的问题，设立了“国益主法专员”，煞费苦心地增加物资供应和救济穷人。然而，面对急剧扩大的国外贸易，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的。

幕府很焦急。6 月 1 日，老中久世广周、安藤信行等人通过所司代① 酒井忠义向关白② 九条尚忠请求将孝明天皇的皇妹和宫下嫁给将军德川家茂作夫人。幕府打算通过这种婚姻来调和条约敕许问题以来恶化了的公（朝廷）武（幕府）关系，恢复将军家的权威，使签订条约合法化，并试图消除尊攘派借以攻击幕府的名义。天皇最初不肯同意，但侍从岩仓具视主张以和宫下嫁为条件，令幕府约许废弃条约及重要国务事先上奏，那末，朝廷的政治权威就会提高。天皇采纳了岩仓的意见，7 月，以拒绝蛮夷，也就是拒绝外国人，并恢复缔结亲善条约以前的状况为条件，默许幕府关于和宫下嫁的请求。9 月，幕府由老中联名向天皇约定，今后七、八年乃至十年之内实现废弃条约，或赶走外国人。10 月，天皇非正式地通知幕府批准和宫下嫁。幕府因急于实现公武协调，竟至承担了不可能实现的义务。

在这期间，幕府于 8 月 3 日与葡萄牙使节古伊马拉埃斯（Guimaraes, I. F.）缔结了《日本国葡萄牙国修好通商条约》。这个条

① 所司代：江户时代警卫京都并代理民政的官职。——译者

② 关白：日本平安时代置摄政以辅佐年幼天皇，天皇年长后，改称关白，其后遂沿用下来。——译者

约的缔结曾由逵帝斯从中斡旋，其内容和五国条约大体相同，于1862年4月8日批准交换。

接着，9月4日，普鲁士使节艾林波（Eulenburg, F. A.）伯爵来到品川，也是要求订立条约。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首脑，正处在意气高昂的新兴时期。幕府面临着和宫下嫁的问题，唯恐刺激尊攘派，便拒绝了普鲁士的提议，但艾林波表示不同意，谈判陷于僵局。

与此同时，发生了两港两都延期开放的问题。在阿礼国的笔记中载有当时外国事务专员老中的下述重要谈话：

“多少年来，我们与外部世界没有来往，也为我们自己生产了一切必需品。……而现在，一下子同五个欧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同时产生了相应的物价高涨。这样一来，我们自身正遭受着全国性的一大灾难。十分明显，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来扩大生产，也不可能立即满足这种需要，结果会怎样呢？一切物价都在暴涨。没有多余财力的我国国民——收入非常低微的我国官员——势将无法生活，而不得不完全陷入贫困状态之中。这种状况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各种物价要涨到什么程度呢？这些事不能不令人担心。从我们来说，是愿意忠实于条约的。话虽如此，总不能坐视对我国普遍遭受贫困的威胁而不管。很明显，现在需要的是时间。你们是过于突乎其来地用如此庞大的需要和近乎贪婪的同西洋的通商向我们猛扑过来。……一言以蔽之，即为了你们的利益，恨不得要我们马上就干出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所有这些关系到我国安宁而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即使贵官不予理睬，我们为了防止重大灾难——这种灾难归根结底必将破坏贵官意图扩大通商之目的——的爆发，也不得不说，时间是必要的。”[①]

52

① 阿礼国：前引书，上，第412—414页。

开始通商对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超过了幕府的估计。现在，对于幕府来说，为了缓和国内的经济混乱和排外风潮，放慢开国的速度已成当务之急。按照五国条约，日本应自1860年1月1日开放新潟港，1863年1月1日开放兵库港；并自1862年1月1日开放江户为商埠，1863年1月1日开放大阪为商埠。新潟港口有砂洲，不适于作港湾，到1860年仍未开放。幕府已陷于无论如何也必须阻止通商关系再行扩大的境地。加之，朝廷极不愿意接近京都的兵库和大阪向外国人开放。为使和宫能够下嫁，幕府考虑尤其必须回避兵库开港和大阪开埠。8月，幕府当局就延期开埠问题向阿礼国进行刺探。阿礼国以此事违背条约精神，表示为难，但同时建议向本国政府发函，并由日本派遣使节。洛康特对此事也是这个意思。哈里斯希望将军亲自致书各国元首。这样，延期开港开埠就成了重大外交问题。

十二　外交危机的深化

哈里斯在幕府和普鲁士使节艾林波之间进行调解，他同情幕府的困境，想出了一个对策。这就是，如果与普鲁士订立一个新潟、兵库既不开港，江户、大阪也不开埠的条约，那么，对各国要求延期开埠开港就有了借口，哈里斯也就容易对延期开港开埠进行调停了。这个建议打动了幕府，与普鲁士的谈判逐渐走上了正轨。可是，1860年12月，日本方面全权代表之一、外国奉行兼箱馆奉行堀利熙突然自杀。其原因据说是普鲁士方面所提出的条约草案把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各国的名字都列上了，使安藤老中大吃一惊，因为他只打算同普鲁士一国缔结条约，堀利熙为此引咎自杀。老中唯恐增加缔约国会对京都发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年，1861年1月，又发生了尊攘派浪人暗杀美国公使馆翻译官亨利·修士肯(Heusken, H.)事件。当时，修士肯应艾林波的请求，正在协助普

鲁士使节团的对日谈判。那天也在芝区赤羽接待所参加谈判，是在归途中遇难的。这种纠纷对于谈判虽然不无妨碍，但1月24日，日本和普鲁士的全权代表几经周折，终于签订了《日本国普鲁士国修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在1864年1月21日批准交换。

暗杀修士肯事件，对各国外交使团和侨居日本的外国人震动很大。一再袭击外国人，终至临到使馆人员头上，外国人对此极其愤慨。与过去的杀伤外国人事件一样，这次也没有捕获凶手。而且还风传水户浪人要大举袭击外国人侨居地区，这也在外国人中引起了惊慌。阿礼国攻击幕府缺乏保护外侨的诚意，主张由英国军舰派水兵登陆，保卫公使馆，并主张各国外交使团一律从江户撤至横滨，以达到威吓幕府的目的。法国公使表示同意，两人退出了江户。荷兰总领事和普鲁士代表也对幕府提出了抗议。但哈里斯却体谅幕府处境困难，尽管他的亲信部下修士肯遭到杀害，仍然留在江户，并出面进行调停。对此，幕府答应尽力维持治安，处罚有关人员并加紧侦缉犯人；2月，设立了护卫外交官的外国人御用役（后改称别手组）。3月，英法公使回到江户，局势暂告稳定。幕府还给修士肯的母亲一万美元作为抚恤金。

这时，列强对日外交的主导权逐渐从美国转移到英国。1861年4月，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它用于亚洲的力量减弱了。英国由于上年10月签订了英清《北京条约》，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暂时告一段落，便转而前来确保开国以来就显得出乎预料地大有希望的日本市场。横滨的贸易，无论输入或输出，英国都占压倒优势。俄国继英国之后，在1860年11月缔结了俄清《北京条约》①，迫使清政府割让了广大的滨海州地区，这就与日本形成隔着日本海而直接对

① 指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使乌苏里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广大领土落入沙俄魔爪之中。西段边界所失领土尚未计算在内。——译者

峙的形势。于是控制日本海入口的对马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便提高了，不久就发生俄国军舰占据对马部分地区的事件。

早在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Actaon)号就测量了对马海岸，驻箱馆英国领事霍奇森(Hodgson, C. P.)也注意到对马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和拥有良好的港湾、木材资源，主张应该占领作为英国基地。英国的态度刺激了俄国。俄国·支那舰队①所属军舰波萨得尼克(Posadnik)号于1861年3月开到对马浅海湾，以修理舰艇为名，要求对马藩许可停留，4月，开进内海芋崎浦，不久竟不顾藩吏的制止，强行测量、伐木，建造营房，摆出了长期停留的架势。接着，俄国的供应船也来来往往。5月，波萨得尼克舰长彼利列夫(Birileff)一面向藩厅宣传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借土地和谒见藩主。对马藩当局急忙报告幕府和长崎奉行，藩主宗义和以一藩之力难以担此重任，请求调换领地。

关于这个事件，阿礼国向本国报告说，据他观察，俄国的目的有二："其一，确保日本海至黄海的航路自由，而一旦有事之时，则可作为破坏欧洲各国与日清两国通商的根据地；其二，阻止欧美列强建立接近俄国新领土(滨海州)的根据地。"他接着说："令人奇怪的是，在俄国下手的数年以前，其他欧美列强竟未插手该岛，置之不顾。"他强调："应对俄国军舰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迫令退出，如果俄国拒绝，英国就自己来占领该地"，并作为一种手段，主张"强硬要求日本政府保障履行条约并开放大阪和兵库，如果日本不答应，就迫使割让对马作为对以往违反条约的赔偿。"在他看来，俄国 54 的行动关系到英国的切身利益，"英国已处于对日本之行将被瓜分不能袖手旁观"的地位②。哈里斯也向本国报告说："占领对马的

---

① 俄国·支那舰队：指在中国地区活动的俄国舰队。——译者

② 大塚武松：《幕末外交史的研究》，新订增补版，宝文馆出版，1967年，第40—42页。

俄国舰长，说是为了不让该岛落入英法人手中"，"实则利用一年前英法两国人之间关于日本终将被西欧所瓜分的议论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口实"。[1] 就是这样，对马事件已成了围绕着日本的严重国际关系的象征，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预想到日本国土将遭到瓜分。

十三　伦敦备忘录

1861年5月，幕府向缔约各国元首发出了要求延期开港开埠的将军亲笔信。这封信以哈里斯的建议为基础，要求延期七年，即到1868年1月1日再行开港开埠。延期开港开埠问题，总算开始有了进展。幕府接受了阿礼国关于派遣使节的劝告，派遣外国奉行竹内保德等人前往欧洲。阿礼国的着眼点并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开港开埠问题，而是有意让使节认识英国的实力，使幕府倾向于依附英国，并使日本统治阶层见识一下资本主义经济，借以引导他们对于开展贸易采取积极态度。

然而7月间，尊王攘夷派的水户浪人突然袭击英国公使馆临时所在地的东禅寺，造成伤害馆员的所谓第一次东禅寺事件。列强外交使团非常愤慨。延期开港开埠的谈判刚见端倪，又遇到了障碍。8月，阿礼国为了打开局面，陪同前来日本的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何伯(Hope,J.)海军中将，和安藤老中等人进行了秘密会谈。关于尊攘运动的高涨，朝(廷)幕(府)关系的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内政治上的困难处境。过去幕府只是模模糊糊地向外国透露过，而在这次会谈中，幕府首次具体地作了说明。这时阿礼国才开始了解幕府的处境。从而断定，为了给幕府以恢复元气的"时间"，不能不在取得适当补偿的条件下同意延期开港开埠。他认识到，当此"英国的对日贸易情况已经超出最乐观的预想"之时，为了

---

① 大塚武松：《幕末外交史的研究》，新订增补版，宝文馆出版，1967年，第42页。

维持这种局面，并为了稳定地确保来日方长的日本市场，必须"信赖日本政府，……加强这个政府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延期开放新港，就好比把重载扔进大海里，以便轻舟前进。"① 这种想法在英国本国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上得到了反映。

为了确立英国在对日关系中的主导地位，阿礼国进而利用对马事件。他在同安藤老中等人的会谈中提议用英国的力量迫使俄国军舰撤出对马，博得了幕府方面的欢心。8月，何伯率两艘军舰开赴对马，向停在对马的俄国军舰施加压力，令其撤走。9月，俄国军舰不得已撤离了对马。对马危机总算勉勉强强地度过了。对马藩主和长州藩② 主是亲戚，事件以后，对马藩士大岛正朝等人从保卫对马的观点出发，策划征服朝鲜，并通过长州藩士木户孝允接近幕臣胜海舟。这种活动成了后来征韩论的萌芽。 55

对马事件加深了幕府对俄国的认识。现在，调整日俄关系已成当务之急。11月，幕府训令派往欧洲的使节竹内保德，为了避免日俄纠纷，在访俄之际，可与俄国进行谈判，对库页岛确定以北纬五十度线为两国国界。

1862年1月，正使竹内保德、副使松平康直和目付京极高朗等共三十六名赴欧使节团搭乘英国准备的军舰奥丁号，从横滨出发，首途历访法、英、荷、普（鲁士）、俄、葡（萄牙）等国。这一行人中，还有福地源一郎、福泽谕吉和松木弘安（后改名寺岛宗则）等洋学家参加。

5月，竹内保德等人开始同英国外相鲁塞尔（Russell, J.）举行会谈。鲁塞尔听取了刚好回国的阿礼国的意见，倾向于接受日本方面延期开港开埠的提议。于是，6月6日，日英代表签订了《伦敦备忘录》，英国同意新潟、兵库的开港和江户、大阪的开埠，均从

① 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增订本，吉川弘文馆，1966年，第84—87页。

② 长州藩：今山口县西部地方。——译者

1863年1月1日开始延期五年。日本方面则决定撤销六项有关对外贸易和旅日外侨事业活动的限制，再次确认了“自由贸易”的原则，作为英国同意延期的补偿。此外，竹内保德等人还约定，归国以后向幕阁提出对马开港、减轻酒类和玻璃器皿等的税率、在横滨和长崎设置保税仓库① 等建议。法国等国也仿效了英国。竹内使节团的使命基本完成。

不久，使节团一行前去俄国，在谈判延期开港开埠的同时，开始谈判以北纬五十度线作为库页岛分界线的问题。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伊格那提业幅(Ignatief, N.)表示妥协，愿以四十八度线为分界线。竹内和松平打算就此解决，但京极高朗从目付的立场出发，认为违背幕府训令，表示强烈反对。日本方面态度不统一，结果，在9月12日同哥尔查科夫(Gorchakov, A. M.)外交大臣签订的备忘录中，决定将确定库页岛边界问题留待日后解决。同行的福地源一郎说，这是“幕末千载之遗憾”②。使节团于1863年1月归国，是一次长达一年的长期出访。

十四 雄藩登台

以英国为首的各缔约国对条约中所获得的权利作了一大让步，即两港两市的开港开埠延期五年，这是为了给幕府以恢复元气和镇压反对派的时间。不过，幕府并未有效地利用这一宝贵时间，它正在衰亡的下坡路上朝下滚去。

56 幕府已经处在尊攘运动的国内压力和列强外交使团的国外压力之间，苦于应付。以这种形势为背景，旁系的大藩(雄藩)登上了政治舞台。幕府强盛时期，雄藩是被排斥在中央政权之外的。但

① 保税仓库：未完成输入手续前保存货物的仓库。——译者

② 福地源一郎：《怀往事谈・幕末政治家》，(《幕末维新史料丛书》八)，人物往来社，1968年，第69页。

现在幕府已无当年镇压雄藩的力量了。长州藩首先冒头。1861 年，该藩以才干闻名的长井雅乐提出"航海远略策"，经藩主同意，从 6 月到 8 月，开始对朝廷和幕府之间进行调解。他对攘夷作出扩大解释，说只有进行开国并向海外发展，使日本的武威炫耀于全世界，才是真正的攘夷。他试图用这种说法使"攘夷"和"开国"巧妙地并存不悖，受到了朝廷和幕府双方的欢迎，于是长井雅乐名扬天下。但不久，以久坂玄瑞为中心的该藩尊攘派攻击他帮助幕府的开国政策，欺骗了朝廷。他因此不幸失势，被处死刑。

1862 年 2 月13日，水户的平山兵介等尊攘派浪人在江户城坂下门外刺伤安藤老中。结果，安藤在 5 月间不得不辞职。按照福地源一郎的评价，安藤这个人物，"总之，作为当时之老中，尤其作为管理外国事务之宰相，自安政年间至幕府灭亡为止，乃历届阁老中无与伦比之一人"①。阿礼国也高度评价安藤说："在和我们互相商讨事务的所有阁老中，他对缔约以来必然引起的各种急务，其态度最为公正而合理。他热切希望，在他的处境允许的范围内，使日本和各国的关系即令不能尽如人意，至少也要把它置于友好基础之上"，从而认为安藤被袭击，"对于我们本身或以条约义务为基础的外交政策，都不能不视为又一次打击。"② 安藤的下台，对幕府外交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再说长州藩长井雅乐显赫一时的活动，刺激了萨摩藩。该藩的实力派是前藩主岛津齐彬的弟弟，藩主岛津茂久的生身父亲岛津久光。他和心腹大久保利通等继承岛津齐彬的遗志，登上中央政治舞台。他们从积极的开国论立场出发，要求实现国家权力一元化和整顿外交体制，试图介入朝廷（公）和幕府（武）之间，调处两者的对立，利用朝廷的权威改革幕政，调整并重建幕藩统治体制。他

① 福地源一郎，前引书，第 327 页。

② 阿礼国，前引书，下，第 318、319 页。

们这个运动被称作公武合体运动。5月，率领大军进京的岛津久光等，利用寺田屋事件①，杀掉了该藩尊攘派，乘势威迫朝廷发出改革幕政的敕令，并挟同敕使前往江户。7月，岛津久光等人以敕令的名义，把萨藩的主张强加于幕府。结果，幕府分别起用了与岛津齐彬政见相同的一桥庆喜为将军后见职②、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③。于是一桥派复活和幕政改革之势形成，萨藩的公武合体运动仿佛胜利在望了。

57 岛津久光改革幕政的时候，攘夷风潮也逐渐高涨。6月，警卫英国临时公使馆的松本藩士伊藤军兵卫刺伤英国水兵，发生了第二次东禅寺事件。岛津久光在江户工作完毕，9月起身前往京都。当一行队伍通过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时，英国商人理查森(Richardson, C. L.)与队伍的前锋相遇未曾下马，护卫的萨藩藩士对其无礼大发雷霆，杀死理查森，并砍伤了随行的外国人。这就是所谓的生麦事件。这一事件是一次不幸的偶然事件，并不是攘夷行动。

明治后期外交大臣林董的回忆录《后事以前事为师》中说，"余所识美人弯理度(Van Reed, E. M.)，通日语，颇以日本通自居。彼在理查森等之前遇上岛津一行，当即下马执辔，伫立路旁，车驾通过时脱帽致敬，乃安抵江户。后闻理查森之生麦事件，语余曰：'不知日本风俗，倨傲无礼，致遭此祸，乃自作自受'。"④幕府末期明治史研究的权威尾佐竹猛在所著《从国际法看幕末外交故事》一

---

① 寺田屋事件：萨摩志士有马新七等策划杀害关白久条尚忠等，拥护岛津久光倒幕，在京都郊外伏见的寺田屋旅店举行集会，岛津久光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立场出发，派家臣奈良原喜八郎等斩杀之。—译者

② 将军后见职：正式名称为大将军后见职，江户末期政局不稳时设之。后见，是保护人的意思。—译者

③ 政事总裁职：也是江户末期的临时官职，很快就撤销了。——译者

④ 林董：《后事以前事为师》，又见《林董回忆录》，《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70年，第112、113页。

书中，根据林董所谈，记述生麦事件说："可以了解，原因在于彼此礼节不同。据说萨摩方面的记载也说，先遇上一外国人，下马执辔，安然无事，此外国人当即前述之弯理度"，认为这不是攘夷行动。①

然而，社会舆论却把萨藩的行为误解为"攘夷的快举"大加喝采，英国方面，据阿礼国的说法，也把此事理解为"最恶劣的"攘夷行动。此事偏又发生在第二次东禅寺事件之后，以致英国方面态度强硬。他们并不仅是因为大英帝国市民惨遭杀害而愤怒的。当时，英国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维护江户幕府，在幕府统治下来确保稳定的市场。因此，他们打算打击妨碍幕府外交的攘夷派，从侧面来支持幕府。于是他们便相信了幕府的宣传，误认为萨摩藩和长州藩同是攘夷派的根据地。英国代理公使尼尔（Neale, E. J.）要求幕府书面道歉，赔款十万英镑；要求萨摩藩逮捕、判处凶手，并交出两万五千英镑的抚恤金，来作为生麦事件的补偿。幕府表示同意，萨摩藩则从惩罚无礼的道理，即行使诸侯共认、理所当然的制裁权的立场出发，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幕府没有能够强制萨藩采取使英国满意的措施。各国逐渐开始认识到，幕府现在已不具备作为"日本国政府"的充分职能了。

十五　幕府外交的破产

萨藩的公武合体运动，与其本意相反，致使攘夷风潮更加高涨。岛津久光等人的实践证明了敕令在现实政治中的有效性。这一点立即被尊攘派仿效去了。本来就是保守的、倾向于攘夷论的朝廷，轻易就成了尊攘派的俘虏。由尊攘派掌握藩政的长州藩和土佐藩②，加上民间志士们都集聚在京都，用暴力威胁，把朝廷中 58

① 尾佐竹猛：《从国际法看幕末外交故事》，1926年，第409页。

② 土佐藩，今四国的高知县一带。——译者

的反对派驱逐出去，代之以自己一派的公卿，以加强自己在天皇身边的势力。并擅自颁发立即实行攘夷的敕令，把幕府逼得走投无路。

1863年1月16日，攘夷敕使三条实美和姉小路公知在江户城向将军德川家茂下达了责令攘夷和设置亲兵①的敕令。在幕府内部，前此根据萨藩下达的敕令而任命的松平庆永等人主张遵奉朝命，与反对这个敕令的老中等发生对立，加深了混乱。1月31日，长州藩尊攘派高杉晋作等纵火烧毁了正在江户品川御殿山施工的英国公使馆，公然点起了攘夷运动的火焰。尊攘派气焰高涨起来。次日，即2月1日，幕府下令大名以下全到幕府来上班，宣布同意朝廷攘夷的意旨。签订亲善条约以来，幕府勉强坚持下来的开国方针，从此开始逆转了。虽说权衡轻重缓急，不得不然，但一发布这种违反时代潮流和不负责任的攘夷布告，幕府就形同放弃了自己作为中央政府所拥有的职责和荣誉。英国和法国提议对幕府的困境予以援助，另一方面，为了保护侨民，集结军舰于横滨。对外关系紧张起来了。

朝廷督促幕府决定攘夷的日期。由于宣布了攘夷，幕府地位已极为软弱无力，被逼得无可奈何，终于在6月6日答复天皇，定于本月25日（文久三年五月十日）开始实行攘夷，并将此意布告天下。当然，幕府既没有实行攘夷的意思，心中也没有行得通的把握。24日，老中级的小笠原长行②向各国公使要求关闭通商港口，撤走侨民，各国表示拒绝，并答称：如果日本强行要求撤退侨民，各国将采取自卫行动。各国还要求驻扎军队以防备尊攘派袭击外侨居住地。7月，幕府许可英法军队驻扎横滨。

开始实行攘夷的6月25日，长州藩炮台向航行在下关海峡的

① 亲兵：幕府末年和明治初期称直属天皇的军队为亲兵，后称近卫兵。——译者

② 小笠原长行（1821—1891年）：当时任外国事务总裁。——译者

美国商船彭布罗克（Pembroke）号开炮。接着，7月间，又分别炮击了法国的情报舰建昌（Kien-Chang）号和荷兰军舰密杜沙（Medusa）号。这种行为使国内外大为震动。尼尔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应该立即给以惩罚的海盗行为”[①]。上年4月继哈里斯之后担任美国公使的普伦（Pruyn, R. H.）决心进行报复。美国军舰怀俄明（Wyoming）号立即袭击并破坏了下关炮台，击沉了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和壬戌丸，给长州方面以沉重打击。这一重创尚未恢复，法国军舰塞米拉米斯（Semiramis）号和唐克来德（Tancle-de）号又来袭击，并命令二百五十名海军登陆，彻底破坏了炮台。惊惶失措的长藩当局，急忙起用了高杉晋作。高杉晋作虽曾一度同尊攘派采取共同行动，但因对尊攘派在京都那种不合实际、沽名钓誉的行动感到失望，而旋即退出。他打破旧身分制的框框，组织了新军“奇兵队”，加强了下关的防卫。这时下关海峡依然处于被封锁状态。

7月25日，英、法、美、荷四国代表在横滨集会，决定对长州藩采取强硬措施，以维护条约规定的既得权利并恢复内海通航权。四国代表制定了联合备忘录。他们还要求幕府迅速制裁长州藩的不法行为。其中，普伦态度尤其强硬。 59

然而，在日本拥有最大海军力量的英国，态度反而消极。这是因为，当时英国对日贸易发展顺利，不愿搞坏对日关系。

生麦事件发展为萨、英战争。尊攘派攻击萨藩的开国论，说这意味着对外屈服，从而萨藩在政治上被追陷于孤立。正因如此，尽管萨藩站在开国论的立场，却不能接受英国的要求，表示妥协。尼尔终于决心派遣舰队前往鹿儿岛。幕府老中联名写信要求暂缓派遣舰队，英国方面置之不理。8月，英国·支那舰队[②]司令古柏

---

① 石井孝，前引书，第259页。

② 英国·支那舰队：指在中国地区活动的英国舰队。——译者

(Kuper, A. L.)海军少将率领尤列拉斯(Euryalus)号等七艘军舰和尼尔一起从横滨出发，前往鹿儿岛。

8月12日，英国方面要求引渡生麦事件的凶手并支付抚恤金，萨藩方面予以拒绝。15日，古柏为了保证谈判取得有利的进展，拘捕了萨藩的青鹰丸等三艘轮船。这时，船上将领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即后来的寺岛宗则)为了亲临其境地学习英国文物，自愿地当了"俘虏"。这就成了战争的开端。当时正赶上暴风雨，英国舰队和萨藩炮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战。16日，继续有小冲突，但英国舰队因准备不足于17日撤退。虽然英国方面战死十三名、负伤五十名，而萨藩方面仅战死五名、负伤十余名，但实际上萨藩方面的损失很大。

不过，尊攘派看到指令发布定期实行攘夷布告等敕令的威力竟意外地使幕府发生了动摇，便大胆起来。领导人真木和泉制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计划，让天皇行幸大和①，亲征外夷，届时对随行的将军出其不意地下一道敕令，迫使他立即采取攘夷行动，他如果不接受，就敕令各藩起来讨伐幕府。这时攘夷已从它的目的转化为打倒幕府的手段了。反对攘夷、主张开国的萨藩当然不会看不到这种动向。9月30日(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萨藩和力图拯救宗主德川家危机的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联合起来，武装封锁了京都御所②，把攘夷派的势力从朝廷驱逐出去，把政局的主导权夺回到公武合体派手里。这就是"八月十八日政变"(文久政变)，由于这次政变，过去气势汹汹的京都尊攘派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其主力逃往长州去了。

幕府外交这才从攘夷派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得到了重整旗鼓的机会。然而，幕府又一次错过了这一宝贵时机。

---

① 大和：今奈良县一带。——译者

② 御所：天皇居住的皇宫。——译者

第四节　幕府外交的崩溃

60

十六　封锁横滨港的问题

文久政变之后，天皇仍不改变攘夷的意旨，并再三督促幕府实行攘夷。由于幕府首脑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将军和老中等人的"江户幕阁"（旧纪州派），另一派是一桥庆喜、松平庆永和保卫京都的松平容保等人的"京都幕阁"（旧一桥派），就没有能力制定和实行统一的对外方针。江户幕阁唯恐一桥庆喜以朝廷为后盾阴谋夺取将军职位；京都幕阁为了博得朝廷的欢心，倒向逆流背时的攘夷论。由于这种状况，幕府对于朝廷所固执的攘夷要求无计可施，不知如何是好。作为穷极之策，幕府打算暂时封闭横滨港，摆出攘夷的样子，以此来同朝廷取得和解。于是，1863 年 10 月，老中板仓胜静等人向美国公使和荷兰总领事提议封闭横滨港，遭到强烈反对。幕府得知各国外交使团强烈反对，就决定暂缓向英国和法国提出。封闭港口的交涉，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

这时，法国公使洛康特向幕府伸出了救援之手。他建议幕府派遣使节前往巴黎，解决 7 月间下关海峡炮击建昌号事件和 10 月间法国陆军卡缪士（Camus）中尉在横滨近郊被浪人杀害事件的赔款问题，那时也许能有机会就封闭港口问题进行对话。幕府心想以派遣使节为借口来转移来自朝廷的攘夷压力，就接受了这个建议。1864年 1 月，任命外国奉行池田长发为正使、外国奉行河津祐邦为副使、河田熙为目付，一行三十七人，于 2 月乘法国军舰从横滨出发。

萨、英战争以后，萨藩认为英国可能再次进犯，加强了戒备。但在参加过实战，体验到英国舰队威力的人们中间，对英媾和的呼声

却高涨起来。结果，经分家①佐土原藩从中调解，1863 年 11 月，萨藩代表岩下方平、重野安绎在横滨开始与尼尔进行和谈。12月，谈判达成协议，萨藩约定逮捕并判处生麦事件的肇事者，并以遗族赡养费名义，从幕府借得两万五千英镑付给英国作为抚恤金。英国方面则决定对萨藩购买军舰提供方便。这样，萨英之间的亲善关系便由此开始。英国在交战中认识了萨藩的实力，通过和谈，改变了对萨藩的看法。英国过去相信幕府的情报，把萨藩误认为攘夷派。在同萨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才了解到实际上该藩始终主张开国论，是同攘夷论对立的。不久，英国就开始探索，设想用以萨藩为中心的雄藩联合政权来取代幕府。

1864年 2 月 6 日，在封闭港口使节团出发的同一天，外国奉行竹本正雅和菊池隆吉等人同瑞士使节亨伯特(Humbert, Aimé)签订了《日本国瑞士国修好通商条约》。早在 1859 年，瑞士就向日本派遣了使节，通过荷兰要求缔结条约，但遭到幕府拒绝。不过，当时幕府向他约定，今后日本同其他国家缔结条约时，要通知瑞士，瑞士使节取得这个约定后就回国了。次年，日本和普鲁士订立了条约，幕府按照约定，通过荷兰通知了瑞士。瑞士政府就派来了亨伯特，于1863年 4 月到达长崎。但因当时攘夷风潮正盛，幕府回避与亨伯特进行谈判。荷兰总领事感到不耐烦了，便威吓幕府说，如果不与瑞士订立条约，就向本国政府建议，不接待封闭港口谈判使节团一行。幕府这才与瑞士缔结了条约。该条约于 1865 年 6 月 7 日在江户批准交换。

1864 年 2 月 7 日，朝廷任命公武合体派诸侯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伊达宗城(宇和岛)、山内丰信(土佐)为朝议参与。20 日，又任命了岛津久光。这反映了文久政变后雄藩政治地位的

① 分家：与宗家（嫡系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分支家族。佐土原藩在今宫崎县部分地区。——译者

提高。雄藩要求打破过去的成规，直接参加制定国家大计，结果产生了这个参与会议。但在第一个议案，即封闭横滨港口问题上，主张促进此事的一桥庆喜和反对此事的岛津久光就发生了正面冲突，还不到三个月，这个会议就烟消雾散了。一桥庆喜企图通过封闭港口来讨得朝廷的好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加强幕府。这是利用外交来解决内政问题。主张开国论的萨藩坚决反对。于是，公武合体运动分裂了，幕、萨之间的裂痕日渐扩大起来。

封闭港口谈判使节池田长发一行于4月到达巴黎，同法国外长德里安·路易士（Drouyn de Lhuys, Edouard）进行了多次会谈，在此期间目睹欧洲文物，领悟到封闭港口是不可行的，并了解到随着普鲁士的兴起，欧洲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统一国内舆论和实现富国强兵是首要的问题，便急于归国，并未使法国承认封闭港口，就结束了谈判，6月20日，签订了《巴黎协定》。该条约决定：(1)幕府偿付十万美元、长州藩偿付四万美元作为炮击建昌号的赔款；(2)使节归国后三个月内，应使法国船只能在下关海峡通航，在不得已时，可以诉诸武力，如有必要，可以与法国海军分遣队指挥官合作；(3)为了发展两国贸易，降低各种关税。21日，使节团从巴黎出发，8月19日出人意料地回到横滨。他们立即向幕阁汇报，极力说明封锁港口之不可行，同时建议：(1)应向欧洲各国派遣外交代办；(2)同全世界各独立国家签订亲善条约；(3)致力于富国强兵，派遣海外留学生，允许国民前往海外；(4)利用海外报纸，研究世界形势。这些本都是卓见，但走向衰亡的幕府根本不能采纳。幕府本想以派遣使节为借口，拖延实行攘夷的时间，现在便张皇失措起来，处分了池田等人，并于25日宣布废弃《巴黎协定》。法国公使也生怕在四国联盟中间陷于孤立，并且为了讨取幕府的欢心，就同意了废除条约。 62

十七　四国舰队远征下关

由于封闭横滨问题未能取得各国同意，幕府就对运往横滨的生丝加强统制。结果生丝贸易缩减，出现了横滨的实际闭港状态，又由于长州藩封锁下关海峡，长崎贸易也受到打击。各国的对日通商关系面临严重危机。

1864年3月，因休假完返回英国的阿礼国回到日本，得知3月5日天皇敕令将军速定攘夷国是，以及将军对此敕令的答复等等，他推测日本的攘夷国策将继续坚持。5月间，他便向本国报告说："靠时间和忍耐来改善事态的希望已没有了"，力陈必须攻击下关，并认为"只要此次攻击是成功的，并且是有效的，我相信此举足可使整个统治势力——上自天皇、大君下至腰佩双刀的武士、浪人——确信攘夷计划绝无成功之望，也根本不可行；并会使他们今后放弃一切这类计划。"① 他要求法国、美国和荷兰代表，支持这一方针。

法国提出了新的对日政策。4月，由驻突尼斯总领事转任法国驻日公使的洛舒(Roches, L.)来日就任。拿破仑三世手下的新外长德里安·路易士把过去在远东方面追随英国的消极政策改变为积极政策，洛舒是体会了这一方针而来到日本的。洛舒虽然认为有必要惩罚攘夷派，但对英国公使所领导的共同行动却抱消极态度，而宁愿寄托希望于幕府的努力。另一方面，美国公使和荷兰总领事则全面赞同阿礼国的提议。最后，5月，四国代表签定了联合议定书，再一次督促幕府履行去年7月的联合决议，以观察幕府的反应。可是，幕府为了实践对朝廷所作的封闭港口的誓约，反而越来越加强了对贸易的统制。在这种形势下，洛舒也认为必须攻

① 石井孝，前引书，第281、282页。

打下关，赞成共同行动的方针以牵制英国的独断专行。7月22日，四国代表签订了关于远征下关的联合备忘录。

文久政变以后，被赶出京都的攘夷派伺机卷土重来。7月，京都守护职指挥下的新选组①袭击并消灭了集结在池田屋的京都尊攘派的地下组织。被这次行动所激怒的尊攘派的长州(藩)军和浪士队于8月19日，在打倒京都守护职的口号下，进攻御所，但被公武合体派击退。这就是禁门之变。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下，长州藩遭到了四国联合舰队的进攻。拥有十七艘军舰、二百八十八门大炮和五千名兵员的大舰队，于9月5日开始攻击下关，顷刻之间就击毁了各个炮台。这就直截了当地证明了攘夷纯属妄想。

9日，长州藩主派遣高杉晋作化名宍户刑马前往联合舰队请 63 求投降。14日，达成和议，缔结了《下关协定》。长州方面约定：(1)优待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供给煤炭、粮食和用水等；(3)遇有风浪准许登陆；(4)不再新建和修复炮台；(5)对于(四国)未烧毁下关市街给予补偿和偿付战费。四国联合舰队远征的目的达到了。23日，外国奉行竹本正雅等人通知各国公使，停止封闭横滨，解除贸易统制。下关事件的赔款由幕府承担下来。10月22日，若年寄酒井忠毗和竹本正雅同四国代表签定了《下关事件议定书》，幕府赔款三百万美元；但如开放下关和濑户内海的适当地点为通商港口，四国可以放弃赔款。四国的目标在于后者。特别是阿礼国认为，诸侯的攘夷论是由于对幕府垄断贸易心怀不满而产生的，在诸侯领地内开设通商港口，就可以消除诸侯的攘夷思想。但幕府却选择了赔款的办法。

在四国舰队正要进行远征下关的8月24日，幕府追究长州藩军在禁门之变中进攻京都御所的责任，取得了讨伐长州的敕旨，便

① 新选组：也作新撰组，是幕府组织的浪人武装团体，用以镇压反对派。——译者

通令各藩出兵。然而，各藩苦于财政困难，并无战意。讨伐长州军的参谋、萨摩藩士西乡隆盛提出了假长州人之手来处分长州激进派这种妥协方案作为解决办法。12 月 9 日，长州藩投降，斩首三名家老① 及其他人员以示恭顺。第一次讨伐长州就这样结束了。长州藩的尊攘派领导人，久坂玄瑞等人前在禁门之变中多已战死，加以这次的判刑，形同全部覆灭。下关的惨败是攘夷论必定破产的实际教训。长州藩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才从尊攘运动的迷梦中醒悟过来。

十八　幕府和法国的合作

洛舒到任的时候，法国在对日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不要说与占全贸易额百分之七十的英国相比，就是同美国和荷兰相比也很差，有的年份甚至还低于普鲁士。处在以这种状况为背景的洛舒对日政策的基调是：(1) 与幕府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以提高法国的政治地位；(2) 把幕府作为特别的顾主，以谋求贸易的扩大。洛舒雇用了住在箱馆的传教士卡雄(Cachon, L.M.) 为公使馆翻译官，卡雄通过教授外语同箱馆奉行所的官员栗本鲲过从甚密，不久，栗本鲲当了目付和外国奉行等幕府高级官僚，这就为洛舒接近幕府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四国舰队远征下关和废弃《巴黎协定》时，洛舒对幕府的合作态度，也在幕府首脑中间造成了亲法的倾向。

在长州藩第一次遭受讨伐以后，高杉晋作认为藩政府对幕府过于软弱，非常愤慨，乃率领奇兵队起事，攫取了该藩的权力。他在“武备恭顺”的口号下，对幕府采取表面恭顺、实际对抗的态度。幕府因而计划再次讨伐长州。幕府着手加强武备，并计划建造炼

① 家老：各藩藩主下面的最高官员。——译者

铁厂(海军工厂和炮兵工厂),要求洛舒给予援助。过去,当幕府和各藩购买舰船和武器时,外商欺其无知,攫取暴利。而洛舒提出的建造炼铁厂的估价却不到幕府预算数的一半。于是幕府首脑对于洛舒更加信赖了。1864 年 12 月,老中正式委托洛舒筹划横须贺炼铁厂。1865 年 1 月,向法国订购了十六门新式膛线加农炮(拿破仑炮)。 64

洛舒向幕府提议直接出口生丝,作为筹建炼铁厂等所需巨额费用的办法。这种作法势必导致幕府对生丝的生产和流通实行统制,进而发展成为筹办以垄断生丝贸易为目的的日法合作公司,这就孕育着对抗英国"自由贸易"原则的因素①。2 月,老中把建造炼铁厂的合同交给洛舒。6 月,外国奉行柴田刚中以理事官的身份赴欧,为了购买机器和招聘技师、军事教官等任务,走访了英国和法国。他委托参与日法贸易的巴黎银行家弗吕里·埃拉尔(Flury Hérard, Paul)为日本的第一个代理人,即名誉总领事。

英国公使阿礼国于 1864 年 12 月回国,温切斯特(Winchester, C.A.)任代理公使。他继承阿礼国的方针,争取实现下关开港。但洛舒认为下关开港恐怕要助长"叛贼"长州藩的走私贸易,因而表示反对,主张宁可接受三百万美元的赔款。1865 年 4 月,幕府通知四国代表,拒绝下关开港,决定接受偿付赔款的方案,但同时要求延期偿付。对此,温切斯特向本国政府提议,可否免除赔款三分之二,即二百万美元,同时要求日本政府以下述条件作为补偿:(1)天皇批准条约;(2)兵库、大阪提前二年开港开埠;(3)降低关税率等。这个问题决定由驻日各国代表进行协商。

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被任命为驻日公使,于 7 月间到任。10 月,巴夏礼接到本国政府重要训令。训令指出,鉴于鹿儿岛和下关

---

① 石井孝,前引书,第 631—633 页。

两次战争后的形势，对“大君政府”，即幕府的统治力量已不能完全信任，暗示要同有实力的大名进行接触。前此于4月间，萨藩家老新纳刑部及五代友厚、森有礼等十九名萨摩藩留学生，已由英国商人格罗佛(Glover,T.B.，日本名仓场)陪同，前往英国。坚持树立幕府为日本统治者的法国方针同图谋接近雄藩的英国方针，二者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了。

十九　敕许条约和改税约书

1865年10月，巴夏礼、洛舒和荷兰总领事波尔斯布罗克(Van Polsbrock, Dirk de Graeff)(美国代表不在)在横滨会商，同意以前述天皇批准条约等三项作为交换条件，免除日本三分之二的下关赔款。洛舒认为巴夏礼的提议可以避免下关开港，同时他还期望“敕许”可以加强幕府的地位，因而表示同意。美国代理公使波特曼(Portman, A.L.C.)也予以谅解。于是四国达成了协议。当时，为了再次讨伐长州，将军和大多数老中都暂住在大阪城。于是，巴夏礼提议率领军舰开赴摄海(大阪湾)进行交涉，洛舒为了牵制巴夏礼的独断专行，答应同行。幕府唯恐刺激朝廷，就以幕府对外交负有专责，可以在江户进行交涉为理由，力图阻止外交使团前往摄海。但是，巴夏礼没有接受。

11月，四国代表率九艘军舰(英国五艘、法国三艘、荷兰一艘)来到兵库湾，以放弃下关赔款三分之二为代价，向住在大阪的幕府首脑提出由天皇批准条约，兵库大阪提前开港开埠和改定税率等三项要求，限七日内答复，否则就前往京都同朝廷直接谈判。朝廷和幕府都为之惊愕不已。这时，一桥庆喜等“京都幕阁”派企图利用外国压力赶走住在大阪城的“江户幕阁”，乃煽动朝廷的攘夷风潮，迫使朝廷发出敕令，对认为开放兵库势在必行的阿部正外和松前崇广两名老中进行弹劾，并罢免其职务。这个措施激怒了将军

德川家茂，他提出要辞去将军职务，返回江户。一桥庆喜一看结果搞得过火了，便惊惶起来。为了安抚将军，他来了个大转弯子，反而怂恿起朝廷敕许条约来。弄得朝廷莫名其妙。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在京都的萨摩藩士乘此混乱之机，为削弱幕府进行策动。他们建议朝廷召集雄藩会议来审议对四国的答复，在此之前，可由萨藩向四国代表交涉延缓答复日期；企图利用外国舰队开进摄海，朝廷害怕外国势力怕得要死的时候，把幕府掌握的外交权转移到雄藩会议来。外交权是气息奄奄的幕府手中剩下无多的中央政府权力之一，如果这个权力一丢掉，德川家的地位就只能没落成为一个普通诸侯了。为了度过这一危机，一桥庆喜紧紧逼迫游移不决的朝廷敕许条约，终于暗示否则将对朝廷施加暴力。既然到了这种地步，顽强主张攘夷的朝廷也屈服了，11月22日，终于批准了条约。这就形成安政以来的幕府外交已取得朝廷加以追认的局面，幕府从而暂时摆脱了困境。但是，朝廷并未同意兵库提前开港。巴夏礼把敕许条约看作是朝廷在主权方面居于幕府之上的证明。而洛舒则与此相反，认为一经得到敕许，诸侯便丧失攻击幕府的根据，指望幕府的政治地位会由此加强①。

敕许条约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解决，于是幕府再次讨伐长州的活动便着实地搞了起来。幕府要求四国代表取缔各国商人与叛贼长州藩之间的武器交易，得到了四国的同意。长州藩被逼入困境，就企图以坂本龙马等龟山社中②（后来的海援队）为媒介，通过自敕许条约以来反幕色彩鲜明起来的萨摩藩搞到武器。于是，1866年3月，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经坂本龙马介绍，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及小松带刀缔结了萨长盟约，准备对幕府开战。萨长两藩的关 66

① 石井孝，前引书，第411—414页。

② 龟山社中：龟山在长崎。社中意为结社。龟山社中的宗旨是研究海军、外贸等问题。——译者

系迅速改善，萨藩拒绝了幕府的出兵要求。这对幕府是一大打击。

另一方面，四国代表所要求的改定税率问题，则移至横滨继续谈判。巴夏礼要求按照中国《天津条约》的低税率，即以按平均价格算出的百分之五的从价税为基准，征收从量税。洛舒为了对抗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优势，主张把横滨作为自由港口，取消关税，而代之以制定国内交易税，以便于幕府控制贸易。然而，英国在对日贸易方面占压倒优势，发言权较大。同时，苦于幕府财政困难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等人为了追求眼前的税收，也赞同征收从量税的方案。6月25日，老中水野忠精与四国代表商订了《改税约书》(《江户协约》)，约定进出口商品一律以征收从量税百分之五为原则，废除各种限制贸易的措施。这样，各国就如愿以偿，得以把和中国相等的低税率与"自由贸易"原则强加于日本。愚蠢的攘夷运动及外国乘机施加的压力，加之被攘夷派硬驾起来的幕府外交的软弱和动摇，由于这些，对日不平等条约的体系遂告完成。从此，力量薄弱的日本工业就不得不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平等"的竞争。现在，幕府为了免除三分之二的下关赔款，在三项条件之中，除了提前开放兵库外，已同意了两项条件。然而赔款并未免除。幕府外交技巧的拙劣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日本是受骗了。结果，可以说叫人家白白拿到了低关税。

处于困境的幕府当然指望得到各国的支持。在签订《改税约书》的一个月以前，5月21日，幕府宣布，不论武士或庶民，为了学习学术和通商，均可前往海外(缔约各国)。这就彻底打破了锁国体制。横滨发行的英文报《日本时报》高度评价这一措施，说这是"在这个国家的精神状态中向彻底革命迈开了第一步"①。

---

① 石井孝，前引书，第450页。

二十　洛舒与巴夏礼的对立

1866年春，正在进行改税谈判，英国领事馆(后为公使馆)翻译官萨道义(Satow, S. E. M. 日本名佐藤爱之助)，在《日本时报》上用化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要求“修订条约与改造日本政府机构”。文章的主旨是：“应该把大君(即将军)降至原来的地位，使之成为大领主之一，而以天皇为元首的诸侯联合体来代替大君，作为统治势力。”① 他认为这种政权的转移，可由各国把缔结条约的对手从将军改为诸侯联合体来和平地得到实现。他这个办法与萨摩藩先前在敕许条约问题发生纠纷时所策划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篇文章的题目被译作《英国策论》，被广泛阅读，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影响。67 不过，英国政府的对策则比这篇文章更为慎重。

另一方面，洛舒却一步步地推行着支援幕府的政策。他不仅在外交上和物质上给予援助，而且回答老中的咨询，对“陆军编组问题”、“粮秣问题”和“宿营问题”等等讨伐长州战争的具体方策，都出了主意。1866年6月前后，法国经济使节库莱(Coullet,M.)来日，与幕府进行谈判，幕、法友好关系向前推进了。

7月，幕府开始了第二次讨伐长州战争。然而，形势对幕府不利。战争造成物价高涨和生活困难，在江户、大阪等地发生了激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城市的捣毁暴动，威胁着幕府军的后方。战况也很不妙，幕府进退维谷，乃以给8月27日去世的将军德川家茂办丧事为名被迫撤兵。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

在7月至8月间讨伐长州战争方酣之际，巴夏礼访问鹿儿岛，会见萨摩藩主父子，就便又访问宇和岛，也会见藩主父子，还和长州藩士进行了接触。英国靠拢雄藩联盟的政策，由此前进了一步。

---

① 萨道义：《一个外交官所见到的明治维新》上，坂田精一译，《岩波文库》本，第197页。

另一方面，法国的经济使节库莱同勘定奉行小栗忠顺经多次谈判，于9月间商定，由法国向幕府提供借款三千五百万法郎，购买武器、装备和军舰。幕、法和萨、英的对立日趋明显。

在此期间，日常外交活动仍继续进行。8月1日，幕府与比利时代表奥古斯特（Auguste, T'kint）缔结了《日本国比利时国修好通商及航海条约》（1867年9月10日批准交换），接着，8月25日，与意大利代表阿明乔恩（Arminjon, V. F.）缔结了《日本国意大利国修好通商条约》（1867年10月3日批准交换）。9月，幕府命令箱馆奉行小出秀实等人前往俄国商定库页岛边界。小出秀实等在彼得堡进行了谈判，但日俄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结果决定仍维持日俄双方领有的现状。此外，11月，幕府分别训令外国奉行浅野氏祐为驻法使节，外国奉行合原义直为驻英使节，这是最早的驻外使节。次年1867年1月12日，幕府与受丹麦政府委托为全权代表的荷兰总领事波尔斯布罗克缔结了《日本国丹麦国修好通商及航海条约》（10月1日批准交换）。这是幕府缔结的最后一项条约。总计自开国以来，幕府共与十一个国家建立了邦交。

德川家茂死后，众所瞩目的继承人是一桥庆喜。他认为德川家的家督①与征夷大将军的职位两者应该分开。1866年9月28日，他继承了德川宗家②，至于将军职位，他留待诸侯推戴而没有立即接受。将军一职形式上成了虚位。看到这种情况，巴夏礼终于断定，将军（大君）不是日本的元首。与此相反，洛舒为了表示将军是国家元首，并能行使主权，乃劝告老中实行兵库开港。这样，68 兵库开港就成了一个涉及日本主权谁属的重要政治问题。1867年1月，巴夏礼的亲信萨道义为了搜集情报，游历日本西部各地，在兵库同西乡隆盛进行了会谈。西乡表示，西南雄藩希望参加兵库

① 家督：嫡系继承人。——译者

② 宗家：嫡系家族，与分家相对而言。——译者

贸易，因此，反对由幕府独自开港和垄断贸易，希望由雄藩联盟来主持开港。

1月10日，德川庆喜终于看出，仍以接受将军职位为上策，乃接受了天皇宣布的任职诏令，就任为十五代将军。他励精图治，致力于复兴幕府。3月11日和12日，德川庆喜用两天时间，在大阪城会见洛舒，就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和经济等全部国政进行了咨询。洛舒对削弱各藩权力和强化中央集权制，建立官僚机构，整顿常备军，重整财政，改革税制等等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可以说是设计了一幅以德川家为轴心的绝对主义政权的蓝图。这些意见对德川庆喜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为了显示新将军的权威，德川庆喜还希望会见外交使团。因此，兵库开港就不能不加速进行。

与洛舒会谈的第二天，1月12日，德川庆喜向洛舒提出，希望调解朝鲜与法国之间的纠纷。上年11月，法国舰队以在朝鲜的法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炮击了朝鲜江华岛。这是西方列强企图武装入侵朝鲜的最初的尝试。朝鲜政府通过对马藩主把此事告诉了幕府。幕府把朝鲜这一行动理解为请求调解。不久，又有消息说，在法国炮击江华岛两个月以前，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在朝鲜大同江搁浅而被烧毁。幕府认为如能在朝鲜与法美两国之间进行调解并获得成功，日本的国际地位就会提高，幕府的权威也会上升，且可以此报答法国的恩情，于是就命令外国奉行平山敬忠前往对马，与朝鲜取得联系。同时，幕府还打算以外交上先进国家的姿态，敦促朝鲜开国。可是，这时香港一个自称是日本名儒的人以八户顺叔先生的名义在广州的《中外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毫无根据、荒唐无稽的投稿，说日本企图用八十艘蒸气军舰征服朝鲜①。这个报导引起了朝鲜对日本的戒心，幕府的调解意图遇到了障碍。不久，

① 田保桥洁：《近代日朝关系之研究》上，1940年刊印，1972年宗高书房复印，第121—122页。

国内政局紧迫，幕府再也没有余力过问朝鲜问题了。

二十一　幕府外交的终结

1867 年 4 月，德川庆喜要求朝廷敕许开放兵库。对此，萨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了阻止由幕府一手来开港，就策划把开港问题移交给萨摩、越前、土佐和宇和岛四侯会议。幕府和萨藩围绕着朝廷虚虚实实地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万国博览会正在巴黎开幕，幕府应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邀请，派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一行前往。萨藩与此相对抗，试图以"萨摩琉球国"的名义参加博览会，向博览会有关人员分发"萨摩琉球国"的勋章，以此在欧洲舆论界造成幕府与萨摩在国内政治上地位相等的印象。69 萨藩代表又取得法国实业家白山伯(Montblanc, Comte des Cantons de)的支持，让当地报纸刊登消息，说德川并不是日本国王，不过是大诸侯之一而已。结果，欧洲舆论便对将军的执政地位开始产生了怀疑。

为了扭转这种形势，洛舒四处奔走，企图安排让德川庆喜与各国外交使团会见，造成各国承认将军是执政者这一既成事实。4 月 29 日，德川庆喜终于在大阪城会见了四国代表。然而，尽管法、荷、美三国代表对德川庆喜使用了"陛下"的称呼，唯有巴夏礼仍称之为"殿下"，反对把将军当作元首。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外国人显示它能够行使主权，幕府不得不尽快开放兵库。6 月 26 日，德川庆喜亲自入朝，彻夜坚持，终于迫使朝廷敕许了开港。萨藩的策动再次遭到失败，于是决心打倒幕府。7 月，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与土佐藩士后藤象二郎、坂本龙马缔结了以实现"大政奉还"① 为目标的"萨、土盟约"。

---

① 大政奉还，即要求幕府把国家大政归还天皇。——译者

德川庆喜依靠法国的援助，竭力加强财政、军事力量。成果很大，足以使反幕势力为之震惊。据说小栗勘定奉行计划用新编的幕府军，先讨伐长州，再挥戈打倒萨藩，乘势废除全国各藩，将全国改为郡县制。萨、长二藩也进行了武装倒幕的准备。但是幸运之神却没有光临幕府。在法国，支持洛舒的外交部长德里安·路易士辞职，由芒斯特(Moustier,F. R.)继任。新外长担心过分袒护幕府，会伤害英法关系，制止了洛舒的活动。8月，驻法外国奉行向山一履报称，法国的六百万两借款未能达成协议。德川庆喜的改革幕政计划，因财源断绝而陷入困境。

后藤象二郎劝告德川庆喜，应该抢先在武力倒幕之前，主动归还政权。11月8日、9日，天皇分别向萨摩藩和长州藩下达了讨幕密旨。德川庆喜得知此事，为了舍名求实，即日上奏天皇，说"当今外交日繁"，为使"朝廷政出一途"，请求奉还大政。他的估计是，形式上把大政(统治权)归还天皇，以此消除讨幕的借口，然后在即将召开的诸侯会议上掌握主导权，实际上仍可确保德川家的统治地位。讨幕活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巴夏礼听到大政奉还，极力称赞德川庆喜的行动，强调这"表现了值得赞扬的牺牲权力的模范"。他以为日本的混乱局面可由此得以避免，市场的稳定可由此得以确保，为此高兴，希望"大君将继续以其惊人的才能和充沛的精力献身国家"，指望德川庆喜在新政治体制下发挥作用①。大政奉还实际上加强了德川庆喜的政治地位，对于这一点，洛舒也抱同样看法。11月17日，朝廷传谕德川庆喜，关于外交事务及其他紧急事务，暂时仍依旧由幕府处理。德川奉还大政的意图看来似乎实现了。

11月20日，为了调解朝鲜与法、美两国纠纷的悬案，幕府奏

---

① 石井孝，前引书，第727—728页。

请朝廷派遣外国总奉行平山敬忠前往朝鲜，得到了天皇的同意。但却未能成行。12月24日，幕府向国内外公布，新潟、江户暂缓开港开埠；17日，制定了横滨外侨居留地管理规则；23日，与俄国订立了《改税约书》。

武力倒幕派又卷土重来。萨摩藩和艺州藩[①]在京都、长州藩在西宫[②]分别集结兵力，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联合皇室公卿岩仓具视，于1868年1月3日，乘幕府不备，突然发动了"王政复古"的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出"王政复古"的大令，废除了征夷大将军及其所属官职。于是，七百年来武家政治各项制度的合法地位，转眼之间就被剥夺了。德川庆喜作茧自缚，反而吃了大政奉还的苦头，在政治上是败定了。他从京都退居大阪城，幕府的中央政府的地位被否定了，于是幕府外交的生命也就基本上停止了。

开国之初，幕府外交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幕府当局对于新事态表现了惊人的理解和适应性，顺利地完成了困难的开国外交，争取使大君外交体制的原则与西洋国家体系的原则能够同时并存。然而，由于幕府自己提出了条约敕许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安政大狱的蛮干，本来应该走上正轨的幕府外交却被引入困境。这固然是幕府政治上的重大失策，但在根本上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即欧美列强强加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的要求，必然要严重地侵蚀幕府统治所赖以维持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样一种深刻的问题。其结果是尊攘运动蓬勃发展，朝（廷）幕（府）对立激化，幕府外交陷于混乱。由于开国所引起的日本社会的变动，使幕藩封建统治成为过时的东西，日本要在十九世纪世界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下去，就必须出现一个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国家政权。于是围绕着外交的政治斗争就发展成了要求变革体制的运动。经不起内外

① 艺州藩：全称为安艺藩，在今广岛县东北部。——译者

② 西宫：兵库县东南部的一个市，在大阪、神户之间。——译者

重压的幕府，未能使自身转化为近代国家政权，终于被打起天皇旗号的倒幕派所推翻。于是，幕府外交遗留下来的课题，就转入新的天皇政府手中。

71

第二章　万邦对峙

(1868—1876)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近代外交主体的形成

一　开国亲善

拥立天皇的西南大藩倒幕派，在京都以王政复古的堂堂大令否定了幕府，宣布自己是日本的中央政府。然而江户的旧德川幕府还保持着统治实力。实际上日本形成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在这种状态结束之前，我们称前者为天皇政府，称后者为德川幕府。

1868年1月12日，刚刚成立的天皇政府根据参与①岩仓具视的提议，决定把政权的更迭通告全国。通告草案首先说："朕乃大日本天皇，为联盟列藩之主"，阐述了自己的地位和性质，接着说明将军职位已经废除，由列藩会议执行国政，之后又说："条约虽向以大君名义缔结，今后应改用朕名，为此，朕将命令有关官员与外国有关官员接洽，在其未定期间，仍从旧时条约"，表明了接受现存条约和有意修订条约。然而，政府内部对发出这个通告颇多异议，特别是守旧的公卿从攘夷立场出发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通告草案成了废案。

另一方面，退居大阪城的德川庆喜，于1月8日会见巴夏礼和洛舒，宣称不承认京都的天皇政府。继之在10日，通过洛舒的斡

① 参与：明治维新初期天皇政府中央高级职官，后改称参议。——译者

旋，德川庆喜会见了英、法、美、荷、意、普(普鲁士)六国代表。德川庆喜强调这次政变是非法的，希望各国切勿干涉日本内政，并且声明，德川政府仍掌管外交，负履行条约之责。各国代表表示同意。在对外关系上代表日本的仍然是德川政府。17 日，老中小笠原长行给予美国公使馆员波特曼以修筑江户一横滨铁路的权益。

天皇政府与德川政府的对立，终于在 1 月 27 日导致鸟羽、伏见① 之战。当天，老中酒井忠淳等通告六国外交使团，对天皇政府的主要支柱——萨摩藩进行讨伐，并要求通知各该国国民，不得向"日本政府"即德川政府以外任何人出售武器、军舰；外侨不得进入开放港口以外地区。然而，战局却向有利于以萨长军为核心的天皇政府方面发展。 1 月 30 日，德川庆喜放弃大阪城，逃回江户。同一天，老中告诉驻大阪的各国代表，战争已失败，并通告已无法保护外交使团。于是各国代表离开大阪，转移到兵库。 72

天皇政府的权威由于鸟羽、伏见之战的胜利一下子建立起来。2 月 2 日，天皇分别任命议定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为外国事务总裁，议定三条实美(公卿)、参与东久世通禧(公卿)、征士参与② 岩下方平(萨摩藩士)和后藤象二郎(土佐藩士)为外国事务取调挂。这是新政府"首次正式任命专管外交事务的官员"③。

2 月 4 日，突然发生了神户事件。这一天，备前藩④ 家老日置带刀的军队奉天皇政府命令开赴西宫担任警备，途经神户时，殴打了从队伍前方横穿过去的外国人，由此引起了同各国公使馆卫兵的武装冲突。各国海军登陆，封锁了神户市街，扣留了各藩停在港内的六艘船只。各国注视着天皇政府的态度。这是对新政府统治能

① 鸟羽：今京都市西南部；伏见：今京都南部一个区名。——译者

② 征士参与：明治维新初期从诸藩及"都鄙有才"者拔擢一些人与闻政事，叫作"征士"，有的"征士"并被授以"参与"之职。——译者

③ 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上，原书房，1969 年，第 6 页。

④ 备前藩：今冈山县东部地区。——译者

力和权威的试金石，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看来或许要关系到天皇政府的命运。政府接受巴夏礼的劝告，8日，派敕使东久世通禧一行前往兵库，同六国代表进行了会谈。这是天皇政府与各国外交使团最早一次的正式接触。敕使亲自向外交使团递交了国书（敕书），国书阐明，天皇亲自裁决"内外政事"，大君缔结的条约，用天皇的名义继承，并接受了各国关于对神户事件道歉和惩办肇事者的要求。各国对天皇政府在对外关系上这种出乎意外的协调态度，感到满意。新政府的首次外交活动获得成功。政府首脑压制了内部尊攘派的反对论调，说服备前藩，下令软禁日置带刀，迫令队长泷善三郎剖腹自杀。处刑的理由含糊其词，说是根据所谓"世界公法"这种笼统的说法。这说明这次惩处是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可以说是使司法从属于外交。然而，政府这种出人意料的迅速处置，却大大提高了它的对外信誉。

2月8日，即东久世敕使向各国代表递交国书的同一天，天皇政府宣布了外交基本方针。布告说，"外交事宜"因"幕府过去的错误"，造成今天的局面，但因形势已变，大势所趋，不得不承认已订条约；同时预告，过去幕府所订的条约将在"公议利害得失之后"，予以改订，并承诺将依"世界公法"处理"对外交际事宜"①。首创明治维新史研究工作的尾佐竹猛解释说，这个布告"写法吞吞吐吐，与维新当时其他法令宣言之直截了当、字里行间充满雄浑进取之气迥然不同，盖因方针之变革过于急骤，并考虑到历来声明的写法，想要摆脱窠臼而感到苦闷。"② 布告的确具有这种特征。

二 局外中立和公使觐见

73

1868年2月10日，天皇政府规定新政府的官制为"三职七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227—228页。

② 尾佐竹猛，前引书，第95页。

科"①，设置外国事务科以代替外国事务总裁和外国事务取调挂，并分别任命山阶宫晃亲王、三条实美、东久世通禧和伊达宗城为事务总督，后藤象二郎等人为事务挂，进一步整顿了外务机构。

天皇政府担心各国会援助德川政府。2月12日，洛舒到江户城访问德川庆喜，暗示法国将予援助，劝告幕府东山再起。但德川庆喜没有同意。与萨藩接近的英国公使馆馆员萨道义劝告萨藩出身、当上天皇政府官员的五代友厚和寺岛宗则等，让他们要求各外国保持局外中立，不使德川拿到向法国和美国订购的铁甲舰。14日，东久世通禧事务总督要求各国代表对天皇和德川双方采取同等的立场。18日，各国达成协议，当天皇与德川双方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并各自向该国国民宣布局外中立。这个布告把天皇和幕府视为具有同等权利的"交战团体"。这就把过去在对外方面曾是正统政府的德川政府降格为"交战团体"之一，而承认了天皇政府拥有与德川政府同等的国际地位，加之，德川政府向美国订购的铁甲舰石墙号(Stonewall)已不能到手，在客观上对天皇政府是有利的。

2月25日，天皇政府再次改订官制为"三职八局"②，将外国事务科改为外国事务局，在"督"(长官)之下设置若干"辅"和"权辅"，其下配备担任日常工作的判事。同日，天皇下诏亲征"庆喜等贼徒"。3月2日，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西乡隆盛等人为参谋，出动东征军。

为了顺利进行讨伐德川的战争，天皇政府也必须设法同各外国保持友好关系。2月29日，议定松平庆永等六位大名批判了政

---

① 三职七科：三职，指中枢设总裁、议定、参与三种最高官职。三职之下，分设神祇、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等七科，由议定分任各科总督，参与分掌各科事务。——译者

② 三职八局：三职，见前注。八局，指总裁局及其下之神祇、内国、外国、军防、会计、刑法、制度等共八局。——译者

府内外根深蒂固的攘夷论，建议天皇宜根据“万国通行之公法”，召见各国公使，以确立开国进取之方针[①]。此举如能实现，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显然会有利于天皇政府的地位。3月7日，外国事务总督东久世通禧和伊达宗城等在大阪西本愿寺会见各国代表，宣布外国事务局已经设立，对日本政府的交涉可经由该局办理，同时要求各国公使进京觐见天皇。这等于请求各国在事实上承认天皇政府。巴夏礼表示赞成，但洛舒怀疑天皇政府的统治能力和履行条约的能力，没有同意。

恰当此时，3月8日，发生了堺[②]事件。在堺的沿岸进行测量的法国水兵偶然想要登陆，遭到担任警备的土佐藩士兵射击，造成死亡十一名、负伤五名的重大事件。政府首脑大为震惊。东久世通禧和伊达宗城急忙赶到法国军舰上道歉，并全部接受了洛舒的

74 要求：(1)惩办负责人和凶手；(2)偿付家属抚恤金十五万美元；(3)外国事务总督和土佐藩主到军舰上来赔礼道歉等。对于惩处土佐藩士兵的问题，由于不愿意得罪大藩土佐，政府内部以公卿为中心的一些人也曾持消极态度，但为了显示新政府的权威，取信于外国，却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坚决执行的。因而决定让二十名土佐藩士16日在堺的妙国寺剖腹自杀。当十一名已剖腹自杀时，法国方面要求停止，下余九名改处流放远岛。看到日本方面当机立断的善后措施，洛舒对新政府的观感好转了。

神户事件之后又是堺事件，天皇政府被攘夷问题搞得头昏脑胀。3月10日，发布三职（即总裁、议定、参与）文告，要求武士、平民人等在“国内大局未定，海外万国交际之大事”有待解决的今日，要“顺时势，识大体，去以往之陋习”，对政府的外交方针给予协助[③]。

---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340页。

② 堺：属大阪府，在大阪市南方。——译者

③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393页。

然而，政府内部对于外国公使觐见天皇一事仍然有人强烈反对。

伊达外国事务局辅与各国公使就谒见天皇问题进行谈判，于3月17日彼此达成谅解。23日，法国公使洛舒和荷兰代理公使波尔斯布罗克顺利地在京都御所紫宸殿谒见了天皇，安然无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本应同时觐见，但在途中遭到天皇亲兵中的尊攘派朱雀操和三枝蓊的袭击，巴夏礼平安无事，但英国卫兵受了伤，因而折回了知恩院寓所。政府大为震惊。显然，如果因此招致巴夏礼大发雷霆，对外交就将产生难以挽回的不利后果。政府首脑竭力道歉，不待对方要求，就向英国当局提出惩办凶手的办法，取得了英国的谅解。这种作法是自己否认了自己的法权上的独立①。巴夏礼对日本方面未加深究，26日，重新晋宫谒见了天皇。这样，各国公使谒见天皇得以实现，新政府的国际地位便日渐巩固起来。

三国公使要求公布严惩谋害外国人的法律，天皇政府对此表示谅解。4月6日发表的《五条誓文》的第四条就是“破旧有之陋习，循天地之正义”，批判了攘夷论。所谓“天地之正义”，与“世界公法”是一个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万国普遍的公理。同时，天皇颁发了《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强调今后放弃攘夷；把“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作为国家的方针②。次日，即7日，代替旧幕府的高札（布告牌——译者），政府发出了五项禁令，其第四项特别规定严禁杀伤外国人。但对基督教的禁令则仍照旧。

实现了各国公使的觐见之后，天皇政府在对欧美的外交方面大体上心中有数了，便开始推进对近邻各国的外交。对马藩过去 75 曾担任日本与朝鲜交往的中介，在朝鲜贸易上拥有垄断特权，取得

---

① 我妻荣等编：《日本政治裁判史录，明治·前》，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68年，第41页。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557页。

莫大利益。因此，在天皇政府下，该藩仍希望继续保持这一特权，积极向政府当局进行了活动①。由于政府对朝鲜问题尚无定见和方针，就完全接受了对马藩的要求。4月15日，政府命令对马藩主宗义达以暂署外国事务局辅的身分，担任对朝鲜国的外交事宜，按照旧例承认了对马藩的特权；同时命令，由该藩将废除幕府、恢复王政一事正式通知朝鲜政府。

三　戊辰内战和外交

东征军的进攻势如破竹。静观局势以定去从的中间派诸藩看到这种形势马上全都倒向天皇政府方面。德川庆喜便决心放弃抵抗，表示归顺。然而，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以及天皇政府首脑却坚持强硬态度，要判处德川庆喜以死罪。东征军一迫近江户，各国外交使团唯恐战火波及横滨，乃以各国卫兵占据横滨主要地点，把横滨置于共同管理之下。1868年3月26日，东征大总督府下令以4月7日为期，向江户城发动总攻。在此之前，4月5日，西乡隆盛为了请求一向对天皇政府表示友好的巴夏礼就野战医疗给予援助，派东海道镇抚总督参谋木梨精一郎前往横滨。巴夏礼却对木梨说，用极刑对待归顺者违反“万国公法”，严厉谴责了东征军的态度。据说，西乡隆盛闻知此讯大吃一惊。巴夏礼担心内乱将给日本市场带来混乱，打算和平解决天皇政府与德川政府的对立②。次日，西乡隆盛同德川政府陆军总裁胜义邦(海舟)举行会谈，决定和平让出江户城。京都三职会议接受了这个方案，并决定了从宽处分德川氏的方针。天皇政府在向德川方面传达这一处分方针之前，先告诉巴夏礼，取得了他的谅解。这显然是日本自己招致英国干涉内政的行为。5月3日，东征军开进江户城，德川庆喜隐退到

① 田保桥洁，前引书，第148页。

② 石井孝，前引书，第834页。

水户，德川政府灭亡了，德川家降为一个普通诸侯的地位。于是天皇政府便名副其实地成了日本的中央政府。洛舒失望归国，5月7日，继任的马克西米（Maxime, Outrely）到达横滨。

5月22日，巴夏礼在大阪行宫西本愿寺向天皇递交了国书。这意味着英国承认了天皇政府。这样，天皇政府便作为日本的正统政府，打开了取得国际承认的道路。

6月11日，政府公布了《政体书》，并改革了官制。中央设太政官，其下设议政官负责立法，设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和外国等五种官职负责行政，设刑法官负责司法，总计七职，分别负责各种政务。“外国官”掌管“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拓疆土”，伊达宗城任知事，东久世通禧任副知事，还任命了一些判官。副知事不久就改由锅岛直大（佐贺藩主）担任，后又改由小松带刀（萨摩藩士）担任。25日，东久世副知事在江户运上所从德川家接收了同十一国签订的条约书。 76

可是，政府内部争论不休，收复江户以后，仍然未能对德川的处分作出决定，旧幕臣和佐幕派各藩因此对政府的迟迟不决感到不满。而身居政府中枢的萨长藩士为了雪除当年禁门之变和火攻江户萨摩藩官邸①的积怨，诬陷会津藩和庄内藩②曾反抗天皇，提出了过苛的伏罪要求，这就形同给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人火上浇油。奥羽二十五藩为了帮助会津藩和庄内藩，于6月22日订立同盟，接着，长冈藩③及越后诸藩④也参加了同盟，结成奥羽越列藩同

---

① 火攻江户萨摩藩官邸事件：王政复古后，讨幕派于1867年以江户萨摩藩官邸为据点，策划武装骚扰江户、幕府的主战派派兵袭击焚烧了萨摩藩的官邸。这一事件引起了鸟羽、伏见之战。——译者

② 庄内藩：今山形县酒田一带。——译者

③ 长冈藩：今新潟县长冈一带。——译者

④ 越后藩：今新潟县一带。——译者

盟。这样，关东以北地方便形成政府难以应付的严重局势。经旧幕府向美国订购的石墙号军舰这时已运抵横滨，政府迫切希望弄到手，而美国公使却以局外中立为理由予以拒绝。6月13日，政府致函各国外交使团，说征讨德川庆喜的战事已经结束，要求撤销局外中立。但美国公使毅然不动。7月4日，政府军向固守在江户上野山的德川方面的义勇军彰义队发动攻击，将其击退，并趁势决定封德川家的继承人德川龟之助为骏河府中①七十万石藩主，以稳定旧幕臣的动摇。9月23日，德川龟之助奉政府之命通告各国公使，德川家今后不再过问外交。至此，外交权便终于不再由德川家掌管了。

战乱终于蔓延到奥羽和北越地带。与此相呼应，10月4日，前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率领八艘舰只逃离品川，向北驶去。旧幕府的军事教官布鲁尼特(Blunet)等五名法国军人也与之同行。为了对抗榎本统率的优势海军，政府更加迫切希望得到石墙号军舰。11月6日，会津城陷落，奥羽战争接近尾声，政府通告各国代表，说国内已经平定，强烈要求撤销局外中立。

11月11日，外国官副知事兼神奈川府知事东久世通禧、神奈川府判事寺岛宗则（萨摩藩士）和外国官判事井关盛艮（宇和岛藩士），取得旧幕府外国奉行所属官员的协助，与受瑞典和挪威委任的全权代表荷兰公使波尔斯布罗克缔结了《日本国、瑞典、挪威国修好通商及航海条约》。这是政府缔结的最早的条约，内容几乎是抄袭幕府所缔结的条约，政府也并未能超出“幕府过去的错误”之上。该条约于1870年12月28日在东京批准交换。缔结日瑞（典）条约的次日，东久世通禧等人同西班牙国全权代表奎维多（de Quévedo, Don José Heriberto Garcia）缔结了与日瑞（典）条约内

---

① 骏河府中：藩名，略称骏府藩，今静冈县中部一带。——译者

容大体相同的《日本国西班牙国修好通商及航海条约》。该条约于1870年4月8日在东京批准交换。这样，政府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撤销局外中立的条件成熟了。

逃出江户的榎本舰队收容奥羽各地的残兵败将，扩大了势力；12月2日，在虾夷鹫之木登陆；9日，占领了箱馆市街和五稜郭，以"德川脱藩家臣"的名义要求各国承认其交战团体的权利。各国外交使团的态度发生分歧。英国和法国派军舰到箱馆进行调查，承认榎本等为"事实上的政权"，但拒绝承认是交战团体，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 77

可是，政府却努力在国民中加深天皇权威的印象。天皇离开京都，11月26日，进入东京。前此，江户于9月3日，改称为东京。政府试图利用天皇驻跸东京这一机会，让各国公使前往谒见。1869年1月4日，意大利、法国和荷兰三国公使在东京城（旧江户城）谒见天皇，递交了国书。次日，英国、美国和普鲁士公使也谒见了天皇。英国公使业已递交了国书，美国和普鲁士公使因本国国书未到，所以只是进行了谒见。在日本驻有公使的六国之中，除美国和普鲁士外，其余各国都承认了天皇政府，政府的国际地位于是确立了。2月9日，各国代表经过协商，决定撤销局外中立，并将此事通告本国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完全的国际承认，石墙号军舰也弄到手了。另一方面，榎本政权依靠各国外交使团调停的希望就此断绝了。

四　改善朝鲜邦交与着手修订条约

1869年1月23日，前已奉命同朝鲜修复邦交的对马藩主宗义达派遣家老樋口铁四郎为大修大差使，前往朝鲜釜山，把致朝鲜国礼曹参判和礼曹参议的书信递交釜山东莱府使，表示希望修复邦交，信中说："我皇即位，重整纲纪，亲理万机，极愿睦邻。"① 可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2册，第693页。

是，朝鲜方面主管对日外交的倭学训导安东晙却以书信格式违反前例，拒绝接受。日朝间的邦交于是陷于搁浅，后来也迟迟不得进展。

朝鲜所以拒绝了日本修好的提议，估计其理由有三①：第一是朝鲜政府的极端攘夷锁国主义。特别是国王生父、掌握实权的大院君李昰应是一个具有强烈排外思想的人。他认为日本既已同西洋各国结成条约关系，也就成了夷狄的同类，这种观点在朝鲜政府的对日态度上反映出来。第二是对日本图谋征服朝鲜存有戒心。八户顺叔向中文报纸投寄虚构的有关（日本意欲）征服朝鲜的文稿，引起朝鲜政府对日本很大的疑心。清朝政府利用此事离间日本和朝鲜。朝鲜政府虽曾通过对马藩主就此事质询过幕府，但未能解除疑团。第三是藩属国朝鲜对宗主国清朝的顾虑。对清朝皇帝尽“事大之礼”、并臣服于清朝的朝鲜国王，唯恐受理写有“皇”、“敕”等字样的日本书信会引起清朝的恼怒。在朝鲜看来，皇、敕等字样只有中华皇帝才可使用。接受了西洋国家体系的国际观念的日本与固执华夷秩序的国际观念的朝鲜，两者之间是有着难以调

78

和的对立。于是，朝鲜问题便成为明治初年的重大外交问题。

修改不平等条约与朝鲜问题，对刚刚成立的政府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外交课题。2 月 4 日，东久世外国官副知事向美国和荷兰公使非正式地提出：随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过去签订的条约）产生了“名实不符”之处，因此，虽尚未到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期限，但希望提早开始修改条约问题的谈判。接着又向其他缔结国发出同样的通告。安政条约规定，到 1872 年 7 月，经双方同意，可以修改条约。接到日本提议的各国代表答复说：日本所希望的修改的内容缺乏具体性，所以不能进行商议，而且在条约规定的期限之前进行

① 奥平武彦，《朝鲜开国交涉始末》，1935年，1969年刀江书院复刻，第40—42页。

修改是困难的。政府刚一着手就遭到了挫折。

政府宣称要修改条约，但对于应该修改的内容是否有足够的理解不无疑问。20日，外国官副知事东久世，神奈川县知事兼外国官判事寺岛和外国官判事井关同普鲁士公使巴兰德(Brandt, Max August Scipio von) 缔结了《日本国德意志北部联邦修好通商航海条约》(1869 年 10 月 15 日在东京批准交换)。这个条约与既存条约本质一样，而且对治外法权规定得更加明确，因而也就加强了不平等性。政府的行为是前后矛盾的①。也许就连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3 月 15 日，太政官命令外国官就修改条约问题进行调查。4 月 9 日，议定岩仓具视向议定兼辅相三条实美提出关于《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地区》的长篇意见书，其中强调："海外万国皆我皇国之公敌"，主张必须保持日本的独立，"允许外国军队在我港口登陆"或"侨居洋人违犯我国法令，也要由外国官员处理"等等，乃皇国之耻辱，所以应该修改条约②。从德川政府手中获得铺设东京至横滨间铁路权利的波特曼，当时正在要求政府重新确认这一权益。然而，外国官得到巴夏礼的劝告，以铁路应由日本人进行修筑为理由，于 4 月 10 日驳回了波特曼的请求。

五　外务省的诞生

1869 年 6 月 27 日，在箱馆的榎本武扬遭到政府远征军的总攻而投降，至此，由天皇政府来实现的日本的政治统一完成了。7月25 日，天皇批准各藩奉还版籍(版，指版图；籍，指户籍。——译者)，任命藩主为藩知事，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政府。

政府于 8 月 15 日公布《职员令》，从根本上改革了中央政府的官制。这个官制仿效《大宝令》旧例，带有浓厚的复古的和神权的

① 稻生典太郎：《日本外交思想史论考》第一，小峰书店，1966 年，第 51 页。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 2 卷第 1 册，第367—377页。

色彩，在百官之上设置神祇官，此外设置总揽大政的太政官，在太政官之下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和外务六省，这样，首次出现了外务省的名称。外务省在"掌管外国交际、监督贸易"的长官——外务卿之下设有大、少辅，正、权大、少丞，正、权大、少录，大、中、少译官和史生① 等官职。据明治二年的《职员录》载，外务省创始时的阵容是：卿——泽宣嘉（公卿），大辅——寺岛宗则（萨摩），少辅——缺员，大丞——町田久成（萨摩）、井关盛艮（宇和岛）、丸山作乐（岛原②）、胜安芳（旧幕臣）、权大丞——谷元道之（萨摩）、黑田清隆（萨摩）、少丞——水野良之（旧幕臣）、马渡俊迈（肥前），权少丞——樱田亲义（宇和岛）、宫本小一（旧幕臣）。由此可以推断，创立初期的外务省是由幕府末期结成联盟关系的萨摩藩和宇和岛藩的人物，加上旧幕府外务官僚混合组成，由前者决定政策，后者处理实际事务。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内部与萨摩藩同样有势力的长州派人物，在外务省领导阶层中一个也没有。

榎本的叛乱及其平定促进了对北方问题的关注。岩仓具视在阐述修改条约意图的4月9日建议书中谈到了"开拓虾夷事宜"，慷慨感叹"听凭俄国人恣意蚕食，成何体统！"说"今奥羽已定，箱馆流寇亦即将就剿"，时机正好，力主必须加速开拓，以对抗俄国的入侵。在这期间，俄国人步步深入库页岛和千岛，超过了日本人。6月26日，发生了箱馆府从事东善八郎的随员在库页岛被俄国兵扣留的事件。8月1日，俄国军队占领了库页岛的函泊，不顾日方抗议，修筑了营房和工事。这些事件给政府以沉重的冲击。政府于8月15日根据《职员令》撤销箱馆府，新设开拓使，使之掌管北方事宜。9月6日，巴夏礼偶尔向寺岛外务大辅指责日本对虾夷地

① 史生：明治初期的低级官职，相当我国的"司书"、"录事"。——译者

② 岛原：今长崎县岛原半岛一带。——译者

区迟迟不采取对策，并警告说如果对库页岛放任不管，它就将为俄国人所吞并。接着他又在14日会见岩仓大纳言①和泽外务卿，强调俄国的威胁不仅限于库页岛，且有扩及北海道之虞。外务卿于16日指令丸山作乐外务大丞前往库页岛进行调查。日俄在库页岛问题上的对立也成了重要的外交问题。

朝鲜问题依然没有进展。太政官于10月28日命令严原藩②知事宗义达说，今后同朝鲜的交往改由外务省直接办理，宗氏向朝鲜派遣使节的作法应予停止。这就剥夺了多年以来宗氏拥有的对朝鲜外交的特权，外交大权集中于政府了。次日，外务省根据宫本外务权少丞的意见，向太政官建议，如果俄国吞并朝鲜，对日本将成为"永世大患"③，为防止此事，必须尽快与朝鲜建立邦交。为此，应以一、二艘军舰派出使节，应暂先派一、二名官员前往对马。这个建议获得了批准。于是，朝鲜问题由于对付俄国的威胁而面临一个新的局面。

10月18日，泽外务卿和寺岛外务大辅同奥、匈帝国全权代表佩兹(Petz, Freiher von)缔结了《日本国奥地利、匈牙利国修好通商航海条约》(1872年1月12日在东京批准交换)。日奥条约的谈判，是由巴夏礼从中斡旋而开始的，而在草拟条文过程中，英国、法国和美国公使也曾参与其事。因此，日、奥条约几乎包括了安政条约以来对外国有利的所有各项条款，而且还承认了许多以前没有的特权，可以说是"集不平等条约之大成"④。各缔约国则借助最惠国条款均沾了这许多新的特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对日本

80

① 大纳言：本是日本古代最高官职，相当我国的宰相。1869年建立太政官制后，在太政官中设置左右大臣、大纳言和参议。这种官制在二年后即撤销。——译者

② 严原藩：即对马藩，明治维新初确立新藩制，改称严原藩。——译者

③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2册，第856页。

④ 下村富士男：《明治初年条约改正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2年，第22页。

修改条约的提议所作的答复并不太理想，外务省便于 1870 年 1 月 11 日重新通告各国，在条约规定日期之前，暂不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新政府外交的前途仍然不容乐观。

第二节 迈向近代外交

六 对清朝谈判的开始

各藩奉还版籍以后，政府的基础仍不稳定。在建立政府中有过功绩的萨摩、长州及其他各藩对政府表现了高度的独立性，互相割据对立，呈现出一幅“小幕府”盘据四方的图景。政府一方面苦于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又受到农民起义和尊攘派士族的反抗，致使政府首脑始终怀有“土崩瓦解”的危机感。而且那些一步登天享有特权的显官们，作为“朝臣”在对于旧藩势力和人民方面利害是一致的，但他们内部却反复进行着勾心斗角的派阀斗争。斗争的核心是萨派与长派的对立。前者是在太政官中拥有势力的大纳言岩仓具视、参议大久保利通等人（萨派），后者是据有民部省和大藏省的待诏院出仕[①]木户孝允、民部大辅兼大藏大辅大限重信等人（长派）。这种对立说起来是人事派阀势力之争的色彩很浓，但具有结果会导致双方在政策上发生对立的强烈倾向。

外交也面临着困难局面。1869 年 12 月，前由樋口大修大差使带去的宗义达的书信终被朝鲜政府以用辞违反惯例而驳回。对朝鲜的交涉形成了僵局。于是，1870年 1 月 3 日，太政官同意木户孝允的要求，任命他为出使清朝和朝鲜的钦差大臣。木户因同对马藩士大岛正朝早有联系，一向关心朝鲜问题。早在 1869 年初，

---

① 待诏院出仕：待诏院也称集议院，明治初期太政官的议政机构。1869 年改为公议所，变为政府和议会的咨询机构。出仕，编制外暂设的官职。——译者

他就主张"征韩"，认为这可转移国内对政府的不满，"确立皇国之大方向，使亿万苍生之目光，对内对外为之一变"，并可以此作为"他日大兴皇国"之机①。对朝鲜交涉的碰壁，使木户孝允的意见在政府内部占了上风。然而，由于不久之后爆发了山口藩脱队骚动②等等，木户出使一事便不了了之。

外务省探索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对幕府时代长崎奉行与清朝上海道台的交涉事例进行了调查，结论是以先派遣小规模使节刺探形势为上策。关于这个问题，外务省送呈太政官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向支那方面寻求旧盟，如获成功，则朝 81 鲜问题当无棘手可言"③。于是，对清外交就开始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本来，朝鲜问题在外务省是同俄国入侵库页岛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现在又同对清邦交联系起来，成了日本当前外交的焦点。

1870年1月7日，外务省派遣该省出仕佐田白茅和外务少录森山茂等人前往朝鲜釜山进行调查。他们是到朝鲜去的第一批外务省官员。然而，朝鲜方面的态度依然如故。对马藩派遣的大修大差使樋口铁四郎一行自上年1月以来，在釜山逗留约达一年之久，一心想寻求同朝鲜开始谈判的途径，而朝鲜方面却终于发表声明，把他们驱逐出去。因此，佐田等人也没能抓到谈判的线索，空手回国。佐田等人在当地目睹朝鲜军事力量薄弱，便倾向于主张征韩，向外务卿建议，强调朝鲜软弱，说用五十天时间、三十个大队（相当于"营"——译者）兵力即可征服，所获战利品足以补偿军费等等。佐田的建议虽然被视为书生之见而未被采纳，但征韩之议

---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1册，第205—208页。

② 脱队骚动：明治初期，长州藩所属武装为反对新政权与农民联合掀起暴动，维新政府派木户孝允率兵进行了镇压。——译者

③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3册，第702—703页。

却由此在政府内外扩展开来[1]。

在日俄之间，关于库页岛的交涉迟迟不见进展。前往库页岛的丸山外务大丞与当地俄国官宪反复进行交涉，但没有进展。不仅如此，2月22日，外务权大录川岛元盈等六名外务省官员企图阻止俄国方面在函泊修筑码头，竟被俄国兵拘捕。政府于3月14日决定使库页岛开拓使自成一个部门，任命兵部大丞黑田清隆为专管库页岛事务的开拓次官，着力开拓该地。次日，泽外务卿又请求美国公使德朗(de Long, Charles E.)进行斡旋，想同俄国就以五十度线为界分割库页岛问题进行谈判，结果失败。日本外交呈现了到处碰壁的局面。

这时，确定对朝鲜外交的基本方针成了当务之急。5月，外务省请求太政官就三种方案进行裁决[2]。第一是消极方案：在"国力充实"之前，停止同朝鲜的谈判。这样，以宗氏为仲介的前近代关系[3]可能自然消灭，这将使俄国易于吞并朝鲜，届时只好"袖手旁观"。第二是积极方案：派木户孝允为天皇使节前往朝鲜，要求订立"开港开埠，两国自由往来的条约"，视朝鲜态度如何，必要时"逼以军舰之兵威"，或进而不辞诉诸武力。第三是迂回方案：根据华夷秩序，利用清朝与朝鲜的前近代宗属关系，日本先向清朝派出天皇使节缔结修好条约，如能与清朝建立平等关系，即可位居朝鲜之上，朝鲜就可能接受日本的建立邦交的要求；如果朝鲜不从，再"议及和战问题"。

82 这三个方案中，第一个方案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只能在第二方案和第三方案之间进行抉择。第二方案是木户孝允等长州派的意见，强调要对朝鲜采取直接的强硬态度；第三方案则是外务省和岩

① 藤村道生：《明治维新外交对旧国际关系的对策》，《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41号，1966年，第10页。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44—145页。

③ 前近代关系：指近代资产阶级体制建立以前的旧式关系。——译者

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派的意见。岩仓曾经提倡过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唯心论，主张日清协力以对抗"公敌"欧美列强。在这里，政府内部的萨长两派的对立，在当前外交政策上表现为日清交涉先行论和对朝鲜强硬论的对立①。

政府内部萨长两派的对立，最后是萨派取得胜利。其象征就是8月7日断然实行了所谓"民藏分离"，即太政官决定民部卿兼大藏卿伊达宗城、民部大辅兼大藏大辅大隈重信和民部少辅兼大藏少辅伊藤博文各自专任大藏省职务，解除其民部省的兼职。此举是试图把一向为长州派据点的大藏省和民部省分割开来，以削弱它的力量。同样，由于萨摩派的胜利，在外交政策上也采用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7月，太政官命令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和外务权少丞花房义质等人前往清帝国进行邦交和通商的预备会谈，并调查贸易状况。到达清帝国的柳原经同清帝国总理衙门进行多次谈判，得到的答复是，如果日本政府明年派遣正式使节，可以商订条约。对清交涉的突破口打开了②。对于朝鲜，10月间虽然派遣了外交权少丞吉冈弘毅等人递交了外务卿要求建交的书信，但朝鲜方面仍然拒绝受理。

七　健全外交体制

外务省在对朝鲜和清帝国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着手准备修改对欧美的条约。首先搜集英国同其他各国所订的条约文件，开始进行比较和研究。泽外务卿于1870年11月会见英、法公使，要求两国撤退自1863年以来驻扎在横滨的两国军队，后来并一再提出这一要求。外务省还进而制定了日本驻外使节的制度。11月，

---

① 藤村道生，前引文，第13页。

② 藤村道生：《明治初年亚洲政策的修正与中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44号，1967年，第9—15页。

外务省宣布，设置大办务使（由大辅充任）、中办务使（由少辅充任）和少办务使（由大丞担任），负责对各国的交际事务，管理日本在该国的侨民，并分别任命外务大丞鲛岛尚信为派驻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的少办务使（驻在法国），森有礼为驻美国的少办务使，同时决定派大藏少辅伊藤博文前往美国视察财政货币制度。后来，1872 年 5 月，任命外务大辅寺岛宗则为驻英国的大办务使。鲛岛尚信、森有礼和寺岛宗则都是幕末时期萨摩藩送往欧洲的留学生。1872 年 11 月 14 日，又把办务使改称为公使。

到了 1871 年，外务省以修改条约的期限近在明年，便加紧进行修改条约的准备工作。3 月间，在美国的大藏少辅伊藤博文寄给政府的意见书① 为此项工作提供了具体方向。伊藤博文受到美国“防御税”即保护关税制度的启发，认为“尚未臻于完全开化之国如我国者”，防御税乃是最适合的制度，论证英国之所以富强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兴产品之制造”；他极力强调，现在英国人主张自由贸易，“并谋诱导我国亦行此法”，“此乃彼国谋求自利之术，对我国有大害；我国应如同美国设置防御税，以发展我国内之生产”，批判了在对日外交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方针，强调了保护贸易的必要。伊藤博文进而提议，为了实现防御税，必须修改条约；为了作好修改条约的准备，应该派遣才智卓越而又精通外语的官员作为特命理事官前往各国进行调查。伊藤博文的意见给予政府巨大影响，但他却没有谈到收回“法权”的问题。

外务省任命了包括神田孝平和津田真道等旧幕府知识分子在内的研究修改条约方案的下调御用挂，着手草拟修改方案。1871年 6 月初，拟定了新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把改善法权作为重点，对现行条约作了部分的修改，并在所附意见书中说，今日国内各项制

---

① 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上卷，1940 年，第 592—597 页。

度尚不完备，明年(即1872年)动手修改条约为期尚早，宜将改约日期延缓数年。政府首脑接受了这个意见，其方针倾向于先向海外派出使节团，商谈延期改约并调查欧美文化。

在政府的周围，征韩论派活跃起来了。4月间，发现了受旧尊攘派操纵的华族① 外山光辅等人的反政府阴谋事件。5月，外务权大丞丸山作乐等因有为征韩而策划叛乱的嫌疑被捕。正因为这样，政府才势必要加速着手对清朝的交涉。6月，太政官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辅佐，以准备与清帝国缔结修好条约。这一行动意外地刺激了欧美各国，横滨一家外文报纸表示疑虑说，日清两国莫非要搞攻守同盟以对抗欧美的亚洲扩张。外务省声明，日清订立攻守同盟的传说毫无根据，伊达一行于7月前往天津。

围绕着库页岛问题的日俄关系仍然迟迟不能进展。前曾邀请美国公使德朗从中斡旋，但他在1871年初，却劝告日本政府最好放弃库页岛。2月，黑田开拓次官发表意见书，认为库页岛既然保持不下去，就只好放弃。恰在此时，库页岛上的形势又紧张起来。6月，太政官任命参议副岛种臣为库页岛划界谈判的全权代表，令其在俄领波塞特湾同俄国方面进行谈判。副岛在上年12月曾会见来日的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布策(Butzow, Eugène)，一致同意库页岛问题应由日俄直接谈判解决。太政官对副岛的训令是在以下三种方案中任择其一：(1)使俄国同意将库页全岛划归日本；(2)结束日俄两国人民杂居的现状，由日俄两国分割库页岛；(3)以适当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把库页全岛出让给俄国。副岛一行在函馆(原名箱馆)等待俄国方面的联系，但因俄国改变方针，重新任命了驻日公使，并决定改在东京谈判，副岛一行便空手而回。 84

① 华族：指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第二次大战后始取消。——译者

外务省既忙于策划日俄谈判，又忙于推进修改条约，在任命副岛为日俄谈判全权代表的同日，通知各国公使，准备修改条约。8月19日，泽宣嘉外务卿和寺岛宗则外务大辅与兼任夏威夷公使的美国驻日公使德朗签订了《大日本夏威夷国条约书》，于同日批准。这个条约互相承认最惠国待遇，日本在条约上的地位提高了一步。

八 《日清修好条规》与岩仓出国使团

1870年9月，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同月，意大利完成了统一。在普法战争中胜利的普鲁士于下一年即1871年1月统一德意志，建立了帝国。欧洲正面临着新的国际关系的到来。在日本，政府一面苦于内部派系之争，一面仍致力于权力的集中。中小藩和反对新政府的藩国之中，也出现了要求废藩的人物。在政府内部，人们已经觉悟到，首脑之间的意见分歧阻碍着"朝权"的确立，有招致政府"土崩瓦解"的危险，于是萨摩派首领大久保利通和长州派首领木户孝允便停止政争转向合作。其结果，1870年末，政府决定邀请鹿儿岛藩大参事西乡隆盛参加政府，以加速强化和改革政府。1871年初，西乡提出了为巩固政府的基础，从萨、长、土三藩征集亲兵的主张，并得到了实现。8月，政府进而断然实行首脑人事的大变动，仅留西乡和木户充任参议，以集中权力。29日，以西乡的领导能力和亲兵的威力为背景，为了"保安万民、对峙万国"，断然实行了废藩置县。于是，封建领主制被废除了，日本名副其实地成为集权主义的近代国家。随着废藩置县，旧公卿大名的势力除了少数例外全面地退出了政府中枢部门，统治实权转移到征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手里。同日，岩仓具视接替泽宣嘉就任外务卿。

到达天津的伊达宗诚全权代表同清帝国全权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就缔结条约问题反复进行谈判。日本方面提出以《中德条约》

为蓝本的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想从清帝国方面得到与欧美列强同等的特权。清帝国全权代表坚决主张以清帝国方面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在此之前，各国与清帝国谈判缔结条约问题时从没有过由清帝国方面提出草案的先例，所以日本方面因而受到了冲击。清帝国方案的中心内容有三点，即删去最惠国条款，防止日本与欧美各国结盟；派遣外交官和领事官；禁止日本商人在清帝国内地进行贸易。清帝国的意图显然是要使日清条约不同于过去清帝国同欧美各国所缔结的一系列条约①。

谈判是按照清帝国的主张进行的。9月13日，两国全权代表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清帝国修好条规》。这是深受与欧美各国缔结不平等条约之苦的日清两国，首次自主缔结的平等条约。而这种平等却含有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率这一特殊内容。而且排除了日本所希望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和内地通商权。然而，日 85 清之间得以建立平等关系，这就实现了日本对清交涉的最初目的，即日清两国地位平等。其结果，对于对清恪守事大藩属之礼的朝鲜，日本在名分上就取得了优越地位，这应该说也就打开了与朝鲜建交的方便之门。

可是，政府内部却对《日清条规》产生不满，追究全权代表责任之声甚嚣尘上，于是批准问题便被束之高阁了。批评的焦点是：(1)承认领事裁判权与修改对欧美条约中收回法权的主张相矛盾，有妨碍修改条约的之虞；(2)《条规》第二条规定，日清两国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时，应互相援助或从中调解，这一点说不定会刺激惟恐日清订立攻守同盟的欧美各国；(3)放弃最惠国条款和内地贸易权会妨碍将来向清帝国的经济扩张等等②。随着对欧美修改条约时机日趋成熟，日本方面对日清条约的意图和要求也发生了

① 藤村道生，前引文，第18—23页。

② 藤村道生：《明治维新外交对旧国际关系的对策》，前引书，第29—30页。

变化。日本要求清帝国修改条文，但遭到清帝国拒绝。

政府忙于修改对欧美的条约。10月，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向岩仓外务卿面授《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①。事由书强调："国与国之间权利对等，乃当然之理"，因而"条约亦应保持权利对等"；日本之所以苦于不平等条约，乃由于"世代锁国之积习"和"东洋独特之国体政俗"等"陈规旧习之弊"，今"已一政令，同法规，初步奠定与各国并驾齐驱之基础"，自"应修改已往之条约，确定独立之体制"。事由书进而指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应"依据万国公法"；为此，"我国国法、民法、贸易法、刑法、税法等，凡与公法相抵触者，均须改革修订"，这项工作需要数年，在明年修改条约期限以前是来不及的；准备不足而"草率修改，则将成为更加丧失国权之基"；所以此时有必要"向各国特派全权使节，一则借政体更新，修聘问之礼，以笃友好之谊；一则借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期望"，并"视察欧亚各洲最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适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外务省首脑岩仓外务卿、寺岛外务大辅和外交少辅山口尚芳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事由书》原来设想的使节团规模较小，包括一名全权使节、一名二等使节、六名理事官及其他人员。但由于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打算躲开废藩置县以后的困难政局，强烈希望参加使节团②，使团的规模就大加扩大了。11月20日，太政官分别任命从外务卿转任右大臣的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参议、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和山口尚芳外务少辅四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组成了包括书记官、理事官以下随员约共五十名的大型使节团。26日，寺岛宗则外务大辅正式通告各国公使，派出岩仓使

① 《伊藤博文传》，上卷，第999—1009页。

② 下村富士男，前引书，第131页。

节团和延期商谈修改条约。12月15日，将递交各国元首的全权委任状授与使节，其中说“就我国情况向贵国政府征询意见，请得高见，以谋议当前乃至将来应予施行之方略，待使臣归国后，再议修改条约问题”①。同日，副岛种臣就任外务卿。18日，三条太政大臣、岩仓右大臣和西乡参议等政府首脑约定：留守政府和使节团“一致协力”，“国内外重要事项及时互相通告”；“照应内外情况处理政务”；“国内事务以待大使归国后进行重大改革为宗旨，在此期间应尽量不另行改革，如不得已而改革时，应知照派出之大使”等等②。23日，岩仓率领的由四十八人组成的使节团和五十九名留学生，其中包括日本最初的五名女留学生，乘美国轮船，由横滨出发，踏上了“考察美欧”之途。

第三节　确立国权的意图

九　努力确定边界

琉球王国过去是鹿儿岛藩的“附庸”，废藩置县后交由鹿儿岛县管辖。1872年2月，鹿儿岛县县官奈良原繁和伊地知贞馨前往琉球。3月4日，向琉球王国的摄政和三司官等首脑宣告日本本土的变革，命令琉球进行政治改革。奈良原繁等人在琉球停留期间，在台湾土著居民区③遇难的十二名琉球八重山岛民，被清帝国从福州送回。这些八重山岛民是在上年12月漂流到台湾的，其中五十四名遭牡丹社土著居民杀害。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获悉这一消息后，报告政府，并建议出兵台湾，追究责任。为了师出有名，有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96—97页。

② 多田好问编：《岩仓公实记》中卷，1903年刊，原书房1968年复刻，第948—950页。

③ 台湾土著居民区：指我国台湾高山族同胞居住区。——译者

必要明确遭难的八重山岛民是日本人，也就是要明确琉球是属于日本的。

政府着手改变琉球属于日清两国的状况，推行起把琉球确定为日本藩属的方针。10月，设琉球藩，任命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并列入日本的华族①。这是日本单方面的措施，并未通知清帝国，清帝国也未对此措施表示异议。政府进而决定，幕末时期琉球与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今后琉球藩的对外事务，均交由外务省管辖。美国公使德朗就柏利缔结的《琉美协定》的有效问题照会日本，副岛外务卿对此答称：琉球是"我帝国之一部"，《琉美协定》当由日本政府"照旧遵守"②。美国未提出异议。当时，德朗说台湾等于是没有领主的土地，怂恿日本抢先占领台湾，还介绍了熟悉台湾情况的前驻厦门美国领事李仙得(Le Gendre, C. W.)。

87

1872年5月，由俄国驻华代理公使转任驻日代理公使兼总领事的布策来到日本。他是俄国派出的首任驻日公使。按照前几年的约定，他立即同副岛外务卿开始了库页岛边界的谈判。俄国方面始终反对在岛上划定边界。日本方面提议收买库页岛，而俄国方面以有必要把库页岛留作流放地为理由，予以拒绝。当时流放到库页岛的俄国人有所增加，他们杀伤住在当地的日本人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布策了解到开拓次官黑田清隆有意放弃库页岛，乃建议用千岛的得抚岛和其他三岛与库页岛交换，并暗示如感不足，还可增加岛数。副岛打算与俄国缔结密约，放弃库页岛，而以日本武装入侵朝鲜时俄国不加干涉作为补偿之一③。然而，由于次年副岛出使清帝国，日俄谈判未得结果而中断。

---

① 华族：明治时代，位于皇族之下、士族之上的一种族称，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者及其家属，享受皇室殊遇。——译者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394页。

③ 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3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0年，第256页。

1872年7月发生了玛利亚·鲁士号事件。从厦门开往秘鲁的秘鲁籍轮船玛利亚·鲁士号，为了修船停泊在横滨港，船上有二百三十一名华工，其中一名因不堪虐待而逃走，向横滨港内的英国军舰求救。驻日英国代理公使沃森(Watson, R. G.)和驻日美国临时代理公使谢泼德(Shepard, C. O.)劝告副岛外务卿说，秘鲁人在日本法院管辖之下，象对待罪人一样地处罚身为他国国民的华人，这是侵害日本法权，也是对日本政府有失礼貌，要对此采取措施。副岛感谢这一劝告，认为这是发生在日本领海内的事件，坚决主张必须站在人道立场，根据日本法权进行审判。他压制了司法省的反对论调，由太政大臣领得全权委任，决定在外务卿领导下，由神奈川县负责审理，并指令该县参事大江卓进行审判。不久，由副岛推荐，大江晋升为该县的权令①。大江审判长不顾内外压力，进行了审判。秘鲁方面主张日本无权审判，并在辩论中引证日本买卖艺妓的例子，击中了日本的痛处。结果，大江裁断，华人移民合同是违反人伦之道的，任何国家的法律也没有保障履行这种合同的义务，判决华人逃离轮船并不违法。10月，船上华工交由清帝国派遣的特使陈福勋率领归国。秘鲁政府认为这一措施不合理，派遣特使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损失。日本与秘鲁的意见发生对立，结果由两国政府邀请俄国皇帝进行仲裁。副岛和大江极力想借这次审判来确立日本的法权，并夸耀日本政府的人道主义。这一事件的副产品是，太政官于11月发布命令，禁止人身买卖并废止公娼②。次年(1873年)2月，外务卿通告各国公使，撤销对基

---

① 权令：1871(明治四)年公布《县治条例》，设置县令或权令管理县政。——译者

② 废止公娼：原文是"废止娼妓的年季奉公"，法令的全称是《艺娼妓解放令》。所谓"年季奉公"即接受妓馆贷款，卖身为娼，在规定年限内无人身自由，全部收入缴给妓院偿债，期满债清，方可获得自由。实际上，这一法令只是一纸具文。有的穷苦妇女，反而沦为私娼。——译者

督教的禁令。

88

十　修改条约的失败

岩仓使节团于1872年2月到达华盛顿，与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菲什(Fish, Hamilton)进行会谈。美国对日本的态度看来似乎是友好的。使节团认为有可能作到超出委任全权的范围，同美国签订修改条约。为了请求新的全权委任状，大久保和伊藤在5月间曾一度回国。然而，外务省不同意大久保和伊藤的请求。在此以前，曾多次发生不经外务省而对重要外交问题作出决定的情况，岩仓使节团变更方针也是其中的一例。副岛外务卿反对甩开外务省进行外交活动的作法，对太政官正院强调"在国书上加盖印章是外务卿的责任"，"大使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和有关对外交际问题，应该首先由外务卿参加商议"，还说"向驻外使臣传达命令、授与指示和维护交际乃外务卿之职责"，力求确立外务省的权限；同时指出："在国外决定修改条约是违反前议的，对国内外都是不妥当的"，严厉批评了岩仓使节团不经外务省同意就擅自变更重要外交方针的作法①。结果，正院虽然发给了大久保和伊藤新的全权委任状，但在这次委任状中，却破例地加上了外务卿的签名。这意味着外交应由外务省统一管理的副岛的主张得到了贯彻。当发委任状时，副岛说，在国外签订条约，即使事属不得已，也必须是完全贯彻了日本方面的要求，给使节团的活动规定了范围。

然而，美国的严峻态度却出乎岩仓等人的预想。与美国签订修改条约的希望并不大，这一点逐渐明白了。7月，大久保和伊藤返回华盛顿，虽然带来了本国政府的指示和新的全权委任状，但这已经无用了。岩仓放弃了在美国谈判修改条约的念头，对菲什说，

---

① 《外务省的百年》上卷，第98页。

日本政府已经改变方针，拟在欧洲召开各国联席会议，协商修改条约，希望美国也派遣代表参加会议。菲什表示拒绝，于是岩仓就借此停止了对美谈判。使节团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①。

使节团结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在美国的逗留，8月，从波士顿港出发，前往伦敦。使节团到达伦敦后，与英国外相格兰维尔(Granville, G.L.)开始会谈。巴夏礼公使当时正返回英国，他协助外相，且积极发言。英国的态度比美国更为强硬②。英国方面不仅拒绝日本方面想把旧约改成平等条约的要求，而且要求更多的权益，毋宁说反而要更加强化不平等的关系。巴夏礼不仅拒绝撤走驻扎在日本的英国军队，还坚决拒绝收回关税权的要求；对于收回法权的要求，则回敬以设立类似埃及那种由国内外审判员混和组成的法院的主张。此外，巴夏礼甚至还要求给予新的权利，即容许外国人在国内的旅行权、沿岸贸易权、准许投资等，这都是在过去条约中也没有同意过的。岩仓一行深深感到修改条约障碍重重，不易打破。

89

使节团历访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之后，到了德国。1873年3月，会见了帝国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讲了十九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的活生生的现实，同时指责英法的殖民地统治，说国际法正在被用来为大国的利益服务。他还讲述了当年不过一个弱小国家的普鲁士，在弱肉强食的残酷国际社会中生存下来、并成长为大德意志帝国的艰苦斗争的历史，给使节团一行留下深刻的印象。大久保写信给西乡说，听过俾斯麦的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资本主义欧美的现状也给使节团以强烈印象。他们为轮船、铁路、大工厂和大城市而瞠目。大久保目睹先进国家美国、

① 下村富士男，前引书，第248页。

② 石井孝：《岩仓使节团对英国的交涉》，《文化》(东北大学文学部)，第36卷第1·2—3号，1972年。

英国和法国的状况与日本相差悬殊，感到望尘莫及，但认为新兴的德国和俄国倒有很多地方值得日本效仿，便对这两国寄予了强烈的关注。

岩仓使节团此行耗费了巨额经费，而外交方面所获成果甚微，不过对改变政府首脑人物的思想，却发生了效果。在出访期间，木户孝允的部下伊藤博文转而投靠大久保利通一派，于是大久保和木户的关系又恶化了。

十一　对清朝交涉的进展

《日清条规》缔结以后，副岛外务卿设法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1872 年 12 月，按照外务卿的希望，日本政府聘请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Le Gendre, C.W.)为外务省二等出仕，职位相当于大辅。李仙得是此人的中国名字，对中国南部和台湾的情况十分熟悉。从 1872 年底到 1873 年初，他多次上书，论述朝鲜、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东亚战略要地，一个国家只要控制了这些地区，就将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优势地位；清帝国对台湾的统治是有名无实的，因此，在清帝国政府对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八重山岛民事件不作适当处理之时，日本可以进而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①。同时，他也没有忽略提醒日本政府，在军事行动之前要先和清帝国就处理台湾土著居民的问题进行谈判，以证实清帝国对此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李仙得的这些意见给政府以强烈的影响。

1873 年 2 月，为了祝贺清帝国同治帝亲政，交换《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书和谈判关于琉球、台湾的问题，政府任命副岛种臣外务卿为特命全权大使。3 月，副岛率领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和李仙得等人前往清帝国。4 月 30 日，在天津同钦差大臣大学士李鸿章

① 藤村道生：《明治初期日清交涉的一个侧面》(上)，《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47 号，1968 年，第 1 页。

交换了批准书。由于玛利亚·鲁士号事件，清帝国对日本有了好感。李鸿章就日本希望修订日清条规一事发表声明说：如果岩仓 90 使节团修改条约的尝试获得成功，则日清条规也可以重新商讨。副岛向李鸿章说，治外法权并非全世界的普遍法制，据说李鸿章听后很受鼓舞，他叮嘱副岛，希望把岩仓使节团出使的成果告诉他。

不久，发生了各国外交使团谒见清帝的问题。过去各国外交使团希望谒见皇帝，呈递国书，清朝出于中华意识，没有同意。由于同治帝开始亲政，就再无理由拒绝了。当谒见时，副岛认为，他是外务卿，而且是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来到清朝的，要求列在各国公使的上座，并拒绝传统的跪拜礼节。这是清帝国难以接受的。日清谈判迟迟不能进展。6月，副岛决心谢绝谒见清帝而回国，乃派遣柳原到清帝国总理衙门向该衙门的大臣毛昶熙等探询清帝国同台湾、朝鲜的关系。毛昶熙等人说台湾土著居民乃“化外”之民，为清朝“政教所不及”，①还说同朝鲜“只有册封献贡之典”，清帝国对朝鲜“和战权力之类绝不干预”②。清帝国方面可能由于集中注意力于谒见问题，以至作出如此轻率的发言，但仅限于口头，并未见诸文字。

由于副岛决心回国，清帝国作出了让步。6月29日，举行各国外交官谒见同治帝的仪式，副岛以位居上席的资格在各国公使团之前，单独谒见了清帝。他未行跪拜礼，而是站着三揖之后，向皇帝呈递了国书。副岛此举，提高了日本的国家地位，引起国内外注目，使他赢得了声望。

---

① 《副岛大使适清概略》，《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1928年，第71页。译者按：毛昶熙答语中并说，中国之于台湾有如日本之于虾夷（北海道）。此次问答并非正式谈话，更未写成正式文件，清政府官报中亦无记载，日本竟以单方面之“记录”制造入侵台湾之借口。——译者

② 田保桥洁，前引书，第318页。

1873 年 2 月，黑田开拓次官再次奏请放弃库页岛。他认为库页岛气候严寒，土地瘠薄，开拓需资甚巨，且效果如何很难设想，也难以抵抗俄国入侵，不如倾全力于北海道为上策，主张不妨仿效俄国出让阿拉斯加给美国的先例，断然放弃库页岛。库页岛的形势依然危急，4 月，在库页岛楠溪发生了俄国兵伤害日本人的事件，接着，在函泊的日本人渔业仓库又发生了火灾。由于俄国方面以前曾要求拆掉该仓库，因此有充分理由怀疑纵火者是俄国兵。俄国兵还阻碍日本人的消防作业，夺去消防器具上的水龙头投到火中，并在海边柴草中放火。开拓使官员向当地俄国官宪提出抗议，但不得要领，谈判就移往东京进行，结果，由外务省和俄国公使馆双方派遣有关官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参议大隈重信重视这一事件，致书黑田，认为库页岛问题比朝鲜和台湾问题更为重要，希望迅速通过外交谈判予以解决。在现场的开拓使官员要求派遣军队保护居民。黑田根据开拓使七等出仕安田定则的现场调查报告，(91) 获悉俄国方面的暴行，也倾向于出兵。他以《库页州俄国人事件之概略》为题，向政府要人散发文件，呼吁重视库页岛问题。

十二　朝廷分裂

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和西乡隆盛参议等人的留守政府承担起废藩置县之后的困难局面，接连不断地施行了一系列新政策：1872 年 3 月，解除了不准买卖土地的禁令；5 月，东京—大阪间电报开始通讯；8 月，全国普遍发放地契，确认土地所有权；9 月，颁布学制；10 月，新桥—横滨间铁路通车；12 月，采用阳历；制定国立银行条例；颁布征兵令；1873 年 1 月，设置六个镇台[①]；7 月，发布地税修改条例。这些再加上副岛外务卿在外交活动方面

① 镇台：地区最高军事守备机构，类似军区。——译者

取得的巨大成果，证明了即使岩仓、大久保、木户和伊藤等人不在，或者说正因为没有大久保和木户的对立，政府满能干得很出色。

然而，在政府内部，大藏省和其他省的对立激化了。在大久保大藏卿出国访问期间，木户的党羽、长州出身的大藏大辅井上馨负责大藏省的事务。他对于长州出身的同乡、陆军大辅山县有朋所提出的庞大预算几乎全部批准，同时却以缩减经费为名大幅度地削减了其他省的预算，于是，肥前出身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和文部卿大木乔任等人便对井上馨和大藏省发动了攻击。遭到围攻，陷于孤立的井上和大藏省三等出仕涩泽荣一一起被迫辞职。司法省临时法院以井上在报纸上发表了政府财政内容的罪名，对井上课以三日元罚款。在国外访问的大久保，为了解决他的老窠大藏省的纠纷，提前于5月单独归国，但也许是由于对他出国期间发生的纠纷感到不愉快，他没有进入东京。留守政府内部的长州派又为接二连三的贪污案件而乱得不可开交。井上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说他从民商手里霸占了尾去泽铜矿，因而受到司法省的追查；山县有朋因与陆军省御用商人山城屋和助的贪污案件被弄得焦头烂额，靠西乡帮了一把才勉强维持住政治生命。接着，长州派的京都府参事槙村正直也同样被司法省检举出有贪污罪行。7月，木户比岩仓等人先回国一步，不得不到处奔走，设法了结党羽们在他出使期间所搞的贪污案件。

朝鲜问题毫无好转。朝鲜方面断绝了对釜山草梁倭馆的食粮和薪炭等的供应，那里本是早自对马藩时代起日本人就居住的地方，朝鲜此举是故意找麻烦。更糟糕的是，4月间朝鲜方面发觉，一个东京商人经外务省许可来到倭馆，企图借用对马商人的名义进行交易。朝鲜方面怒不可遏，5月，在倭馆门前张贴出一张告示，猛烈攻击日本说，日本人模仿西洋制度和风俗不以为耻，说日

本是“蛮横之国”，不能让这种人进入朝鲜①。

代理省务的外务少辅上野景范得到这一消息后，提请太政官审议。三条实美太政大臣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首先有损国威，也事关国耻，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主张“必须采取断然出兵措施”的强硬的武力解决方针。不过由于“出兵事属重大”，“为保护我国人民，应先派若干陆军和几艘军舰开往该地，一旦有事，则下令九州镇台火速支援”，然后，以武力为后盾，“派遣使节，按公理公道进行严正谈判”②。参议板垣退助赞同这个主张，太政官的会议上强硬派占上风，多数人倾向于主张出兵。

92

可是，参议西乡隆盛对主张出兵论提出了疑问："先派军队是否得当?"他认为日本一派遣军队，朝鲜就可能要求撤兵，如果日本拒绝，则“战端将由此而启”，他担心出兵会激化日朝间的纠纷，“如是则将大违初意，酿成战争”，强烈反对出兵论③。西乡认为，不如“此时应立即派出使节，明确宣布其(朝鲜)违理”，力主派使节前往朝鲜，通过谈判，弄清是非曲直④，并愿亲自充任使节。恰巧副岛外务卿此时从清帝国归国，西乡获得了他的谅解。

然而，西乡隆盛也并未能完全摆脱政府内部强硬论的影响。他在要求坚持出兵论的板垣退助同意派遣使节时说，如果派出使节，朝鲜方面可能以“暴举”对待，这样就“师出有名了”；他认为派遣使节，视朝鲜方面态度如何，可以找到出兵的借口；“纵使不能象副岛公使那样出色地完成使命，然以死报国，固已身许”。这种决心，流露出古代豪杰那种慷慨就义的气概⑤。西乡隆盛对板垣退助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第282页。

② 田保桥洁，前引书，第320页。

③ 《大西乡全集》第2卷，1927年，第736页。

④ 同上，第747页。

⑤ 同上，第737页。

也谈到："应使（士族）思乱之心移作兴国之远略"①。不过，西乡虽然这样说，却并未与陆海军当局商量过有关派兵的问题。他的意见，重点在于压制出兵的主张，想靠使节的谈判来解决问题，当时正是副岛与清帝国谈判刚刚取得成功不久，可以认为西乡对发动战争的心情是淡薄的；因此，把这时西乡的论点看作"征韩论"是不对的。

8 月 17 日，阁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为前往朝鲜国的大使。次日，得到天皇的批准。但决定待岩仓大使归国后再正式宣布。

这个动向使岩仓等"外游派"受到刺激。岩仓大使一行出国访问历时一年零十个月，于 9 月 13 日回国。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人通过出国游历的见闻，决心凭靠普鲁士式的官僚专制来推进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可是，现在政治上的主导权已转移到留守政府方面。大久保等人正因为得知岩仓使节团在修改条约问题上遭到失败，便必然会害怕西乡出使朝鲜取得成功。从副岛赴清谈判的实例来看，西乡的成功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果真如此，西乡的声望就会大大提高，留守政府方面的政治地位就会巩固，而大久保等人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了。因此，大久保等人当然决心要用尽一切手段，设法夺回政治主导权并使西乡派下台。

在反对留守政府这一点上，大久保和夙不和睦的木户利害趋于一致。长州派由于连续发生贪污事件，如不力争，必然会一蹶不振，便渴望铲除眼中钉江藤司法卿。此时，大久保大藏卿因江藤欺侮大藏省而正在对他进行反击。

这样，在阻止派遣西乡出使朝鲜的问题上，"外游派"便联合起来了。岩仓主张先解决库页岛问题，大久保则高谈应优先考虑内治，反对派遣西乡出使朝鲜。这些议论是为反对而反对，是事后想

---

① 《大西乡全集》第 2 卷，1927 年，第 755 页。

出来的谬论，毋宁说是近乎无理取闹。大久保歪曲西乡的论点，故意把他同留守政府方面的对立，炮制成"外征派"和"内治派"的对立。西乡可能没有理解大久保的这种态度。西乡的主张也有弱点，他反对出兵，但并不否定对朝鲜开战的可能性。

岩仓和大久保施展了幕末以来惯用的宫廷阴谋手法，于10月24日推翻阁议的决定，让天皇表明无限期推迟派遣西乡前往朝鲜，迫使西乡隆盛和副岛种臣、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参议辞职。长州派的贪污事件不了了之。这样，朝鲜问题与政府内部的派阀对立纠缠在一起，终于发展成为朝廷的大分裂。

第四节　大久保时代的外交

十三　出兵台湾

副岛外务卿被迫下台后，1873年10月，特命全权公使寺岛宗则以参议身分兼任外务卿。他是维新以来外务省的元老，可以说是"外务省最大的主流派"①。11月，设内务省，大久保充任首任内务卿，成了全国警察和实业界的总头目。另一方面，除西乡以外，下野的参议于1874年1月向左院②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开始了自由民权运动。

岩仓等人反对派遣西乡前往朝鲜，表面上的理由之一是主张优先解决库页岛。因此，政府不得不解决库页岛问题。1874年1月，经黑田开拓次官推荐，政府任命开拓使出仕榎本武扬为海军中将兼驻俄国特命全权公使，由他在俄国首都与俄国政府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寺岛外务卿在东京会见俄国临时代理公使奥罗洛夫斯

---

① 《外务省的百年》，上卷，第110页。

② 左院：1871年与设太政官同时，设置左院，负责起草宪法草案及各种法律，后因征韩派下台而中断。1875年废除左院，设元老院。——译者

基(Orolofsky)，刺探俄国方面的意图。奥罗洛夫斯基提议以千岛交换库页岛。日本方面也倾向于交换办法。3月，太政大臣训令前往俄国赴任的榎本，要他议定边界以消除库页岛上日俄杂居的状态，如库页全岛归俄国领有，则要求以全部千岛群岛划归日本为交换条件。 94

当政府着手解决库页岛问题时，国内士族①的反政府运动抬头了。土佐出身的前陆军少佐武市熊吉等九人，于1月14日在赤坂喰违坂袭击岩仓右大臣，岩仓仅以身免。武市等人是追随西乡和板垣的下野而辞职的所谓征韩派军人。政府受到冲击，决心把征韩派的不满转移到国外去。大久保参议兼内务卿和大限参议兼大藏卿草拟《处理台湾蕃地要略》，主张"台湾土蕃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所以，"我藩属琉球人民遭受杀害，为之报仇，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②2月6日，内阁会议根据这个《要略》议决出兵台湾。同时，为了准备和清政府交涉，派遣柳原前光外务大丞为驻清公使。2月18日，前参议江藤新平等人以"奉锦旗以兴师，问朝鲜无礼之罪"为名而举兵，发动了佐贺之乱③。这次战乱虽于3月1日被平定了，但政府为防止此类事件重演，却必须更加加紧向台湾出兵了。4月，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士兵，充任台湾蕃地事务都督，任命大限重信参议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并任用外国人李仙得为该事务局出仕。木户参议兼文部卿认为出兵台湾违反内治优先的方针，表示反对，因终未能改变阁议而辞职。但是，英国公使巴夏礼和美国公使平安(Bingham, J.A.)却照会外务省，对日本的行动提出抗议，并以局

---

① 士族：明治维新后，称旧武士为士族，这一称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取消。——译者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页。

③ 的野半介：《江藤南白》下卷，1914年，原书房，1968年复刻，第445页。

外中立为理由，拒绝提供原拟用以运输军队的两国船只。于是，政府动摇了，决定停止出兵，大久保利通急忙赶去制止正准备从长崎港出发的西乡都督。然而，西乡从道却于5月2日擅自强行出兵，大久保无可奈何，只好追认西乡的行动。

5月22日，日军全部集结在台湾社寮港，开始了军事行动。6月3日，大体上控制了土著居民区。

驻华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 T.F.）曾将日本计划出兵台湾一事告知清政府。清政府起初还以为《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换文、副岛大使谒见皇帝都是不久以前的事，同日本处于友好关系，而且日本政府又没发来出兵的通告，所以并不相信这一消息[1]。尽管如此，清政府总理衙门仍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卿，指出台湾虽系偏僻海岛，乃属清帝国版图，同时提出质问，如果日本出兵属实，为何事先不进行协商？于是，出兵台湾便成了日清之间重要的外交问题。28日，柳原公使在上海会见了福建布政使司潘蔚，说明日本出兵的目的是：(1)惩办加害（琉球渔民）的土著居民；(2)对抵抗这一处理的人进行惩罚；(3)制定防止今后发生暴行的方策。清帝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于7月12日向柳原公使提出抗议说，日本没有预先照会总署而出兵，是违反条约的，要求撤兵。清政府预想对日开战的问题，向沿海各省负责防卫官员咨询对策，而回答几乎都是申述战备不足，结果便采取了不同日本作战的方针，而是要求列强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撤兵[2]。

在台湾的日军虽然轻而易举地结束了战斗，但流行的疟疾却使他们大吃苦头，战死者才不过十二名，而病死者竟达五百六十一人之多。于是日本便不得不考虑如何突破这个僵局了。陆军卿山

① 许世楷：《台湾事件》，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4年第2号，《日本外交史的一些问题II》，有斐阁，1965年，第43—44页。

② 许世楷，同上，第46页。

县有朋对于对清战争缺乏信心，但政府不顾他的反对，于7月9日下令陆、海军省作战争的准备。当时，陆军卿由于未兼任参议，在决定国家最高政策时，根本不能容喙，据说，他出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后来不久就使他坚决要把统帅权独立出来①。同月15日，政府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前往北京，向柳原公使传达了谈判的要领，即一方面向清帝国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此机会否定清帝国对琉球的宗主权，消除琉球对日清两国的领属关系，并应打开"朝鲜自新(即朝鲜自身革新)之门"②。然而，日清间的交涉不见进展，陷入胶着状态。

大久保参议兼内务卿希望亲自赴清以求打开僵局。此行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解除日清间的胶着状态，也是为了把台湾日军从流行病的艰苦环境中拯救出来。8月，大久保以全权办理大臣的身份——既有权决定媾和，又有权指挥驻华文武官员——，来到清帝国。9月，同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等开始会谈。日本方面主张，由于清帝国的实际统治并未及于台湾土著居民地区，所以很难视为清帝国领土，企图使日本出兵合法化；清帝国方面则引用《日清修好条规》第三条所规定的"两国政事、禁令各异，其政事应由本国自主"，认为对统治台湾的实际状态并无说明之必要，坚决予以拒绝。会谈搁浅了。10月25日，大久保声明要停止会谈归国。这时，与台湾的通商有利害关系的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10月31日，日清之间达成协议，两国全权代表签署了《日清两国间互换条款及互换凭章》③的协定。内容是：(1)日本认为此次行动是"义举"，清帝国对此主张不予反对；(2)清帝国偿付日本遇难民

① 藤村道生：《山县有朋》，《人物丛书》67，吉川弘文馆，1961年，第65—66页。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57页。

③ 《日清两国间互换条款及互换凭章》，即"台事专约"，又称"北京专约"。——译者

抚恤金十万两(库平银)，为日军留下的道路及建筑物等偿付代价四十万两；(3)日本从台湾撤兵。台湾问题暂告解决。

作为大久保的顾问随同赴清的聘用法律家法国人巴桑纳(Boissonade, G.E.)① 在次年即1875年3月说："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因为，在条约的字面上把遇难的琉球人民"称作日本臣民"②。1875年7月，政府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在首里城命令琉球藩王停止对清朝贡、不接受清帝国的册封和撤销福州的琉球馆，使琉球与清帝国断绝了关系。华夷秩序的一角崩溃了。

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Hart, R.)的秘书濮兰德(Brand, J.O.P.)在所著《李鸿章传》中写道："清帝国对日本的力量和野心开始有所认识，是在1874年。……李在后半生一直力图显示威慑的武力以侮辱日本人"③。北洋舰队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

十四　关于以库页岛交换千岛的条约

寺岛外务卿早在1874年2月就建议三条太政大臣必须迅速着手修改条约。同年5月，设置了条约改缔书案取调局④作为调查机关。取调局委员由外务、内务、大藏和司法等省抽调，外务大丞森有礼任主任，主持工作。

修改条约是收回国权的运动，它包括取消治外法权(收回法权)和实现关税自主权这两个方面。但取调局认为，在当时国情

---

① 巴桑纳：法国法律家，明治维新后任日本司法省法律学校教授、外务省顾问等职，1874年，曾随大久保利通来我国助日侵略。——译者

② 清泽洌：《外交家大久保利通》，1942年，第253页。

③ 许世楷，前引文，第38页。

④ 条约改缔书案取调局：审查有关修改条约文件的机构。——译者

下，全面收回国权是不可能的。取调局的结论是，必须充实一切法典，完善审判机关，才能使各国同意日本收回法权，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当前应该致力于收回税权。因此，寺岛外务卿于1876年1月训令驻外公使开始收回税权的谈判，但这一尝试也因巴夏礼的反对而失败了。然而，同年1月27日，英法两国公使却致函外务卿，承认日本国内治安已经确立，日本政府有了保护外侨的能力，通告撤回1863年以来驻在横滨的两国军队。这个日本外交的老问题终告解决。这对确立国权来说，是前进了一步。

榎本公使抵俄后，到了1874年11月才好不容易与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斯特列莫乌霍夫(Stremoukhov, P.)开始了关于库页岛问题的谈判。日本方面建议按照库页岛的自然地形划定适当的边界，俄国方面却要求把库页全岛划归俄国，表示愿以千岛群岛的得抚岛和其他几个小岛作为补偿。日本政府已决心放弃库页岛。1874年3月，开拓使库页岛支厅下令住在库页岛的日本居民撤离。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放弃库页岛的代价问题上。1875年2月，榎本向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Aleksandr II)呈递文书，请求调停日本与秘鲁之间由于玛利亚·鲁士号事件而产生的纠纷。这样作，还另有一个企图，即日本作出信赖俄国皇帝的姿态，博得皇帝好感，以利于推进库页岛问题的谈判。

97

3月4日，榎本要求割让全部千岛群岛作为库页岛的补偿。俄国方面虽以海军反对为理由，表示为难，但最后终于22日同意了库页岛和千岛全岛的交换。斯特列莫乌霍夫对榎本说，放弃千岛是皇帝的恩惠，皇帝和大臣等不久即将按例外出作休养旅行，如不及早议妥，唯恐谈判拖延下去；库页岛和千岛是僻远的地区，拖延谈判，误了季节，就要给调查带来困难等等。榎本推测，俄国担心的是如果谈判拖延，唯恐英国会有介入进来①。此外，还可以认为，俄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91—192页。

国是由于面临巴尔干风云紧急、英俄在中亚发生冲突这样的局面，所以才宁愿与日本妥协。

5月7日，榎本武扬同俄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及附属文件。日本放弃对库页岛的共有权，而以接受俄国所割让的从得抚岛至占宋岛俄领千岛群岛总共十八个岛为补偿。并约定：俄国在十年之内对开进库页岛科尔萨科夫港（日本名为久春古丹）的日本船只免征港务税和海关税；承认在滨海州和勘察加从事贸易和渔业的日本人享有同最惠国国民的权利；偿付日本九万三千日元作为日本在库页岛的国有动产和不动产的代价。该条约于8月22日在东京批准交换。

日本是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径领有千岛的，不是侵略的结果①。幕末遗留下来的日俄纠纷由此解决，拉克斯曼和列扎诺夫以来的"北方威胁"大体上结束了。

日本放弃库页岛，赢得了俄国方面的好感。5月29日，俄国皇帝作出仲裁判决：日本政府对玛利亚·鲁士号事件没有责任。

十五 《日朝修好条规》

朝廷分裂后一个月，1873年11月，朝鲜发生政变，大院君下台，王妃闵氏一族取得了政权。排外主义者大院君的下台，使朝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变化，不久，撤换了东莱府使和倭学训导等处理对日关系的官员。前训导安东晙以对大院君的排日政策负有罪责，被判处死刑。

政府接到这一消息后，命外务六等出仕森山茂视察朝鲜政情。森山到达朝鲜后，于1874年6月报告外务卿说，据传朝鲜之所以发生政变，是因为清政府下令要朝鲜改善对日关系。8月，清帝国

① 信夫清三郎：《千岛、樺太交换条约》，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57年第3号，《日本外交史研究——明治时代》，有斐阁，1957年。

总理衙门将日本出兵台湾一事通知朝鲜政府。并警告说，日本从台湾撤兵以后说不定会转战朝鲜。朝鲜政府发生动摇，急切希望缓和对日关系。9月3日，新任训导玄昔运等人会见了釜山公馆长森山茂，就打开日朝关系问题进行了协商，这是日朝两国官员最初一次正式会见。双方同意，由日本外务卿向朝鲜国礼曹判书，原对马藩主宗重正外务大丞向朝鲜国礼曹参判分别重新发出书契（正式文件），作为建立邦交的开端。

于是，政府命令森山以外务少丞的身分，充任派到朝鲜国的理事官。1875年2月，他受命在釜山亲手递交致朝鲜的新书契。可是，朝鲜方面对“大日本”、“皇上”等字样表示难以接受，又对理事官乘坐轮船和穿着西式大礼服等表示不满。于是日朝交涉又一次陷于停顿。

在釜山的森山急于打开局面，4月，向外务卿提议，乘朝鲜政府“内讧”之机，“派遣一两艘军舰”，以在对马和朝鲜之间测量海路的形式进行示威活动，希望以此从侧面对谈判施加压力①。政府于是决定派春日、云扬和第二丁卯等舰驶往朝鲜近海。5月25日，云扬号没有预先通知就开进了釜山港，东莱府使提出抗议，森山以保护外交官的理由予以驳斥。云扬号对朝鲜东海岸进行示威测量，接着又着手测量西海岸。

9月20日，云扬号驶近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河口，为了补充饮水，向那里的江华岛派出了小艇。这时，江华府的炮台开起炮来，云扬号当即还击，但双方都无死伤。这天下午，云扬号以报复为名，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

引退之后居住在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写信给志同道合的前陆军少将篠原国干，批判了江华岛事件。② 西乡说，日朝谈判即将达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72页。

② 《大西乡全集》第2卷，第842—844页。

成协议之时，却“轻启战端”，“实属遗憾”，认为测量时即应征得朝鲜同意，遭炮击后，也应“首先谈判”以澄清事态。他严厉谴责这次事件完全是“蔑视”朝鲜而造成的，在“交往上，实属背离天理之可耻行为”。西乡还说，事件的背景“极为可疑”；他追问：是不是政府当局由于前此否决了西乡出使朝鲜的提议，唯恐受到天下的批判，因而“以奸计使过去种种情况化为乌有，另启战端？”或者是由于“惧怕派大臣赴朝”才干出这种勾当？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内心深处”“不讲道理，欺弱怕强”所造成。他猛烈攻击政府动机不纯，说也可以认为，“政府已面临瓦解之势，用尽一切狡计仍无济于事”，所以才用对朝鲜的纠纷来“蛊惑国内之愤怒”，总之，都是“出自权谋术数”。

然而政府对江华岛事件却并未立即作出反应。重任参议的木户孝允主张派使节追究朝鲜的责任，并希望亲自出马，后因病未果。11月，从釜山回国的森山建议派遣大使前往朝鲜，追究开炮责任，然后两国之间再缔结条约。

99

政府意向趋于决心派遣使节。由于担心清帝国借口宗属关系而介入，于11月10日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令他到清帝国总理衙门进行了解。接着，又把派遣使节的计划通知驻日各国公使，并取得了支持。外务卿对美国公使说，这种处理办法与过去柏利提督来到下田时（对日本）的先例是一样的。

12月9日，政府任命陆军中将兼参议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27日，又任命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派他们前去处理江华岛事件并与朝鲜进行修好谈判。太政大臣训令全权办理大臣“以缔结和约为主”，如果朝鲜方面答应日本的“修睦和好，广开贸易”的要求，可“以此视为对云扬舰之赔偿，予以同意”①。

---

①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46页。

1876年1月6日，黑田全权一行效仿1853年柏利来航的先例，率领三艘军舰和三只轮船从品川出发。美国公使平安将《柏利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副全权，以壮其行。①黑田等人到达釜山后，鉴于当地的形势，要求派遣两大队②陆军。政府为此紧张起来，马上派出山县陆军卿前往下关进行准备。

2月11日，黑田清隆和井上馨在江华府同朝鲜国全权代表申櫶、尹滋承开始会谈。日朝建立邦交的时机成熟了。经过数次会谈，2月26日，两国全权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该条约规定：(1)一开头就载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强调朝鲜的自立，否定了对清帝国的宗属关系；(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港口；(3)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4)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此外，日本方面还要求最惠国待遇，但朝鲜方面声明无意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缔结条约、进行贸易，因而未载入条文。这个条规确认了朝鲜的单方面开放港口和日本的单方面领事驻在权和领事裁判权，虽无协定关税的规定，其为不平等条约是显然的。

二十三年前在美国柏利舰队压力下被迫开国的日本，这次竟以同样手段强迫朝鲜开国，并把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它。由于缔结《日朝修好条规》，日本的大陆政策便迈出了第一步。此外，这个条规否定了清帝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对东部亚洲华夷秩序的国际体系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自不待言，清帝国是不肯承认这个条约的。于是，围绕着朝鲜问题，日清两国就不能不形成严重的对立关系。

---

① 渡边胜美：《朝鲜开国外交史》，《普专学会论丛》，第3辑，1937年，第282页。

② 大队：明治年间日本陆军编制，一大队由四百人组成。下分中队，小队。——译者

100

第三章　大陆政策的形成

(1877—1883)

第一节　釜山租界的设置

一　英俄在东亚对立的激化

日本和朝鲜缔结修好条规是1876年2月。当时消息传递缓慢，俄国首都彼得堡的《逻各斯》报[①]直到3月才报道了关于签订修好条规谈判的消息，同时却又登载了日本同朝鲜已进入战争状态这种捕风捉影的错误消息。在报导中强调"日本已向朝鲜宣战，舰队封锁了朝鲜的港湾"，"对于接近俄国边界地域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转载这一报道的英国报纸又添枝加叶地说："俄国决定增派舰队，……陆军准备与日本占领南朝鲜相呼应，侵入朝鲜北部"。这段插曲不仅使我们看到当时消息传递是如何迟缓而饶有兴味，而且生动地说明，俄国对日本向朝鲜扩张十分警惕，英国也怀疑俄国会向朝鲜南下，而且对日俄的接近心怀恐惧。

在国际政治中，必有一种对立起着主轴的作用。列强围绕着这个主轴互争霸权，而在当时，英俄对立就是主轴。英俄对立首先出现在欧洲，接着出现在亚洲。如果说，在亚洲俄国所积极关心的是朝鲜，英国则对琉球有着强烈的兴趣。英国的报刊《旁观者》(Spectator)在社论中指出："必须把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如是则上海就将处在英国的军事控制之下"。但当时英俄对立的主要舞台还

① 逻各斯，俄文Логос之译音，意为"普遍规律"。——译者

在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地处远东的日本四周的争夺还没有成为现实的课题。不过巴尔干半岛上英俄对立酿成的酷烈的国际政治现实，已经通过驻在俄国首都的榎本武扬，对日本外交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强烈影响。榎本在幕末·戊辰之战中，虽曾率领幕府舰队与官军战于函馆五稜郭，但因通晓国际法，萨摩出身的黑田清隆为他出头奔走，使他幸免一死，而后负起解决棘手的库页岛边界问题的重任，出使俄国，成功地缔结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在日本外交方面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在彼得堡详尽地考察了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目睹列强如何极力夺取战略要地，又如何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择手段，很受刺激。他感到，日本有必要在俄国开始向朝鲜南下之前，在朝鲜占住脚步。早在江华岛事件前不久的1875年2月，他就建议说，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出兵朝鲜，保障占领"对马岛对岸一岛或一地"之"战略要点"，以确立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足点，以备俄国南下。在江华岛事件后的1876年2月，榎本又建议，必须置经济得失于度外，占领军事要地釜山码头。为此，对朝外交一职，应由1872年去过朝鲜、有这方面的经验、并同他一起驻在俄国详细观察到沙皇主义冷酷的外交政策的花房义质来担任①。这个意见书于4月到达日本，寺岛外务卿接受了榎本公使的建议，命令花房书记官归国。花房义质于10月归国，该月底接到出使朝鲜的任命。这件事表明，在对朝鲜外交方面榎本公使的主张被采纳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以巴尔干半岛为舞台而展开、并不久发展为俄土战争的强权政治，从此开始反映在日本外交之中，以至把战略性的"要务"置于优先地位作为基本方针。 101

二　釜山港居留地租借契约的订立

根据榎本的献策，日本外交为使战略性"要务"万无一失而作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27页。第9卷，第79—80页。

出的第一件事就是1877年1月30日《釜山居留地租借契约》的缔结。

上年2月缔结的《日朝修好条规》，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同朝鲜长期以来的历史，朝鲜通过日本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中。但朝鲜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企图尽可能维持江户时代的“交邻”关系，不愿允许外交代表驻在首都和在国内旅行等等。朝鲜政府要求公使的职务同过去的信使一样，只限于“哀庆交聘”的来往，公使进京要规定一定的道路。这个问题应在附件和通商章程上规定下来，日本政府乃于1876年6月派外务大丞宫本小一前往朝鲜，进行此项交涉。宫本大丞根据黑田清隆全权代表在“复命书”① 中所说的方针开始进行谈判。但宫本对谈判的态度非常消极，他说：朝鲜是个穷国，贸易之利很少，若立即开放三港，则派遣领事，设立海关，开支庞大，有损无益。因此，当前开港应只限于釜山，即使釜山一地，也不可能指望增加贸易额，目前也应只限于改革朝贡贸易之类的陋习。而且，已改称为日本公馆的旧倭馆，面积太大，没有用处，不如归还。至于公使常驻首都权、携带家属权以及内地旅行权等悬案，则遭到朝鲜政府的拒绝而撤回了。8月24日，宫本大丞在
102 《日朝修好条规附件》上签字，其中决定只开放釜山，其它两港容待将来再说。朝鲜政府强调说，同意釜山开港，也只是承认“三百年来开港之地”这个既成事实。在朝鲜政府主观上，对日外交同江户时代相比并无变化，宫本大丞在交涉中的表现，也使朝鲜政府有这种想法。

1876年11月，花房大丞出使朝鲜，改变了这种消极外交。他一变归还倭馆的方针，而把广达三十六万平方米的倭馆地区同码头一起租借下来，作为日本人居留地。釜山港居留地租借契约书，

---

① 复命书：外交使节在任务完毕后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报告。——译者

在法律上虽然是《日朝修好条规》有关细节的协定，即附件的实施章程，但缔结方针则不同。该契约书在次年1月30日签字，但提前于当年12月15日就付了地租，也就是在签字之前即已生效，采取这种破例的措施，就是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使朝鲜政府即使反对，也无计可施。

日本第一次设置了"居留地"，但朝鲜政府却把这个契约书称作"釜山口租界条约"。租界的原意是指准许借用土地的地区，但西欧各国在中国所设的租界，根据条约或惯例，则是指行使外国行政权，并在原则上禁止中国国民占有土地的地区，和单纯的外国人居留地不同①。把租界同单纯的外国人居留地加以区别，其理由在于，在租界中，外国行政权与领事裁判权相结合，大大地排除了中国主权，做为"国中之国"，形成殖民地化的据点。后来，日本外务省也就把釜山的居留地以及在朝鲜和中国所设立的几个专管居留地称作"特别居留地"，同单纯的居留地加以区别。这种由外务省概括为"特别居留地"的居留地，根据1895年至1896年外务省和朝鲜公使往返电报的明确记载，其特点是：(1)为了日本人居住及营业而设立；(2)是划定通商港口一部分的居留地；(3)在那里，除日本人以外，不准租借土地；(4)行政权只能由日本政府代表行使，拒绝被租借国政府或其他派有使臣的国家介入；(5)居留地的维持费由日本政府国库开支；(6)日本政府可统一施行任意决定的居留地制度，无需事先取得被租借国政府的同意；(7)日本政府独占警察权，经常派驻警察，其费用由国库开支；(8)在战时可用作军事基地或兵站基地②。"特别居留地"侵害主权的程度比西欧各国设在中国的租界更加严重，几乎等于日本领土的延长。釜山的特别居留地是日本最早设立的，接着，1880年在元山、1883年在仁川、

① 英修道：《列国在中华民国的条约权益》，1939年，第583页。

② 《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0卷，第1112—1119页。

1902年在马山等朝鲜半岛上的战略要地设立了特别居留地，形成了对朝鲜进行殖民地化的根据地网。在设立这个划时代的釜山居留地时，日本自身在国内也准许外国人在横滨、长崎等地设有居留地。一边屈服于欧洲，一边又侵略亚洲，日本外交这种本质的最初体现，就是釜山居留地的设立。

三 士族叛乱的终结

103 当花房义质外务大丞在釜山努力设置居留地时，在日本国内，一场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内乱——西南战争正在迫近。1876年10月，在西日本的熊本、秋月和荻市①连续发生了士族叛乱。另一方面，从11月到12月，在茨城县和三重县陆续发生了反对修改地税的农民起义。三重县的暴动很快就扩大到爱知、岐阜等县和堺市，短短四天之间，竟发动起如此众多的农民，以至事后被判刑者竟达七万五千人之多。

同时，政府背后，还有鹿儿岛士族也在酝酿起事，于是，政府便担心遭受两翼夹击，惊慌失措。为了防止士族叛乱与农民起义汇合起来，参议伊藤博文强调应“不待物议骚然四起，即先发制人”。政府断然决定把按地价百分之三征收的地税减为百分之二点五，以平息农民起义，而把矛头转向镇压各地的士族叛乱。

计划反对政府掀起叛乱的士族，不只是保守派。民权派也在指望西乡隆盛起事。民权论者末广铁肠和杉田定一等合办的《评论新闻》67号（1876年1月）观察当时形势说，现在“暗中反抗政府者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由于无力单独反抗政府，“其各自论点虽有所不同”，但“其势必将自行结成一个鹿儿岛派”。正如该报所说，天下的形势已经是“若非执政派以力制服鹿儿岛派，则鹿儿岛派必

① 熊本：今熊本市；秋月，今福冈县甘木市的一部分；荻市：山口县北部的市。——译者。

将打倒政府派而自掌天下大权”。情况既已如此，政府就有必要选择在有利的时机挑起叛乱，加以镇压。1877年1月，对朝鲜的外交已由花房义质外务大丞实行了根本的转变，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就挑动奉西乡隆盛为首领的私学校派①，逼其走向叛乱。木户孝允欢迎叛乱，主张“以铁火手段彻底制服之”；大久保也说，如果发生战争，则西乡军师出无名，“此乃朝廷不幸之幸，内心窃喜”②。2月，私学校派起兵，高举“新政厚德”的旗帜向北进军。熊本的民权论者宫崎八郎和中津的民权论者增田宋太郎联合发难，土佐的立志社以及各地的民权派也计划响应。但经过八个月的战斗，政府军以优势兵力和压倒优势的火力消灭了叛乱军。叛乱军战死和被处死者达一万人，政府军战死达七千人。

叛乱结束不久，福泽谕吉写了题为《丁丑公论》的论文，论定政府“间接促使了这次事件的爆发”，并指出，要防止政府专制，“只有抵抗之一途”，强调“只要世上在执行专制，就需要有抵抗专制之精神”。在反抗方法上，他虽与西乡意见不同，但却论断“其精神则毕竟无可非议”，悼念西乡之死。他写《丁丑公论》的意图是，鉴于“士民对政府之威力噤若寒蝉”，“窃愿保存日本国民之抵抗精神，俾其传统不致断绝”，但因慑于社会舆论，未曾发表。③ 104

西南战争中武装叛乱的失败，确实意味着“日本国民的抵抗精神”暂时被政府所击败。现在，专制（政府）摆脱了军事上被打倒的危机，“有司（官僚）”已无需对反对派有所顾虑，可以实行专制政策了。

---

① 私学校派：私学校，指西乡隆盛等下野后为收容鹿儿岛士兵而建立的士族学校，实际是西乡派的政治结社。——译者

② 《木户孝允文书》第7，《日本史籍协会丛书》本，1931年第172页。《大久保利通文书》第7，《日本史籍协会丛书》本，1928年，第489—490页。

③ 《福泽谕吉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527页以下。

四 外交机构的革新

"官僚专制"的外交方针在人事配备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1878 年的外务省官员同 1872 年相比较，其变化如下表：

		1872 年 10 月		1878 年 5 月	
负责政策		事务总裁	副岛种臣(肥前)	卿	寺岛宗则(萨摩)
		少　　辅	山口尚芳(同上)		
派往各国	清帝国	大丞	柳原前光(公卿)	全权公使	森 有 礼(萨摩)
	朝　鲜	同	宗重正(对马藩主)	代理公使	花房义质(冈山)
	英　国	全权公使	寺岛宗则(萨摩)	全权公使	上野景范(萨摩)
	法　国 德　国	代办	鲛岛尚信(同上)	同	青木周藏(长州)
	意大利			同	河濑真孝(同上)
	俄　国			同	榎本武扬(幕臣)
	美　国	代理公使	森 有 礼(萨摩)	同	吉田清成(萨摩)
负责常务		小丞	楠本正隆(长崎)	大书记官	宫本小一(幕臣)
		同	宫本小一(幕臣)	同	田边太一(同上)
		同	田边太一(同上)	同	盐田三郎(同上)
		同	津田真道(同上)	同(兼)	花房义质(冈山)

这个表表明：第一，派阀结构的变化。1878 年 5 月，肥前出身的副岛种臣和山口尚芳从外务省首脑部匿迹，1872 年 10 月，则由已派到西欧的萨摩藩出身的人取而代之，占据了主要职位。寺岛宗则从驻英公使晋升为外务卿，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878 年 5 月空缺的大辅在 6 月间调来萨摩出身的驻清公使森有礼担任，少辅也同样调来萨摩出身的驻英公使上野景范于翌年 11 月担任，这就更突出了这种倾向。这些人是幕府末期由政治商人仓场(格罗佛)建议，乘他的轮船偷渡英国的留学生出身的人，也可以说是所谓"仓场阀"。这种变动说明以欧美知识为依据的外交即将取代副岛派的外交而展开。第二，在外务省内担任常务工作的小丞

或者大书记官在这两个时期都由旧幕府官员占据着。幕府当因开国而开始外交时，为了培养从事实际业务的官员，曾设立蕃书调所，而构成新政府主力的各藩领导人则没有外交经验，如果不利用旧幕府官员的实际业务能力，就不能拟定和执行政府的政策。从事实际业务的小丞和大书记官大都由旧幕府官员来担任，就是这个缘故。另一方面，在 1872 年占据大丞这一主要职位的柳原前光和宗重正则在 1878 年退出外交工作，也值得重视。柳原前光是公卿出身，1870 年曾以遣清小使身份前往清朝，担任修好条约的预备谈判，接着于次年作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达宗城的副使再次赴清，在副岛大使赴清时又作为一等书记官随同前往，到 1874 年充任驻清特命全权公使等，一直担任明治初期的对清外交。宗重正是旧对马藩主，因在旧幕府时代有应付对朝事务经验和“交邻仪礼”的知识，受到器重，直到 1875 年，他一直担任对朝鲜的外交工作。但这两个人在 1875 年都离开了外务省，尤其是柳原前光，虽然领到驻清特命全权公使的任命，但终于没有赴任而去职。柳原前光和宗重正都是按照华夷秩序的原则来看待清国和朝鲜的。因此，当政府的外交政策把否定华夷秩序作为课题而提上日程时，他们就不能不退出外交界。只要一看宗重正的后任是花房义质，就可以认为，1872年和 1878 年之间的人事更迭，标志着日本对亚洲外交的巨大变化。

105

这个表还表示新政府的外交已在欧美和亚洲各国布开了一个公使馆网。开设公使馆的顺序是：1870 年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1873 年在意大利、奥地利、俄国、比利时、荷兰和清帝国，1880 年在瑞典、丹麦、瑞士、西班牙和朝鲜。欧洲先于亚洲，这反映了日本与各国的邦交首先是同欧美各国开始的这一历史事实。

五　军事机构的建立

在强权政治控制的国际社会里，外交只有得到武力的支援才

能发挥它的力量，而在非常情况下，外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用武力来解决。外交机构的调整当然要求军事机构的调整。

天皇政府用征兵令创建起来的近代化军队，首先肩负着镇压农民和士族的反政府行动的任务。政府在西南战争中的胜利，使军队的基本任务从对内转化为对外。在基本任务转化的同时，进行了军制的改革。

日本的军制最初是采用法国式军制而编制的。因此，军令和军制在组织上一元化，军政大权通过太政大臣的辅佐来行使，陆军卿和海军卿同其它各省的卿一样，没有直接辅佐天皇之权。1878年11月，政府为了推行军队从对内转向对外的新任务，设置了参谋本部，把军令机关独立出来。参谋本部参与天皇的帷幄机要，其任务是主管对内对外的作战准备。参谋本部长不仅不受陆军卿管辖，也不受太政大臣管辖，而作为在有关军令方面辅佐天皇的最高机关，直属于天皇①。1879年10月公布的陆军组织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其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陆军一律直属天皇陛下"，第七条规定："凡有关军令之事项，由参谋本部长负责上奏和策划，经天皇亲自裁决后，由陆军卿执行之"。这样，军令机关的独立，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②。这样一来，对于军部，除了天皇以外，任何人都没有命令它的权力，反之，天皇则可依靠参谋本部长的辅佐下达任何命令。极而言之，参谋本部长甚至可以通过天皇发布违反太政大臣意旨的命令。这样，参谋本部长的地位就和太政大臣平等，高出陆军卿了。

设置参谋本部，是刚从柏林归国的桂太郎中佐建议的，是采用德国式军制的第一步。首任参谋本部长是调陆军卿山县有朋中将担任的，次长是大山岩中将，堀江芳介大佐担任调查库页岛、满洲、

① 中野登美雄：《统帅权的独立》，1934年，第363页。

②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有斐阁，1956年，第81页。

堪察加、西伯利亚地志和政情的管东局局长，桂太郎中佐担任负责从朝鲜到中国沿海地志和政情的管西局长。参谋本部最初着手的工作是 1879 年和 1880 年派志水直大尉等十二名军官驻在中国各地调查军备和地志，另派福岛安正中尉短期出差，并由桂太郎局长和该局局员小川又次少佐前往视察。桂太郎局长归国后，提出调查报告，题名《与清朝斗争方策》。其内容是设想派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以此为中心作战行动，然后，“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①。而福岛中尉则把关于清国的兵力、素质、士气的调查结果整理为《邻邦兵备略》六册，在 1880 年出版。

山县有朋把各种调查结果具体化为日本的军事战略，于 1880 年11 月提出了题为《进邻邦兵备略表》的上奏文。他照顾到桂太郎的作战计划，说“本邦在海陆攻战方略方面，业经初步规划”，但“至于防守方略，则尚未就绪”，强调了防卫国土计划的不完备；并指出目前清帝国正努力改革兵制，数年后将成为“称霸于世界”的强国，“邻邦军备愈强，我国军备亦不容忽视”，主张随着清帝国的兵制改革，日本也应充实军备。他说现在的形势是“万国对峙，各划疆域以自守”，故“兵不强则不能独立”，指出列强是“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并极力主张，虽然日本“国计亦艰”，但尽管这样，以“沿海防御”为中心，充实军备乃是当前“燃眉之急”，必须立即着手②。山县有朋借助统帅权独立所想达到的目的是，首先把强烈的军事优先思想，一直贯彻到国家财政，即所谓“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言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平等之交往，始可收贸易之利益，始可积蓄国民之劳力，始可保住国民之富贵”，是要使军备扩充计划的实现优先于其它各种财政计划。 107

---

① 《故桂公传记参考书》3，《桂太郎文书》，国会图书馆藏。

②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 年，第 91—99页。

第二节　修改条约交涉的具体化

六　列强对日政策的多元化

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在列强对日外交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英国公使巴夏礼。他把条约所规定的治外法权加以扩大解释，并把这种解释强加于日本。事实上，他坚持了这样的主张，即无论外国人在日本犯了任何的罪行，都享有领事裁判的特权；而且，日本政府即使制定行政上的法规，外国人也根本无须遵从；如果日本政府想把这项法规适用于外国人，必须事先与各国公使协商。这是不合理地扩大了治外法权，并无条约根据，但明治初期的日本政府，由于在维新过程中，受过巴夏礼的支持，欠他很大的情分，加上缺乏国际法知识，对于在以巴夏礼为首的各国公使共同压力下强行提出的主张，没法表示异议①。巴夏礼还强硬地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关税自主权的要求。他认为一旦同意日本这一要求，不仅在通商上受到损害，而且势必要给清帝国以同样的权利，英国的东亚贸易体制就将崩溃②。欧美各国也追随巴夏礼的政策，以全体缔约国协同一致主义的原则为挡箭牌，对日本方面所提议的修改条约谈判，表示绝不同意单独进行谈判。

但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却有了若干变化。美俄两国开始试图进行单独对日外交。1873年9月到任的美国公使平安开了这个头。他在治外法权的解释上采取了与其他各国不同的见解，认为美国人应服从日本国内的法律；1874年1月，经国务

---

① 广濑靖子：《关于井上修改条约的一个考察》，《近代中国研究》第7辑，1966年，第305页。

②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1941年，第694页。

卿菲什同意，平安公使的见解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①]。美国政府提出这样的对日方针，固然与平安的亲日倾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发展起来，结果东亚贸易的比重增高，对同扼守东亚贸易通路的日本保持亲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平安公使对日本采取了开明的政策，认为关税自主是作为独立国理所当然的权利，主张应当接受这种要求。在他看来，美国由此得益甚大，毫无所失[②]。

俄国也显示出接近日本的征兆。因为俄国在贸易上对日本几乎还没有利害关系，它对于修改条约的要求之所以表示好意，毋宁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在英俄对立中希望得到日本的好感[③]。 108

寺岛外务卿看出各国的统一步调已经紊乱，乃于 1876 年 3 月向三条太政大臣提出报告，打算立即开始交涉收回税权的问题。在这个报告里，寺岛提出以下几条作为收回税权的补偿：(1)废除输出税；(2)预先约定输入税率不高于目前对缔约各国所征的税率；(3)在条约中列入最惠国条款，对各国一视同仁等；还附加了一条，如果对方对这些条件仍不同意收回税权，就准备再开放若干新的港口。寺岛列举两点作为必须尽早收回税权的理由：第一，他举出了下述实际情况，即在现行条约下，由于不能靠关税收入增加国家岁收，“势必加重国内捐税，此项捐税又不能不向人民征收，难保国家财源不至消耗殆尽”。寺岛还强调第二个理由说：“较诸财政损失，更有尤可虑者”，即现在“人民亦已察知，所以征收重税，乃因外国干预我国税法所致”。他认为，由于人民了解被课重税是因为我国税权被剥夺了，因而对与外国交往抱有反感，酿成排外。因此，

---

① 《美国外交文件》，1894 年，第 653—654 页。

② 下村富士男：《条约修改史上的明治十二年》，《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8，《史学》3，1954 年，第 14 页。

③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1 卷，第 799—802 页。

寺岛的结论是：为了“回收政府固有之国权”，以“满足民心，保持治安，扩大对外贸易”，再没有比收回税权“更为紧迫之事”①。当然，寺岛外务卿也并没有忽视收回法权的重要性。他也曾同各国公使谈判要收回法权，但他们不信任日本的法律和法官，主张除非采用埃及那样有外国法官参加的混合审判，否则就绝对不能让本国国民服从日本的审判权，因此，收回法权问题只好从缓。4月，寺岛经太政官批准，指令驻英、美、法、俄、德五国公使立即就修改条约开始谈判。

七 寺岛外务卿修改条约的交涉

驻美公使吉田清成根据寺岛外务卿的指示同美国政府交涉的结果，至1876年9月起草了修改日美条约的方案。吉田方案主要包括四项：(1)日本收回制定有关进出口物品纳税项目和税率的各种规章的权利；(2)对于违犯日本制定海关税则的处理，虽由美国领事进行裁判，但没收品和罚款均须交给日本；(3)对出入日本开放港口的美国船只给予最惠国待遇；(4)新开放特定港口等。至于寺岛指令中的废除输出税问题，由于美国政府反对，说它与美国的保护国内产业政策不符，未列入修改方案。寺岛本来就无意按照吉田方案同美国单独修改条约。其原因在于：第一，他看到修改条约的成败关键在于英国的态度如何，如果同美国单独缔结新约，则将“招致英法之嫉妒，甚或伤害其感情，有误事失机之虞”；第二，由于最惠国条款，其他未订新约的国家也将借此均沾美国所获之利，“当与他国谈判之际，将有于我不利之虞。”

寺岛推迟了对美交涉。1877年3月，美国总统换了，国务卿也由菲什换成埃瓦茨(Evarts, W. M.)。埃瓦茨切望同日本修改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368页。

条约。寺岛只好在日本方面提出的修改方案上增加了留待各国共同实施的特别条款。即使这样，他仍不希望同美国单独谈判，担心即使对美修改条约取得成功，“既有特别条款，实际上无得失可言，徒沽虚名而酿实祸”①。他感到为了使同美国所修改的条约具有实效，也必须加紧解决同欧洲各国修改条约的问题；1878年2月，他指令驻各国公使，以“关税自主权是日本作为独立国家当然应有的权利”为理由，尽快进行交涉。他举出的理由是：自1868年至1875年，日本入超累计额已达五千七百万日元，而改税约书上所规定的以从价百分之五为原则的进口税率，由于物价上涨，实际税率不过百分之四点二，因此，近年来有硬币外流的倾向，难以维持币制的稳定。他指出对此必须设法提高进口税，并且强调修改条约和保护产业的关系，即必须靠提高进口税来保护国货，以其收入来废除全部出口税，以鼓励出口。②

对此，驻英、法、德三国公使上野、鲛岛、青木说，为了保护国货而收回税权的主张，与欧洲各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抵触，列强可能不会承认；并且指出，所谓不收回税权有损国家的独立主权这一提法必将引起其它东洋各国修改条约的要求，因此最好避而不谈。③

但是，除英、法、德三国外，交涉都取得了进展。对于日本的提议，俄国首先做了答复。副外交大臣吉尔斯(Giers, N. K. de)于1878年6月向榎本公使表示“欣然同意日本政府的提议”，并强调这种同意是“维护两国所存在的友谊，并渴望这种友谊更加亲密的一个证明”。同月，意大利代理外相也答复临时代理公使中村博爱说，只要日本定出适用于进口物品的税率的最高限度并承认最惠国待遇，就同意日本的提案。在华盛顿，埃瓦茨国务卿和吉田公使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449页。

② 同上，第393页。

③ 《条约修改经过概要》，《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别册》，第159页。

的谈判也有了进展，1879年7月25日，终于签订了《修订日本国合众国现行条约某些条款并为增进两国通商的约定书》这一冗长标题的条约。这就是“吉田一埃瓦茨条约”，共包括十条，其中 110 规定，美方承认日本收回税权、废除出口税及沿岸贸易的管理权；日方则决定新开放下关等两个港口作为补偿；关于条约的实行日期则规定在其它缔约国也缔结了与此相同的条约并付诸实行之时。

寺岛外务卿获知此约签订后，10月，除已同意修改条约的俄、意两国外，特指令驻英、法、德三国公使仿照“吉田一埃瓦茨条约”缔结条约。但是，这些驻外公使的担心立即成了事实。法国外长沃丁顿（Waddington）要求以开放内地作为承认关税自主权的补偿；英国外相格兰维尔（Granville）对日本从保护贸易主义立场出发要求提高关税也表示异议。[1] 德国外相标洛（Büllow B. II.）说，日本要求的提高关税将给德国贸易造成重大损失；并且致函法国政府说，日本既然主张关税自主，相信协商修改条约问题，没有益处。英、法、德三国这样决坚拒绝日本的要求，是由于背后有巴夏礼公使的活动。他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谩骂”日本的财政是由“粗心大意”的人管理着，并强调如果“一任”这样的政府“恣意决定税权，将会招致可怕的祸害”。他还指出：“日本至今仍无健全的议院，一切政务的变更取舍之权统属朝廷二三大臣，朝令夕改，实为反复无常之政府”，如果让日本掌握“统辖通商之权”，则“危险甚大”[2]。寺岛外务卿听到这个消息，乃指示上野驻英公使，对于一切有名望、有见解、足以左右英国政府并指导社会舆论的人物，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要加以“笼络”。实际上，这就是后来鹿鸣馆政策的开端。

---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674、550页。

② 同上，第765、552、374页。

八　寺岛修改条约交涉的挫折

寺岛外务卿虽然指示进行“笼络”外交，但未能马上觅得应该“笼络”的对象。这里，在交涉方式上，寺岛和驻欧洲公使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驻英公使上野和驻法公使鲛岛认为，如果在伦敦开会，由于能向有关各国的首脑们直接传达日本的正当要求，在本国声誉不佳的巴夏礼公使“实际将难以信口雌黄”，列强政府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也不能无视日本的要求；此外还指出：由于各国利害冲突，互相牵制，日本就能居于有利的地位①。传说英国政府同意在伦敦召开会议，并希望在 1879 年内结束会议。俄国和意大利表示支持日本。但寺岛外务卿表示反对，认为若在伦敦召开会议，日本将会受到各国的联合压力，不如在东京分别同各国进行谈判，更便于贯彻日本的主张。这是巴夏礼等驻日公使团生怕被排除于交涉之外而向寺岛进行活动的结果，但由于寺岛强硬主张，1879 年 3 月，各国也同意在东京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了。

111

巴夏礼公使仍然继续对日本实行强压外交。1877 年 4 月，他一反过去的先例，竟向英国国民宣布，外国船只运出的煤炭都属船只所用，一概免税，并付诸实行；但煤炭出口税在改税约书中属于适用第一种税率的物品，日本当局已在 1869 年通告各国公使，即使是船上用的煤炭，若装上帆船也要课税，并取得了谅解。巴夏礼公使的新布告无视上述这种谅解，是明显地侵害日本国权的行为。②接着，1878 年 2 月，横滨的领事法庭判决哈特利(Hartly, J.)私运生鸦片为无罪。贸易章程第二条规定，鸦片为禁止进口的物品，但领事法庭强辩说：“生鸦片是供药用的，故不属于条约中的禁

---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1 卷，第 602 页。

② 《修改条约过程概要》，第 79 页。

止进口物品，且向日本运进鸦片并不违反英国政府的有关法令”。①1879年7月，德国轮船赫斯培利亚号从流行霍乱的清帝国直接开到横滨，无视日本的检疫规则，在军舰的护航下开进了港口。这是巴夏礼公使唆使德国公使采取的蛮横行动，其目的在于用这种行动来摧毁美国公使关于外国人要遵守日本行政法规的主张，以及日本援用这种主张所作的解释。而且，赫斯培利亚号事件发生的第二天（7月15日），巴夏礼公使又正式通知日本说，在日本把现行海关税则中希望修改的条款通告各国政府之前，英国政府拒绝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②日本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修改现行海关税则，而是废除协定关税率，实行固定关税，因此，巴夏礼的通知就等于说，如果日本继续坚持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主张，就不能进行谈判。这样一来，好不容易缔结成功的“吉田一埃瓦茨条约”，由于其中列有特别条款，也就归于无效。

日英修改条约交涉的停顿，无疑地表示了寺岛外务卿修改条约的交涉以失败告终。寺岛引咎辞职，于1879年9月转任文部卿。

哈特利事件告诉人们，即使条约上有明文规定，如果不收回对它有解释权的领事裁判权，条约本身也就不会有任何实效。而且，赫斯培利亚号事件正发生在霍乱从九州蔓延到关西，死亡者剧增之时（到年底为止，死于霍乱者已达十万人），因此，民众认为英德两国的横暴是不讲人道的问题。事件发生后不久的7月20日，自由民权派的《朝野新闻》登载了《英国人的横行霸道》一文，坦率地反映了民众的感情，攻击了巴夏礼公使。这个事件表明，要收回国权就必须收回法权，寺岛外务卿所尝试的那种只限于收回税权的修改条约工作，已不能满足国民的要求。

① 《修改条约过程概要》，第168页。

②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658页。

要求既收回法权又收回税权、把这一修改条约的工作进行到底的呼声，在日本民众中日益高涨。1879年11月，在大阪召开的爱国社第三次大会，是一次划时代的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要求建立国会的请愿运动。是先要求修改条约，还是先进行建立国会的运动，大会对此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讨论，代表土佐立志社的片冈健吉等人极力主张，即使为了实现修改条约，也必须首先建立国会。大会排除了筑前共爱会所提出的修改条约先决论。11月22日的《朝野新闻》以《实现修改条约的方法》为题发表评论，对大会讨论情况作了说明。评论指出：目前，修改条约之所以不能实现，虽然是由于英德法三国认为维持现行条约对他们有利，但原因决不止此，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蔑视"日本。《朝野新闻》认为，他们"蔑视"日本，决不是因为日本军事力量弱小；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军事力量也是弱小的，但他们有宪法，有国会，所以"任何大国强国也不能违逆这些国民的感情，不敢恣意妄为背理不公之事"。《朝野新闻》的结论是，英德法三国之所以蔑视日本，是因为日本没有国会，不能集中国民的舆论；日本要想"实现目前至为紧迫之修改条约，并进而排除治外法权"，就"必须迅速建立国会"；并极力主张："国会果能建立，则国人之感情即可著功效于实际，彼欧洲国家，纵使既大且强，岂能抵抗我国民之成功？"《朝野新闻》的评论表达了自由民权派对修改条约问题的正统见解，这种主张的正确性，后来为事实所证明。

112

九　井上外务卿的上台

以完成修改条约作为目标之一而开展起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在1879年至1881年期间，迅速扩展，势如奔流。1880年3月的爱国社第四次大会集聚了来自全国两个府、二十二个县八万七千人的总代表共一百一十四名，改组为"国会期成同盟"，向太政官提

交了《恳求准予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请愿书》指出："今日之我国，对海外各国犹未能充分伸张国权，而蒙受屈辱之事实属不鲜"；其原因则归结为"人民无自主自治之精神，无人民应有之权利"，从而强调：为了实现独立，伸张国权，"必须首先创立国会"。①

政府为了阻止创立国会的运动，也必须实现修改条约。承担这个重任，代替寺岛而上台的，是参议兼工部卿井上馨。他以参议身分兼任外务卿，着手推行修改条约的工作。别的姑且不谈，他决定首先把修改条约的重点从税权移至法权，提出了收复一部分法权的问题；在关税方面，则不提英国所反对的收回关税自主权，而把目标缩小在修改现行协定税率上。新的条约草案于1880年5月送达驻欧美的日本公使，于7月送达驻日各国公使。

1880年4月，英国自由党接替保守党成立了格莱斯顿（Gladstone, W. E.）内阁，外交部新任政务次官迪尔克（Dilk, C.）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他在1876年到过日本，回国后在《双周评论》上发表论文，对日本要求收回法权表示好感，遭到代表旅日英国人利益的《日本邮报》的强烈反驳。②井上外务卿赶忙指示驻英公使森有礼说：迪尔克"一向偏袒日本"，所以要"适当地加以笼络"；并指出："今日欧洲最有势力者为英德两国，若能笼络此二国，余者即可在我掌中"。对于德国，则委托日本公使馆雇佣的外国人西波尔德（Siebold, A.）向俾斯麦首相进行游说。③

113

但是这种"笼络"并没有成功。1881年7月，英国外相格兰维尔通知说，日本政府的草案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同时通知日本，为了协商修改现行条约中有关通商关税事项，准备向日本政府提议，召开驻东京各国代表的联合预备会议。森公使对这种无视日

① 《自由党史》上，《岩波文库》本，第288—289页。

② 广濑靖子，前引论文，第400页。

③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611、1077页以下。

本政府意向的单方面的通告提出了抗议，却无答复。他慨叹日本处于欧美各国对等交往之外，说："无与国之力可恃，匹马单枪独挡称霸世界之英国政府，尽管驳斥彼方摈斥草案之作法为不当"，也当然不会有效果的。格兰维尔外相直到10月才寄来答复，他指出：领事裁判制度虽然有时或有不便，但在司法制度显著不同的情况下，乃是国际关系的必要条件，并且故触日本痛处，说：这个原则，日本自己在缔结《江华条约》时不是也同意的吗？①

针对这种情况，德国对各国进行斡旋，设法召开东京会议，英国也表示了同意。

据森公使看来，英国之所以同意召开东京预备会议，是想借此"免遭一国专横之讥，而以共同协议为后盾，保护远涉东洋谋利之商人"，而德国之所以出面斡旋，则是"试图执欧洲大陆之牛耳，与英国一道向东洋扬威"。换句话说，德国政府的好意"全属表面文章"，"并非真意"，其真正目的在于操纵会议，以之作为"在欧洲图谋自身利益之工具"，"加强其霸者之地位和权势"；俾斯麦是个"佯装不知被人笼络而乘机施展权术"的居心叵测的人物。根据这种看法，森公使指出：东京预备会议的本质在于"专为夺我之利以与外国"；日本想要"笼络"的英德两国正试图把过去施加于土耳其的侵略手段"施之于东洋，而欲以我国为开端，亦即试图以欧洲之全部力量迫使我国俯首贴耳，听其颐使"，并警告说：日本如接受东京 114 预备会议，必至"国步维艰，偏离东洋发展之捷径，此乃昭然若揭者也。"②

为了实现修改条约和收回主权，井上馨外务卿面临着两条道路。其一是《朝野新闻》所呼吁和创立国会请愿书中所指出的道路，即通过制定宪法和创立国会，集中国民的舆论，用这种舆论的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749、757页。

② 同上，第173、763页。

力量来实现独立。巴夏礼公使曾举出诸侯派阀的寡头统治来作为拒绝日本要求的理由，由此可见，靠议会主义和立宪制度来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即使对外国来说，也是取得它们同意修改条约的必要条件。但是，政府却拒绝立即创立国会，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因此，井上外务卿面前所能选择的道路，就只剩下了一条，即同英德两国，而且仅仅是其特定人物挂钩，"笼络"他们，依靠这种要手腕的外交技术。正如森公使所警告的，这种选择乃是导致英德两国"颐使"日本的道路，是放弃"东洋发展"的道路；但是，日本既然把英国加于日本的那种强压外交施加给朝鲜，因而在亚洲也就完全孤立而无"与国之力可恃"，必然在全世界也孤立，而不得不采取"笼络"政策这种要手腕的外交。于是，井上外交便同意在东京召开联合预备会议。从 1882 年 1 月召开的修改条约预备会议，导致了鹿鸣馆时代的出现，同时，在暗中势必隐藏着对朝鲜和琉球的强压政策。

第三节　对琉球的处理

十　琉球问题的重新提出

明治政府试图一边统一国内，一边通过《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来调整国境，并以修改条约来摆脱同欧美各国的不平等关系，以对朝鲜和清帝国开展外交来打通日本前进的道路。国内的统一，在通过西南战争杜绝了武装叛乱的根源之时，大致已告完成；国家统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将琉球划入日本领土的问题。日本政府于 1875 年 5 月，禁止琉球藩对清帝国的两年一次朝贡以及清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并接受册封的惯例。但是，琉球藩官员一再前来东京请求日本政府允许向清帝国朝贡，并且派遣使节出使清帝国请求援助。1876 年 5 月，日本政府又接管了（琉球的）司

法权和警察权，但在东京的琉球藩官员却向清帝国公使何如璋及外交使团申诉了琉球藩的独立性，还对内务省驻琉球办事处所雇佣的藩民处以私刑。

日本政府唯恐琉球问题发展成国际问题，1879年1月，派内务省大书记官松田道之前往琉球，令他要求琉球藩王限一周内宣誓遵奉日本国法。但是，琉球藩王尚泰指望清帝国前来干涉，便拒绝说，在日清两国尚未达成协议期间，提出誓约，“不仅无以对清帝 115 国，而且必将受其谴责”。于是，日本政府决心“处理琉球”，令松田提出处理方案。松田的方案是：第一，估计琉球藩民必将“不顾一切拚死抗拒处理”，“出现聚众请愿等骚扰，数不尽的各种暴动，行同叛乱”，认为在颁布处理命令之前，有必要增派军队；第二，必须宣布废除琉球藩，改设冲绳县，并令藩主住在东京。但强调此事“既不能用强制措施来进行，则终不得不以形同罪犯来对待，采取武装押送等措施。”①

明知要出现这种抵抗，还要强行处理琉球，其理由固然在于急须改变琉球属于日清两国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划归日本领土；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对琉球列岛的军事重要性的考虑所起的作用。1872年11月，外务省顾问李仙得就曾主张，日本要在东亚施展威权，就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并指出了琉球群岛在这方面用作基地的军事重要性。② 1877年7月，代理外务卿森有礼提出报告并提请日本朝廷注意：伦敦出版的《东洋杂志》指出：“琉球地势极为有利，占有此群岛，则在一旦有事之时，对大国将极为方便，此点无待论述”；该文并论证说“我英国今若能得此群岛，置兵守备，作为太平洋中驻屯之地，则英国在东洋之地位不知因此又将前进多少”。③

---

① 《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编》，风间书房，1962年，第202—204页。

② 《生番事件》，见《陆海军档案显微胶片》。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10卷，第194—199页。

十分明显，如果琉球对英国可以成为统治东洋的策源地，那么，对日本当然也是一样；如果英国打算占领琉球，那么日本就必须抢先确定其领有权。1879年3月，日本政府令松田大书记官带领警察队一百六十名、步兵约四百名，接收了琉球藩王居住的首里城，并把他护送到东京。

清帝国认为日本处理琉球是对华夷秩序的挑战，对此抱有强烈的反感。清帝国公使何如璋向清帝国最大的武力集团——淮军的统帅，实际统辖清帝国军事、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提出警告说，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问题如果妥协，日本下一步即将侵略中国北境；特别是台湾、澎湖接近琉球，“将来一夕之安不可得”，并极力主张“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① 与清帝国要人有接触的日本外交官也向本国报称，清帝国决心难移。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和驻清公使宍户玑相继报告说，据称，李鸿章坚信，如果默认日本占领琉球，下一步就要征服朝鲜，接着则是策划袭击北京；李鸿章打算全力以赴地阻止“处理琉球”②。

116 但清帝国这时正因伊犁问题同俄国发生争执，很难同日本进行战争。既然如此，清帝国就只好请求列强仲裁，此外无法解决琉球问题。不过列强仲裁对日本是不利的。因为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批评日本占领琉球是凭借武力，没有合理的根据，并到处发表同情清帝国的见解。驻清德国公使巴兰德也批评日本外交的策略不光明正大，总是搞“邪门歪道”，尤其是对清外交，“行迹近乎欺凌”，强调说：“这使各国政府感到不快”③。

李鸿章常驻天津，驻天津领事竹添比较容易搞到清政府的情报，其情报的准确性是很高的。竹添综合搞到的情报，认为“断然

① 全文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24页。——译者

② 《冲绳县史》第15卷，1969年，第82—83页。

③ 同上，第96—97页，128页。

弃和开战，压之以兵，威服清帝国，缔结新条约，使我国占有充分之权利"为日本可取之上策，但又作出结论说，全面对清开战，财政上有困难，而且妨碍正在走向"兴旺"的对清贸易，因此必须避免。其次的良策则是，虚张开战之势，以促使清帝国屈服；但清帝国对日反感强烈，加之，由于同治中兴，其结果颇似日本的维新，军备"已非十年前之清国可比"，日本并不能确操胜算。竹添领事的结论是，日本所能采取的途径，只能是让步以求妥协；他建议政府说，与其由外国仲裁而向清帝国让步，最好"莫如先由日本主动予以些许之利"。①

日本政府接到竹添领事的报告，决定采取让步方案。恰巧这时前美国总统格兰忒(Grant, U. S.)将军访日，对琉球问题提出了日清双方让步的方案。日本政府就同意了格兰忒将军所提议的以互相让步来和平解决的原则。

十一　井上外务卿的亚洲政策

格兰忒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国民英雄，1869 年起连任两届总统，卸任后旅游世界，途经清帝国，于 1879 年 7 月来到日本。他在清帝国受李鸿章之托，请他居中调停琉球问题。他指出，日本列岛和琉球列岛，再加上由于日本占领琉球而"可轻易夺取的台湾岛"，形成了对清帝国的包围形势；他提出一个具体解决办法，即日本把台湾及宫古、八重山群岛的占有和管辖权让给清帝国。格兰忒将军的见解是出自诚意的，可是他只是从战略观点来论断领土的归属，并没有考虑到宫古、八重山群岛居民的民族、历史特点。可是，井上外务卿除让步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估计到"将我领土以内之两岛割让给清帝国，必将惹起议论纷纷，说这和削弱国权无

① 《冲绳县史》第 15 卷，1969 年，第 82—83、96—97 页。

117 异；鄙人不幸，处此地位，必将首当其冲，集此类攻击于一身。”虽然如此，他还是在格兰忒提议的那条线上，订立新的方针，并于 1880 年 3 月上报太政官。①

题为《琉事存案》的新方针是：第一，把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清帝国管辖，以后述二、三两条作为补偿；第二，把原定直到 1883 年有效的现行《日清修好条规》提前废除，加以修改；第三，在修改时，应使侨居清帝国的日本商民同享列强商民所享有的内地通商权等。井上外务卿提出这种交换条件的理由是，考虑到即使假定 1883 年以前日本对欧美各国修改条约取得成功，由于欧美各国均沾《日清修好条规》的税率，日本也不能获得改订税率的实效；而且唯有清帝国（对日）的领事裁判权依然存在，因而会有招致国际上的纠纷之虞。因此，井上强调第二个条件，即提前修改《日清修好条规》，把过去双方互有领事裁判权改为日本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并使其同意日本提高进口税率，“实为最紧要之事”，“务须期其必成”。

这种要求是要把过去相互平等的《日清修好条规》改为日本居于优越地位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很难想象，清帝国会以日本所提供的条件，即以宫古、八重山群岛作为补偿而同意这种要求。于是，井上外务卿对宍户玑驻清公使赋予谈判全权，命令他乘俄清发生危机之际，以威胁和恫吓手段进行紧急谈判，并扬言如果清朝政府不承认第二个条件，就决心“以干戈收拾此种局面”。

井上外务卿认为，第三个条件与第二个条件相比，必要性较小，“不足以决国家之和战”，因此他密令，如果清帝国拒绝，可以撤回。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出口的商品，在开放港口全可销尽，即使获得内地通商权，总计各种费用，也没有攫取“大利”的希望。

---

① 《宍户玑文书》（国会图书馆藏）。

井上外务卿断定，国际形势对日本是不利的。他看到："英俄不和，时有诉诸干戈之危机"，而德国也正要着手"东洋政略"，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日本欲统一东洋而对抗西洋之政略，实为困难"。因此，他极力主张：日本必须"在海陆双方完成战备，在内政方面修改法律，增强中央政府之威力，首先以作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即以废除治外法权为第一步"。这说明，当时井上外务卿的外交政策还不是以向清帝国市场进行扩张这样一种具体的利权要求为依据，而是要通过实现修改条约来完成独立，为了这个目的而把确保日本在东亚的优越地位作为核心的。

十二　日清对立的形成

井上外务卿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同欧美列强修改条约。对清交涉从属于修改条约的交涉，置重点于：放弃宫古、八重山群岛，提前修改《日清修好条规》，以便使日清关系同将来对列强缔结的新约相适应。但是，1880 年 4 月 17 日的内阁会议却修改了井上的对清交涉方案，决定增加最惠国条款。井上把均沾内地通商权视为次要的东西，并曾指示，如果清国拒绝，可以撤回；而内阁会议的决定，则不仅要均沾内地通商权，而且在一切方面，凡西欧各国在清帝国所拥有的特权，日本都要获得。当时，日本政府决定，如果清帝国只图"了结琉球一案"，而"拒绝我方修改条约之要求"，日本也必须把琉球问题和修改条约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两案圆满解决"；密令宍户公使，此项要求"即使激烈也无妨碍"；并指示他，如果清帝国拒绝增添最惠国条款，"我方亦痛驳琉球之议"，即使清帝国再度要求格兰忒将军介入，也"不得轻易允诺"①。

118

日本政府意识到，与割让宫古，八重山群岛的代价相比，日本

① 《宍户玑文书》。

的要求太高，很不相称，若不乘清帝国因伊犁事件而穷蹙无路之时强行提出，是难以满足要求的；因此命令一旦俄清之间的紧张关系激化起来，“立即毫不犹豫地同总理衙门强行谈判”。清政府的正式外交机关总理衙门屈服于日本的“强行谈判”，竟上奏说，为了防止日俄两国的夹攻，只好同意分割琉球群岛并修改条约，并于10月21日，把规定割让宫古、八重山群岛的《琉球分岛条约》草案和以改订《日清修好条规》及给予最惠国待遇为内容的附加章程草案[①]提交日本。

参加谈判的太政官大书记官井上毅自夸说："所订条款虽不过一二，但一变旧约之精神，而得以与各国并驾齐驱，获内地通商之利，并以此永占将来之大利"；还兴高彩烈地说谈判的结束“实为我国之福”[②]。但是，井上毅自夸得太早了。清政府内部对总理衙门的上奏，一再提出异议。清廷大员陈宝琛认为，宫古、八重山群岛远处大洋之中，与中国本土隔绝，即使接受割让，将来终究要被日本吞并，并指出：总理衙门说日清有可能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这一点也并无希望。陈宝琛还指出，日本畏俄如虎，日清俄的关系取决于清帝国的强弱，因此，即使有了日清同盟，一旦清俄开战，日本也将站在俄国方面，而当清帝国失利时，必将从背后进行袭击。他极力主张，因《琉球分岛条约》而正式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处理时，则俄国一旦要求割让垂涎已久的永兴湾[③]，即无理由拒绝；因此，仍应暂取拖延政策，在此期间同俄国妥协，以对俄备战所动员的兵力和建造中的战舰来威慑日本，如果日本还不屈服，则一待军备充实，就进攻日本[④]。接着，李鸿章也奏称，日本企图乘俄清发生纠纷

119

① 即总理衙门所呈“球案专条”“加约条款”及有关通商、税则之“凭单”三个草案。原文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44页。——译者

② 《冲绳县史》第15卷，第267—273页。

③ 永兴湾在东朝鲜湾内，元山即永兴湾内的一个港口。——译者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23卷，第19—22页。

之际占领琉球，如果接受《琉球分岛条约》，承认最惠国条款，则将给清帝国带来大害；但是，如果拒绝，则在俄国之外又增加一个敌人，因此，最好采取拖延政策；他强调对俄让步，以对付日本。总理衙门奉到上谕说，对乘清国之危而施加强压的日本慎勿妥协，乃避不签订条约①。

围绕琉球问题的日清交涉，在最后阶段陷于破裂，这对日本外交是个打击。宍户公使提议："现在有必要先打它一拳"，而井上毅则比他更加强硬。他提出两个方案以供抉择：一是用武力强制清国签订并批准条约；二是权当清国已放弃对琉球的争议，宣布"我国对琉球全岛有不容争辩之权利"②。政府认为，第一个方案可能发展成对清朝的全面战争，未予采纳，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但外务卿井上馨想要借此机会"大喝一声，使其震惊"，决定撤退公使并以此为借口派遣军舰③。他在1881年2月4日给上野外务大辅的信中转述了内阁会议的气氛，说内阁一致认为，如果清帝国开战，我方将不避应战，并有充分的胜利把握。

清政府也开始了对日战争的准备。军机大臣左宗棠下令④沿海督抚加强防卫，把以往的防俄体制转为对日防卫，并激励他们，一旦日军入侵，必须一举全歼。在督抚当中，也有人扬言要在8月间完成对日战备，届时以一军占领琉球，另一军从朝鲜南下进攻日本本土；上海发行的权威报纸《申报》（4月25日）对不要签订琉球分岛条约的上谕进行了解释，并强调日本负债累累，士气不振，因此，如果同日本"决战"，必能取胜。

---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25卷，第6—8页。

② 《井上馨文书》（国学院大学梧阴文库藏）。

③ 《冲绳县史》第15卷，第315—316页。

④ 指左宗棠在光绪七年二月初四日向清廷所上"说帖"，内称："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左宗棠并未直接下令。——译者（参阅《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152页）

这种报道增加了日本对清帝国的敌视心理。自由民权派的报纸《邮便报知》于4月12日指出："吾国之忧不仅在于强英猛俄"，认为清国正在成为可怕的邻国，接着于18日又称："试看目前日本之兵制，……或尚不及欧美常加侵凌、吾国亦复蔑视之土耳其和支那"，要求大力扩充军备，这种倾向愈益强烈。

十三　日本对朝鲜的入侵

但是，日清两国对立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处理琉球问题。日本对朝鲜的重新入侵也引起了以朝鲜的宗主国自居的清帝国的警惕，于是朝鲜问题成为新的争议焦点。1880年5月，日本实现了使元山开港的意图，把元山变成同釜山一样的特别居留地；据井上外务卿的指示说，所以选定元山作为第二个居留地，就是因为那里是军事要地。日本政府在控制朝鲜战略要地的同时，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实现了一直被拒绝的公使觐见，还使朝鲜默认了日本公使常驻汉城。常驻汉城的花房公使极力向朝鲜国王以及政府要人讲述国际形势，赠送新式武器，并到处鼓吹编练日本式军队的必要性。继元山之后，又要求开放仁川；当朝鲜政府以仁川距离首都太近为理由加以拒绝时，他于1881年2月向本国政府建议采取"强迫要求"的手段，出兵"立即解决"，在同朝鲜政府的谈判席上，也表示决心断交开战，加以"威胁"①。朝鲜屈服了，约定以1882年9月为期，开放仁川，并设置特别居留地；但花房公使并不以此为满足，于同月发表声明说，日本对维护朝鲜的独立极为关心，要求朝鲜聘请军事顾问团并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进而又认为，绝影岛扼釜山港之咽喉，"若能使之成为我海军之驻地，则他日我海军力量足以控制朝鲜海峡时，将有无限方便"，要求租借绝影岛②，这次交

120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14卷，第332页。

② 同上，第350页。

涉的结果，日本于1881年6月，得以使朝鲜成立了日本式军队"别技军"，并聘请堀本礼造少尉为军事教官。

日本所要求的朝鲜独立，乃是使朝鲜脱离清帝国的藩属地位，把它纳入日本统治之下，日本踏踏实实地实行了这个方针。日本的这种入侵引起了朝鲜民众的反感和抵抗。1881年3月，儒生李晚孙等人向国王上《岭南万人疏》，对屈服于日本压力而放弃攘夷国策的国王以及政府领导人进行攻击。各地儒生的不满就此爆发起来。各地相继上疏，全都力主必须"卫正斥邪"（保卫朱子学，排斥外国的邪说），并倡导攘夷的必要。国王的生父、曾经独揽大权、采取强硬的攘夷政策而被迫退位的李昰应大院君，看到这种动向，图谋东山再起。他为了打倒政敌闵派①，开始积极活动。

反日动向不仅吸引了儒生，在民众中间也燃起了对日本商人的憎恶。三菱公司和大仓组等商社侵入朝鲜，向农村大量倾销兰开夏②的棉织品和日本的火柴等日用品。由于《日朝修好条规》规定免除这些商品的进口税，朝鲜手工业者无力与之竞争，相继破产。日本商人还囤积粮食，图谋暴利，以至米、麦、大豆等不仅价格上涨两三倍，而且接连出现了缺粮地区。于是，对日本商人的憎恶爆发了，1882年3月，朝鲜元山附近安边府发生了袭击日本人事件。大仓组职员儿玉朝二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和东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莲元宪诚一起，无视条约的规定，从元山居留地前往安边府，途中遭受约二、三百名朝鲜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受重伤，莲元当场死去。4月25日，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报道了安边府事件，要求立即派军舰常驻朝鲜三个港口，保护侨民，公然主张采取炮舰政策。 121

日本的入侵朝鲜和俄国的企图南下，以及朝鲜国内对此的反

① 闵派：指朝鲜国王李熙的妻党闵妃集团。——译者

② 兰开夏：英国纺织业中心。——译者

应，使清帝国和朝鲜当局痛感必须采取新的对策。早在1880年，清帝国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根据他对于日本的广博了解，写了《朝鲜策略》一书，书中谈到朝鲜的危险来自俄国的南下和日本的北上，为了防止这种危险，主张应将列强势力引入朝鲜以对抗日俄的侵略。《朝鲜策略》给朝鲜和清帝国很大影响。李鸿章也是受此影响之一。他指示朝鲜政府，为了抵抗侵略，必须实行通商和练兵两策；但现在的朝鲜，难以两种方策同时并举，因此以先同欧美各国建立邦交以牵制日本、争取时间为上策。并指示最好以美国为对象。他所以选择美国为建交对象，是因为他估计美国急切希望向东亚扩张，因而缔约条件能够比较宽厚。事实上，美国也确是加深了对东亚的关注，1881年1月，《波士顿新闻》就指出，倘能热心开展"同中国及其邻近国民的大规模贸易"，就可以输出美国商品，把现在高达数百万美元的欧洲商品驱逐出去，希望政府积极努力。

美国国务卿布莱恩(Blaine, J. G.)于1881年11月14月，指示美国驻清公使馆武官薛斐尔(Shufeldt, R.W.)要求朝鲜政府开放既便于日清两国交通又可供美国舰队停泊的港口。薛斐尔提督同天津的李鸿章和朝鲜外交代表进行了会谈，李鸿章强烈要求在条约中载明朝鲜是清帝国的属国。但是，美国表示反对，最后同意在换文中承认朝鲜是清帝国的属国①，于1882年5月，缔结了规定开放仁川港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仁川条约》)。继美国之后，6月，英国东洋舰队司令威利斯(Willis, G.O.)中将及德国公使巴兰德也签订了与《朝美条约》内容几乎相同的《朝英条约》、《朝德条约》。但英国政府认为《朝英条约》对于贸易的规定和侨民地位的保障不够完备，表示反对，未予批准；德国也仿效英国；结果，直到巴夏礼公使调任驻清公使，重新缔结条约，朝鲜与英、德之间的外

① 指朝鲜国王在致美国总统照会中声明，朝鲜为中国的属邦，其分内应行各节均与美国无涉。——译者

交关系才得以建立。但是，从威利斯提督提出租借巨文岛问题，可以想见英国对于朝鲜决没有等闲视之。

第四节　壬午兵变

十四　壬午兵变的发生

正当朝鲜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成为各国外交在远东的焦点之一的时候，朝鲜首都汉城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导火线是 1882 年 7 月 23 日士兵对不发薪饷心怀不满而引起的"壬午兵变"。由于创立了日本式新军即"别技军"，旧军受到冷遇，主张斥邪政策的大院君便唆使、煽动旧军士兵发动反日运动。起义士兵杀死了别技军的教官堀本少尉，杀伤了日本翻译人员和警察，122 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花房公使等冲出重围逃到仁川，搭乘英国军舰回国。大院君进入宫廷，赶走了前此掌握政权的闵妃及其党羽，掌握了政权。

日本政府于 7 月 30 日，召集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对策。内阁顾问、萨摩派的黑田清隆等人主张应速派讨伐大军，对朝开战。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占领朝鲜，向清帝国挑衅，挑起日清战争，乘胜不仅解决朝鲜问题，而且一举解决琉球问题。陆军的元老、参事院议长、长州派的山县有朋则提出，应首先与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谈判陷于"僵持"时，再占领开放港口和要冲各岛。山县知道对清战备不足，所以意在回避对清朝的全面战争，只以朝鲜为对手，确保战略要地。外交负责人井上馨外务卿是长州派，他考虑到欧美各国对日本并无好感，所以更加慎重。他的结论是，只能以派遣军舰作谈判的后盾，待谈判失败后，再讨论出兵问题。内阁会议通过了井上的提案，为了给外交谈判撑腰，政府决定派遣步兵一个大队（相当于营——译者），一百五十名陆战队和四艘军舰，并于 8 月 2 日

指令花房公使向朝鲜政府提出如下要求：(1) 朝鲜政府正式道歉；(2)对受害者家属偿付抚恤金；(3)逮捕并法办肇事者，罢免并处分政府有关人员；(4)赔偿日本的损失，并偿付派遣军队的费用；(5)如经调查，明确朝鲜政府负有重大责任时，则要求割让对马海峡的要冲巨济岛和日本海的郁陵岛；(6) 若朝鲜政府不接受以上要求，可占领仁川作为保障。尽管井上馨外务卿持论慎重，但日本的要求却越来越大了。山县有朋考虑到以和平手段难以实现上述要求，乃以代理陆军卿的资格，于 8 月 2 日和 3 日，分别对熊本镇台和东京镇台所辖地区发出了召集令，5 日，又经天皇批准向全军管区下达了召集令，8 日，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团，并令运输船队待命，为开战做了准备。这次动员是日本军队首次为对外作战而进行的动员，它首次显示出日本军队以西南战争的胜利为转折点，已将其基本任务从对内战争转为对外战争。① 9 月，有了这种动员体制作背景，日本政府对朝鲜政府的要求又加码了，追加了：(1) 开放咸兴、大邱和邻近汉城的杨花津等朝鲜腹地的要地；(2)承认外交官的内地旅行权；(3)处分安边府事件的肇事者并赔款；(4)对通商章程进行有利于日本的修改等项要求，企图借此机会一举解决所有悬案。福泽谕吉在 18 日的《时事新报》上全面支持这一政策，认为朝鲜政府如不接受，"就应挑起战端，进攻彼国之防守要冲，迫订城下之盟"。

十五　清帝国的对策与《济物浦条约》

1882 年 8 月 1 日，清帝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将日本的动向电告两广总督张树声。当时掌握清帝国政治和外交实权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正服母丧，由其部下张树声代理。张树声本想待

123

① 《明治军事史》上卷，《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 年，第 553—554 页。

朝鲜国王前来请求之后再开始行动，但因黎公使报告了日本动员情况，并说清帝国若不出兵保护朝鲜，日本的影响将会加强；乃于7日获得批准出兵朝鲜，派出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所率领的威远、超勇、扬威等三艘军舰。随同丁汝昌前往的李鸿章部下马建忠，是通晓国际法的外交人员，他在仁川观察实况之后，于8月12日电告张树声，担心"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等不日将率领兵船大集汉江"①，并强调如果清帝国没有兵备，则花房将率重兵前往汉城，自行查办，强行要求，向朝鲜逞强邻之威，要求速派陆军六个营（三千人）。同日，李鸿章的幕僚、素负干才之名的天津薛福成向张树声建议：如果日本勾结大院君，废除朝鲜国王，或者拘捕大院君解往东京，朝鲜就将听命于日本；因此，清帝国必须先发制人，拘禁大院君。马建忠和薛福成的建议被采纳，浙江提督吴长庆②于8月20日率北洋陆军六营精锐部队到达南阳湾。清帝国对朝鲜的政策是明确的。但是，大院君却不知清帝国的计划。他指望清军前来调停，而对日本拖延不答。

花房公使认为大院君的态度缺乏诚意，乃于23日宣布撤离汉城，并以断绝邦交威胁朝鲜。马建忠生怕清帝国被卷进战争，便按照预定计划于26日拘捕了大院君，送往天津；同时指示朝鲜政府接受日本要求，实行妥协，这样就打开了局面。30日，花房公使和朝鲜方面的全权代表李裕元、副全权代表金宏集签订了《关于明治十五年京城事变的善后协定》（《济物浦条约》）及《日朝修好条规续约》。在《济物浦条约》中，朝鲜方面同意：（1）二十日内捕获凶手，严究巨魁从重惩办；（2）优礼厚葬被害的日本官员；（3）对受害者家属和负伤人员偿付五万日元；（4）对日本所受损失及出兵费用赔

---

① 原书脱"及井上馨等"五字，兹补上，见《适可斋纪言纪行》卷6。——译者

② 按：应为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第39页。——译者

偿五十万日元，在五年内分期偿付；(5)同意日本驻兵警卫日本公使馆；(6)特派大员道歉。在《续约》上规定：(1)扩大在釜山、元山和仁川的旅游区域，一年以后开放杨花津；(2)允许日本领事及其他人员旅游内地。

《济物浦条约》谈判过程中的问题焦点在于是否同意“赔偿军费”和驻兵“警卫”公使馆。朝鲜政府认为，把贴补出兵费说成赔偿不妥当，侵犯国家主权，表示反对；对于驻兵“警卫”问题，也主张法办凶手后应即撤退。但是，花房态度强硬，坚不让步，最后规定“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作不要警备，不妨撤兵”。① 撤兵仍然规定由日本来断定。这样，日本便由于缔结《济物浦条约》而首次获得了在国外驻兵的权利。这是日军具体地入侵大陆的第一步，它成为日后干涉朝鲜内政的武力，侵犯了朝鲜的主权。

福泽谕吉在9月4日的《时事新报》上评论《济物浦条约》的缔结时指出：这件事表明日本外交官的机敏练达并不逊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外交官，兴高采烈地说：“只能赞扬不已”。指导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9月5日—6日）也赞不绝口，说花房公使的谈判是“重演”了外国使臣曾施加于德川政权的手段，“足以向全世界显示其技巧之高超”。但是，樱鸣社的小野梓虽然同属自由民权派，却在10月14日的演说中指出：日本对朝鲜的威压只能使清帝国对日本更加疑虑重重，招致朝鲜的对日怨恨，并批评说，这是丧失日清韩联合起来对抗西欧的可能性的干法，他极力主张日本应该从亚洲全局出发，立即研究和解对策。②

124

十六　壬午兵变的影响

小野梓的忧虑之论果然言中了。在清政府内部，对日强硬论

① 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19页。——译者

② 小野梓：《东洋论策》，1885年，第43页。

增强起来。特别是高级官员张佩纶，他强调日本的威胁比西欧的危险更为紧迫，必须迅速训练陆海军，征伐日本，并奏陈《朝鲜善后六事》①，倡议为了维持朝鲜作为藩属，必须整顿朝鲜政府的外交体制，在清帝国指导下重建军队，使日军撤出朝鲜，购入军舰加强仁川的防备，此外还必须在奉天②和永兴湾上建立军事设施。但是，李鸿章认为最好是以恫吓来达到目的，因此，主张一面扩大海军，一面加强对朝鲜的统治，而拒绝征伐日本。他在加速建设北洋水师的同时，对朝鲜：第一，决定令已派去的吴长庆军三千人长期驻屯朝鲜。日本的驻屯军是步兵一个大队（一千人），所以清帝国军能够压倒日军③；第二，命令马建忠同朝鲜缔结《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内容虽然是通商协定，但在条约上明文记载了宗属关系，并且宣布"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例"④，成为对清帝国极为有利的协定，并在汉城设立了中国人的居留地；第三，派李鸿章的亲信马建忠和德国人穆麟德(Möllendorf, P.G.)至朝鲜掌管通商、外交、海关制度；第四，赠朝鲜青铜炮十门、英制步枪一千支，并将别技军改编成清国式军队。通过这些措施，重新建立了过去近于有名无实的清韩宗属关系，清帝国的权威遍及朝鲜外交、内政的整个领域。

壬午兵变是亚洲发生的第一次反日暴动。日本巧妙地利用兵变，取得了驻兵权，从一个几年前还驻有外国军队的国家一变而为在外国驻兵的国家。这是日本的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大陆。清国企图进行还击，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增强其在朝鲜的力量，并

① 张佩纶，时为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该奏折收入《涧于集奏议》卷2，第63—65页；"六事"即：理商政、预兵权、救倭约、购师船、防奉天、争永兴。——译者

② 奉天：指今辽宁省地区。——译者

③ 《朝鲜驻扎军历史》，《日韩外交资料集成·别册》，1967年，岩南堂，第8页。

④ 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4，第37页。——译者

力图整顿并加强宗属关系。日本尽管获得了驻兵权，但其政治地位却从《江华岛条约》以来的独占状态大大地后退了。唯其如此，就更加激化了日清两国在朝鲜的对立，并与朝鲜政府内部的对立交织在一起，日趋激烈。在朝鲜政府内部，闵氏一派的“事大党”企图依靠清帝国来维持政权，“独立党”则企图靠日本援助来刷新内政外交，两派互相暗斗，产生了新的危机。

125

十七　壬午兵变后的日本

壬午兵变不仅对日本的朝鲜政策，而且对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发展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山县有朋此时已担任了为审议和修改法令而新设的参事院议长，他已经不单是一个军事专家了，但在壬午兵变后不久的 8 月 15 日却说：“欧洲各国距我国较远，痛痒之感并不急迫”，断定目前不存在来自欧洲各国的入侵的可能性，并指出：现在“我之欲以力一较强弱者”正在“紧邻之处”，日本的假想敌应该是清帝国。他还警告说，来自“我曾轻蔑之”清帝国的“外患”，在于彼“行将乘我之弊”的形势，同两年前《进邻邦兵备略表》之时已经不同，清帝国的威胁已发展成为具体的了。从以上的形势判断出发，山县强调：“坐待此种局面之到来，则我帝国将无人可以恃之以维持独立，无人可以与语富强”，极力主张必须加紧扩张军备。① 陆军当局在山县有朋指示下提出计划，要增设野战炮兵联队（相当于团——译者）及骑兵、工兵、辎重兵大队等特殊兵种，将过去镇台的步兵两个旅团改编、扩大为具备在大陆平原作战能力的野战师团。

9 月，右大臣岩仓具视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即便在这次朝鲜事变中，派遣军舰还十分困难，并说：“目前既已如此，待至他年清帝国舰队大体完备之日，我国如仍止于今日之状态，则将何以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 119 页。

备缓急，实属寒心之至”，强调扩大海军的迫切性。① 事实上，日本这时能用于实战的军舰只有铁甲舰扶桑号、钢架木皮舰金刚号和比叡号，以及建造中的木制舰海门号和天龙号，全都是二千吨以下的军舰。与此相比，清帝国除了快速巡洋舰超勇号、扬威号之外，正在建造七千五百吨的钢铁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而且即将竣工。海军卿川村纯义要求将过去原定二十年内建造六十艘的计划提前实现，改为八年内建造四十八艘。②

扩大海军所需的经费，计每年四百零二万日元，但1881年6月开始的年度总收入为六千六百八十一万日元，扣除国债利息和还本两千三百二十九万日元，尚余四千三百五十二万日元，其中陆海军经费已达百分之二十七即一千一百七十七万日元，要追加扩大军事预算是困难的。岩仓提出意见书指出：“要支付此项费用，除采取非常税收办法外，别无他策”，他虽然预想到“采取非常税收办法等于招惹人民之怨恨”，却认为：“然而只能如此，一时发出怨恨之声，亦不足深虑”③。山县也与岩仓意见相同。他预想到“增税之令一发，则喧喧嚣嚣，驳之、议之、攻讦之者将纷纷四起，一时天下为之骚然，此情此景盖属必然。”但他认为“若顾虑国内之物议而不能断然实行，则将只能坐待国家之灭亡”，表示决心压制舆论的反对，推行军备扩张。④

126

日本政府一面加紧推行增税和扩张军备，一面加紧决定对朝鲜的政策。10月，岩仓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献策，提出了关于朝鲜问题的三种可供抉择的方案。第一方案是同各国协议，决定朝鲜独立，以牵制清帝国；第二方案是同清帝国直接谈判，使之承认

① 《岩仓公实记》下卷，第910页，

② 《山本权兵卫和海军》，《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年，第283页。

③ 《岩仓公实记》下卷，第910—911页。

④ 《陆军省沿革史》，《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5页。

朝鲜独立；第三方案是对朝鲜政府进行工作，援助朝鲜独立。岩仓认为第二方案和第三方案将同清帝国发生纠纷，他希望当前应采取第一方案；井上外务卿则认为在决定之前有必要听取正在旅欧的伊藤博文参议的意见。伊藤回电说，应该“秘密”援助独立党来维护朝鲜，但内阁会议以军备不足和财政困难为理由，否定了伊藤的提议，采纳了岩仓的第一方案①。这样，当前对朝鲜的政策就决定为：避免同清帝国直接发生冲突，把各国利权导入朝鲜，同欧美合作，以摧毁清帝国对朝鲜的统治。

壬午兵变使民间舆论从民权论开始急剧转变为国权论。一向是民权运动右翼的玄洋社的成员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等人当兵变时策划组织义勇军，从民权论转变到国权论上来。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于 1882 年 5 月建立东洋社会党的樽井藤吉，也伙同熊本爱国社的成员，开始了日朝合并的活动。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登载了《政府应公开外交往来》（8 月 13 日）、《论专制政府不适于外交》（8 月 18 日）等评论，要求外交公开，要求尽早创立国会做为讨论外交的场所，并强调如能实现这些，外交就可得到国民的积极支持，就能够“张国权于海外，耀国威于异邦”。但“发扬国威”的内容则规定为，日本要成为“东洋之灯塔”，要把朝鲜作为“防备强俄之屏藩”；另一方面，又把“专制政府”和“朝廷官员”评价为“皆明治创业之功臣，王室之栋梁，国家之柱石”，是“企图巩固明治创业之基础”的。由此可见，只要一涉及外交的目标，政府同自由党之间的距离就消失殆尽了。

① 《世外井上公传》第 3 卷，《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8 年，第 493—495 页。

第四章　脱亚入欧

（1884—1891）

第一节　甲申政变

一　中法战争和日本

日本政府对亚洲的政策，至少在完成对清战备以前，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要同清政府保持妥协，又企图实现朝鲜独立。但是，要同清政府妥协，就必须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这就与另一个目的即维持朝鲜独立完全矛盾。壬午兵变后日本外交的特点，就在于明知这是个矛盾，却仍然要把这种政策实行下去。日本外交在对清妥协政策和朝鲜独立政策之间举棋不定，时而采取妥协政策，时而采取强硬政策。政府首脑的态度也并不全同。如果说井上馨外务卿是推行妥协政策，那么伊藤博文就可以说是倾向于朝鲜独立政策；负责军事的山县有朋虽然也支持强硬政策，但认为准备不充分，强调应该避免同清帝国发生冲突。

日本既然在亚洲政策方面摇摆于对清妥协和援助朝鲜独立之间，因而其朝鲜政策也就不稳定。1882年10月，（朝鲜）全权大臣兼修信使林泳孝一行访日时，日本政府给他们十七万日元的借款，其中包括五万日元抵付壬午兵变第一次赔款，另十二万日元同意用作独立党的经费。此外，还赠给朝鲜国王四百二十五枝步枪。但未想到次年1月，日本政府竟自动把公使警卫队从两个中队减为一个中队（二百人）；同年6月，独立党的金玉均为了整顿朝鲜政府的财政而想在日本募集三百万日元公债时，也是初而赞成，终则拒绝。

正当日本外交举棋不定之时，以法国侵略越南为契机，中法关系紧张起来，亚洲形势由此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1883年5月，法国成立了以茹费里(Ferry, J.)为总理的内阁。茹费里内阁一成立就企图以扩张海外领土来重振国威，召回驻清公使，放弃了过去的和平解决方案。法国议会决议支出五百五十万法郎的远征费，河内的法国军队也活跃起来。这个消息一传到日本，强硬论者就指出，法国对安南的关系和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完全一样，都是要摧毁中国的宗主权，认为这是日法联合夹击清帝国的最好机会。强硬论者中也有自由党人，他们认为清帝国是专制国家，而法国的政体则是自由主义，因而倾向于支持法国。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于6月13日推测，如果爆发中法战争，清帝国获胜，那么清帝国的"欲乘胜一雪外耻之心，必将迅速转向我国"，主张"如果万不得已，莫如与法国联合起来"。就在自由党部分成员中出现日法联合论的前后，6月22日，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旅欧视察(主要是访问法国)回国。他们便开始策划日法联合起来指使朝鲜独立党发动武装政变。

128

日法联合本是法国驻清公使宝海(Bourée, F.A.)早就对驻清公使榎本武扬鼓吹过的问题。但山县有朋于1883年6月指出，日本还没有对清挑起战争的军备，要求采取"和平稳妥之方针"①。正在欧洲调查宪法的参议伊藤博文则主张不可错过这个好机会，"应联法攻清"，但井上外务卿则断定，日法两国公开联合，将使清帝国的"怒焰"愈炽，虽然赞成法国的观点，却认为不可能实行②。

1884年6月，中法间的紧张局势由于在越南谅山发生的冲突③而演变为公开的战争。8月，法国东方舰队攻击福州的清帝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37—138页。

②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926页。

③ 谅山冲突：亦称"北黎冲突"，发生在1884年6月23日。北黎，中国当时称观音桥，在谅山之南。——译者

国舰队，并将其全部歼灭；10月起着手封锁台湾。清政府战败的消息使民间政客也激动起来。1884年7月，自由党员中江兆民和杉田定一等人发表了《国家盛衰取决于外交策略》的意见书，并前往中国，要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教授汉语。一同前往中国的樽井藤吉和和泉邦彦等人则与参谋本部部员小泽豁郎中尉、代理芝罘领事东次郎等，策谋趁清帝国的战败，在福州发动政变①。将要开始行动，参谋本部下令停止，此项计划因而未得实行而告吹，但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却把朝鲜独立党的政变计划加以具体化，9月，请求法国驻日公使西昂基厄维兹(Sienkiewicz, J.A.)提供借款一百万美元作为经费。日本政府得知此项计划后，参议伊藤博文就抢在自由党之前，命令他所控制的《汉城旬报》主编井上角五郎同金玉均、朴泳孝面议。休假回国的竹添进一郎公使也奉伊藤之意返回汉城。10月31日，竹添公使召集岛村外务书记官和井上角五郎说："我政府已决定攻打中国，对朝鲜也要伺机而动，为了博取人心，已决定将四十万美元赔款退还。"② 11月1日，竹添公使谒见国王，提出退还壬午兵变的赔款四十万美元，并赠送汽艇一艘、山炮两门。独立党认为日本已改变了对朝鲜的政策，乃着手实行政变。竹添公使看到这种形势，于11月12日提出甲乙两策，甲策为"煽动亲日派发动内乱"，乙策则为克制政策，请求本国选择决定。并在附言中强调，在朝鲜"如不使其对我怀抱恐惧之念，则将一事无成；为使其知支那不足惧，必须时时压制亲清派，使之不得抬头"。并汇报形势紧迫说，"今后亲清派如再得势，亲日派将陷于殊死之地，必将采取除奸之举"③。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汉城和东京间的邮件需要两周时间，因此，可以想象，此项重大请示可能

129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顾录》下，1926年，第317页。

② 田保桥洁，前引书，上卷，第924页。译者补注：所谓"退还"，当指壬午兵变赔款五十万美元中尚未偿付部分，免予偿付。

③ 田保桥洁，前引书，上卷，第930—931页。

约在11月26日左右到达东京，而当时驻清公使榎本武扬发出的一封机密信也到达了，政府得知法国要求清政府割让台湾[1]。与此同时，在彼得堡的驻俄公使花房义质提出《关于中法启衅处理台湾之方案》，认为如果法国占领台湾，琉球就濒于危险，因此，"应不使法国占领台湾，或不使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法国；若两者皆作不到，则只能由我占领台湾"，指出如果前两者都行不通，日本只好直接占领台湾，但这个时机"不求而至，现已成熟"[2]。

日本政府认为，朝鲜问题固然重要，但台湾一旦变成法国领土，就要夺去日本南进的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政府决心对台湾问题倾注全力，在11月28日答复竹添进一郎公使的请示中说，让亲日派（独立党）也实行政变的"甲策不妥当"。另一方面，政府又训令榎本公使，要他对清政府提议，为了防止丧失台湾，可向法国偿付赔款并出让铁道利权，在这个条件下，日本有意调停中法纠纷。榎本公使在向清政府提出这个建议时，提出警告说，如果清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提案，继续争执，终于把台湾割让给法国，则"须知此事对亚洲全局影响甚大"。但清政府反驳说，赔款和出让铁道利权，比丧去台湾危害更大，会谈就破裂了。

二　甲申政变

1884年12月4日，日本政府不同意竹添公使甲策的训令还未到达汉城。但已经勾结起来的日方和独立党在汉城断然发动了反对朝鲜政府的政变。当时，汉城正在举行庆祝邮政局开办的宴会，朝鲜政府的要人都出席了宴会。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岛村久和《汉城旬报》主编井上角五郎同独立党领袖锦陵尉、朴泳孝和负责交涉通商事务的总理帮办金玉均共同策划，决定以日本打手和留日学

130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17卷，第578—579页。

② 《秘书类纂·外交编》中卷，1934年，第183—186页。

生为骨干的行动队首先纵火焚烧国王的别宫，把因失火而惊慌奔往出事地点的（朝鲜）要人暗杀于邮政局外的路上，然后控制王宫。政变搞起来了，朴泳孝和金玉均请求国王要求日本公使保护。

竹添公使反对搞政变，认为“亲日派的激烈举动”如果失败了，就会断送朝鲜国“独立”的希望，因此，政变计划事前没有告诉他。但当（朝鲜）国王在政变压力下发出诏令时，他却率领三个小队的兵力闯进王宫，拥护国王，支持独立党政权的建立。独立党政权断绝了同清帝国的宗属关系，宣布独立，并宣布改革政府。但是，12月6日，经右议政沈舜泽请求，优势的清帝国军队为保护国王而开进王宫，日军退却，政变瓦解了。朝鲜民众对于日本公使干涉内政非常愤怒，袭击了公使馆。金玉均和朴泳孝逃亡日本，但扈从国王的朴泳孝的胞兄和留日学生却被杀害了。日本军人和官员死亡十名，还有三十名日本侨民也受牵连而牺牲。

朝鲜政变的消息使正在从民权论转向国权论的日本舆论一下子变成了坚决的国权论。自由党早在政变前不久的10月29日已经解散，但《自由新闻》仍继续发行，12月19日，该报鼓吹“要迅速出动充分兵力，占领朝鲜汉城”，现尚留存的该报最后一期12月27日的社论《必须把日军之武力显示于世界》一文强调，若出兵朝鲜以显示日军之勇猛，则欧美人敬畏日本，“修改条约等事将可轻易完成”，指出了亚洲政策同修改条约的关系。

福泽谕吉也在12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断然诉诸武力，迅速收拾局面”，还预想到如果在对清战争中获胜，则“将永被尊为东方之盟主”。1885年1月8日，东京公私立学校学生，在上野公园集会示威，把象征侮蔑清国的猪头插在竹竿上，游行示威之后，捣毁了孤守民权派据点、主张非战论的《朝野新闻》社。改进党领导人藤田茂吉、尾崎行雄和犬养毅联名向伊藤博文参议提出了强硬的意见书，要求“干预朝鲜内政，并设法吞并之”，

强调“今日欲以武力对付朝鲜，则不得不考虑同中国发生纠葛；然为国家计，同中国发生纠葛，乃吾等所最希望者”。3月，福泽重新发表了《脱亚论》的论文。福泽把日本国民的精神评为“脱亚洲之陋习，转向西洋之文明”，强调“我国与其踌躇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莫若脱其行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主张对亚洲各国“唯有效西洋人对待之方式处理之”。

但政府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太政官大书记官伊东巳代治指出，竹添公使不待朝鲜政府的照会，未得本国政府的训令，竟应131 国王的“私嘱”而轻率出兵，是超越了公使权限的。不过，伊东巳代治在具体行动方面也是强硬的，他认为全权公使的行动“无论招來致辱，皆政府之责”，因此，当前必须迅速派遣办事大臣处理善后，同时赶紧派遣陆海军，实现竹添公使的目的，即树立独立党的政权①。

但是，立即派陆海军有使日清关系彻底恶化之虞。榎本公使的中法调停方案虽被拒绝，但日本为了阻止法国占领台湾，仍在设法再次进行调停。法国议会在甲申政变爆发前不久，通过了追加军费一千六百万法郎和1885年前半期军费四千三百万法郎，茹费里首相在议会上宣称“将永久占领台湾”。这一事实表明，茹费里内阁决心扩大亚洲的殖民地，议会对此也是支持的。日本要阻止法国占领台湾，只有三种办法：使清帝国同意媾和；日本亲自占领台湾；日本参加中法战争，在媾和会议上取得发言权，以牵制法国。但是，日本占领台湾或参加中法战争都因准备不足而碍难实行。军部首脑也要求和平解决，因而阁议决定同朝鲜和清朝政府谈判和平解决。

井上馨外务卿亲自担任全权大使，主持这次交涉：1884年12

---

① 晨亭会（编）：《伯爵伊东巳代治》，上卷，1938年，第67—89页。

月 21 日，他领得对朝鲜和对清朝政府的两份全权委任状，在高岛鞆之助陆军中将及桦山资纪海军少将所率领的两个大队兵力护卫下，前往朝鲜。他在与朝鲜政府谈判时，也想和清政府代表进行谈判，“以防止将来在朝鲜发生有损两国友谊之事端”，但遭到清政府派至朝鲜的代表拒绝，理由是他只负有作为宗主国调查朝鲜内乱的使命，不能同日本全权代表进行会谈①。井上全权只好放弃同清朝政府的交涉，而开始同朝鲜谈判，方针是只求确认日本并无参与（政变）事件之责。谈判顺利达成协议，1885 年 1 月 9 日，井上馨回避了对日本追究责任，签订了以对遇难日侨及烧毁公使馆给予赔偿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明治十七年京城暴徒事件的日韩善后约定》（《汉城条约》）。

由于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朝鲜政府的交涉告一段落，但清军炮击日本公使事件及清军与朝鲜乱民杀害日本非战斗人员事件尚未解决。国内舆论十分瞩目于清帝国如何行动。伊藤博文参议认为有必要实现日清两国同时撤兵，但清政府究竟是否同意，很是个疑问。他设想，对清交涉如果“马虎”了事，政府就将“失掉军心、民心，即令不至发生内乱，亦将威信扫地，以至不能保持其尊严”，因而提议，还不如根本回避“谈判”。驻清公使榎本武扬根据他的观察，也认为清政府大概不会同意同时撤兵，却与伊藤参议相反，主张增派日军，占领朝鲜要地。政府认为，采取榎本公使的方针，则日清冲突必不可免，于是请求英国驻清公使巴夏礼从中斡旋，结果 132

① 译者按：此处史实与我国史料所载不符。查当时中国使臣吴大澂《朝日议约已竣，商办善后事宜折》内称：“前闻日本使臣井上馨屡告朝员以朝事议结，即当与中国理论，臣恐该使臣诡计多端，意在寻衅，若俟其启齿，再与争辩，未免多费唇舌，是以于二十三日突入议政府书示数条，……乃井上馨既与朝鲜立约完结，复遣书记官井上毅前来通问，仍谓臣无全权字样，不便来晤。……”（《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6 卷，第 44页。）

成功地取得清政府口头同意同时撤兵①。

1885 年 2 月 24 日，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被任命为全权大使；2 月 28 日，同参议兼农商务卿西乡从道、陆军少将野津道贯、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一起出发；4 月 3 日，开始同李鸿章会谈。经过五次会谈之后，于 4 月 18 日签订了《天津条约》②。《天津条约》约定：(1)两国军队从朝鲜撤退；(2)两国不再派遣军事教官；(3)两国有必要派兵到朝鲜时，必须事先互相通告。由此实现了日清两国在朝鲜的"权力平等"。6 月，日本政府罢免了竹添进一郎公使。这是变相地承认了对政变的责任。7 月 21 日，日清两国军队全部撤离。

三　围绕朝鲜的国际紧张局势

《汉城条约》签订后，朝鲜国王派密使请求俄国保护朝鲜并派遣军事教官训练军队。俄国同意国王的要求，但提出须以朝鲜北部要地永兴湾(拉查列夫港)的租借权作为代价，1885 年 4 月，拟定了第一次《俄朝密约》草案。日本得知俄国向朝鲜扩张的消息后，受到强烈的冲击。继俄国的冲击之后，又是英国的冲击。4 月 20 日，英国政府通知日本政府已占领足以控制对马海峡的要冲巨文岛。英国占领巨文岛，反映了因俄国占领阿富汗要地而加剧了的两国间的紧张局势。英国怀疑俄国入侵阿富汗之后，或许进而占领巨文岛，才抢先占领了它。

井上馨外务卿认为，英国舰队占据巨文岛是"予俄国插手朝鲜以最大良机"，绝望地说，其结果"日本近海将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殆不可保"③。事实上，俄国已经通告清政府，将对朝鲜半

① 田保桥洁，前引书，上卷，第 1075—1079 页。

② 天津条约：亦称"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译者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 18 卷，第 601 页。

岛所属的其他岛屿及海港实行占领。不仅如此，俄国为了对抗巨文岛基地，还策划占领对马，据说已经派遣舰队到对马近海进行测量①。《时事新报》（6月24日）在社论《对马之事不可忘》中重提幕府末期俄国舰队占据对马的事件，警告说已经出现对马遭受侵略的危机。

6月，井上馨外务卿认为，围绕朝鲜的国际紧张局势是“瓜分朝鲜”政策的开始，但他同甲申政变时的情况一样，认为日本的情况不允许采取强硬方针积极入侵，为防亚洲受“虎狼的侵袭”，他选择了同清政府妥协的道路。7月，他命令驻清公使榎本武扬向清政府提出《朝鲜办法八条》。这是默认清帝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提议以清政府为主导，把朝鲜置于日清两国共同保护之下，以抵抗俄国的入侵②。 133

想同清妥协的井上馨外务卿，甚至在朝鲜问题以外也贯彻了这种妥协政策。琉球问题仍然是日清两国争执的悬案。9月，冲绳县令西村舍三报请山县有朋内务卿在冲绳和台湾之间的无人岛钓鱼岛、久场岛和久米赤岛上树立标桩，以明确为日本领土。山县内务卿向井上外务卿征求意见，井上在答复中指出，这些岛屿接近清帝国，就是清帝国方面所说的钓鱼台③、黄尾屿和赤尾屿，树立标桩和着手开拓宜留待他日④。在清帝国计划架设汉城奉天间电线问题上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清帝国的计划与架设日朝海底电线条约是抵触的，但井上外务卿却指示说，日朝间条约的重点是架设汉城釜山间的一段，因此可以默认清帝国的要求。

但清政府对井上馨的妥协政策反而有了戒心，认为如果按照

① 矢野仁一：《满洲近代史》1941年，第154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1册，第357—360页。

③ 钓鱼台：即钓鱼岛。——译者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第574页。

《朝鲜办法八条》，日本和清国共同保护朝鲜，则清帝国的宗主权就将只是形式了。清政府反而企图利用日本的妥协态度，重新加强对朝鲜的统治权。清政府释放了大院君遣返回国，以牵制国王和闵派，并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也就是清政府驻在朝鲜的代表。袁世凯实际上则以朝鲜副国王①身分行使职权，尽管《天津条约》规定日清两国“权力平等”，但清政府在朝鲜的权力加强了，朝鲜的独立形成徒有其名了。

四　大陆作战的准备

不论对于甲申政变，或在来自英俄争霸的“瓜分朝鲜”危机之时，日本都因军备尚不充足，没能采取积极的对策。正因如此，扩张军备就成了紧急的课题。早在1885年3月，陆军聘请德国梅克尔（Meckel, Klemens Wilhelm Jacob）少校为陆军大学教官。在他任职三年之间，给予骨干军官很大影响，指导了陆军的建制和战略，确立了军令机关独立出来的德国式军制。

与梅克尔少校到任同时，1885年3月，参事院通过了设置陆海军联合审议的机构——国防会议。参事院以“当前东方形势并非太平无事，今后形势变幻莫测”作为设立国防会议的理由，强调“如今若不注意着手本国防务，则将祸生不测”。②

1885年5月，陆军决定设置监军，以保证在战争爆发时，能够立即率领由两个师团编成的军团③出征，又把补充常备军战争消耗的预备队以及常备军、预备队两者开赴战场后的第二线预备队都定为法制，这样，就把陆军改编成为能够参加正式国外战争的军

① 副国王：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行政机构中，都设置副职，派日本人充任，掌握实权。此处把袁世凯比作朝鲜副国王，正是此意。——译者

②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第22页。

③ 日本的军团、师团、旅团，分别相当于我国的军、师、旅。——译者

队。由于这一措施，实际兵力膨胀了一倍半。 134

海军为了适应大陆作战的需要，继上一年（即1884年）设立横须贺镇守府之后，又于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设军港。1886年5月，开始建设吴和佐世保两地作为军港，并规定吴为大陆作战的后方基地，佐世保为"最枢要之地"，把佐世保"扩大到专供出师准备之规模"，以准备对清战争。海军还制定了以八艘铁甲舰为主力的庞大扩军方案。当时是通货收缩末期，财政仍很困难，还需要靠公债来支付造舰费用，但仍然定下了目标，务在1894年前要拥有新的精锐舰队。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为了以严岛①、松岛②和桥立③，即日本三景命名的"三景舰"穿透清帝国北洋舰队定远级战舰的装甲，竟把口径三十二厘米的大炮装在只有四千二百吨的舰体上，使这些舰艇成了世界造舰史上罕见的奇型舰。这也是日本海军由于财政困难不能建造装甲战舰而苦心积虑的产物。

1885年11月，川村纯义海军卿提出，为了对抗英国占领巨文岛和俄国的南下政策，有必要租借朝鲜釜山港口的绝影岛。次年1月，日本政府租借绝影岛，建筑海军煤库。为了防卫对马岛，海军又于1885年建造了三艘水雷艇，配备在对马；1886年12月，又配备了对马警备队。以山县有朋内相为部长的临时炮台建筑部开始把对马筑成要塞，伊藤博文首相还和大山岩陆相一起视察了防卫情况，对风传俄国将占领对马作了戒备。

五　亚细亚主义

国民的舆论在甲申政变时曾不断鼓吹主战论，但不久，随着日

① 严岛：在广岛县西南部的广岛湾西部，以原始森林和严岛神社等闻名。——译者

② 松岛：指宫崎县中部松岛湾一带，有扇谷山、多闻山、富山、大高山等名山。——译者

③ 桥立：天桥立，简称桥立，在京都府北部宫津湾，是幽美的风景区。——译者

本从朝鲜撤退、英俄两国关系又围绕朝鲜问题愈形紧张，人们反而对国际间的危机感增强了。1885 年 10 月，柴四郎的小说《佳人之奇遇》出版，主题思想和文章体裁都迎合了潮流，立即成为畅销书，使民众间的国权思想更加活跃。《佳人之奇遇》指出，强国专事弱肉强食，俄国和德国恃其威势而骄横，英国和法国凭其狡黠而侵略亚洲，结果是，"亚洲北部被强俄所吞并，南方印度臣事于英王，安南隶属于法国，土耳其和清帝国亦颓靡不振，濒于灭亡"。柴四郎向读者呼吁："当今燃眉之急是，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自由党和自由民权运动全盛时期，民权小说曾盛行一时，自从《佳人之奇遇》这部最通俗的政治小说问世之后，国权小说便取而代之了。

在 1885 同一年，东洋学馆创始人之一樽井藤吉写了《大东合邦论》。书中说："白人之欲灭我黄人，其迹象已历历在目，我黄人若不取胜，即将成为白人之饵。"从这种现状认识出发，他指出："今我日人欲使南洋诸岛摆脱白人之束缚"，必须"合并朝鲜以防备俄国，结盟清国以分担其劳，否则非独立所能及"，呼吁亚细亚要联合起来。他的结论是，作为这个目的的手段，必须解决日朝纠纷，使朝鲜近代化，建立日朝平等合并的"大东国"，以共同防卫列强的侵略。书稿写成不久，樽井藤吉因受到由于朝鲜改革问题引起的大阪事件的株连，未能及时出版，直到 1893 年才得以发行。此书后经中国的改革论者梁启超翻印，据说销售达十万部。在朝鲜，《大东合邦论》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中国知日人士黄遵宪的《朝鲜策略》、美国人德尼的《清韩论》同为影响深远之书。

因朝鲜改革问题引起的大阪事件发生在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脱稿之时，是由自由党员大井宪太郎一派所策划的，于 1885 年 11 月被发觉，在大阪被检举，所以叫作"大阪事件"。他们对朝鲜独立党政变的失败感到愤怒，计划携带武器弹药大举渡海，推翻事

大党，使独立党掌握政权。他们的估计是，独立党一旦宣告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日清就可能发生战争；战争一起，既能唤起日本人的爱国心，也能实现内政的改革。

对大阪事件的镇压，表明政府决心不允许一切不符合政府政策的民间活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依然采取对清妥协的态度。然而，俄国在朝鲜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俄国公使韦贝(Waeber, K. I.)策谋拉拢受袁世凯压制的朝鲜国王及其亲属，把朝鲜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并进行了第二次俄朝密约的谈判。1886 年 8 月，袁世凯发觉俄国的阴谋，立即进行干涉，粉碎了密约，并计划废黜国王而拥立大院君之孙李埈镕。虽因担心俄国反对，未曾实行废黜，但这种决心，却使朝鲜国王及其亲属为之悚栗。此后八年间，经袁世凯发布的宗主国清政府的命令，就成为绝对权威了。

清帝国既对朝鲜施加压力，也对日本施加压力。1886 年 8 月，北洋舰队以定远、镇远等巨舰为首，列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发，来到长崎，向日本炫耀威力。冲绳县知事大迫贞清以为北洋舰队驶来长崎是为了交涉琉球归属问题，立即带领几十名警察赶回县里。偏巧清帝国水兵和日本警察在长崎发生了冲突，引起骚乱，双方共死十人，重伤八人，一时舆论沸腾，传出日清断绝邦交、清国军舰大举来袭等传说。参谋本部把驻清公使馆武官小泉正保大尉的报告送交外务省，用以牵制外务省。该报告说：“我国万一采取让步政策，则清帝国将作何感想？……恐将看作为威胁吓倒，苦于抑制，终于屈服，而愈助长其轻侮之念。”① 但是，井上馨外相却于 1887 年 2 月实行妥协：清帝国对日本受害者偿付一万五千五百日元抚恤金；而日本则对清帝国受害者偿付五万二千五百日元。日本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20 卷，第 569 页。

清帝国水兵在长崎同警察冲突的事件一结束，明治天皇便于3月14日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为充实海防，拨出内帑三十万日元。伊藤博文首相接受了天皇的海防赐金，在专供贵宾社交用的俱乐部鹿鸣馆召集官员，发表演说，呼吁一定要实现建设海国日本的理想，并要求地方有志之士捐出海防献金。半年之间，海防献金达到了二百零三万日元，海洋扩张热高涨起来。海洋扩张热又产生了南进论，志贺重昂写了《南洋时事》一书，介绍以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为中心的内南洋①的情况。在文学作品方面，以须藤南翠所写的海洋小说《旭章旗》为开端，小宫山天香的《冒险企业·联岛大王》和久松义典的《南溟伟迹》等以日本人雄飞南方为题材的小说陆续出版，日本人对南洋的兴趣大为高涨起来②。

第二节　鹿鸣馆外交

六　内阁制度和外交体制的充实

政府的扩充军备工作顺利开展，民间舆论开始转向为国权论。虽然舆论转向国权论是表明民权论改变了方向和自由民权运动遭到了挫折，但自由民权运动也从政府方面得到了创立国会的许诺，预定在1890年创立国会。政府已经着手制定创立国会必不可少的宪法，派伊藤博文前往欧洲，不久就将着手草拟宪法。1885年12月，政府为准备创立国会，改革了政府机构，废除了以前的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度。伊藤博文就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井上馨外务卿继续就任首届外务大臣。

---

① 内南洋：日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日本托管的地区称之为"内南洋"，称其他南洋群岛地区为外南洋。——译者

② 柳田泉：《海洋文学和南进思想》，《广播新书》第94种，1942年，第117页以下。

内阁制度的建立当然给外务省机构带来了变化。外务大臣的职责明确规定为"管理有关推行对外政策及保护我国对外贸易等事务，监督交际官及领事"，废除了过去大辅以下各官职，新设了次官以下各官职。在外务省的人事编制中，引人注目的是官房长官助理斋藤修一郎、调查局长兼翻译局长鸠山和夫、调查局次长助理栗野慎一郎和翻译局次长助理小村寿太郎等人。斋藤、鸠山和小村都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①的同期同学，文部省第一批留美学生，斋藤曾在波士顿大学、鸠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小村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栗野作为黑田藩②的留学生，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这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所谓"职业外交官"(career diplomat)在部内的作用提高了。1887年任用内田康哉和林权助等作为交际官试补(官名——译者)或外务省试补以后，出现了系统地采用帝国大学毕业生的倾向，1888年日置益、1889年松井庆四郎、1890年本野一郎和石井菊次郎、伊集院彦吉等分别从这个渠道进入外务省，承担了明治后期直到大正时期的日本外交工作③。到了1893年，制定了"外交官领事官考试制度"，此后便按这个制度的规定任用职业外交官。 137

七　井上外相的修改条约

外务卿时代的井上馨从1882年以来，屈服于英国的要求，在东京召开了各国联合的修改条约预备会，同各国代表进行了交涉；1884年7月，以预备会的最后结果为基础，制定了关于修改条约的备忘录，取得了各国大致同意的答复。同年11月，外务省调整了阵容，以外务省少书记官栗野慎一郎和外务大臣秘书官斋藤修

① 法科大学：后改称法学部。——译者
② 黑田藩：正式名为黑田庄，在今兵库县多可郡黑田町一带。——译者
③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卷，第198页。

一郎为核心，会同外务省法律顾问亨利·丹尼森(Denison, H. W.)着手草拟新条约草案。

新任外相的井上馨多次在意见书中阐明了日本政府对于起草新条约的方针。他列举列强在东亚的帝国主义活动，作为必须尽快修改条约的理由，强调为了对付这种形势，必须通过修改条约获得名副其实的独立。他力陈："欧美各国大肆扩张殖民政策，竞相插手东洋"，"此时我国若仍不能摆脱过去被束缚之地位，则于国家将来之兴衰，其关系决非浅鲜"①。这就是说，修改条约现在已经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其目的并不单是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日本的独立，而是要创造条件，以应付正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局势。因此，在修改的内容上也就必须倾注全力于收回最损害独立国权利的领事裁判权。井上批判了寺岛外务卿时代以收回税权为主的修改条约方针，指出收回税权"与治外法权对我国权之束缚相比，其轻重大小自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结论是："税权虽可置之不问，而法权则即使分寸亦必设法收回。"②

井上指出，如果把收回法权完成独立作为紧急课题的话，其办法"只有两个"。他说："即一靠兵力，二靠和平谈判，以撤销治外法权"，既然不能依靠兵力，就只能依靠谈判，那么，就必须使"泰西各国对我国抱有应该撤销治外法权之感情"。他的结论是，为此，一方面必须同意各国所盼望的开放内地，即给与外国人以在日本内地自由旅行、居住、占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的利权；另一方面，必须"一变攘夷锁国之感情"，并且"向西方文明发展，在亚洲建成一个西方文明国家的兄弟之邦"。井上外相的基本方针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同意开放内地，进而"改善文物制度，使我国地位接近西方各国"，然后，"以期将来挽回完全独立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390页。

② 同上书，第231—233页。

之国权。"①

但是，井上外相的方针却遭到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来自国内的一种反对意见是，开放内地是日本能够让给外国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没有平等条约的基础就这样打了出去，岂不要失去收回"完全独立国权"的保障？另一种意见是，在资本和技术上都占有优越地位的外国人一旦进入内地，则正在发展中的日本工商业马上就会在竞争中败给外国人，因此，从保护日本工商业的观点来说，开放内地为时过早。此外，许多对日贸易比重不大的国家对开放内地并不感到有多大利益，因此也认为以此为交换条件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时尚早。 138

井上馨外相采纳各国的反对意见，制定了修改条约方案，于1886 年 5 月 1 日，在东京召开了修改条约的各国联合会议。会上提出的修改条约方案包括三十四条，要点是：(1) 提高协定税率；(2)对外国人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违警罪之规定及普通刑法；(3)除现行条约规定的地区外，凡罚款三十日元以下、监禁十天以内，包括两者并课在内，以及以外国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中，其请求额在五百日元以下者，一律归日本审判机关管辖，亦即关于领事裁判权，仅仅收回轻微案件的审判权。收回这种部分税权和法权的代价是，在下关和四日市以及宫城县女川等地开放准许国人与外侨混合居住的"特定商港"；在特定商港中，以服从有关日本土地所有权的法令和审判管辖为条件，许可外国人占有不动产、经营工商业及在商港外五日里(二十公里)以内自由旅行；并制定外国人护照章程，承认商务以外、目的正当的内地旅行。这个条约草案并不是要实现收回全部国权，而只是要收回一部分，因此，为了日后再次重新修改，条约的有效期限很重要。经决定，在批准交换后的第十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大日本外交文书》第 2 卷，第332—336页。

一年，始可通告废除，通告一年后才能失效。然而，日本要通告废除是有限制的，会议规定，只有开放内地，而列国又同意其本国人民服从日本审判权时，日本始能通告废除。总之，日本不能自由废除。因此，领事裁判权的完全收回，至少推迟到十二年以后，而且十二年后也没有确实实现的保证。

由各国共同参加的会议方式，正如前述森有礼公使指出过的，造成各国联合起来压迫日本的结果，对日本不利。英国在对日贸易中占据首位，把持各国的联合，在制定了如此苛刻的原案之后，为了今后继续保持对日外交的主导权，认为尽管有或多或少于己不利之点，但从大局着眼，仍以促进修改条约为上策，便在 1886 年 6 月 15 日的第六次会议上态度一变，由英德两国联合提出了一个旨在以开放内地为条件，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审判管辖权条约。井上外相欣喜若狂地称赞英德代表的提议价值一百万日元。7 月 16 日，天皇接见英德公使，向已授予勋章的英国公使普伦基特(Plunkett, 139 F.R.)致谢说："幸赖贵国与德国政府之力，使得有排除阻碍我国与西洋各国交际障碍之望，朕甚满意，"并授予德国公使赫尔本(Helleben, T. von)勋一等旭日大绶章①。

然而，英德代表的共同提案，比起享有领事裁判权来，在某种意义上却具有更加侵害日本国权的内容。这就是它要求按照"西洋主义"制定司法组织和法典；要求把法典通知给外国政府；还要求聘用外国的审判官和检察官；在审理涉及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诉讼时，审判机构的法官中，外国人要占多数。而且法典不仅要通知外国，还附有一条解释，即"如不符合西洋主义，即视同违反条约中其他重要条款"②。这就等于把对法律的事先审议权交给了外

① 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功勋共分八等，即"勋一等"至"勋八等"。勋一等之上，还有最高的"大勋位"。大勋位授予菊花章颈饰和菊花大绶章；勋一等以下均授予旭日大绶章，但大小不同。——译者

② 《日本外交文书・明治年间追补》第 2 册，第 1247 页以下。

国。然而，这项内容却没有向国民公布。

八　鹿鸣馆外交

当修改条约会议以英德提案为基础而继续讨论时，1886 年 10 月，突然发生了对修改条约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搭载二十四名日本乘客的英国轮船诺曼顿号(Normanton)，从横滨驶向神户时，在纪州海面遇暴风而失事。按船舶章程规定，遇难时应首先营救乘客，但以英国人为首的三十名船员却抛下乘客自行逃脱，以至造成日本乘客全部死亡。英国领事馆的海事审判所对此却不加追究就宣告无罪。日本舆论大为愤激，立刻谱成《诺曼顿号沉没之歌》，剧场也把遇难事件编成戏剧上演。日本政府一面以兵库县知事的名义向神户领事裁判所提出控告，一面由外务省通知警察部门，要禁止该剧上演。神户领事裁判所仅对船长以过失致死罪判处监押三个月，并未对死者给予抚恤。领事裁判的弊害已是有目共睹了。

正在讨论中的裁判管辖权条约草案虽然规定二年后开放内地，同时取消领事裁判(东京、横滨和神户等居留地则是三年后)，但其条件却是，凡属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审判案件，不论日本人是被告还是原告，都必须接受外国人审判官占多数的审判机构的判决。现行条约规定，只有以外国人为被告、以日本人为原告时，日本人才必须服从领事裁判权；与此相比，以开放内地为代价所获得的好处未免太小了。但井上外相为了实现取消治外法权，仍然继续执行“笼络”政策。其典型事例就是鹿鸣馆的晚会。鹿鸣馆是招待外国高级官员的迎宾馆，于 1883 年 7 月建成，从那时起到 1887 年上半年，一直用作政府接待外宾的场所。其中当 1887 年 4 月、修改条约会议即将收场时，由伊藤首相主办化装舞会，参加者达四百人。山县有朋内相化装成奇兵队的样子，伊藤博文首相化装成威尼斯

贵族，三岛通庸警察总监化装成儿岛高德① 的样子，内大臣三条实美夫人打扮成乡下姑娘来助兴，真是"开天辟地未曾有过的热闹场面"，这一夜间的狂欢，"羡杀、笑杀、惊杀、恼杀了整个首都"②。

140

鹿鸣馆外交，既是为了大规模地收买各国外交官，也是官僚的放荡不羁。内阁法律顾问巴桑纳指出："当日本国外则权利削减，内则征收进步税，前途暗淡，势将沉沦于可悲境地时，东京都府却以大兴土木与宴会享太平之乐"，并宣称："余相信现在尚非奢侈之时，故各大臣之宴会一概谢绝"，批判了不顾民众疾苦而彻夜狂欢的政府首脑③。

鹿鸣馆时代，又称欧化时代。这是因为井上馨外相认为，要实现修改条约，就必须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从这种观点出发而推行积极的欧化政策。但是国民中间对于鹿鸣馆晚会上那种只学皮毛的欧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1887 年 2 月，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德富猪一郎创办《国民之友》，向当时的青年介绍新思想，影响很深。他在创刊号的门面文章《啊！ 国民之友诞生了！》中指出，日本现状的特征是"破坏性的时代终于过去，建设性的时代即将到来"，是"我国社会在冥冥之中发生转变"的时期，主张要把带有"贵族气味"的"欧化"转变为由平民来推动的近代化。在他看来，政府所推行的欧化是"但求外人满意，外人认为完备即可，对人民则毫不介意"；"宪法、法律愈完备则人民反而愈加丧失权利；社会愈改良则人民反而愈感痛苦"，是反人民的欧化。他指出，对于这种欧化，果"同胞人民竞相扩张其权利，增进其幸福"，由此而使政府"有感于内部之冲击更甚于外国之压力"，则真正的西洋化、近代化才有可能。他提出扩张人民权利和增进人民幸福的主张，同鹿鸣馆式的

① 儿岛高德：日本南北朝时代(十四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武将，大概是传说人物。——译者

② 内田鲁庵：《想起的人们》，1932 年，第 5 页。

③ 《有关修改条约的大日本外交文书》，第 2 卷，第 511 页。

近代化相对抗。德富苏峰大喝一声说："外交一事乃决定我国生死存亡之因素"，但"今日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①《国民之友》以新鲜的感情吸引了国民，反对欧化政策的呼声在国民中扩展开来。

九　反对井上修改条约的运动

《国民之友》批判了政府的媚外外交，但修改条约的方案依然遮掩在保密的面纱之下，批判必须由政府内部来进行。批判修改条约方案的第一炮首先由巴桑纳顾问打响了。他向井上外相和青木次官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接着向山田法相进行申诉，但未被接受。他认为宫内省图书头②井上毅对伊藤首相很有影响力，便于1887 年 5 月向井上毅进行申诉。他指出，修改条约方案虽然规定把涉及外国人的审判改由日本审判机构进行，但日本审判官之外还要聘用外籍审判官，而且规定外籍审判官占据多数，所以这种审判对日本人是不利的。他还强调说，日本人对造成屈辱性审判制度的日本政府的不满将甚于对外国人的怨恨，"政府将深受埋怨"。他还指出，修改条约方案规定要把法典通知给外国政府，外国公使则把这种通知解释为进行"审查"，结果则"日本立法权将受外国之束缚"③。巴桑纳的指摘涉及许多方面，6 月，他进而向伊藤首相提出意见书，建议把修改条约方案向国民公布出来，"莫如在舆论赞助之下，拒绝预定将进行的签字"；他警告说，如果不向国民公布，而把修改条约方案付诸实施，则国民之中难保不出现侮辱外国使节之人，"外国政府就将借口保护侨民、乘隙寻求干涉日本国权之

① 德富猪一郎：《苏峰文选》，1915 年，第 20，33—34 页。

② 宫内省图书头：宫内省图书寮的负责人，掌管宫内图书、书画、古玩等，战后与诸陵部合并，称为宫内厅书陵部。——译者

③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2 卷，第 508—510 页。

机，以至不无引起危及日本独立问题之虞"①。

接着，受到巴桑纳指责的山田显义法相对修改条约方案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西洋主义原则这个词，并无"一定之规"，终将由力量对比来决定，因此他担心引起"交战或外人干涉内政，终至不可言状"之后患，批判说采用这个方案乃"关系国家荣辱，决定安危之举"②。

山田显义法相的批评表明，政府内部也有反对意见，在政府内部还有一个人，即农商务大臣谷干城，也提出了反对意见。1887年6月，他游历欧洲归国，7月3日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了长篇意见书，强调修改条约的办法必须"前面赖舆论之声援"，"后面以军备为后盾"，造成"同欧洲强国对峙"之形势，主张条约的修改"必须改革现政府之组织，施行立宪公议之新政，然后始能断然实行"；而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援，他力陈"必须修改《新闻条令》，大大放宽集会条例，令世人自由议论，畅所欲言"。谷干城的意见书和巴桑纳的意见书都秘密出版，散布民间，掀起了民间的反对思潮。

1887年4月22日，修改条约会议通过了有关审判管辖的英德方案，但是，伊藤首相鉴于反对运动的高涨，决定会议暂停。7月18日，井上外相向参加修改条约会议的外国代表提出，下次会议延期到年底。接着，29日，日本政府通告，将在各项法律编制完毕之后，再开始谈判修改条约，会议无限延期。井上外相修改条约的交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谷干城的意见书极力主张，欲使修改条约取得成功，应扩张人民权利，排除专制。既然如此，井上馨的交涉虽然失败，问题并未结束。而且，井上外相依然留任，谷干城农商务相反而辞职了。于是，前自由党员召开会议，开展了表彰谷君名誉的运动，拥护谷干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0卷，第73—74页。

②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514页。

城。这种活动在当时就等于是一次示威运动。接着，板垣退助向政府提出了长篇意见书。这个意见书也立即秘密出版而流传起来。板垣的意见书把政府的内外政策看作一体，批判它是"对外极尽卑躬屈节，阿谀奉承；对内则示以严辞厉色，高压暴戾"。他指出，现在外交政策之所以"萎靡不振"，乃是"违抗社会进化，坚持专制政治"的结果。按照板垣的逻辑，反对修改条约的运动必须一变而为要求改革内政的运动，实际上运动也在向这种方向发展。1887年9月11日，星亨主办的《醒钟新闻》要求废止侮辱官员法，制订侮辱人民法，声称君主是人民的代表。接着，9月15日，该报又刊登了题为《革命不可怖》的评论，强调暴政之危害数倍于革命，并指出，以废除弊政为目的的革命，对于防止国家灭亡来说是必要的。反政府运动的声势与日俱增①。 142

政府企图用镇压和怀柔两种办法来分化反政府运动。9月11日，山县内相指示警察总监三岛通庸：要表面装作平安无事，暗中机动灵活地追查反政府运动的"隐秘"，先发制人。9月20日，又指示，可根据情况相机处理②。为了在镇压的同时进行笼络，政府预定由大隈重信接替井上馨任外相，其目的是要把改进党首领大隈拉进政府，分裂民党。大隈提出入阁的条件是，创立国会后八年内实行政党内阁制；把众议院议员的选举资格规定为缴纳国税十日元以下等等。伊藤首相觉察到大隈有意接任外相，乃于9月17日解除井上外相职务，自行兼任外相，预定将来由大隈接任。28日，伊藤首相召集地方长官训话说，把外交交给"人民公议"的意见是"立宪王国断然不能采纳"的，拒绝了公开外交的要求③。

反政府运动冲破政府对策的阻挠而继续发展。要求言论自

---

① 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下卷，1962年，有斐阁，第497—498页。

② 《三岛通庸文书》(国会图书馆藏)。

③ 《东京日日新闻》，1887年10月6日。

由、减轻地税、重振外交等“三大建议”，由各县陆续提出，集会、示威运动反复出现。在三岛警察总监所搜集的密报中，有的就说自由主义者中有人策谋政变，主张如不采纳建议，就“进行暗杀，杀死两、三个大臣，现内阁就会立即崩溃”①；又说星亨在 12 月 21 日发出指示，以本月 27 日为期，采取“最后手段”②。政府惊慌失措，于 26 日清晨发布《保安条例》，以妨碍治安为理由，把三百多人逐出东京。在警察厅的驱逐名单中，还包括有后藤象二郎和德富猪一 143 郎。这里可以看到那种要把凡是不盲从政府者统统驱逐出境的极其野蛮的架势，只是由于政府害怕民心激愤而未贸然批准。

保安条例的彻底镇压取得效果，1888 年 2 月，大隈就任了外相，4 月，由于宪法草案提交制宪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成立枢密院，作为讨论宪法草案的机构，伊藤首相乃辞去首相职务，亲自担任枢密院议长，并按照预定步骤让黑田清隆继任首相。黑田内阁事实上是伊藤内阁的继续，7 月，井上馨再次入阁，担任农商务相。

后藤象二郎虽然开展了大同团结运动，但这种在野党联盟已经和政府站到一个圈子里。不久，后藤追随大隈入阁，大同团结运动便烟消云散了。

第三节　大隈的修改条约和颁布宪法

十　大隈的修改条约

大隈重信于 1882 年 2 月就任外相。他专心致力于修改条约。制定宪法的枢密院会议从 6 月 18 日开幕，大隈只出席了一次会

---

① 《三岛通庸文书》。

② 伊藤仁太郎（谈）：《〈西哲梦物语〉秘密出版事件的真相》下，《明治文化》11 号，1928 年。

议。据说大隈认为制定宪法的功劳既归伊藤博文，那么他自己下定决心必须在修改条约方面立功劳，以对抗伊藤。

下定决心的大隈，以加藤高明秘书官为中心，动员了外务次官青木周藏和外务省顾问丹尼森以及莫斯（Mosse, A.）等省内博学之士，着手起草修改条约方案。大隈采取"强硬政略"作为修改条约的基本方针，要让外国人知道，执行现行条约、维持现行条约，对他们未必是有利的。

修改条约方案完成后，大隈于1888年11月26日，用分别和各国谈判的方式，开始交涉。大隈方案的特点是：（1）把裁判权条约和通商条约合并为友好通商条约；（2）在条文上贯彻平等原则；（3）提高协定关税率；（4）条约实行五年后，完全撤销治外法权；（5）最惠国条款是有条件的；（6）条约有效期为十二年，逾期无须预告，自行作废；同时，日本保留缔结新条约以完全恢复税权的可能性。作为在条文上贯彻平等原则的补偿而新给予对方国的好处则是：（1）开放内地；（2）在大审院①任用外籍审判官；（3）从实施条约之日起，两年以内，修改刑法、治罪法、民法、商法及诉讼法，予以公布；如果各种法典未能在两年以内修改完毕，那么，治外法权的撤销即须延期至实际修改并公布各种法典三年之后。关于任用外籍审判官和编制法典之事，不列入条文，而以两项声明书的形式公布之。

大隈方案与井上方案相比，在法权问题上，有所进步。治外法权的存在期间从十二年缩短为五年；外籍审判官的任用从十七年内任用审判官三十至四十名、检察官五至十一名改为十二年内仅仅任用审判官四名。井上方案是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均须由外籍审判官占多数的审判机构审判；大隈方案则仅限于外国人为被告 144

① 大审院：是战前日本的最高最后审判机构，相当于最高法院。——译者

时才如此处理。井上方案明确记载，编纂法典要依据“泰西的原则”，并有通告各国的义务；大隈方案则删去了这两条。井上方案把日本方面的让步载入条约本文；大隈方案为了贯彻条约上的平等原则，则避免载入条约本文。

大隈外相着手谈判修改条约后不久，1888 年 11 月 30 日，日本同另行谈判的墨西哥缔结了《日本国墨西哥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同墨西哥签订的这一条约，互不承认治外法权和税权的拘束，相互承认开放内地，是日本所缔结的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增强了大隈外相的信心。大隈乘势向美国公使哈伯特提议及早签订修改条约。美国决心同意日本政府的提议，于次年 1889 年 2 月，几乎未加任何更动，便在修改条约上签了字。但英国对大隈方案表示不满，要求均沾日本给予墨西哥的开放内地的特别优惠，大隈拒绝了。于是，英国与俄国、德国商妥，共同对付日本。

3 月 17 日《泰晤士报》(The Times)估计：“必须同日本自由交往的国家，终将不得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并且指出：“多数英国人认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①]，日本统治阶级已知道，英国为了在亚洲对抗俄国，有必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②]。但是英国政府态度仍然强硬，于 5 月间通告宣称：“英国政府不能默视日本对英国不利的见解”，大隈对此不加理睬[③]。6 月，德国在修改条约上签了字，8 月，俄国也签字了。于是英国终于让步，也在 8 月间大致达成协议。修改条约的夙愿，似乎眼看就要达到了。

这时，宪法已经由枢密院审议完毕，并于 1889 年 2 月 11 日纪

---

① 转引自 1889 年 4 月 26 日及 28 日的《时事新报》。

② 大隈侯八十五年史刊行会编：《大隈侯八十五年史》II，1926 年，第 115 页。

③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3 卷，第 506—508 页。

元节公布出去，这就发生了大隈方案中在大审院任用外籍审判官是否与宪法抵触的问题，大隈的修改条约交涉又碰到了预想不到的障碍。

十一　宪法和外交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大日本帝国的国家基本法，因此，在国家对外活动的外交方面也作了重要的规定。宪法起草人伊藤博文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之权力以君主之大权为中心，其他一切权利均由此而来”①。宪法的特征正是：在大权的名义下，对天皇赋予许多独裁权，而对称作“臣民”的人民，则不承认其基本权利，对于应该代表人民的国会，也未赋予实际权力。贵族院与代表人民的众议院相对立，并抑制众议院的权威；天皇的命令即敕令，特别是议会闭会期间以紧急为名而发布的紧急敕令，与国会制定的法律相对立而束缚议会的权力；另外，枢密院与议会对立，使议会的地位降低。宪法虽然创立了议会（国会），采用了立宪制度，作为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回答，但这种立宪制度只是极其表面的东西，宪法所制定的日本国家机构，本质上仍然是以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天皇制。

145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天皇行宣战、媾和并缔结各种条约。”这是作为天皇独裁权的“外交大权”，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时有过争论。寺岛宗则副议长指出，缔结有关贸易及国民负担的条约，必须以经国会批准为条件；进而主张，一切条约均须经国会审议。副岛种臣顾问官也主张，确定赔款和割让领土的媾和条约关系到人民的权利，因此必须经国会审议。伊藤博文议长则强调说：“外交方面之条约，专属于君权，绝不容议会置喙”，并声称“有关外国交

① 清水伸：《帝国宪法制定会议》，1940年，第119页。

涉之事，寸步不可让"①。

关于外交大权的规定使国会丧失监督外交的手段，从而助长了秘密外交。这就使国民蒙受着这种危险：于不知不觉之中被卷入战争；与国民生活利害攸关的条约，于不知不觉之中被强加于自己头上。

审议条约的机构不是国会，而是枢密院。枢密院的组织和权限由枢密院官制来规定，其第一条规定："枢密院乃天皇亲临咨询重要国务之处"，第六条在"召开会议、上奏意见并请求敕裁"项下，列有解释宪法及附属于宪法的法律，起草宪法的修改草案、重要敕令、新法律草案、有关现行法律的废除和修订的草案、供与各国谈判的条约、行政组织的计划等。后来改为"听候咨询，召开会议"，更加明确了它的权限。

枢密院的任务是在天皇咨询时，召开会议对咨询事项进行讨论，然后上奏意见，审议条约即其重要任务之一。枢密院除对天皇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是同国会、国民都不发生关系的特权机构。允许这种特权机构枢密院参与国家重要决策，正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国家机构的专制性格。后来，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批判枢密院这一机构说，它"居无责任之地位，牵制内阁，有时即使内阁已取得议会之信任，但由于枢密院反对也不得不辞职"，"阻碍国政之进行"。这是又一旁证，揭示了枢密院所体现的日本国家机构的专制性格②。

146 外交大权中，承认天皇有权缔结条约的同时，还承认天皇有权宣战，这样，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军队编制权和统帅权也就同外交紧紧联结在一起了。

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率海陆军"，把统率军队视为天皇

① 清水伸：《帝国宪法制定会议》，1940年，第200—205页。

② 美浓部达吉：《宪法逐条精义》，1927年，第554页。

的大权（军令大权）；第十二条规定："天皇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把编制军队视为天皇的大权（军政大权）。

关于统帅大权和编制大权，在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时也有所议论。草案原把统帅和编制写在同一条文之中，规定为"天皇统率陆海军，以敕令决定陆海军之编制"，敕令则由国务大臣副署，并由他负责。陆军省企图绝对排除其他机构插手军队事务。他们在拟订草案时，提出意见书，要求在平时和战时，凡有关军队建制和编组以及参谋本部、监军部官制等军事方面的敕令，一律称之为军令，并作为大元帅的亲宣命令[①]。对此，井上毅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把由国务大臣副署负责的敕令改为国务大臣不负责任的军令"，"其结果将减轻内阁大臣在军事方面的责任，违背宪法所规定的（内阁大臣）辅佐国务的精神，且今后有朝一日必将导致军队内部权限扩大而与内阁抗衡"。[②] 结果，宪法草案把编制大权明确规定为国务的一部分，陆海军的编制由敕令来决定。但是，争论仍未结束。大山陆相提议把草案中的"敕令"改为"御裁"。井上看到罗斯勒（Roesler, Karl Friedrich, H.）所提出的意见书《宪法草案意见概要》中说："陆海军编制应属天皇最高命令事项，故无需发布由内阁大臣副署之敕令"，就撤回了自己的意见。伊藤博文议长决定增设第十二条，明文规定了编制大权。以伊藤博文名义写成的《宪法义解》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官方注释书，其中说，编制大权"固须由责任大臣辅佐，但与帷幄军令一样，应属至尊之大权，无须议会之干涉"[③]。由此就把军事决定权同一般立法及行政事务明确区分开来。这违背了近代立宪政治中军事决定权均须从属于统治权的兵政合一原则，为双重外交提供了法律根据。

---

① 稻田正次，前引书，下卷，第385—389页。

② 《井上毅传》，《史料编》第2，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68年，第393页，617页。

③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岩波文库，1940年，第39页。

宪法中另一个与外交有关，特别是与当时修改条约有关的问题，是关于任用官吏的条文。宪法第十九条规定："日本臣民按照法律命令所定之资格，均得充任文武官吏及其他公职。"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解释为："须知，除依特殊规定者外，外国臣民不得享受此项权利。"① 按此规定，大隈修改条约方案中的任用外籍法官，就违反宪法。不仅如此，帝国宪法在第三十七条还规定："一切法律均须经帝国议会通过。"过去曾以约许任用外籍法官、约定编制法典，来换取修改条约，有了这条规定之后，对这种作法就不能不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其是否妥当了。

147

尽管国会的权力在宪法上受到很大束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在财产资格上受到很大限制，但国会的开创却为舆论的集中提供了新的场所。国会虽然软弱无力，但一旦有了它，却使日本外交迎来一个新的转机。

十二　反对大隈修改条约的运动

在审议宪法至颁布宪法期间，修改条约的交涉并未间断，仍在完全秘密之中进行着。国民中间，对于这种秘密主义的不满日渐增高。1888年年底在大阪出版的半月刊《经世评论》，估计宪法即将颁布，于1889年1月（第四期）载文评论说："我国外交向来一曰机密，二曰机密，三仍曰机密；举凡外交策略，均锁于外务大臣官房之中，仅此一端，今之大隈伯爵亦堪称为昔之井上伯爵之继承者"。国民连签订的新约的内容都无法得知。但当各国前后签字时，国民却以欢欣心情迎接了喜报。后来成为反对论核心的保守中立派杂志《保守新论》（1889年6月）在报道日德条约签字时欢呼修改条约之成功，指出："迎来今日之幸运，全凭强硬之力量，而强硬之力

① 伊藤博文：《宪法义解》，岩波文库，1940年，第48页。

量则全赖国民之气魄。”同样，保守派杂志《日本人》(1889 年 6 月)也刊登题为《条约修改即将完成，恭献颂辞于大隈伯爵》的论文说，大隈外相执行强硬政策的结果，将于 1890 年 2 月 11 日纪元节，同“公正之各国”实施“改正之条约”，对于“只身奋斗，完成大业”的大隈，大肆赞颂。

但是，随着修改条约内容的透露，形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陆羯南主编的报纸《日本》从 5 月底开始连载《〈泰晤士报〉关于修改条约之评论》一文，把 4 月 19 日《泰晤士报》所载社论全文译出。其大意是，该报认为英国保持治外法权既是对“日本的污辱”，同时也是阻碍英国对日贸易发展的障碍，日英交涉进展迟缓的原因在于英国外交部的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因此，最好是由首相亲自出马，迅速同意修改条约。问题在于《泰晤士报》这篇社论还介绍了新条约的“主旨大纲”，作为可以接受大隈方案的根据。社论特别指出，新条约的要点是预定聘用外籍法官和编订法典，认为“主旨确实是合理的”。6 月 5 日，《日本》社论《大隈伯爵之政略》一文，根据这个“大纲”，推测了大隈修改条约方案的内容，批评大隈方案“无非是以混合裁判的机构和西洋主义的法典为代价来换取治外法权”，攻击它同井上的方案大同小异。

《日本》的批判成了攻击大隈方案的导火线，末广铁肠主编的 148 《东京公论》和中江兆民主办的《东云新闻》等原自由党派的新闻杂志以及保守中立派的《保守新论》和三宅雪岭的《日本人》等保守派杂志一齐起来攻击大隈方案，说在日本法庭上聘用外国人为法官是违反宪法第十九条的。据尊皇奉佛大同团的机关报《大同新报》的归纳，政府派《东京日日新闻》曾指出，反对修改条约的人可分为几类，即以枢密院为中心的“宪法派”，元老院中反对内地杂居的“攘夷派”以及“攘改进党派”，并加解释说：“与其说攘改进党派是憎恶改进党，毋宁说它是因‘憎其人而及其物’，因而才反对改进党

拟欲实行的修改条约方针”，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同意修改条约，“如果这些人换个立场，说不定还会希望现在这样的修改”。反之，在赞成派方面则举出“迎合现任外务大臣意旨”的早稻田派和“虽属言不由衷”，但因大隈派“一再请求支援”而主张赞成论的“礼尚往来派”，而在“礼尚往来派”中，也有不少人曾经反对过井上外相的修改条约方案[①]。7月16日《日本》在社论《〈报知新闻〉[②]的修改条约论》中写道，反对大隈修改方案的声浪虽然四起，但因修改方案的内容秘而不宣，反对论只是在“真伪莫辨”的情况下，由于“意外地听到传说有损日本荣誉及利益”而发生的。

成为问题的任用外籍法官一事，来自伊藤首相临时兼任外务大臣时对德国公使和意大利公使许下的诺言[③]。大隈虽受这一诺言的拘束，但把任用外籍法官限制在大审院。大审院是“最高法院”，原则上不具体审理案件。再则井上的方案规定审判机构的审判用语是英语，新条约对此则未涉及；关于聘用外籍法官的资格，也一字未提，因而只要是“外国法律家”，日本政府就能“绝对自由决定”，选任任何人。英国外交部在3月6日向欧美各国提议采取共同步调反对大隈方案的《传阅抄件》中，把这一点与另外一点，即所拟法律并未保证符合西洋原则，也不拟正式通告（各国），一并强调作为反对大隈方案的理由[④]。

但是，6月21日，英国阁议决定同意日本修改条约，索耳兹伯里（Salisbury, Robert Arthur Tarbot Gascoingne Cecil）外相送来了共包括二十八条的修正案。从阁议提出的文件看来，英国所

① 稻生典太郎：《日本外交思想史论考》第2，小峰书店，1967年，第107—110页。

② 《报知新闻》：原为民权派改进党机关报，名为《邮便报知新闻》，改名《报知新闻》后，背景不详。——译者

③ 《青木周藏自传》，《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70年，第144页。

④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13页。

以同意了日本的要求，是因为德国已"屈服"于日本，并于6月11日签订了以大限方案为基础的条约。德国这种"中途变卦"，使英国的"地位显著削弱"；而且侨居日本的外国人都渴望日本开放内地，因而认为接受日本提案更为有利[①]。 149

但反对论也发展到日本政府内部。冷静地看来，从当时的日本国际地位和修改条约谈判的"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大限的方案是接近日本所能达到的限度的。反对论与其说是反对修改条约方案本身，不如说是出自对大限外相的反感。因修改条约有了进展而精神抖擞的大限，曾说过如下的豪言壮语："修改条约一旦成功，临到议会开会时，改进党将占有绝大多数之议席"，在许多阁僚中引起了恐惧和反感。据当时兵库县知事、后升任外务次官的林董观察，阁僚们"主要是讨厌（大限）伯爵在政府内部功成名就，至于修改条款的利害得失尚在其次，遂与后藤（象二郎）伯爵的大同团结运动里应外合，进行攻击。"[②] 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起初主张，聘用外籍法官固属违反宪法，但可通过让他们入日本国籍来避免违反宪法。但中途又变了卦，说聘用外国人为法官的"宣告书"违反宪法，所以只能停止修改条约，7月，终于为此提出了辞呈[③]。按照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的说法是，宪法第十九条的目的在于禁止以家庭出身作为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至于外国人能否被任用为日本官员，并不能根据这一条规定作出判断[④]。事实上，当时在递信局、船舶管理局的海事审判中，已有外国人在进行审判；后来，日俄战争后的保护韩国时代，日本的韩国统监府的审判

① 稻生典太郎：《关于〈极秘文书〉，日本的条约修改，1889年6月19日的文件》，见《中央大学纪要，史学科》，18号，1937年。

② 林董，前引书，第226—327页（译者注：327疑为227页之误）。

③ 《井上毅传》，《史料编》第2，第155，169—173页。

④ 美浓部达吉，前引书，第342—349页。

机构，按照官制规定，也曾任命韩国人为审判官。因此，认为任用外国人为日本审判机构的审判官就是违反宪法的说法，在宪法解释上，是未必妥当的①。但是，政府内部的违宪论却迅速传播到枢密院，枢密院的多数派也开始持违宪论观点了。

井上毅法制局长官提出辞呈后的8月2日，黑田内阁决定通知修改条约交涉的对手国：日本审判机构任用的外籍法官是指已归化了的日本人。违反宪法问题似乎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外交的保密主义，在于大隈外相对于舆论对外交政策施加的影响不加考虑的态度。违宪问题虽在形式上得到解决，舆论却并未就此平息。批判、责难大隈外交的运动仍在继续。政府内部也根本没有就此恢复统一。驻美公使陆奥宗光建议断然实行修改条约，说："扩张国权之类的空谈，不妨尽量加以压制"②。但舆论的反对却迫使伊藤枢密院议长于10月11日辞职。黑田内阁于15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了是坚持实行修改条约还是中止的问题，但没有作出决定，18日的阁议也没有作出结论。大隈重信外相在阁议上毫无所得，退席返回霞关外务省内的外相官邸。正当大隈所乘马车进入外务省正门的一刹那，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投掷的炸弹轰然爆炸。来岛以为暗杀成功而自杀。大隈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伤势很重，终于不得不切除右脚。21日，黑田内阁决定中止谈判，翌日，除了正在疗养的大隈之外，内阁成员全体辞职。并不象当时人们所想的那样，以为恐怖主义直接促进了外交政策的变更，但这件事成了导火线却是事实，造成了日本外交的不幸先例。这一事件表明，无视舆论已不可能取得外交的成功。暗杀大隈事件，就这一点说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50

---

① 田口卯吉：《修改条约论》（《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编》）1928年，第357页。美浓部达吉，前引书，第350页。

②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55页。

第四节　大陆政策的拟定

十三　青木外相的登场

大隈重信外相修改条约交涉遇挫，给日本外交以严重的打击。首先成为问题的是，日本提议并已由数国签字的条约，能否以日本国内情况为理由，单方面地加以废弃。一度辞职而被挽留的法制局长官井上毅推测，如果宣告废除条约，“英国政府将命令公使退出东京，或甚至派东洋舰队驶入东京，指令公使提出紧急的要求”，担心日本将被迫签订比大隈方案更加不利、也更加违反宪法的新条约。井上毅的结论是，那时国民将责难政府“轻举妄动”，政府将被“推翻”，而外交上的“颓势”将无法挽回①。

黑田内阁的内相山县有朋被指定为继任首相，他以对处理难局缺乏自信为托辞表示拒绝，并且批评同样拒绝继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是“好高务远，不顾后果”。1889 年 10 月 25 日，内大臣三条实美不得已出任临时首相，青木周藏外务次官代理外相。为了决定大隈外相修改条约中止后的善后措施方针，农商务相井上馨同枢密院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代理外相青木周藏共同起草了意见书《将来外交之政略》，于 12 月 10 日在阁议上通过。阁议根据意见书决定采取如下方针：第一，再次确认缔结平等条约的方针；第二，修改已签订的条约；第三，如果对方国家不同意修改，日本就采取拒绝批准已签订条约的强硬方针。阁议估计到各国将非难日本的方针，提出“意外的要求”或者“使用联合强制的手段”，决心“在不得已情况下，只能依靠正当防卫之方法”。阁议采用这一方针的理由是，断定：(1)任用外国法律家为大审院审判官违背“宪

① 《井上毅传》，《史料编》，第 2，第 174 页。

法之主旨”；（2）把约定公布法典作为撤销领事裁判权的代价，有“日后”束缚议会立法权之危险；（3）在领事裁判权继续存在的五年间许可全面开放内地，是违反“平等主义”的，因此只能限于内地通商，必须满足国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政府看到国民要求之强烈出乎意料，除此以外，无法压住反对运动，才采用了这种强硬的方针。

151

大隈外相对否定自己谈判成果的阁议决定心怀不满，于12月14日提出辞呈。青木周藏由代理外相升任外相；24日，三条实美内阁总辞职，同日，成立了山县有朋内阁。青木周藏留任外相。

青木周藏从1869年到德国留学，到1885年充任外务大辅以前，一直以代理公使和公使身分驻在德国，被公认为德国通。可能受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是一个国权主义者，头山满形容他是“西洋和东洋的杂种狗”。他是第一个地道的外务省出身而出任外相的人。

青木外相继大隈方案之后，为了重新决定进行修改条约的原则，于1890年2月8日，向阁议提出了《青木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在日本已建立立宪制度的今天，如果提出的方案“甚至难以取得议会的间接赞同”，就不可避免要遭到“欺罔他人之议”，因而只有下述两个方案可供抉择：第一，“无限延期”修改条约；第二，把“足以取得议会协助”的修改条约方案作为交涉的基本方案。由于第一方案现在已不能考虑，因而他极力主张必须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调和立法部门的各种异说”，“把新条约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排除于舆论范围之外”。新方案的“要点”是：（1）取消大审院任用外籍法官的约定；（2）撤销有关调查、编制和公布法律的条款；（3）撤销有关让外国人（在日本）占有不动产的约定；（4）关于给予外国人以同日本国民同样地位的问题，对此种权利规定若干限制，但强调（3）（4）两点并非国际条约上的规定，乃国家固有的权利。阁议同

意根据这个意见书着手修改条约的交涉，接着，枢密院也同意了①。

英国公使傅磊斯（Fraser, H.）认为青木备忘录否定过去的谈判过程，未奉指令，拒绝转达本国。但英国政府通过驻英公使河濑真孝接到了备忘录，并在答复中提出了原则上同意日本提案的方案。英国的方案中包括限制协定关税率等，对日本有许多不利之点，阁内也有人认为"为将来国家得失计，不胜忧虑"，但青木外相却自夸说："我方要求无一未被接受。"②

文相榎本武扬过去曾从强权政治的现场学习强权政治，是在日本外交政策上采用强权政治的划时代人物。他得知俄国已经着手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后，就预测到整个亚洲政局将开始出现划时代的变化。他认为，英国对日本的修改条约方案表示积极对待的 152 态度，也是这种影响的表现。据他观察，英国对青木备忘录提出原则上同意的方案这种"几乎出乎意料之结果"，与其说是由于青木外相的手腕，不如说是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全局近况"，使英国有所"深省"的结果③。

青木周藏外相自己也认为，铺建西伯利亚铁路计划，其效果等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实际增加了强大兵力，预计俄国不久将占领朝鲜各港口。他发现日英两国对俄国的动向具有共同的利害④。

十四　"外交政略论"和"东亚各国之权衡"

1889 年 12 月 24 日成立的山县内阁，对外务期完成修改条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3 卷，第 632—636 页。

② 《秘书类纂·外交编》，中卷，第 594 页。

③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3 卷，第 778 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 23 卷，第 539 页。

约，同时确定向朝鲜扩张的政策；对内则作为面临国会的第一届内阁，准备对民党的攻击进行抗争。

1890年2月11日，山县内阁纪念皇纪2550年纪元节[①]，制定了金鵄勋章[②]，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驻日俄国公使什维奇(Schewitch, Dimitry)为此询问青木，目前日本并无敌国，也就不存在同别国开战的形势，有什么必要制定武功勋章？他警告说，日本政府似乎对俄国的朝鲜政策采取反对的方针，“不至于轻举妄动，以俄为敌吧”，并附带声明，俄国政府反对日本占有整个朝鲜[③]。制定金鵄勋章，就这样被视为日本着手准备正式对外战争的例证。

山县首相的意见书《外交政略论》清楚表明事实正是如此。1890年3月，他感到有必要统一内阁成员的思想，乃将《外交政略论》连同1888年草拟的《军事意见书》一起在阁僚中传阅。

《军事意见书》论述说，由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等的建设，运输通讯手段发展了，使欧洲更便于侵略亚洲，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在东亚必然对立，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亦即亚洲“掀起轩然大波之日”。山县强调说，为了对付这种危机，并“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就必须把“充实兵备”作为“最大的紧急任务”[④]。

《外交政略论》继承了《军事意见书》的精神，在表示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侧，又设想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

153

① 纪元节：明治五年(1872)日本统治集团把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即公元前六百六十年，定为建国年；把所谓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即二月十一日定为纪元节。实际上，神武天皇并无其人，其目的是为了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战后曾一度废除，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恢复，改称建国纪念日。——译者

② 金鵄：传说神武天皇东征大和地方时，曾有金黄色的鵄鸟落在他的弓弦上保护他。这也是日本统治阶级编造的神话。——译者

③ 《青木周藏自传》，第247页。

④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7，185页。

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并且断言：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若不能保卫利益线，则该国“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山县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他极力主张，为了在英俄抗争的漩涡中保卫朝鲜，就要与英德两国在“东洋共同利益之范围内进行联合”，并联络清国，成为朝鲜的“共同保护者”，同时强调，在内政方面，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和鼓吹爱国主义教育①。

5月间，山县有朋为了把这个意见书的内容付诸实施，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他计划发布《教育敕语》，作为鼓吹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为此，撤换了反对这个计划的榎本武扬文相，而命令接任的芳川显正准备发布《教育敕语》。这种改组也波及到其他职位，即任命桦山资纪为海相，要他研究扩张海军；把农商务相岩村通俊安置到宫中顾问官这一闲职上去，而命驻美公使陆奥宗光继任。陆奥宗光的入阁本来不是山县的意图，而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为了牵制山县派的青木周藏外相而提出来的；虽然如此，陆奥宗光却与递信相后藤象二郎共同负责操纵政党，准备应付即将开幕的国会。

为了把外交方针确定下来，青木外相将题为《东亚列国之权衡》的意见书交给阁僚传阅。这个意见书接受了山县首相两个意见书的观点，强调俄国远东政策带来的朝鲜危机，极力主张日清两国结盟把俄国赶出西伯利亚，并把朝鲜、满洲以及勒拿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必要性。青木还估计近期欧洲可能发生战乱，要求乘战乱之机驱逐俄国；而在此之前，则把亚洲大陆变成日本的市场，同时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政策”，实际上把朝鲜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6—200页。

置于日本保护之下。尽管山县内阁具有前述倾向，内阁成员（除后藤递信相外）对于这种意见也都表示反对。青木把这个意见书送交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和陆军次官桂太郎，唤起他们的注意①。

青木外相的意图是，乘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在整个亚洲形势中所引起的变动，“侪身于列强之中，参与彼等共同之事务，试行奋力之奔走经营”，以使世界公认日本为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员，并借以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对他来说，修改条约和入侵大陆是表里一体的事业②。

1890 年 7 月 1 日，举行第一次大选。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核心的反政府派，以“休养民力”、“减轻地税”为口号，赢得了全部三百议席中的一百七十议席。有选举权的百分之九十七都是以占有土地取得选民资格的，呼吁要求减轻地税，就是为了争取这些人的选票。当选的议员中有百分之六十出身于地主阶级，因而议会浓厚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民党，要求山县内阁交出政权。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指出：山县内阁应采取的上策是漂漂亮亮地办好手续，将政权让给反政府派（民党）；中策是在议会中通过辩论争取多数派；下策是死守孤营③。德富苏峰所谓的死守孤营，其策略就是内阁超然处于政党之外，以镇压和拉拢来瓦解民党，简称为“超然主义”。德富苏峰的估计是，超然主义与其说是下策，还不如说是极为失策，因为民党势力与日俱增，而内阁却得不到执政党的援兵，只能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然而，山县却采用了下策。

10 月 30 日，山县内阁发布了芳川显正文相所准备的《关于教育的敕语》。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一届国会。12 月 6 日，山县首相

154

① 《青木周藏自传》，第 109 页。

② 同上。

③ 德富苏峰，前引书，第 130 页。

首次在国会上作了施政方针的演说。他强调为了“国家独立和自卫”，“仅只防守主权线决不可谓完备。必须保护利益线”，并指出，预算支出大部分是“陆海军经费”，但这确实是不得不然。政府所提出的预算中，争议最大的是海军扩张费。海军主张必须把日本舰队扩大到与清帝国舰队相匹敌的规模，要求今后二十年内以六艘战舰和六艘巡洋舰为基干，造舰二十三万吨。但是，“考虑到民力”乃将计划减半，改为计划造舰十二万吨，除去现有的和正在建造的军舰五万吨，要求拨给七万吨的造舰预算。但是，山县内阁生怕刺激民党，把此项预算又压缩了三分之二。海军对此反驳说，如果这样，十年之后，即1900年，能够到外洋航行的舰艇只能保有五万吨。但山县仍未同意海军的主张。

对于这个预算案，民党要求再削减百分之十。他们向高唱超然主义的山县内阁要求，由议会的多数党来组织内阁，实行向国民负责的责任内阁制，认为当前的任务不是扩充军备，而是节减政费，以休养民力，特别是减轻地税；在外交上则以实现平等外交为目标。他们企图以议会的预算审议权为武器来打开突破口，痛击山县内阁。自由党的杉田定一在演说中强调：“至于目前陆海军的问题，不完备之处要完备，应扩充的要扩充”，但“在今年，无论如何，节减经费、减轻地税是舆论之一大问题”，并提出了在岁出总额八千三百三十二万余日元中，削减包括官员薪俸在内的八百八十八万余日元的方案。政府以解散议会的恫吓和收买拉拢来瓦解民党，而对于在天皇大权保护伞下的外交方针，则拒绝议会控制。自由党新井章吾等人提出了关于修改条约经过和将来方针的质问书，政府则对此断然回答说，修改条约方针和协议事项皆属外交机密，没有必要向议会报告，说完便不顾议员气势汹汹的质问，离开会场，扬长而去。但是，山县内阁在同民党的抗争中已经筋疲力竭，好不容易地度过了第一届议会，旋即于1891年5月总辞职。155

萨摩派的松方正义代替长州派组织了内阁。

十五　大津事件

前届内阁勉强通过了预算，预算中具体化的海军扩充计划却是对民力和民党有所顾忌的谨慎计划。但是对外问题却毫不留情地压到日本的头上来，而正是对外问题迫使海军非扩张不可。主持报纸《日本》的陆羯南后来回顾1891年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时，说它"确实是我国对东洋问题开始进行活动的时代"①。1891年3月，俄国皇帝正式宣布西伯利亚铁路开工。日本国民受到了新的冲击。在自由党初期，与马场辰猪齐名的政论家大石正巳把西伯利亚铁路看作是"席卷日清韩，逐英国于太平洋之外，以囊括亚洲之武器"，并预测铁路完工之日，"不动一兵，不派一舰，即可把朝鲜划入该国版图之中"。他警告，日本的"国家之寿命"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延长而缩短②。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西伯利亚铁路一旦建成，过去受阻于中亚细亚的森林、而靠海路向东亚补充物资的俄国，就可以直接从欧俄向东亚输送物资和军队。英国一向把通向东亚的道路置于其制海权控制之下，限制俄国和德国在亚洲的活动，保持着对亚洲的主导权，一旦西伯利亚铁路建成，英国在亚洲的这种优越地位就有动摇的危险。这就可能使英俄两国在从小亚细亚直到东亚细亚的全线上的对抗激化起来。英俄在东亚的对抗使日本人有一种将被直接卷入战火的恐怖感。俄国的这种威胁，由于俄国皇太子的访日而直接出现在日本国民面前。俄国皇太子(后来的尼古拉二世)为了游历东洋各地并参加预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的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第一工区开工仪式，顺路游历日

① 《陆羯南全集》第4卷，三铃书房，1970年，第664页。

② 大石正巳：《日本之二大政策》，1892年，第174页。

本，于1891年4月27日抵达长崎。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情是复杂的。《国民之友》（4月3日）提出疑问，说："俄皇太子之行果为单纯之游览旅行乎，抑为军事考察之旅行乎？"指出这件事应"使我国民从酣睡中惊醒"。警察津田三藏认为，"俄国皇太子怀霸占我日本国之野心，考察近江等地之地理，以便他日前来霸占"，于5月11日借警卫的机会，刺伤了在大津游历的俄国皇太子①。伊藤博文等政府要人和松方正义首相等阁僚们惊慌失措，好象俄国远东舰队眼看就要驶进东京湾。法相山田显义也惊慌不已地说："俄国决不至于要求九州来作赔偿，但难保不要求千岛，真是一大国难。"松方内阁竭力赔礼道歉，明治天皇亲自到京都探望了俄国皇太子。 156

事件发生之前，青木周藏外相在同俄国公使研究一般警卫问题时曾约定，对皇太子的犯罪，将按对日本皇室犯罪论处。于是，内阁打算判处津田死刑以表歉意，向司法部施加了压力②。

但是，大审院长儿岛惟谦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决心维护司法独立，对政府的压力进行了抵抗。青木外相恳求俄国公使说："本想对凶犯津田处以死刑，但苦于法无明文。请贵公使提出死刑要求，这样就可以外交上的必要为借口执行死刑。"并写成正式文件交给了俄国公使③。

大审院对照法律条文，未按对皇室犯罪论处，而是按照谋杀未遂罪，判处津田无期徒刑。司法权的独立得以维护了，但大津事件的经过却说明，政府表面虽然主张强硬论，而内心则是何等害怕俄国。青木周藏外相和西乡从道内相为大津事件引咎辞职，修改条约的交涉再次中断。

---

① 尾佐竹猛：《湖南事件》，岩波新书，1951年，岩波书店，第108页。

② 儿岛惟谦：《大津事件日志》，《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71年，第35页。

③ 林董，前引书，第247页。

十六　对外强硬论和对外恐怖感

津田三藏的行刺是与对外强硬论互为表里的对外恐怖感的表现。后来这两者也一再表现成互为表里。

对外强硬论愈趋强硬。西伯利亚铁路动工的1891年5月，副岛种臣、近卫笃麿和陆羯南等国权主义者组织了东邦协会。曾经阴谋改革朝鲜的大井宪太郎组成了东洋俱乐部。他在政谈会上说："若不压制中国之傲慢无礼，则无法进行谈判"，并提问说："岂能与中国、朝鲜者流共论东洋之政略，并一一听从之耶？"他认为不能这样，应该"由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而立于统帅之地位"，即打倒清国和朝鲜而称霸东洋①。6月，一个不出名的青年稻垣满二郎出版了《东方策》第一编，立即成了畅销书。《东方策》警告说，俄国必将侵入满洲、蒙古，钻进太平洋，使东洋各国陷于危境。7月，《日本》连续三天刊载了《读〈东方策〉》的社论，认为"英俄以兵战，英美以商战，此三国之竞争为经，而法、德两国与此三国之离合则为纬"，试问"日清两国身为此角逐场之主人，应何以自处？"并且警告说："东洋各国行将成为少数强国之角逐场。"

在对外强硬论的背面，又有对外恐怖论。7月，清帝国的北洋舰队再度来日。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则是为了显示军威，从下关经过神户驶入横滨港，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贵、众两院议员和新闻记者，炫耀它的威容。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7月22日）上慨叹地说："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等，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国民一方面蔑视清国没有西洋化，另一方面对强大的中国舰队的威力又感到恐怖。当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而知道北洋舰

157

① 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的发展》，雄鸡社，1948年，第114页。

队"只不过是驴蒙虎皮"时，这种蔑视和恐怖的交错心情，就一下子变成清一色的蔑视了。但是，国民的舆论仍然摇摆在对外强硬论和对外恐怖论之间。9月，朝鲜政府发布了《防谷令》。《防谷令》是为了防止米、麦、大豆等因歉收而暴涨，禁止粮食出口的法令，但对于估计粮价飞涨而拼命抢购的日本投机商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打击。据说，元山的日本商人遭到十余万日元的损失。投机商人的活动加剧了朝鲜的反日运动，在济州岛和仁川连续发生了日本人和朝鲜人的斗殴事件。9月14日，《日本》报强硬地主张说："对于蔑视我政府，侮辱我人民之行为，吾人决不能置之不问。"

对外强硬论和对外恐怖论的交错，与政府和民党的论战纠缠在一起，前者要强制实行扩充军备，后者则主张休养民力。由于大津事件，松方内阁推迟了人事整顿，到5月底才进行改组，品川弥二郎就任内相，榎本武扬任外相，大木乔任任文相。海相桦山资纪和农商务相陆奥宗光留任。松方内阁的方针是继续执行前届内阁扩充海军的政策。7月8日，桦山海相重新计划在九年内建造一万一千吨级的铁甲舰四艘和巡洋舰六艘，向内阁会议提出了五千八百六十万日元的支出方案，获得通过。10月，榎本外相受到阁议决定扩充海军的鼓舞，把青木方案加以若干修改，作为甲案，连同废除条约的乙案一并向内阁会议提出，请求阁议选择其一。废除条约是青木周藏前外相于6月间向榎本武扬外相提出的，他指出，要把国际法所抽象承认的废除条约权变为实际的权利，就必须"扩充海陆军备和上下人心一致"。罗斯勒顾问也说，如果日本有决心与各国"以硝烟剑戟相见"，就保证可以通过废除条约而废除领事裁判权。榎本外相接受了青木和罗斯勒的献策，他指出，要想在一定年限内从现行条约"一跃而达到完整无缺的平等条约"，只有采取以军备为后盾的废除条约的手段。伊藤枢密院议长也决心"万不得已时则坚决废除"。内阁会议虽然未能作出结论，但政府的对外

政策显然逐渐趋于强硬[①]。但是，对于推行扩充军备和对外强硬政策却存在着巨大的阻力。这就是民党所提倡的休养民力论。民党反对的并不是扩充军备本身，而是采纳了选举的社会基础即地主阶层的要求，主张先休养民力，然后再在民党的主持下执行对外强硬政策。

11月21日，阁议对榎本外相的提案尚未作出决定，第二届议会召开，政府提出了以建造军舰、建筑炮台、设立钢铁厂为中心的、比前一年度增加六百五十万日元的预算案。在遭受经济恐慌打击的地主和上层自耕农民的鼓动下，民党重新整顿了在前届议会中被瓦解的队伍，再次以民力休养论来对抗政府。他们在预算案的审议中，削减了七百九十四万日元，包括建造军舰费在内。不仅如此，民党还揭发了海军内部的弊病，提出了进行根本改革的上奏案。桦山海相在盛怒之下，藩阀意识毕露，质问："今日保护国家安宁，维护四千万国民安全，是谁的功劳？"并慷慨激昂地说："维新以来，克服内外种种困难，使帝国一至于有今天，是谁的力量？岂不是世间所说萨长政府的力量？"[②] 这就是所谓的"蛮勇演说"。议会场上一片笑声，桦山则一本正经。激怒的民党否决了所有的重要法案。政府于12月25日解散了国会。第二次总选举于1892年2月15日举行，政府为了挽回颓势，对总选举进行干涉，警察到处驱逐民党选举人，腥风血雨遍及各地。尽管如此，民党还是胜利了。由于解散议会和总选举的混乱，榎本武扬外相的修改条约方案暂时被搁置起来。1892年3月，榎本外相、伊藤枢密院议长以及青木前外相三人会谈，决定"以甲案（对青木方案加以修改的方案）为基础，若对方不接受我方要求，则只好改为乙案（废除条约方案）"，

158

① 《有关修改条约的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804—843页。

②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卷，第1492页。

接着通过了内阁会议。但是，在5月召开的第三届特别议会上，松方内阁因干涉选举被追究责任，受到严重打击，阁内矛盾于是也暴露出来。7月，按照尾崎行雄的说法是，“宛如饿殍一样”地倒下了。榎本外相修改条约的设想也同松方内阁一起崩溃了。

159

第五章　日清战争[①]

（1892—1896）

第一节　修改条约

一　日本资本主义和大陆

宪法颁布了，国会建立了，在如何作出外交政策的抉择上，情况也和过去不同了。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的规模扩大了，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开始担负起新的任务。这时，日本的资本主义终于奠定了基础，开始走向稳步发展的阶段。日本外交政策开始直接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矛盾，也更加鲜明地显示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了。

当时日本的主要工业是缫丝业、织布业和纺织业。1892 年，这三个部门占全部工业投资的百分之五十七和雇佣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八。缫丝业和织布业的手工业成分仍然很重，堪称近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在这三个部门中仅有纺织业中的棉纺业一种。日本工业的核心是纤维工业，主要是棉纺业。棉纺业为了从国内市场驱除传统的手纺棉纱，在同外国棉纱的竞争中取胜，极力争取大幅度降价。为了降低成本，就必须使用低工资的劳动，同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因而棉纺业便把劳动报酬压低到最低限度，同时热中于引进新技术和提高生产率。从 1887 年到 1892 年的五年中，棉纺业的生产设备扩大到五倍，产量增加到九倍，生产率提高

---

① 日清战争，我国称中日甲午战争或甲午中日战争。——译者

到一点八倍，大体上达到了英国的技术水平。在价格方面，以当时一般生产的品种二十支纱来说，在1892年已经能够降低到进口纱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是惊人的技术进步，惊人的成长率，但这种成长进度却产生了种种矛盾。

首先是产量的急剧增加碰到了国内市场狭隘的障碍。早在1890年经济萧条时，纺纱卡特尔棉纺联合会就决定不计损益，一定要作到每年向清帝国和朝鲜输出三万件棉纱。而实际输出1890年不过三十一件，1892年不过一百零九件，根本无法靠出口来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开辟海外市场，对纺纱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一点已很明显。 160

希望每年出口三万件，实际却只能出口一百零九件，其原因在于：日本棉纱由于负担棉花运费、棉花进口税以及棉纱出口税等费用，其价格在上海比印度纱还要贵。纺织联合会乃尽力想法废除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及积极开展减轻棉花运费的海运竞争。对于废除棉花进口税，棉农表示反对，地主出身的议员支持棉农。这是因为棉花进口税保护着国内的棉花种植。1892年，废除棉花进口税的议案在众议院通过。但是产业资本足以影响政治的力量仅止于此。采取保护农业立场的贵族院却将上述议案束之高阁。为了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性，棉纺业本身虽然以压低工资和提高生产率为武器试图向大陆输出，但在数量上还很少，而纺织界的政治力量也很薄弱，还不足以决定日本的大陆政策。1892年，日本对华出口总额，包括香港在内，为一千九百六十五万日元，达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表明自1884年以来，八年之间已增加了大约三倍，但其中多系欧美工业品的再输出，贸易活动也几乎被清帝国商人所垄断。对朝鲜出口额，1892年达到一百四十一万日元，八年之间增加了大约三倍，但在出口总额中只占百分之一点九，况且日本商品在朝鲜进口总额中的比重，由于受清帝国商品的

排挤，有逐年下降之势。清帝国也好，朝鲜也好，在日本资本主义出口市场中的地位，姑不论其前途如何，从现实来看还很低，还没有成为决定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

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大陆的重要性首先不在于它是商品输出市场，而在于它是工业原料和食品的供给地。作为原料的棉花，由于日本原有的国产棉花不适于机器纺织，加上都是分散经营，不能大量进货，因而完全仰赖美国、印度和清帝国供应。但是美国和印度的纺织业是日本对清贸易的竞争对手，仰赖美棉和印度棉，运费成本昂贵，在价格上就不能同美国布和印度布竞争。日本纺织业看中了清帝国和朝鲜是个最好的原料供应地。1892年，从清帝国进口的棉花达到六百万日元，同砂糖并列为主要的进口物资。第一银行总经理涩泽荣一在1887年就计划在上海开设皮棉加工工厂，大阪纺织公司的山边丈夫在1889年也强调，日本的棉花原料“不能不求之于西邻支那”①。朝鲜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作为粮食供给地。纺织业之所以能自立，主要是靠日本工人的低工资。据1894年统计，名古屋纺织公司和三重纺织公司在名古屋所设工厂的纺织女工，平均工资还不到工厂所设工人宿舍的住宿费。大多数女工都靠这种低工资来负担“一家的生计”②。为了161 维持这种生计，无论如何也须进口廉价的朝鲜米和安南米。为了维持低工资而推行低米价政策，这不仅对日本资本主义，而且对日本当局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作为将来的出口市场，作为当前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地，日本当局对大陆，特别是对朝鲜，本已极为关心，而为了转移国民对低工资、低米价政策的不满，就正好向朝鲜进行扩张。资产阶级喉舌《时事新报》（1892年7月20日）写道：“我国当前之政略，应使人心转向外界，其方向则在朝鲜”，并要

① 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的历史分析》，潮流社，1949年，第118页。

② 《爱知县厅文书》（文部省史料馆藏）。

求政府“以英明之决断，定朝鲜之政略”使国民“无暇思及其它”。

二　超然主义和民党

1892年8月，第二次伊藤内阁继松方内阁而成立，陆奥宗光就任外相。伊藤首相认为，自创设国会以来，政府已遭到国会三次攻势，“近来统治纲纪废弛，以目前形势推之，不出两三年，政权将崩溃而不可收拾”，乃决心拥护超然主义，进行“明治政府之最后一战”，并网罗元勋入阁①。但是，敌方不仅是民党。英国和俄国的动向也是日本政府一刻都不能忘记的心腹之患。俄国已在日本海彼岸与日本隔海相望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正式建设要塞；11月常驻此处的俄国远东舰队以避冬为名，开进了长崎港，使日本国民对俄国的威胁有切肤之感。

面临第四届议会的伊藤首相，受到这种威胁，为了取得对扩张海军的赞同，与自由党板垣退助等秘密会晤于芝区红叶馆。席间，伊藤首相“原则上”赞同竹内纲所提议的政府和自由党合作，将来组织政党内阁。② 自由党被伊藤首相说服，在《党报》25号（11月25日）上公布了建造十万吨军舰的方针；接着，又在28号（1893年1月1日）的《党报》上宣布，即将召开的第四届议会将“制定扩充海军的大方针”。

虽然自由党把扩充海军做为党的决议，领导集团打算与政府妥协，但一般党员和自由党的选民基础——地主及中农阶层都希望实行减轻地税，并对领导集团施加压力。当时的日本，不论是扩充军备还是发展资本主义，都只能靠对农民的掠夺，而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土地税。因此，自由党赞成扩充军备就是自我矛盾。敢于采取这种自我矛盾立场的自由党，在基层的压力下，发表声明

① 《伊藤博文传》中册，1940年，第856页。

② 三宅雪岭：《同时代史》第二卷，岩波书店，1950年，第477—478页。

说，现政府行事徇私，所以要同它进行斗争。自由党员、预算委员长河野广中于1893年1月说："并非不以建造军舰为急务，今日必须充实国防亦不待多言。"只是不能容忍"海军内部之积弊"。民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削减了建造军舰的全部经费和官员的薪金。议会通过了弹劾内阁的上奏案，但政府却要求天皇裁决，或者解散众议院，或者敕令民党同政府妥协。2月10日，天皇下达敕谕称："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再次决定六年间每年从内帑中拨发三十万日元，并命令在同一期间内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缴纳国库，用以补充造舰费，并要求各方"齐心协力"。民党屈服于天皇大权，接受了政府的修改预算案，对于有争议的造舰费，也同意延续七年。当时批准建造的两艘战舰就是后来日俄战争中的六·六舰队最初的两艘。由于（民党）这种轻易的屈服，政府和政党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局面。

162

自由党夸称，"民党"眼中只有君国，并扬言它是"海军的密友"。自由党干部江原素六在该党主办的演说会上吹嘘说，我国军备一旦完成，"若能一下子把英国远东舰队打垮了，则中国和朝鲜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发抖"，并极力主张修改条约"也要凭靠兵力"①。立宪改进党攻击自由党如此公然背弃其原来立场说："数月以前，民党严词拒绝建造军舰，今则翻然放弃一贯主张，并斥责说："民党尚有何面目取信于天下。"②于是，民党联合烟消云散，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伊藤内阁及占有准执政党地位的自由党与在野党对立的局面。在野党的核心是改进党，一向被称为政府党的国民协会等也反对政府而向在野党转化。《日本》报（7月31日）看到，随着自由党向政府日益靠拢，而过去的政府党却转化为在野党，认为"吏党、民党今已互易其位"。新的在野党联合用来攻击政府的武器已不是民力

① 自由党《党报》31号（1893年2月25日）、49号（1893年11月27日）。

② 《立宪改进党党报》第2号，1893年1月4日。

休养论，而是对外问题。按照《日本》报的说法，当时正是"对外论勃兴的时代。" 1893 年 3 月 11 日，以榎本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成立；同月 20 日，郡[1] 司成忠大尉等六十三人在热烈欢送声中，乘木船从隅田川出发，勘察千岛；福岛安正单身横穿西伯利亚的事迹每天登满报纸；邮船公司开辟南洋航线；横滨正金银行开设上海办事处等事相继出现。《日本》报（5 月 25 日）列举这些事件，认为这是"把竞争精神转向海外的绝好机会"，力主向海外扩张国权。

这种绝好机会，由于上年开始的日韩关于防谷令事件的交涉接近尾声而到来了。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政府禁止出口粮食的措施，使日方损失十七万日元；1892 年 12 月，提拔自由党的活动家大石正巳为代办，令其进行交涉，强硬要求赔偿。但交涉迟迟不见进展。陆奥外相因交涉拖延而恼火，于 1893 年 5 月令大石公使声明保留"强行采取国际公法所允许的手段的自由"，撤离汉城回国。朝鲜政府惊慌失措，决定赔偿十一万日元。（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来又接受妥协，这是因为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首相："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强压"，使伊藤想起了北洋舰队的威力[2]。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悔恨地说："政府决心不够坚定，动作过于缓慢。"[3] 163

但是，军方却不断地进行了战争准备。陆奥外相下令大石公使回国后两天，即 5 月 19 日，天皇根据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上奏，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这个条例的施行，具体地表明了军队预定不久将要进行战争。《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天皇亲自主持的战时最高统帅机构，有关战时统帅事项，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限制；天皇的战时军令大权，国务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仅由幕僚长即参谋总长辅佐独断行使。而且大本营的幕

① 郡：原书误作"群"，兹据平凡社《大人名事典》改。——译者

② 林董，前引书，第 260 页。

③ 《原敬日记》第 2 卷，乾元社，1950 年，第 87 页。

僚完全由陆海军军官组成，没有文官参加，即使是首相，也不能参与大本营的一切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

关于制定这个《战时大本营条例》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还批准了《海军军令部条例》。它虽然把海军军令部长与参谋总长并列为天皇直属机关，但《战时大本营条例》却规定“在大本营中参与帷幄机要，并制定帝国陆海军之作战计划，乃参谋总长之任务”；也就是说，在大本营中，军令部长隶属于参谋总长之下，受其指挥。首任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曾主张陆海军必须平等，对陆军施加压力，但陆军对此进行了抵制。海军主张从《参谋本部条例》中删去“任命陆军大将或者陆军中将一人为帝国全军的参谋总长”的规定，直到10月才得以实现。即使这样，参谋本部仍掌管“国防及用兵”(修订前则称为“出师国防作战”)，而军令部的职责则被限于“出师作战沿岸防御”，并未改变《战时大本营条例》的规定；直至1903年12月修改条例以前，军令部长始终与参谋本部次长平级，隶属于参谋总长之下①。

在海军遭到轻视的情况下，由陆军进行对清作战的准备。掌握实权的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早就派遣所属军官到大陆各地去收集作战资料，为了完成此项工作，他于1893年4月，用三个月的时间亲自进行了对清帝国和朝鲜的长期视察旅行，于7月回国。川上的视察反映在10月间山县有朋大将所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山县大将概述了英法俄三国对清帝国的侵略过程，预计“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之瓜分；由于清帝国的兵制自1886年起开始衰落，军队士气的低落已无法掩饰，因此对瓜分将无力抵抗。山县指出：“东洋祸机之爆发，不出今后十年”，并且强调，敌手将为“英法俄等

---

① 松下芳男，前引书，下卷，第182、190、194、390页。

国”，为了事先防范这种祸端，日本“应作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①。和伊藤首相的看法不同，山县和川上并没有把北洋舰队的威力及其制海权的意义放在眼里。 164

三　厉行条约论和对外强硬派

第四届议会结束后，由于自由党变为准执政党，政局发生了变化。改进党和刚刚站到在野党立场来的国民协会，揪住对外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是否立即修改条约问题，同伊藤首相进行了激烈斗争。在政府内部，伊藤首相重视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威力，陆军则只估计陆上兵力而对胜利抱乐观态度，两者之间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分歧。陆奥宗光外相观察到这种情况，于1893年7月向内阁会议提出了修改条约的方案，经同意后，又取得枢密院的赞同。他对这次修改条约交涉的态度概括在他给驻德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陆奥把修改条约问题看作是要造成“有如向国民心里投放发狂剂的状态”，并指出，以往历次修改条约谈判的失败，“实际情况是在内而不在外”，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统一国民的意向”。“若能随意诱导国内舆论，或能任意压制舆论”，则修改条约不难进行；但实际上作不到，因此，他坚决认为“不能不指望至少要取得某些开国人物之赞同”②。为了实现这种想法，他着手对在基层党员压力下处于动摇状态的自由党议员进行收买，但对于国民协会和内地杂居研究会中的反对内地杂居论者，则视为“完全无缘之众生”，认定他们是不会支持修改条约的。③

被陆奥外相断定为“无缘之众生”的反对内地杂居论者，用他们的思想家井上哲次郎的话来说，其主张是，“日本人种今日仍比

---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15—222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6卷，第21—24页。

③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1，塙书房，1973年，第263—265页。

欧洲人种低劣一等，如今即欲与欧美人种经营同等之事业，试与彼等进行同等之竞争，其危险有如稚弱之童子与大力之壮士进行格斗”，在表面对外强硬的言辞背后隐藏着对外恐怖论①。写过《杂居尚早》，并支持反对内地杂居论的东京大学②总长加藤弘之指出：“如因我方拒绝内地杂居，对方即断然拒绝我收回上述两权（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此乃无可奈何之事；虽属遗憾万千，但也只能暂不考虑收回上述两种权利”。《国民之友》189号（1893年5月3日）痛斥反对内地杂居论者是“内心实不欲修改条约，而欲永远保持治外法权与税权之退缩状态，实属秦桧之徒。”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以国民协会为核心的多数派的工作有了进展，改进党的一部分人发生动摇，并开始表现出欲以“反对内地杂居”为核心组成在野党联合的动向。《国民之友》害怕这种动向会变成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联合，在191号（5月23日）和205号（8月23日）上指出，165 以国民协会为主导的在野党联合是要“帮助武断派来夺取天下”，并号召：为了以民众为主导来实现修改条约，制定“日本国民的修改条约方案”，凭群众运动来实现这一方案。《国民之友》所提倡的群众运动，其办法是“厉行条约”，是立足于下述逻辑的，即：欲把“日本国民修改条约方案”强加于外国，其前提“在于要使外国人感到有修改之必要；欲使其感到有修改之必要，则须使外国人患其苦；而为使外国人患其苦，则别无他法，只有正确实行现行条约”。举出的具体办法是：(1)严格执行外国人旅游区域之规定；(2)彻底取缔外国人的非法行为；(3)严禁外国人在居留地以外地区居住；(4)没收外国人用日本人名义占有的土地和房屋。并且强调，这些要由

① 《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编》，第476页。

② 东京大学：1877年建立，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1897年改称东京帝国大学，战后改称东京大学。——译者

全体国民来广泛进行揭发，迫使政府按违犯条约论处，这样，各国就将不得不同意修改现行条约。《国民之友》认为“此实为强硬政略。事若至此，则主客完全易势，我之要求悉皆贯彻，为求彻底，不惜迈进百步千步，所谓平等条约始可望成立”，并且认为在这种运动过程中，可以建立起以议会为基础、对国民负责的“责任内阁”。

《国民之友》所提倡的这种“厉行条约，责任内阁”的逻辑，是依靠国民来实现修改条约的路线。但是，在当时自由党已成为亲政府党的政治条件下，它只能得到畸形的实现。在第四届议会之前，亲政府党的国民协会和国粹派再加上东洋自由党合并成立的大日本协会，本来持反对内地杂居论的主张但秘而不宣，赞成厉行条约；而立宪改进党和立宪革新党则主张建立责任内阁。1893年10月，第五届议会前夕，两派妥协，并在“对外强硬”方面获得一致，分别主张厉行条约和责任内阁，同时结成了在野党联合的“对外强硬派”。其结果与《国民之友》的设想相反，对外强硬派反而是在与伊藤内阁及自由党的内外政策对立之中，发现了具体的统一点，并付诸实行。

1893年11月，第五届议会召开，国会的情况和第四届议会以前全然不同。对外强硬派提出了对自由党众议院议长星亨的不信任上奏案，并以多数通过；进而通过了振肃官纪上奏案，迫使农商务相后藤象二郎辞职。接着，向议会提出了厉行现行条约建议案。议会中的言论刺激了院外的群众运动，对外国人的刁难和暴行不断发生。《国民之友》214号（1894年1月13日）不得不慨叹事与愿违，它提倡的厉行条约论，成了鼓吹排外主义的母体，“鼓吹虚伪之爱国精神”，以至变成对国民施行“民党所未料及之可怖政治教育”。在不断发生的对外国人暴行事件中，发展成为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驻日英国公使馆肖牧师（Shaw,A.）遭暴徒袭击，警察袖手旁观不予救护的事件。12月28日，这个消息一传到伦敦，英国外交部就宣

布，在事件未得解决之前，停止修改条约的谈判，并谴责日本排外运动的发展和政府取缔不力。次日，陆奥外相在众议院登台演说，认为提出厉行条约之类“销国攘夷的建议案，为修改条约制造障

166 碍”简直是荒谬绝伦，厉行条约案所列举的外国人在居留地以外居住、占有不动产及进行营业等违反条约事例，“若非误解，即为意图锁国者流之曲解”，提出这样的议案，“以蓄意与外国构事，此乃违反维新以来之国策，为政府所不能容许”，对煽动过激的排外主义的大日本协会给予解散处分，继之于12月30日解散了众议院。青木公使称赞陆奥外相说“阁下解散议会之演说，恕我冒昧，实为上上之杰作”[1]。

四 修改条约的进展

由于第五届议会的解散，反政府热潮立即高涨起来。在贵族院，近卫笃麿等一派三十八名支持对外强硬派，谴责政府不应解散议会，同时认为伊藤内阁已失去国民的信任，要求它下台。

转年（1894年）1月26日，《时事新报》促请政府注意：政府“如优柔寡断，天下人心将厌倦不堪，终必出现非同小可之内变”，并建议“政府改变其方向，大力推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此乃目前最为妥当之政策”。对外强硬派举办的各地演说会，在国民中散布排外气氛，连改进党系的报纸《邮便报知》（1月4日）都害怕民众把对外强硬论“作为攘夷论而听取之，感佩之”；《国民之友》214号（1月13日）看到，打倒政府的热情已经转向排外主义，“伪勤皇、假爱国、保守、武断之精神弥漫全国”，劝戒对外强硬运动不要越轨。

1894年3月1日举行大选。亲政府党的自由党从八十议席

① 《日英条约改正记事附录》，（《陆奥宗光文书》）。

跃增为一百一十九议席；相反，转为在野党的国民协会却从六十六议席减为二十六议席。第二次大选中靠政府干涉选举而当选的议员，因改变攻守立场而落选，自由党新增加的议席大体上相当于这些人失去的议席数目。但是，对外强硬派仍保持一百三十议席，如能争取到无党派议员的半数，就可以控制国会的多数。

3 月 27 日，陆奥宗光外相在给青木周藏驻英公使的信中谈及他的感想，说"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强调政府"若不作出某种使人心为之一震之事业，则无以镇定喧嚣之人心"；指出虽然"以内政之关系促外交之成功，乃本末倒置"，但时势如此，无可奈何；结论是"既不能发动无故之战争"，则"唯一之指望只有修改条约"，以此敦促青木公使①。但是，因肖牧师事件而对英国处于不利地位的陆奥外相，要使对英修改条约的交涉取得成功，就必须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日本按照英国的要求，除将居留地的租借权改为永久租借权之外，在税率上也做了让步，同时还做了"政略上的让步"，即日本不与俄法合作以使英国在东洋陷于孤立。英国满意了，从此修改条约的交涉才纳入正轨②。 167

在国内，国权主义高涨，时刻都有发生排外主义越轨事件的危险。在国外，修改条约的希望好不容易才有所增强。就在此时，3 月 28 日，逃亡日本、受到民间政客的保护和同情的朝鲜革命家金玉均，被朝鲜国王所指使的刺客骗到上海，遭到杀害。事件发生后，福泽谕吉等人立即组成金氏友人会，前往收还尸体，但清政府却把金玉均的尸体用军舰运去朝鲜，朝鲜政府则在汉江河畔曝尸示众。以金氏友人会为首的民间志士向国民诉说，清帝国和朝鲜的举动是无视日本国威和国权的蛮横无礼的行动，于是维护国权的呼声急剧高涨。玄洋社首脑的野半介走访陆奥外相，促其决心开

① 小松绿：《明治外交秘话》，1936 年，第 82 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 27 卷，第 1 册，第 51 页。

战。陆奥回答说："开战尚非其时"，但却把他介绍给川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对的野说："只要一着火，灭火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要主动执行自己的任务"，暗示玄洋社社员可以"放火"①。在这样喧嚣的气氛中，5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议会。17日，对外强硬派以解散第五届议会"不合理、不正当"为理由，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并迫使政府接受"强硬的对外政略"和"实现责任内阁"，结果以一百四十四票对一百四十九票被否决。但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却被五票之差所吓倒，说国会是"胡言乱语，混乱已极"，"与此种国会谋议国事，将一事无成"，认为只好解散国会。

第二节 日清战争的开始

五 甲午农民战争

当日本国内国会与政府抗争日趋严重之时，在朝鲜，农民叛乱正在扩大。1894年2月，朝鲜南部的古阜发生的反抗地方官员虐政的农民起义，在罢免地方官后暂告平息；但5月4日，在民间宗教东学道主要领导人全琫准的号召下再次兴起，并通过东学道的宗教组织，从全罗道蔓延到忠清道。农民军的要求是：肃清不法官员，驱逐日本人，允许自由信仰东学道，这些要求引起了苦于李朝暴政和日本商人恣意妄为的广大民众的共鸣。

驻清公使大鸟圭介当时兼任驻朝公使，驻在汉城。他看到这种形势，估计农民起义如果进一步激化，就有使清帝国以镇压为名出兵吞并朝鲜的危险。他建议，日本应协同清帝国改革朝鲜内政，以防止清帝国出兵和吞并朝鲜。5月，农民起义再度爆发，他

①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年，第143—144页。

为了汇报形势，休假回国。中旬，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濬得知前往讨伐农民军的朝鲜政府军打了败仗，估计朝鲜政府将要求清帝国出兵，于是建议，日本也有必要准备出兵以对抗之。杉村的建议书于5月28日到达外务省；另外参谋本部指派公使馆武官渡边铁太郎大尉到釜山收集情报，并增派了参谋本部人员伊地知幸介少佐。5月30日，伊地知少佐回到东京，从军事观点报告了农民起义的实况。在汉城，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拜会清帝国外交代表袁世凯，询问清帝国是否要出兵保护侨民？并暗中怂恿清帝国出兵，以求为日本出兵提供机会。在东京，31日，休假归国的大鸟公使也向陆奥外相提议，若能在清帝国之先派兵镇压内乱，就可取得日后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导权，建议派遣一千名左右的陆军部队。 168

在此同时，日本国内政局也面临着重大的变动。5月31日，众议院以一百五十三票对一百三十九票的多数通过了弹劾内阁上奏案。上奏案指摘内阁："尤其在外事方面，姑息苟安，唯恐失外国人之欢心，以至内外亲疏、轻重之别，完全颠倒"，说"臣等对阁臣不能信任"，表明了对政府不信任。这一上奏案虽然被驳回了，但政府被迫陷于总辞职或者解散国会的境地，危机十分严重。总辞职就可能使好不容易获得进展的修改条约交涉前功尽弃。政府所能采取的道路只有解散国会。6月1日，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向伊藤博文首相强调说："此种议会如再继续下去，政府势必丧失威信，天下人心将不知所向"，一再要求"采取坚决解散之策"①。但是，即使解散议会，为了在大选中取胜，无论如何也要作出一番"使人惊心动魄的事业"，把国民的视线转移到反政府运动之外。这种机会，由朝鲜送上门来了。5月31日，起义军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6月1日，杉村濬代理公使电称："朝鲜政府已请求清帝国派遣援军。"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二册，第155页。

日本政府接到杉村的紧急电报后，于6月2日召集了内阁会议，决议解散众议院并出兵。政府抓住了转移人心的极好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候，日清开战之局已定。财界在当时对日清战争尚未能起主导作用。《日本社会主义史》的著者山路爱山评论说："日清战争还不能说是资本家自觉发动的，不能说这是资本家图谋自身利益所发动的"，而应该说是日清战争促进了"士绅集团的阶级意识"①。日清战争是以围绕朝鲜的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内的"政治危机"为导火线而发生的。

六　日清两国的出兵和朝鲜

169　川上操六参谋本部次长看到朝鲜已经"着起火来"，就勇往直前向他的"本行任务"——战争迈进。据林董外务次官的证词说，川上曾到外务省拜访陆奥外相，在林次官列席之下，讨论了出兵方案。他预计清国派往朝鲜的兵员为五千人，要求派遣一支并非平时编制约三千人的旅团，而是一支拥有约八千兵员、能够完全压倒清国的战时编制的混成旅团。川上估计：如果混成旅团在汉城附近取得胜利，清国就必将求和；如果清国不投降，就再派一个师团在平壤打败清国从满洲南下的兵力，那就肯定会讲和。他主张："做好派遣一个师团的准备，先派出混成旅团。"陆奥外相表示同意。林次官总结说，当时会议所讨论的"已不是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取得胜利"。②

6月5日，日本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天皇批准向朝鲜派遣混成旅团，参谋总长对广岛第五师团下达了动员令。次日，不待动员完毕，就决定紧急派遣一个大队步兵。

① 岸本英太郎编：《明治社会主义史论》，青木文库，第52页。

② 林董，前引书，第75页。

伊藤博文首相的主张与川上操六、陆奥宗光的方针不同。伊藤与陆奥作了详细的计议，定出了如下方针，但据陆奥说，该方针“大都是出于伊藤总理的意见”。伊藤首相的方针即政府的方针是：(1)当日清两国由于派兵发生冲突时，应全力以赴，贯彻“初衷”，即维持日本在朝鲜的权力；(2)但是，应“尽量”保持和平，维护国家的荣誉，保持日清两国的“势力均衡”；(3)日本尽可能立于被动地位，设法使清国处于主动地位；(4)将问题局限在日清两国之间，避免第三国的干涉①。

这个方针同林次官所说的陆奥外相的方针具有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大鸟公使紧急返任、于5日从横须贺军港出发去朝鲜时所接到的训令中。伊藤首相指示，大鸟公使应与袁世凯进行协商，尽可能和平了结；陆奥外相的书面训令，也明确指出出兵目的是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但是，陆奥外相同时所发的口头训令，内容却有所不同。口头训令要把“在韩国取得优势”作为“主要目的”，并且说：“向这个方向前进，纵使破坏和平，完全由我负责，所以阁下(指大鸟公使)即使觉得过激，也无须顾虑，而应采取坚决措施。”当时在场的林次官感到这种训示“简直等于说要尽量采取开战的办法”②。

大鸟公使接受了“表里不一，包含两个主义”的指示，带上四百二十名警卫兵，搭乘八重山号军舰，于6月11日回到汉城③。大 170 鸟返回汉城后，看到的却是一片平静景象。为了不给日清两国出兵的借口，农民军已经同政府军讲和，从全州撤退了。书面训令所谓保护公使馆和日本侨民的理由已经用不上了，若以“势力均衡”为目的，下一步的目标就应该是日清两国同时撤兵。比起口头训令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岩波文库》)，第17页。

② 林董，前引书，第76、257页。

③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0页。

来，大鸟公使当然更重视正式的书面训令，所以对同时撤兵没有表示异议。大鸟公使到达汉城时，袁世凯看到日本派兵，便提议同时撤兵，大鸟公使表示原则上同意，并开始商谈。交涉进展迅速，12日，暂定两军维持现状，并约定：日军以一个先遣大队为限不再增兵；进驻牙山和公州的清国军队自8日起也不再移动。大鸟公使乃电请本国停止派遣后续部队。

但是，对大鸟公使的请求，日本的反应却是冷淡的。陆奥外相尽管认为"大鸟公使的请求是合理的"，但对停止派遣军队的电报却复电说"没有任何办法"，"难以停止登陆"。其理由是，出兵纯属统帅事项，内阁无权变更大本营的决定；除此以外，他还有这种考虑，为了使局势向有利于口头训令中所指示的开战方向发展，"外交上虽然要经常居于被动地位，但一旦有事，在军事上则一切都要先发制人。"①12日，与大鸟公使的要求相反，大本营决定将第五师团尚未出发的部队派往朝鲜。接到大本营决定之后，陆奥外相于13日指出，派遣军"如果什么也不干，又哪里也不去"，空手而归，"不仅很不体面，政策上也说不下去"，于是转向积极政策，对大鸟公使说："如今既已派出大军"，"毫无所获便撤回军队，殊为不妙"，倘若如此，"国内论调必将掀起不平，炮制种种谴责"，指示应乘此机会全部解决以往的悬案②。朝鲜内乱的平定、清国的提议撤兵③以及欧美各国对出兵的批评，的确给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理由的进一步增兵造成了困难。但"骑虎之势已成，既定兵员数目不能中途变更"，既然如此，就必须改变派兵理由，而获得某种利益——比如解决过去的悬案④。伊藤首相考虑到这一点，在14日的内阁会议

---

①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29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192页。

③ 原书"出兵"，疑为"撤兵"之误。——译者

④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3页。

上，打算向清政府提议：在日清两国共同镇压内乱和平定起义之后，共同改革朝鲜内政。陆奥外相认为这个提案含有"使我国外交上之位置一时由被动者变为主动者"的重要内容，乃要求缓期一天，进行"通宵熟虑"。

当时，陆奥宗光外相手中收到三份报告和请示。第一个是参谋本部派到朝鲜的福岛中佐的报告。报告断定，从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兵力配备情况来看，俄国不可能出兵朝鲜。第二个是青木驻英公使的报告，说如果日本的行动是预防俄国入侵朝鲜，那么英国不会反对。第三个是大鸟公使的请示。面对拥有三千兵员的混成旅团第一次派遣军已经到达仁川的既成事实，大鸟提议，为了"有效地使用"已经到达的"大军"，可否"撕毁日清共同撤兵之协定"，为此"纵使同清国开战"也提出清韩宗属问题。并请示，为了实行这种政策，可否采取"激烈的手段"。陆奥外相认为，由于英国承认清帝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不宜以清韩宗属问题作为开战借口，而以英国所同意的、镇压内乱并改革内政以防止内乱再度发生为借口，较为适当。

15日，陆奥宗光外相提出在改革内政未完成前不撤兵；清国若不同意即由日本单独实行朝鲜内政改革；在这两项附加条件下，同意了伊藤首相的提案。16日，他向清国公使汪凤藻递交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他估计到清国将会拒绝，准备届时由日本单独实行改革；但单独改革则将根本改变日清对朝鲜的关系，所以估计清国根本不会接受。日本提议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用陆奥外相的话来说，就是使开战外交"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①。

七　开战外交

参谋本部设想十年后将进行对俄战争，为了事先在战略上占

①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7页。

据优势，推行了出兵朝鲜的政策。陆奥外相基本上同意军部的政策，但与军部不同，他十分警惕以英俄为首的欧美干涉。欧美各国由于尚未完成正式瓜分清帝国的准备，因而尚不希望发生将使正式瓜分清帝国问题提上日程的战火。日本不能无视欧美的意向，而在朝鲜发动战争。这是因为如果无视欧美的意向，日本就将受到干涉，大陆政策本身就会遭到挫折；特别是如果无视英国的意见，那就将使为了达到日本"独立"所必需的修改条约不可能实现。陆奥外相竭力利用英俄对立，争取英国的赞同。为此，就必须把出兵朝鲜的理由放在镇压民乱及预防民乱即改革内政方面，并使英国相信日本的真意在于预防俄国入侵朝鲜。陆奥外相之所以不采取大鸟公使以废除清朝宗属关系作为开战借口的提议，是因为英国基本上希望维持清帝国和朝鲜关系的现状。6月14日，英国外相告知青木公使"朝鲜乱民已经溃散，清帝国方准备撤兵，因此希望日本也同样撤兵"，并附带说："英国政府担心，如果日军长期逗留朝鲜，将会引起纠纷。"[①] 报告此事的电报于16日到达。陆奥保证"若变乱平息至无需驻兵时"，则立即撤兵；但又说："然至今尚未接到贼军溃败之确实报告，目前仍未见扰乱已止之迹象。"[②]

172

全州讲和之后，农民军在朝鲜南部建立了自治机关，名为"执纲所"，开始了民众的自治行政，这就是所谓的"扰乱"。但也考虑到因英国反对而不得不撤兵的情况，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获得既使日本政府满意，又能满足公众感情之结果，则不能从目前之地位退后一步"，要求大鸟公使应"利用此机会"就以下问题与朝鲜政府进行"严肃谈判"：出让汉城一釜山间的电报线；废止对日本人征收内地税；全面废除防谷令等问题。对于这种要求，大鸟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269页。

② 同上，第270页。

公使反对说，"论形势或论道义，均不能视为上策"，但陆奥外相为了"满足"军部和公众的"感情"，竟不惮其烦，"搬出琐碎的难题，以高压手段达到其目的"①。

6 月 21 日，不出所料，清帝国拒绝了日本关于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提案。同日，驻天津武官神尾光臣少佐发来了清国又增派五千兵员的报告。陆奥外相看到传阅的电报，断定"清国意图所在已不察自明，事至今日，两国冲突已无可避免"②。22 日，召开御前会议。会前神尾少佐又发来报告，详细报告了李鸿章已经下令出动北洋海军的情况。御前会议决议："日清两国之相互合作，已非我国一厢情愿所能为力"，并决定：(1) 向清国发出绝交书；(2) 增派第二批派遣军，编成足以粉碎牙山清军的混成旅团。并训令大鸟公使："只要我方不负理屈之责，可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当日本外交由"被动者"转向"主动者"的时候，列强的干涉也开始了。25 日，驻日俄国公使希特罗渥(Hitrovo, M.)询问日本，如果清帝国撤兵，日本是否也撤兵？30 日，又"劝告"日本接受朝鲜政府希望日清两国撤兵的"请求"，并"忠告"说，如果日本拒绝这一"请求"，须负"重大责任"。陆奥外相认为："环顾国内，当时之事态已使局面大为变化，即使清国自朝鲜撤退其军队，我方亦难以无所作为而撤兵"，于是便作出不计国外干涉和国内情况进退"两难"的"最后判断"。他到首相私邸拜访伊藤博文，请求伊藤下决心。两人意见一致，认为："听俄国之指教，自朝鲜撤出我军，今日非其时也。"7 月 2 日，日本"委婉"地拒绝了俄国的劝告③。

继俄国之后，英国也来介入。英国无论从通商方面，或为使清 173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1 卷第 1 册，第 559 页、568 页。

② 同上，第 2 册，第 229 页。

③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 63 页。

国成为阻挡俄国南下的屏障方面考虑，都希望维持东亚的和平。7月1日，驻日代理公使佩吉特(Paget,R.S.)通知(日本)说，如果日本不提改变清韩宗属问题，清国就会接受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但是，陆奥外相判断，英国的介入是受清国之托，便制定并提出了一个其内容为清国所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方案。

八　向开战接近

李鸿章看到日本态度强硬，就改变了当初“用声势威吓我国(指日本——译者)的政策”，一面请求欧美强国调停斡旋，一面准备向朝鲜增派兵力。李鸿章深知他所统辖的北洋陆海军，且不说外表如何，实际却难以抵抗日军，加之西太后六十寿辰在即，所以希望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但是，德宗皇帝及其近臣则想借此机会掌握实权，便反对李鸿章，牵制他的行动。李鸿章希望通过列强的调停来摆脱当时的事态，努力在列强中进行活动。他向驻清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 A.P.)提议，由日清俄三国代表商讨日清两国撤兵和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问题。但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以俄国在亚洲兵力不足和外交上有陷于孤立的危险为理由，加以拒绝。英国仍继续介入，7月7日，呼吁各国共同仲裁，但因德国拒绝而未能实现。

在列强继续干涉之时，陆奥外相于6月28日起草了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送交大鸟公使。在这个训令到达之前，大鸟公使认为“如不同中国打上一仗，并把它打败了，内政改革的目的将得不到充分贯彻”，但又说“并无两军冲突的机会”，而“为达到内政改革的目的，以速战为有利”，因此建议，还是希望提出清韩宗属问题。他提议，如果清国承认朝鲜是独立的国家，即可正告清国“贵国师出无名，必须迅速撤退，如果拖延不撤，我国不得已将以兵力赶走”，并付诸实行；如果朝鲜政府声明它是清国的属邦，即可责以

修好条规签订十七年来欺骗日本之罪，“以兵力相逼”，从朝鲜政府“取得我方满意之补偿”①。但陆奥外相却指示说“迫令撤退牙山清军，与现行政略不符”，驳斥了大鸟的提议。

英国的态度至关重要。7月7日，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在给老部下第三师团长桂太郎的信中说：“现正在绞脑汁想办法，如何乘欧洲大国尚未介入的机会，采取一切足以引起战端的手段”，明确表示正在等待开战的良机。② 这种“良机”到来之日，就是英国在日英修改条约上签字，日本无论采取任何行动也不致影响修改条约之时。13日，青木驻英公使报告：“本公使可于明日在新约上签字。”但到15日，忽然电报飞来，说英国举出两件事，指责日本在朝鲜的行动并拒绝签字，一件是日本要求朝鲜政府解雇聘用的英国海军教师；另一件是日本在仁川公共居留地架设电线，侵犯公共居留地的中立。陆奥外相以“功亏一篑”，而大失所望，指令青木公使竭力向英国政府进行解释。16日，修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字完毕。英国外相金伯利（Kimberley, J. W.）在祝词中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③ 174

7月14日驻清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政府递交了“类似诀别”的第二次绝交书说：“今后若发生不测之变，我政府不负责任。”17日，即日英修改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决议开战，并决定了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内容是，开战初期应力求舰队决战以获得制海权，若一举成功，陆军则挺进直隶平原，进行决战；若舰队决战胜败未决，陆军则控制朝鲜，作持久战；若舰队决战不利，则加强沿海防备。同日，撤换了与陆军对抗的中牟田海军军令部长，而以著名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任此职。7月19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册，第573—576页。

② 《桂太郎文书》。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册，第113页。

日，大鸟公使提出如下要求：在汉城—釜山之间架设军用电报线；建筑日军兵营，撤退牙山清军并废除清国和朝鲜之间的一切条约，限 22 日答复。英国政府鉴于形势紧迫，于 19 日再次提议调停，但陆奥外相看出英国无意进行武力干涉，便制定清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修改方案，并限五天以内答复。同时声明，在此期间清国如继续增兵，则将视为"威胁恫吓"的措施。同日，大本营也命令联合舰队阻止清国增援军队，并允许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如果清国增派援军，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对处；接着，又命令要"以主力击破当面之敌"。答复期限届满的 7 月 23 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推翻闵氏政权，树立了以大院君为核心的傀儡政权。联合舰队也奉命开出佐世保军港，控制朝鲜西海岸，发现敌舰立即击毁。

九　日清战争的爆发

1894 年 7 月 25 日，日本海军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在丰岛海面发现北洋舰队的济远号和广乙号，打响了日清战争的第一炮。新式的优秀快速的日本舰队击毁了济远舰，打伤了广乙舰。浪速舰击沉了运输清帝国增援部队的英国轮船高升号，并俘获了护航炮舰操江号。在通告宣战以前，击沉在公海上航行的英国商船，这个事件使英国舆论强硬起来；但在当时，国际间尚无开战之前必须通告宣战或发出最后通牒这种协议，1908 年，经过海牙世界和平会议签订《关于战争开始公约》有这种协议，所以英国舆论的谴责，并没有道理。不久，由于《泰晤士报》的解释，舆论对此有所了解而平息，因高升号事件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就此放下心来。

175

战争开始的第二天，即 26 日，天皇同意了伊藤博文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的请求。伊藤首相以不参与战争的最高级指导，不利于指挥外交为理由，从 27 日起，开始出席大本营御前会议。陆军

从汉城南下，29 日，在成欢对因高升号沉没而一直处于劣势的清帝国军队展开了进攻，第二天占领牙山。但是，由于清军渡过鸭绿江而南下集中平壤，日军感到威胁，乃停止追击，转回汉城。

8 月 1 日，日本发出了宣战诏书，强调清国的政策总是"自称朝鲜为属邦，暗中或公然干涉其内政"，"对帝国（日本）率先使朝鲜与各独立国并列之地位，以及表示此种地位之条约均置诸不顾"，声称日本毅然决然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改革朝鲜的内政，以维持治安，确保朝鲜的独立。同日，清国也颁发了开战的上谕，于是战争成为公开的事实。

开战后不久，伊藤博文首相提出意见书，估计列强将要共同进行武力干涉，强调必须使政略战略一致起来，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①。陆奥宗光外相也认为，明年必须结束战争，届时如果"毫无所得"，将必遭舆论的反对，于是指示必须获得"从日本人看来，可以想象是日本利益"的物质利益，并附带说，即使"其实并非利益"也无妨②。为求速战速决，就不能坐待舰队决战。8 月 14 日，大本营编成以山县有朋大将为军司令官的第一军，受命出征，进攻平壤。8 月 17 日，陆奥外相要求在第一军占领朝鲜之前制订出关于朝鲜的政策，并提出了四个方案以供选择：（甲）作为真正的独立国，不加干涉；（乙）名义上承认为独立国，事实上使它"屈服"于日本势力之下，作为日本的"保护国"；（丙）由日清两国瓜分；（丁）作为永久中立国。内阁会议决定以乙案为目标，但考虑到难以立即实现，决定视各国动向如何再行确定。20日，大鸟公使遵照内阁会议的决定，同朝鲜政府缔结《日韩暂定合同条款》，决定将汉城—釜山间及汉城—仁川间的铁路敷设权和电信架设权让与日本，增设开放港口；并决定今后双方将进行协商，以巩固朝鲜的独立自主。接

① 《伊藤博文传》下，1941 年，第 84 页。

② 《陆奥宗光文书》。

着，26 日，又签订了《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1]，即把朝鲜"置我掌中，使之不敢他顾"的攻守同盟。朝鲜政策虽然向着陆奥外相所说的乙案，即把朝鲜作为保护国的方向推进，但朝鲜政府抵抗日本所领导的内政改革，加之，日本千方百计获得的铁路敷设权也因资金困难而无法着手。陆奥外相后来回忆时不得不慨叹日本资本主义的软弱，说"外交上既得之权益亦终至归于画饼"[2]。

176

9 月 15 日，根据陆军的主张，大本营进驻广岛。大本营御前会议的成员伊藤首相也跟随大本营而移居广岛。从外交上看来，首相(有时是外相)离开各国公使常驻的东京是不利的，但大本营进驻广岛乃是为了表示天皇站在国民的前头，为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同一天，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竟不等山县大将所率领的增援部队到达战地，就开始向平壤进行了总攻击。这是出于速战速决战略的要求，也是由于补给不足，供应第一军全军有困难的缘故。第二天，即 16 日，兵力不足的日军，经过激战，击败了缺乏战意的清军。接着，17 日发生了黄海海战。伊东祐亨中将所率领的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面与水师提督丁汝昌指挥的北洋舰队相遇。日本舰队灵活运用了以其高速和快炮而引以自豪的新型巡洋舰，从正午开始，经过六小时的激烈海战，击溃了拥有使日本人畏惧的定远和镇远这种大型军舰并载有巨炮的北洋舰队。日本取得了制海权。

9 月 21 日，大本营接到平壤和黄海的捷报，决定开始第二期作战，编成拟派往辽东半岛作战的第二军，任命大山岩大将为该军司令官。

---

①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 123 页。

② 同上，第 132 页。

第三节 下关[1]条约

十 战局的扩大和对朝鲜的政策

日军在平壤和黄海的胜利，引起了列强的干涉。首先，在中国拥有最大利益的英国出头干涉。英国最害怕的是清朝因战败而失去权威，从而导致清国国内发生内乱。黄海海战后不久，权威杂志《经济学家》指出：日本若取得完全胜利，将对中国的未来造成最可怕的后果；警告说，西藏、满洲将脱离其统治，中国本土也将四分五裂，一旦陷入无政府状态，贸易也就要断绝，因而主张应该"以稳妥的协议来迅速实现和平"[2]。10月5日，英国政府倡议共同行动，以求在"即将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保护侨民。次日，呼吁德、法、意、俄、美各国对战争进行联合干涉，并指示驻日公使刺探日本政府对讲和的意向。8日，英国公使特伦奇(Trench, P.H.Le P.)走访陆奥外相，询问若以(1)列强保证朝鲜的独立；(2)清国赔偿日本战费两项作为恢复和平的条件，日本是否接受？[3] 对于联合干涉的提议，德国答复说："目前为时过早"，美国拒绝参加共同干涉。俄国和法国也表示消极的态度。共同干涉虽然没有实现，但面对英国的干涉，陆奥外相感到有必要事先制定讲和条件的纲要，草拟了下列甲、乙、丙三种方案。(甲)明白表示日本所希望的"最大限度"，"坚决避免"英国所提议的各国共同保障朝鲜独立的方案，要求割让旅顺

177

① 下关：又叫马关，即今山口县下关市。我国通称"下关条约"为马关条约。——译者。

② 信夫清三郎：《日清战争中的英国对外政策》，《明治政治史研究》第一辑，1935年，第11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474—475页。

和大连作为“中国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担保”；赔偿军费；并迫使签订以与欧洲各国同等原则为基础的新通商条约。（乙）认为让列强也“多少分上一份”是缓和干涉的“捷径”，因此，同意共同保障朝鲜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提出割让旅顺和大连湾作为“中国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担保”，就改为要求台湾，其它与甲案相同。（丙）日本暂不明确提出讲和条件，而要求先了解清帝国的意向，这是一种“拖延政策，等待他日良机到来”①。11日，陆奥外相在提出三个方案的同时，提请伊藤首相注意："外国干涉现已开端，则我军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棘手地步之前，以最大速度先占领下任何一块地方，最为必要。"② 伊藤首相同意甲案，但签注意见说，割让旅顺、大连湾及赔偿军费的要求，最好“在我军再前进一步之后宣布”。但是，第二军尚未从日本出发。23日，陆奥外相在英国公使催促下，决定姑且做“既非同意但亦非不同意”的答复，说日本认为“事态之进展尚不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取得满意之结果”，事实上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已经大大超越了开战前川上操六所主张的、平壤战役胜利后即及早讲和的论点。这里提到的甲案和乙案，很快就综合起来成为讲和条件的基本方案；为了实现此种方案，要求第二军以占领旅顺和大连湾为目标，迅速采取行动。24日，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清国领土；同日，与第一军相呼应，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战局进入了第二期。

在战局开始出现新进展的10月18日，第七届议会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开幕。与过去相反，对政府未进行任何攻击，只用五分钟，国会就全场一致通过了临时军事费一亿五千万日元和募集军事公债一亿日元。目睹国内一致支持战争和战争热潮的高涨，11月1日，伊藤首相心想，仅靠占领金州半岛，根本不能指望清帝国

---

① 《伊藤博文传》下，第140—141页。

②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148页。

投降；因此，在攻克旅顺之后，"势必要采取大举进攻天津之策"，把 178
战争扩大到直隶平原作战①。

日本开始向着完全胜利挺进，这就加深了列强干涉的危险。11月5日，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W.Q.）召见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提请他注意："现在已经到了欧洲各国要联合干涉日清两国战争的地步"，并提议（由美国）进行"友谊的仲裁"②。驻欧洲的公使不断报告说联合干涉的趋势重新高涨；内阁会议收到这些报告，于14日一面指出："为了结束战争，似无需取得友邦协助"，一面又决定，如果清帝国通过美国提议讲和，可以回答说大概不会拒绝。这是鉴于英俄与东亚利害关系较深，与其接受英俄的调停，莫如接受与东亚尚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美国的调停较为有利。清帝国通过美国，向日本表示可以承认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为讲和条件，同时为了刺探日本的讲和条件，还派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G.）。但伊藤首相以不是正式使节为理由，拒绝会见，并声明不能接受清帝国提出的讲和条件。

虽然赶走了德璀琳，但讲和却成了紧迫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心在讲和之前必须把对朝鲜的统治确立起来。接替大鸟圭介的驻朝鲜公使井上馨，实际上是以殖民地总督的姿态行事。他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强迫国王同意，执政大院君不同意，就迫使他退隐。为了粉碎朝鲜政府的抵抗，他威胁说，正在镇压从十月起再度起义的农民军的日本讨伐队将撤出朝鲜；利用政府大员的买办性来图谋贯彻他的要求。当时的形势是，农民军已从全州攻至离汉城不远的全罗北道首府公州，日军是和农民军作战的主力，如果日军一旦撤退，农民军就能轻易地打垮朝鲜政府军。井上公使想利用这种形势推行朝鲜的殖民地化，除改革内政

① 《伊藤博文传》下，第104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491页。

纲领之外，还准备了三个条约方案。这三个条约草案是：(1)《外交通知书》草案，规定战争结束后，仍(在朝鲜)常驻一个旅团以上的兵力；(2)《铁路电报条约》草案，规定日本拥有汉釜及汉仁铁路的敷设权和五十年管理权，以及日本架设的军用电报线的永久保持权；(3)《秘密同盟条约》草案，规定改编朝鲜军为日本式军队，派遣军事顾问团，专由日本供给武器弹药，以及租借军港等。但是，外务省顾问丹尼森提出警告说，如果日本把上述条约草案强加给朝鲜，并由日本来独霸朝鲜的话，各国就再也不会相信日本维护朝鲜独立的诺言，而将在朝鲜竞相"占领垂涎之地"；并劝说，一切要求可否放在讲和之后再提出。这时，攻打公州的农民军，由于日军的猛攻而战败，12月间，领袖金琫准也遭逮捕。农民起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新的高潮到来之前，朝鲜民主改革的道路被封闭了，日 179 本也失去了威胁朝鲜政府的武器。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暂时只提出改革内政纲领二十条①。

11月21日，第二军攻占了旅顺要塞。当时日军惨杀了大批的非战斗人员。外国记者向全世界报道了惨杀事件。陆奥宗光外相对林董次官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美国参议院正在审议日美修改条约，陆奥很担心此事会影响美国舆论②。纽约世界报(11月28日)评论说："日本乃披文明之画皮，而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指出全面放弃领事裁判权是危险的。陆奥外相发出指示说，要力求在"此类流言尚未进一步散布之前"，取得参议院的批准。

攻陷旅顺的日军，打算进一步谋取"彻底胜利"。日本乘胜迫使清帝国接受过分要求的危险性增大了。陆奥外相说国民的"一般情绪"是"满怀壮志，尽情狂欢，流于骄横傲慢"，并且"国民到处

① 《陆奥宗光文书》。

② 同上。

沉醉于欢呼和凯歌声中，对未来之欲望与日俱增"，"除要求进军之声外，其他皆不入耳"，他对这种状况表示担忧。他看到日本国民的"不可一世之情"将使列强"感到不快"，担心凭靠胜战得来的日本声誉将由此而被"抵消"，以至"唯有两失，而无一得"[1]。事实上驻俄公使西德二郎于12月1日报称，"如果日本在挟战胜者之势，提出要求，致使清帝国感减其命脉，并提出损及各国条约利益之条件"，则列强将联合抵抗，英俄两国对此已取得一致。据他观察，日本在大陆上瓜分领土是办不到的，驻意公使高平小五郎也报告说：如果日本致使清国分裂和清国政府覆亡，列强"将不会默视而将插手干涉"[2]。日本政府首脑虽然预感干涉的危险，但受制于"国民之热情"，考虑到"若非多少满足国民希望之后，根本无法预防外来之危险"，乃致力于"得早一日就早一日、得远一步就远一步，尽力将日清战局向前推进"[3]。

十一　媾和谈判的进展

攻陷旅顺后，列强对日本的行动，显然已开始心怀危惧。列强干涉的危机增大了，但这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见诸实现，还要取决于日军攻下旅顺后的动向如何。伊藤博文首相接受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的暗示，向大本营提出《应取进击威海卫，攻占台湾之方略》的政略意见书。伊藤判断，通过直隶作战而攻占天津、北京，就含有使清政府"土崩瓦解"的危险，列强为了保护商民和贸易，"必然"要进行"共同干涉"，因而主张停止直隶作战，而进攻威海卫，以 180 歼灭残存的清国舰队，并占领控制台湾的要地澎湖列岛，以作为媾

---

①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145—14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505、512页。

③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147—148页。

和条件的"基础"①。

但是，大本营却希望立即进行直隶作战，指令军队主力集中大连湾，进入新的作战准备。不过，在陆军内部，作战方针也发生了分歧。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看到第二军仅用一天就攻下旅顺，乃设想由第一军攻占奉天(沈阳)，于是违背大本营的指示，竟把军队推进到连结奉天和旅顺的中间要地海城。占领海城，是在敌军深部打进一个楔子，此举虽获成功，但进攻的第一军却立即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补给也都发生困难。日军所害怕的长期流血作战的局面出现了，但大本营无法抗拒军部元老山县大将的权威。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哭求伊藤首相劝说天皇不要损害山县的面子，12月8日得以使天皇颁发敕令，令山县回国治病疗养。山县大将回国后，改任监军。大本营在伊藤首相的说服下，于12月14日决定暂缓直隶作战，而先进行威海卫作战。但是，由于山县有朋开始的海城战役，使得第三师团在那里无法脱身，还要派第一旅团前往救援，因而大本营乃下令第六师团留在本国的半个师团出征，进行新的战役。至此，七个师团中留在本国的，只剩下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这两个师团了。

旅顺的沦陷，在清帝国内部也引起了动摇。德宗皇帝及其亲信重臣翁同龢弹劾清帝国陆海军连续战败的责任在于李鸿章，企图把勾结西太后、一直掌管政治外交的李鸿章赶下台去。翁同龢就任军机大臣，将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合并为督办军机处，统一了政治和外交。与旅顺沦陷的同时，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山海关以东的指挥官，剥夺李鸿章的勋位，罢免了李鸿章北洋大臣的职务。督办军机处决心在日军突破山海关之前媾和，任命总理大臣(其员额不止一人)张荫桓和前台湾巡抚邵友濂为议和代表，并于12月

① 《伊藤博文传》下，第134—138页。

20日通过美国公使将此事通知日本。清国希望日方任命代表并立即停战，但陆奥宗光外相拒绝停战，只同意开始会谈。

回国后充任监军的山县有朋大将依然坚持进行直隶作战。他在12月表示赞同威海卫作战，是以这次作战作为直隶作战的预备战为条件的，并上奏，攻占威海卫之后，应立即把大本营移往大陆，以求"攻屠敌国之首都，迅速结束此次战乱"，说是除此而外"不知有其他手段"可以采取①。他还出席大本营会议，强调辽东半岛"抚朝鲜之脊背，扼北京之咽喉"，为国家长远计，绝对应予占领②。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和桦山资纪军令部长也赞成大本营出征大陆。海军参谋山本权兵卫指出，把大本营移往海外，是对各国干涉的危险不加考虑的作法，如果列强联合舰队切断日本和大陆的交通，那么，天皇和陆军主力岂不就将被"封锁、孤立"？③除山本权兵卫外，其它军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各国干涉的危险。山本忧虑之余，乃向伊藤首相进行工作。伊藤反对山县等人的大本营前进论，认为是"不明形势的顽固之辈"的意见。但山县并不退让，终于秘密决定由参谋总长充任征清大总督，率领大本营全部幕僚进驻旅顺。

181

1895年1月20日，第二军主力在山东半岛登陆。另一方面，由于清国和谈代表即将来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于27日决定了讲和条件，讲和条件有三大重点：(1)朝鲜独立；(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和偿付赔款；(3) 修改通商条约。这是把前一年10月的讲和条件方案（甲）（乙）两案综合起来的方案。接着，御前会议任命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为全权代表。

清国政府的和谈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于1月31日到达广岛，

---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6—227页。

② 《蹇蹇余录草稿》，《陆奥宗光文书》。

③ 《山本权兵卫与海军》，第93页。

但威海卫的战事仍在进行；在辽东半岛，正在计划进攻牛庄①，而澎湖列岛的战事还未开始。日本认为停战不利，乃于2月2日以全权代表委任状不完备为理由，拒绝会谈。同日，陆军占领了威海卫要塞，12日北洋舰队投降。任北洋舰队提督时曾使日本畏惧的丁汝昌服毒自杀。清国政府迫于战败的紧急形势，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德国受李鸿章的委托，于3月8日劝告日本政府迅速讲和并放宽条件；并且指出，如果日本要求割让中国本土，恐将引起干涉②。

大本营决心在和谈达成协议之前，把预定要割让的地区拿到手里，乃于3月9日进攻田庄台③，接着，抽调东京湾和下关海峡的守备队编成南方部队，使之出征，去占领澎湖列岛。16日，又任命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随着征清大总督的任命，制定直隶作战的计划，决定使日本现有的八个野战师团，包括以北海道屯垦军为基干的临时第七师团在内，全部开往大陆。伊藤首相批判了陆军的这种作法，警告说，日军"大举出征，防卫几乎撤尽"，是无视列强干涉的危险的。④

十二　下关媾和条约的签订

1895年3月19日，清帝国全权大臣李鸿章携同参议李经芳、参赞马建忠到达门司⑤。次日起，在下关春帆楼同日本全权代表开始和谈。在清政府内部，皇帝的亲信翁同龢等反对割地，主张仅以赔偿战费为条件进行讲和；但多数人认为所指望的各国调停既没

---

① 牛庄：位于辽宁省海城县西北，距营口九十里。——译者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册，第709页。
③ 田庄台：位于营口附近，与营口隔辽河相望。——译者
④ 《伊藤博文传》下，第181页。
⑤ 门司：在北九州最北端，与下关隔一海峡，现有海底隧道可通。——译者

有实现，而又面临日本的强硬态度，也只好以割地和赔款两个条件来缔结和约。

李鸿章要求在讨论和约之前先行停战。川上操六参谋次长等军部当局甚至要求割让山东半岛，所以坚决反对停战。伊藤全权代表在这种压力下，提出了清帝国根本不能接受的要求，即让出尚未被占领的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并解除该地区的清军武装，作为停战的条件。李鸿章遂对先行停战之议不再抱希望。24日，在会议后的归途中，自由党系的“壮士”小宫丰太郎狙击李鸿章，使他受了重伤。小宫认为对清战果还不够大，和谈为时过早；如果现在答应讲和，清国将东山再起，“显然早晚必定要反攻”，就企图暗杀李鸿章以破坏和谈[①]。伊藤全权代表担心，狙击讲和使节的蛮横干法，将使欧洲各国迄今称赞日本之声“一变而为怜悯中国之声”，将“诽谤我国之风气”；因此，请求大本营同意立即停战。但是，统帅部却拒绝了伊藤的要求。伊藤又对当时已就任陆相的山县有朋讲出三万俄军已经进入清帝国北部的情报，要求他作出“非常的英明决断”。山县同意了停战。26日，伊藤强调：“清帝国如以其所获最好之借口哀求各国时，各国势将对彼表示同情，反以共同之压力压制我国。”文武重臣[②]会议通过同意“无条件停战”三周。但是澎湖列岛和台湾战区却被排除于停战范围之外。 182

4月1日，陆奥宗光全权代表向伤愈的李鸿章全权代表递交了和约草案。草案包括五个部分。第一，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第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第三，赔偿战费库平银三亿两（相当于四亿五千万日元）；第四，以清帝国同欧美各国所签订的现行条约为基础，修改日清条约，给予最惠国待遇；此外并开放北京、沙市等七个城市，扩大航路；第五，同意日军暂时占领奉天

① 田保桥洁：《日清战役外交史的研究》，刀江书院，1951年，第491页。

② 文武重臣：指当过首相或有类似身份的人。——译者

（沈阳）和威海卫，用作履行和约的保障，并负担占领费。其中，关于第二项的辽东半岛，由于军部的强烈要求，其范围包括辽阳、鞍山、牛庄等盛京省[①]南半部的广阔地区。至于第四项要求给予特权问题，不仅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企图侵入中国本土的要求，而且也含有一种策略，即让英国也均沾新特权的利益，以防止英国干涉讲和条约。

4月3日，李鸿章指出：日本“武员”对割地赔款态度强硬，连伊藤和陆奥两全权代表也“无法强阻”军部的要求，估计会谈前途多难[②]。5日，李对日全权代表强调，和约条件不妥当，反对割地和赔款。他指出：第一，日本所要求的盛京省南部是清朝发祥之地，若割给日本，则首都北京将经常处于危境，清帝国人民将势必“卧183 薪尝胆”。第二，日本要求赔款三亿两，但日本实际所耗战费不过一亿两，显然过分。他剀切地说：“中日两国官民日后将永远和好，或永远讐仇”，对日本的“国计民生”影响甚大[③]。陆奥宗光外相考虑，如果放宽讲和条件，“国内必然产生激烈动荡，其危害较诸他日或预想中之外来事变更为严重”，因而主张对李鸿章的意见不予考虑[④]。伊藤博文全权代表估计到列强的干涉和军部的反对，追使李鸿章从速同意和约，并在8日的非正式会谈中恐吓说：“武员”已计划结束停战，进攻北京，“此次谈判一旦破裂，则一声令下，我六、七十艘运输船即将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立刻开往战场”[⑤]。日本一直偷听并破译了李鸿章的全部密码电报。9日，李鸿章电

① 盛京省：指现在的辽宁省，清时沈阳为盛京，其后亦称盛京所在的省份为盛京，但无“省”字，后又改称奉天省以示区别，而盛京遂专指沈阳一带。——译者

② 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日清事件（1934年）》，复印《机密日清战争》，《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7年，增补第28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338页。

④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05页。

⑤ 《机密日清战争》，增补第28页。

请本国指示说，如不允许做出若干让步，本人但愿停止谈判回国。得知李要回国而惊慌的正是伊藤全权代表。伊藤判断，身负重伤的李鸿章如果离开日本，那末，世界对日本的同情也就会随之消失，于是决心让步以达成和议。天皇也说，万一谈判决裂，而订北京城下之盟，“难免要受外国之干涉，最后割据领土也将成为泡影”，对让步表示支持[①]。10日，伊藤全权提出了让步方案，把辽东半岛的割地大约缩小一半，即自营口经海城到凤凰城以南地区；赔款减少一亿两；保障占领地区也只限于威海卫一地。13日，征清大总督府的首脑部门以出征来施加压力，迫使清国接受让步草案。李鸿章从住处望见出征的船队，就在电报中说：“事态实为严重，若接受日本之要求，则京师尚可保全，不然，则局势当出意想之外。”17日，在日本的让步草案上签了字。

《日清讲和条约》(《下关条约》)，首先是推翻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打开了日本向朝鲜扩张的道路；第二，决定了琉球的永久归属，确定为日本的固有领土，并决定了悬而未决的尖阁列岛的领有问题[②]；第三，改变了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所规定的互有领事裁判权的体制。日本解决了明治初期以来的亚洲政策的课题，华夷秩序受到最后打击而崩溃了。日本打破了旧的东亚秩序而达到“脱亚”的目的，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的“入欧”。

日本获得了辽东半岛和台湾，变成了把朝鲜置于(日本)保护之下的“帝国”，和列强一样，转变为东亚的压迫者。赔款二亿日元(如加上辽东半岛的退还费就是三亿五千万日元)保证了维持帝国军备和奠定近代工业的资金。有了这三亿五千万日元的赔款，日

---

① 《伊藤博文传》下，第187页。

② 尖阁列岛的领有问题：所谓尖阁列岛，实指我国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系我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不属于琉球，马关条约亦未涉及琉球。——译者

本得以采用金本位制，日本资本主义就能够把以国际市场为前提的贸易立国和工业立国加到新的目标中去。并且，对清帝国获得了同列强一样的特权以及居留地与航路的扩大、在居留地设立工184厂和经营工业的权利等，使日本资本主义有了侵入广大的中国市场的可能。

第四节　三国干涉

十三　三国干涉的发生

通过《下关条约》，日本要求清帝国割让广大土地的意图已经暴露，对中国的瓜分，就从边境扩展到中心地区。对边境的割取，不论北部的伊犁，或南部的安南，其进行的方式都是从清国剥夺华夷秩序的朝贡国，华夷秩序已近乎虚有其名；而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的被剥夺，再加上日本又提出割让盛京省，这就意味着瓜分的刀刃已插入华夷秩序的心脏。但是，列强还未下定决心来共同瓜分清国的心脏部分。他们不是乘日本下手之机来竞相瓜分，而是选择了暂时制止日本下手，将来再竞相瓜分的道路。

《下关条约》签字的4月17日，俄国正式向德法两国提议对日进行干涉，并附带说："如有必要对日本采取战斗行动，那么，首先应该切断远征大陆的日军同本国之间的交通。"在俄国，主持干涉政策的是俄国资本主义的首脑、财政大臣维特（Witte, S.Y.）。俄国皇帝主张承认日本割取辽东半岛，而以（俄国）在朝鲜沿岸取得不冻港作为代价的政策。维特反对这种政策，他主张必须确保满洲，做为俄国的垄断市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不妨将旅顺军港让给日本，但强调决不能让日本插手满洲本土。俄国根据维特的意见，决定进行干涉。

对于俄国的提议，德国首先表示赞同。德国的赞同隐藏着三

个目的：第一，俄国干涉日本，把矛头转向远东，就可以缓和俄国向德国东部国境所施加的压力；第二，德国参加共同干涉，就可以在从东西两面压迫德国的俄法同盟中打进一个楔子；第三，可以在尚未准备好的瓜分中国的问题上确保发言权。为了达到上述三个目的，德国同意干涉。4月22日，德国外相向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提出指责说，日本“违背外交惯例，采取了任意妄为的措施”，并且谴责说：“世界决不会按照日本的愿望或命令来行事的。”①

法国担心由于俄法同盟，德俄之间一旦发生纠纷，法国就将卷入战争。俄国转向东亚，从而缓和德俄之间的紧张，这对法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20日，法国也通知俄国外交大臣参加干涉。

俄德法三国极力要求英国参加。但是，由于清帝国因战败而软弱无力，英国很需要在对抗俄国南下方面得到新的盟国。保持日本的友谊，已经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课题，英国政府的结论是：“远东的英国利益尚未遭到理应唯有依靠武力实行干涉那种程度的损害”，仍抱不参加干涉的态度。 185

虽然英国不参加共同干涉，但俄德法三国还是决定对日进行干涉。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走访外务省，正式宣布干涉；并指出以下四点。即如果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则（1）朝鲜独立将有名无实；（2）妨碍欧洲各国商业上的利益；（3）威胁清国首都；（4）给东洋的和平带来妨碍，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

俄国用武力支持干涉。几艘俄国军舰开进神户和被指定为和约批准地点的芝罘（烟台），摆出了如果拒绝干涉就立即诉诸武力的姿态。当时还风传俄国远东舰队已经接到二十四小时内能够进入战斗的命令②。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3页。

② 《伊藤博文传》下，第213页。

十四 接受三国干涉

陆奥宗光外相早就患有肺病，接到三国干涉通知时，他正在休养。他认为："我国政府最初即处于骑虎之势，故不管有任何危险，除表示维持现有地位、一步不让之决心外，别无他策。"[①] 在他看来，问题在于"外来之灾祸即使可以减轻，而内部发生之动乱将何以抑制?"他所一心忧虑的是"内外两难之中，如何权衡轻重"。为了不使内部发生动乱，他试图"暂先拒绝彼等（三国）之劝告"，以借此"一面刺探彼等真意之所在，一面研究我国军心民心之所向"[②]。伊藤首相推测，三国舰队将联合行动，"或则对我内地乘虚而入，或则切断我国与远征军之联系"，二者将居其一；乃抱定"只能和军舰大炮商量"的态度，询问陆海军当局"治国抱负及实际信心如何"。他们不得不坦白承认没有抗战能力，山本海军军务局长认为，这是"为抑制日后陆海军之非议"而采取的"一种对内手段"[③]。

在封住了陆海军的反对之后，伊藤博文首相在24日的御前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拒绝三国干涉，即使因此再增加敌国也在所不惧；第二，召开各国会议，处理辽东问题；第三，接受三国劝告，把辽东半岛归还清帝国。

会议首先确定："同第三国的友好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宜破坏，制造新敌国决非上策"，而采纳了第二方案，即召开各国会议之方案[④]。但是，在舞子休养的陆奥外相表示反对，认为召开各国会议的方案是自己招来新的干涉的"愚计"。剩下的只有第三方案，即归还辽东半岛。陆奥外相决心"对三国即使最终不得不完全让步，

186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11页。

② 同上，第11页。陆奥宗光，前引书，第252—253页。

③ 《机密日清战争·资料增补》，第10页。《山本权兵卫与海军》，第98页。

④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01页。

但对清帝国则一步不让”①。时距5月8日批准交换条约尚有时日，陆奥外相一方面向三国进行活动，以求撤回劝告或稍加缓和；另一方面则试图诱使美、英两国给与支援。三国干涉虽然反对目前瓜分中国本部，但却意图将来实行瓜分，而且是以兵力为后盾，在这一点上，同前年10月英国所提出的为事先阻止瓜分中国而进行联合干涉的方案有本质的不同。陆奥外相注意到这一点，便于26日草拟以营口和另一个港口做为自由贸易港的让步方案，命令驻英公使加藤高明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加藤指出：“俄国对满洲东北部及朝鲜北部之觊觎”，已很明显，并询问(英国)：“日本可指望得到英国何种程度之帮助?”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向(美国)国务卿指出，三国干涉是使清国“抛弃(下关)条约，重开战端”，并说日本“秘密仰赖美国之友谊援助”。但美国却回答说，如果“与局外中立不矛盾”，可以援助日本。英国的回答是，已经决定对此事完全不加干预，而协助日本也“不外是一种干涉”。意大利曾表示好意，但至28日，“口气稍有变化”②。这样，企图用英美意三国协商来对付俄德法三国干涉的政策就破产了。4月30日，内阁会议决定，保留金州厅，放弃辽东半岛，但遭到俄国反对；5月4日，决定放弃整个半岛。5月8日，日本全权代表伊东巳代治在芝罘同中国全权代表伍廷芳交换了批准书，《下关条约》开始生效。

退还辽东半岛一事，由5月10日的诏书和13日的《官报》发表，为国民所获知。为了抑制军部的不满，天皇向陆海军颁发了诏令，强调“国家前途来日方长”；山县陆相也前往旅顺的征清大总督府进行了慰抚。但是，退还辽东的责任问题，却在新闻界轰动起来了。陆奥外相对责任论进行反驳说，列国前来干涉，早在预料之中，但“当时我国国内之大势，果能使吾辈毫无顾虑施权宜之计乎”。他

①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256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2册，第40—44页，54页。

认为："政府虽对外有屈从之态，而事前之大势，实因内部有所顾虑，以至于此"，这才是"事实之真相"；并在结论中说："在我（指日本——译者）已进至所当进之地，而止于不得不止之处。"

十五　对朝鲜政策的转变

187　陆奥外相所谓"当进之地"，第一个就是朝鲜。《下关条约》以日清两国相互承认朝鲜独立而否定了华夷秩序，日本则以此为基础，计划单独统治朝鲜。单独改革朝鲜内政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而且，日本还要把广泛的要求强加于朝鲜。战争进行中的1894年12月，驻朝鲜的井上馨公使就向陆奥宗光外相提出了准备向朝鲜强行要求的纲要，这就是要获得（1）连结汉城和釜山、仁川和义州间的铁路舖设权；（2）电报线的半永久管理权；（3）军港适用地区的租借权；（4）海关监督权等特权；还有：（5）开放木浦及大同江口等港并划定居留地；同时，（6）贷给朝鲜银币五百万日元，以朝鲜全国的地税为担保，并在各地配备日本的监督人员，等等，内容是多方面的。井上公使认为，最重要的是第（6）项，即贷给朝鲜银币五百万元，这是效仿英国在埃及投资，从而在有关实利方面占据了地位。他强调贷给银币的重要性，指出，重要的是"从财政关系入手，然后扩及其它关系，以制造干涉的借口"①。

但是，日本的资本主义还未成熟到能够把输出资本提上日程的程度。三井银行和第一银行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确实保证，就难以同意为此项贷款而募集公债。1895年1月，井上公使强调："朝鲜政府难以渡过（旧历）年关，公使本身也无法维持其地位"，要求支持贷款②。政府只好从军费余额中提出三百万日元作为贷款。但是，经济界害怕银币外流将造成物价暴涨和经济混乱，向政府施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册，第476—477页。

② 同上，第28卷，第1册，第318页。

加压力，直到3月底，才决定一半用银币，一半用纸币，贷给三百万元贷款①。这样，井上公使才开始了“事关军事的重大事件”，即《铁路电报条约》的谈判。但是，朝鲜政府进行抵制说：“我国前为中国属邦之时，亦未曾有类如此次提出之铁路电报两条约草案束缚我国国权之事。”交涉难以进展，直到4月才好不容易签订了汉城—仁川间的铁路条约。其时，三国干涉已使“内政改革”无法进行。

三国干涉造成了新的形势，使得确定应付这种新形势的对朝鲜政策成为紧急的课题。陆奥外相于5月15日接到俄国将要求日军撤出朝鲜的情报，为了阻止俄国从朝鲜南下，又重新提到了去年8月内阁议案中的第四种方案，即各国联合维持朝鲜独立的方案。陆奥外相考虑，今后对清政策和对朝鲜政策必然要引起“欧洲各国之干涉”，因此不可能“单独进行”，乃于18日提出，可否以“由于英国和日本有共同利害关系，所以日本希望英国协助”为理由，向英国政府提议建立日英联盟②，要求伊藤首相决定。伊藤首相说正在仔细考虑，推迟回答；陆奥外相唯恐失去时机，乃于25日乘常 188 驻广岛大本营的伊藤博文首相、松方正义藏相、山县有朋陆相、西乡从道海相不在东京的机会，召集在东京的阁僚开会，决定了朝鲜中立化和列强联合维持朝鲜独立的方针，并决议把对朝鲜政策改变为“将来日本国和朝鲜国之关系应以条约所规定之权利为基础”，并向伊藤首相报告了此项决议③。

伊藤首相指出，英国在朝鲜的利益还没有达到必须甘冒与俄国开战之危险来加以保卫的程度，因此，在关键时刻英国有抛弃日本的可能；由此判断，把日本的命运寄托在日英同盟上是危险的。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册，第358页。

② 同上，第415页。

③ 同上，第434页。

26日，在天皇回东京途中，在京都紧急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此事日后再定。6月4日，为了商讨日清战后的对朝鲜的政策，重新召开了有伊藤首相参加的内阁会议。会议决议“今后对韩政策应采取尽可能不加干涉而使朝鲜自立之方针”，并加以解释说，换言之，这也就是“他动”的方针。其结果则是决定“朝鲜铁路电报（条约）一事，也不必强行实行”，于是，井上公使所推行的第二期内政改革遭到了挫折①。

6月4日内阁会议的决议否定了日英联盟的方案，而为日俄协商方案敞开了大门。但是，这也不是彻底的。日本对朝鲜只是“尽可能”不加干涉，而且这也是根据形势变化“他动”地决定的。这里就已经留有解释的余地，即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可以允许加以干涉。此后，对韩政策就一直摇摆不定，从与俄国断然对抗一直摇摆到日俄协商瓜分朝鲜，具体地说，就是从发动杀害闵妃的政变这种非常手段一直摇摆到山县—罗拔诺夫(Lobanov-Rostovski, A. B.)协商这种妥协政策。

十六　占领台湾

陆奥外相的“当进之地”，其二就是台湾。如果对韩政策不能如愿以偿，那末台湾则无论如何也必须拿到手。为了在各国插手干涉之前占领台湾，政府于1894年5月，提升桦山资纪军令部长为大将，任命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桦山资纪总督在冲绳中城湾会合从旅顺匆匆赶来、连冬服都未及更换的近卫师团，前往炎热的台湾去就任。

当时台北正在爆发一场独立运动。运动的主力是当地知识分子和地主富豪。他们于5月15日决定“台民独立”，并呼吁各国给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册，第441页。

予承认和援助。到23日，又发表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说“日本欺凌清国，要求割让我国领土台湾。台民虽曾多次向（清）朝廷请愿，终未奏效”，强调了台湾独立并不是与清国为敌；并宣布：“我台民与其事敌，毋宁死。会议决定将台湾岛改为民主国，一切国务将由公民选举之官员治理”，并推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于25日举行了独立典礼[①]。独立虽已宣布，外援则一处未见。对澎湖列岛感兴趣的法国，虽曾派来巡洋舰，给独立运动带来了希望，但仅使日本约定保持台湾海峡自由航行，台湾、澎湖列岛不得割让给别国就满足了。 189

以近卫师团为主力的日军于5月29日，在底澳[②]登陆，进攻台北。6月2日，桦山总督同清国结束了接收台湾的手续，在国际法上确定了对台湾的领有权。以唐总统为首的民主国大员听到日军进攻，就逃亡到清国本土。17日，日本举行了台湾总督府开始执政的仪式。但是台湾中南部的地方豪族和民众的抵抗却从此开始了。日本准许可以自由选择国籍，离境者可以携带财产，但对出生于台湾的多数民众来说，所谓离境自由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除了留在台湾进行抵抗之外别无出路。地方豪族和民众推举在中法战争中博得威名、镇守台南的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组织了义民军。刘永福宣誓“同台湾人民共生死”，进行抗战。日军被困于“有全台皆兵之势”的猛烈的游击活动和疟疾之中，投入了五万兵力、两万六千名杂役人员以及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对居民进行了无区别的屠杀，结果反而加剧了居民的反抗。11月18日，历时四个月，

① 黄昭堂：《台湾民主国的研究》，东大出版社，1970年，第60页。译者补注：唐景崧、刘永福宣言原文，与此略有出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201—202、204页。

② 原文作澳底，按《中国地图册》改。底澳在台湾北部，西去基隆约五十里。——译者

桦山资纪总督才能向大本营报告台湾平定；在此期间，日军却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四千八百名死亡和两万七千名负伤的巨大代价。

但是，反日武装斗争并未停止。1896年3月，日本虽然把军政移交民政，但台湾的统治乃是日本第一个殖民统治，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政府对此费尽心思。欧洲各国的殖民地政策分为法国式和英国式，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两种意见。第一种是法国式的同化主义，外务省顾问勒邦（Le Bon, M. M.）和台湾事务局委员原敬都是这个主张，其目标是要在将来“达到同日本本土无差别”①。第二种是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主张的英国式，他主张以文明为武器来收揽民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居民自治，以维持殖民地统治。日本政府起初采用法国式殖民政策，极力推行同化政策。结果在1897年5月8日决定台湾岛民国籍时，过去来自中国本土的多数岛民都放弃台湾，而改入中国国籍，而且许多居民起来加入抗日运动。讨伐队所杀害的“叛民”，从1898年起五年间达到一万两千人。

十七 《日清通商航海条约》的缔结

日清战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以粉碎华夷秩序为目的，其主要手段是与清帝国进行武力斗争；第二个方面是围绕瓜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问题与列强竞争，陆奥外交正是强烈意识到这一点而进行的；第三个方面是镇压出兵地区的民众。

190 由于三国干涉这种“未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方面是失败了。1895年10月爆发了三浦梧楼公使所策动的杀害闵妃的政变，这是驻外外交官为挽回第二方面的失败而采取的一种狂暴行

① 《秘书类纂·台湾资料》，《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70年，第32—34、309—409页。

动，它以惨败而告终。结果在陆奥外相患病期间，临时代理外相的西园寺公望只好向列强保证日军将来撤退，并且不得不正式通告对朝鲜内政采取“不干涉方针”。但接着，由于发生了朝鲜国王移居俄国公使馆的事件，又不能不同俄国合作。1896 年 5 月，同俄国缔结了《小村—韦贝备忘录》；6 月，又缔结了山县—罗拔诺夫协定，日本被迫确认了俄国在朝鲜的地位。日清战争，就朝鲜方面来说，其终局是：虽然赶走了清国，却把一个新的庞大的帝国主义俄国引了进来。

第三个方面，即镇压民众，以借口镇压甲午农民起义而出兵开始，以镇压台湾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告终，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这种镇压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但是，在这方面，日本也未能取得胜利。在朝鲜，反日运动加强了；在台湾，民众的抵抗也一直在延续。

既然在第二和第三方面未能取得胜利，那末，日本就势必非从第一方面即对清帝国武力斗争的胜利中摘取最大的果实不可了。1895 年 7 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提出四项要求，做为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第一是辽东半岛不得割让他国；第二是偿付库平银五千万两（合七千五百万日元）做为退还辽东半岛的代价；第三是开放牛庄、大连湾以及沙河镇[①]三港；第四是要求承认赵子沟和宁海[②]为靠岸港。内阁会议指定从外务次官调任驻清公使的林董为全权代表进行交涉，但因辽东半岛已非退还不可，日本无法采取强硬态度，交涉迟迟不得进展。此外还有俄国的干涉，结果日本陆续放弃了大部分要求，于 11 月 8 日，仅以减至三千万两（合四千五百万日元）的代价为满足而签订了《辽东半岛退还条约》[③]；12 月

① 沙河镇：即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地近鸭绿江口。——译者

② 宁海：即今辽宁省金县，见《古今地名大辞典》。——译者

③ 中文称：中日《辽南条约》、《交还奉天府南边地方条约》。——译者

17 日，结束了占领地区的交接工作。

缔结通商条约的谈判也是由林公使担任全权代表进行的。谈判的焦点是在新允许开港地区设立的制造工业的产品如何征税的问题。清帝国方面主张免除内地税的规定不适用于(在中国设厂)制造的产品。按照林全权代表的说法，在开港地区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实际并非出自日本本身的要求，是由于"别有用意"而加进和约之中的①，《日本》报断定，其用意是"对英国进行国际贿赂"②。1895 年 5 月，三井物产公司的益田孝向林董全权代表指出：清国一向禁止外国人开办纺织公司，这对日本有很大好处；如果欧洲各国凭其丰富的资金和多年的熟练技术，再用清国人的低廉工资来开办工厂，则"我国纺织业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之竞争"；他提出疑问 191 说："然则下关条约中解除此禁令之条款究竟为何？"日本的私人资本当时还未感到有在海外开设工厂的必要③。因此，林董全权代表认为"用意既已表达过，再对此坚持"已无必要，乃于 1896 年 7 月 21 日，把纳税问题作为未决问题放在一边，签订了《日清通商航海条约》④。后来，总理衙门以外国制造商在清国内地开办制造工业有损于(中国)国民之利益为理由，决定按进口物品课以同额之税款。由于有过上述经过，日本表示反对，但列强不打算同清国发生冲突，有意表示同意。林董公使乃于 9 月建议说，纳税问题之争论"有损无益"，与其固执这个争论，不如撤回对纳税有争议的条款，而代之以在上海、天津、厦门⑤、汉口等四处开放港口设立专管租界更为得计⑥。10 月，内阁会议同意了林董全权代表的意见，林董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29 卷，第 507 页。

② 《日本》，1895 年 12 月 9 日。

③ 林董，前引书，第 264 页。

④ 《日清通商航海条约》：中文称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译者

⑤ 原误刊为"厦门"，兹更正。——译者

⑥ 《日本外交文书》第 29 卷，第 508 页。

公使乃发表声明：如不同意设立专管租界，就拒绝批准通商条约。因为批准推迟一天，威海卫撤兵的交涉也将推迟一天，于是清国政府只好于1896年10月19日在同意设立租界的议定书上签字，次日，日本才答应批准交换通商条约。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日本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的五处还多；这个事实象征性地表明了日本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维新以来"独立"这一课题的完成，同时也就是"侵略"的开始。东京商业会议所兴高彩烈，认为由于撤回反对纳税的要求而设立租界，"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骎骎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断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①

日清战争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跳板。清国由于借用外债来偿付巨额赔款而迅速加深了殖民地化。与此相反，日本则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9卷，第519页。

192

第六章　日俄战争

(1896—1905)

第一节　日本、俄国在朝鲜

一　俄国的政治优势

1895年5月25日内阁会议所决定的日本进行日清战争的目的，在于割断清朝和朝鲜的藩属关系①。日本虽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朝鲜问题的处理却未能如愿以偿。这是因为三国干涉还辽以来，俄国登上朝鲜这个国际政治舞台，取代了战前的中国，摆出了一副要在朝鲜与日本一决雌雄的架式。日清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一样，也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略。自从俄国在1860年取得滨海州，1861年企图占领对马以来，这回初次采取了积极侵略东亚的政策。这样，朝鲜半岛和满洲此时就成了俄国政策的焦点。

在朝鲜，日本的三浦梧楼公使为了把亲俄派从朝鲜宫廷中清除出去，于1895年10月8日发动了杀害闵妃、拥立大院君的政变。但是通过这次政变所建立的亲日派政权，在1896年2月，又被亲俄派的政变所推翻，造成了国王及其家族和朝鲜政府迁入俄国公使馆达一年多的异常局面。日本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除这个局面，其结果，签订了1896年5月4日的《小村—韦贝备忘录》。这样，日本就正式承认了俄国对朝鲜有着与日本同样的利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册，第434页。

害关系。这是日本政治上的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允许俄国也可以出兵朝鲜；日本政府接受了俄国这种要求本身就可以说象征着俄国在朝鲜占有优势。接着，在下一个月，即 1896 年 6 月 9 日，于莫斯科签订了《山县—罗拔诺夫议定书》。山县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使俄国政府同意由日俄两国共同保证朝鲜的独立，但是这个目的并未达到，而日本政府希望由第三国来训练朝鲜军队这一点也未被接受。在其他问题上，在莫斯科签订的议定书只不过是在更高的立场上从政治方面确认了上月签订的《小村—韦贝备忘录》而已。

但是，在同一时间，罗拔诺夫外交大臣又与朝鲜特使闵泳焕在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定。这一协定除了包括俄国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对朝鲜提供军事、财政援助以外，还包括防御同盟的协议，约定在朝鲜发生重大国内骚乱和外国侵犯朝鲜独立时，俄国向朝鲜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于是，1896 年夏，俄国根据这一秘密协定，把新设立的俄华道胜银行的两名代表和一些俄国军人派至朝鲜。以一名上校为首、包括三名军官的十几名俄国军人，于 1896 年 10 月末到达汉城，负责训练新建的近卫兵团。此外，俄国的经济专家还与朝鲜政府缔结了秘密贷款协定；由俄华道胜银行以朝鲜关税收入为担保，向朝鲜政府提供贷款三百万元。这三百万元本来是供朝鲜政府偿还日本的债款的。1896 年 8 月末，又把鸭绿江流域的木材采伐权利给予了一个俄国人。

俄国在朝鲜势力的这种扩大，反过来就意味着日本对朝鲜影响的减弱。早在 1894 年 8 月 20 日，即日清战争爆发后不久所签订的《暂时日韩合作条款》中，日本即为“日本政府或日本某一公司”取得了京釜（汉城至釜山——译者）及京仁（汉城至仁川——译者）铁路的铺设权；但是，1896 年 3 月 29 日，朝鲜政府却把京仁铁路铺设权给了美国人莫尔斯（Morse, J. R.）。同年 7 月，又把汉城

至义州之间的铁路铺设权给了法国的一个辛迪加。因此，日本决心着手修筑京釜铁路。但是，这条铁路的铺设权也由于俄国公使韦贝的干涉，被朝鲜政府取消了。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直至1897年，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和日本影响的迅速减弱是十分明显的。

不过，日本政府当时也并非袖手而无所作为。1897年2月，朝鲜国王离开俄国公使馆返回王宫。次月，日本大隈外相公布了1896年的《小村—韦贝备忘录》和《山县—罗拔诺夫议定书》的公开条款，同时，把日俄两国所商定的将来有可能把朝鲜划分为两国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也告诉了朝鲜政府。这种作法无疑是为了降低朝鲜政府对韦贝公使的信任。朝鲜政府似乎还没有充分理解日俄两国可能把朝鲜半岛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的企图的严重性，但某些朝鲜官员对于越过朝鲜而搞的日俄协定却暗中表示不满。与此同时，斯佩耶尔(Speyer, A. A.)公使接替了有手腕的韦贝公使。俄国公使这种更替也成了使朝鲜人减弱对俄的好感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整个1897年，俄国仍然继续保持着在朝鲜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的迅速削弱则是进入1898年以后的事情。

二　日本的经济优势

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至1897年，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虽然很明显，但当时的特点则是，俄国在此期间并未准备利用其政治压力在朝鲜半岛培植充分的经济势力，从而也就未去建立与朝鲜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刻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就拿朝鲜利权中枢的铁路铺设权来说，取得京仁铁路铺设权的是一个美国人，取得京义铁路铺设权的是一个法国辛迪加，而俄国人或俄国辛迪加却一件也没有取得。

194

与此相反，日本即使在其政治影响衰退时期，也稳步地加深了与朝鲜的经济联系。日清战争爆发后不久的 1894 年 8 月 20 日，日本所取得的京釜和京仁两条铁路的铺设权，虽在 1896 年被朝鲜政府取消，但 1897 年 5 月 8 日，以涩泽荣一及三井系统的益田孝和三菱系统的瓜生震为核心的“京仁铁路承办组合”，却成功地从美国人莫尔斯手中接收了京仁铁路铺设权。当时“承办组合”付给莫尔斯的合同保证金是五万美元，后来当莫尔斯要求追加保证金二十万美元时，大隈重信外相竟由政府保证让正金银行贷款一百万日元作为京仁铁路的修筑资金①。日本就这样即使在政治影响衰退时期，对取得朝鲜铁路利权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与同时期俄国的朝鲜政策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以国家资本弥补民间资本的不足，或由政府保证来加以支援，坚决向国外投资，取得国外利权，这种日本帝国主义的独特的作法，在政治影响衰退时期已经表现出来。

日本在坚决要求朝鲜铁路铺设权的背后，当然有其军事性和战略性的意图，但也不可忽视这一事实，即日本在朝鲜贸易中，无论进口或出口，都是最大的顾主。试看日清战争前后，即 1893 年至 1902 年十年间朝鲜的进出口贸易数字，即可得出如下结论：②

第一、1893 年至 1902 年十年间，不论在朝鲜的进口或出口上，俄国一次也未超过日本。

第二、不仅如此，在这十年间，不论在朝鲜的进口或出口上，日本对俄国的优势，都经常是压倒的。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30 卷，第 347 页以后。前岛省三：《日清、日俄战争中的对韩政策》，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1 年第 3 号，《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清、日俄战争》，有斐阁，1962 年版，第 79 页。

② C.I.E.金/H.K.金：《朝鲜与帝国主义政治，1876—191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部，1967 年，第229—230 页。

195 第三、即使在俄国对朝鲜政治发言权最大，而日本的政治劣势最明显的时期(1896—1897 年)，朝鲜对日本的出口仍为对俄国出口的五十五倍至六十四倍，而朝鲜从日本的进口则为从俄国进口的五十五倍至六十五倍。

总之，三国干涉还辽后至 1897 年，俄国在朝鲜的优势，几乎纯恃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压力，根本不是建立在紧密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牢固的优势。因此，一旦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俄国军事、政治压力转变方向，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也就自然要发生动摇。事实上，1897 年底到 1898 年春，国际形势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为 1897 年 11 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华北的山东省被杀害，德国借此出兵，占领了胶州湾，由此引起了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于是，1897 年底以后，俄国对朝鲜的军事、政治压力发生变动，俄国在朝鲜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很自然的。

三 日俄的共处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占领胶州湾，对俄国和英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在俄国，虽然财政大臣维特摆出一副好象是中国领土完整的保护者的姿态，对德国占领胶州湾，打算采取支持清政府的政策，但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及军部却更热心于仿效德国的先例，占领旅顺口。1898 年 1 月，维特试图与英国结成反德联盟，作为最后的手段，但英国并不反对德国对中国的入侵，而把它作为对俄国在中国优势的一种牵制；事实上英德正在同清政府谈判联合贷款。但是，英国同时也在考虑让俄国对抗德国。于是，英国首相索耳兹伯里一面对俄国的建议提出意见说："不是瓜分领土，仅仅是划分势力范围"，一面又力求实现英德对清政府的联合贷款①。

① A. 马洛泽莫弗(Malozemoff)：《俄国远东政策，1881—1904》，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1958 年，第 105 页以下。

不久，英德联合贷款得到清政府同意而成立。俄国政府看到英德贷款成立，立即于1898年3月3日，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并于3月27日取得了旅顺、大连的二十五年租借权和南满铁路铺设权。另一方面，德国已于3月6日取得了胶州湾的九十九年租借权和胶济铁路铺设权以及矿山开采权。面对这种形势，英国政府便派遣舰队开往北方海域，想把俄国赶出旅顺，但考虑到俄法同盟，并未马上采取强硬措施。这是因为法国舰队正在印度支那待机而动。结果，作为对抗措施，英国政府决定于3月25日向中国要求租借威海卫。7月1日，英国取得了威海卫的二十五年租借权。法国也于4月9日，要求广州湾租借权和云南铁路铺设权，并于次日就取得了清政府的同意。总之，1898年春，列强已开始瓜分中国了。

196

这样，由于1897年11月至1898年初中国形势发生了如此急剧变化，不言而喻，俄国就把它的军事、政治压力焦点从韩国(1897年10月16日，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转移到中国来了。在俄国政府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在1897年12月11日前即已采取了“以旅顺口为目标”(Port Arthur orientation)的政策。12月19日，俄国舰队开进了旅顺口。

12月16日，日本政府向俄国提出抗议。抗议指出，俄国驻汉城公使什佩耶尔施加压力，指使韩国解雇韩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柏卓安(Brown,J.M.Mcleavy)，并于10月底任命俄国人亚力克塞夫(Alekseev, K.A.)为其后任，是违反1896年6月9日《山县—罗拔诺夫议定书》条款。这项抗议固然有争辩的余地，但热衷于旅顺口问题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却选择了姑息日本的道路。之所以如此，照穆拉维约夫的话来说，是因为考虑到“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俄国不容置疑地必须维持同日本的友好关系”①。

① 马洛泽莫弗，前引书，第107—108页。

再者，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的军备扩张也是俄国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1896 年春，俄国太平洋舰队拥有战舰两艘、装甲巡洋舰六艘和非装甲巡洋舰一艘。对此，日本海军是由战舰三艘和大部分属于旧式非装甲巡洋舰十二艘所组成，虽在数量上稍有差别，但是，俄国海军在技术上却保持着优势。不过，日本已于 1896 年着手建造一万五千吨的最新式雄伟型铁甲舰。于是，俄国也计划自 1897 年起建造战舰四艘（后据 1898 年 3 月 10 日敕令又改为六艘）。日俄之间的造舰竞赛便由此开始了。但是，因为建造军舰的速度慢，所以，就 1898 年的情况来看，两国的海军扩充计划还都没有达到发挥实效的地步。另一方面，就陆军来说，1897 年 11 月，日本的常备兵力为十七万，对此，俄国在远东可以使用的兵力约为四万。由于俄军战略分布广，日俄兵力的这种不平衡比率更加扩大了。就是说，1898 年的情况与 1895 年完全相反，日军兵力集中，而俄军兵力则因承担保卫铁路建设和守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以及乌苏里江国境线等第二线任务而被分散了①。

如上所述，由于 1897 年末至 1898 年春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日军数量比俄国远东兵力占优势，日俄海军兵力的微妙平衡等缘故，当时俄国在朝鲜问题上就不得不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了。早在 1898 年 1 月初，俄国政府已经向驻彼得堡的林董公使暗中透露：俄国希望以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具有超过俄国的重大利害关系为基础，与日本达成协议，以结束在韩国的“不断摩擦”②。1 月 15 日，又通过俄国驻东京公使罗森（Rosen, R.R.），正式提议进行有关朝鲜问题的日俄协商。1898 年 2 月 16 日，日本通过驻彼得堡的林董公使提出了新协定的初步草案。其内容是：（1）日本与俄国保证朝鲜独立；（2）由俄国任命朝鲜军队的军事教官；

197

① 马洛泽莫弗，前引书，第 108—109 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 1 册，第 109—110 页。

(3)由日本任命朝鲜的财政顾问官；(4)日俄两国在工商业方面采取新措施时，应事先达成协议。

针对日本的草案，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于1898年3月17日，提出了对应方案。其中，他表明了俄国政府的如下意向：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同时愿向日本保证不干涉朝鲜内政。两天后的3月19日，在东京，西德二郎外相通知罗森公使，"如果俄国把朝鲜交给日本，日本则可以承认满洲及其沿岸不属于日本利害关系范围之内。"这就是所谓"满韩交换"政策。1898年春，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以及西德二郎外相、小村寿太郎外务次官、驻彼得堡的林董公使等人都赞成"满韩交换"。

但是，当1898年3月27日，俄中《旅大租借条约》签订，俄国占据旅大成为既成事实之后，罗森公使却在4月2日答复西德二郎外相说："不能容许把俄国势力完全从朝鲜排除出去。"当时，俄国想既要避免以放弃俄国在朝鲜利益的明确保证来束缚自己的愚蠢作法，又要从朝鲜脱身。4月12日在朝鲜的俄国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同时辞职，上一年12月17日刚刚开办的俄韩银行也仅仅营业一个半月就关闭了。此外，以强硬政策的执行者而著称的什佩耶尔公使也奉命调去巴西。当时，就连俄国的"和平渗透"路线的推行者财政大臣维特也表现出对满洲比对朝鲜更大的兴趣了①。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正开始卷入下述的所谓"中国南部问题"，于1898年4月24日，与清国互换了《关于不割让福建的换文》②。就在这种形势下，日俄在朝鲜终于达成妥协。这就是1898年4月25日在东京签订的《西—罗森议定书》。议定书内容如下：(1)日俄两帝国政府确认朝鲜的主权和完全独立，互不干涉该国的内

① 马洛泽莫夫，前引书，第110页。

② 见《中日条约汇纂》第34—35页，此照会无名称，通称"福建不割让往来照会"。——译者

政；(2) 日俄两帝国政府在朝鲜向日本或俄国请求劝告和援助时，凡属任命练兵教官或财政顾问官的问题，应先相互协商，再作处理；(3) 俄罗斯帝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业企业非常发达，并承认侨居朝鲜的日本臣民数量很多，绝不妨碍日朝两国工商业关系的发展。

198

可以说，由于这个《西—罗森议定书》的签订，俄国首次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利害关系[①]。当然，日本还没有能够把俄国从朝鲜驱逐出去。但是，日本至少在对朝鲜政府的政治影响方面，已恢复了与俄国对等的地位，而且得以使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巨大经济利害关系，并使俄国约定不妨碍这一利害关系的发展。

例如，1898 年 9 月 8 日签订的有关铺设京釜铁路的《日韩条约》，就是《西—罗森议定书》签订后所获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而这种铁路利权正是涩泽荣一和前岛密等三菱系统的资本家们自 1896 年 8 月以来所一再要求的[②]。如果再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从《西—罗森议定书》签订至日俄战争爆发之间的大约六年里，日本和俄国在朝鲜半岛上可以说维持着一种"共处关系"[③]，但这种"共处关系"并不意味着势力的均衡，莫如说在"共处"的条件下，日本的经济优势变得越来越显著了。特别是在 1900 年俄军占领满洲以后，在俄国的决策者们看来，在朝鲜的利害仅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而与此相反，日本的决策者们却日益深刻地领会到，面对俄国的南进，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安全来说，在战略上该是何等重要。

① 马洛泽莫弗，前引书，第 111 页。

② 前岛省三，前引书，第 80 页。

③ C.I.E.金/H-K.金，前引书，第 96 页。

第二节　瓜分中国的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四　福建不割让和购买大冶铁矿石问题

1898年3月，当日本根据"满韩交换"的思想谋求与俄国妥协的时候，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以及西德二郎外相、小村寿太郎外务次官、驻彼得堡的林董公使等人，都是赞成这一思想的。当时唯一反对对俄妥协、主张与英国结盟并采取坚决行动的人，是驻伦敦公使加藤高明。他首先于3月23日，用电报表明了反对对俄妥协的态度，接着又于3月26日，以一系列文件向政府申诉了反对意见①。加藤认为，即使在朝鲜问题上暂时与俄国妥协，也必须同时保持与英国结盟以对抗俄国的态势。他的办法是利用威海 199 卫问题来做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加藤高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日军占领威海卫作为偿付日清战争赔款的担保，并决定在付清赔款余额后即归还中国；但是，英国却想向中国租借威海卫，以对抗俄国租借旅顺及大连。1898年4月1日，英国驻东京公使萨道义(Satow,E.M.)接到索耳兹伯里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训令，要他就英国租借威海卫问题，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第二天，4月2日，得到了日本政府表示同意的答复。

加藤公使之所以如此坚决主张促进与英国的合作，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已经在主张与日本建立联系。1898年3月16日，索耳兹伯里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Chamberlain, J.)招待加藤公使时就曾强调说"贵国与我国利害关系一

---

① 伊藤正德：《加藤高明》，上卷，1929年版，第313—330页。

致，处于可以合作共事之地位”，并谈到“贵国继续占领威海卫，英国方面不仅没有异议，而且此事与我国政策并行不悖”。“不过，贵国如果让出该地，英国或将认为随后自行占领该地为宜。”① 后来加藤回忆说：“日英同盟播种于威海卫”，从这里寻求日后日英同盟的思想根源，未必不可；不过，却不能说 1898 年春英国已经考虑要把与日本结盟作为国策，英国决心放弃其“光荣的孤立”，是在其后 1901 年秋间的事情②。但是无论如何，1898 年春，日本政府内部，与日俄妥协路线相对抗的日英合作路线已经出现，两者并存，这一点对于考察此后日本外交的发展，是应该注意的。

1898 年 4 月初，日本政府决定归还威海卫，于 4 月 22 日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出公文。公文指出：“威海卫撤兵，前已声明在案，……不外唯恐累及清国起见”，同时要求“清国政府方面则应声明不将福建省内各地让与或租给他国”。4 月 24 日，同样以公文取得了总理衙门的同意。这就是关于不割让福建的换文。这种外交手续与不久前法国获得广州湾租借权及云南铁路铺设权的手续是同一形式。虽然履行的是同一形式的外交手续，但法国同时取得了铁路利权，而日本却没有取得铁路利权。这么说来，是不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没有取得福建省铁路利权的野心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政府在成功地进行了关于不割让福建的换文之后，立即“进而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该省铁路铺设权不要落入他国之手”。并

200 于 5 月 7 日很快就得到了清政府对这一要求的答复。

诚然，当时清政府约定的只不过是：“并非约定不将福建省铁路铺设权给予日本以外之国家，只是……在有关资金和工程方面需要借助于其他国家时，首先与日本政府交涉。”但是，义和团运动

---

① 鹿岛守之助：《日英外交史》，鹿岛研究所，1957 年版，第 207—209 页。

② 中山治一：《关于英国放弃“光荣的孤立”的时期问题》，《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 17 辑，1957 年版，第 67—74 页。

时山县首相的所谓“经营南方”政策，其起源应该说是1898年4月至5月的这次日清交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约两年以后，在山县内阁时期推行的取得福建、江西、湖北、浙江四省铁路铺设权的计划，完全是上述1898年4月至5月之间日本政府要求的延伸。

但是，就取得铁路利权这一点来说，“中国南部问题”无论如何还没有超出计划阶段，可以说仅仅是作为将来的课题来考虑的。而为1897年5月开办的官营八幡制铁所（钢铁厂——译者）购买湖北省大冶铁矿石的问题，在1898年至1899年这一段时间里，却已经是现实的课题了。这是因为1898年秋，清政府汉阳铁政局督办盛宣怀一方面表示希望以大冶铁矿石与日本焦炭进行换货贸易，另一方面又在进行着“与英、比商人商谈借款事宜”。日本政府根据驻上海小田切万寿之助代理总领事的报告得知此种情况，便计划“贷款白银二百万两，作为汉阳铁政局和大冶铁矿等企业的周转资金”，用来垄断汉阳铁政局及大冶铁矿的管理。但是，铁政局督办盛宣怀的真正意图却在于缓和对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拥有重大发言权的德国的压力，使贷款条件更为有利，让德、英、比、日之间展开贷款竞争。因此，日本政府的企图终于落空，仅在1899年4月7日签订了购买大冶铁矿石的合同①。

1899年3月，日本政府独霸汉阳铁政局及大冶铁矿管理权的企图就这样破产了。但是，计划是否实现与这样一个计划曾被制订出来这个事实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应该是两码事。因为，正是在这个流产的计划之中，早已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政策即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2卷，第516页，第518—522页，第524—526页。藤村道生：《官营制铁所的设立和原料问题》，《日本历史》第292号，1972年9月，第88页。M.B.詹森：(Jansen)《八幡制铁所、汉冶萍与二十一条》，《太平洋历史评论》，第23卷，1954年，第34页以下。

将展开的那种独具特征的模式。在上述贷款谈判过程中，青木周藏外相于1899年3月13日谈及："就我方而言，由民间资本家向中国提供上述资金，在目前经济状况下，终究难以实行。但由他国资本家提供上述资金，把铁政局和大冶铁矿管理权完全交给他国人，这对日中两国关系颇为遗憾。因此，政府决定指令正金银行进

201 行上述贷款之谈判。"他还写道："上述资金虽然实际出自日本政府，但在表面上仍盼以政府毫不干预，作为纯属民间资本之借贷进行洽商。"① 这和三年半以后的1902年10月2日桂内阁小村寿太郎外相所确定的《对清、对韩最高国策》②，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政策。亦即在民间资本积累尚未达到势必进行资本输出的水平之前，强行向海外投放国家资本，企图由此获得矿山、铁路、水路等利权；这种独特的帝国主义政策早在1899年3月流产的计划中即已显露出来。如同小村外相所说，日本是把"在清韩两国扩大我国事业之经营，以取得与帝国现有地位相称之利权"③ 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并且把资本输出作为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置于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应该说，这标志着独具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形成④。可以说，从1898—1899年起，日本已处于帝国主义的形成阶段。

五　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日本

1898年9月2日，英国与德国商定，扬子江沿岸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黄河沿岸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承认了两国的铁路铺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2卷，第519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206—210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206页。

④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再版，第19页。

设范围。次月，总理衙门正式同意，为了修建前已公布的山海关—新民屯铁路，接受英国借款团提供的铁路贷款。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对英国资本的北进感到威胁，于1899年2月，再次与英国进行谈判，经过两个月的交涉，于4月28日达成谅解，亦即交换了所谓《斯科特—穆拉维约夫协定》的备忘录。通过这一协定，俄国承认扬子江流域为英国修建铁路的势力范围，英国则承认满洲为俄国修建铁路的势力范围。此外，根据同日交换的备忘录附件，俄国还承认山海关—新民屯铁路的修建由英国借款团提供贷款，并由英国人管理；另一方面，英国则接受了穆拉维约夫外交大臣划定势力范围的要求，承认长城以北的所有中国领土都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总之，1899年春，由于英国同德国和俄国的妥协，整个中国领土已经处于被列强的势力范围分割殆尽的危机状态。

上述的趋势，即德俄两国对中国压力的增大和英国势力的衰退，由于东亚以外世界形势的变化得到进一步促进。1899年3月，在中国的山东省，义和团举行起义。同月29日，发生了德军占领山东省沂州的事件。中国的形势越来越令人忧虑。但是，英国却遇到了使它无法专心致志处理中国问题的情况。这是因为英国和布尔人的共和国早就争执不休的南非问题，这时终于进入最后阶段。1899年6月，英国把第一批远征军派往南非。另一方面，在荷兰首都海牙，1899年5月18日召开了世界和平会议。这是应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1898年8月24日《敕书》建议而召开的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通过“和平渗透”来侵略中国，这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政策目标，而英国则无论如何也要制止俄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 202

正是在这种世界形势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 M.)在1899年9月6日，向英、德、俄三国递交了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的

照会，要求保证在中国的通商航海方面得到均等待遇。这个照会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俄国的。这样，自从“门罗主义”宣言发表以来，俄国和美国便首次在东亚形成对抗，而这同时就意味着东亚这时已成为全球规模的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焦点。海约翰照会的第三项说：“在清国要求利益或势力范围之各国”，“在其‘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该国船舶之港口税，并在其‘范围’内所敷设、控制或经营之铁路上运输属于他国公民或臣民的货物通过此种‘范围’时，所收运费不得高于本国国民在同等距离内运输同样货物所收之运费”。并“切望”“作出正式的保证”① 。这一条款是特别针对俄国在满洲的铁路计划而提出的要求，俄国认为，“这对俄国是敌对的”，如果接受这一要求，则对俄国在满洲的金融、经济上的利益来说，将会后患无穷② 。

另一方面，在英国，海约翰的照会则被理解为，对于长期孤立无援地负责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国家——英国，美国终于迈出了伸出援助之手的第一步③。实际上，海约翰照会虽然是由他的顾问柔克义(Rockhill, W.W.)④ 起草的，但是，这个草案无非是英国人希皮斯利(Hippisley, A.E.) 所写的照会的改头换面，岂但如此，有些部分甚至是原文照搬。

一些研究工作者过去一向过分重视这一事实，把海约翰照会说成是“起源于英国”。还有另外一些研究工作者则把海约翰照会理解为全球规模的国际政治“交易”的一个侧面的表现，说美国在东亚代英国承受重担，是为了换取英国不再插手加勒比海。 203

① 译文参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转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美国对外关系》，1976 年，内部资料)。

② 马洛泽莫弗，前引书，第 117 页。

③ C.S. 坎贝尔：(Cambell)《英美两国之间的谅解，1898—1903》，约翰斯·霍浦金斯出版社，1957 年，第 165 页。

④ 柔克义：后任美国驻华公使。——译者

但是，海约翰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肯定不是为了帮助英国摆脱困境。海约翰照会的起草人柔克义在1899年8月28日给海约翰的信中写道：“英国和俄国一样，都是中国的最大侵犯者，所以，美国的政策决不是英国的政策。”后来他又对俄国驻华盛顿大使强调说：“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也不想采取英国的政策”，认为“政府仅仅考虑本国的利害”，同时他还指出：“如果美国的政策偶尔与索耳兹伯里先生等其他人所宣布的政策落到一条线上而与英国的正式政策一致，那不过是难得的巧合。”① 实际上，美国政府内部也出现过敌视英国的意见。例如，驻北京的代理公使田贝(Denby, C. J.)就曾警告说：“美国在中国的最坏的敌人是英国”，并主张“应该促进同俄国的友好关系”②。

总之，海约翰照会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的要求，不外是向国内外宣布，现在美国已做为第三大国，一面与俄国对抗，一面与英国对抗，登上了东亚的国际政治舞台。但同时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并未因此与英国形成根本上对立的关系，却同俄国形成了国际政治上根本对立的关系。这是因为英国一向至少在形式上是主张中国“门户开放”的，无需因海约翰的要求而立即改变对华政策；反之，俄国却一直执行与“门户开放”根本不能两立的完全相反的政策，即以“划分势力范围”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因此，美英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能够建立一种一方表示强硬则另一方便表示退让的对立关系；而与此相反，美俄之间却只能形成一方的主张立即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全面否定的根本性对抗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俄国这种国际政治对抗的背后，存在着美国经济界对俄国将来可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恐怖感。例如，比霍布森(Hobson,J.A.)的《帝国主义论》还早一些，在1898

① 坎贝尔，前引书，第167—168页。

② W.A. 维廉斯(Williams)，《美俄关系，1781—1947》，八角书店，1971年，第34页。

204 年9月即以发表《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①] 一文而成名的美国财政金融问题专家、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兼实务家科南特（Conant, C.A.）[②]，在1899年2月发表了《作为世界强国的俄国》一文[③]。这是一篇警世的论文，它根据统计数字论证：在维特指导下，开始走上近代化和工业化道路的俄国经济，在十年或三十年后，将成为美国多么可怕的对手。可以说，美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当权者，这时就已经把俄国视为未来的经济大国，并且看到了与俄对抗的必要性。

1899年9月6日送交英、德、俄三国的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也分别在11月13日及17日送交日本和意大利，在11月21日送交法国。不过，美国驻日公使实际向外相青木周藏面交这个照会却是在12月20日。这时，日本政府已了解到英、德两国以"其他有关各国均无异议"作为"先决条件"，"承认"美国的提议。[④] 日本政府在12月25日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给美国政府的答复。当时，青木外相的意见是："不仅对其宗旨无可反对，……而且认为排除二三强国之垄断利益，或将对保全中国有益。"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青木外相在12月26日答复美国公使时说："各外国政府若均表同意时，帝国政府亦将欣然表示同意。"[⑤]

这里，最大问题是俄国对海约翰照会的态度。穆拉维约夫外交大臣直至12月30日才向美国驻俄大使面交了对海约翰照会的答复。"答复"说：宣布大连为自由港这一事实就是俄国想要遵守中

---

① C.A.科南特(Conant)：《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北美评论》，1898年9月号，第326页以下。

② 高桥章：《查·阿·科南特的帝国主义论》，《人文研究》(市立大阪大学)第23卷，第10号，1972年9月，第70—86页。

③ C.A.科南特：《作为世界强国的俄国》，《北美评论》，1899年2月号，第178页以下。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32卷，第215页。

⑤ 同上，第220—221页。

国“门户开放”的坚定意向的证明。“答复”还同意了海约翰照会的第二条，即有关在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征收关税的问题。但是，对于海约翰照会的第三条，即有关“在该（利益或势力）范围内所敷设、控制或经营的铁路线上”平等对待所有各国商品的要求，答复则只字未提。因此，俄国的答复，实质上等于拒绝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要求。而且，其结果就使得海约翰的照会遭到除意大利外所有有关各国的拒绝。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以“其他有关各国均无异议”作为“先决条件”的。1900 年 3 月 20 日，海约翰再次向有关各国发出照会。照会说，美国政府把以前对“门户开放”照会所表示的赞同看作是“最后的和确定不移的”，但这已不过是为了“挽回面子”而说的收场语罢了①。

205

总之，海约翰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的要求，终于未被有关各国接受，而俄国的否定尤其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果，它未能成为有关各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共同意见或协约，只是美国一国有关对华政策基本原则的单方面宣言。但是，由此宣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随着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强国，特别是成为在东亚与俄国对抗的强国，便具有了重大意义，这种意义甚至超出了国际政治上的共同意见或协约。这是因为后来在东亚方面的美、俄、日三国的关系，基本上取决于下述两种原则的对立，即对中国是采取“门户开放”政策，还是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而日本至少在 1906 年以前，反而利用了这种原则的对立，联美抗俄；而在 1908 年以后，则变为联俄抗美。

六 义和团事件和日本的大陆政策

如前所述，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中国“门户开放”要求的

---

① 马洛泽莫弗：前引书，第 118 页。

半年之前，中国山东省就发生了义和团起义，到处弥漫着不安的气氛。不久，1899 年 10 月，也就是英国人在南非发动布尔战争前后，义和团的骚乱蔓延到直隶省；而且，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抵抗运动的旗帜也越来越鲜明。针对这种形势，驻北京各国使团于 1900 年 1 月末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清政府虽然在 2 月发布了严禁义和团的命令，但是，义和团的势力却日益扩大。同年 5 月以后，天津，甚至北京也濒于危险。驻北京德国公使遭到袭击而死，是 1900 年 6 月20日。而 6 月 14 日，俄国陆军四千人已经到达天津。美国也决定派遣五千名陆军前往救援外交官员和侨民。与此同时，国务卿海约翰于 1900 年 7 月 3 日，再度向有关各国发出照会，强烈要求：采取克服危机办法，应不仅要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而且要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统一"。海约翰这一手是为了预防俄国对中国的侵略。

另一方面，清政府却忽而"称赞"义和团"有爱国心"①，忽而又向出兵北京的各国宣战，对待义和团的政策极端混乱。然而，事出偶然，在海约翰发出照会的同一天，即 1900 年 7 月 3 日，清国皇帝以个人名义致电日本天皇，请求日本天皇调停义和团事件。电文中有这样的话："彼称维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支，恐贵国（指日本）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须暂置小嫌，共维全局。"② 意思是说，对于西方列强侵略亚洲，日清的利害是共通的，因此，日清要共同进行抵抗。但是，清国皇帝的亲笔信，实际送交日本是在 7 月 11 日。日本政府早在五天前，即已决定出兵一个师团，援救驻北京的外交使团的侨民；此举同英国曾

206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33 卷，别册之 2，第 80 页以下。

② 河村一夫：《义和团事件和日本》；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57年，第 3 号，第 117 页。译者按：此件见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3 卷，第 34 页。同日，并致书英国和俄国。

强烈要求日本出兵有关，7月8日，英国甚至向日本政府表示"愿提供财政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7月14日，向中国公使面交日本天皇致清国皇帝的国书。国书答复说："自上月以来，各国派大军前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派遣兵员前往该地。"这就意味着日本选择了不与中国联合，而与西方列强采取共同行动的道路。开往天津和北京的日本军队成了八国（德、奥、美、法、英、意、日、俄）联军的主力而展开活动，8月14日，成功地救出了北京各国公使馆和侨民。

清政府已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让他负责与联军进行停战谈判。光绪帝和西太后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逃往山西太原，10月26日，又到陕西西安避难。清帝国正面临瓦解的危机，唯其如此，却预计停战和谈出乎意外地为期不远了。

在面临着这种形势的日本，山县有朋首相于1900年8月20日一边自问："若和局果真形成，我国将以何种方针处之？"一边自答说："必须预先确立一定之方针，……以期不误"，并写了题为《关于北清事变（即义和团运动——译者）善后》的意见书[①]。这个长篇的意见书，仅有一处由青木周藏外相加注意见，看不出曾被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决定的形迹。但是，无论从当时山县居于日本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来看，还是从他同外交大臣（青木）和军部的关系来看，都不能设想他的意见会因遭到无法抗衡的反对而被否决。所以，可以认为，这个意见书反映了包括军部在内的当时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的基本思想。

山县首相强调说："世之论经营北方者，欲乘此次北清事变之机，将朝鲜全部划归我国势力范围；或以约许不妨碍俄国经营满洲，使俄国承诺我国经营朝鲜"，如此等等；还强调说"此次事变，在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之3，第947—953页。

"彼确为无上之良机，而彼之良机，亦应务使成为我国处理朝鲜之良机"。然而，根据"满韩交换"的思想来处理朝鲜问题，现在还不是时 207 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即令彼有意以经营满洲交换处理朝鲜，而北清战乱未已，满洲之处理尚非可议之时，彼既不能约定与处理朝鲜相交换，我方于理亦苦于无可强加之辞"。因此，目前日本应采取的策略是"莫如此时先行经营南方，并伺机与俄交涉，以达经营北方之目的"。山县的结论是："取朝鲜何必非今日不可？谚云：追两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逐鹿支那，光追南方一兔，捕获之后，再追北方一兔，犹未为晚也。"

总之，当义和团事件引起瓜分中国的危机之际，山县首相确立的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北守南进"。这里，问题是"南进"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山县在同一意见书中，作了如下规定："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主张"计议此次善后时，亦应求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他推测说："果尔，则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他还断定："在划定此种势力范围时，……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亦只宜依他日之形势而定。"[①]据此已可清楚看到当时日本政府所设想的"南进"政策的具体内容。

山县首相写下这个重要意见书两天之后，即1900年8月22日，参谋总长大山岩经天皇批准，训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一有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之3，第951页。

机会即应占领厦门。接着，8月24日，厦门的大谷派本愿寺遭暴徒袭击烧毁，当即有一小队水兵和侦察队从停于厦门、负责警戒的“和泉”号军舰登陆。另外，8月27日，又有两个步兵中队从台湾开往厦门。日本在台湾海峡的这种迅速而果断的独断军事行动，立即引起了列强的疑虑。8月28日，驻厦门英、美、德三国领事向驻厦门日本领事上野要求撤退日军。第二天——8月29日，英国驻东京代理公使根据索耳兹伯里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训令，向青木外相提出了口头照会，询问“日本帝国政府在厦门拟采取的行动的性质及该行动的宗旨”。这时由于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也反对从台湾派出陆军，于是，大山岩、桂太郎、山县有朋、青木周藏也只好打消了强行出兵厦门的念头。当天，即英国代理公使向青木外相提出口头照会的同一天，下达决定，命令日军从厦门撤退，连登陆的水兵也包括在内。 208

就这样，日本陆军（大山参谋总长及桂陆相）和山县内阁（山县首相及青木外相）打算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出兵厦门，在福建建立立足点的企图，由于遭到列强的抗议和海军（山本海相）的反对而惨遭失败；但是，要把福建变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意向，却决不仅仅是因一时骚乱而引起的单纯念头。1898年4、5月间的《不割让福建的换文》和日本在福建省内敷设铁路的要求，已经在前面谈过。1898年11月成立的第二次山县内阁，继上述要求之后，又进一步计划修建穿越福建、江西、湖北、浙江四省的铁路，决定要求取得这一铁路的敷设权。这个方案是于1900年2月1日由青木外相起草，于3月31日经内阁讨论决定的。方案要求清政府同意：“日本国铺设起自福建省厦门，途经该省福州及光泽和江西省的抚州及南昌，直达汉口（湖北省）的铁路干线；并铺设自福建省福州至该省罗源、自江西省南昌经浙江省衢州至该省杭州的铁路支线；”“上述铁路的铺设由日本商人及中国商人组成的公司或组合担当

之”；并要求“日中公司或组合，有权在前述铁路沿线距离三十里以内，采掘煤炭及其他矿产”①。这些要求，正如青木周藏外相本人也承认的那样，显然是以德国在山东省的经营方式为样板的。

这个要求方案送交驻华的西德二郎公使，是在1900年4月10日。西公使看到如此庞大的要求，感到震惊，表示担心说：“帝国政府提出铁路要求时，若不采取断然手段，则不仅不能成功，反将招致轻侮。”特别就与中国谈判的方法问题，提出建议说：“在向清国中央政府提出该件之前，有必要探知有关各总督之意向，进行工作，尽可能使他们表示同意，以打下实现我方要求之基础，然后伺机向中央政府提出。”② 但是，青木外相竟无视西公使的意见，于5月31日，训令立即提出上述对清要求。因此，西公使也只好在6月5日，面会庆亲王及各大臣，递交了上述要求的照会。对此，清政府于6月13日复照表示拒绝。1900年6月间的情况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开始同联军交战是6月14日，此后，西公使即使想与清政府继续交涉中国南部铁路问题，事实上也不可能了。

这样，1898年开始提出，并在1900年2月再次提出的日本对中国南部铁路利权的要求，由于义和团起义，在1900年6月中旬以后，就不了了之；结果是直到1903年1月以后，小村外相再度开始进行交涉之前，不得不束之高阁。但是，试看这次交涉的经过，并把它和购买大冶铁矿石的交涉过程一并加以考察时，即可看出，209 日本政府对中国南部的关心，其渊源决非浅显。同时，它说明处于形成阶段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企图向哪个方向发展；说明其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确实是指向由台湾而福建而江西以及浙江、湖北这些地区。上述山县有朋首相于1900年8月20日所提出的“北守南进”意见，的确不外是在这种背景下确立的国策的基本方针。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264页。

② 同上，第266页。

当然，山县首相绝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即由朝鲜而满洲，亦即所谓“伺机与俄交涉，以达到经营北方之目的”。后来日本帝国主义注定要经常面对的叉路口，即“北守南进”，还是“南守北进”？也就是“海主陆从”，还是“陆主海从”？这种何去何从、二者必择其一的局面，应该说在这时已经以上述形式开始显露出来了。

第三节 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与日本

七 满洲问题和日本

1900 年 6 月上旬以后，由义和团引起的骚乱已波及南满。7 月 4 日，发生了奉天附近中东铁路被破坏和北满铁路警卫及职员被杀害的事件。面对这些情况，俄国政府于 7 月 9 日，命令东西伯利亚军开往满洲。7 月末至 8 月初，俄军占领了珲春、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和瑷珲等地。9 月 2 日，俄军把清军赶出了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地区，9 月 23 日占领吉林省会，从而完全占领了北满。9 月末至 10 月初，辽阳、奉天、铁岭等地均已陷入俄军之手，俄军由此大体上占领了整个满洲。

当时日本驻俄公使是小村寿太郎。早在 7 月 22 日，他估计俄国很快就要占领整个满洲，就向青木外相提出了如下意见：应趁此机会谋求从根本上解决日俄在朝鲜的对立。他指出：“目前时局应视为能在安全和持久之基础上，与俄国达成相互谅解之最好时机。”他还献策说：“应采取之最好方针是提议划定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和满洲，日本与俄国互不妨碍，并且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互相保障通商自由”①。对此，青木外相反应异常迅速，四天之后，即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33 卷，第 699 页。

7月26日，就把《满韩势力范围协定案》送交小村公使，并训令他就商定满韩势力范围问题，与俄国开始谈判。但是，当时似乎没有得[210]到俄国方面的响应。8月4日，小村公使提议"暂缓提出协定案"。就这样，日本企图趁义和团事件之机与俄国进行交易，把朝鲜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策略，终于未得公诸于世，而上节所述1900年8月20日《山县侯意见书》所提的"北守南进"策略，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出来的。

但是，即使在《山县侯意见书》提出"北守南进"方策之后，青木外相仍未放弃利用义和团事件的骚乱，把朝鲜纳入势力范围的愿望。1900年8月27日，青木外相训令驻柏林公使井上胜之助，就朝鲜置于日本势力范围时德国的态度及措施一事，对德国政府的意图进行刺探。此后，与德国的这一交涉直继续到10月初，但是，随着10月7日第二次山县内阁辞职，第四次伊藤内阁成立和由加藤高明取代青木周藏担任外相，这一交涉便结束了。这是因为加藤就任外相后不久，英国与德国就中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加藤外相确定了加入英德协定以对抗俄国的政策。

1900年8月下旬，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亦即日本的山县首相提出"北守南进"政策时，在欧洲，英国和德国也正在为确立对华政策而焦虑。当时的德国，不仅承认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进一步主张"如有一个强国欲在扬子江流域适用不同于门户开放的原则时，该国即将不能不与德国为敌"，而且采取了要把这种主张通知英国政府的态度①。此外，俄国与法国也于1900年7月末，询问德国政府："德国是否认为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行动值得忧虑？"因此，英国在确立对华政策时，必须估计到以下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德、俄、法三国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再次进行

① 中山治一：《扬子江协定成立前后的英德关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第5辑，1953年，第282页。

合作；另一个是美国因中国"门户开放"问题的关系，也不是不可能站到德国一方的。于是，在1900年10月下旬以后，英国不断与德国交涉，结果达成了协议，这就是1900年10月16日的《英德协定》(《扬子江协定》)。

这个协定条文的第四条规定，两国应将"本协定通知其他有关各国"，包括日本在内，"并劝导其承认协定所记载之原则。"[1]于是，加藤高明外相在10月29日向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发出通牒说："日本政府毫不踌躇地公开声明，加入该协定并承认该协定所记载之原则。"亦即日本也作为正式缔约国，加入了有关中国的《英德协定》。这件事意味着，加藤外相看出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中含有制止俄国对华侵略的因素，打算把英德作为遏制俄国侵占满洲的防波堤。因为当时英国也想把满洲包括在上述协定范围之内，借此把俄军赶出满洲。 211

但是，对于俄国占领满洲的欲望和德国的态度，加藤外相和英国政府所作的估计，应该说是太天真了。前已述及，俄国从1900年9月底到10月初完全占领了满洲，绞尽脑汁设法使这种占领合法化，于11月26日，与盛京将军增祺签定了《暂定满洲军事条约》[2]，但是，这个条约内容泄露出来是在1900年年底，而被《泰晤士报》揭载出来则是1901年1月3日。对此，加藤外相于1月26日训令驻伦敦的林董公使通知英国政府：日本政府认为目前的满洲事态明显地属于《英德协定》第三条的范围，同时让他就这一问题要求英国政府表示意见，并询问英国是否拟采取某种措施。但是，根据林公使的观察，英国政府似乎拿不出什么好办法，而且关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57页。

② 暂定满洲军事条约：即增祺擅自签订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九条，由周冕与俄交涉总管于11月8日议订，增祺于11月30日画押，1901年1月30日清政府否认该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一)，第978页。——译者

于将采取什么措施则不作任何明确表示，情况是："除了说要注意观察俄国今后之动向之外，再听不到其他想法"①。另一方面，德国对这个问题认为"由于德国在满洲不能发挥任何力量，……所以该协定不应适用于满洲。②

这样，加藤高明外相想借英德之力，运用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通过日、英、德的共同压力来阻止俄国统治满洲的策略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1901年3月21日，加藤外相竟不得不写下："在目前状况下，不能指望取得任何国家之有力援助，故帝国政府不应依靠此种援助，迫切需要决定单独处理此问题之方针。"③但是，在1900年10月下旬至1901年3月初之间，加藤外相以英德为对手顽强地一再进行的外交交涉，决非徒劳无益。为什么呢？因为以这次交涉为背景，从1901年1月下旬以来，在伦敦出现了一种日英德同盟的设想，而这一设想所孕育出来的萌芽，后来就结出了日英同盟之果。

八　日英同盟的成立

1901年1月22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女王的外孙，为参加葬礼前往伦敦。当时，他曾多次责难俄国侵略中国，甚至说出英德同盟这样的话。接着从2月上旬到3月下旬，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参赞埃卡特施泰因(Eckardstein, H.F.)与英国外交部和驻伦敦的日本公使林董频繁接触，提倡日英德同盟的设想。1900年11月12日以后，在英国政府里，澜斯顿(Lansdowne, H. C.)接替了索耳兹伯里首相的兼职，担任专职的外交大臣。他不是索耳兹伯里首相那样的孤立主义者，倾向于英国需

212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册，第121页。

② 同上，第145页。

③ 同上，第206页。

要盟友的想法。于是，澜斯顿外交大臣与埃卡特施泰因参赞的秘密活动相呼应，在1901年3月12日起草了英德应给予日本军事援助的共同宣言，也就是一种日英德同盟的方案。不过，这一方案在第二天3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未被采纳。

曾与埃卡特施泰因进行接触的林董公使，在1901年4月9日和15日发出的报告中，把他的日英德三国同盟方案呈报给加藤外相，经加藤高明准许后，随即于4月17日直接试探澜斯顿外交大臣的意向。日英同盟的交涉可以说从此开始，但直到1901年秋，这一交涉并无显著进展。这是因为这年春天，英国首相索耳兹伯里去法国南部休养，而在日本则由于政府财政方针的关系，政局一直不稳。伊藤首相提出辞呈之后，经过一个月的难产，在1901年6月2日，才成立了第一届桂内阁。日本政府正式开始考虑与英国结成同盟，是在这次内阁期间。

当时，回国休假的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McDonald, C.)与驻伦敦的林公使进行会谈，吐露了英国方面的真情。据称，英国国王和索耳兹伯里首相都并不反对与日本结盟，"英国政府并非无意结成这一同盟，无奈，由于南非战争尚未结束，日前不便断然实行。在此期间，日俄是否有结盟之虞?"① 值得注意的，是林公使经过7月15日和16日两天与窦纳乐会谈所得的感受。根据感受的印象，林董公使提出建议强调说："看来英国政府由于某种原因，屡次表示害怕日俄联合；因此，我想利用这一时机，作出如果日英同盟没有希望，日俄就可能联合的姿态，刺激一下英国政府，就可达成有利的协议。"这个报告于1901年7月18日发出，而外务省接到的日期则是8月21日②。

在伦敦的林董公使不了解东京的情况，也是情有可原的，但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2—23页。

② 同上，第24页。

“是否有日俄结盟之虞?”英国的这种忧虑却决不是没有来由的。元老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早就热心于和俄国搞好关系，这时仍然相信与俄国有妥协的可能。同是元老的山县有朋早就赞成日英德三国同盟的设想，甚至在1901年4月曾向当时的首相伊藤建议推行日英德三国同盟政策。在这之间，桂太郎首相听说英国的澜斯顿外213 交大臣曾在7月31日对林董公使说过:“朝鲜之于日本，其利害等于德兰斯瓦尔(Transvaal)之于英国”①，就在8月3日以后着手说服伊藤和井上。8月4日，伊藤回答说，如果英国承认日本对韩国的要求，就可以开始谈判结盟问题。据桂太郎首相的解释，伊藤这样回答，意思是说英国决不会承认日本的要求的②。甚至到了8月26日，伊藤还说:“英国政府只图一己之利，不顾其他，与之联合，效果甚微。”③那时，伊藤经与井上协商，打算亲自访问彼得堡，以刺探与俄国妥协的可能性。本来为了接受耶鲁大学的名誉学位，并为在辞去首相后略事休养，他曾决定访问美国，于是便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把旅程延长到俄国。9月18日，他离开横滨出国。

伊藤出发后三天，9月21日，在北京的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就任外相。在桂内阁成立时本来已内定他任外相，但因处理义和团事件的善后，未能离开北京，直待9月7日签订了《义和团事件的最后议定书》(即《辛丑和约》——译者)，才于9月19日回国。小村根据他在中国的经验，已转到强硬对俄、日英合作的立场。就任外相后，立即以《致驻英公使电稿》的形式，制定了最初的同盟条约草案;10月7日，取得桂首相、山本海相和儿玉陆相的同意，随即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册，第26页。(德兰斯瓦尔:在南非，布尔人曾在该地建立共和国，1877年被英国殖民者强行吞并，但布尔人一直进行反抗。1881年英国政府被迫恢复其“独立”，1899年又发动英布战争，强行并入英属南非联邦。——译者补注)

② 德富猪一郎(编述)《公爵桂太郎传》乾卷，1917年，第1057—1058页。

③ 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编):《故井上公传》第5卷，1934年，第8—9页。

于10月8日授权林董公使"开始公开交换意见"。于是，自1901年10月16日第一次正式会谈至1902年1月30日签订协约，在此期间，林公使和澜斯顿外交大臣反复举行了会谈。

但是，正如在日本内部有伊藤和井上两元老那样的对俄协调论者一样，在英国也有强有力的对俄妥协的论调。澜斯顿外交大臣要说服内阁中的对俄协调论者很感棘手。这里，十分有趣的是，英国致俄国的建议和对日同盟方案，在英国政府内部完全是同时准备的。1901年10月25日，起草了发给驻彼得堡的英国大使馆的训令，就在同一天，索耳兹伯里首相表示同意外交部的对日同盟方案。所谓英国致俄国的建议，是指关于满洲的英俄协定和英俄共同向波斯（今伊朗——译者）提供贷款的建议，此建议于10月28日在内阁会议通过；而提请内阁会议通过的有关日英同盟的文件，也是在这一周准备的。11月4日，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Lamsdorf,V.N.）拒绝了英国有关共同向波斯提供贷款的建议，同时还要求英国不要过问满洲问题。11月6日，在一次决定性的内阁会议之后，澜斯顿外交大臣向林公使面交了英国方面有关日英同盟的方案。

试看英国政府内部的上述活动，便可知道，在1901年11月初，英国面临一方面认清对俄妥协是绝无希望，另一方面日俄妥协又并非绝无可能的现实，这才终于下定了同日本联合的决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元老伊藤于11月4日到达巴黎；他在巴黎一面与伦敦的林公使及本国政府取得联系，一面做好了访问彼得堡的准备。11月27日，伊藤抵达彼得堡，12月2日和4日两次与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会谈，12月3日又与维特财政大臣进行了会谈。伊藤当然没有作出任何约定，于12月4日前往柏林，但伊藤这一行动当然给英国政府以很大的刺激。日俄协调论者伊藤的行动，却起了促进缔结日英同盟的作用，这只能说是历史的讽刺。 214

当然，并无任何证据说明伊藤博文采取上述行动是一种促进日英同盟的佯攻战术。但是，至少桂太郎首相似乎认为，伊藤的行动有助于使英国靠拢日本。12月6日桂首相曾对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伊藤访问俄国引起了许多流言，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掩饰真相却很有利。"桂首相的这番话，应该同7月18日林公使报告书中所说的"我想作出如果日英同盟没有希望，日俄就可能联合的姿态，刺激一下英国，就可达成有利的协议"这些话对照起来加以玩味。

12月6日，伊藤博文从柏林电告本国政府，建议暂时推迟日英同盟谈判，这一电报到达本国是12月8日夜间。这时，日本政府已通过12月7日的元老会议决定了有关日英同盟的最后态度，与伊藤的想法最接近的元老井上馨也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赞成缔结日英同盟。12月9日，桂首相取得天皇的批准；12月12日，把元老会议的决定通知伊藤，并征求其同意。总之，日本在1901年12月7日做出了有关国际政治进程的重大决断。此后的日英同盟谈判，可以说已只是最后的事务性工作了。对日本来说，最主要的目标是解决韩国问题。这一点，由于日本承认了1902年1月24日的英国方案，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就这样，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协约》由林公使和澜斯顿外交大臣签署，即日生效。2月11日，在东京和伦敦同时公布。

这个所谓的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由协约条文和秘密文件两部分组成。秘密文件约定，两国海军配合行动，并在远东海域保持优势。协约条文除前言外，分为六条。第一条规定，相互承认尊重并维护日英两国在中朝两国的"特殊的""特别拥有的"利益；第二条规定了中立的义务；第三条规定了参战的义务；第四条规定了与第三国签订其他条约的条件；第五条规定了相互通告的义务；第六条规定了条约的期限（五年）。对日本来说，这个条约的最重要的

问题在于：对于不诉诸战争而制止俄国占领满洲（对朝鲜的威胁），它能起多大的作用？以及在与俄国开战时，它又有多大的用处？俄国方面也已充分体会到了这条约的意义。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在接到日英条约成立的通报时，他一边掩饰着内心的震惊，一边电告驻日公使伊兹沃尔斯基（Izvolski, A.），夸口说："只有时间将告诉我们：俄国为保护自己在辽东的利益，应采取何种措施。"

九　日俄交涉

日本政府之所以建立日英同盟，是为了把它当作解决"满韩问题"的手段。俄国在 1901 年 1 月，曾以韩国中立化为诱饵接近日本，因此，如果仅仅是"韩国问题"，那时也许会通过日俄交涉达成妥协。但是，当时的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主张："韩国问题之解决如不同满洲问题联系起来，则不能令人满意。"① 当时的外相加藤也采纳了这个主张。他说："俄国占领满洲，其本身虽不会直接与我利益发生重大冲突，但其结果则俄国势力将统治朝鲜半岛，有进而危及帝国自卫之虞"②，甚至还在 1901 年 3 月把处理"满韩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提交内阁会议讨论。日清战争后，"朝鲜问题"就这样被改作"满韩问题"来处理了。与英国的同盟，正是当作处理这个问题的最适当的手段而被选中的。

俄国自 1900 年秋以后继续占领着满洲。在整个 1901 年中，俄国为了以撤兵为交换条件而取得各种特殊权益，与中国反复进行了交涉。对此，中国在各国，特别是日本及英国的幕后支持下，一直勉强拒绝了俄国的强求。当时，清政府外交机构中的关键人物是庆亲王。据说，日英同盟条约公布后不久，2 月 20 日，庆亲王与英国驻华公使会谈时，曾明显流露出"如果拒绝（对俄国的要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34 卷，第 524 页。

② 同上，第 203—208 页。

求）签字，不知将发生何种事态，满怀忧虑之情”。英国公使鼓励庆亲王说：“英日同盟并非无谓之恫吓，对此大可不必担心。”① 显然，日英同盟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俄中交涉，作为侧面的压力，起了有效的作用。

于是，1902 年 4 月 8 日，如此强横的俄国也终于签订了《满洲撤兵协定》②。条约的第一条规定，俄国“允许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第二条分别规定：(1)六个月以内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军，并交还铁路；(2)再过六个月，撤退盛京省其余各地和吉林省所驻俄军；(3)又再过六个月，撤退黑龙江省所驻俄军。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忠实执行这一条约的规定。1902 年 4 月 29 日，山海关—营口—新民屯的铁路，根据特别协定，移交中国官方。由此，俄军驻扎辽河以西已经失去意义，遂即从该地撤退。总之，俄国政府在最初六个月还是遵守 1902 年 4 月 8 日的俄清条约，实行了撤兵的。

216

但是，俄国政府并未实行应于 1903 年 4 月 8 日以前完成的第二次撤兵，反而在 1903 年 4 月 18 日，以强硬的态度向中国提出了“七条要求”。这件事意味着，1902 年10月 8 日至 1903 年 4 月 8 日这一期间，俄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俄国远东政策中的“和平渗透”路线转变为“武力压服”路线了。从其后果来看，可以说，由于这一转变，俄国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若问引起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那就是俄国远东政策负责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即：1902 年下半年至 1903 年，在俄国，别佐勃拉佐夫(Bezobrazov, A.M.)集团掌握领导权，财政大臣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35卷，第 188 页。

② 《满洲撤兵协定》：即《交收东三省条约》，见《光绪条约》67 卷，第 6 页。以下引文均按原文照录。——译者

维特下台。

所谓别佐勃拉佐夫集团，是指以退伍近卫军人别佐勃拉佐夫为主谋的一伙宫廷贵族。他们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直接勾结，追求以鸭绿江流域的木材采伐权为中心的私利。关于俄国政府内部势力更替的过程，不暇详述，这里仅仅指出势力更替标志的事实，是1903年8月13日，设置远东总督府，其后半个月，即8月28日，罢免了维特财政大臣。远东总督府是统辖关东和阿穆尔州①的军政兼摄的统治机构。设置这一机构之所以对远东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关系，是因为从此俄国对华、对韩、对日的外交指导权都交给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Alekseev,E.I.)了。此后，俄国的对日交涉，已不经由外交大臣拉姆斯独夫，而是经由总督阿列克塞耶夫来进行，而阿列克塞耶夫则听命于别佐勃拉佐夫集团和沙皇。

就这样，从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夏，俄国改变了远东政策，并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另一方面，正如小村寿太郎外相在1901年12月7日意见书中所说，日本既然以"与英结盟，以此联合势力迫使俄国顺应我方之要求"②为目的建立起日英同盟，同盟一经建立，当然要对俄采取强硬路线。如上所述，通过日清战争的"战后经营"而进入帝国主义形成阶段的日本，如今在日英同盟建立后与俄国的对抗关系之中，已经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而走向成熟，从而自觉地确立其帝国主义的政策了。这次，政策的制订者又是小村外相。1902年10月2日，桂内阁根据小村外相的请求，经内阁会议决定拨付"清韩事业经营费"。所谓"清韩事业"，其内容是：以向韩国政府提供贷款为交换条件，使"贯通韩国之铁 217

① 关东：原泛指山海关以东，即我国东北地区。沙俄强占我旅顺、大连以后，将该地区擅自命名为关东州。阿穆尔州，在西伯利亚东部，黑龙江以北，原属我国，1858年，沙俄通过瑷珲条约掠走。——译者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7页。

路干线”“完全归于帝国所有”，使“整个韩国归于我国势力范围”；在对中国方面，除了由政府投资设立日清银行并在天津和上海设立商品陈列所之外，还要调查中国南部及扬子江流域的矿山、铁道线路、水路、商业情况等①。也就是通过投入国家资本，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侵略目标的重点，侧重于朝鲜和南满，中国南部则在其次。如前所述，义和团事件当时，山县首相曾经提倡过“北守南进”；而俄国占领满洲和日英同盟的建立则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向再次指向北方。可以说，随着日本成熟为帝国主义国家，其侵略的基本方向也越来越明确了。

总之，从1902年秋到1903年春，俄国和日本都以满洲和朝鲜为目标，摆出了采取积极侵略政策的态势。而且，俄国相信凭恫吓就能使日本后退，而日本则认为依靠日英同盟的建立能“迫使俄国顺应我方之要求”。两者的冲突，可以说只是时间问题了。1902年10月9日到1903年4月8日的第二次撤兵期间，俄军表面上还装做要撤兵的样子；而在1903年4月9日以后的第三次撤兵期中，则连这种伪装的样子也没有了。日本政府看到这种情况，于1903年6月23日召开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决定与俄国开始直接谈判以解决“满韩问题”，并决定了在交涉时可以提出的协议方案纲要。应该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此时已经考虑到，“一旦提出建议，即须排除万难，坚决贯彻我方目的，本此决心着手进行，至为重要。”②这意味着，在交涉开始时，日本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在最坏的情况下难免要发生战争。而俄国方面则根本无从了解日本这种决心。

7月8日，小村寿太郎外相就与俄国开始交涉一事取得英国政府的谅解，随后于7月28日命令驻彼得堡公使栗野慎一郎刺探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498—503页。

② 同上，第36卷，第1册，第3页。

俄国政府的意向。栗野公使与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开始交涉是在8月12日，当天就向俄国方面面交了日本的第一次提案。但是，8月12日这一天，正是俄国沙皇签署有关设置远东总督府的敕令的日子。第二天，总督府就设立了。如上所述，这一次的制度改革意味着俄国的对日交涉将脱离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的控制，而被置于阿列克塞耶夫总督的管辖之下。同时，它还意味着俄国对日本的态度将不由拉姆斯独夫和维特决定，而由别佐勃拉佐夫集团决定了。不管怎样，8月24日，俄国政府要求将日俄谈判的地点移往东京，结果，迟到10月5日以后，才在东京继续进行谈判。

这一谈判继续进行到1904年2月初，其结果简直就意味着战争。为了避免烦琐，这里不详述唇枪舌剑的经过。彼此对峙各不相让的争论的基本点，在于俄国认为"有关满洲这个专门属于俄中之间的问题，我俄国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第三国签订任何协定。"① 反之，日本则认为"朝鲜问题之解决如不与满洲问题联系起来，则不能令人满意"②。这也就是说，日本在日俄交涉中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制止俄国独霸满洲。从这一点来说，1903年10月8日签订《日清通商行船续约》一事，由于使日本取得了反对俄国独霸满洲的条约上的根据，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续约的第十款里，规定了开放满洲的奉天（今沈阳——译者）和大东沟③为商埠。

218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签订这个条约的同月同日，美国与中国之间也签订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其中也规定开放奉天和安东县。而且，日本强使中国开放奉天和大东沟，是与美国要求开放奉天和安东县采取一致步调的，在续订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日本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32页。

② 同上，第34卷，第524页。

③ 大东沟：辽宁省丹东市南沿海地方。——译者

也经常留心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还有，日中与美中两个续约的签订日期，即1903年10月8日，根据1902年4月8日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正是俄国应把满洲完全归还给中国的日子。小村外相严令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务使日清通商条约与美清条约同时签署。"这种做法大概也是小村外相对美国有所考虑的一种表现。他认为，只要打着满洲"门户开放"和排除俄国独霸的招牌行事，日本就可以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袒护。前已取得与英国结盟的小村外相，现在又能够指望美国的支持和袒护了。

第四节　战争与和谈

十　对俄强硬的舆论和反战论

驻东京的俄国公使伊兹沃尔斯基在1900年12月18日寄给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以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为主席的国民同盟会大会，做出了指责政府的决议，决议说"满洲之现状，违反清帝国领土完整原则，且使朝鲜陷于危险。应迅速找出改变此种事态之手段"。接着，他又在1901年1月4日寄出的报告中说："关于满洲及朝鲜之煽动，近数日来甚为激烈，正在给政府带来极大压力。"① 1901年1月4日这个日子，正是伊兹沃尔斯基公使向加藤高明外相提议朝鲜中立化，而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则针对此事向加藤外相提出意见说"朝鲜问题之解决，如不与满洲问题联系起来，则不能令人满意"之前的几天。此后，情况正如伊兹沃尔斯基公使1月14日报告所说："由满洲问题引起的针对俄国的放肆煽动，给予加藤外相极深的印象，……好战的国家主义运动显然是在政府默认之下，正在日益扩展起来。"伊兹沃尔斯基提请加藤外

219

① 《红档杂志》(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第18卷，1934—1935年，第572—574页。

相注意此种情况，并要求加以取缔①。在3月1日发出的报告中，伊兹沃尔斯基进一步说："国民同盟会已重整旗鼓，再度开展宣传。这次不仅在东京，而且在各地城市也进行了宣传。每天不断从那里传来报道有关集会、演说、示威运动情况的电报。"②他还报告说，日本的舆论，对俄国来说，极可忧虑。

但是，1902年4月8日，中俄之间签订了上述《满洲撤兵协定》，国民同盟会便从而失去谴责俄国的理由，于4月底解散了。不过，俄国没有履行应在1903年4月8日以前完成第二次撤兵的规定，并对中国强行要求新的撤兵条件，原国民同盟会的人们获知后，再度集结，叫嚷对俄要执行强硬外交，并于1903年8月9日成立了反俄同志会。时在上述日俄两国正式开始谈判"满韩问题"之前三天。这个组织虽然因日俄开战而解散了，但它在唤起对俄开战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上述1903年8月至1904年1月的日俄谈判，正是在这种高涨的开战舆论的支持下进行并走向破裂的。诚然，这种舆论是在政府的"默认"之下，由接近政府的人士操纵的，但它却至少在形式上使人觉得政府是在国民绝对支持下才得以决心走向开战的，以至在开战后不久，田口卯吉③甚至评论说："国民舆论强拉硬拽地迫使政府打起仗来。"④

当然，当时的日本舆论并不是清一色地主张对俄强硬和对俄开战的。众所周知，当时有先以《万朝报》为阵地、后又以《平民新闻》为阵地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社会主义的反战论，有内村鉴三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非战争论，有谷干城和尾崎行雄的避战论，

---

① 前引书，第575—576页。

② 前引书，第585页。

③ 田口卯吉(1855—1905)，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创办《东京经济》杂志，著有《日本开化小史》等书。——译者

④ 藤村道生：《开战舆论的结构》，《日俄战争史研究》，前引书，第179页。

还有与谢野晶子等《明星》派的厌战思想，除此之外，近来的研究工作还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曾有避战的乃至和平的论调①。但是，压倒多数的国民，却听不进他们的声音，认为这些言论只是少数人发发牢骚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220 反战论和非战论对于如何对付正在占领满洲并危及朝鲜的俄国威胁这个现实课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是离开这个课题，从另一种立场来进行一般说教而已。也许可以说，这是脱离现实的一般说教被诉诸人们感情的、密切结合现实的论调所击败。于是，就连曾经是反战论乃至非战论堡垒的《万朝报》，也以 1903 年 10 月 8 日为界，迅速转入认为形势所迫、只能开战的立场，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两人退出了该报。1903 年 10 月 8 日这个日子是按照 1902 年 4 月 8 日《满洲撤兵协定》，俄军应该完全撤出满洲之日。此后开战舆论的激化，诚然可以认为是上面通过反俄同志会等组织操纵舆论的结果，但却不能说开战舆论的高涨完全是上面操纵的。因为反俄同志会的活动处于低潮之时，反而到处充斥着开战舆论。

总之，绝大多数国民的态度都是与其维持现状，莫如在战争中一赌胜负。这里的所谓现状，是指产业革命时期的国民生活状况及其贫困。大多数国民希求从幸德秋水在 1901 年所写的"厌倦贫困"②和 1903 年 12 月 17 日《万朝报》上所写的"积怨郁愤"中摆脱出来。这种趋势为什么没有朝着反对现存体制的方向发展下去呢？关于这个问题，固然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例如，1898 年才刚刚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幼稚性，以及应该成为这个运动基础的工人阶级还不成熟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促使大多数国民支持战争的根本原因，却是他们期望"摆脱现状"，借二

① 前引书，第 181—204 页。

② 《幸德秋水选集》第 2 卷，第 36 页。

叶亭四迷的话来话，就是“需要空气一新”①。既然日俄战争正是作为满足这种期望和需要的道路而被选中的，那末，当战争的结果违背了他们的要求和期望的时候，他们的不满爆发出来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后述的朴次茅斯和谈成立前后的反和谈运动，特别是以日比谷事件②为象征的民众骚动，与前述的开战舆论，其关系恰是一体两面，不了解后者也就不能了解前者。

十一　对俄宣战、军事行动、提议和谈

如上所述，决定是和是战的日俄谈判，从 1903 年 8 月以来一直进行着，而另一方面，俄国却在鸭绿江口地带继续进行侵略活动，并在 1903 年底“疯狂地加紧备战”。面对这种形势，日本政府也在 12 月 30 日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对俄交涉破裂时日本应采取的对清对韩方针》。次日，向英国政府提出：“在日俄冲突不可避免时，希望在开战前得到英国的财政援助。”在这种形势下，1904 年 1 月 12 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关于日俄谈判满韩问题的帝国最后提案》，并于 1 月 16 日，由驻彼得堡的栗野慎一郎公使面交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1 月 30 日，小村寿太郎外相命令栗 221 野慎一郎公使要求俄国明确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日期，对此，拉姆斯独夫外交大臣却于 2 月 1 日回答说，不能确切说明答复日期。于是，日本政府认为“除中止目前徒劳无益之谈判外，别无他途”。2 月 4 日，内阁会议决定“中止日俄交涉，帝国采取独自行动”。小村外相通告俄国驻东京公使断绝外交关系是在 2 月 8 日，但联合舰队在 2 月 6 日即驶离佐世保；8 日，就以驱逐舰队攻击了旅顺的敌舰；9 日，第二舰队又炮击了在仁川海面上的俄舰。公布宣战则

---

① 二叶亭四迷：《杂记五》，《全集》第 6 卷，岩波书店，1965 年，第288页。

② 日比谷事件：指日本国家主义者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大会反对日俄媾和条约的暴动事件。参见后文。——译者

是在2月10日。

此后，日俄之间的战争状态一直继续到1905年9月，共一年零七个月。这场战争也是以日俄两国作为前哨的帝国主义列强两大营垒的冲突。所谓两大营垒，一方是结成同盟关系的日英和在同盟外支援日英的美国；另一方是同样结成同盟关系的俄法和鼓励俄国进一步卷入东亚的德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俄战争孕育着随时扩大为世界战争的危险。如果日俄战争演成长期战争，那么这种危险或许会变成现实。但是，战争的长期化，有可能同时促使俄国革命取得成功。为了制止俄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也必须防止战争的长期化。另一方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日本也是经不起长期战争的脆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英法两国与德国的对立正在深化，从欧洲政策这个角度来看，战争的扩大和长期化也是不利的。总之，日俄战争尽管包含着发展为世界战争和长期战争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上，却应止于两国之间的战争和短期战争。

如果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围歼敌人，那么1904年8月4日至9月4日的辽阳会战中，这个机会即已存在。但是，当时旅顺要塞尚未陷落，正在围攻旅顺的第三军不能参加辽阳会战，所以未能歼灭俄军，而让俄军撤退到奉天。第二年3月1日到10日的奉天会战也是一样，二十五万日军未能围歼三十二万俄军，力求保存实力的俄军向北满撤退了。而且，俄国在奉天会战以后重整军备，并把配备在欧洲方面的第一线兵力转运满洲。但是，充实满洲的兵力，却使旅顺陷落后立即出现的俄国欧洲部分的革命形势更加发展起来，结果反而促使战争早日得到结束。总之，日俄战争的胜败已经不取决于战场上歼灭有生力量了。

奉天会战后不久，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向桂首相提出了意见书。意见书说："第一，敌方本国尚有强大兵力，而我方却已用尽所有兵力"；还说："第二，敌方军官尚不缺乏，而我方开战以来军官损伤很

多，今后不易补充”，要求“确立国家之根本政策”①。这是军方坦率承认已无力继续进行战斗而提出要求和谈。战争既不能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就只好由外交来决定了。1905年8月4日，桂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为了在情况允许范围内谋求迅速而满意地恢复和平，……应采取适当手段，以期达到我国之最后目的；并须日益密切同他国的关系，……以求创造有利于达成我方最后目的之条件”②。接着，在4月21日确定了与俄国议和时提出的不容磋商的三项必要条件和可以磋商的四项必要条件。 222

在日本内部出现上述趋势之时，欧洲形势也在朝着欢迎日俄和谈的方向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继俄军在奉天会战中遭到失败之后，德国在3月31日挑起了丹吉尔(Tangier)事件(第一次摩洛哥问题)③，使它与俄国的盟国法国之间出现危机④。为了对抗德国，法国当然希望早日结束日俄战争。4月10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赛(Delcasse, T.)向驻巴黎的本野一郎公使表示愿意居中调停讲和。不言而喻，德尔卡赛这一行动是在同俄国磋商之后进行的。不过，由于德尔卡赛外长以日本不坚持赔款和割地作为调停的前提，日本政府以不能接受以特定和谈条件为前提的调停为理由，于4月13日拒绝了德尔卡赛外长的建议。并于4月18日向美国政府转告了德尔卡赛外长调停的经过。当时，驻美国的高平小五郎公使并未忘记附带说明，日本政府是期望“某一国家出面进行善意的调停”的。

至少小村寿太郎外相似乎很早就属意美国总统罗斯福(Roo-

---

① 德富猪一郎(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1933年版，第679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235页。

③ 丹吉尔：摩洛哥的贸易港，靠近直布罗陀海峡。这次事件是指德国占领该港，引起了帝国之间的纠纷。——译者

④ 中山治一：《丹吉尔事件的社会学说明》，《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第11卷，第9号，1960年，第88—91页。

sevelt, T.)作为日俄和谈的调停者。早在1905年1月25日，即旅顺陷落后不久，小村外相就通过高平公使向美国总统转达了“我国政府在和平恢复后对于满、韩、旅顺的意图和希望”。其要点是：(1)使朝鲜成为保护国；(2)将满洲归还中国；(3)继承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及其他利权；(4)确保日本的永久和平。到了4月18日，美国总统接到高平公使上述通告后，要求日本确认满洲的“门户开放”和归还满洲的方针。4月25日，小村外相训令高平公使，向美国总统说明，这一方针是确定不移的。正当如此探索和谈道路之时，远渡重洋的波罗的海舰队通过新加坡海峡，开进了东亚水域。

223 对俄国来说，1905年5月27日至28日，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的覆灭，可以说是走向和谈的跳板。同时，以这一年1月22日“血的星期日”事件为开端的俄国国内革命形势，对俄国政府来说，也成了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则立足于日本海海战的彻底胜利，着手推动和谈。6月1日，日本政府通过高平公使正式向美国总统表示，希望对日俄和谈作友好的斡旋。美国总统在了解到俄国沙皇确实同意和谈以后，于6月9日，通过驻东京及彼得堡的美国公使，向日俄两国政府面交了劝告讲和的照会。6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同意；6月12日，俄国政府也表示同意。6月26日，美国总统确定朴次茅斯为进行日俄和谈的地点。

十二　朴次茅斯和谈和反对和谈运动

和谈即将开始，日本政府于1905年6月30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和谈条件，7月3日任命小村寿太郎外相和高平小五郎公使为和谈全权代表。日本的和谈条件是：〔甲〕绝对必要条件：(1)由日本决定韩国的处理；(2)日俄两国军队撤离满洲；(3)俄国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及哈尔滨至旅顺间的铁路转让日本；〔乙〕相对必要

条件：(1)赔偿军费；(2)引渡逃入中立港的俄国军舰；(3)割让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4)出让滨海州沿岸的捕鱼权；〔丙〕附加条件：(1)限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2)撤除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防御设施①。另一方面，俄国则任命原财政大臣维特为首席全权代表，还任命曾任驻日公使、现任驻美大使罗森为副全权代表。

8月9日举行预备会议后，朴次茅斯和谈于8月10日正式开始，持续到9月5日签署条约。在此期间，仅正式会议就召开了十七次。会谈的难点在于割让库页岛和赔偿军费。小村在8月18日的第十一次正式会谈上提出了如下的妥协方案：(1)把库页岛分成两半，北半部归还俄国；(2)以支付十二亿日元作为对库页岛北半部的补偿为条件，不再要求赔偿军费。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斯福总统为支持日本的要求而展开了精力充沛的外交活动。他试图通过美国驻彼得堡大使说服俄国沙皇，又要求德国皇帝对俄国沙皇提出劝告，还请求法国政府说服俄国，用尽千方百计，却终于未能使俄国沙皇同意偿付赔款。于是，小村于8月26日发出电报报告了会谈内情，并请求最后的指示。对此，政府于8月28日召开了内阁会议及御前会议，决定"纵使不得已放弃赔款、割地两项要求，亦须于此时达成媾和"，并训令小村："但应首先放弃赔款要求，而坚持割地要求"，② 于是，小村在8月29日，以放弃赔款要求和以北纬五十度为界把库页岛分为两半作为补偿，与俄国达成了妥协。 224
9月5日，在朴次茅斯签署了《日俄和平条约》及附加条款。

总之，朴次茅斯和约是由于日本放弃赔款要求才好不容易达成妥协的产物。如上所述，奉天会战以后，军事当局本身已认为不可能再继续作战，因而日本谋求妥协是不足怪的。但是，一般国民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239页。

② 同上，第242—245页。

并不了解这些内情，而且一向只向他们灌输陆海军连战连胜的消息，这样，他们对日本在和谈中的让步和妥协感到不满，也就情有可原了。以这种普遍不满情绪为背景，率先制造对俄强硬舆论的是开战前鼓吹对俄强硬外交并煽动开战舆论的《反俄同志会》系统的人士。他们以及在野党进步党的政治家们，于1905年7月19日组织了《和谈问题同志联合会》。8月17日，在东京召开该组织的大会，决议反对议和条件的让步。8月17日正是朴资茅斯和谈愈益迫近最后难关的时候。当时，在东京以外各地也连续召开了要求坚持和谈条件的集会。

到8月底，日本在朴次茅斯的让步公开出来，《和谈问题同志联合会》乃于8月31日决议反对和谈，9月3日向全国散发了檄文三万份，9月5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了国民大会。尽管警视厅下令禁止这次国民大会，但仍有三万民众集合，以河野广中为主席，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和约和继续作战。激昂的民众在散会以后，袭击了支持政府和谈政策的《国民新闻》社和曾经取缔反政府言论的内相的官邸，烧毁了警察署和派出所。这一骚动到第二天仍在继续，形势益趋不稳，于是政府在9月6日公布紧急敕令，在整个东京市及东京府所属五个郡实行戒严。东京的骚动在9月7日被镇压下去了，但这个消息一传出去，神户、横滨等地又发生了骚动，而在各个城市都召开了反对和谈的集会。直到11月29日，才撤销了东京府全境实行戒严令的紧急敕令。

看到这样广泛的反和谈运动，社会主义者们想必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自我满足。以为实践证明了自己预言的正确①。因为他们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说过："战争结束之日，汝之狂喜必将一变

---

① H.库布林(Kublin)：《日本社会主义者与俄日战争》，《近代史杂志》第22卷，第4号，1950年，第337页。

而为悔恨，此吾人可无须踌躇而预言于今日者。"①这里所说的"汝"是指一般国民；实际上，1905年的反和谈运动是全体国民不满的表现，其中包括各个阶级、阶层和各行各业的人们。其中有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人们，因物价上涨而生活困苦的人们，因为"毫无赔款"而担心资金枯竭和重税加身的资产阶级，手艺人、搬运工、车夫、赶驮子的人、店员、商人等城市小市民们，这些人们的不满爆发出来，就形成了以日比谷事件为高潮的全国性反和谈运动。正因为他们都对战争寄予莫大的希望，而他们的失望和不满也就更大。不过，他们的不满所以只能以要求继续作战这种反和谈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或许应该由当时日本社会的阶级分化还不成熟来加以说明。 225

十三　日英美关系和朝鲜的"保护国"化

日俄战争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朝鲜置于日本自由处置之下，正如1904年2月10日颁发的宣战诏书所明确宣示："帝国之置重于韩国之保全，实非一朝之故，……韩国之存亡实乃帝国安危之所系。……"②因此，日本在对俄作战的同时，力求强化对朝鲜的统治力量，可以说是有计划的行动。日俄战争开始后仅两周，2月23日，日本便强迫韩国签订了《日韩议定书》。其第一条是"应采纳其（日本）关于改善行政劝告"（to adopt the advice…in regard to improvements in administration）；第四条："当（韩国）领土之保全遭受威胁时，大日本帝国政府……得相机征用军事上视为必要之地点。"据此，可以说日本已"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保护权"。

1904年4月底，日军把俄军赶出了北朝鲜，战场转移到南满。

---

① 《平民新闻》周刊，《近代日本史史料·社会主义史料》第1卷，创元社，1953年，第302页。

② 译文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203页。——译者

针对这种战局的转移，日本政府为了推行韩国的保护国化，通过1904年5月30日的元老会议和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决定了《对韩方针》和《对韩措施纲领》。以这些决定为基础，在8月22日缔结了《日韩协约》。根据《日韩协约》，朝鲜于是就"在有关处理与外国缔结条约及其他重要外交问题方面，必须预先与日本政府协商"了。这个协约还规定韩国政府应"聘请"日本政府推荐的财务顾问（日本人一名）和外交顾问（外国人一名），"有关财务（或外交）之重要事务均须征询其意见后施行。"10月15日，目贺田种太郎就任财政顾问；12月27日，美国人史蒂文斯（Stevens, D.W.）就任外交顾问。从此以后，韩国财政和外交的"一切要务"可以说均置于日本政府指挥之下了。1905年1月19日，韩国政府承认日本货币为法定货币，使其在国内流通。1905年4月1日，又签署了规定将韩国通讯机关"委托"给日本的《日韩协议书》。

1905年4月，已如上述，正是继奉天会战日军胜利之后，美国总统和法国外长斡旋日俄和谈的趋势开始酝酿之时。日本政府早在确定日俄和谈条件之前，于4月8日，就由内阁会议确定了对韩国彻底实行保护国化的基本方针。不过，日本政府却未能把这个基本方针立即付诸实施。这是因为日本要把韩国变为保护国，不单是日韩两国之间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东亚国际政局的问题。所以，旨在签订《日韩保护条约》的谈判，是和日俄和谈及修订日英同盟的谈判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确定上述对韩实行保护国化方针的同一天，内阁会议决定对延长和修订日英同盟条约开始进行谈判；此后不久，4月21日内阁会议又决定日俄和谈条件，应该说这决不是偶然的。就俄国而言，根据9月5日的朴次茅斯条约第二条，就得以使其承认日本"在韩国可实行认为必要的指导、保护及监督的措施"。

226

但是，就英国来说，早在1904年9月26日，即上述的《日韩协

约》签订后一个多月，驻伦敦的林董公使就曾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日本最近将采取措施接管韩国的外交关系，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谅解。不久，旅顺要塞陷落后，1905年2月15日，召开纪念日英同盟签订三周年庆祝会，小村外相在会上发表演说，希望继续发展日英同盟。英国外交大臣澜斯顿听了以后，立即向驻伦敦的林公使建议开始进行延长日英同盟的秘密谈判。这是修改日英同盟谈判的开端，但以后经过前述日本政府4月8日作出关于开始谈判的决定，实际谈判则是到5月17日由林公使和澜斯顿外交大臣的会谈才开始的。这次谈判持续三个月，到8月12日签署了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磋商的重点，从英国方面说是同盟的性质和适用范围问题，从日本方面说则是获得自由处置韩国的权利和维持在远东水域的海军力量优势的问题。

最初，日本的目标在于不改变同盟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仅明确规定日本取得自由处置韩国的权利和同盟的期限。但是，英国却希望把现行条约的"同盟国之一方，只有在受到其他两国联合进攻的场合"，才能"要求他方援助"，改为在受到一国攻击的场合也可以要求他方援助；并希望把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印度。于是，围绕这些论点进行了反复磋商。结果，双方互相接受了对方的主张，于8月12日在伦敦签署了期限十年的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这样，日本就得以使英国承认了"在韩国实行指导、监督及保护措施的权利"。

从上述修订日英同盟的交涉经过，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最关心的事情，是预防日俄战争结束后可能发生的俄国对印度的侵略，和抑制印度民族运动在日本胜利鼓舞下的高涨，而不是想以此导致日俄和谈①。美国则与英国不同，罗斯福总统胸怀明确的国

---

① 村岛滋：《日英同盟的修改》，前引《日俄战争史研究》，第368—369页。

际政策蓝图，即通过日俄势力的均衡来维持东亚及西太平洋的和平，因而对日俄和谈的热心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如前所述，1905年1月25日，攻陷旅顺之后，小村寿太郎外相通过高平小五郎公使向罗斯福转达“我国政府关于恢复和平后的满、韩、旅顺的意图及希望”时，罗斯福说：“日本必须确保旅顺，必须确保韩国。”还说：“这两点已成定局。”他还让驻东京的外交官乔治·凯南(Kennan, G.F.)把这个见解告诉“日本二、三有力人物”。因此应该说，早在1905年2月初，对于日本获得韩国的自由处置权问题，美国总统已经答应给以支持。①

227

不过，也有些研究工作者还没有放弃泰勒·丹涅特(Dennett, T.)1924年以来的旧说，即罗斯福是通过后来的1905年7月27日《桂太郎—塔夫脱会谈备忘录》，及其在7月31日发出的追认这一备忘录的电报，来表示承认日本取得对韩国的自由处置权的。这是今天许多研究工作者见解分歧之点。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作如下解释，即罗斯福最初是想通过支持日本来谋求日俄势力均衡的，但后来看到日俄战局的推移，开始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有所畏惧，乃要求日本以允许保证菲律宾的安全来换取美国对日本对韩国的自由处置权的承认。早在1898年至1899年的菲律宾独立运动时，日本一部分民间人士曾支持过阿奎纳多(Aguinaldo, E.)派，但是，日本政府却支持美国占有菲律宾，取得了美国的欢心。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这时又成了日美两国之间政治交易的材料了。然而，不拘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日本还在签署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和朴次茅斯和谈成功以前，其对韩国的自由处置权已经得到了美国总统的承认。

总之，1905年9月5日签署《朴次茅斯和约》时，日本已经就

① R.A.Esthus：《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现实还是神话?》，《近代史杂志》第30卷，1959年，第50页以下。

获得对韩国的自由处置权问题，取得了英美俄三国的正式承认。剩下的问题就是强迫韩国接受“保护条约”了。10月27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在韩国确立保护权的政策；11月17日，强迫韩国签署了第二次《日韩协约》（即《韩国保护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日本迫使韩国政府承认：由日本掌握韩国的外交权；继承韩国与外国之间所订的条约，在韩国设置统监府等。这样，自三国干涉还辽十年以来日本一直怀抱统治韩国的愿望，大半都得以实现了。后来仍继续追求不休，终于通过签署1907年7月24日的第三次《日韩协约》，名副其实地把韩国变为自己的保护国。

228

第七章　帝国主义政策的展开和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
（1905—1914）

第一节　日俄战后的新形势

一　满洲的"门户开放"和日美关系

1905年9月5日的《日俄和约》，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和领水的租借权，以及与此租借权有关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转让设施；长春—旅顺口间的铁路及其所有支线和在该地区附属于该铁路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财产，以及在该地区属于该铁路或为其利益而经营的所有煤矿，均应由俄国转让给日本。但是，对于这些规定附有条件，即必须取得清政府的同意。清政府是唯恐日本势力进入满洲的，而日本政府却于1905年12月22月强迫清政府签署了《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1]及附属协定和协议。这样，日本便得以继承了原俄国在南满洲的全部利权。在签署该条约的两天前，12月20日，桂内阁提出了辞呈。1906年1月7日，以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为首的内阁成立。外相是加藤高明。

在刚才谈到的《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签订以前，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Harriman, E.H.）估计到南满铁路将要转让给日本，

---

① 《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即《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II，第338页。——译者

企图控制这条铁路，作为其野心勃勃的环球运输网设想的一环。1905年9月初，他在东京向一些元老和阁员建议，由日本政府提供物资，美国方面提供资金，共同经营这条铁路。9月中旬，哈里曼虽曾一度离开东京去满洲和朝鲜视察，但他的提议得到了井上馨、伊藤博文、涩泽荣一等人的赞同。他们赞成此事的动机里，可能含有借引入美国资本以避免俄国发动报复性战争的考虑，但是，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必须为战后经营筹措资金这个迫切要求。

桂太郎首相也被元老们的想法所打动，于1905年10月12日设午宴招待哈里曼。席上，哈里曼与桂首相拟定了有关满洲铁路草约的备忘录。不过，这个备忘录终于没有签字。第二天，10月13日中午，哈里曼就带着这个没有签字的备忘录，离开横滨，登途回国。哈里曼所以接受邮电大臣大浦兼武的劝告而同意延期签署备忘录，是因为上述以日比谷事件为高潮的全体国民的反和谈运动正在高涨①。不管怎样，《桂—哈里曼备忘录》还是遭到了10月16日从朴次茅斯回到横滨的小村寿太郎的强烈反对。10月23日，哈里曼返抵旧金山就接到通知说，备忘录的计划停止进行。小村是要极力防止美国人分享日俄战争的成果。1906年1月15日，被指定为日本政府和哈里曼的居间人的日本兴业银行总裁添田寿一写信给哈里曼，正式通知《桂—哈里曼备忘录》无效。

可是，《朴次茅斯和约》追加条款第一项规定，自和约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以内，两国军队应从辽东半岛租借地以外的满洲各地全部撤退。这就是说，1907年4月15日以前，南满洲有可能被置于日本的军事统治之下。实际上，从1905年底到1906年春，南满正处在日本的军事统治之下，日本以外的各国商人几乎不可能在

① R.T.张：《桂太郎—哈里曼协定的失败》，《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第1期，1961年11月，第69页。

南满进行贸易活动。这种局面不言而喻是违背日本战前一再宣称的满洲"门户开放"的诺言的。而且日本陆军还企图利用军事统治时期，尽量扩大在满洲的权益。这种情况当然要招致特别是英美商人的不满。早在桂内阁末期，英国商人中间就有过抗议活动；于是，一面是日本在南满的军事统治，另一面是英国商人的利益，日本外相处在二者之间，左右为难，焦虑不安①。

因此，1906 年 1 月 7 日，内阁更迭后出任外相的加藤高明面对的最重要课题是，要抑制陆军企图使南满成为与外界隔绝的特殊地区的方针，实现日本在战前一再宣称的满洲"门户开放"。1 月 31 日，加藤高明外相致函寺内正毅陆相，要求就满洲"门户开放"问题作出说明；但尚未及得到回答，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就于2 月 13 日就满洲"门户开放"问题，向加藤外相发出了正式照会。于是次日加藤再次要求寺内作出说明，但仍无答复。

此后，2 月 16 日，加藤高明应元老伊藤博文的邀请前往大矶②，当时除元老山县有朋、大山岩、井上馨之外，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也应邀在座。这就是所谓的大矶秘密会议③。在这次会谈中，儿玉参谋总长坚决主张 1907 年 4 月以前不能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加藤高明劝说不果，乃决心辞职。2 月 23 日，美国驻东京代理公使递交了有关满洲商业"机会均等"问题的备忘录。2 月 27 日，英国大使也就满洲"门户开放"问题，催促日本作出答复。第二天，2 月 28 日，西园寺内阁召开会议决定铁路国有方案，加藤坚持反对意见，向西园寺首相递交了辞呈。3 月 3 日，加藤外相辞职获准。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因满洲"门户开放"

230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39 卷，第 1 册，第 194 页。

② 大矶：在神奈川县中南部，风景幽美，现为京(东京)滨(横滨)地区之住宅卫星城市。——译者

③ 加藤高明，前引书，上卷，第 584 页。

问题与陆军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一点，今天大体上已经得到证实①。

加藤高明辞职之后，由西园寺首相兼任外相。5月19日，由驻英大使林董专任外相，在他就任前的3月到4月，英国和美国对日本陆军在满洲实行军事垄断统治的企图，曾一再提出强烈抗议。特别是驻美临时代理公使日置益在4月10日发出报告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都认为"日本逐排他性之俄国于满洲之外，以此立功扬名，今却立即取而代之，以至实行俄国之主义，实属遗憾"。报告还说："关于门户开放主义，该国向以创始者自居，……且有曾为此与俄国对抗之经过，因此不难推察，总统想必为此而焦虑。"②总之，一方面是英美要求满洲"门户开放"，另一方面是日本陆军企图在满洲实行军事垄断统治，西园寺首相兼外相是负有协调此二者之重任的。

英国驻日大使窦纳乐除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外，还于3月31日写私信给驻汉城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说："目前日本政府所采取之政策……只能说是日本自杀之政策。"③元老山县也写信给伊藤，介绍了军部和外务省主张的对立。而另一方面，元老井上馨则不惜"关照首相"，支持西园寺公望。在这种情况下，西园寺竭力说服陆军，终于得以使陆军从5月1日起对安东县和大东沟、从6月1日起又对奉天分别实行了门户开放。此后，西园寺本人进行了整整一个月（4月15日—5月15日）的满洲视察，此行也不外是一种准备工作，以便作出"已无驻兵之必要"，从而"可以断然撤兵"的决定④，也就是为了要实现满洲的"门户开放"。

---

① 中山治一：《关于第一届西园寺内阁加藤外相辞职的理由》，《人文研究》（市立大阪大学），第12卷，第8号，1961年9月，第64—7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39卷，第1册，第221—222页。

③ 同上，第238页。

④ 若槻礼次郎，《古风庵回忆录》，读卖新闻社，1950年，第71页。

如上所述，西园寺首相在他起身前往满洲视察以前，在说服陆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从根本上解决全面撤销满洲军事统治的问题，却迟至5月22日，通过举行"研讨满洲问题会议"才实现的。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馨五元老之外，还有政府方面的首相西园寺公望、陆相寺内正毅、海相斋藤实、藏相阪谷芳郎、外相林董等五人，和军方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陆军大将桂太郎、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三人，总共十三人。在这次会议上，伊藤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奋起慷慨陈词把陆军的气焰压了下去，山县也从侧面支持伊藤，这才使陆军同意撤销满洲的军事统治①。

231

上述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军部的原则性对立，如果没有元老这种军政体制以外的人物出马，竟是不能解决的。这种情况暴露出根据明治钦定宪法而建立的国家机构在组织方面的缺陷，它不外是这一缺陷所派生出来的"双重外交"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次是经过元老出马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对外政策的统一。后来，通过1907年9月12日公布的第一号军令，规定凡属有关军队指挥方面的敕令无须内阁总理大臣副署一事定为制度，军部的独断专行从而取得了制度上的依据。从此以后，军部在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擅自行动，就使得负责日本外交的人大伤脑筋了。

二　亚洲民族运动的潮流和日法协商

日俄战争既是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又是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因此，这种胜利和在日俄战争过程中爆发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就给了整个亚洲以闪电一般的影响。1906年的伊朗革命，1907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39卷，第1册，第237—245页。平塚笃(编)：《伊藤博文秘录》，1929年，第392—409页。

年印度国大党的迅速抬头、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和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等，都是日俄战争后的亚洲民族主义激流的浪花①。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也未能例外。越南独立运动的伟大先驱者潘佩珠，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旅顺和辽东的炮声，乘着大海的波涛，迅速传到我们的耳畔。……日俄战争确实在我们的头脑里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②。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在双重意义上使法国感到恐惧。其一是俄国在欧洲国际政局中的地位下降；其二是激发了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法国当局尤其害怕日本的胜利给印度支那知识分子带来的影响。1907年3月6日，法国外交部长向驻巴黎的栗野慎一郎大使提议，希望缔结日法协定。栗野大使在3月28日向林董外相就此申述意见说："法国政府在这次协定中最重视的，不外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与和平。"③这就是说，法国在日俄战后接近日本的第一个意图在于约束日本，使日本不支持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而要站到法国一边，维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于是，日本就再一次站在重大的十字路口。这就是，支持亚洲的民族主义，232 援助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呢？还是以西欧殖民地占有国为盟友，支持西欧殖民地体制的继续存在呢？

但是，当时的日本实际上已经没有这么大的选择自由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苦于筹措军费及战后经营资金的日本，早在奉天会战后不久就与法国金融界及政府开始了接触，并被允许战争结束后立即在巴黎金融市场上募集公债，从而在财政上已经加深了

① 格·巴拉库拉夫：《现代史序论》，中村英胜、中村妙子译，岩波书店，1971年，第182—183页

② 潘佩珠：《越南亡国史及其他》，长冈、川本译，《东洋文库》第73种，平凡社，1966年，第116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1册，第49页。

对法国的依赖[①]。实际上，1907年3月6日法国外长关于缔结日法协定的提议，也正是与同月日本所签订的合同、即在巴黎举债募款问题联系起来而提出的。法国同意募集公债显然是出于政治意图[②]。这样，日法两国都有互相接近对方、互相利用对方的理由。以上所述就是1907年6月日法能够达成协议的背景。

为缔结协定而进行的日法谈判，从1907年3月27日法国提出第一个提案开始，到6月10日结束签署。这个协定(《日法协定》)规定："为维护两缔约国在亚细亚大陆上相互之地位及领土，对确保前记诸地区(即与两缔约国拥有主权、保护权或占有权之区域相邻近之清帝国地区)和平与安宁之目的，应相互予以支持。"此项规定附有秘密说明书，明确规定福建省为"前记诸地区"之一[③]。而且，日本政府特别把这个秘密说明书暗中通知了英国，所以这就等于至少英法两国当时已经承认福建省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的。另一方面，法国在签订这个协定以后，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在日本的越南独立运动志士。日本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劝告他们离开日本。这么一来，日本就公然表明它已与欧洲列强为伍而站在压制亚洲民族运动的立场上了。应该说，在日本对待亚洲民族主义态度的历史上，日法协定的签订是个划时代的事件。

同时，日法协商对当时整个国际政局也带来了巨大影响。这是因为有了日法的接近和协调，日俄妥协才有可能，而且有了日法协商和日俄协商，英俄协商才能完整无缺。法国意识到这一点，与日本缔结了协定；英国也意识到这一点，迫切希望日本与俄国进行协

233

① 中山治一：《法国在外交革命方面的积极作用——国际政治与金融资本的问题》，《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14集，1956年，第3—5页。

② 小木曾照行：《从第一次日俄协商到第三次日俄协商》，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以后》，创元社，1957年，第145—146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1册，第81—82页。

商。日法协定签字是在 1907 年 6 月 10 日，下面即将谈到的第一次日俄协定的签订是在 7 月 30 日，而英俄协商达成协议则是在 8 月 31 日，这种情况决非偶然。日法协商的成功，对于在国际政治上形成对德包围圈、亦即对完成三国协约之最后一环成了直接的导火线。作为这个最后一环的英俄协商的成功，则向全世界表明，国际关系的基本对立已不在英俄之间，而在英德之间了。

三 第一次日俄协商和韩国的保护国化

1906 年 12 月底，正当日本政府要求法国同意它在巴黎金融市场募集第二次公债时，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大臣在彼得堡向日本公使本野一郎说："如能获得日俄之间将来和平之确实保证，则不惜作出更多的让步。"随后，1907 年 2 月 4 日，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大臣提议开始进行以"巩固对日亲善"为目的的商谈，并于 2 月 20 日提出了俄国方面的草案。这是一个仅包含两项条款的简单方案，内容是相互保障领土完整和条约上规定的两国各种权利，其性质毋宁说是消极的。

日本政府收到这个提案后，于 1907 年 3 月 3 日召开元老会议，决定了对应提案，在俄国提案两条之后，又增加了两条。第三条明文划定两国在满洲的利益范围；第四条明文承认 1904 年至 1905 年第一次和第二次《日韩条约》所决定的日韩关系，并保证不干涉其进一步发展。这么一来，这个协定方案便以有关韩国和满洲的政治交易为内容，成为性质极其积极的提案。针对这个方案，俄国又于 4 月 3 日提出了对应提案，提出了该国的蒙古问题，以同日本的韩国问题相对立。亦即要把日本提案的第三条和第四条作为秘密条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要求另加第三条，其中规定，承认俄国在蒙古及邻近中国之边界地区具有特殊利益。4 月上旬以后，围绕两国有关满、韩、蒙的政治交易继续进行了磋商。而饶有兴味

的是，与这种政治交易相联系，日本统治者内部两种意见的对立表面化了。

一种意见是驻英大使小村寿太郎和前海相山本权兵卫的主张。小村本来就反对在《日俄条约》中把韩国问题和划定满洲利益范围问题包括在内，加之，俄国又进一步提出了蒙古问题，于是他的反对就更加强烈起来，与当时在伦敦的山本海军大将一再共同提出了反对意见。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意见则是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所坚决主张的，他说："至于韩国问题，遗憾的是，在朴资茅斯条约中尚留有使日俄两国间各持异议之余地"，因此，"日俄间解决有关韩国问题，乃我国当下之急务"。处于这两种对立意见之间的西园234寺内阁，于6月14日召开元老会议，关于蒙古问题，制定了仅仅承认俄国在外蒙古享有特殊利益的妥协方案。最后，以这个妥协方案为基础，驻彼得堡公使本野一郎和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大臣在7月3日大致商妥，便于7月30日签署了《日俄协约》及其附件。第一次日俄协商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这个《日俄协约》由公开协约、秘密协约、追加条款和换文四部分组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是秘密协约。秘密协约的第一条划定了两国在满洲的利益范围；第二条承认了日韩的特殊关系及其进一步的发展；第三条承认了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分别明文肯定下来。这个条约的复杂结构本身就说明它不仅是友好协商，而是为了调节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以满、韩、蒙为对象的利害关系而订的特殊协定。总之，日本通过把外蒙古交给俄国而换得了对韩国的自由处置权。

但是，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条约》签订及12月设置韩国统监府以后，朝鲜各地发生了反抗日本统治的暴动。适逢世界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15日起在荷兰海牙召开第二届会议，当时出现了三名朝鲜使节，向会议主席出示了韩国国王的委任书，要求

出席会议。这就是"海牙密使事件"。他们本想指靠从俄国官员获得方便，但其时正逢《日俄协定》即将签署，俄国当然不会理睬；而在他们到达海牙以后，荷兰政府及各国代表团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问题在于日本对这个事件的善后处置。7月7日，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向韩国国王指出："彼等之行为乃对日本公开表示敌意，不能免除违反条约之责，故日本对韩国有宣战之权利。"①西园寺内阁外加元老，举行会议决定了对韩国的处理方针。7月12日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这一方针就是要把有关韩国内政的全部权力都掌握起来。

在朝鲜，国王高宗于7月18日退位，太子李坧继位。因此，韩国军队发生动荡，总理大臣李完用的官邸也被烧毁，到处都出现了不稳的局面。7月24日，西园寺内阁应伊藤统监的要求，决定从日本国内派遣军队。同一天，在汉城，伊藤博文统监和总理大臣李完用签署了《日韩条约》(第三次)。这个条约是由七项条款组成的简单条约，但有三个秘密附件，两者分别规定把行政、司法、监狱、警察、军事等各方面内政全权都移交给日本。特别是关于军备方面，附件(二)的第三项第一条规定"保留一大队陆军，使其担任皇宫守卫，其余军队解散"。总之，自日俄战争开始后不久(1904年2月23日)签署《日韩议定书》以来，一直推行的韩国保护国化，经过1904年8月22日的第一次《日韩条约》及1905年11月17日的第二次《日韩条约》，由这个第三次《日韩条约》彻底完成了。

以上述经过清楚表明，三国干涉还辽以来，从根本上决定了日韩关系的是日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上述韩国保护国化的完成，与第一次日俄协商达成协议正好同时，应该说决不是偶然的。诚然，日本陆海军从1906年10月至1907年4月就已决定了《帝国 235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1册，第454页。

国防方针》，规定“即使在将来，亦认定我国防上之主要敌国为俄国”①。然而，1907 年以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却需要增进日俄的合作关系。这样，《帝国国防方针》的书面计划与实际对外政策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

第二节　围绕满洲的日美俄关系

四　日美关系和日本的满洲政策

1906 年 3 月，正是英美两国对于日本陆军企图在满洲实行军事垄断统治一再提出抗议之时。当时，在美国西部沿海地区发生了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3 月 7 日，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关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决议案。同年 10 月 11 日，旧金山市教育局发布了禁止日本学童与白人一起就读的命令。固然转年(1907 年) 2 月，联邦议会两院批准新移民法案后，取消了这一命令，排斥日本学童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美国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却毕竟使日俄战争以后的(日本)亲美热情急剧冷却下来，在日美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为了保障菲律宾的安全而希望同日本维持友好关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Roosevelt, T.)于 1907 年 8 月 13 日，把国务卿卢特(Root, E.)和陆军部长塔夫脱(Taft, W.H.)召至牡蛎湾(Oyster Bay)② 会谈之后，决定再次派遣塔夫脱前往日本，以谋求改善日美关系。

塔夫脱在前往菲律宾途中，再次来到日本，以 1907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先后与林董外相、田中光显宫内大臣、寺内正毅陆相、西园寺公望首相和前首相桂太郎等举行了会谈，并于 9 月 30

① 大山梓：《山县有朋的〈帝国国防方针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1 年，第 3 号，第 174—177 页。

② 牡蛎湾：纽约附近长岛上的一个海港。——译者

日在东京商业会议所做了讲演，又于10月2日谒见了天皇。通过与日本这些最高领导人的接触，塔夫脱确信，如果强行执行去年12月28日卢特国务卿向（日本）驻美大使青木周藏所提议的日美互相禁止移民的条约，那只会给这个国家（指日本——译者）的骄傲的国民以侮辱，有害无益；并且确信，日本政府是极力要避免与美国开战的。10月18日，塔夫脱向罗斯福总统详细报告了与日本领导人会谈的印象，并就此申述了自己的意见。毫无疑义，塔夫脱的意见对于后来罗斯福政府的对日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方面，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也于1907年11月6日写信给林董外相陈述意见说："日美友谊的障碍在于劳动问题和移民问题"，"不能 236 让日美关系象今天这样放任自流。"①

以上述情况为背景，1907年11月6日，美国驻日大使欧伯连（O'Brien, T. J.）写信给林外相，要求严格限制（日本）工人赴美；接着又于11月26日提交了有关限制日本人及朝鲜工人前往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的照会。对此，林董外相于12月30日向欧伯连大使面交了关于移民问题的复照。有关移民问题的日美交涉就以这种形式一直继续到1908年2月18日。其间经过第一号到第七号往返文件，双方意见取得一致。所谓"日美君子协定"②就是这七件文件的总称。总之，日美间的移民问题，通过日本主动限制对美移民而大体上得到了解决。无论怎说，这个时期日美两国政府都是热心于维持友好关系的。特别是当1908年3月18日美国舰队准备作环球航行前来日本停泊时，日本还予以款待。

这样努力维持对美友好关系的西园寺内阁，因阁内对于财政问题意见分歧而辞职。1908年7月14日，成立了第二届桂内阁。驻英大使小村寿太郎再度就任外相。他从伦敦归国后于8月27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283页。

② 同上，第284—305页。

日就任外相，便在9月25日向内阁会议提出了对外政策方针及解决对华政策方面有关满洲若干问题之方针两个议案，取得同意。前者包括帝国对列强的态度、国外企业管理、修订条约三项，后者包括间岛问题①、法库门铁路②、拆除大石桥至营口的铁路③、延长京奉铁路④、抚顺及烟台煤矿⑤、安奉线及其他铁路沿线的矿山⑥等六项。不消说，小村寿太郎是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解决各项对华问题上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针中所提出的对

---

① 间岛问题：所谓"间岛"，原名假江，系图门江北岸我国吉林省和龙县东北光霁峪附近之滩地。清初列为"封禁之地"，同治以来朝鲜人民不断越境开垦，清政府经交涉后于光绪十一年始准其租种，并于光绪十三年与朝鲜政府勘定国界，立有界碑，明确此处为中国领土。光绪二十九年，朝鲜当局偶把该地称作"间岛"，清政府曾明确予以澄清。日本侵入朝鲜后，更肆意扩大所谓"间岛"之范围，意图侵占我延边一带。——译者。

② 法库门铁路问题：即新法铁路问题。1907年清政府拟依靠外资修筑新民屯至法库门铁路，并计划由此展筑至齐齐哈尔。日本竟以此线与南满铁路平行，有损日本利益，无理阻挠，清政府终于屈服。——译者。

③ 拆除大石桥至营口间之铁路问题：此路本系沙俄为运输建筑中东路南满支线所需物资而临时铺设。1898年中俄东省铁路续订合同规定，南满支线勘定路线拨给地段后八年，此大石桥至营口之铁路必须拆除。日俄战争后，中日北京会议交涉东三省善后事宜时，清政府又强调此路通海，必须由清政府自行拆除。至是，日本竟拒绝拆除，并强行要求清政府承认该线为南满铁路支线。——译者。

④ 延长京奉铁路问题：清政府拟将京奉路奉天车站移展至奉天（今沈阳）城根，需穿越南满铁路，日本乘机要求将该站与南满铁路之奉天车站合并。——译者。

⑤ 抚顺及烟台煤矿问题：日俄战争后之和约曾规定，在清政府同意下，俄国所经营之中东路南段（长春至旅顺）及其附属矿山等利权转让给日本。抚、烟二矿与此毫无关系。但日本政府竟无理声称此二矿山亦属于让渡范围，清政府曾据理拒绝，但后来终于屈服。——译者。

⑥ 安奉线及其他铁路沿线矿山问题："安奉线"，指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擅自建筑之安东至奉天窄轨军用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曾规定，此路由日人改筑竣工经营十五年后估价售与中国；有关改筑事项应与中国妥议。但日本竟擅自动工改变线路，假名"铁路用地"，肆意占地驻兵，并在鸭绿江架设铁桥，清政府曾提出交涉，终则一一屈服。——译者。

以上注②至注⑥合称"东三省五案"，加上注①之所谓"间岛问题"，合称"东三省六案"。——译者。

英、对美、对德和对法诸政策，都不过是为了解决对华诸问题的手段。

不过，由内阁会议决定的解决对华政策中有关满洲诸问题之方针，当然并未立即付诸外交谈判。在此之前，小村外相首先继承前内阁的方针，致力于对美协调。1908 年 10 月 18 日，环球航行途中的美国舰队到横滨停泊时，他有意识地制造大张旗鼓的欢迎气氛，以求改变日美舆论。于是，以当时两国舆论一时好转为背景，11 月 30 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和卢特国务卿实现了有关太平洋方面的问题的换文，即所谓《高平—卢特协定》。日本保证对菲律宾、关岛、夏威夷等地没有领土野心，并保证维护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和在中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日本力求通过这些保证来换取美国的对日好感。但是，在小村外相心目中，对美协调也不外是实现对华政策的手段罢了。 237

五　满洲政策的推进与日美对立

1908 年 10 月 2 日，即内阁会议决定上述解决对华政策中有关满洲诸问题之方针后一周，小村外相给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发出与清政府开始谈判的训令。据此，伊集院公使从 12 月 18 日起开始与中国谈判。但是，这一交涉遇到中国的顽强抵抗，难以达成协议，第二年(1909 年)春，谈判一时陷于停顿状态。元老山县有朋对这种形势感到焦虑，在 1909 年 4 月 29 日写了《第二次对清意见书》，并于 5 月 1 日写信给桂首相说：“基于去秋廷议决定之大方针，谈判虽已开始，但由于清政府之冥顽，遂至谈判中止，此乃遗憾之事。由目前情况推测，将来实不胜忧虑……”①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于 1909 年 6 月 22 日召开内阁会议，

---

① 《桂太郎关系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对改建安奉铁路及吉长铁路借款的细节作出了决定，并于8月6日通过伊集院公使告知清政府说："兹已决定不待贵国之合作，自行改建安奉线路，仰即察照。"① 日本政府就这样不待中国同意，擅自强行着手改建安奉线。这件事似乎震动了清政府，使之认识到必须迅速解决满洲悬案，于是便向日本提出了迅速解决悬案的建议。结果于1909年8月19日签署了《安奉铁路节略》，接着于9月4日签署了有关间岛的日中条约及有关满洲五案的日中条约②。通过这些条款，日本政府迫使清政府承认：铺设新民屯—法库门铁路时须与日本政府商议；大石桥—营口铁路作为满铁支线；出让抚顺及烟台煤矿的采掘权。此外，还商定：以图们江为中韩国境，在间岛地区设立杂居区并作为互市地区，对住在该地区的朝鲜人进行审判时，须有日本领事列席等。

第二次桂内阁执行如此强行推进攫取满洲利权的政策，当然要招致各国的不满和反击，其中尤以美国为最。在美国，该年(1909年)3月4日已发生了政权更迭，日俄战争和战后时期的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卢特下台，进入了塔夫脱总统和诺克斯(Knox, P.C.)国务卿执政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金元外交"③ 时代。当时在满洲，东三省总督锡良正计划铺设从锦州经齐齐哈尔至瑷珲的纵贯南北的铁路(锦瑷铁路)。听到这个消息的美国前奉天总领事司戴德 (Straight, W. D.) 便和与这一计划有关的英国保龄公司(Pawling & co.)进行交涉，在1909年10月2日，两者一起与锡良签署了《锦瑷铁路借款合同草案》。美国国务院接到关于签订这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318页。

② 即《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及《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见《中外旧约章汇编》，II，第601页及599页。——译者

③ 金元外交：1912年3月，美国总统塔夫脱致国会咨文称："……现政府的外交，一贯谋求适应商业关系的现代观点。这个政策的特征是，以金元代替子弹。……"(见布罗克韦编：《美国对外政策基本文件集》，普林斯顿，1957年)。——译者

个合同的报告后，国务卿诺克斯就想要利用这个合同草案做为发言的依据，把满洲各铁路置于国际管理之下，以推翻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优势地位。这就是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

诺克斯于1909年11月6日，首先将国际管理满洲各铁路的方案告知英国，想先取得英国赞同。其内容是：(1)让中国赎回满洲各铁路；(2)所需的资金由各国提供；(3)由提供资金国共同经营管理各铁路；(4)若这一方案不能实现，则修建锦瑷铁路以减损现有各铁路的价值。英国于11月25日对此答复说："原则上"并不反对满洲各铁路的国际管理化，但认为以暂缓提出为明智，而且有必要让日本也参加锦瑷铁路的建造。也就是说作了婉言谢绝的答复。尽管如此，诺克斯仍然从12月17日至21日，向日、俄、中、德、法等五国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 238

列强对诺克斯提案的反应是否定的。日俄两国互相交换意见，都表示反对。英国不仅表示"冷淡而怀疑"，而且劝告清政府要尊重日俄两国的利益。法国则认为日俄两国并没有侵犯"门户开放"原则，态度消极。只有德国表示赞同，但德国在满洲并无如此重大利害关系，以至要卷入此问题而加深与日俄英法四国间的对立。结果，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不仅未被列强所采纳，反而徒然起了促使日俄接近的作用。

不拘怎样，上述1909年8月至9月，日本强行推进满洲政策，对此后日美俄关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元老伊藤博文担心由于日本强行推进满洲政策，日俄关系是否会恶化？并担心这样作是否会使美俄两国接近？他想通过加强与俄国的联合来改变对外政策。原南满铁路总裁、当时的邮电大臣后藤新平，早就提倡"新旧大陆对峙论"，主张联合以俄国为主的欧洲列强对抗美国，并曾以此劝说过伊藤，因此，伊藤看来似乎也被这种主张打动了①。

①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劲草书房，1965年版，第962—974页。

不管怎样，由于后藤的斡旋，伊藤决定与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Kokovtsov, V.N.)进行会谈，为此于1909月10月26日前往哈尔滨。但在哈尔滨车站遭到朝鲜人安重根狙击而死去。然而，日俄关系仍然由于诺克斯国务卿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提案而更加紧密，从反对这个提案的日俄联合中产生了1910年7月的(第二次)《日俄协定》。

六　第二次日俄协商，并吞韩国，第三次日美同盟

1909年12月17日，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通过美国驻彼得堡代理大使，收到了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提案。第二天(18日)，他就召见(日本驻俄)临时代理大使落合谦太郎，提议"在对美国作出答复之前，希望预先与日本政府协商"。在日本，小村寿太郎外相在12月20日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收到了诺克斯提案，当天即训令驻彼得堡落合临时代理大使，让他答复俄国政府说："在对美国作出答复之前，预先互披胸襟交换意见，并协商保护两国共同利益之办法，此乃帝国政府所切望者。"俄国大使就此问题访问小村外相，强调"目前有必要更加密切日俄两国之关系"。小村在12月30日也认为："目前进一步密切日俄两国之关系，乃帝国政府之夙望……，上述共同之意旨或许不无以满洲铁路问题为动机而出现取得促进之结果。"[①] 通向第二次日俄协商的道路就从这里打开了。若按《春秋》笔法，第二次日俄协商的生身父母应该是美国国务卿诺克斯。

1910年3月，日本政府廷议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南北满洲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满洲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2卷，第1册，第724—736页。

相给予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定的基本方针，以及这个协定和秘密协定的纲领草案①。3月19日，小村外相把协定草案交给当时正归国述职的驻彼得堡大使本野一郎，命令他试探俄国政府的意向。本野大使回到彼得堡后，从4月5日起与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大臣始开进行会谈，以后一直进行了三个月的磋商，1910年7月4日，同伊兹沃尔斯基外交大臣共同签署了第二次《日俄协定》。

签署的这个协定，由三条公开协定和六条秘密协定组成，重点显然是在秘密协定。“1907年秘密协定追加条款所规定的分界线”，成了“划定两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各地区的分界线”，并且约定“出现侵犯上述特殊利益事件时，两缔约国为维护该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或相互给予支援”。

然而在日俄交涉的同时，日本政府还推行并吞韩国的计划。已如上述，日本通过1907年7月的《日韩条约》(第三次)，已经掌握了韩国内政全权。但是，从那时以来，韩国国民的反日游击活动此伏彼起，日本对韩国的统治并不稳定。一般认为1908年是游击活动最盛的时期。面对这种形势，小村寿太郎外相认为：“今后需努力日益增进在该国之实力，加深其基础，以树立内外不可抗争之势力”②，并于1909年3月30日向桂太郎首相提出并吞韩国的方案。4月10日，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同正在回国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商讨了并吞韩国问题。一向主张对韩慎重论的伊藤，也意外地赞同了小村的方针。伊藤也似乎对韩国的保护统治感到绝望了。不拘怎样，政府在1909年7月6日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小村提出的并吞韩国的方案，并决定在并吞的适宜时机到来之前，首先根据并吞的方针扶植实力。 240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332—334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42卷，第1册，第179页。

当时，伊藤已辞去韩国统监的职务，曾任副统监的曾祢荒助自6月14日起担任第二任统监。但是，伊藤竟再次前往汉城对韩国政府和韩国国王施加压力，追使他们在1909年7月12日签署了有关委托韩国司法及监狱事务的日韩备忘录，同时还追使他们同意解散韩国军队。在如此这般铺平了并吞韩国的道路以后，伊藤起身前往去满洲巡视。同年10月26日抵达哈尔滨的时候，已如上述，他被一个朝鲜人暗杀了。接着，在同年12月22日，又发生了韩国首相李完用遭袭击而负重伤的事件。日本由此出现了一种意见，认为这类事件连续发生是由于统监政治不够完备，于是并吞韩国的问题便骤然表面化了。在韩国内部也出现了为迎合日本意图而鼓吹日韩合并论的人，对舆论起了推动作用。

韩国统监曾祢荒助对这些舆论持消极态度，因健康不佳而辞职。1910年5月30日，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以现职兼任韩国统监。当时日本正在为缔结上述第二次日俄协定而与俄国进行交涉。1910年4月，小村外相利用这一交涉，使俄国事先同意了并吞韩国。此外，小村还照会英国，就并吞韩国问题取得了英国政府的预先谅解。做完这些准备之后，桂内阁在1910年6月3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韩国的施政方针，一步紧似一步地着手实现并吞韩国。旋于6月24日，追使韩国政府承认有关委托警察事务的备忘录，把韩国警察置于驻韩日本宪兵队司令官明石元二郎的统辖之下。接着，7月23日，寺内正毅抵达汉城就任统监，以李完用首相为对手不断进行交涉，于8月22日追使签订了关于并吞韩国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日本成功地追使韩国"完全而且永久地"出让了"有关全部韩国的一切统治权"。[①] 如前所述，这个条约的签订，与第二次日俄协商的完成大约同时，应该说这决不是偶然的。因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340页。

为自从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韩关系归根到底不外是随着日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就这样，日本通过与俄国的妥协和联合，逐渐成长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妥协和联合，如上所述，本来是出自对抗美国远东政策的需要的。因此，日俄结合的加强就意味着日美对立的加深。这样，当时既与日本有同盟关系，又与俄国有协约关系的英国，其对美的立场就变得极为微妙了。1910 年 8 月 9 日，英国驻美大使布赖斯(Bryce, T.V.)向外交大臣格雷(Grey,E.)报告说，塔夫脱总统提议要同英国缔结仲裁裁判条约。9 月 25 日，格雷外交大臣通知驻英大使加藤高明说，只好使与美国缔结的仲裁裁判条约和日英同盟同时并存。1911 年修订日英同盟的原动力可以说 241 就在于英美关系[1]。在与英美谈判缔结仲裁裁判条约的同时，格雷外交大臣与加藤大使进行了修订日英同盟的谈判，而日本在 1911 年 1 月即已答复英国，对于英国与美国缔结仲裁裁判条约并无异议。

1911 年 4 月 5 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修订日英同盟的下述方针：从现有协定的条款中，删除有关日俄战争和韩国的规定；期限为十年；追加本条约不适用于已签订有一般仲裁裁判条约的国家的规定。此后，根据这一方针进行了磋商，1911 年 7 月 13 日，由加藤大使和格雷外交大臣签署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于是，日英同盟从这次签字之日起，又具有十年的效力。但是，由于英国被免除了在日美发生战争时的参战义务，所以只要问题涉及与美国的对抗，日本与其说依靠英国，毋宁说更加深了对俄国的依靠。当修订日英同盟条约时，小村外相曾把日英同盟看作是“帝国外交的真髓”，但是，如上所述，唯其在日美关系上，它已失去了“真

---

① P. 洛(Lowe)：《大英帝国与日本，1911—1915 年英国远东政策之研究》，麦克米伦，1969 年，第 34 页。

髓”的实质。

第三节　辛亥革命和大陆政策的分歧

七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日本

第三次日英同盟结成后约一个半月，第二届桂内阁辞职。1911年8月30日，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成立。在这次内阁里，最初是由以邮电大臣身分入阁的原外相林董临时兼任外相。从10月16日起，内田康哉担任专职外相。中国爆发革命，就是在内田担任外相前夕的10月10日。

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辛亥革命的性质时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辛亥革命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革命来说，“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①辛亥革命的确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清朝得知革命爆发，惊恐万状。10月13日，庆亲王内阁的陆军大臣廕昌请求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提供武器弹药。西园寺公望首相和内田康哉外相得报后，按照陆相石本新六的希望，决定接受廕昌请求的方针。10月16日，内田康哉外相向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传达了这一方针，但他没有忘记同时提出以“清政府亦应改善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作为交换条件②。10月23日，泰平组合的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与清政府陆 242

① （日）毛泽东选集刊行会编译，《毛泽东选集》第5卷，三一书房，1956年，第17页。译者补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7年横排袖珍本，第62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清国事变》，第135—136页。

军部签订了购入二百七十三万二千六百四十日元武器的合同，这些武器不消说都是日本陆军省的处理品。

提供用于镇压革命的武器，表明早已反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日本，对辛亥革命也公然采取反革命的态度，而要求清政府“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作为提供武器的交换条件，则把日本的帝国主义有缝就钻的奸狡面目暴露无遗。但是，西园寺内阁还必需进一步确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10月24日，内阁会议讨论了“关于对清政策问题”，作出了决策。内阁会议的决定是，首先确认前内阁的“在经常保持对该国（清国）之优势地位”的同时，“永远维持满洲现状”的方针，接着阐述了有关满洲问题的方针，即“延长满洲租借地之租借期限，解决有关铁路各项问题，更进而确立帝国对该地区之地位，借以达到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乃帝国政府经常策划而不容懈弛者；苟有机可乘则应利用以采取下此决断之手段”；但在今天则应“暂时维持现状不使遭受侵害，遇有良机则努力逐步增进我之利权。至于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则须等待最有利于我之机会并稳操胜算之场合始实行之，是为上策”。然后，阐述了下述对“中国内地”的方针：

“再看帝国对中国内地之关系：帝国侨民之多，我通商规模之大，以及与我有关企业之日益增加，在在表明帝国在该地区之地位日益优越，趋势十分明显。加之，清国局势极不安静，今后形势如何，任何人亦不得预知。而一旦不测之变发生于该地区，其时得以采取应急手段者，舍帝国而无他。衡诸帝国之地理位置及帝国之实力，此事更无可置疑。帝国在东亚之一大任务亦可谓即在于此。今后帝国不仅必须自觉认清上述之地位并努力确立之，而且务须从今不计一切采取使清国及列国逐渐承认上述地位之方策。而列国深切考虑东亚大势之时，终将承认我之优势地位，吾人认为并非无望。”

这样，内阁会议就把当前政策定为："满洲问题之解决，唯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1]

243 所谓"中国内地"与日本的关系，前此已有如下进展：1898 年，日本从清政府取得福建不割让给他国的保证；1899 年八幡制铁所与汉阳铁政局督办盛宣怀缔结了购入《大冶矿石合同》[2]；1904 年兴业银行与大冶铁矿缔结了三百万日元的投资贷款，这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都曾起过重大作用。确保大冶铁矿石成了发展军需工业及重工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日俄战争行将结束的 1905 年 8 月，当时的桂内阁曾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为确实扶植帝国在汉口方面之利权，并对清国将来之发展作好准备"，须把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的采掘权"伺机全部归诸本邦之手"，"关于大冶、萍乡两矿之经营，汉口铁政局及兵器局之经营，须以聘请我国技师负责业务为条件提供资金，使其管理归诸我国之手"[3]。这个内阁决定，一方面表明日本政府决心不仅要控制铁矿石，而且要进一步控制以大冶为中心的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另一方面还表明日本政府再次摆出了因日俄战争而暂时收敛的南进姿态。日俄战争后，大冶和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密，每年都由正金银行提供贷款。1908 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1910 年，日本为了确立对汉冶萍公司的控制，得以把该公司改为日华合办。但是，辛亥革命使汉冶萍公司陷入了危机。以武昌起义为开端而发动革命的革命军，立即占领了汉阳铁厂。1911 年 10 月 13 日，伊集院公使为了阻止革命风暴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 44/45 卷，别册，《清国事变》，第 50—51 页。

② 《大冶矿石合同》：1899 年 4 月 7 日签订，见《中外旧约章汇编》，I，第 874 页。——译者。

③ 安藤实：《日本的对华财政投资，汉冶萍公司借款》，见《观察亚洲之眼》第 8 期，亚洲经济研究所，1967 年，第35—36 页。

波及大冶，要求政府派遣军舰。14日，海军决定向扬子江方面增派四艘军舰的方针。17日，海相斋藤实一面指示在汉口的川岛令次郎司令官"在尚未接到(日本政府)有关命令之前，应对清国政府及造反者双方采取严正中立态度，仅限于采取保护我侨民及各国侨民生命财产所需要之行动"，但另一面又强调："至于大冶，若暴动波及该地，则有理由以国家自卫权之名义加以保护"①。24日的内阁决定就是根据这种情况作出的。这个内阁决定固然继承了1905年8月的内阁决定，但应该说它表明了一面北守南进、一面在"中国内地"确立"优越地位"的一种新政策，显示了为此目的而企图拼命维护既得利权、不使受到革命侵犯的异常决心。但是，无奈中国正处于动乱之中，不容许立即采取具体措施，只好暂时注视形势的发展。

八 大陆政策的分岐

西园寺内阁虽然决定以维持满洲现状和在"中国内地"确立优势地位作为当前的政策，但是，派驻满洲和"中国内地"的政府机关却按照各自的意图采取行动，反而把日本的政策引向混乱。

10月28日，驻中国的伊集院公使向本国政府提出为了确立在"中国内地"的优势地位，应乘革命之机分裂中国的方案。他主张："清廷挽救时局政策的一部分，盖在于千方百计地试图与革命军友好妥协，此事固不容置疑"，但是，一方面"清朝业已完全失去人心，乃属不可争辩之事"，而另一方面认为"盘踞武昌的革命军的军政基础已稍见牢固，为时已非过早。而且广东总督于何时宣告独立亦未可知"，假使形势如此，则"恰好应利用此种形势，至少在华中和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华北则应由现朝廷继续统治 244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46—48页。

之"，"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在华北一隅保存清朝，使之与汉人长期对峙，乃属有利于帝国之上策"。为了实行这一政策，伊集院公使于11月2日强调指出："在华中武昌和华南广东方面，应讲求对革命党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受挫，使之不起与华北清廷中央政府融合妥协之念，长期对峙、坚持到底之办法。"①

陆军则无视西园寺内阁的政策，企图一举解决满洲问题。10月下旬，革命派王国柱进入满洲策划暴乱，据说这一行动是由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所操纵，其活动资金也是由中村总裁提供的。而指挥中村总裁的则是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同时，中村还是与满铁第一任总裁、后任第二届桂内阁邮电大臣兼铁路院总裁的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而进行这一活动的。据清朝方面的情报，情况则是："满洲之革命党，多潜伏于日本国铁路附属地之内，并大量搬运贮藏武器弹药，对此，日本国给予免付运费之执照。"②

驻沈阳的落合谦太郎总领事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11月27日，向内田康哉外相建议，使革命派王国柱离开满铁附属地。于是，内田外相训令采取措施，使王国柱离去。但是，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大将于11月29日致电内田外相说："我认为此时采取使其离去之措施是不适宜的。"同时通知落合总领事："希望暂缓采取使其离去之措施。"内田外相当然于11月30日向大岛都督传达了政府的方针，并发出训令，不要把附属地区搞成政治活动的策源地。尽管如此，驻外机关仍然背离政府基本方针而行动，特别是军部及与之相勾结的扩张主义者更是任意践踏政府及外务省的政策，这种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149页，第377—378页。

② 同上，第264—265页，第270—271页。译者补注：此情报当指宣统3年10月初10及12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外务部电，内称："王小堂等声称，由日商处借银十余万两并接济军火炸弹……凡匪党皆由南满铁路发给全线免票"。王小堂，即王国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531—533页。

日本外交的典型模式在有关辛亥革命问题上也出现了，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注意的事实。

在满洲擅自行动的陆军和扩张主义者，为了便于在满洲采取行动，在"中国内地"也进行了活动。还在10月底或11月初，陆军中佐寺西秀武就曾向陆军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建议向革命军提供武器。他主张"使革命军之抵抗长期化，于我国之对清政策极为必要"，并要求"与三井的山本（条太郎）① 商谈办法"②。这是否陆军策动的不详，但是，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向革命军出售武器的情报，在11月初即已流传。大仓组在12月的确把武器运送给革命军。1912年1月，三井物产与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签订了贷款三十万日元的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提供武器。以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缔结合同的则是内田良平③。 245

内田与头山满同是黑龙会的头目，都想乘辛亥革命之机解决满蒙问题。内田早在11月上旬就组织有邻会，向革命军方面输送医药品、医生和护士，协助建立南京陆军医院。他打算在援助革命过程中，制造机会解决满蒙问题。他们相信，在革命前即已获得孙文的如下诺言，作为援助孙文的酬答："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所以在长城以南的范围里建国就行了，满蒙则任凭日本获取。"④ 头山满也于年底的12月26日组成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国问题同志会"，打算建立一个推动解决大陆问题的团体⑤。然而，

---

① 山本条太郎（1867—1936）：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重要代表人物，时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常务董事，其后任日华学会理事、满铁社长、政友会顾问、贵族院敕选议员等。——译者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150页。

③ 山浦贯一：《东亚新体制的先觉者森恪》，1940年，第387页。

④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453页。

⑤ 山本四郎：《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动向》，《史林》第49卷，第1号，1966年1月，第40—41页。

他们的意图既然在于确立日本在满洲的统治，他们的行动也就是与分裂中国的策划一脉相通的。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 J.N.）奔走调停，促使清廷和革命军实行停战，骨子里正是害怕日本进行干涉。日本的志士们企图使革命军打消与袁世凯妥协的念头，这也不外是想要分裂中国的策略，因为革命军并不具备以武力战胜袁世凯的力量①。策划分裂中国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对辛亥革命对策的一种倾向。

九 中国政体问题和日本出兵南满的企图

辛亥革命取得了发展。1911 年 11 月上旬至中旬，华中华南各省相继落入革命派手中。清廷考虑，能收拾这场动乱的只有袁世凯。虽然并不心甘情愿，还是起用了袁世凯；先任命为湖广总督，继而任命为钦差征讨大臣，之后又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 11 月 16 日完成了组阁。据伊集院公使 11 月 18 日发出的报告，为了摆脱这种困难的局面，是应该改造清朝政体而采取立宪政体呢？还是应该废除清朝，走向共和政体呢？“袁世凯对这种选择似乎至今仍不知所从，……究应依从哪种作法，心中颇为苦闷。”②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 11 月 28 日廷议决定了《对中国时局的方针》。据此，日本政府改变了革命爆发以来的“观望”和“袖

246

手旁观”的态度，而以“采取适当手段”作为基本方针。具体地说，则是确立了企图在下述条件下维护清朝的政策，即“抛弃共和说之类脱离实际之空论，同时去除满洲朝廷专权之弊害……在满洲朝廷名义上统治之下，实行实际依赖汉人之政治”。这是因为如果中国采用共和制，那就会给日本的国体问题带来冲击。11 月 28 日，

---

① M.B.詹森：《日本人与孙中山》，斯坦福大学出版，平装本，1970 年，第 148，152 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 380 页。

内田外相把这一方策电告伊集院彦吉公使及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圆次郎。内田外相的意图在于首先取得英国对这一方策的赞同，然后在日英共同压力下谋求保护清朝，同时想在围绕中国的外交交易中取得主动权①。

但是，英国政府对此于12月5日向山座临时代理大使发出照会，虽然认为在中国采用立宪政体是适当的，但又认为不宜从外部进行干涉，对日本方面提出的日英联合行动的提议表示拒绝。在对华政策方面，日英的利害已经并不一致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从11月以来即已接受袁世凯的委托，奔走调停清廷和革命军的停战；到12月5日，不仅武汉地区，所有军事行动地区都实行了停战。接着，12月18日，在上海清廷与革命军的和谈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中国的政体问题将由国会决定。日本以外的各国也都承认政体问题应由中国自身决定。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于12月14日召开元老会议决定："认为以确立立宪君主制为挽救时局之最上策……当前应立即与英国进行协商，视其结果如何再作出决定。"②但结果日本政府于12月26日只好承认，"此事已不得不听任其发展"③。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暴露出日本至今还是一离开英国就一事无成，同时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被袁世凯用来作为借口、迫使清廷同意不得不采用共和制的结果。

元老山县有朋对于西园寺和内田的"束手无策"及其追随英国的外交感到忧虑，在1912年1月14日起草《建议乘中国骚乱出兵满洲》的意见书，内称："因保护满洲租借地及铁路之关系……必须断定此时乃需要出兵满洲之适当时机（但出兵以两个师团为限）"，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382—385页。

② 同上，第455页。

③ 同上，第467—468页。

并把这个意见书送给了前首相桂太郎[1]。1月16日，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如后所述，就分割满洲及蒙古的势力范围，与俄国开始谈判。第二天，内田康哉外相训令驻彼得堡的本野一郎大使，让他就中国革命波及到满洲时，日本向南满增派军队一事，取得俄国政府的谅解。据说，这是由于陆军省的田中义一军务局长擅自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内田外相屈服于这种压力，才向俄国方面通知有意出兵南满的[2]。究竟如何，姑且不论，其结果是本野大使于1月18日与俄国外相进行会谈，并得到了答复说："对帝国政府以单方面力量负责保护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并无异议。"针对俄国的答复，内田外相于1月23日再次训令本野大使，要他预先通知俄国政府：日本出兵南满，不仅是为了保护铁路，也是为了维护日本在南满的利益。

247

可是，德国政府察觉日本意图后，于1月31日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不干涉中国。对于德国的建议，国务卿诺克斯回避了发表声明的形式，而以答复德国政府询问的方式，在2月3日向德国驻美大使复照，强调了中国形势无需各国干涉的意旨，并于2月6日把这次交换照会一事及其内容通知了日本驻美临时代理大使埴原正直。另一方面，在柏林，德国代理外相于1月31日及2月1日，向杉村虎一大使及畑良太郎参事官反复表示"难以同意日本国此时对中国采取单独行动"。此时日本出兵南满的企图，是否仅仅由于德、美表示了这种态度而中止了，尚未发现史料可资证明。不论情况如何，元老山县有朋在2月9日却不得不写道："相机出兵或增兵一事，业经阁议议决，并已与俄国协商完毕，今乃顾虑周围情况……采取旁观坐视之政策，致失千

① 《桂太郎关系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② 由井正臣：《辛亥革命和日本的对策》，《历史学研究》第344号，1969年1月，第7页。

载难逢之机会，实为国家不胜痛愤。”①

十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和第三次日俄协商

1912年1月1日，在中国，上年年底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在南京正式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接着，1月28日，孙大总统组织参议院，并组成了南京临时政府。但是，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第二天(13日)孙文便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部分日本军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这种进展及日本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感到焦虑，乃和在大陆上进行活动的一部分民间人士相勾结，把清帝退位视为大好时机，企图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使之独立。这就是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其表面上的主持人是清朝顾问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早就为大陆问题到处活动，在北京官界也有相当的地位和势力。看到革命发展和清朝灭亡已成定局，他便拥戴清朝的肃亲王逃往满洲，并指使喀喇沁王等人在蒙古起兵，企图拉拢这些人建立满蒙王国。在这个计划中，当时由参谋本部派往北京的高山公通大佐扮演了主要角色，北京守备队长菊地武夫也曾对此给以支援，而高山大佐则是与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直接取得联系进行活动的。喀喇沁王的活动资金是由大仓组出面、并以蒙古矿山为抵押提供的贷款，其实却是由日本政府支出的(即蒙古借款)。此外还有与张作霖有来往的町野武马大尉和朝鲜总督府的太田宪兵大尉也参与了川岛的这个计划，后者曾与寺内总督不断取得联系。2月5日，肃亲王一行到达旅顺，进入都督府顾问官邸，“奉天举事”的时机似乎越来越成熟了。

248

① 《桂太郎关系文书》(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可是，英国很快就察觉了这种形势，2日16日通过窦纳乐大使向内田外相指出，“根据清帝退位的上谕，袁世凯乃是接受委任建立统一南北(亦包括满洲在内)的新共和政府的人，……在满洲发起任何分裂活动，从保全中国领土来看，都是不利的”。内田外相于2月20日，就满洲形势答复窦纳乐大使说：“依然决心保持不干涉态度……对目前之危机拟严守中立”。[①]同一天，西园寺首相也训令关东都督大岛义昌，要他取缔川岛浪速等人的满蒙独立活动。这样，一部分军人和民间人士企图乘辛亥革命之机分离满蒙并使之独立的计划，因受西园寺—内田外交方针的压制，遂不济而终。但是，此中留下不满的种子却继续萌芽、成长，不久便给日本外交造成了致命伤。

西园寺内阁在制止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的满蒙政策之时，正在策划勾结俄国分割满洲及蒙古。在外蒙古，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自治和独立的要求一直在高涨，1911年8月，甚至发展到向彼得堡派遣使团寻求俄国支持的程度。同年10月10日，中国一爆发革命，外蒙古便于11月30日宣告独立。一方面，俄国通过1910年7月4日的第二次《日俄协定》虽然就分割满洲一事同日本达成了协议，但是，关于蒙古问题还留下一些悬案。另一方面，日本则想乘中国革命之机“谋求根本解决满洲问题”[②]。这样，日俄双方都存在着须寻求对方支持的问题。

1912年1月10日，内田康哉外相训令驻彼得堡的本野一郎大使，以“本大臣之一私见”的形式，带着“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我国势力范围，西部为俄国势力范围的方案”，去试探俄国政府的意向[③]。此后，1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了以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338—340页，347—350页。

② 同上，第527页。

③ 同上，第523—524页。

延长南北满洲分界线，划分日俄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为目标，与俄国达成协议的方针。当时，日本还同时考虑着"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而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v, S.)也在1月24日提出以日本要求延长关东州的租借期限、俄国要求北满铁路的敷设权等等，作为承认中国新政府的交换条件。但是，由于当时俄国害怕在远东引起事端，对于日本在满洲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持反对态度，结果，这个时期的日俄交涉就完全避开了满洲问题。于是，本野大使和萨佐诺夫外交大臣，仅就延长(满洲)分界线和分割内蒙古的协定方案，继续进行了磋商，6月5日，二者大体达成了协议。 249

1912年7月8日在彼得堡签署的第三次《日俄协定》，全部是秘密协定。其内容很简单，除前言之外，由三条组成，只是延长1907年第一次协定附加条款所规定的分界线，并划定两国在内蒙古的"特殊利益地区"。这就是说，日本政府想乘中国革命之机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企图，未能实现。日本这一时期未得实现的野心，不久即乘中国"二次革命"和世界大战之机而再次暴露出来。

第四节　维护宪政运动和大陆政策

十一　辛亥革命的冲击——维护宪政运动

自由主义者中野正刚，自1911年12月18日起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五日的论文《对岸的火灾》中，论述了辛亥革命和日本的问题，强调指出："若说邻邦之革命对我国有影响，则只有当它并非革天下之命之革命，而仅是止为打破现状之革新运动，详言之，即仅限于打破藩阀、改造腐败之政党，则吾人方引以为快事，并起而欢迎之。"① 他试图把辛亥革命的冲击转化为在国内实现"打破藩

① 野泽丰：《辛亥革命和大正政变》，见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教育书籍，1960年，第177页。

阀"的动力。12月26日，曾在综合性杂志《太阳》上挥笔号召打破藩阀的浮田和民，和主张对中国革命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东京朝日新闻社的松山忠次郎等发起组成了"中国问题同志会"。他们提倡的两大方针是保全领土和尊重民意，还制订了会则，开展了国民运动。后来这一组织发展为"共和新政府同志会"，开展了承认新政府运动①。

陆军的领导集团受到了中国辛亥革命和日本的"打破藩阀"运动的深刻冲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于1912年1月7日指出："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试观今日我新闻界青年之辈种种议论，即可得知。"并出提警告说："吾人认为当局须对此种趋势有相当之认识方可。"2月13日，山县有朋因其出兵满洲的主张遭到政府反对，未能实现，受到冲击，深有感慨地说："总之，外交政策未奠定总的基础，外依列强之风向，内视议院(党派)之情况，动辄摇摆不定，方向变化无常。"2月21日，军务局长田中义一指出：有些"不喜帝国向大陆发展之辈"，"勾结政府党羽，以至使人有今日政府之中心似已落入此辈手中之感。凡事皆牵制政府之行动，欲使其终于无所作为，结果导致今日失利之状况。"他强调："总之，时局问题将进而为我陆军招来危急存亡之秋，此吾人苦心焦虑者也。"②

他们要求通过增建两个师团这一悬而未决的方案来解决上述问题，甚至为此打算组成以陆军为主导的内阁。增建两个师团的问题来源于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计划增建四个师团，已建成两个师团，要求再增建其余两个师团，以完成大陆作战的部署。但是，对于陆军来说，这两个师团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军事计划的问题，而是另有更加重要的意义。1912年4月，陆军利用陆相石本

① 山本四郎，前引论文，第41页。

② 山本四郎，同上，第43页。由井正臣，前引论文，第6、11页。

新六因病辞职的机会，让强硬派上原勇作担任陆相，打算倾注全力完成两个师团的增建；但是，西园寺内阁以财政状况为理由，不肯轻易赞同。陆军的一个文件强调说："目前情况，不单纯是增建师团问题，政府实欲乘此机会奠定政党内阁之基础，故增建师团问题不过是其牺牲品耳。"该文件还警告说：当前"实为关乎我国大计之重大时期"，"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此所谓天下成败之秋也"。他们打算在西园寺内阁总辞职之后，推寺内正毅为首，组织以陆军为主导的内阁，实现增建两个师团，同时克服"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的天皇制危机。①

1912 年 7 月 30 日，明治天皇逝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即大正天皇。为了辅佐大正天皇，桂太郎以重臣资格入宫，担任内大臣兼侍从长。陆军继续要求增建两个师团，西园寺内阁始终没有同意。12 月 2 日，上原陆相单独提出辞呈，5 日，西园寺内阁总辞职。元老似乎认为拥立寺内为时尚早，乃让桂太郎组织了内阁。12 月 21 日，第三届桂内阁组成。陆军无视财政情况提出强硬要求，迫使内阁总辞职，本来已经激起了对军阀的批判；而军阀巨头桂太郎出宫组阁，更引起了认为这是打乱宫（宫中）府（政府）之别的批评，于是反对阀族专制、维护宪政的气势猛然高涨起来。为应付辛亥革命而诞生的"中国问题同志会"，成了产生护宪运动组织的团体。维护宪政的运动以 12 月 4 日交询社的志同道合人士发起时局恳谈会为开端，进一步发展成为 12 月 19 日的维护宪政大会和 27 日的维护宪政联合会第一次恳谈会，转过年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1913 年 1 月 13 日的第二次恳谈会。1 月 15 日发行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作出论断说："大正维新，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二个中国革命。"②

---

① 由井正臣，同上，第 44 页，46 页。

② 野泽丰，前引论文，第 189 页。

当对于辛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应发展成为维护宪政运动之时，对于同一个辛亥革命，头山满和内田良平大陆论者的国家主义的反应，又向哪里发展了呢？大陆论者策划要把维护宪政运动的力量引向实现大陆政策上去。1913年1月9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报道，面对护宪运动的高涨，大陆论者企图扭转舆论，要再次策划"大大唤起舆论，使政府作出决断"①。自由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随着"民论"的高涨而日益激烈。但是，在护宪运动正在高涨的这个阶段，民间舆论却以压倒之势倾向于维护宪政。

为了对抗护宪运动，桂首相认为必须拥有自己的政党。1月20日，他发表了建立政党的计划。组织新党的意图之一，就在于建立起一个实行大陆政策的主体。但是，护宪运动以议会的在野党为前列，对桂太郎的新党计划提出了挑战。2月10日，桂太郎出席议会，打算解散议会，但是，群众包围了议会，高呼"打倒阀族"、"维护宪政"。桂首相害怕群众的行动发展成为内乱，于次日决定内阁总辞职。在日本历史上，群众运动首次推翻了内阁，但是，群众组织仍然是弱小的。元老推举萨摩藩阀、海军的山本权兵卫代替长州藩阀、陆军的桂太郎担任首相。1913年2月20日，山本内阁成立。外相是牧野伸显。

十二　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

山本内阁外交政策的最大课题在于：统一由于中国革命和护宪运动而分裂的国内各种势力，同时解决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谋求确保和扩张在中国的利权。

这时，在中国，为使临时政府发展成为正式政府，正在具体进行制度上的改革。1912年2月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袁世凯，

① 野泽丰，前引论文，第195页。

不去南京，反而在4月让南京参议院作出决议，把临时政府迁往北京。2月间已从清朝接受了权力的袁世凯，现在又从临时革命政府手里接受了权力，成功地结束了辛亥革命。袁世凯政府在8月公布了民国议会法，准备进行众、参两院的选举。为了准备选举，政党重整了阵容。政府党是当年5月由五党联合成立了共和党，革命党方面则是8月以中国同盟会为中心，集结到五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中。国会选举将在12月先进行初选，次年(1913年）2月再进行复选。这就是建立国会的程序。

袁世凯为建立新政府而进行的制度改革，尽管只是表面上的，但已再度刺激了美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的舆论。1913年1月，美国议会第二次通过了要求立即承认的决议。3月4日，民主党的威尔逊(Wilson,T.W.)政府取代共和党的塔夫脱政府而成立，使尽速承认的呼声更加高涨。威尔逊总统决心单独对中国采取行动。3月19日，美国首先退出了作为共同对中国提供贷款的机构而建立的六国贷款团。诺克斯国务卿的满洲铁路中立化方案失败之 252 后，美国的银行家成功地挤进了对华贷款的行列，其结果，1911年2月建立了英、法、美、德四国贷款团，加上1912年5月加入的日、俄两国银行团，这就是所谓六国贷款团。美国退出的理由在于，六国贷款团以袁世凯政府为对手而进行交涉的善后借款①，其条件有可能侵犯"中国本身行政上的独立(the administrative independence of China itself)"，并有"对于刚刚觉悟到对其权力和人民具有义务的伟大的东方国家的财政方面，甚至政治方面，进行粗暴干涉"的危险②。美国单独承认(中华民国)已经在望了。

---

① 原文为"改革借款"(Reorganization loan)，兹从我国文件的通称，译作"善后借款"。——译者

② 李田意：《威尔逊的对华政策，1913—1917》，1952年著，1969年再版，八角书店，第38页。

1913年3月20日，驻美大使珍田舍巳告知牧野伸显外相，美国势将决定单独承认。同一天，在中国发生了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最大政敌——主张建立政党内阁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的事件。牧野外相得知这一消息，在4月4日决定采取反对尽早承认的态度。可是，日本的国内形势还难以预断，如果美国较早承认了（中国），将对日本国内形势发生怎样的刺激也不得而知。山本内阁和牧野外相不得不迅速改变方针，决定尽快承认。4月9日，牧野外相向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小池张造发出了如下训令：

"……日前帝国议会开会期间，上下两院屡有议员质询，其主旨在于希望顾及两国之特殊关系，尽速予以承认。此类质询并有进而显示为有力之国家舆论之趋势，政府不惟不能忽视，且对此种趋势不能不予以适当之考虑。而且，列强中如美国，已将办理承认手续，帝国之舆论当将更加激动。毕竟有几千年之交往，而且目前在政治、经济、贸易、交通等方面交往极为重要而频繁，均不外来自地理上相邻接之关系，不正式恢复日中两国之邦交而长期处于不确定之状态，就日本国民之利害而言，终究不能容忍。因而帝国政府有必要特别加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尽快予以承认。"①

于是，日本政府继上年2月的提案，又向各国政府提出了有关承认中国新政府的第二个提案，提案建议："一方面，新国会目前正值开会，据某些颇值信任之理由，可以预料，事态平静之形势将可持续；另一方面，中国又遵守以往根据条约和惯例所规定之国际义务，因此，在可保无虞之情况下，愿各国尽可能同时承认中国政府。"② 英国和俄国都表示赞同日本的建议，美国却在接到中国国会开幕通知的5月2日，单独承认了中华民国。

253

就这样，中国国会开会，日本确定了承认中华民国的态度；但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8页。

② 同上，第26—27页。

是，由于前述暗杀宋教仁事件而形成定局的中国南北的对立，因善后贷款合同之缔结而愈益不可克服。上述的六国贷款团，由于美国退出，成了五国贷款团。这个五国贷款团在1913年4月26日与袁世凯政府缔结的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贷款合同，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中国的改革，但却完全有可能变成袁世凯的政治资金。而且贷款条件中也含有触犯中国主权的内容。国会势力激烈地表示反对。但是，袁世凯却践踏临时约法第十九条有关国家会计的一切事项均须国会同意之规定，打算独断专行地强行签署这项合同。国会势力的反对甚至冲及签字的会场。原定4月26日举行的签字实际是在27日凌晨3时才进行的。天亮以后，从国内各地相继拍来谴责袁世凯违宪行为的电报，国会也在十天之内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同样的决议。不顾反对、一意孤行的袁世凯，看上去似乎得到了各国对自己政权的支持和财政援助，但是反对的浪潮却越来越高。6月9日，袁世凯罢免了主张武力讨袁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接着仅存的三个国民党都督中又有两个被降职。一触即发的危机到来了。

中国新的革命危机，给日本国内舆论带来了新的刺激。多数主张都对南方革命形势寄予同情，抨击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偏重于支持袁世凯。在袁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的6月9日，政府以外务省的名义，史无前例地发表了陈述书，并要求报刊登载，强调日本政府对中国问题抱不偏不倚态度。政府用陈述书的形式声明外交方针的作法，是从这时开始的①。

十三　中国的“二次革命”和强硬对外政策

袁世凯罢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终于在1913年7月12日，揭

① 信夫淳平：《大正外交十五年史》，1927年，第11—12页。

起反旗，开始了“二次革命”。驻九江的八木书记，就日本军人参加李烈钧的叛乱部队一事，报告汉口总领事说：“当地中国官民及西洋人皆认为此次李烈钧之起兵是依仗日本人之后援，并相信江西军中有许多日本军官。”还指出：“实际参加江西军之日本人，目前计预备役军官三名，下士官七名和身分不明者三名，此外，在15日，预备役陆军中尉佐藤某及贵处（汉口）驻屯军翻译穴水某，也投奔湖口之李烈钧”，并推测“今后尚有可能增加”①。袁世凯立即派遣军队讨伐南方的叛乱。

日本军人的策动，已明显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各地都发生了伤害日本官民的事件。8月3日，在山东兖州发生了中国派遣254军（日本驻华军队——译者）所属华北派遣步兵第二大队（营）的中队（连）长川崎享一大尉被监禁于中国军队兵营的事件。8月11日，发生了华中派遣队付步兵少尉西村彦马及一名士兵，在汉口江岸车站附近被中国士兵殴打、监禁的事件。9月1日，北军开始攻击南京，3日，攻陷南京，使“二次革命”终于流产。就在1日这一天，江苏督军张勋部下的士兵，对日本人施加暴行和抢劫，杀害了三名日本商人，三十六家日本商店中三十四家被劫。

日本的国内舆论沸腾起来了。当时，护宪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宪政拥护会正在为寻求能够把运动组织起来的课题而焦虑。对大陆论者来说，这正是把护宪运动的力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绝好机会。9月14日，以头山满等人为中心召开了“南京事件同志会”，有十三人出席，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同日，对华同志联合会决议，为了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应出兵北京后方，进驻蒙古的热河方面”。5日，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在东京赤坂的私邸附近，被冈田满及宫本千代吉等两名右翼青年用短刀刺伤，次日身亡。凶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370—371页。

手的后台是岩田爱之助。他有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军而负伤的经历，并以所谓中国浪人的身分，一直主张强硬的大陆政策。

阿部政务局长是代表外务省的政策制定者，当然也是大日本帝国的拥护者。但是，他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完全依靠和平方法，而以开展贸易和扩大其他经济利权为重点"。并为此而强烈要求外交的统一。他说：

"……外交完全由外务省统一之，陆海军省自不待言，即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官署，亦均须遵循政府之方针，不仅决不能与之背道而驰，且应按照外交机关之要求，为其活动创造条件，此点至为重要。因此，主管长官亦应针对此点向中国各地驻屯军司令官下达详尽之指示，以使将来无丝毫之误解，此固不可不然者；而当务之急则须使以往参谋本部、军令部等机关公开或秘密派往中国各地之军官亦牢记上述意旨。"

阿部列举了为保持外交机关的统一而应厉行的事项，特别强调了"在满洲我国外交之统一及各机关之协调"①。这是对陆军乘中国革命之机策划满蒙独立的剖析和批判。

阿部的主张阐述了对于资本主义说来最合理的政策见解。而护宪运动的纲领在外交问题上也确实提出过从制度上保证阿部主张的改革。1900年，山县有朋首相为了防止政党势力渗入军事机构，建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而山本内阁于6月间改革了此项制度，把军部大臣的资格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但仅靠这点改革，当然还不足以从制度上保证外交的统一。

暗杀阿部政务局长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大陆论者的强硬对外 255 运动。9月7日，对华同志联合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决议提出出兵建议，闭会后还到外务省进行了示威游行。对华同志联合会制订的《满蒙问题理由书》强调指出："经济资源贫乏之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67—1076页。

我国，除政治实力外无可依恃。”①

9月9日，山本内阁决定了为上述三个事件进行交涉的方针。牧野外相指示从6月开始担任驻华公使的山座圆次郎，让他提出(1)惩办负责人和(2)以赔偿为中心的要求，并命令山座公使，既要说明这些要求是在民众压力下制定的情况，又要剀切说明“为维护帝国之脸面，不得不要求尽速得到适当解决”②。次日(10日)，牧野外相一面向山座公使进一步详细说明国内的情况，强调必须尽速实现上述要求，另一方面或许出于对军队及一般民心的顾虑，又进一步追加了两项要求：(1)革除张勋的江苏督军职务；(2)须将南京事件之处理公之于众，并由总统发布命令表示歉意；让山座公使进行交涉。山座公使把追加的两项条件作为希望条件附加在要求条件上，提交给了中国政府③。后来在“二十一条”中所采用的把“要求”条件和“希望”条件加以区分的外交技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④。

结果，中国政府在9月12日发布了总统令，实现了“希望”条件之一，并在15日向山座公使面交了表示同意全部主要条件的照会。剩下的仅是“希望”条件中的张勋革职这一项了。9月16日，牧野外相指示山座公使说，张勋革职问题乃是“我舆论所最为热衷者”，所以要对中国政府一步不让地谈判这一问题，“使其迅速同意实行”。山座提出反对意见说，前已约定，如果同意主要条件，对“希望”条件可酌情处理，因此碍难过急地严厉提出张勋革职问题。牧野外相表示，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要“改变方向”，提出代替张勋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76—1084页。

② 同上，第480—481页。

③ 同上，第484页。

④ P.洛：前引书，第110页。（“P.洛”原书刊作“Rowe”，当系“Lowe”之误，参见原书第241页注①。——译者）

革职的新条件，命令山座要求：(1)进一步延长关东州的租借期限为99年，并且在延长租借期间，不把满铁归还中国或由中国赎回；(2)同意出让早就提出要求的四条支线。

山座公使对此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他痛切地指出："如我方改变态度之理由，完全由于舆论激昂，则与帝国政府自行暴露其思虑浅薄无异，与其说是要求，毋宁说是依靠袁世凯来求得自身之生路。此种奇特局面，关系帝国政府威信实非浅鲜。"① 牧野外相撤回了自己的条件，态度软化了，他说："当前先使对方以文件保证近期决定将张勋革职，如此点办不到，则要求取得确实之口头保证。"②结果，中国政府于12月16日免去了张勋的江苏督军职务，任命他为长江巡阅使，这样，事情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解决。 256

上述三个事件，一度造成了势将影响悬而未决的承认中华民国这个问题的情势。但是，承认的手续却还在进行着。袁世凯已经镇压了"二次革命"，上述的善后借款对镇压革命起了很大作用。10月5日，袁政府公布了总统选举法，第二天(6日)举行了选举。结果，袁世凯当选，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同一天，日本与英国和俄国都承认了中华民国③。

取得各国承认的袁世凯，日益暴露出独裁的真面目，11月4日，镇压国民党并发动了政变；13日，迫使国会无限期休会；第二年(1914年)的5月1日，公布了大幅度扩张总统权力的《修订民国约法》。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所出现的是独裁政治。革命运动已经面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509—512页。

② 同上，第511—512页。

③ 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即派孙宝琦、李盛铎二人为特使赴日出卖主权，以换取日本承认袁政权，并取缔国民党在日本之活动。日本遂提出满蒙五路之要求。1913年10月5日，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与袁政府进行了"满蒙五路秘密换文"，袁政府出卖了四洮(四平至洮南)、开海(开原至海龙城)、长洮(长春至洮南)、洮热(洮南至承德)、吉海(吉林至海龙城)等五条铁路的借款权或优先借款权(见《中外旧约章汇编》II，第928页)。10月6日，日本政府乃承认袁政权。——译者

临着新形势和新课题。革命运动的核心再度迁到日本。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的精养轩召开成立大会。上年7月爆发"二次革命"时被免去全国铁路督办职务、从8月以来逃亡日本的孙文，被推举为总理。

牧野外相围绕上述三个事件所进行的外交谈判，暴露出山本内阁既无指导舆论的器量，也缺乏这种能力。他们只因害怕舆论而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反过来就只是被中国人民投以恐怖和蔑视的目光。若从舆论方面来看，施加压力团体的施加压力行动已开始对政策的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政府的态度和舆论的作用，在国内，不仅没有实现阿部政务局长所希望的外交机关的统一，反倒加深了分裂；在国外，反而阻碍了日华亲善。

1914年初，国内分裂再次出现了千钧一发的局面。海军受贿的"西门子事件"[1]被揭发，使正在找不着斗争题目的宪政拥护会由此得以复苏。大陆论者则又想把高涨的护宪运动的力量吸引到自己的运动中来。1914年2月6日，对华同志联合会各派一起在东京两国[2]的国技馆召开有志者大会。2月10日，各派在日比谷联合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对支持议会和政府的报社举行了示威游行，使东京陷于混乱。黑龙会的内田良平作为这次行动的领导人之一，被检事局传讯。他在3月1日说："我正在尽力赶在议会即将召开之前遍访各政党知名人士，打算让他们就对华问题提出外交不信任案，此时，突然发生了海军问题，就把这个问题也抓过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3] 3月24日，山本内阁倒台。4月16日，成立了大隈内阁。外相是加藤高明。

---

① 西门子事件：指日本海军官员接受德国大军火商西门子公司的贿赂，1914年1月23日被揭发，涉及山本首相及海军部门多人。——译者

② 两国：东京都东部的一个地名。——译者

③ 野泽丰，前引论文，第201页。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

第一节　参战外交

一　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

大隈内阁的外相加藤高明，1881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三菱公司，被派在伦敦工作，认识了正在英国游历的陆奥宗光。作为三菱的职员来说，他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很快就在1885年当上了三菱总公司的副经理。同年，在大力支援自由民权运动的三菱公司与共同运输公司合并而创办"日本邮船公司"之时，他担任了总公司庶务科的副科长。第二年，1886年，他与三菱的创办人岩崎弥太郎(已于1885年死去)的长女春治结了婚。当时的日本正充满着新的希望，即1885年底实行内阁制度，伊藤博文组成了首届内阁；1886年5月起，外相井上馨开始进行修改条约的工作；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也近在眼前。1887年，加藤因"到处向人点头哈腰的买卖这行算干够了"而改行，在陆奥的帮助下进入了外务省。他在外务省的经历也是不同寻常的。1894年7月，陆奥担任外相，成功地与英国签订了修订的条约，便提拔三十四岁的加藤到已取得对等关系的英国担任公使。1895年1月，日清战争方酣之际，加藤前往伦敦就任，由此直至1899年初，他作为驻英公使，经历了开始瓜分中国的重要时期，为其后不久缔结的日英同盟铺平道路，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即认为日本外交政策应以日英同盟为基础。1899年，回国述职，前往韩国和中国进行考察。1900年，他四十岁

参加伊藤博文(此时他已组织了政友会)的第四届内阁，担任外相。第二年，他和这个短命内阁一起辞职下野。此后，他策动民党联合反对桂太郎，当上了议员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后来的《每日新闻》社)的社长。日俄战争后，1906年，他在西园寺公望内阁中再度就任外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反对陆军在满洲的军事统治，在大矶会议上进行争论，最后提出了辞呈。此后，他不断强烈要求外交的一元化。1909年，他应第二届桂内阁小村外相的要求，出任驻英大使，缔结了第三次日英同盟。在回国休假的1912年，他与桂太郎取得和解，1913年，作为外相参加第三届桂内阁。在桂内阁因护宪258运动而倒台，他也辞职以后，加入了桂太郎组织的同志会。桂太郎死后，在1913年12月的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他被推选为总理(即总裁)。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14年4月参加大隈内阁，第三次担任外相。加藤的这些经历表明，他是当年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外交家。

大隈内阁的外交课题是，把仍然处于混乱之中的对华政策确定下来，确保并扩大在中国的利权。西园寺内阁曾确定了对辛亥革命的政策，在解决满洲问题方面则采取了"等待对我最有利时期之到来"，以及当前"特别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的方针，但当时加藤也曾提出应该解决满洲的问题。在他为参加桂内阁而辞去驻英大使回国之前，曾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为了确立日本在满蒙的地位，就延长即将到期的旅顺及大连的租借期限① 和满铁及安奉线的经营期限②，进行会谈，取得了格雷的谅解。格雷表示

---

① 旅顺及大连的租借期限：1898年中俄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旅顺、大连租借期为二十五年。——译者

② 满铁及安奉线的经营期限：1896年中俄中东铁路合同规定自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该铁路。此项规定亦适用于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译者

好意，说关东州是日本"播种了鲜血"(Planted blood)之地。桂内阁寿命很短，所以加藤作为外相是无所作为的。现在，他作为大隈内阁的外相，企图要全面解决中国问题。大隈内阁为了分化护宪运动，就把与犬养毅一同被民众尊崇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安置在法相职位上，以强化保守阵营。保守阵营的强化，是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是，中国的形势却是绝不容日本乐观的。推举大隈重信做首相的元老井上馨，曾对大隈检讨自己在日本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并谈及日本面临的苦恼。他指责"外交界和商人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日本资产阶级不象外国资产阶级那样积极向外发展，流露不满。他强调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浙西的石油，华南的铁路，还是满洲的铁路，其利权今天都被德国、英国和比利时拿走了。更不用说所谓日本占有优势的福州方面，就连大冶铁矿今天也几乎陷于危险状态了。"他悲观地说："照目前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恐怕招商局的大冶铁矿也将被英国夺去。"他担心地说：满洲的"租借也将在几年后就要满期，如果中国坚持还债而让日本走开的话，这个问题也将很不好办"。他警告说："照此发展下去，俄国势力的影响就要从蒙古蔓延到黑龙江，终将直至长白山，日本无疑要从满洲撤退，而日本一旦撤离满洲，首先就将是无法保住朝鲜"，因此，"果然如此，则先帝陛下的遗业将悉遭破坏，国家未来的危难实不堪设想。"①

大冶铁矿的情况是，1912 年 1 月，当辛亥革命高潮时，总算达成了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草约，但是，3 月间，在革命的影响下，公司的股东大会一致通过了取消合办，结果成为泡影。1913 年 12 月，正金银行(应中国方面的要求)订立了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合

① 《故井上公传》第 5 卷，1934 年，第 353—354 页。

259 同，日本取得了贷款优先权，并攫取了聘请日本人为最高技术顾问和会计顾问的权利，事实上确立了对汉冶萍公司的财政统治；① 但是，既然不能合办，或者既然不能确保日本对该公司的处理权，则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控制就不能实现，并且还不得不继续担心有受到革命冲击的危险。

在连接大冶铁矿和福州的铁路问题上，形势也很严重。在山本内阁时期，1913 年 8 月，日本政府曾就铺设宁湘铁路（南京经南昌至汉冶萍的萍乡）问题与中国政府开始交涉，此外并计划修建自厦门经福州、南昌至汉冶萍的汉口的铁路，但是，11月间，日本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不得不很快就放弃了铺设宁湘铁路的打算。1914年 3 月，英国与中国政府订立了宁湘铁路贷款合同。日本仍寄希望于福州至汉口的铁路，于 1914 年 2 月要求中国政府让给贷款权，同时向英国政府要求提供资金援助。英国对于福州至南昌的铁路虽表同意援助，但是，对于南昌至汉口的铁路却予以拒绝，"主张将来有必要或希望修建这条延长线时，将为英国企业取得此项权利。"②

一边在英国享有利权最多的"中国内地"向英国利权进行挑战，一边又向竞争对手英国要求资金援助，这就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缺乏资本力量的矛盾。但是，如果回避这一矛盾，日本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就不能胜利。加藤外相毫不退缩地向英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山本内阁时期，1914 年 3 月 2 日，英国驻日大使格林（Green, C.）向牧野外相强调："日本在扬子江流域地区的利害关系，在其分量与范围上，是不能与早在该地区已经建立、而且目前正在日益发展的英国的巨大利害关系相比较的。"但是，继任的加藤外相却于 6 月10日反驳格林大使说："阁下含混所谓之扬子江流域乃相当广泛之地区，此区域本身本不明确，即使明确，亦难以承

① 安藤实：前引书，第 72 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3 年第 2 册，第 455—456 页。

认英国对此整个广泛地区之排他性关系。”他强调指出：“根据尊函（指3月2日致牧野伸显外相信），英国在扬子江流域之利害，其程度与范围为日本在该地区拥有之利害所不能比拟，但是，应该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实际。”他极力主张说：“以往之情况姑且不论，今日则不仅决不存在如来函所述之事实，而且必须看到，在许多方面，日本之利害反比英国更为显著”，并且声言：“日本对该地区之关系，决非如尊函所言。”①

加藤外相虽然向英国提出了挑战书，但无奈却依然缺乏资金。大隈首相倡导所谓“英国的资金——日本的头脑”（English money——Japanese brain）这种日英同盟的新方式，企图在日英同盟的名义下诱使英国拿出资金。总之，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资金的劣势是难以掩盖的，日本在资金的竞争中正在节节失败。对于日本的现状，1914年7月号的《中央公论》在社论中不得不发出沉痛的呼吁： 260

“往年，帝国乘百战百胜之威，将势力范围扩及满洲，欧美各国颇有羡慕之色，而在今日资本战争中，帝国却不能不输于各国。斥责外交之无能，对当局加以鞭策，固无不可。然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暂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切不可徒事焦虑慌张而招致各国之耻笑。”

这时，正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意想不到的“发展之机”送上门来了。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本的参战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跨进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在普法战争中取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459—460、466—468页。

得胜利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对于以位居世界工厂和银行而自豪的英国来说，成了极大的威胁。英德对立取代十九世纪末的英俄对立，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枢纽。对德国的扩张感到威胁的英国，在1904年与燃烧着对德复仇热情的法国缔结了英法协定，在1907年又放弃过去的对立，同俄国缔结了英俄协定。俄国通过英俄协定，在向巴尔干进行扩张上取得了英国的支持，与同样企图侵占巴尔干的德国及奥匈帝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帝国主义列强的抗争和斯拉夫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激流在巴尔干互相交织，使巴尔干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欧洲火药库的景象。第二国际预见到形势万分危急，巴尔干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线，1912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作出决议说，日益迫切的战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要反对战争，并要把已爆发的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并要求不介入德俄两国的巴尔干纷争。

帝国主义的对立，在亚洲也很激烈。由于1907年缔结的日法协定和日俄条约，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和德、奥同盟国的对抗也扩大到亚洲。另外，中国革命也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激烈斗争给予新的刺激。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竞争，就是围绕中国而展开的帝国主义激烈争斗的新形式。

进入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对立已经孕育着一触即发的危机。1914年6月28日，在塞尔维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射向奥国皇太子斐迪南(Ferdinand, F.)夫妇的枪声，成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7月28日，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30日，俄国发布动员令；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3日，德国和法国进入战争状态。欧洲战争有可能以列强驻军的中国为舞台而蔓延到亚洲。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战争蔓延到本国，在8月3日请求美国政府向有关各国进行活动，务使交战国不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

261

领土和领海。

8 月 3 日，英国政府决定参加对德作战，第二天，通过驻日大使格林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说："如果战斗波及到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① 4 日，英国宣布对德宣战，7 日便正式向日本要求援助。英国要求日本海军搜索并击沉正在"中国海"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伪装巡洋舰，并附带谈到："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对德宣战，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② 大隈内阁于当夜十时召开内阁会议，直到第二天（8 日）的黎明。一向把"日英同盟"看作"帝国外交核心"的加藤外相主张："今日本虽非处于根据同盟条约之义务而必须参战之立场"，但是，"一则基于同盟情谊之英国请求，二则为了帝国趁此时机从东洋清除德国之据点，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之利益，由此两点，断然参战，相信乃适合时宜之良策。"③ 加藤把根据日英同盟的"义务"和"情谊"两者分别开来加以使用，认为即使没有发生德国攻击了威海卫或香港这种明确的同盟上的义务，也可以"情谊"作为决定对德参战的根据，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军事行动的自由。于是，内阁会议决定向英国政府提出，把日本参战的理由规定为"由于战乱余波涉及东亚，日英同盟之目的濒临危险，英国政府根据该条约向日本政府要求援助"④。

断言协约国将取得胜利而引导内阁决议对德参战的加藤高明，在当天（8 日）午后出席元老会议，征求有关决定参战的意见，取得了同意。当晚，加藤在番町的私邸召请藏相若槻礼次郎、海相八代六郎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举行秘密会谈，拟定了对德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3 年，第 3 册，第 96—97 页。

② 同上，第 105 页。

③ 《加藤高明》下卷，第 78—79 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3 年，第 3 册，第 106 页。

要求的内容。其内容是：使德国军舰撤出"中国海"及亚洲方面；把胶州湾暂时交给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对德通牒的期限定为七天。加藤是打算以撤退德国军舰来满足英国的要求，另外，还打算以把胶州湾归还中国为条件，解决满洲问题这个悬案，并谋求扩张在"中国内地"的利权。对德通牒期限所以不是惯例的二十四小时乃至四十八小时，而是不同于惯例的七天，是考虑到和、战两个方向的缘故。

想利用大战来扩大在中国的利权，这一点不用说大限重信首相，就连元老山县有朋和井上馨也都是一样的。不过，山县和井上还考虑到战后的国际竞争，他们想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从根本上改革对华政策以解决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进而有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飞跃发展。为此，他们企图不仅在日英之间，而且与俄法两国也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体制。没有出席8月8日元老会议的井上，向大限和山县提出了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中，他认为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必须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为此他力主"日本应与英、法、俄实行精诚团结，以此为基础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指袁世凯——译者）"，并特别建议指派"可使袁世凯折服"的人物（井上指的是后藤新平）前往中国。以前就曾主张设立日法银行，引进法国资金以便向中国投资的井上，还极力主张说必须在大限所说的利用"英国资金"之外，再进一步引进"法国的资金"[①]。山县完全赞同井上的见解，并批判加藤外交说："加藤外相之所为，似以解决悬案中之未了事宜为满足，此种缺乏远见之外交，为国家前途计实不胜忧虑。"他从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在于种族战争的认识出发，强调指出："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②]关于如何开

① 《故井上公传》第5卷，第373—374页。

② 同上，第370页。

展大战外交，加藤外相和井上、山县从一开始就是有分歧的。

三　围绕日本参战问题的国内外舆论

英国政府8月9日收到日本政府有关参战的备忘录，对其内容深感不安。这个备忘录写道："一旦成为交战国，则日本之行动即不能仅限于击沉敌国之伪装巡洋舰"，"亦即为了破坏可能使日本及英国在东亚利益遭受损害之德国势力，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之手段和方法。"①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既害怕日本此种出乎意料的积极行动会加深中国的混乱，其结果将给英国对华贸易带来恶劣影响，又害怕日本占领德属南太平洋诸岛屿会同澳大利亚和美国引起纷争。当天下午，格雷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暂停当前的军事行动。次日(10日)，加藤对英国政府申辩说，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并正在考虑由日英两国共同谋求保全中国，还苦苦哀求说，日本政府既已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参战，只要情况没有重大变化，就得坚持对德参战，否则，将会招致重大的政治危机②。11日，又进一步恐吓说，如果明确英国业已撤消参战的要求，那将会给日英同盟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③。由于日本政府的执拗要求，英国同意了日本参战，但要求日本声明不攻击德占区以外的中国地区，不在南中国海及太平洋采取战斗行动。加藤拒绝在宣战布告中发表限制战区的声明。英国政府同意了这一点。

263

8月15日，日本政府依照8日番町会议决定的内容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8月23日正午以前答复，通牒要求：(1)德国舰队须立即撤离日本及"中国海"方面，不能撤离者立即解除武装；(2)为了把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在9月15日以前，无代价、无条件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110页。

② 同上，第114—116页。

③ 同上，第120—121页。

地移交给日本政府。舆论的主流是支持并鼓励政府的方针的。《东京朝日新闻》8月16日的社论大谈山东省的军事价值，说它既埋藏着未开发的资源，又是通往北京的"捷径"。18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也发表社论，赞同侵犯中国领土的作法。没有迎合这种潮流的是《东洋经济新报》。该报于8月15日发表了题为《警戒好战态度》的社论，警告说，如果日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大军运往中国"追求其野心，则必将带来使我国陷入危险之事件"。

英国的不安仍未消除。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的8月15日，驻华公使朱尔典提议，在日英两国共同向中国政府发出的照会中要写进"保证归还胶州湾"的字样①。加藤外相拒绝这个建议，说："现在不能做出归还胶州湾的保证。付出很大牺牲而取得之胶州湾，即令归还，日本也须附有条件。例如延长满蒙租借地及延长铁路期限等，恐将成为主要条件。"②加藤的参战意图已经明白了。8月17日，英国政府新闻局又发表声明，对日本进行牵制，说："据了解，日本的行动，除非为保护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航线，将不使其越出中国海而扩及太平洋，而且不使其扩及德国在东亚属地以外之任何外国属地。"③加藤反驳说，这个声明只不过是单方面的解释。

对日本的积极态度感到疑虑的，不仅是英国。中国政府曾在8月3日请求美国采取措施，不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这个请求遭拒绝后，中国政府当即于6日宣告中立，以防止战火的波及。在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后，中国舆论立即开始敲起了警钟。8月18日，《京津时报》警告说：尽管目前在英国对华和对亚洲贸易方面，尚未出现任何障碍，但是，日本插手胶州湾是"有意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干些什么事的"。被视为半官方报纸的《神州日报》攻击日本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162页。

② 《加藤高明》下卷，第124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177页。

说：日本对胶州湾的毫无根据的要求是企图趁欧洲各国无暇顾及亚洲之机，占领该地，以便为延长十余年内即将满期的旅大租借确保其交换条件。

美国有影响的报刊也展开了同样的批判言论。《纽约时报》指出，日本参战是出于日本政府的欲望。《纽约论坛报》警告说，应使日本对胶州湾之攻占，不被用于侵略亚洲的目的。《费城记事报》推测，日本攻占胶州湾后，不占领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恐怕是不会满足的。希望在战争期间维持亚洲现状的美国政府，在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后不久说，得知日本要求移交胶州湾并非为了扩张领土，表示满意，用以牵制日本；但又叮了一句说，如果中国内部发生动乱而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时，希望日本政府一定遵守《高平—卢特协定》，与美国政府进行协商。 264

还有，对印度支那的安全感到不安的法国再三提议缔结日法同盟或参加日英同盟。害怕受到日德两国夹击的俄国也一再试探加入日英同盟。

在发出最后通牒的8月15日，加藤外相对驻日本的美国、法国、俄国及荷兰的大使或公使说明了最后通牒的原委，并强调指出，日本毫无领土野心。荷兰公使阿斯贝克(Asbeck, B.D.V.)听了加藤的话以后说："阁下，如此说来，日本无意吞并我国的殖民地吧？"并伸手表示"满腔的谢意"①。但是，保证必须用行动来表示。

四　山东及南洋诸岛的占领

大战一爆发，日本军队立即进入战斗准备。8月3日，由四艘军舰组成的第二舰队在佐世保作好出动准备，并在长崎、函馆及釜山各配备一艘军舰。参谋本部则着手制订进攻青岛的作战计划。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155页。

在最后通牒期限（8月23日）以前的21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要求，把山东省的黄河以南地区做为非中立的战区。中国政府说，如果答应日本的要求，中国人民就会认为日本将占领整个山东，从而难免要发生动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①，29日，日本退了一步，要求将潍县至诸城的南北一线以东直至海滨划为战区，并声称即使中国不同意，日军的计划也不能变更；进而又要求撤退山东铁路（指胶济路——译者）的中国守备队，并恫吓说，中国方面若不答应，则日华两军一旦发生冲突，应由中国方面承担责任云云。

8月23日，德国终于未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以第十八师团为中心的五万一千七百名日本陆军和第二舰队开始了军事行动。9月7日，完成了在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的登陆作战。龙口的登陆作战，不仅是为了进攻胶州湾，而且隐藏着要控制整个山东的意图。9月13日，参谋本部通知外务省，计划占领包括潍县以西的整个山东铁路，并建议把这个意思通知中国政府。23日，参谋总长

265 长谷川好道指令当地部队司令官神尾光臣中将占领山东铁路。但是，驻华公使日置益认为参谋本部计划的军事行动将引起中国舆论的激烈反感，向加藤外相要求推迟这一行动，同时还请求妥善处理日本军队侮辱中国妇女和征发民房财物的行为。② 加藤虽想把山东铁路弄到日本手中，但仍然接受了日置益的忠告，决定暂时推迟向西部的武力进攻，并指示进行交涉，以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但是，当地部队却在25日占领了山东铁路的潍县车站，10月2日开始向西挺进，6日占领济南，把山东铁路置于日军控制之下，并强行要求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宪。日本军队的行动已超越了8月29日日本政府自己向中国所强行要求的战区，是侵犯中立的行为。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加藤狡辩说，德国经营的山东铁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364页。

② 同上，第403—404页。

路同胶州湾租借是不可分割的，占领它不是侵犯中立。[1]10月底，日本军队开始向有五千名德军守备队防守的青岛开始发起总攻击，11 月 7 日结束战斗，占据了胶州湾。

一部分中国的舆论和政界人士，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中国政府的优柔寡断。占领潍县后不久，《京报》、《大国民报》、《民报》、《民视报》、《国民公报》、《黄钟日报》等报纸，群起抨击日军的暴行、侵犯中立和领土野心。9 月 29 日的《国民公报》痛切地指出："失信于军民之外交部，将何以对此军民？将何以对此国家？"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在 10 月 2 日的参政院会议上提出紧急动议——有关日军强占山东铁路等侵犯中立行为的质问书。参加讨论的议员们大声疾呼山东省有成为第二个东三省的危险，以唤起爱国心，全场一致通过了质问书[2]。日本的大战外交已经开始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

但是，日本的舆论却与此相反，狂热支持日本政府的政策。许多报刊杂志煽动以山东为根据地，谋求向扬子江两岸的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就连友爱会的机关报《友爱新报》(1914 年 12 月)也鼓吹在战争结束以前，把胶州湾置于日本领有之下，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要大举进入该地，以发扬国威。过去曾经竭力反对日俄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没有抗住"大逆事件"[3]后的重压，未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仅止于发表一些评论，寄希望于欧洲工人运动和战后的变革。

与山东的作战相呼应，海军开始进攻德属南太平洋群岛。10 月 3 日占领马绍尔群岛，5 日占领加罗林群岛，8 日占领雅浦岛，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3 年，第 3 册，第 472 页。

② 同上，第 467—478 页。

③ 大逆事件，指 1910 年 6 月，日本政府捏造所谓暗杀天皇案，迫害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的反动事件。——译者

12日占领特鲁克群岛。12月1日，日本政府便要求英国政府支持其永远保有赤道以北的德属各岛。参战当时曾对国内外声言没有领土野心的保证丢得一干二净，各国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266

第二节 战时外交

五 “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意想不到的“发展之机”，是“天佑”。以前，加藤高明外相在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解决满蒙问题举行会谈时曾说过：同中国的交涉要看准“心理的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个“心理的时机”到来了。

大战爆发后不久，1914年8月7日，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部长福田雅太郎少将，向外务省提出了以满蒙自治论为中心的意见书《日华协约要领》。24日，陆军次官大岛健一建议以归还胶州湾为交换条件，吞并满蒙。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和黑龙会、东亚同志会、对华联合会等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向加藤外相提出了大量的对华要求和意见。这些意见的共同点，第一是所谓中国人没有能力统一国家，必须由日本“支援”这种侮蔑中国的思想；第二是所谓应利用大战来确立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的趁火打劫的劣根性；第三是所谓以日本的优越地位为基础的日中“提携”有助于维持亚洲和平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判断。

日置益公使在前往中国赴任之时，也曾到加藤外相那里“亲聆训令之精神”，并于8月26日提出了对华政策的计划。他提出，以归还预定要占领的胶州湾和驱逐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家为交换条件，希望实现以下要求：(1)延长关东州的租借权为九十九年；(2)今后九十九年内中国不行使对满铁和安奉铁路的收买权；(3)由日本推行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军事和行政改革；(4)对上述地

区内日本人的居住及营业提供自由与方便；(5)以日本贷款修筑九江至武昌及南昌至杭州的铁路等①。加藤虽然对于日置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过，在加藤心目中，日本的对华要求也已不限于解决满蒙问题了。

元老们也想利用这个“天佑”来谋求帝国主义的扩张。他们在9月24日同大限首相会谈的时候，一致确认必须获得中国的铁路和矿山等利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加藤的外交方针表示极端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首先来源于对加藤试图不容许元老干预外交的所谓外交一元化的不满。就具体政策来说，则在于加藤认为日英同盟是“日本的根本大计”，对元老们力主的日俄、日法同盟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此外，还在于加藤不采纳“怀柔”袁世凯的建议，而以威压的态度对待中国政府，致使中国增加了对日本的不信任。在这一天，元老们让大限重信首相保证，应由首相制定外交的根本方针，而且应该使外相执行首相和元老们的一致意见。尽管如此，加藤仍不想听从元老的意图。他反而想通过采纳各方面提出的对华要求来确立外交的领导地位。这样，加藤便根据11月7日青岛的陷落作出判断，认为“心理的时机”确已到来，并在11月11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了有关对华交涉的训令方案。后来加藤虽然曾就训令方案征求了元老的谅解，但是，对加藤的“独断专行”感到愤怒的山县却坚决拒绝说：因为从根本上就反对，所以无须加以可否②。加藤未能取得元老的赞同，照样把对华要求归纳为以下的五号二十一条③，并训令正在东京的日置益公使实现这些要求。

267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第544页。

②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册，第611页。

③ 此处所说的五号二十一条之内容并非全文，而是作者的概括。全文可阅《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91—95页。——译者

第一号　关于山东问题

(1)关于德国所有一切权利及利益之处理，悉按日本与德国之协定。(2)沿海土地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让。(3)出让芝罘(烟台——译者)及龙口接连胶济路之铁路铺设权。(4)开放主要都市。

第二号　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

(1)旅顺和大连之租借权，以及满铁和安奉铁路之赎回权均延长为九十九年。(2)取得为农耕及商工业所用之土地所有权和租借权。(3)居住、往来及商工业之自由。(4)提供矿山采掘权。(5)对其他国家提供铁路铺设权以及为扩建铁路向其他国家借用资金，均须经日本事前同意。(6)聘用政治财政军事顾问，须事前(与日本)商议。(7)吉长铁路之经营管理权在九十九年间委托(日本)。

第三号　关于汉冶萍公司

(1)该公司由日中合办①，有关其权利、财产之处理，须事前取得(日本)同意。(2)非经该公司之同意，不得批准开采附近之矿山。

第四号　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让

第五号　对中国全境之要求

(1)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2)日本人之医院、寺院及学校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3)警察业务由日华合办或聘用大量日本警官。(4)军械半数以上由日本供给，或设立日中合办之兵工厂。(5)出让武昌经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铁路铺设权。(6)福建省内筹建铁路、矿山及港湾，引进外国资金时，须事前(与日本)协商。

---

① 原书误刊作“合并”，兹更正。——译者

(7)日本人之传教权。

第五号要求虽然是希望条款，但却并未指令在交涉中与其他各项要求另行加以区别。第五号要求，一方面包括聘请日本人作中央政府顾问和日华合办警察这种政治控制的要求，另一方面还包括敷设铁路这种向英国的“巨大”利益提出挑战的要求。第五号并不是简单拼凑国内各方面要求的一揽子的大杂烩，而是把过分 268 刺激中国和各国的要求项目作为“希望”项目端了出来的。加藤外相是把要求和希望区别开来，玩弄外交技巧，编制了“二十一条”要求。这种范围庞大的“二十一条”要求，完全是无视中国的主权，使之完全隶属于日本的要求。

六　日华交涉

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向袁世凯大总统面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且恐吓说，在日本，也有人主张鼓动革命派颠覆袁氏政权的；如果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日本的要求，将招致严重的后果①。袁世凯愤怒地说：日本是想象奴隶一样地对待中国吗？日本害怕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透露给其他各国，要求在绝密情况下快速地进行一揽子交涉。中国则主张逐条审议，拖延交涉，企图泄露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以引起其他各国的干涉。

“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很快就泄露出来了。1月22日，日本刚刚把除了第五号以外的内容，以“秘密谅解”的形式通知给英国，格雷外交大臣就向加藤外相发来提出以下两项的建议：第一，如果提出与英国国民既得利权相抵触的要求，必须立即进行协商；第二，不能提出损害中国领土及独立的要求。交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中国舆论获知“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后激怒了。《亚细亚日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3册（上），第114页。

报》大声疾呼说："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绝对不应答应进行交涉，与其坐以待毙，宁肯抵抗而亡。《北京每日新闻》和《京报》则主张向列强进行呼吁。冯国璋等十九省将军联名电告政府"日本之要求，职部所属军队一致激烈反对，吾辈军人必以死力拒之"①。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召开了抗议集会，回国的留学生们组成了对日同志会，号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在舆论激昂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于2月12日提出了对案。对案对"二十一条"要求的第一号、第二号及第三号，做了若干修改，基本上接受了要求；但对第四号和第五号则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要求赔偿中国因日本战争行动所受的损失。

这时，日本秘而不宣的第五号已被其他各国普遍获知。美国在2月20日向日本政府指出，第五号要求歧视第三国并威胁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此极为关注。国际上对日本的大战外交所抱的疑惧与日俱增。但是，日本方面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采取了强硬态度。日置益公使向加藤高明外相报告说：必须"加强断然不移的最后决心"来进行交涉。袁世凯的顾问坂西利八郎大佐也向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呈述意见说，必须以武力迫使中国承认要求。但是，加藤外相却指示日置益首先尽力进行外交交涉。谈判频繁进行，但日本所期待的进展并未出现。3月间，焦急不堪的日本政府不等满洲驻屯军和山东守备队换防，就另派出换防部队，以施加武力269 压迫。中国的舆论变得更加强硬。报刊杂志刊载了各界拒绝"二十一条"要求的呼声，抵制日货的运动从全国主要城市蔓延到东南亚的华侨。

各外国的压力也迅速加强。3月10日，在扬子江流域享有权益的英国送来备忘录，要求重新考虑第五号中三条铁路修筑权的

① 原书引文与中文稍有出入，不具录，请参阅黄毅、方梦超合编：《中国最近耻辱记》，民国4年，国耻社印行，第89页。——译者

要求。16 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Bryan, W.J.)向日本送来了长篇备忘录，抗议第五号有关警察、武器及福建省的要求，违背尊重中国主权和工商业上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另一方面由于满蒙和山东问题并不直接与美国利益相抵触，所以布赖恩说，对此暂不置可否，亦即指望用软硬两手使日本让步。但是，日本仍不改变其高压的姿态。美国希望落了空，乃通告中国说，美国决不会做任何损害美国按条约规定所享有权利的让步，在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上也寸步不让。4 月 17 日，得到美国支持的中国断然拒绝了第五号及有关东部内蒙古的要求。谈判出现了僵局。

加藤外相无计可施，决心下最后通牒。5 月 4 日上午，他取得内阁会议同意后，下午在元老会议上征求意见。对加藤的"独断专行"极为不满的元老拒不同意。山县有朋坚决反对说，如果是为了满洲问题出兵，还有可说的，为第五号问题出兵，坚决反对；他还反过来将了加藤一军，说还是你亲自出马去说服袁世凯吧。当夜，大隈内阁再次召开内阁会议，删除第五号①，制成最后通牒，征得元老同意后，于 7 日递交中国。对陆海军下达了出动的命令。中国终于屈服了，5 月 9 日接受了最后通牒。

5 月13日，美国政府向日中两国政府发出强硬照会说，凡属侵害"合众国及其人民的权利、中华民国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完整、门户开放及有关对华国际政策者，概不承认"。这个通牒是在协约国和美国正忙于大战之际，作为"保留"，以便"将来再议"而提出的，是预告今后仍有发言权②。不过，对将来的预告在眼前却不能化成力量，已经屈服于最后通牒的中国政府，于 5 月 29 日③签署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汉冶

① 关于福建省问题，采取换文形式，并未删除第五条。——译者

② P.蓝辛：《大战回忆录》，1935 年，第 284 页。

③ 应为 5 月25日，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2 册。——译者

萍公司的换文》、《关于胶州湾租借地的换文》以及《关于福建省的换文》。问题的第五号，则作为悬案留待日后交涉。

尽管国际上的谴责日益高涨，日本的舆论却大都支持"二十一条"要求。不久，甚至对中国和朝鲜的独立运动曾经表示深刻理解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也表示支持，说"二十一条"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只有大战以来一贯批判政府对外政策的《东洋经济新报》，在5月5日的社论中痛切地评论说：政府明目张胆的侵略政策和"国民的轻薄的举国一致论"，这两者是"树敌于全世界，其结果只能说是为帝国贻下百年之祸根"。

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们确实正在"树敌于全世界"。他们对于造270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征服中国的政策，不想做任何反省。他们是一不作二不休，只想在以下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是用变本加厉的武力威吓办法来强行征服中国呢？还是恢复与各国的"协调"，怀柔中国政府，更巧妙地来推行征服政策呢？除此而外，不愿作任何考虑。

七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袁世凯对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屈服了，此后便开始进行蓄谋已久的帝制活动。日本政府担心建立帝制将加剧中国内部的对立，从而损害日本业已培植起来的利权，于是伙同英俄两国劝告袁世凯停止帝制活动。袁不接受劝告，在1915年12月宣布以次年1月1日为期登极当皇帝。作用引起反作用，反袁的第三次革命迅即爆发了。

袁世凯的行动和第三次革命的爆发，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对华强硬论的抬头和乘中国混乱之机搞阴谋活动的计划。"二十一条"要求达成妥协后不久，黑龙会的内田良平就已经鼓吹支持南方反袁的革命派和伺机复辟清朝的宗社党来获得满蒙的委托统治和福

建省的海军基地。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川岛浪速也再次开始进行策动。川岛认为列强分割中国乃是势在必然，策划让伺机复辟的、以清朝八大世袭王族之一的肃亲王为中心的宗社党，和土匪出身、手下有三千人的蒙古将军巴布扎布勾结起来共同起事，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并置之于日本势力之下。中国的新事态，使内田和川岛之流的对华强硬潮流迅即蔓延开来。1916 年 2 月，政友会①、同志会、国民党、中正会各党②的议员志士们和院外集团，以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华联合会、浪人会等民间团体，还邀请实业家和新闻记者参加，召开了对华同志大会。大会称赞中国的反袁起兵是正当行动，宣言打倒袁世凯，"挽救中国四亿苍生，以收拾大局并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③此外，"二十一条"制订过程中曾主张满蒙自治论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福田雅太郎以及陆军军官们，也频繁地和外务省的小池张造政务局长进行接触，精心地进行反袁密谋。以这些动向为背景，大限内阁在 1916 年 3 月召开内阁会议，确认"以袁氏退出中国当政者集团为妥。毫无疑义，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并决定"默认""民间人士"支援中国人的反袁活动的方针④。这个决定意味着，大限内阁要比"二十一条"要求更进一步，树立一个随日本任意摆布的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政策。

---

① 政友会：(1900、8、25—1940、7)，即立宪政友会之简称，伊藤博文创立，与民政党同为日本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多次掌握政权。——译者

② 同志会：(1913、12、23—1916、10、10)，即立宪同志会，由桂太郎组织成立，属于三菱系统。国民党：即立宪国民党，1910 年 3 月由犬养毅等建立，至 1922 年改组为革新俱乐部。中正会：(1913、12、24—1916、10、25)，由尾崎行雄、竹越与三郎等组成。同志会、国民党、中正会也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与政友会有矛盾，被称作非政友系三派。——译者。

③ 曾村保信：《袁世凯帝制问题和日本外交》，《国际法外交杂志》第56卷，第 2 号，1957 年 5 月，第 30 页。

④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 418—419 页。

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利用政府采取此种方针的机会传令驻满洲各地的领事和官宪，不再取缔日本人的反袁活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则与福田雅太郎第二部长进行策划，把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四人派往满洲。派遣的目的是要利用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起事，“至少要牵制北方势力以帮助南方势力的继续发展，如有可能则使满蒙派与南方派互相呼应，逼近北京；并对于起事所需的资金筹措及武器的购买和输送，多多给以方便；同时指导其军事行动。”[①] 土井等人把川岛等划归指挥之下，并以肃亲王的土地为担保由大仓组提供了一百万日元的资金，发给了包括有五千只步枪和八门野炮的武器。土井、川岛等人预定以4月15日为起事日期。

271

但是，从当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对。驻安东领事吉田茂表示反对说：默认反袁活动将使“我官宪威信”扫地，事关“帝国之威信”。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也对加藤外相的继任者石井菊次郎申述意见说：“如果是对于象中国军队那样有实力的势力进行内部策反，在此基础上发起有把握的暴动，则另当别论”，而“在我军宪威力掩护之下，试图掀起不成体统之掠夺性小暴动”，则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因此，愿根据本人的裁夺，予以取缔[②]。恰好此时，张作霖正在满洲策划取代奉天都督段芝贵以掌握满洲实权。田中义一参谋次长认定，莫如支援张作霖。石井外相和田中次长接受了矢田的意见。4月4日，田中禁止擅自发动满蒙起事。接着，石井外相于9日指示矢田代理总领事：“张作霖态度如何对东三省今后形势影响极大”，因此“要对他进行工作，说服他”，让他知道“此时除依靠日本之外，别无他法”。10月，田中次长也怀着拉拢张作霖的意图，更加积极地指示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西川虎次郎少将说：“我相

① 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卷，1958年，第633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853页。

信，当前进一步透露日本之真意，使彼（张作霖）独立，乃一捷径，且万无一失”，因此，可以会见张，“怂恿他起事，而且不妨明说届时保证张本人将来之安全，自不待言，而且在提供武器弹药和军用资金方面，也将尽力而为之意。”① 但是，土井和川岛等人却反对援张政策，6 月上旬，仍按照过去的方针进行发动独立起事的准备，甚至企图暗杀张作霖。满蒙政策在当地完全陷入了分裂。

不料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帝制受到挫折的失意之中突然死去，继任的黎元洪代理大总统接受了南方革命派的要求，形势一变而成为南北和解，因此，大隈内阁利用南北对立的反袁政策失掉了基础。于是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便从反袁一变而为援黎。结果土井和川岛等人经政府“默认”反袁而推行的满蒙独立计划受到了压制，以至不得不中止。而在石井外相、田中次长和满洲总领事这方面所推行的援张、满洲独立计划，也由于段芝贵下野逃往北京，张作霖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实权，而扑了一个空，成了泡影。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是在内阁的反袁政策这个公认的渠道里探索进行的，与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相较，有其特点。但是，在这个范围内所策划的两个满蒙独立计划都失败了，与第一次独立运动一样，都是以流产而告终的满洲事变。 272

八　加入《伦敦宣言》问题

进一步推行“与世界为敌”的路线，即以武力为背景的反袁政策和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挫折；但这个时期，选择另一条路线，即与各国“协调”，同时强化日本帝国主义地位的路线，也正在上升为重要的外交议题。这就是加入《伦敦宣言》问题和日俄同盟问题。

大战爆发后不久，1914 年 9 月，英、法、俄三国在《伦敦宣言》中保证，不单独媾和和互相商定媾和条件。日本虽与英国有同盟关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5 年第 2 册，第 860 页。

系，与俄法两国也有协约关系，但在战争和媾和问题上却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协定。开战以来，俄法两国曾提出过加入日英同盟的要求，在国内，山县和井上两元老也希望与这两国缔结同盟，但是，加藤外相却不同意。

1915年1月，遭到德军猛攻的俄国，希望得到弹药的补充，再次向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提议缔结日、英、俄、法四国同盟，并对英国的格雷外交大臣说，如果不能缔结四国同盟，则希望促使日本加入《伦敦宣言》。本野大使对加藤外相建议说：为了巩固战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缔结四国同盟是必要的。当时，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也谈到，“有关提出媾和条件的规定只能依照《伦敦宣言》来确定，而在日英同盟协定中并未提及，所以，如果不加入《宣言》，帝国政府在媾和谈判时，当然就不能与三国政府处于同一地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在媾和谈判时，自然会遇到障碍”[1]，促使加藤仔细考虑加入《伦敦宣言》问题。但加藤外相认为，日本通过日英同盟，已与加入《伦敦宣言》处于同样地位，无意听取石井等人的提议。

加藤外相认为，日英同盟本来是有共同敌人的，如果俄法两国加入，则日英同盟“将成为无的之矢，丧失其攻守同盟之特色，而成为一种协商”[2]，担心成为“威士忌中加水过多”而不再成其为酒[3]，他仍然想以第一次日英同盟以来的传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础来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权。加藤更为担心的是，缔结四国同盟和加入《伦敦宣言》会促使协约国要求日本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山县和井上则与加藤的想法不同，他们预料到战后国际竞争的激化，早在辛亥革命时的中国政体问题上对英国已经心怀不信任，

273 因而要求改变外交的基础，以求不仅同英国，而且也同俄法两国结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3册(上)，第36页。

② 同上书，大正3年第3册，第384—385页。

③ 《加藤高明》上卷，第662页。

盟来预先作好应付战后国际竞争的部署，通过多边同盟来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另一方面，石井大使的关心则首先在于加强日本在媾和会议上的国际地位。他认为第三次日英同盟对日本来说不过是“壁龛里的装饰品”[①]，打算以加入《伦敦宣言》来保障加强媾和会议上的地位。但是，加入《伦敦宣言》，就是在走向日俄同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日俄同盟问题与“二十一条”要求问题纠缠在一起，把加藤与元老的对立推上了顶点。1915 年 2 月，元老向大隈内阁提出山县起草的意见书，认为日俄同盟是当务之急。虽然大隈首相答应将对问题的研究情况及其结果作出报告，但加藤外相仍然表示消极。据说急得大发雷霆的井上馨和松方正义在 6 月间元老与首相会见的席上，强烈要求撤换加藤外相。井上干脆说：“加藤根本不是个懂外交的人。”[②] 7 月，山县直接会见加藤，说明日俄同盟的必要性。

元老的动向也反映在报刊的论调上，发展成为日俄同盟论。日本的情况传到了俄国。苦于极端缺乏武器弹药的俄国便第三次开始策动四国同盟。收到俄国政府建议的本野大使对加藤外相说，俄国即使付出相当代价也希望缔结同盟，此时以提供武器为条件使其转让松花江至长春间的铁路，这种交涉是有可能成功的，以此来引诱加藤的兴趣。他还建议，即使不缔结同盟，加入《伦敦宣言》也好。[③] 但是，7 月 27 日，大隈内阁的内阁会议却决定，确认加藤外相以前的见解，认为没有必要加入《宣言》。加藤外相叮嘱本野大使说，行动要谨慎，不要招致误解。

但是，1915 年 8 月 3 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却劝告日本加入

---

① 石井菊次郎：《外交余录》，1930 年，第 70、73 页。

② 《故井上公传》，第 5 卷，第 234、404 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4 年，第 3 册，第 4 、15—16 页。

《伦敦宣言》。格雷害怕在东部战线苦战的俄国撤离战线，想加强英、法、俄、日四国的联合。一直顽强拒绝加入《宣言》的加藤也同意了他所信赖的英国的劝告，答应加入《宣言》。但此时加藤外交已接近终局。在加入《伦敦宣言》问题急剧转变前不久，7月31日，大限内阁因贿选问题受到批判，根据加藤的强烈要求决定总辞职。元老虽希望大限留任，但坚决反对加藤留在内阁。8月10日，加藤辞职。在继任的石井菊次郎就职以前，由大限首相兼任外相。加藤辞去外相意味着"与世界为敌"并与元老对立的加藤外交路线的失败，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在天皇制权力范围内由外务省实行外交一元化的难以逾越的界限。加藤辞职后不久，9月1日，与加藤极端对立的元老井上馨死去了。但是，井上所希求的外交路线的转变，并未因其死而作罢，而是由山县等人继续推进了。

274 为就任外相而从法国任所回国的石井菊次郎，在回国之前与格雷进行会谈，表示在媾和之际日本希望获得中国山东省的利权并领有南太平洋诸岛。格雷虽没有做出确实保证，但对情况表示了谅解。9月23日，日本决定加入《宣言》，10月19日正式加入。加入《伦敦宣言》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媾和的地位。

九 日俄同盟

由于日本加入《伦敦宣言》一度陷于停顿状态的日俄同盟问题，由于1916年1月俄国大公米海洛维奇（Mikhailovich,G.）访日而进入了新阶段。沙皇尼古拉二世授与大公访日的使命是与日本缔结协定，第一，取得预定在4月进行的协约国对德反攻所需要的武器；第二，为消除德国把中国纳入控制之下、从亚洲威胁俄国后方的危险性。元老山县有朋认为这是缔结盼望已久的日俄同盟的大好时机，乃任命长州藩阀直系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担任大公的接待委员长。

大公一行与寺内及山县进行接触，力主加强日俄协商的必要，得到这两个人的友好反应。接着，大公的随员远东司长卡查科夫(Kozakov,M.A.)会见了石井外相，说明大公访日的目的，要求日俄靠拢。石井外相考虑了要阻止苦战中的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并利用俄国的困境，扩大日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的方策。在1月20日与元老的会谈中，石井提出这个方策，想依此拟定答复俄国建议的方案。其内容是：(1)以由俄国出让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并由日本取得吉林平原的富饶资源为条件，向俄国提供武器；(2)就"日俄两国政府防止中国将来陷入德国手中的办法"约定进行协商，以消除俄国的担心；(3)两国缔结协定，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国际条约①。大山岩和松方正义举双手赞成，山县则对提供武器问题附加了须与陆相商量的条件。大隈首相和石井外相与大岛陆相另外进行了协商，陆相担心会遭到陆军内部的反对，对向俄国大量提供武器问题没有作出决断。这样一来，石井对俄交涉设想的前提就垮了。第二天，大公一行即将离开东京时，石井外相在傍晚召见卡查科夫，答复说，(1)日俄两国间已有三次协商，满蒙问题业已解决；(2)德国对中国的策动虽然重要，但是，没有必要重新缔结协定；(3)关于提供武器问题，将尽力而为，但不能做出约定。大公一行对石井的答复感到失望，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东京前往朝鲜。山县得知石井的冷淡的答复以后感到十分惊愕，便委托在朝鲜的寺内正毅对大公一行进行解释，消除误会。此后，日俄交涉的实权就不由石井外相掌握，而转移到山县和秉承其意图的寺内及山县的心腹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手中。

寺内在朝鲜接待了回国途中的大公一行，自作主张地对他们说："出于陆相和次官等人的厚意，在三周内可以送交两千万发子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1册，第117页。

弹，其他问题虽不能确切答复，但我想大概会作很好的研究。”① 恰275遇当时大隈内阁因武器售款问题遭到贵族院的激烈攻击，面临倒台的危机。石井外相失去了解决日俄问题的热情。山县和田中一方面以议会结束后大隈即行下台为条件，压制贵族院的攻击来支撑内阁，另一方面则积极促进缔结日俄同盟。田中则在提供武器问题上催促陆相和次官。1916 年 2 月 14 日，大隈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以收买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为条件，出售武器并缔结日俄同盟的方针。田中在 2 月 12 日给寺内的信中报告说：“一切均已按照陆军之主张行事。”②

对俄交涉由亲俄派本野一郎大使负责。交涉在转让铁路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日本方面主张接管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俄国则坚持只转让这条铁路的中点松花江以南一段，不再让步。在交涉过程中，俄国武器的缺乏有所缓和，以提供武器问题做为交易条件的有效性减弱了，日本的要求未能实现。7 月 3 日，缔结了第四次日俄协定“大正五年日俄协定”。“协定”与前三次一样，有公开和秘密两部分。秘密协定的最大特点是把防止中国落入对日本或对俄国怀有敌意的“第三国的政治控制”规定为最重要之事；把协定的适用范围从过去的满蒙扩大到全中国；并商定为防止第三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而缔结攻守同盟。“协定”所谓的“第三国”，从交涉过程及本野大使对石井外相建议写明“第三国”是德国等来看③，首先可以认为是德国，但是，美国也在其考虑之中。8 月 21 日，美国政府针对日俄新协定的签订，建议日本政府要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

---

① 吉村道男：《日本和俄国》，原书房，1968 年，第 285 页。

② 同上，第 288 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5 年，第 1 册，第 125 页。

第三节　中国的新形势和对华政策的转变

十　寺内内阁和外交体制的改组

日俄同盟的缔结给日本帝国主义外交的基础带来了变化。从加藤前外相的"日英同盟真髓论"转变到元老们一直强调的日俄同盟路线。10月9日，大隈内阁下台，山县的王牌寺内正毅组织了内阁。以曾经担任米海洛维奇大公接待委员长并致力于加强日俄协商的寺内正毅大将为首的寺内内阁的诞生，进一步明确了向日俄同盟路线的转变。而陆军元勋山县元帅、陆军前辈寺内大将以及他们的心腹田中少将对日本外交路线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粉碎了加藤前外相所坚持、并不惜为此与元老发生激烈冲突的，由外务省来实现外交一元化的体制，开辟了陆军侵犯外交权的道路，致使出现了所谓"双重外交"的现象。　276

大凡任何一个国家在制订外交政策过程中，由于阶级、阶层和个人利害与对形势判断的不同而产生形形色色的意见，有时发生激烈冲突，是难免的，但是，最终还是由政府来统一决定外交意图并付诸实行。不过，在日本外交中，这种决定和执行则经常出现分歧。这首先是由于军部在所谓多元化统治结构的天皇制机构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外交原则上是由外务省主管，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统帅权独立，对于担负战争——对外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军队统帅部门，议会或内阁都不能控制。这里统帅部门就有根据离开以外务省为中心的政府所决定和执行的对外政策，而独自按照自己的利害和判断来执行外交政策，这里就有了出现所谓"双重外交"的根源。而日本帝国主义所具有的两面性又进一步促进了"双重外交"。这种两面性就是：一方面由于它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不足，不得不依靠欧美先进国家，这就

产生了与欧美协调的趋向性；另一方面，在地理上与大陆接近，这一条件又产生了武力侵犯大陆的倾向性。多元的统治结构和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的两面性所造成的对外政策的分裂倾向，由于实际上对此起着一元化统一作用的元老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或者死亡或者衰老，其全面统一的能力削弱了，"双重外交"便由此趋于表面化，"满洲事变"① 以后，发展得更为显著。十五年战争期间②，军部对外交的侵犯和由军部推行的一元化，是"双重外交"的极端表现。

寺内拒绝与大隈所支持的立宪同志会联合，不是把基础放在政党上面，而是以山县系统的官僚为中心组织了内阁。他任用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为外相，从而巩固了日俄同盟体制。寺内内阁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是转变大隈内阁时代陷于混乱的对华政策。寺内任用了通晓中国情况的小幡酉吉作政务局长，但是，做为对华政策中心的贷款政策，实际上却不是通过外务省这一途径，而是由他担任朝鲜总督时期过从甚密的西原龟三和曾任朝鲜银行总裁的藏相胜田主计来负责。而这两个人又有田中义一参谋次长和前袁世凯顾问坂西利八郎等驻华武官的支持。寺内甚至想剥夺外务省在满洲方面的权限，把它转移给关东都督，但这一点却没有办到。

1917年6月，寺内内阁设立了外交调查会（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由此更加大幅度地剥夺了外务省的权限。设立外交调查会的目的是，要继大隈内阁把尾崎行雄从护宪运动中拉过来之后，再把犬养毅拉过来，给护宪运动以最后的打击；同时，在举国一致的名义下使政党变为政府党，把外交统一在首相之下，以便更加健全

---

① 满洲事变：即1931年日本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译者

② 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译者

适应强硬政策的态势。外交调查会的任务是“直属天皇，对有关时局的重要案件进行考查和审议”，由寺内正毅首相担任总裁，由内阁的本野一郎外相、后藤新平内相、加藤友三郎海相、大岛健一陆相，枢密顾问官牧野伸显、平田东助、伊东巳代治和政党的政友会总裁原敬、国民党总理犬养毅任委员而成立的。宪政会的加藤高明表示反对，认为在内阁以外设立直属天皇的外交机构，外交大臣将会受到牵制，因而拒绝入会。 277

由于寺内内阁改组外交机构，外务省地位下降，其情况在传记《小幡酉吉》一书中有如下记述：

“因为寺内总理本人是军阀巨头，把军阀立场摆在第一位来推行国家政策，来规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外交政策也就自然带有军人派头的帝国主义色彩，以至出现所谓双重外交，并不足怪。岂但如此，即在用人等方面也是以重视严格等级制度的军人态度来对待，因此，无论是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或是后藤新平，在寺内面前简直可以说抬不起头来。所以，外务省的次官和司长，即使在外交方面相当老练，或是出色人材，一旦遇上寺内，却都被当作单纯的一名事务官员来对待，几乎并不放在眼里。”“外交调查会设立之后，诸如援段政策①、劝告中国参战、日华陆海军共同防御协定、对华经济援助贷款、出兵西伯利亚等外交政策，都是先在这个外交调查会上讨论决定其根本大纲，然后在形式上作为内阁会议决定的事项，责成外务省来执行。”②

与外务省的权限减低相反，参谋本部则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开始研究使内政、外交隶属于军事的总体战体制。田中次长命令参谋本部第一科（编制动员科）的森五郎大尉调查各国总动员计划的实况并制订日本具体的总体战计划。1917 年 9 月，森大

① 援段政策，指支援段祺瑞政权。——译者

② 小幡酉吉传记刊行会（编）：《小幡酉吉》，1957 年，第 195—196 页。

尉写成《全国动员计划之意义》。此外，在同一时期，第五科（中国科）的兵要地志课长小矶国昭少佐学习德国战时自给经济的文献，写成了题为《帝国国防资源》的报告书，估计战时所需要的物资，提出了可以说是"日满华经济区"设想的前驱的个人方案。军部逐步开始侵犯外交，并准备把它一口吞掉。

十一　对华政策的转变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之后，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接受了反对袁世凯帝制并宣布独立的南方派各省和国民党的要求，恢复了袁世凯所停止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并让三名国民党人加入段祺瑞内阁，致力于南北和解。但是，在黎元洪的统治下，中国的体制根本也没有安定。黎代总统没有袁世凯那种军事实权，在他的统治下，不仅各督军的独立性没有削弱，就是其身边的北洋军阀内部，段祺瑞、冯国璋、冯玉祥等人也互相倾轧。中央政府的租税收入极度减少，财政也陷入了危机。中国政治的不安定，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意味着，不用说扩大利权，就连保持日俄战争以来至大战期间所获得的权益，都不大可靠了。加之，美国不待战争结束，就开始了资本的攻势。正如1916年是 278 所谓"美国贷款年"那样，美国在4月与中国政府缔结了山东、江苏两省运河贷款合同①，贷款六百万美元；5月缔结了铁路承包合同，贷款一千万美元②；11月，芝加哥银行提供了第一次烟酒税贷款五百万美元③。

---

① 即"导淮改良运河七厘金币借款合同"（1916、4、19），见《中外旧约章汇编》Ⅱ，第1188页。——译者

② 即"裕中公司(美)承包铁路合同"(1916、5、17)，见同上，第1194页。——译者

③ 即"(芝加哥)大陆商业托拉斯银行五百万美元借款合同"(1916、11、16)，见同上，第1236页。——译者

从对德参战到“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对日本政策的反抗和中国的新事态，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以往那种露骨的侵略政策了。寺内内阁在1917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对华政策，表面上不得不标榜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各国协调。寺内内阁当然不是由此放弃了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利权。这一点，从它所决定的对华政策规定扩大在满蒙和福建省的特殊权益和确保原德国在山东省的整个利权，就十分清楚了。对华政策的转变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和扩大利权而改变了方法。早在加藤辞职之后的大隈内阁，在袁世凯死后，就已经为了把黎元洪一段祺瑞政权变成傀儡，以救济财政困难之名，在1916年9月让兴亚公司提供了五百万日元的贷款，铁路银行贷款的谈判也在开始进行了。寺内内阁则打算进一步大力推行这个政策。寺内首相宣布其想法说："对华问题，不只在政治上，而且还须在幕后谋求亲善。""因而有必要提供贷款，以救济中国的财政，应该通过日本的斡旋，提供贷款一亿日元左右。"① 通过"怀柔"中国政府和输出资本来扩大在中国的利权，这条路线是元老井上馨和山县有朋从大战爆发以来一再主张的对华政策的核心。不过，与当初井上力主引进法国资本的大战爆发初期相比，此时日本经济已经有了显著发展。大战爆发前一年的1913年，日本还是十二亿二千四百万日元的债务国，由于"天佑"，到1915年，贸易已转变为黑字；到1917年，黄金储备已达到十一亿五千万日元。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不依靠外国资本，而以本国资本来进行海外投资了。

寺内内阁内相后藤新平是一向主张新旧大陆对峙论的，根据这种论点，后藤认为要运用日本的"游资"，以确立东亚经济同盟的基础。他说："今若断然实行，在中国投资一亿日元，则其效果可与

---

① 《原敬日记》，VII，第57页。

其他国家投资五亿乃至十亿相匹敌。”① 1916年6月，寺内推行对华政策的得力人物西原龟三访问中国，与日置益公使、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坂西利八郎大佐及段祺瑞、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前驻日公使（当时任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陆宗舆进行会谈，听取并目睹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经征求当时担任朝鲜银行总裁的胜田主计的意见，向当时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提出了《适应时局的对华经济政策纲要》。在这个报告书中，西原做出判断说：“目前日华关系，毫无经济基础，在此种状况下，不得不从打地基开始。”主张组织以日本大银行和纺织公司为中心的实业贷款团，承担二千万日元的贷款，用这笔贷款改革中国的币制，实现日中货币的混合使用，以
279 便在中国扶植日本的经济力量②。

大藏省次官胜田主计（1916年12月6日升任藏相），为了实现对华贷款，着手改组对外投资的金融机构。他把对华贷款区分为政治贷款和经济贷款。政治贷款照旧由参加四国贷款团的正金银行承担。四国贷款团范围以外的贷款则作为经济贷款，由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成立贷款团来承担。

寺内、胜田和西原组成的“朝鲜三人组”，在交通银行贷款谈判中，开始推行了对华贷款政策。早在大隈内阁末期，此项贷款谈判就已经通过正金银行、大仓组和驻华公使馆，以日中合办交通银行为条件，开始进行。寺内内阁的本野外相继此之后，12月11日，还就贷款二百万日元的条件问题向驻华公使林权助发出过训令。就在这时，西原跑到中国，与陆宗舆和曹汝霖进行秘密会谈，谈妥了交通银行贷款问题。贷款的条件是：不以日华合办作为前提条件；金额为五百万日元；免除佣金；以公债为担保；此外，期限为三

①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3卷，第646页。

② 北村敬直（编）：《梦幻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东洋文库》，平凡社，1965年，第82—86页。

年；利率为七分五厘。其内容与日本过去所提出的条件相比，对中国有利，但其真实意图却无非是以更巧妙的手段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听任日本摆布。尽管中国的财政总长陈锦涛表示反对说："此项借款有使日本逞其野心、致使交通银行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危险"①，但是，段祺瑞总理却压制了这种意见，使贷款达成了协议。即所谓第一次"西原借款"。正是在这次贷款交涉中，胜田和西原抢在"外务省—正金银行"这个系统之前，在确立其对华外交领导权上迈出了第一步。

十二　中国参战问题

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寺内首相也让西原担当了重要角色。

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4月6日，决定参战。威尔逊总统曾抱如下设想：保持中立，同时调停议和；在议和过程中，一边限制德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摧毁英国称霸海上的地位，以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并建立旨在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国际机构。但是，自从德国潜水艇开始不加区别地攻击各国船只以后，他断定通过调停议和来实现其设想已不可能，于是决心参加对德作战。美国的参战保证了协约国的胜利，并给大战后的世界政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美国不能不担心参加欧洲战争后，日本的对华侵略会不会更加无所顾忌。尽管如此，美国却没有余力与日本全面对抗，彻底抑制其行动。美国只好采取这种方法：把问题的最终解决留待战后，同时预先有所部署，以加强中国在和谈中的地位，用来牵制日本对中国的扩张。美国在对德绝交的同时，劝告其他中立国及中国同样对德绝交。在此之前，列强之间也曾屡次议论过中国的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2册，第244页（中文待查。——译者）。

280 参战问题。以前，英法俄三国也曾就中国对德绝交问题与日本进行过协商。日本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参战将加强中国在和谈会议上的地位，并造成协约国限制日本在华行动的可能性，因而一直表示反对。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反日的袁世凯已经死去，日本容易驾驭的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1917年1月，日本又根据《伦敦宣言》，以日本派遣舰队前往地中海为交换条件，从英国那里获得保证，在和谈会议上讨论处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利权和赤道以北的德国属地问题时，支持日本的要求。

2月9日，寺内内阁获知美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劝告后判定：中国对德断交对于日本获得德国的各种权益是有利的，乃决定对此予以支持。关于中国参加对德作战问题，尽管还需慎重考虑，但却下定决心劝告中国参战。次日，本野外相通知代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只限贵公使知悉"，"帝国政府希望中国以参加协约国方面为宗旨，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① 日本企图通过自己主动使中国参战来削弱美国对中国的指导力量，以加强日本的指导地位。

寺内内阁没有把这项重任交给驻华公使，而是交给了刚刚缔结了交通银行贷款的西原龟三。在交通银行贷款问题上与西原发生对立的林权助公使，被暂时召回东京停止活动。这里，寺内内阁充分施展了轻视外务省的外交伎俩。为了通过参战谈判来推进他的"日华一体化"设想，西原就以下问题取得了寺内首相、胜田藏相及本野外相的同意：(1)把庚子赔款两亿日元归还中国；(2)以使各国同意提高中国关税为条件，废除国内关税——厘金和棉花等若干产品的出口税；(3)废除治外法权和租界地；(4)援助参战及建军费用约三千万日元；随即跑到北京②。西原就参战问题在中国政府要人中进行活动。其结果，不用说亲日派的段祺瑞和曹汝霖，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232页。

② 北村敬直(编)：前引书，第141—142页。

就连当初反对参战的冯国璋副总统也表示赞成了。但是，黎总统却担心，日本的干涉将因参战而更加严重，坚决表示反对。由于黎总统和段总理的对立，中国未能象西原所希望那样立即决定参战，而是在 3 月间先宣布对德绝交。

从对德绝交到参战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了。5 月，黎元洪总统罢免了要强行参加对德战争的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派各督军相继宣告独立，并在段祺瑞退隐的天津建立了联系机构。黎总统则要求安徽督军张勋予以支持。早就企图复辟清朝的张勋，利用这个机会拥立宣统帝恢复了清朝；但是，段祺瑞率兵粉碎了复辟，推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这是在 7 月 17 日。西原为建立第二届段祺瑞内阁进行了幕后活动。 281

段政权建立的第二天，7 月 18 日，日、英、法、俄四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建议断然实行参战。段政府于 8 月 14 日决定参战。8 月 20 日，寺内内阁决定援段政策，9 月，签订了段祺瑞在磋商参战问题期间所要求的第二次交通银行贷款二千万日元的合同。日本的对华外交似乎正在取得成功。但是，围绕着对德参战问题，中国内部的对立却变得更加深刻了。孙文谴责说对德断交是“非为公理，非为自卫，仅为取得贿赂而断交”①。9 月 10 日，他亲自出任大元帅，组织了广东军政府，任命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副元帅。于是，中国的南北对立成为定局，日本帝国主义使全中国隶属化的政策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十三　石井—蓝辛协定

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美国曾发出过布赖恩抗议②，“保留”将

---

① 臼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原书房，1972 年，第 110 页。译者补注：中文待查。

② 即本章所述 1915 年 3 月 16 日美国务卿布赖恩致日本外务省的备忘录。——译者

来采取行动的权利，由于对德参战，无暇顾及亚洲。从1916年开始的对华贷款攻势，也未能充分展开。美国痛感有必要稍微抑制一下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性扩张。1917年5月，国务卿蓝辛（Lansing, R.）向日本驻美大使佐滕爱麿表示，要求日本方面派遣特使，以便就保证中国的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完整问题进行会谈。日本政府表示同意。日本在把"二十一条"要求强加于中国之后，为了缓和国际上的谴责，并确保已获得的权益，加入了《伦敦宣言》，缔结了日俄同盟，而且从英、法、俄三国得到了在和谈会议上支持日本的保证，现在，它又想与最强硬的谴责者美国，就中国问题达成某些谅解。政府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其任务是就以下两个问题商讨适当措施：(1)关于日本人在美国的地位问题；(2)关于协调日美两国在中国的行动问题。

9月，石井菊次郎特使与蓝辛国务卿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石井谈到，英国对日本占有南太平洋诸岛已经表示同意，以此来引诱蓝辛表态，蓝辛却不置可否。讨论的中心转入中国问题。为了牵制日本的行动，蓝辛提议就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机会均等问题发表宣言。石井反驳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自"高平—卢特协定"以来已由各个协定一再表明，没有任何新的意义。石井打算以废除势力范围作为代价，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废除了势力范围，就能消除外国对日本的猜疑，而且，如果各国也仿此废除势力范围，日本就能凭借地理的接近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在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①。于是石井还写好含有废除势力范围内容的宣言草案，要求政府给予指示。刚刚在日俄协商中与

282 俄国互相确认了势力范围的本野一郎外相，对石井方案大为惊讶。

① 石井菊次郎：前引书，第138—139页。

在外交调查会上，伊东巳代治表示激烈反对，主张暂停商谈，许多委员也都是同一论调；但是，寺内首相却提议“是否要发出这个协商方案姑且不谈，应试探一下美国的意图”，原敬也表赞同，于是通过了首相的意见①。政府复示石井特使说，已有日俄协商的秘密协定在先，放弃势力范围对将来影响甚大，所以不要涉及这个问题，而要致力于“不拘形式如何”，“只谋求使其承认我之特殊地位”②。

石井接到本国训令后，在交涉中主张，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接壤地区，占有特殊地位，希望用“卓越的利害关系”(Paramount interests)这个词来表达这种地位。以排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做为交涉目的的蓝辛对于石井这种主张提出用所谓“基于地理地位的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 based upon geographical position)一词来表达。为了使日本的立场多少有利一些，石井打算取消“基于地理地位”这个定语，而以“特殊利益”一语来达成妥协，请求政府指示。在外交调查会上，虽然伊东巳代治表示不满意，但是，原敬却认为，尽管不充分，在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这点上却是前进了一步，而且，“日美间有了这个协定，至少在消除中外疑虑、使中国南方派有所谅解上是有利的”，各委员遂以修改字句为条件表示了同意③。本野外相下达指示，在“特殊利益”之后要加上“及势力”(and influence)一词，但是，石井察觉到威尔逊总统态度强硬，就没有坚持这个主张，向政府报告了事态的困难和紧迫性之后，完成了换文。1917年11月2日交换的《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1)宣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2)相互承认“国家间领土相接近会产生特殊关系”，因此，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同日本属地毗

① 《原敬日记》VII，第235—236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3册，第773—774页。

③ 《原敬日记》VII，第245页。

连的地方"①。

由于缔结石井—蓝辛协定，日本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但是，这个换文是在美国埋头于战争的情况下的妥协的产物。换文中的保全领土和门户开放与承认特殊利益，二者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关于成为问题的"特殊利益"，美国始终解释为基于地理上毗连的"公理"(axiom)，日本的立场却偏重其政治方面的含义。双方相反的解释只好留待将来解决。

签署石井—蓝辛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日美间的协调，日本外交似乎走上了轨道。但是，在签署换文后仅仅五天，就爆发了动摇日本外交基础、并迫使其改变性质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

283

第四节　俄国革命和干涉苏联的战争

十四　俄国革命

当日本饱享大战的"天佑"，继续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大战的主战场欧洲，协约国正在把战争节节推向胜利。但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矛盾，发展到1917年，终于产生了俄国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已经在改变着世界历史的动向，而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更使之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为扩大势力范围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参战的列强虽然都用保卫祖国的美名来使战争正当化，但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要进行侵略性的领土扩张。但是，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却造成了使战争不能按照战争发动者的意图而结束的状况。

① 译文据《国际条约集》(1917—1923)。——译者

作为总体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欧洲参战国的危机，同时又飞速地提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战前曾经是债务国的美国，在大战中转化为债权国，与欧洲列强的经济凋敝相反，却强化了它的经济力量。美国参战进一步造成它对欧洲列强的经济优势，同时对协约国的胜利也起了重大作用，使前此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美国参战前夕，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制度崩溃了。协约国内部一个专制国家的崩溃，使美国总统威尔逊有可能给这次战争的目的定性，说它是民主反对专制之战。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参战并未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但是，威尔逊的参战口号，再加上德国和奥国帝制的旋即崩溃，却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国际范围内民主主义的高涨。

俄国的二月革命发展为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诞生了世界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府在它诞生的那一天就发布了《和平法令》，呼吁为了实现以不兼并（即不侵占别国土地，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和不赔款为内容的公正而民主的和平，立即进行谈判；并于次日向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宣布了这个法令。接着，苏维埃政府在15日发布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了俄罗斯各民族的自决权。20日，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德国提议，为实现和谈而停战三个月。22日，在废除秘密外交口号下，开始揭露并公布沙俄政府在战争期间与协约国缔结的秘密条约。

苏维埃政府接连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给在战壕中迎接第四个寒冬的士兵和因生活危机而战栗的参战国的国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为了对抗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参战国政府有必要把战争的目的和“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继续战争”的“和平原则”明确地公之于众。1918年1月5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D.）在会议上以《战争的目的》为题发表了演说。他谈到战争不是以德国的崩溃作为目的，暗示要维持德国的帝制，接 284

着，又对处理欧洲殖民地问题，亮出了所谓“根据被统治者的同意来进行统治”的原则。此外，他还主张，对军费偿付赔款（Indemnity）尽管是不应该的，但是战败国必须对给市民造成的损失偿付赔款（Reparation）①。英国为了抹杀苏维埃外交的影响力量，精心地进行了伪装，但是，它并不想放弃开战的目的。针对这种情况，美国的威尔逊在1月8日发表了有关和平与战后世界的设想“十四点原则”。“十四点原则”的第一条，废除帝国主义国家惯用的秘密外交，主张公开外交，在这一点上是有新特点的。“十四点原则”还抛出了航海自由、贸易条件平等、裁减军备、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带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装饰的新想法。与“旧外交”不同，它被称为“新外交”。但是，威尔逊终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总统，他的“新外交”隐藏着两个意图。其一是，企图与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法令》和公布秘密条约的行动相对抗，把群众重新集拢到帝国主义方面来；其二是，摧毁英国的海上霸权，并创造国际条件，以自由运用战争期间所积蓄的经济力量，确立本国的优势。

针对“旧外交”而提出的苏维埃外交和威尔逊总统的“新外交”，两者的根本原则虽然不同，但对各国国民却展示了有可能对外交发表意见并加以控制的远景，而且，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成了极大的促进因素，对于一直由“旧外交”所支撑的世界政治给予了深刻的冲击。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解放运动的高涨，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

十五　日华军事协定②

俄国的两次革命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一直被迫沉默的社会

① 江口朴郎：《帝国主义时代》，《岩波全书》，1969年，第148页。

② 日华军事协定：即《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译者

主义者，在二月革命成功后的“五一”节，表示了如下看法：“认定俄国革命将是同时反对中世纪专制政治和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并做出决议说“希望俄国社会党和欧洲交战国立即结束战争，并进一步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之际，他们发表宣言说：“对于你们在结束可恶的战争中和革命中的巨大成功，我们衷心表示祝贺。”俄国革命促进了从根本上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思想和运动的恢复与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革命，从日英同盟转向日俄协商路线的日本外交的基础出了破绽。在俄国呆了十二年并素称“俄国通”的本野一郎外相，二月革命后在议会上强调说：“不论俄国政体如何变化，构成几次日俄协商基础的长远利害关系是不会消失的。”① 但是，十月革命引起的“政体”变化，却推翻本野的预见，导致了日俄协商崩溃。十月革命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注意力便集中到如何防止德国通过西伯利亚而东侵和南下满洲，以及如何反过来利用日俄协商的崩溃，把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外交虽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俄国革命在意识形态和世界历史上的意义，但在客观上，由于新增添了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性格，使日本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与满铁有关系的人和参谋本部，最迅速地做出了侵略性的反应。受外务省的委托，从 6 月开始对俄国情况进行了四个月视查的满铁理事川上俊彦，于 11 月中旬向本野外相提出了长篇的《俄国视查报告书》。他详细地报告了革命的经过和实况，并在结语中建议，如果苏维埃政府单独对德媾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如果苏维埃政府站在协约国方面，继续进行战争直至停战，也要“以在该地区获得各种利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 10 卷，第 1093 页。

权为条件，尽可能大量地投放公私资本”，以确保将来的发言权①。参谋本部也在11月中旬开始制定以保护日本侨民和接管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为名而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②。与这个计划相联系，参谋本部还企图推行陆军蓄谋已久的中国军队的隶属化。11月，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一面向前来参观陆军特别大演习的段祺瑞系的靳云鹏和曲同丰两位将军提出警告说，俄国革命的结果，德军有侵入东方的危险性，暗示有必要签订日华军事协定，以对付德国对东方的侵犯；另一方面又命令同来的坂西利八郎要完成这项协定。坂西少将在返回中国任所之后，与黎元洪的军事顾问青木宣纯中将及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等人进行策划，劝说冯国璋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缔结协定。围绕南北统一的方针与冯总统相对立，并辞去总理而居于参战督办地位的段祺瑞，虽然对协定颇有兴致，但冯总统却持慎重态度，未能进展到立即缔结协定。

1918年1月，田中义一次长为了促进日华军事协定，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组织了军事协作委员会，并担任委员长。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对寺内正毅首相力主对付德国东侵的日华共同防御的必要性，并征得了寺内的同意。在国内作好了安排的田中确定了“如果能让中国方面发起就更妙”的方针③。青木中将暗中对冯总统和王士珍国务总理进行工作，强使他们承认了协定的必要性，还让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缔结协定的建议，把问题

286 纳入外交轨道。缔结日华军事协定的交涉，完全是按照参谋本部内定的步骤进行的。但是，害怕日军控制北满的中国政府，确定了日华军事合作仅限于中国国境以外，国境内的防务则由中国军队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6年，第1册，第594页。

②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第674页。

③ 《田中义一传记》，上卷，第714页。

承担的方针，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议。本野外相对日军不能在满洲行动一事表示不满。但寺内内阁却于3月5日确定，“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来谋求完成日华军事协定①。其后不久，西原龟三取得寺内首相和胜田藏相的同意，“为了稳定中国政局”匆匆跑到中国去了。20日，西原会见了在上一年11月因与冯总统对立而辞退总理职务的段祺瑞，一开口就说：“本来，只要一运用权力、兵力和财力，任何事都可以干得成”，接着又说：“现在，您要是掌握了权力，兵力是现成的；”“如果钱不够，我来帮您忙。”他积极催促段祺瑞掌握政权。3月23日，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接着，亲日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又兼任了财政总长。在西原龟三看来，情况是在“万事如意”地发展着②。

1918年3月25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换文，其主要内容是：由于敌国势力正在俄国境内蔓延，有危害远东和平与安全的危险，日华两国就共同防御的办法缔结协定。这样，两国军事当局就开始了制订军事协定的交涉。西原为了支持段政权，于4月30日缔结了提供电信贷款二千万日元的合同。但是，中国国内却掀起了激烈反对缔结军事协定的运动。3月22日的《京津时报》指责说：“此乃实际使中国隶属于日本之军事统治，势必使‘二十一条’要求中之第五号自行实现。”北京和济南的各报谴责协定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广东军政府的陆荣廷和唐继尧两个副元帅要求不要签署协定。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抗议集会，到6月上旬，已有一千名以上抗议军事协定的留学生回国。5月3日，田中义一次长走访章宗祥公使，施加压力说：“在协定签订之前，不能指望日本方面提供贷款和武器。”③由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和压力，中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卷，第280页。

② 北村敬直编：前引书，第183页。

③ 白井胜美：前引书，第134页。

国政府加速了协定的交涉，5 月 16 日，缔结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 日，缔结了"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十二条组成的陆军军事协定规定，为了履行参加大战的义务：(1)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须与日军合作；(2)相互交换职员及情报；(3)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4)采用共同的军事密码；(5)派遣军队到中国境外时要进行协商等。军事协定虽然披着互利主义的外衣，但是，正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日本军方，却通过提供武器和交换情报，迈出了使中国军队隶属化的第一步，并且为已在策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确保了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然而，在另一方面，缔结日华军事协定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对立，对于中国的反日运动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287

十六　出兵西伯利亚

所谓德国势力渗入俄国境内，曾被当成缔结共同防御军事协定的理由，现又成了以消灭敌国为名来干涉俄国革命的借口。

1917 年 12 月，英法两国向日美两国建议，为防止储存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手中，并为把这些物资提供给反革命集团，出兵海参崴。本野外相接到英法两国的出兵要求，以及当地外交官提出的应作好派遣军队的准备工作的意见后，在外交调查会上提出意见书说："西伯利亚东部整个地区难保不为德国势力所席卷"，力陈这种"危机"的严重性，并称："为防万一，必须事先将出兵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一事置诸心头并作好准备。"① 原敬反对本野的这种意见，不同意仅仅说德国势力已渗入俄国，或者有了协约国的要求，就贸然进行可能引起大规模战争的出兵，许多委员对本野的意见也不表赞同。寺内首相也未下定决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6 年，第 1 册，第 666—667 页。

心。财界大部分人对德军东侵的说法也怀疑，并担心军费庞大和导致对美关系的恶化，反对出兵。

在1917年12月这个阶段，出兵的论调尚未能打动政界和财界的上层。要使出兵的论调在他们当中占上风，就需要事态出现新的发展。1918年初，第一个机会来到了。1月，临时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地方自治机关宣称，由于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发展，危机正在迫近，要求协约国派遣军舰。日、美、英三国接受了这个要求。日本派军舰"石见"号和"朝日"号以及两艘破冰船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对革命势力施加压力。主张出兵论的本野外相想乘此时机更进一步，由日本单独出兵西伯利亚，便向协约国进行活动。英、法两国同意日本单独出兵，但是，美国却表明态度说，在当前情况下反对日本单独出兵。在3月的外交调查会上，原敬严厉指责本野外相进行单独出兵的交涉是独断专行。调查会驳回了本野的出兵主张。3月15日，山县有朋向寺内正毅首相、本野一郎外相和后藤新平内相提出意见书，指出没有俄国的要求就出兵，不仅是施加压制干涉，而且"将招致英国、特别是美国之猜疑；不仅不能指望其支援，且恐今后将带来许多忧患"。他还说，假使出兵西伯利亚，"即令陆海军兵力能与之对抗，而遗憾的是，军需补充及军费筹措却不能不有待于英、美援助"，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劝告他们要留心美、英两国的意向①。美国的反对阻碍了单独出兵论的发展。3月18日，政府决定："对于尚未取得合众国和各协约国相当谅解之行动，帝国政府将深加慎重"，并把此意转告了美国政府②。主张出兵者的第一个机会就这样毁掉了。

288

在政府对出兵未能作出决定期间，参谋本部以田中义一次长为首，为了打下出兵的基础，开始向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

①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355—356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1册，第709页。

特（Horvath, D.L.）和哥萨克头目谢苗诺夫（Semyonov, G.M.）大尉提供武器援助，并继续进行建立反革命政权的工作。恰当此时，主张出兵者的第二个机会来到了。4月4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生了俄国兵杀害三名日本商人的事件，演成了陆战队从停泊中的日本军舰登陆施加压力的事态。本野一郎外相抓住这个机会向元老和阁员散发了《关于出兵西伯利亚之我见》一文，并在4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主张说："帝国政府作出一大决断，大胆出兵西伯利亚，此其时也。"本野外相陈述自己主张的根据说，把出兵看作是协约国对德斗争的一部分在国际上会顺理成章，然后利用出兵的贡献来加强在和谈会议上的发言权，而要确保在处理俄国问题上的有利地位，"最好直接立足于俄国领土之上来寻求其基础乃是捷径。"① 然而，日本陆战队的登陆反倒使日本的国际地位恶化了。苏维埃政府抗议指出，登陆是日本侵略西伯利亚的表现，要求立即撤兵。不仅美国，英、法、意三国也对日本军队的行动怀有恐惧。本野的主张未能取得内阁会议的赞同，22日，他辞去了外相的职务。后藤新平从内相转任外相。后藤比起本野毫无逊色，也是个主张出兵者。

尽管本野一郎下台，使出兵的主张愈益高涨的条件却在逐渐成熟。由于1918年3月德、苏两国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英、法两国阻止德军从东部战线转移到西部战线便成了迫切问题。为此就必须使那个肯打仗的俄国恢复起来。恢复肯打仗的俄国就不能不寄托希望于反革命势力，为了扩大这个反革命势力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干涉。6月3日，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希望日本在共同干涉中发挥作用，其条件是：(1)保全俄国领土；(2)不干涉内政；(3)尽量派兵到西伯利亚西部，并通过英国政府把这些条件转达

---

① 《后藤新平》，第3卷，第880—883页。

给日本。当时，后藤新平外相编写了长篇的《有关出兵西伯利亚的意见》一文。这个意见大部分承袭了本野一郎前外相的意见，但是在对美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并且提出了更积极的侵略设想，在这些方面有其特点。这就是，他预见到美国对西伯利亚将同对中国一样，会进行经济扩张，于是主张：日本要"以武力援助""组织对完全不受过激派政府控制的坚强的政治团体"，并与之密切配合，同时"在各要冲配备帝国军队，将西伯利亚的铁路管理以及其他有关民政的实权收归我手"，借以阻止德国的渗透，同时对抗美国的扩张①。但是，与3月的情况一样，外交调查会大多数人主张，即使是共同出兵，如果美国不同意，他们也要反对。政府答复英国政府，出兵的前提是美国同意，并要求出兵时应派往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还要求在协约国军队内部有军事指挥权。 289

恰在这时，在日本出兵问题上视为关键的美国的动向发生了变化。这是指苏维埃境内的四万五千名捷克斯洛伐克军明确现出其反革命集团的面目，6月29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动了反革命叛乱。美国改变了一向的旁观态度，于7月间向日本提议，为支援捷克军队，日美两国各自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派遣七千名军队。于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所谓的"美国同意"的保留条件不复存在了。剩下的问题仅仅是，是否把兵力限制在美国提议的七千名，以及是否把出兵地区限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后藤外相和陆军企图乘机大举出兵，实现对西伯利亚东部的统治。在外交调查会上，后藤新平的政府方案是除日美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外，还要另外单独出兵西伯利亚，大岛陆相则散发了《关于出兵俄国远东领土的要领》的文件，其中写着向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大举出兵十四万八千人的计划。伊东巳代治和犬养毅支持政府的主张，而原敬和牧野伸显却从对美协调的立场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1册，第857页。

出发，坚决抵制政府的意见，主张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少量出兵，平田东助支持这种意见。寺内内阁未能说服外交调查会。到这时，外交调查会已失去了当初建立的目的，即作为在寺内首相之下使外交一元化的机构的机能，而转化为它的对立物。政府向美国建议，把派兵七千名增加到一万二千名，并说可能出兵西伯利亚。美国同意前者，却不同意后者。

屈服于美国的寺内内阁，8月2日发布了出兵宣言。两个师，一万二千名军队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是，伺机侵略西伯利亚东部的陆军，却展开了超出政府方针规定的军事行动。8月9日，陆军根据日华军事协定，把满铁沿线的部队调至满洲里，进而派出大批部队占领了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并利用以前得到武器援助的霍尔瓦特、谢苗诺夫以及哥萨克头目加莫夫（Gamov）和卡尔梅科夫（Kalmykov, I.）等人组织了亲日政权，企图以此稳定对满洲和朝鲜的统治，并垄断西伯利亚的市场和经济资源。十月底，在西伯利亚展开的日军已达七万二千名。陆军的行动完全背离了政府与美国相互立下的诺言，造成了双重外交。陆军的行动不仅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抗议，而且逐渐开始与曾经狂热支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舆论为敌了。

十七　西原借款

与出兵西伯利亚同时，寺内内阁大力推行了对华贷款政策。贷款政策的推行者西原龟三所设想的最初目的是，利用日本贷款来改革中国币制，确立日华货币混合使用的体制，扶植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力量。但是，碰上了1917年的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在他本人幕后策动中国参战和缔结中日军事协定的过程中，这个设想发展得更具体，更庞大了。

290

结束了促进中国参战的工作而回国的西原，在1917年3月发

表了论文《中国关税问题和日本》。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为目标的日华经济区设想[①]。其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发展日本的经济；此外，"鉴于欧洲战乱的实况"，为了"在有事之际，谋求国民生活的安全和急需物资的供给"；并且，估计到战后各国经济的改组，为了确立经济自给的基础。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11月，西原又写了《东洋持久和平策》，把他的设想从日华经济区发展为东洋自给圈的设想。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把北到西伯利亚、南达印度以至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尽收眼底的"雄伟"设想。但是，在这个设想中，西原对中国和其他地区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这就是，对于中国，要排除"侵略性的压迫"，通过"王道亲善""使四亿民众与我同化"；其具体方案则是：(1)全部铁路由中国自营，由日本供给所需资金；(2)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煤炭生产铣铁，确保日本炼钢所需之铁；(3)把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利用这项资金发展棉花、羊毛和石油工业。西原对中国提倡"王道亲善"策略，但对其他地区却赤裸裸地提出了"侵略性的压迫"政策。例如，对于印度尼西亚，他说要使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对立，让中国占领印度尼西亚再由日本收买；对于西伯利亚，他主张应"伺机在滨海州、阿穆尔州及堪察加扶植帝国势力，或进而采取断然措施，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年产值达六千万日元的金矿和无数海产[②]。"西原的东洋自给圈设想，就其策略来看，虽然分别提倡"王道亲善"和"侵略性的压迫"，然而，以"亲善"为名的"同化"也不外是更巧妙一些的侵略性策略，完全可以说是"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前驱。

与西原设想趋于成熟相呼应，寺内内阁健全了确保对华贷款资金的体制。1918年3月，胜田藏相向第四十届议会提出了由政

① 波多野善大：《西原借款的基本设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9年3月，第402—403页。

② 同上，第405—406页。

府负担一亿日元债券为兴业银行提供海外事业资金的议案，获得通过。寺内正毅、胜田主计和西原龟三这个“三人组”由此掌握了对华贷款的资金。胜田对于能够在中国扶植日本的经济力量，大发感慨地题诗说：“渐到菊花分根日。”① 另一方面，为建立第三届段祺瑞政权而进行过幕后活动的西原，则在新政权诞生后不久的4月13日，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陆宗舆交换了“两国政府代表对于有关日华两国亲善的协约措施的备忘录”。其内容以西原在《东洋持久和平策》中所展示的设想为核心，共有四项：(1)利用庚子赔款振兴产业；(2)设立官营炼铁厂以便实现日华两国钢铁的自给；(3)确认铁路国有主义及其实行办法；(4)以实现金本位制为目的的币制改革。

291 西原回国后，敦促寺内首相、胜田藏相和田中参谋次长根据“备忘录”来推行对华政策。寺内首相接受了西原的建议，派他前往中国。西原在出发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前往北京之使命，实在于实行日华提携，为确立日华一体之自给政策作出开端。敝人承担此任乃一生之荣誉。”② 但是，西原卖力推行的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在推行“备忘录”的积极策略之前，西原面临了一个课题，即必须救济因财政极度困难而濒于危机的段祺瑞政权。为了支持段祺瑞政权，他向胜田藏相建议，提供以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和森林为担保的贷款三千万日元，修筑连结吉林和朝鲜会宁的吉会铁路的预备贷款一千万日元，和以改烟酒公卖为专卖的预计收入作担保的炼铁厂贷款三千万日元，结果取得了同意。吉黑林矿贷款虽然遭到了居民的反对，但仍与吉会铁路贷款一起勉勉强强达成了协议。然而，炼铁厂贷款和西原早就渴望的、以发行金本

① 渐到菊花分根日：胜田主计把日本对中国投资比做菊花的分根，并写有《菊之分根》小册子。——译者

② 北村敬直(编)，前引书，第190页。

位货币为目的的币制改革以及利用庚子赔款来振兴产业的方策，却遭到由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而使其活动受到严重障碍的林权助驻华公使、大仓组和正金银行的激烈反对，在外交调查会上也因伊东巳代治等人的反对，未能通过而流产。无论是出兵西伯利亚，或西原贷款，寺内内阁不仅始终未能利用外交调查会使之成为内阁对外政策合法化的场所，反而受到了它的约束。对内受到米骚动的冲击，对外则对华政策陷入困境，寺内首相于是在9月21日提出了辞呈。胜田和西原在西原设想遭到破产以后，在下届原敬内阁成立前一天，9月28日，把前述的一亿元兴业银行债券的余额六千万日元分为满洲四铁路贷款两千万日元[①]、山东铁路贷款两千万日元[②]和中国参战贷款两千万日元，并且签订了合同。这种匆忙签订的贷款合同，是打算用来应付大战后估计将要出现的美国的金元攻势，并想强化在和谈会议上的地位，以确保在中国的利权。

总额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天佑”而积蓄起来的本国资本而进行的首次“日元外交”。但是，企图用贷款来达到中国全面隶属化之目的的西原借款，尽管是“日元外交”，却由于抑制了国内资本的对华活动，并因无视了资产阶级的合理主义，遭到国内资本的抵制而失败了。所提供的资金，大部分被段祺瑞政权用于镇压南方革命派，与“日华亲善”背道而驰，反而加深了中国的反日情绪，其资金也落得无法收回了。

迫近大战结束的日本外交，特别是它的对华政策，已经面临新的转折。

---

① 即“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四铁路指(1)自热河至洮南；(2)自洮南至长春；(3)自吉林经海龙至开原；(4)洮热间某一地至某海港。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1411页。——译者

② 即《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济顺”指济南至顺德；高徐，指高密至徐州。同上书，第1413页。——译者

日本外交史分期表

I 1853—1918年

大时期	中时期				小时期			
支配原则	划分		课题	特征	划分		开始的标志	特征
		1853—1868	对西方国家体系的原则和自由贸易原则的适应	开国与攘夷的对立，外交课题的选择发展为体制课题的选择，幕府制的崩溃 （开国）	1	1853—1854	柏利来日	对外部压力的试探性反应和倾向于开国
					2	1854—1858	缔结日美亲善条约	基本上接受条约体系的原则
					3	1858—1866	缔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此进行反抗的攘夷运动
					4	1866—1868	建立萨、长同盟	被外部压力激发的改革体制运动（倒幕）
由于形成民	1	1868—1882	外交主体的形成和加入近代主权国家体系	承认近代国际法原则和“华夷秩序”的否定，国民课题的提出及其追求 （万邦对峙，文明开化）	1	1868—1873	宣布外交基本方针	外交主体的确立和外交课题的提出
					2	1873—1876	朝廷分裂	否定“华夷秩序”和重新改组与近邻国家的外交关系
					3	1876—1882	缔结日朝修好条规	大陆政策的开始和收回关税自主权运动，参谋本部的设置

族国家而自立	2	1882—1895	摆脱从属性和大陆政策的形成	通过修订条约完成独立，围绕朝鲜的日清对立，以及其结果的日清战争，由此而打破"华夷秩序"（脱亚入欧，富国强兵）	1	1882—1890	对壬午兵变的干涉	对朝鲜的扩张和收回治外法权运动，明治宪法体制的创立
					2	1890—1894	利益线的宣言	通过修订条约完成独立和划定利益线，创建帝国议会
					3	1894—1895	日清战争	打破"华夷秩序"，由军人、官僚掌握外交发动对华军事斗争
帝国主义的扩张	1	1895—1918	向帝国主义国家发展和加入再分割的争斗	开始帝国主义的扩张，围绕朝鲜的日俄对立和日俄战争向满洲扩张和日美对立，分割满蒙和向中国本土的扩张，为此而形成帝国主义集团（帝国主义外交的形成和展开）	1	1895—1900	下关和谈和三国干涉	确定在中国的政治、外交的优势与固有领土的确定，占有殖民地
					2	1900—1902	对义和团事件的出兵	确定统治朝鲜的政策和加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竞争
					3	1902—1904	缔结日英同盟	解决满韩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4	1904—1907	日俄战争	完成对朝鲜的统治和侵略满洲，双重外交的开端
					5	1907—1914	缔结日俄协定	满蒙问题和帝国主义集团的形成，太平洋问题，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6	1914—1918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利用参战和大战带来的"天佑"，使整个中国隶属化

① 分期表是表明近代日本外交史的发展阶段，并表示各阶段特点的。近代日本外交史开始于1868年，当时，幕藩体制崩溃，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由此形成了新的外交主体。从1853年柏利来日到1868年，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下，被迫从大君外交转向近代外交的时期，也就是向近代日本外交史过渡的时期。在本表（分期表I）中，用——表示这一划分。

② 从1868年到现在的外交史，如以外交主体的性质为标准，则可以战败与媾和为两个时期而划分为三个时期。本表（分期表II）中，用——表示这一划分。1945年以前为"战前期"，是天皇制的官僚和军部与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形成重要的外交主体，不久出现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的时期。从1945年至1952年的"被占领期"，是日本的外交权在军事占领下从属于占领权力的时期。从1952年起，由于媾和和恢复邦交而形成的"战后期"，是资产阶级政党与财界构成外交主体的时期，它们由于天皇制在美国占领下解体，因而在政治上确立了主导地位。

③ 各时期外交的发展阶段，分作大时期、中时期和小时期三级，相互之间又有机地联系着。其分段标准如下：

"大时期"，按发展阶段中外交的指导原则的转变来划分。这里所谓指导原则，是说近代国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维持独立乃至扩张，即对外的欲望和行动的倾向。

"中时期"，指在一定国际、国内条件下，外交的指导原则具体化为外交课题时，按其中心课题的转变来划分。

"小时期"，是按完成中时期的外交课题所确定的当前目标及其实现方法，亦即按外交政策的转变来划分。

第九章　华盛顿体系

（1918—1922）

第一节　凡尔赛体系

一　对战后世界的方策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次战争造成一千万人死亡和两千万人负伤的空前大牺牲。大战及其后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结构，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国内条件带来了重大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这两届反对"护宪运动"的内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两届内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天佑"来对外进行侵略，同时对内强化了反动统治。特别是寺内内阁时期，对内的反动统治倍加强化。但这个时期，作为对这种反动统治的批判，在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以吉野作造为中心的民本主义运动，政党政治家和学生一时趋之若骛。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逐渐开始觉醒，在斗争中结成了工会。1917年的美国参战外交和先后两次俄国革命，鼓舞了民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与干涉苏俄战争同时爆发的米骚动，从1918年8月延续到10月，在这三个月期间，解放了民众的活动能力。它一方面导致了寺内内阁的垮台和原敬政党内阁的诞生；另一方面，不久便创造了使群众运动同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基础，同时逐渐形成了一支对于保守势力的旧外交进行批判的力量。

在国际上，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而这种民族主义又不断成长为从根本上威胁日本在华统治的力量。俄国革命导致日俄同盟的崩溃，而这个同盟正是作为侵略中国的最大支柱而结成的。日英同盟在历史上曾经是日本向大陆进行扩张的支柱，但由于俄国革命和德国的战败，对英国来说，这个同盟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越来越小了。由于日本的对华侵略和干涉苏俄战争，日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对立。1918年，美国决定想办一个以中国为对象的新的国际借款团，开始准备对日本发动美元攻势。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天佑”而享受的各种条件正在统统丧失。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的人民外交和威尔逊所提倡的新外交给世界政治以巨大影响，使那种以包括秘密协定的同盟、协约为后盾来推行侵略大陆政策的旧外交已难以继续。在激烈变动的战后世界中，日本帝国主义即使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权益，也不能不修改其对外政策了。

294

着手进行这种修改的，是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寺内内阁于 1918 年 9 月 21 日总辞职；29 日，原敬组阁，除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外，其他阁僚全由政友会成员担任。外相是曾对出兵西伯利亚持批判态度的前驻俄大使内田康哉。最成问题的陆相一职，提拔了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他是山县有朋一手培育、在军部专横跋扈的中心人物，又曾积极鼓吹出兵西伯利亚。原敬让田中当陆相，是想要靠他来控制陆军，以恢复外交一元化。寺内前首相想凭军阀外交统一国民舆论，设置了外交调查会；而原敬则想反过来利用这个组织以求达到由政党来统一外交的目的。

原内阁在内部整顿外交一元化的体制，同时制定了对付战后新形势的外交方针。其要点是：恢复对美协调以取代过去的对英协调；改革对华外交。原敬早就注意到美国在日本外交中所占的地位。1908 年至 1909 年，他视察欧美，就根据见闻在当时的日记

上写道："将来可畏者当系此国。"① 大战一爆发，他对山县有朋说："将来日美同盟不足恃。一旦与美国有事，欧洲毫不可恃，因此，应采取多少付出一些代价、务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所缓和之方针"，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至于原敬从对美协调立场出发，曾对出兵西伯利亚表示不太赞成，前文已经说过了。

原敬的这条对美协调路线，是同改变遭到美国强烈批判的对华政策和出兵西伯利亚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根据大战后的新形势，原敬决心要改变大战期间所推行的大陆政策。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身为日本帝国主义宰相的原敬要放弃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在就"二十一条"要求问题弹劾大隈内阁的议会演说中，原敬曾经说过："吾人认为，诸如此次取得中国同意而将发布之条约，若致力于亲善之道，与中国结成最亲密之交往，则谈笑之间即可办成。"② 他并没有否定（二十一条）要求本身的必要性，这是在说招致中国反对和引起各国猜忌的那种作法不好。原内阁外交路线的基本，也在于此。但是，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得权益与恢复对中国及以美国等列强的协调，二者之间有着严重的矛盾；而且，可以预见，外交方法的变换势必遭到曾经推行大战外交的旧势 295
力的强烈反抗。原敬企图变换外交政策的困难正在于这两点。原敬内阁面临的首次外交上的考验就是媾和会议。

二　凡尔赛会议

1919 年 1 月 18 日，媾和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饱经五年多大消耗战灾难的世界民众和苦于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对发表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寄予莫大的希望。阿尔美尼亚人要求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犹太人寄希望于巴勒

① 《原敬日记》，第 3 卷第 273 页。

② 田中朝吉（编），《原敬全集》下卷，1929 年，第 247 页。

斯坦的未来；中国人要求归还山东；朝鲜人要求民族独立，十四点原则宛如救世福音一般受到了欢迎。另一方面，参加1915年伦敦宣言的各国，则基于帝国主义的各自要求，业已缔结了重新瓜分领土的密约。法国首相克雷孟梭（Clemenceau, G. E. B.）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正在一心等着他那些充满对德报复的要求得到满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是不仅毫无解放本国殖民地之意，而且野心勃勃要吞并德国所属殖民地。凡尔赛会议成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新旧外交的角逐之地。

日本政府任命了参加媾和会议的全权代表，以西园寺公望为首，包括枢密顾问官牧野伸显、驻英大使珍田捨巳、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使伊集院彦吉。西园寺和牧野同原敬首相一样，认为必须推行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对外政策。牧野实际上必须起到首席全权代表的作用。他在出发前的1918年12月2日和8日，在外交调查会上阐述了对付新形势的"新式外交"原则。他回顾说，过去日本外交有些表里不一、权谋术数、以势压人，表面上口称日华亲善，内幕却是"霞关外交"①、"私人外交"和"军人外交"三足鼎立，以致引起外国的猜疑。他强调说，现在尊重和平主义、排除威压主义的"新式外交"既已成为世界潮流，"对外固应为我帝国极力倡导顺乎世界大势，同时又不能不切望勿使国内陷入茫然自失之窘境"，他最后说："今后愿致力于排除威压权谋之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②

但是，日本最高层领导人却并非都持牧野式的见解。外交调查会成员中，对牧野持批判态度的人反而居多数。犬养毅批判说，如果听从牧野的主张，今后连一寸土地也无法谋求。伊东巳代治

① 霞关：日本外务省所在地。霞关外交：指日本外务省的外交活动。——译者

② 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年，第326—327页。

主张："不管如何向往光明正大，但大势所趋，每当风云变幻，力求乘机扩大我国领土，乃我富有奋发图强趋势之国民所应经常考虑之事"，根本没有对侵略主义的立场反躬自省的意思。寺内前首相和田中陆相则紧逼牧野，要他用事实来说明外交上的分裂。原首相指出，日本对外政策引起外国疑虑乃是事实，从而支持了牧野的建议①。原敬一边考虑批判者的主张，同时想尽量按照牧野所主张的那条路线把媾和政策统一起来。但是，在调和新旧主张的基础上确定的媾和方针，大大束缚了日本在媾和会议上的行动。 298

原内阁所决定的《对媾和大使的训令案》，把媾和会议的议题和对策分为三个范畴。第一，关于日本单独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全权代表被授予这样一个绝对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原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第二，关于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除非特殊必要，日本概不干与。第三，关于与协约国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尽量采取与各国协同步调的方针②。尽管原内阁以及牧野全权代表怎样主张"新式外交"，但只要日本要求领有南洋群岛和获得在山东的利权，它就不可能同企图抑制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美国保持协调，不可能和民族主义浪潮不断高涨的中国保持协调。

果然，威尔逊迎头反对日本领有南洋群岛。他认为，如果承认吞并领土，就难以把对苏联提倡不赔偿、不兼并的媾和条件产生共鸣的各国人民吸引到帝国主义方面来；他反对的另一个理由则是，担心日本把靠近夏威夷的南洋地区变成要塞。但是，同日本缔有密约的英国和法国却支持日本。结果威尔逊妥协了，以南洋群岛

---

① 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年，第336—337，342页。

② 同上书，第347—348页。

交由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形式，事实上承认了日本的领有。不久，日本就把这些群岛变成要塞，建成日美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据点。

三　山东问题

山东问题是凡尔赛会议上日中两国之间的最大争端。攫取山东利权是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世界大战的最大目的之一；而中国对凡尔赛会议的最大期望又恰恰是收回山东。大战期间，日本根据“二十一条”中关于山东的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日德两国间所缔结的有关处理德国在该地区权益的协定。日本还和英、法、俄、意四国签订秘密协定，取得了获得山东利权的保证。接着，1918 年 9 月，日本又通过西原借款，在《日本外务大臣和中国章宗祥公使关于山东省及山东铁路、东蒙古地区铁路借款的换文》中，规定由日中合办胶济铁路。凡此等等，都为取得山东利权作了布置。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在出席媾和会议途中访问日本时，内田外相和牧野全权代表又再三叮嘱，诱使他在会议上事事与日本采取共同行动，说只要中国不作“多余的举动”，就归还胶州湾，取得了中国的合作。

大战期间一直批判日本侵略行动的中国舆论，对威尔逊十四点原则抱有希望，强烈地提出了恢复主权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中王正廷、顾维钧等被称作“年轻的中国人”，则代表了这种舆论。他们撇开北京政府而独立行动，为恢复主权领导了中国代表团。他们与威尔逊身边的亲信米拉密切联系，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的要求。

297 要求是：(1)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2)撤退驻扎在中国的外国军队；(3)取消外国在中国的邮政及电信事业；(4)废除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及租界；(6)恢复关税自主权；(7)取消二十一条等共七项。他们还诉诸舆论。在宣传技术方面，不知诉诸舆论为何物的日本代表团同他们是无法相比的。中国各地的学生、商人、

地方议会以及国外的华人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中国代表团发来了鼓励的电报和信件。

1919年1月27日，牧野全权代表提出了日本关于山东的要求。29日，顾维钧对此滔滔不绝地争辩说，由于中国对德宣战，中德两国之间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已告结束，因而也就取消了德国的权益，有关胶州湾及山东的铁路、矿山的利权已由中国收回。中国的主张得到各国的共鸣，形势对日本不利。谈判陷于僵局。从2月到4月，两国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取多数派的工作。4月，美国国务卿蓝辛在五大国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把山东的权益交给五大国处理，由五大国作最后决定，牧野拒绝了这个提案。

由于同英法两国订有协约，并和陆征祥有所"约定"，自以为稳操胜券的日本，却被逼到一筹莫展的困境。在外交调查会里，伊东巳代治指责中国"背信"，主张日本有权取消归还胶州湾的宣言。犬养毅敦促政府应以拒绝在媾和条约上签字的决心来对待事态①。4月21日，内田外相电令日本代表团，如果日本关于山东的要求得不到通过，就暂时不要在国际联盟盟约上签字。22日，牧野、珍田两代表表示，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日本就不能在国联盟约上签字。把建立国际联盟当作媾和会议上最重要议题的威尔逊，为了拯救国联，对于日本的蛮不讲理终于屈服了。4月30日的最高会议决定接受日本关于山东的要求。6月28日，终于达到要求的日本在媾和条约和国联盟约上签了字。抗议的声浪淹没了中国国内，失败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媾和条约和国联盟约上签字。原敬内阁想要改变对华政策的打算也好，牧野的新式外交伪装也好，只要一谈起山东问题，就全都成了画饼，不仅未能恢复中国的信赖，而且不得不遭到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严厉抨击。

---

① 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年，第464，467页。

四　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

凡尔赛会议上山东问题的争论经过，是威尔逊"新外交"和牧野"新式外交"在旧外交面前具有很大局限性的一次大暴露。对"新外交"力量的进一步考验则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过程。

旧外交玩弄的拿手本领是势力均衡，即通过谋求势力均衡的协商、联盟来达到目的。协商、联盟的方式必然要产生秘密外交，随之带来秘密条约。秘密条约使国民在不知不觉中陷于战争的深渊，在不知不觉中把国民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批判旧外交的新外交提出创立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以便把势力均衡和秘密条约排除于国际政治之外。1918年1月，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倡议创立国际联盟，认为凡尔赛会议必须以此作为最重要议案。于是，建立国际联盟就和缔结媾和条约一起，成为凡尔赛会议的最重要议案。

法国被威尔逊这个提案所触动，打算把大战期间的反德联合延续为抑制德国的国际机构；英国所考虑的则是一种把列强结成一个同盟的列强之间的国际调停机构，列强对国际组织作了具体的考虑，日本却没有自己的方案，而以对国际联盟的赞否形式展开了争论。牧野伸显全权代表对建立国际联盟表示赞成。内田外相虽然大体赞成联盟的目的，但警觉到由于列强的人种偏见，日本有陷入不利立场的可能，主张"对本案具体成文之议定应使之尽量延期"，在组织联盟时，须使之写上"排除由于人种偏见而可能产生对帝国不利"的保证①。日本政府把内田外相的消极意见确定为日本的方针。

在威尔逊强烈要求下，媾和会议把国际联盟问题列为第一项

① 小林龙夫编：《翠雨庄日记》，《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66年，第286页。

议案。1919年1月15日，全体会议决议，把建立国际联盟和国联盟约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列入媾和条约。以威尔逊为委员长的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向2月14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盟约草案。对建立国联持消极态度的日本，在多数人趋向建立之际，就提出了废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牧野提议，在盟约草案第二十一条的信教自由项内加上下述条文：“各民族平等乃国际联盟之基本纲领；据此，各缔约国约定，对于在国联成员国家中的外国人，不论在任何方面，都应尽速给予平等公正之待遇，不得因人种或国籍不同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有任何差别。”日本却把自己对朝鲜和中国不断实行民族压迫束诸高阁，而企图借这个机会，使美国以至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排斥日本移民问题的解决得到保证。而且这个提案中还隐含着牵制在山东问题上反对日本的美国的意图。牧野的提案虽有少数赞成，但因澳大利亚以及英国强烈反对而被否决。于是牧野又作为退一步的方策，提议在盟约前言中加上一句，“凡加入国际联盟各国国民皆同意平等原则”，但也被否决了。

国际联盟盟约的制订按照美、英两国的步调进行，并在4月25日的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国际联盟盟约前言中宣告“维持各国间公开、公正、荣誉之邦交”，“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许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在二十六条 299 正文中提出了裁减军备、保卫各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社会及人道事业进行合作等任务。特别是第十八条规定：“嗣后联盟任何会员国所订条约或国际协议应立送秘书处登记并由秘书处从速发表。”还规定“此项条约或国际协议未经登记以前不生效力”①。这就是打算废除秘密条约和产生秘密条约的秘密外

① 录自《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266，273页，但“盟约”通过之时间，据该书为4月28日。——译者

交，最清楚地表明了国际联盟是“新外交”的产物。

但是，盟约所标榜的理想却并没有立即付诸实行。凡尔赛会议上所缔结的各项媾和条约，虽然第一编里就编入了国际联盟盟约，外表上与联盟理想浑然一体，但各条约所形成的凡尔赛体系却决非联盟盟约所说的“公开、公正”的关系。凡尔赛体系，第一，是战胜国在牺牲战败国的基础上构筑的体系；第二，不仅未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会议，而且凡尔赛体系是在推行干涉苏俄战争中形成的，具有反苏、反革命的性质；第三，它虽然承认了中欧的民族独立，但隐藏有对德和对苏建立缓冲地带的企图；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体系则根本不想着手解决。凡尔赛体系无非是由战胜者一手确立的新的帝国主义统治体系。战败国则不许加入国际联盟。因此，与媾和条约结为一体的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和平，其性质只能是和平地维护帝国主义新体系。而且，对建立国联起了主导作用的美国，由于参议院主张恢复孤立主义，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并未加入国联；因此，国际联盟的机能就变成在英法两国控制下维持凡尔赛体系——维持凡尔赛条约现状。国际联盟就这样包含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正式成立，其本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老练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松（Nicolsson, H.）考察了“形成民主外交基础的观点”，在关于“新外交”的议论中，他注意到“应当成为由民众进行民主管理对象的（外交）政策”和“不能成为民主管理对象的（外交）谈判”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分析这种区别时，他着重指出：正是在国联盟约第十八条和在条约批准问题上的新观点中，包含着给“民主管理外交”带来的“革命”。前者按理应该是：“如果世界所有国家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那么，一切使国民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战争的秘密条约，以及与之并存的秘密对外政策，实际即告终结”；至少也应该是：“联盟诸成员国的人民可

有如下保证，即他们政府所签订的任何秘密条约，非经公布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后者则是从批准来说，“由一国的首脑或其代表所 300 缔结的条约”，经过批准即得到“最后的承认”，对外交的“民主管理问题的解决办法”就由于这个批准表示出来。根据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总统须经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同意”始有批准权，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正是按照后者的批准手续而实行民主管理的①。美国总统创立国际联盟，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从而美国又不参加国际联盟，这是一种讽刺，但却使人们对照着看到了对于外交进行民主管理的两个侧面。

如果把国际联盟作为帝国主义的国际，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而成立的则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当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主流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协助进行战争，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从而实际上瓦解了。1918 年 1 月，团结在真正继承 1912 年巴塞尔宣言的布尔什维克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周围的社会主义者，为筹建新的国际，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国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了召开创立新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的原则：(1)各党、各组织均同意，走反对本国政府、要求立即媾和的革命斗争道路；(2)支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②。这些原则同参加凡尔赛会议的协约国的态度针锋相对。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的紧急课题是，在各国创立能够把遍布欧洲的政治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性质的党。同时，共产国际要不断使帝国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联系，“为了促进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后崩溃”，把

① 哈·尼科松：《外交》，齐藤真、深谷满雄合译，UP 选集，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 76—83 页。译者补注：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中译本，第 66—73 页。

② 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卷，村田阳一译，大月书店，1973 年，第 41 页。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作为自身的义务①。中国、朝鲜、伊朗和土耳其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帝国主义各国无产阶级从此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劳动者携起手来。共产国际的成立及其活动造成了与凡尔赛体系对立的国际团结，在世界各地形成并扩大了从根本上反对反苏、反革命的对外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和运动。

在看透了凡尔赛会议所谓"民族自决"乃是幻想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开始出现了接近共产国际的人物。1920 年 7 月至 8 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方向。尤其是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视以 1919 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亚洲民族解放斗争。1922 年 1 月，召开了远东劳动者大会，开始在亚洲各国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把朝鲜和台湾作为殖民地，并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共产国际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极大的威胁。

301

五　外务省的情报活动

日本既然成了国际联盟的理事国，位居国联活动的中心，在国联舞台上固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国际各种条件，也使外交与国际关系上情报活动的重要性飞速提高了。新外交重视舆论。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觉醒了的民众，对舆论的形成开始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组织舆论、操纵舆论，政府不得不开辟"情报活动"这个新的活动领域。对日本外务省来说，"年轻的中国人"在媾和会议上的果敢宣传活动造成的痛苦经验，记忆犹新。

原敬首相在凡尔赛会议召开之前就为设置情报机关费尽心机。他派读卖新闻社主编伊达源一郎前往召开媾和会议的巴黎，

① 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共产国际的历史》上卷，村田阳一译，大月书店，1973 年，第 45 页。

让他和全权代表牧野伸显以及伊集院彦吉商量。伊集院对建立情报组织极为关心。他设想的情报组织是在内阁设置强有力的国家规模的情报局，不仅外务省，而且把陆海军以及大藏省的情报也统一起来。以伊集院的设想为中心，伊达集中各方面人才，拟定方案，携带回国呈交首相，但被原敬驳回了，说："这是不可能实行的方案。"据说原敬的想法是："陆军军阀、海军军阀都非常任性，要统一他们的情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我身为总理大臣，也无能为力，很伤脑筋。这个方案中的情报局长不知谁来当，我看也干不了三天。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外务省设立强大的情报部，大力进行情报收集、交换、公布等活动，这个办法我看可以行得通，就这样办吧！"原敬在委托伊达对设置情报机关进行调查时，他自己似乎已有腹案。由于对伊达带来的方案不满意，结果还是指令外务省实行自己的腹案。外务省内部也为设置情报机关而奔忙起来。青壮年外交官从凡尔赛会议上"年轻的中国人"的果敢宣传活动受到刺激，讨论要改革外务省以适应战后的新国际关系，改革纲领中"扩充机构"的第一项就要求"设置情报部"。

外务省着手筹设情报部，从1920年4月开始实际活动，次年8月，外务省情报部正式成立①。任务是收集、整理内外情报，编辑和发行宣传刊物，并掌握国内外新闻杂志的内部联系等等。首任部长是伊集院彦吉。在外务省情报部开始实际活动的1920年，陆军 302 省也从出兵西伯利亚等感到有指导舆论的必要，组织了新闻班子。这时日本正进入情报宣传时代。

1921年起，外务省开始发刊《外务省公报集》，虽然这与外务省情报部的工作有无关系还不十分清楚。1921年刊行的是1920年度所公布的文书的汇编。1922年1月，又在1920年度内容之外

①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第1028—1037页。

加上了1919年度的部分，作为《外务省公报集》第一辑。此后，每年刊行一册。内容以外务省公布的文件为中心，在附录中则编入了全权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外相在议会上的演说等等，纯属于燥无味的文件汇编，分发给谁也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外务省发刊《公报集》这个事实表明，自从1913年6月外务省要求报纸上刊登陈述书以来，文件汇编的公布才逐渐增多，受到新外交冲击后尤为频繁。这说明，按年度把已公布的文件加以汇总，作为情报宣传活动一环的风气已经出现。

第二节　革命和反革命

六　“三一”独立运动与改革殖民地官制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成立大会，恰当此时，共产国际所瞩目的“三一”运动爆发了。3月1日，在为李王朝末代国王高宗①举行葬仪而集聚的汉城群众面前，一群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宣读了独立宣言，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我们在此宣布：朝鲜独立，朝鲜人民是自由的人民”。学生们的声音倾刻之间变成了“独立万岁”之声，象潮水一般遍及十二府、二百一十一郡和两个岛，朝鲜全境化为独立运动的洪炉。中国和西伯利亚的朝鲜流亡者以及旅美朝侨也起来响应，高呼独立。4月10日，约有一千名独立运动者从朝鲜内外集聚到上海，通过了宣告“仿效北美合众国、采用民主政治”的大韩民国临时宪法，组织了以侨居美国的李承晚为国务总理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以及高喊独立万岁的多数朝鲜人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凡尔赛会议上，结果希望落空，临时政府逐渐衰退。群众斗争的“三一”运动，至1919年4月中旬，

① 即朝鲜废王李熙。原书误刊为“高祟”，兹更正。——译者

也被日本官宪镇压下去，此后，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就从对十四点原则抱幻想的民族主义者转移到在俄国革命感召下觉醒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和流亡满洲的武装抗日团体手中①。

"三一"事件从根本上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使日本很难继续进行过去那种武力统治了。原敬首相作为一个政党政治家，在"三一"事件爆发以前，对朝鲜及其他殖民地的武官统治，就持批判态度，想要改革殖民地的官制。就任首相后不久，1918年10月，朝鲜总督府总监山县伊三郎说："目前朝鲜形势，以武人为总督已经过时"，原敬对此表示赞同。他对田中陆相讲了改革官制的必要性，主张总督府"宜实行改革，军政分离，国防指挥由陆军直辖，总督则由武官或文官担任均可"。田中就任陆相以来，打算追随原敬以确立其政治家的地位。对于原敬的提议，他认为应由陆军外部提议改革，"不宜由陆军内作出决断"，就请求由他自己提议来动手实行。田中首先疏通寺内，就关东都督的文官制问题获得默许②，随后即在1919年2月的阁议上提出了文官、武官均可担任关东都督的改革方针，并获得通过。殖民地官制就这样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303

正当原敬内阁准备动手改革官制之际，爆发了"三一"独立运动。原敬得报后，检查事件原因，认为"总之，虽然可能受到民族自决等空谈的鼓动，但或许还有某些其他原因"；他检讨过去，认为统治方式偏于武力压迫而缺少怀柔方策③。但面对当前事件，原敬却首先集中全力镇压独立运动。这时原敬对处理事件的指示是"对内对外都要把它当作极为轻微的问题"；关于镇压，他告诫："必须十分注意"，不要在外国人中"招致残酷苛刻之批评"④。4月8

① 山边健太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岩波新书，1971年，第83—91，100页。

② 《原敬日记》，第8卷，第55，94，139，150页。

③ 同上，第169—170页。

④ 同上，第175页。

日，政府以“保护良民”为名，把加大通常编制的六个大队和四百名宪兵，分别陆续派遣到朝鲜。尽管有原敬的“关照”，镇压仍然是极其残酷的。从全朝鲜九十八个宪兵驻在所、八百七十七个宪兵派出所、四十三个宪兵出张所出动的宪兵，抢杀人数估计在十万人以上。继军队进行彻底镇压之后，朝鲜总督府于4月15日公布了《政治犯罪惩处条令》，以便取缔独立运动并防止其再度发生。《条令》规定“以变革政治为目的，结伙妨碍或意图妨碍秩序与安宁者”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监禁，对在苏维埃境内或在中国境内进行活动者，也同样适用。这个《条令》成了旨在镇压俄国革命和米骚动后逐渐抬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治安立法的开端。

“三一”事件促进了殖民地官制的改革。4月12日，事件余烬未熄，政府就对已在阁议上取得同意的关东州官制改革作出了决定。这就是废除都督府官制，另设关东厅，并公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把过去由都督统辖的军、政两权，分别改由新设的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厅长官掌管。首任长官任命了文官林权助。其结果是，陆军多年来企图一手独揽满蒙统治权的梦想破灭了，但是却给单独设立的关东军在统帅权独立的名义下授与了独断专行的活动余地[①]。接着，原敬内阁又着手进行朝鲜及台湾的官制改革。“三一”事件爆发后，原敬指示返回朝鲜的山县总监，要求：“改行文官制度，教育方面采取彼我一视同仁之方针，改宪兵制度为警察制度，……总之，把朝鲜视为日本本土的延长而加以同化”[②]。8月20日，政府宣布改革朝鲜和台湾的总督府官制，使文官、武官均可担任总督，削除总督对陆海军的统帅权。陆军内部强烈反对这种改革，但原敬通过田中陆相进行了压制。不过，改革后的首任朝鲜总督仍不得不任用海军大将斋藤实，以资妥协。在台湾，则任命了第

304

① 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1965年，第38—39页。

② 《原敬日记》，第8卷，第193页。

一个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原内阁在打开文官担任总督的道路的同时，又着手改革统治政策。在朝鲜，改宪兵警察制度为普通警察制度，取消官吏和教员制服上的佩刀，发行若干朝鲜语报纸以资"统一民心和宣传施政方针"，实业教育、专门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日本人和朝鲜人同校，地方议会选入朝鲜人代表等等。在台湾，则适用日本本土法律；设置有台湾籍委员参加的总督府评议会，作为总督谘询机构；除初等教育外，在教育制度上废除日、台人的差别等等。这一系列改革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三一"运动的冲击，整顿殖民地统治，以缓和民族运动发展的措施。这决不是为了扩大朝鲜人和台湾人的民族自治而作的让步，只不过是以把朝鲜人和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目的，意在消灭朝鲜民族和台湾民族的一种改革而已。正因为如此，夹杂一些让步的同化政策，虽然得以怀柔一部分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但要使朝鲜人和台湾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解放斗争沉默下去则是根本办不到的。

七　"五四"运动对日本的冲击

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的冲击下尚未得喘息，又在中国遭到反对大战期间（日本）一直推行的殖民地化政策的激进性反击。1919年4月30日，凡尔赛最高会议在山东问题上决定接受日本的要求，使中国民众对凡尔赛会议的幻想破灭了，大战以来对日本的积愤顿时爆发起来。5月4日清晨，大约三千名学生集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络绎不绝地高举标语大旗："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誓死收回山东利权！""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举行抗议集会。这次集会是一场烽火，一个新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随即开展起来。学生们在集会后走向日本公使馆，遭到阻止，就涌进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私宅，当场质问并殴打了恰在该处的前驻日公使章宗祥。中国官宪

逮捕了约三十名学生。但抗议行动更加扩大，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学生举行罢课响应北京，从商人一直扩展到工人等各个阶层。6月间，全国举行罢市，工人以上海为中心断然实行罢工。张继、何天炯等国民党干部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沉痛抗议。其中对二十一条指出："中国国民之全体，无不以恐怖怨恨之心理对日本"，并强调指出："盖中国人对于日本之传统的政策，以为尽力支持之辩护之者，以是贵族军阀为最，而平民政治家之意见未必尽如是也"，"乃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阁成立，其对华方针，仍为奉行传统的政策"，"中国人已经忍无可忍"①。以学生为先锋的广泛抗议运动吓坏了北京政府，它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三名亲日派要人。"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由于领导运动的学生们，受到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所强调的反对军阀专制，实现自主、进步、民主变革的思想和俄国革命后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指导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工人参加反帝斗争而具有新的性质。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性质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对于"五四"运动，《大阪每日新闻》（5月10日）斥之为"以为靠日本以外的援助就可以贯彻其排日的要求，这只是狂人的妄想"。《国民新闻》（6月30日）报道说，运动是由美国公使馆煽动的。面对新闻论调中充满敌意的报道倾向，曾一度支持过"二十一条要求"的吉野作造，一变过去的态度，1919年6月，在《中央公论》和《新人》杂志分别发表《北京学生行动不可侮》、《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两论文，认为中国的学生运动不是外人煽动的，而是自发的，充满"自信精神"的，是既要排日，又要内除祸根的；同时，这

① 中国之会编，《中国》第66号，1969年5月，第16—18页。译者补注，见《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210—21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种排日，其目标是日本的官僚、军阀、财阀，因此，要根除这种排日行为，“不是靠援助亲日派曹、章等人，压制民间不满就可以了事的”。他敦促日本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并指出了友好的道路，主张“我们自己要约束军阀、财阀的对华政策，使邻邦友人了解日本国民真正的和平要求”。他支援了以新人会为中心的（日本）学生和北京学生的友好交流计划。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当时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中国，正集中全力撰写《国家改造法案大纲》的初稿，即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圣典的《国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纲》一书。由于国内民本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大川周明等国家主义者很快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组织犹存社，把北一辉从中国叫了回来。犹存社成立之目的，是以亚细亚主义和改造（日本）国家来对付内外的“赤化”。昭和时期的法西斯运动领导者，很多人是从这里出来的。

“五四”运动既然促进了日本国内民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立，对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也就不能不给予巨大的影响。原敬内阁成立之初，曾批判过去的侵略主义政策，并确定了停止干涉内部纠纷的政治借款和武器援助，促进中国南北妥协的方针。不过，原敬内阁的南北妥协方针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实现中国的统一来使整个中国承认日本的媾和条件①。但是，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南方派在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谈会议上，提出了以不接受有关山东问题的媾和条件、宣布日中密约无效，以及惩处有关人员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原敬所期待的南北妥协破裂了。原内阁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原敬在评论“五四”运动时说：“中国借山东问题搞骚动殊无理由，日本可以按照条约归还中国，但中国打算借助别

306

① 小林龙夫：《巴黎和会和日本》，《神川先生还历纪念·近代日本外交史的研究》，有斐阁，1956年，第375页。

国力量来压服日本则断难同意。”[①]面对中国的新局势，日本帝国主义最现实的政治家原敬，采取了软硬两手的处理方针。他对元老山县说：“排日思想及其借口盖不易消除，故应外则采取竭力协调各国”，“内则坚持援助亲日派，勿使彼等失望之方针”，并说有必要每年给徐大总统（指徐世昌）五百万日元至一千万日元[②]。9月9日，政府为了使徐总统亲日化，决定提供借款，接着就再三要求北京政府取缔排日活动。原敬内阁成立之初，借批判西原借款而声称要改变的对华政策，至此大大后退了一步。但这并不意味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全面退回到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的武力外交和威压外交。1919年11月，关于福州中国学生和日本商人冲突事件[③]的处理，原敬首相把负责调查此事的外务省书记官松冈洋右叫来，命令他说：“以往完全压制中国方面之作法并非今后之善策，应取公平态度解决此问题”[④]，这个事件以“打架双方各有是非”的方式解决了，可算是一个特例。“五四”运动与企图用新外交的伪装来软化中国的原敬内阁外交完全对立，赤裸裸地暴露出分别使用软硬两手的帝国主义外交的面目。

八　对西伯利亚政策的混乱

在大陆政策方面，原内阁遭受了“二一”事件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在西伯利亚政策方面也被急转直下的形势搞得狼狈不堪。原敬内阁成立时，参谋本部不同美国商量，就从海参崴到赤塔，在西

---

① 《原敬日记》，第8卷，第227页。

② 同上，第249页。

③ 福州事件：1919年11月6日，福州日本领事馆指使日本侨民逞凶，枪击中国青年、爱国学生及市民多人，领事馆警察长陆军少将在现场行凶被当场拿获。事后，福州商民及学生罢课罢市，日本政府竟派军舰至福州进行威胁。直至1920年11月12日，才由北洋政府与日本妥协结案。——译者

④ 《原敬日记》，第8卷，第422页。

伯利亚铁路沿线布署了七万两千名军队。为了使东部西伯利亚变成日本势力下的“自治区”，日军在各地扶植傀儡：在外贝加尔的要冲赤塔扶植谢苗诺夫；在阿穆尔洲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扶植加莫夫；在乌苏里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扶植卡尔梅科夫，并继续支持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1918年11月，美国政府对日本的独霸行径提出责难说：“看到兵力之庞大不禁吃惊”，并强烈抗议说：“日本目前在北满洲及外贝加尔东部所进行之独占控制无疑将经常引起猜疑”。①

307

原敬首相从对美协调的前提出发，对出兵是消极的，从他来说，前内阁的出兵方针必须改变。原敬把力主出兵的田中义一选拔为陆相，本来是“以毒攻毒”的花招，但田中就任陆相后，迅速接近原敬，好象忘记了自己曾力主出兵，在11月18日阁议上却说：“美国的不快未见好转，费用又很庞大，如果议会质问为何投此巨费布置重兵，则无法答辩；如此殊非国家之上策，宜只留守备队保持治安，召回其余部队”，提议把驻兵改为平时编制②。政府决定削减三万四千人，1919年初开始撤兵。3月间，西伯利亚驻兵额已削减到二万六千名。但这时西伯利亚政治形势又在发生重大变化，不能不给原敬内阁的政策以深刻的影响。

当时，在贝加尔湖以东的东部西伯利亚，日军所支持的傀儡势力还保持优势，但在西部西伯利亚，社会革命党员、西伯利亚自治主义者及以帝政派所组成的鄂木斯克的全俄临时政府则据有有力地位。但其内部不断纷争，1918年11月，英国所支持的帝政派发动政变，建立了以声望甚高的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Kolchak, A. V.）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英国的意图是，为了打倒苏维埃政权，北从北海，南从乌克兰，与进攻莫斯科的反革命军分别呼应，以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475页。

② 《原敬日记》，第8卷，第114页。

使东方的鄂木斯克政府强大起来。法国也支持高尔察克。这个高尔察克同日军所支援的谢苗诺夫却是冤家对头。协约国责备谢苗诺夫，说他妨碍运输和通讯，对支持他的日军行动一直怀有疑虑。是继续支持参谋本部孵育下的谢苗诺夫？还是为了恢复同各国的协调改为英法两国所支持的高尔察克？原敬内阁对此举棋不定。1919年1月26日，原内阁决定《对俄政策方针》，从同各国协调的立场出发表示支持鄂木斯克政府。这表明日本参加了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战线。但与此同时，这个方针又承认谢苗诺夫等建立东部西伯利亚"自治区"，以保全参谋本部的面子，并想把谢苗诺夫等的哥萨克军并入鄂木斯克政府，以掩盖国际协调方针与参谋本部计划的矛盾①。

1919年3月至4月，高尔察克军不断进攻。3月19日，原内 308 阁加强了支持鄂木斯克政权的立场，决定使谢苗诺夫军隶属于高尔察克，参加西部战线。参谋本部依然支持谢苗诺夫，谢苗诺夫拒绝隶属于高尔察克。这里也未能克服双重外交。到了5月，原内阁为了在协约国中掌握对苏政策的主动权，向协约国提议共同承认鄂木斯克政府，田中陆相则在外交调查会上明确表示有意派兵到贝加尔湖以西，而这是他向来一贯反对的。政府向鄂木斯克政府提出，以获得北库页岛油田和煤矿资源、收买中东铁路南段、缔结渔业协定等作为承认该政府的条件②。原敬内阁的对苏政策，从削减出兵一转而为参加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大干涉。美、英、法三国虽对日本提案怀疑，但仍然强烈支持它承认鄂木斯克政府的方针。但此时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在布尔什维克军5月份开始的猛烈反击下，7月至8月，高尔察克军完全溃败了。

---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8年第1册，第444—445页。

② 细谷千博：《日本与承认高尔察克政权问题》，《法学研究》（一桥大学）第3辑，1961年，第86页。

高尔察克军的溃败，给西伯利亚局势带来决定性的变化，干涉战争也从此开始破产。英国迅速甩掉高尔察克，决定撤退干涉军。日本被迫第三次改变对苏政策。参谋本部的东部西伯利亚统治论重新抬头。8月，田中陆相在外交调查会上要求派遣二十五万四千大军，确保远东三州，作为防卫满、蒙的第一线[①]。但1919年度军费已达年度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一。犬养毅表示反对，说大量派兵将招致日本经济破产，高桥藏相从同样的观点出发主张撤兵。大量派兵势必招致对美关系的恶化和国际上的孤立。日本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增兵则招致国际批评和财政危机；撤兵则不得不放弃对东部西伯利亚的统治。为了维持远东三州的治安，原敬内阁提出以市会、州会、县会等自治组织为基础，由日美共同建立新政府的方针，以此统一了阁议。但11月15日，鄂木斯克政权崩溃，西伯利亚局势更加恶化。田中陆相深感布尔什维克向远东西伯利亚及朝鲜、满洲渗透的危机，再次主张增兵。要增兵，则必须取得美国的合作。11月23日，政府向美国提议共同增兵。美国政府却于1920年1月9日通告从西伯利亚撤兵，作为答复。原敬内阁受到了强烈打击。

九　单独驻兵

美国的撤兵通告迫使日本在单独驻兵或撤兵二者之中作出抉择。在等待美国对增兵问题给以答复期间，田中陆相曾主张马上向满洲派兵五千至六千人，并考虑向当地派遣军下达如下方针：列宁的政府军“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将扰乱与帝国关系密切的远东三州之治安，并进而威胁帝国之存在，为此，应坚决阻止其东进[②]。美 309

① 细谷千博：《日本与承认高尔察克政权问题》，《法学研究》（一桥大学）第3辑，1961年，第107页。译者补注：远东三州当指外贝加尔州，滨海州、阿穆尔州。——译者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9年第1册，下卷，第835页。

国发出撤兵通告的1月9日，原敬首相对田中说："照旧驻兵则使我成为各国猜疑之的；加以费用庞大，国论亦属难料。然该地区与我关系特殊，当然亦不能轻易撤兵"，表明了进退两难的心情。作为穷极之计，他表达了如下想法："今后之计，宜抓住时机，集中居留民，将兵员全部撤退，而止于守备海参崴，并与中国共同守备其领土内的中东铁路，以改变局面。若有过激派破坏此项守备，或试图在我领土内宣传过激主义，届时始转入攻势，占领适当土地。至于占领后成立政府再撤兵，或作为我国领土加以统治，则均无不可。"① 田中虽然基本同意原敬的见解，但以为使将来能够顺利撤兵为理由，坚持当前应向满洲增兵。1月13日，原内阁在派遣军待机撤至海参崴和中东铁路沿线的前提下，决定派遣高田第十三师团到满洲。1月17日，田中指示海参崴派遣军司令官大井成元："鉴于单靠武力威胁来保全远东三州统治并不适应当前形势，为恢复三州秩序，首先切望各地出现之稳健政治团体实现融合统一，至于其中谁人执政，应听从他们自己的要求，丝毫不要受过去关系之拘束等。"② 田中的这个指示是企图从武力威压转为融和政策，借以回避西伯利亚人民的抵抗，维系日本对东部三州的影响力。

但是，进入1920年，东部西伯利亚局势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益形恶化了。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领导下，1月31日，滨海州临时政府在海参崴成立。2月至4月，以外贝加尔的上乌丁斯克临时政府为核心陆续召开了宪法会议。从1月底起，驻在库页岛对岸、阿穆尔河（黑龙江）口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的日本军守备队遭到游击队的攻击，至2月底竟然投降。政府断定，危机迫近朝鲜和北满。3月2日，"出于帝国的自卫"，决定采取缩短守备线的方针，将外贝加尔及黑龙江方面的军

① 《原敬日记》，第8卷，第453—454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9年第1册，下卷，第852页。

队向中东铁路沿线、滨海州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集结。于是，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显然已从援救捷克军转为防卫朝鲜和满洲了。

当地派遣军对局势的恶化尤感焦虑。据3月12日在海参崴的政务部长松平恒雄向内田外相所提报告说，日军为了守备铁路正进行着发动武力的准备。并对下述危险提出警告说："可以看出，有策划乘机对当地过激派给予一次打击的模样"，而且，"部分军宪人员有企图在我军集中到此地后，以武力驱逐当地过激派，让谢苗诺夫或霍尔瓦特行使当地政权之意"①。3月16日，当地（日本）派遣军判断，滨海州临时政府即将革命化，乃向军部请示届时应向该政府提出什么条件。4月1日，美军刚刚撤完，果然不出所料，当地派遣军就占领了海参崴的要地。次日，大井司令官向临时政府要求保障日军行动自由及抑制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等。临时政府表示有意接受此项要求，但日军却在签订协议之前的（4月）4日，借口俄军已暗中开始战斗准备而发动了总攻击。进攻从海参崴市区扩展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滨海州主要城市尼可尔斯克·维里斯克、伊曼、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解除了七千名俄军的武装。

310

日军对滨海州的军事统治似乎眼看就要确立了。但日军的进攻及伴随进攻而来的残虐行为激起了俄罗斯人抵抗的怒火。为了加强革命权力，滨海州临时政府决定召集代表滨海州全体人民的国民会议。4月，以乌丁斯克的临时政府为中心连续召开了宪法会议的外贝加尔人民，宣布建立远东共和国，其范围从外贝加尔起，直到滨海州、堪察加、萨哈林，包括整个东部西伯利亚全境。受到西伯利亚人民激烈抵抗的大井司令官被迫于5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只要东部西伯利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并对朝鲜和满洲不发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9年第1册，下卷，第821—822页。

生危险，日军就撤兵。

十 尼港（庙街）事件和撤兵问题上的国务与统帅①

内外形势已使日本难以继续单独驻兵。1920年初，美国开始撤兵。2月，苏维埃政府提议，在否认相互间有敌对计划、不干涉内政及承认日本在东部西伯利亚地区处于经济通商上的优越地位为条件，双方议和。4月间，英苏两国围绕通商协定开始谈判。在国内，《东洋经济新报》和《大阪朝日新闻》从一开始就反对出兵，现在则不仅它们，在1月底的议会上，宪政会的片冈直温也对援救捷克军既已大致结束，而仍耗费巨大军费继续驻兵一事进行了批判。撤兵的要求进而扩大到工人团体。在4月间召开的友爱会关西同盟第二次大会上，有人提议"要求撤回西伯利亚方面的日本军队，并和列宁政府通商"。5月2日，在日本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时，进步的教师组织启明会提出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的紧急动议，在全场热烈掌声中通过。撤兵已势在必行，但5月间突然发生了尼港（庙街）事件，形势又暂时逆转。2月底，投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日军在被要求缴出武器时反而向游击队司令部进行了袭311击，结果失败被俘。日军救援队去救俘虏时，游击队在5月25日至27日杀了俘虏，烧毁市区后撤走。这个事件刺激了国民的感情，陆军大规模地展开了反苏宣传，要求撤兵运动的扩展受到阻碍。

但是，已经确定缩短战线方针的原敬内阁，在6月1日阁议上决定，在以赤塔地区作为中立地带的条件下，从外贝加尔方面撤兵，一旦尼港事件得到解决，就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也撤兵。这次阁议还驳斥了陆军当中有一部分人打算以海参崴政府为中心，

① 尼港：即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国务，指日本政府。统帅，指日本军部。——译者

包括远东共和国政府和谢苗诺夫，建立西伯利亚缓冲国的设想。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口称提出辞呈，以示反对这次阁议的决定。围绕外交方面的国务与统帅的矛盾在这里也暴露出来了。国务对统帅摆出了坚决对抗的态度。田中陆相主张"上原要辞职就让他辞职"，坚决实行撤兵，原敬也下定决心说"不能让军阀任意妄为"①。

政府一面执行从外贝加尔方面撤兵的方针，同时在6月28日，决定占领北库页岛，作为日后解决尼港事件的保证，并付诸实行。7月16日，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表示除俄罗斯以外，不能承认他国权力占领该地。7月28日，陆军省向外务省提出了关于经营石油、煤炭及其他矿山或森林的业务分担计划。由此也可看出，对北库页岛的占领，显然隐藏着超出单纯为保证（解决尼港事件）而占领的意图。

8月20日，政府从外贝加尔撤兵完毕。9月初开始研究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撤兵问题。参谋本部表示反对。政府再次决心坚决对抗。田中陆相为了表示对抗，提出了辞呈。据说他估计山县有朋会挽留，于是打算以废除统帅权独立的原则作为留任的前提②。原敬也决心要改革参谋本部。他对田中和枢密顾问官三浦梧楼说，参谋本部借直属天皇而挥舞统帅权是落后于时代的，反而连累皇室。他提出了极为大胆的废止天皇大权的设想：即由政府负全部责任执行国政，"皇室如不问政事而成为专司慈善恩赏之府，则可保安泰"③。上原总长得知田中提出辞呈，就软化了。9月10日，政府决定自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撤兵。尽管上原软化了，阁内撤兵论的急先锋高桥藏相却于10月间将废除参谋本部的主张制成文件向原敬首相秘密提出。但是，虽然原敬早有此意，却也说废除参谋

---

① 《原敬日记》，第8卷，第553，558页。

② 同上，第9卷，第48，60页。

③ 同上，第9卷，第52，61页。

本部很困难，必须作好万全的准备，搁置了这个急进的文件而未予发表。出兵西伯利亚使国务和统帅之间的矛盾深刻化，竟至在内阁中出现了(天皇)大权废止论和参谋本部废除论。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撤兵于12月12日结束。在这之前的11月8日，盘据赤塔的谢苗诺夫也败退了。到1920年底，日军的派遣312区域和势力范围已收缩到海参崴周围和北库页岛。但当地日军开始策谋强化海参崴作为反革命根据地。1921年1月，尽管田中陆相命令大井司令官停止对滨海州临时政府的反对活动，但当地日军仍然抬出商人麦尔库洛夫(Merkulov,S.)兄弟对临时政府进行了两次反革命政变，并于5月建立了阿穆尔沿岸地区临时政府。派遣军开始向准备进攻远东共和国的阿穆尔沿岸地区临时政府提供武器和资金的援助。11月1日，阿穆尔沿岸地区临时政府开始进攻。不几天，11月4日，原敬首相就躺倒在中冈艮一的匕首之下。原敬死后，由内田外相临时代理，后来由高桥是清接任首相。

第三节　华盛顿体系

十一　新四国借款团与满蒙问题

在西伯利亚连续后退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也遭到国际资本的进攻。大战期间，旧国际借款团实际崩溃，日本乘机以西原借款为中心输出了总额达两亿五千万日元的资本，加强了确保利权的地位。对于日本的独占侵华，美国开始进行攻击。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蓝辛正告中国驻美公使说，要促进恢复美国中断了的对华援助，"只有阻止日本单独霸占中国的投资领域才有可能"①。美国决心组成新的国际借款团，于1919年10月提出方案，请日、英、法

① T.F.拉法格:《中国与世界大战》，1937年，第138页。

三国参加。其要点是：(1)凡由政府所保障的一切对华贷款，不分政治贷款或实业贷款，一律作为借款团的共同事业；(2)三国政府仿效美国，把所有希望对华贷款的团体都包罗进来，组成新的借款团；(3)借款团成员已经获得的附有优先权或选择权的贷款，移交借款团，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美国的意图是，鉴于列强分别向各军阀提供贷款的现状，企图靠贷款一元化来促进中国的统一，确保投资安全，并进而用美元的力量摧毁日本使中国隶属化的政策。

诞生不久的原内阁遭到美国的攻势后，迅速着手改变对华政策。1918年10月29日，内阁指责西原借款招致各国猜疑，并决定停业"此类以实业贷款为名，而钻四国借款团章程的空子"的政治贷款[1]。接着，11月11日，外务省召开了讨论对华贷款问题的首脑会议，新任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提出四条改善方案：(1)"放弃过去之侵略主义，凡事以公正态度"对待中国；(2)不采取无视在华外人的权利或损害其感情之政策；(3)鉴于过去对华政策之不统一，统一对华外交机构；(4)克服国内对华舆论的分歧。会议同意按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改善方案是要求大胆改变对华政策的。但是，这次会议又同时确定继续推进西原借款所规定的满蒙四铁路、吉会铁路及山东两铁路的工程[2]，政府并于12月同中国铁道总长开始谈判铺设吉会铁路问题。原敬内阁也无意放弃西原借款的既得权益。 313

1919年5月，日、美、英、法四国银行家代表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确认了美国所提方案的各项原则，同意组成借款团，并制定了章程草案。但6月间，日本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根据本国政府训令要求把"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满蒙地区之一切权利及选择权"排除于共同事业对象之外[3]。美国代表反驳说，满蒙是中国重要地区，决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471—472页。

② 同上，上，第472—474页。

③ 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机会均等主义关系资料》，1935年，第249页。

不能除外，认为“特殊利益”和“经济问题”并无任何关系。对于石井一蓝辛协定中所说的“特殊利益”，两国解释不同，早已发生冲突。英国代表也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在美英两国抵制的影响下，政府内部也分裂了。内田外相认为，如果坚持满蒙除外，日本就会在国际上招致绝对孤立。田中陆相则强调即使退出新借款团，也要贯彻满蒙除外。为使双方妥协，原敬首相提出，目前先主张满蒙除外，以等待时机，这样统一了阁议。但9月1日，日本虽然再次提出满蒙除外，三国仍不予承认。

进入1920年，日本从概括的满蒙除外论后退了一步，提出“在确保帝国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存的安全上”重大者除外的“公式”，并向美英两国提出下列具体的除外对象：(1)南满铁路及其支线以及作为附属事业的矿山；(2)吉林一会宁、郑家屯一洮南、长春一洮南、开原一吉林、新民府一奉天、四平街一郑家屯间各铁路；(3)洮南一热河铁路及洮热线某地至海港的铁路[1]。美英两国拒不承认并提出反驳，认为日本所提“公式”极其含糊，“日本政府仍然意图排除美英法银行团参加为中国谋福利对共和国(指中国——译者)重要地区的开发”；关于具体排除对象，认为洮热线“与其说是为了日本的国防，毋宁说其形势是控制北京之背后，从而得以施加压力”[2]。在美英两国强烈抵制下，日本撤回了“公式”和洮热线。3月15日，按上述提案的(1)(2)两项除外达成妥协。日本对满蒙的概括的特殊利益虽然遭到否认，但其具体的利益则获得列强的承认。原敬首相自我吹嘘说：“我们只不过笼统地主张满蒙为我们之特殊利益，而这次解决借款团问题，却就具体利益得到承认，为将314 来计，实为我国之利。”[3] 由于新借款团成立，美国看来似乎抓住了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9年第2册，上卷，第195—196页。

② 同上，第233，235页。

③ 《原敬日记》，第8卷，第537页。

控制日本在华活动的缰绳。但它所期待的中国南北妥协却遭到挫折，中国并未成为安定的投资市场，美国资本转而流入到欧洲。1921年5月，原敬内阁口称尊重借款团的精神，却决定扩大满蒙利权的方针，其具体方法是：支持"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确立在东三省的牢固地位，重申"以此确保我对满蒙之特殊地位"[①]的决心。美国靠组成新国际借款团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便召开华盛顿会议，开始第二次攻势。

十二　华盛顿裁军会议

1921年8月13日，美国政府正式邀请日本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

如前已述，美国对二十一条要求以及大战期间日本的对华政策屡次表示了抗议。从1916年开始至1918年修订的丹尼尔斯[②]海军大扩军计划，既是为了凌驾英国海军，应付欧洲局势，也是估计到将来日美关系紧张而拟定的。（美国）海军计划委员会（General Board）把日本看作头号假想敌国，认为必须保持威压日本的军事力量[③]。但是，战后美国国内各阶层已开始叫嚷要求缩小带来庞大财政负担的军备。美国政府既要保持本国军事上的优势，又要适应国内舆论，就只能选择这样的道路，即与列强、首先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日英两国一起实行国际裁军。于是，继威尔逊上台的哈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政策，其基本路线便不是靠武力来压迫日本，而是靠所谓"抑制"的办法，即依靠正在抬头的（日本）自由主义派，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525—526页。

② 丹尼尔斯（Daniels，Josephus，1862—1948），1913年至1920年任美国海军部长。——译者

③ 有贺贞：《通过协调进行抑制—美国》，《日本政治学年报》，1969年，岩波书店，第10，24页。

通过同他们合作来抑制日本①。

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各种反响。海军正在推行以主力舰八只、巡洋舰八只为基础的"八·八舰队"军备扩张计划，这是1907年确定帝国国防方针以来的宿愿。海军省内所设国际联盟军事关系研究会根据对英美保持均衡的原则向政府提议，维持八·八舰队或保持对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比例②。陆军的宇垣一成则在日记上写道，美国提议讨论裁军和太平洋问题是"蛮横无礼"③。政界和言论界中的呼声则是：这次会议上将对远东问题进行总清算，使日本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苦于军备扩张重压和1920年春爆发的战后危机的财界，却盼望通过裁军缓和财政负担，通过调整日中邦交促进贸易并恢复国际信用，因而表示欢迎。已经确定对美协调路线的原内阁则抱着"事态固属严重，但也不必大惊小怪"④的态度，答应参加会议。当时，外务省正把政务局分为亚洲局和欧美局，连同原有的通商局和条约局，形成所谓"四局时代"，十分热衷于外交一元化，确定以下述态度作为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根本方针："利用此次会议，纠正历来之两重外交、军人政治、军阀外交等谬误，使我国对外国策及国际立场面貌一新，以利于帝国之永久利益和发展。"⑤在选拔全权代表团时，原敬首相把在裁军问题上能够控制海军的人物加藤友三郎海相安排为首席全权代表，而配以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外务省次官埴原正直。在海军大臣离任期间，由原敬临时掌管海军大

315

---

① 有贺贞：《通过协调进行抑制—美国》，《日本政治学年报》，1969年，岩波书店，第22—23页。

② 濑川善信：《华盛顿裁军会议和日本》，《法学新报》（中央大学），第75卷，第3号，1968年，第66—67页。

③ 《宇垣日记》1，三铃书房，1968年，第349—350页。

④ 《原敬日记》，第9卷，第373页。

⑤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第800页。

臣事务，试图打开改变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的道路。致力于对美协调和外交一元化的原敬，在送走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之后不久，就倒在中冈的匕首之下，未能看到会议的前景。但日本全权代表团是按照他规定的外交路线行事的。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一开始，担任议长的美国国务卿休斯(Hughes,C.E.)就打破国际会议外交惯例，提出了具体的裁军方案。这是一个所谓爆炸性的提案，其内容是：(1)今后十年期间，一律放弃建造主力舰计划，包括目前正在建造的在内；(2)废弃一部分老朽军舰；(3)参照现有海军力量，决定主力舰的保存量，保存限度为，英美各五十万吨，日本三十万吨。他还指出了(应予废弃的)废舰及应予停止建造的具体舰名。英国全权代表白尔福(Balfour, A. J.)外相支持休斯的提案。日本海军专门委员加藤宽治中将等强烈主张对英美保持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明治以来，根据战史研究的结果，进攻舰队对迎击舰队必须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优势兵力；而防守舰队则必须对假定敌国的舰队保持相当于该舰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兵力。百分之七十的要求正是以海军内部的这种共同想法为基础的。但是，这个百分之七十的要求却未能被各国接受，日本不得不作出决断。加藤友三郎全权代表决心接受对美保持百分之六十的比例。促使他作出这种决断的是：即使假定日美发生战争，但"没有钱打不了仗"；这个钱的问题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结构上的矛盾，也就是说，它不能不依赖向战争对手美国借外债。加藤由此断定："结论是，日美战争是不可能的。"他总结说：以外交手段来避开战争，这才是目前形势下国防的真正途径①。

加藤提出，整个裁军协定期间，在太平洋水域的特定区域，不得建立或扩建新的海军基地，作为接受对美百分之六十的条件。休

① 《外务省的一百年》，上，第833页。

斯压制了美国海军部内对加藤提案的反对意见，强行缔结了《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在阿留申群岛、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区域，英国在香港及东经一百一十度以东区域均不建立或扩建海军基地。日本海军虽然在保有主力舰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在限制建设基地方面，则对必须防卫两大洋的美国和必须把舰队分散在全世界的英国确保了有利的地位。结果则是，日本舍其名而获其实。

316

十三　中国以及太平洋问题

华盛顿会议上，与裁军问题并列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和太平洋问题。出席这个会议的，除参加裁军会议的日、美、英、法、意五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总共九个有关国家。主持会议的美国的意图是，通过在中国确立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废除日英同盟，以摧毁日本在中国的优越地位，保障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体制。为了确立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主义原则，美国全权代表卢特提出：(1) 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2)提供机会以加强中国自主政府的发展；(3)商务实业机会均等；(4)废除损害中国和友邦权利的特权要求。加藤全权代表指明，所谓"行政的完整"是指与政治独立有关者而言，不涉及过去已许给各国的利益或特权，卢特对此点也表示同意。于是，(美国)提案被承认了。中国对收回主权充满期待，派来了大约一百名的庞大代表团，根据卢特四原则，要求取消势力范围。全权代表王宠惠在侵害中国独立和完整的诸条约中，首先举出依据二十一条要求所签订的条约及换文，要求予以废除。日本强烈反对把这个问题列为这次会议的议案。由于议长休斯的裁夺，二十一条问题的讨论暂时延期。

宣布暂缓讨论二十一条问题的休斯，在 1922 年 1 月16日和17

日的会议上，以引伸卢特四原则的形式提议，“在特定地区内，在有关商业及经济发展方面，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设定一般性的优越权”，亦即意欲不准设立势力圈，并重新审查既存的势力范围。休斯这个提案是试图全面调整（各国）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是关系到加藤全权代表就卢特四原则所质询的、已由中国许给的权益问题的提案。起来反驳的币原全权促使提案者承认：海·约翰的门户开放宣言本来是以中国存在着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为前提的，其适用地区也是限定了的；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有关商业和出口问题。接着，币原继续反驳说，因此，这个提案是把海·约翰的原则大大扩大了的新的定义；新的定义没有任何溯旧效力。币原对于否定特定地区中的概括的优越权虽未提出反对，但却表达了必须尊重根据条约的现存权益的立场。议长休斯姑且反驳说，他自己的提案是海·约翰原则提出以来，经过高平—卢特协定等多年被承认下来的，但对有关取消现存势力范围部分则表示可以保留，而对有关今后（势力范围）部分则要求采纳。这个主张获得通过。

被保留的既得权益问题，特别是暂缓讨论的二十一条要求问题，由于中国代表再次提出又发生争论。币原从维护条约所规定的权益的立场进行强辩说，1915年的条约是“自由主权国”的中国的“拥有正当权限”的全权代表所缔结的条约，对在本次会议中讨论这个正当的条约一再表示反对。但是，币原也担心中美两国的批判，就宣布：(1)新四国借款团组成时约定除外的满蒙三铁路及以租税作担保的借款的独占权可以向新借款团开放；(2)放弃在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3)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①。后来，币原作为政党内阁的外相而全面推行的、尊重条约规定之权益，否定地区的势力范围，外交前后相承主义的外交原 317

① 满铁经济调查会（编）：前引书，第365页。

则，其主要之点已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提出来了。日本在这次会议上放弃了在满蒙的许多既得权益，美国扩大了向满蒙输出资本的自由。卢特四原则和休斯决议案被列入《九国公约》①，其结果是，《石井—蓝辛协定》于1922年4月被废除了。

凡尔赛会议以来，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问题一起成为日中两国之间的最大悬案。由于美国的斡旋，在美英两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的日中会议上进行了激烈争论。中国要求无条件归还山东，日本反对。结果，决定中国用日本银行贷款赎回山东铁路，在清偿贷款以前，运输及会计交给日本人主管；山东铁路附属的煤井和矿山转让给日中合办的公司，在这些条件下，中国从日本接管胶州湾。至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和凡尔赛会议上本应获得的最大成果——山东铁路和矿山利权也放弃了或受到了限制。

对于美国来说，废除日英同盟，是为使华盛顿体制得以完成而务必要实现的任务，因为日英同盟承认在亚洲地区的相互特殊利益，一直是日本对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从1919年起，美国政府就向英国政府要求重新考虑日英同盟。在大英帝国内部也有两种意见对立。加拿大、印度和南非联邦主张废除同盟，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认为同盟是阻止日本侵略的保障，主张继续保留。大战以来，英国加深了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为了采纳美国的意见，并调整帝国内部意见的对立，就提出了日英美三国同盟的设想。美国主张把法国也加进来，便于1921年12月13日缔结《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四国条约》，② 实现了废弃日英同盟的主张。《四国条约》只约定，尊重太平洋地区的四国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侵害这种权利时，应进行协商；它和在亚洲大

① 《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65页。——译者

② 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736页。——译者

陆上互相承认特殊利益并具有攻守同盟性质的日英同盟，其性质是不同的。这样，日本就完全丧失了1902年以来一直恃以进行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

318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取得胜利。由1922年2月6日签定的裁军条约、九国公约等诸条约所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否定了大战期间日本以武力威胁为背景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地位，它是要通过经济竞争来较量帝国主义优劣的体系。因此，它是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相适应的体系。再则，华盛顿体系虽然首先标榜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但对于中国代表所提出的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除外国的军队、警察、邮政、电信等项要求，只是原则上得到承认，至于具体地全面收回权利，则委之于将来的讨论结果。仅就此一点来看，华盛顿体系也并未放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利权。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评论说，华盛顿体系是把以前各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侵略，变成了协同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处于生死关头①，表示了严峻的反对态度。

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丧失了大战期间趁火打劫所获得的许多权益。但是，华盛顿体系却为日本外交创造了抑制军部的专横独断的国际条件。怎样把这个国际条件变为国内体制而加以保证，并使之巩固下去，这是日本自由主义势力的课题。

十四　裁减军备

在日本，关于裁军的议论，在华盛顿会议以前就开始了。如果把国际联盟的建立和由国联所进行的裁军讨论看作是裁减军备的国际条件，那么，1920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则是其国内主要因

---

① 藤井昇三，《华盛顿体系与中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71年，第2号，《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联系》。有斐阁，1972年，第5页。译者补注：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素。大战期间，日本经济飞跃发展，国际收支盈余上升到二十八亿美元，但在1920年却遭到明治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产业都陷入了深刻危机，必须由政府或日本银行来救济才能整顿过来。日本经济已经经不起庞大的军事负担了。

在这种内外形势的背景下，犬养毅在1921年7月的国民党大会上提出了根据产业立国主义的裁军。他主张：在经济上，通过整顿财政和裁减军备来巩固产业立国的基础，以求在国际竞争上占据优越地位；在国际上，以裁军和产业主义来消除各国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误解；在军事上，为了准备国家总体战，平时应全力以赴地发展产业，缩短服役年限，削减常备师团，以增加生产劳动力。犬养毅的裁军论并不是立足于和平主义，而是一种立足于资产阶级合理主义观点的帝国主义裁军论[①]，企图调和经济与军事，以求日本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并为将来的总体战作准备。同年2月，尾崎行雄在第四十四届议会上提出《限制军备决议案》，展开了议会中的裁军辩论。尾崎主张，必须：（1）通过裁军来摆脱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2）削减阻碍教育、产业、交通发展的军费；（3）克服落后于时代的大舰巨炮主义。尾崎议案虽以三十八票对二百八十五票的悬殊被否决，却得到《东京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等自由主义言论界的支持。9月间，尾崎与岛田三郎、吉野作造及堀江归一为发起人组成裁军同志会，会中集结了许多政界、学界、言论界、劳动界中的大正年代的民主主义领导者。在为经济危机所苦的资产阶级中也发出了裁军的呼声。1921年3月，钟渊纺纱厂长武藤山治领导的大日本实业联合会开始了限制军备运动。

各界甚嚣尘上的裁军呼声，由于华盛顿会议的进展而势头愈

---

① 木坂顺一郎：《军部和民主主义》，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7年，第3号，《和平和战争的研究》，Ⅱ，有斐阁，1969年，第17页。

强。与华盛顿会议同时，在继承了原内阁的高桥内阁下召开的第四十五届议会，成了裁军和批判军部的议会。华盛顿会议决定裁减海军军备后，要求裁军的锋芒就集中指向了陆军。宪政会在1922年1月19日的第六次大会上，从整顿财政观点出发，决议坚决裁减陆军。1月28日，尾崎行雄和岛田三郎在议会上提出了包括十三个项目的《关于海陆军备及特例的质问书》：关于海军，要求把裁军会议上决定的主力舰三十万吨再裁减一半，并削减辅助舰；关于陆军，主张把现有二十一个师团大幅度地削减一半，并质问政府有无实行之意。接着，2月7日，高桥内阁的执政党政友会领袖大冈育造提出了《整顿并缩减陆军的建议案》；国民党提出了《关于缩减陆军军备的决议案》，其内容包括把现有师团裁减一半，并把步兵服役年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不过，大冈的建议并不是"为了减少国防力量"，而是从战争胜败取决于国民经济力和现代武器出发，主张为了扶植产业和军队现代化必须裁军。除了以总体战体制为论据的裁军论以外，第四十五届议会讨论中还提出了新的裁军论据。尾崎等人提出的《质问书》断言：由于陆军所设想的假想敌国——俄国的崩溃，二十一个师团之多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认为无事可做的大军，对内阻碍教育和产业的发展，对外招致各国的猜疑，反而使国家陷于危殆。尾崎等人举出兵西伯利亚为例而进行弹劾说，"徒耗六亿日元国帑，招致全世界非难。而遭受侵略主义、两重外交之恶评等，亦皆备置毫无必要之大军之结果"。[①] 国民党的犬养毅和在讨论中赞成国民党议案的宪政会的下冈忠治也以俄国崩溃为根据，主张裁减陆军。2月7日提出的两个裁军议案，交给各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归纳成统一建议案，把步兵服役期间缩短为一年四个月，并削减经费四千万日元，于3月23日在众议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3卷，第655，1209页。

院以压倒多数通过。裁军成为议会的一致呼声。

高桥内阁因政友会内部纠纷而崩溃，继任的加藤友三郎内阁于1922年6月12日成立，裁军就由继任内阁之手来实行。加藤内阁首先根据华盛顿条约，断然废弃现存主力舰十四艘，并停止五艘的建造，对海军省部进行"统、废、合"（统一、废止、合并——译者），整理军港，官兵退伍约七千五百人，裁减海军工厂工人一万四千名。对裁军十分消极的陆军，由于遭到国会内外的批判，陆相山梨半造也削减官兵五万六千名和马匹一万三千头，节减经费两千三百万日元，服役年限缩短了四十日。但山梨的裁军是与新设机关枪队、野战重炮队和航空队，由此着手实行机械化和现代化同时进行的。

320

十五　军制改革问题和对双重外交的批判

第四十五届帝国议会是要求裁军的议会，同时也是强烈批判军部的议会。在帝国议会史上，如果说，以纠缠于增设两个师团问题而对帷幄上奏权展开争论的1913年第三十届议会是批判军部大臣由武官担任制度的第一个高峰，那么，1922年的第四十五届议会就是第二个高峰。这届议会不仅对军部大臣由武官担任的制度，而且对统帅权独立，以及支持军部特权地位的军制都进行了全面批判。上面提到的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的《关于海陆军备及特例的质问书》就列举八点，对保证军部特权地位的各种制度进行了弹劾，并质问政府是否有意从立宪主义立场出发改革此类制度。《质问书》第一点，把批判锋芒指向统帅权独立，指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完全违反我国宪法条文的规定，事实上是在内阁之外还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军事内阁"，正如在出兵西伯利亚中所看到的，形成了外交、军事"政出双门的状态"。第二点，指责军部大臣由武官担任的制度是"违反官制条例和各国实例"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制度"。第三点，指出帷幄上奏权违背宪法第五十五条等规定。宪法第五

十五条规定：国务各大臣在一切国务方面辅弼天皇，负其责任。第四点，指责1907年9月军令第一号是“使陆海军掌握了一种可以和天皇一般敕令相对立的法律上的一大特权”。第五点，举出直属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四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到四十一个。第六点，现役七年以上陆军准士官无须考试即可任用为判任[①]文官等特权。第七点，指出陆军薪饷不受会计检查院监督的特权。第八点，弹劾军人犯罪由军法会议处理是“一种治外法权”。《质问书》强烈要求政府对上述各点进行改革[②]。作为议会政党人士对军部、军制的批判，尾崎等的《质问书》是最完整而彻底的。在原内阁时期高桥是清曾首倡参谋本部废止论。那次也许是受到军部的牵制，比起这个《质问书》来，却完全表现了一副消极的态度。高桥说，“现时尚不见有些质问的味道，但将来随着形势的推移，难保不无要作适当的修改”[③]。但是，这次对军部的批判在议会中继续进行。大冈育造在前述裁减陆军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宪政之下而有所谓帷幄上奏，实在不可思议”，接着，2月28日，宪政会的野村嘉六代表三十名赞成者，根据原敬、内田康哉、高桥是清三位首相都曾在海军大臣离职期间顺利代行职权管理事务这一事实，就改革军部大臣武官担任制的必要性向政府提出了质询[④]。3月6日，曾在 321 1919年第四十一届议会上从发展宪政立场出发，主张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和殖民地长官武官制的国民党的植原悦二郎与西村丹一郎及另外一人提出了《关于任用陆海军大臣的官制改革建议案》。此案的特征在于强调裁减军备和军制改革是不可分的，认为若不

① 判任：日本旧文官官制，一至二等为敕任、三至九等为奏任、其下为判任，相当于我国解放前的委任。——译者

②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3卷，第1210—1211页。

③ 同上，第1211页。

④ 同上，第656，837页。

能改革军制，"则我国国力所要求及我全体国民所希望之陆海军的整顿皆不可能"①。这个建议案也同裁军决议案一样，提交委员会，作为要求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的建议案而付诸表决，并在本届议会上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

与议会的动向相呼应，在议会外展开全面改革军制论的，是早就对军部干预外交进行批判的吉野作造。1921年3月，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从双重政府到双重日本》一文中，就已经指出，造成日本外交混乱的双重外交，其主要原因在于统帅权的不应有的扩大；1922年2月13日起，在《东京朝日新闻》五次连载的《论所谓帷幄上奏》一文中发挥了全面改革军制的理论。吉野批判军部独断军务，并侵害外交和其他行政。为了把国政统一到内阁里，他进而论述说：第一，废除"军令"，即废除有关军队统帅事项不经内阁和法制局审查而能发布命令的规定；第二，军部大臣武官担任制牵制总理大臣，其地位宛如弱小国家中的外国顾问，应予废除；第三，改革在内阁外行使国防用兵最高最终权力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第四，必须修改内阁官制第七条中有关军机军令由军部大臣独断的规定。面对议会内外日益高涨的批判，陆军于2月19日在各报发表《帷幄上奏辩》一文，从天皇是陆海军大元帅的前提出发，正颜厉色地进行强辩说："将有关统帅的直属任务与一般政务分开，按照我国国体乃属理所当然"，军部"不可能蹂躏内阁总理大臣职权"。

7月，在批判军部高潮中，加藤友三郎内阁指出，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政府或军阀的军事顾问，造成"极端双重外交"，并作出决定，要求陆军予以纠正②。在裁军和普遍批判军部呼声的压力下，军部的政治地位明显地降低了，双重外交也受到一定的约束。但是，对于已经成为批判对象的军制，军部则绝对不容改革，政府也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3卷，第948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25—26页。

无法插手。这就为军部在政治上卷土重来保存了地盘，未能消除双重外交的根源。在海军方面，在华盛顿会议上吃了败仗的加藤宽治军令部次长着手修改军令部条例，拟把兵力决定事项定为军令部长的规划事项①。1922年2月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把美国列为第一个假想敌国，原定对美战争时初战进攻目标吕宋岛，现在则又加上了关岛；并把决战战线从西南诸岛推进到小笠原群岛，把前哨线从小笠原群岛推进到南洋委任统治诸岛；并决定海军所需兵力 322 以战舰十艘、重巡洋舰十二艘、航空队十二个为基干②。军部虽然后退了一步，但死守堡垒以反击华盛顿体系和支持该体系的国内体制。

---

① 木坂，前引论文，第27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I，朝日新闻社，1967 年，第 32 页。

323

第十章　政党政治和外交

(1921—1929)

第一节　日苏交涉

一　大连会议

1920年4月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政府，接到前述同年5月大井派遣军司令官的撤兵条件声明之后，不断向日本提出撤兵和开始通商的要求。1920年12月和1921年3月，远东共和国外交次长苛捷夫尼科夫(Kozhevnikov, I. S.)曾先后两次向海参崴(日本)驻军司令部政务部建议缔结通商条约。1921年3月，英国首先与苏维埃缔结了通商暂行协定，此后，各国也开始同苏维埃进行谈判。在这种趋势下，原内阁担心，日本如果无视苏维埃政府和远东共和国关于谈判的再三建议，反而会使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经济扩张落于各国之后。于是，在5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接受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建议。内阁会议决定的谈判条件是：(1)在远东共和国内切实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2)禁止过激派在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宣传，取缔共和国境内朝鲜人的"不法行动"；(3)尊重日本及日本人条约上规定的权利和既得权益；(4)对外国人给予出入国境、居住、从事商业、工业、交通、沿海贸易的自由以及土地所有权或土地永租权；(5)撤除军事要塞设备，使海参崴商港化；(6)延期处理尼港(庙街)事件等。关于撤兵问题，则以"消除对朝鲜、满洲的威胁和保证居留民及交通之安全"为条件，决定首先进行非正式谈判。

6月8日至7月20日，两国政府的非正式谈判在哈尔滨举行，双方代表是岛田滋副领事和苟捷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方面对协定内容表示了下列意向：(1)两国相互约束宣传；(2)允许日本国民在共和国主要城市享有六十年的土地租借权；(3)修改渔业协定；(4)(对日本)给予森林及北库页岛的利权；(5)收买松花、黑龙两江的日本人所有船舶；(6)接受日本贷款；(7)俄国在日本的官厅或公共建筑物、财产、船舶移交给共和国；(8)撤退日军等，并要求从8月18日起在大连开始正式会谈。政府认为此种意向大部接近日本的希望。但是，陆军对撇开其所支持的麦尔库洛夫政权而单独同共和国进行谈判表示反对，主张同共和国和麦尔库洛夫两政府同时进行谈判，并把两者合而为一，企图以此保存反革命势力。在7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政府断定，麦尔库洛夫和谢苗诺夫的势力在日本撤兵后将会衰落，如果接受陆军的主张脚踩两只船，必将招致俄国人及各国的猜疑，反而会使日本的立场不利，决定按既定方针进行谈判。

这次会谈自8月26日开始。日本方面的代表先由派遣军司令部政务部长松平恒雄担任，不久改为继任政务部长松岛肇。共和国方面也是先由尤林外长，后改为代理首相彼得洛夫担任。9月6日，共和国方面提出了二十九条协定草案，9月26日，日本提出了十七条草案。共和国草案在关于居住、旅行、通商、航海、通信、外交等方面几乎都以双方平等为原则，除给日本企业提供居留地外，没有规定对日本提供特殊利权。而且要求日军立即撤退，至迟在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以内撤退完毕。日本的草案则基本上根据5月阁议决定的方针，但却提出要中国政府承认黑龙江和松花江的航行自由；禁止远东共和国在朝鲜满洲边界上的军事行动；租借北库页岛八十年作为尼港事件的补偿等项要求，并提出，要以(1)日本一旦与第三国交战，共和国应严守中立；(2)在滨海州秩序稳定后 324

撤兵；(3)北库页岛自开始租借后，始从该地撤兵等三项内容作为秘密协定，态度极其强硬。

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完全对立，会谈中断了。到了11月，麦尔库洛夫政权在日军支持下对共和国发动进攻。面临麦尔库洛夫政权进攻的远东共和国，要求苏维埃代表参加会谈和日军全部从西伯利亚撤退及明确规定撤退期限。接着，共和国向华盛顿会议提出控诉，说日本正图谋使西伯利亚殖民地化，要求参加会谈。美国代表休斯在华盛顿会议上谴责日本拒不撤兵和占领北库页岛，并认为日本此种侵害俄罗斯政治及领土主权的行动绝不能承认。日本的西伯利亚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它在国际上的孤立。

1922年3月，双方除撤兵问题和向日本提供利权问题外，就相互权利和通商问题达成了十六条协议。但到了1922年，远东共和国击退了麦尔库洛夫的进攻，4月初，提请日军不要妨碍共和国军进入海参崴。陆军对此表示强烈反对。4月4日，政府决定继续驻兵海参崴，共和国若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停止谈判。4月16日，大连会谈决裂。决裂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坚持驻兵和日本驻军无视政府的方针支持麦尔库洛夫政权。

二　西伯利亚撤兵和长春会谈

大连会谈期间，国内要求从西伯利亚撤兵的呼声日趋高涨。在1922年的第四十五届议会上，和尾崎行雄的严厉批判出兵相呼应，宪政会的正木照藏在外交质问中质询政府说："自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已三年有半，耗资六、七亿日元，牺牲三千多人，所得者何？外招各国猜疑和俄国人之怨恨，内遭国民抱怨，如是而已"①，宪政会的早速整尔在提出临时军事费问题时，斥责出兵西

325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3卷，第580页。

伯利亚有害无益，指出“姑不论外交上是否必要，仅从财政观点而言，如此巨额经费负担，今日实已势不能忍”。要求撤销临时军事费①。

此时，由于尼港事件的影响而一时低沉的群众性要求西伯利亚撤兵运动再度高涨起来。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过反战组织“光明”②的小牧近江，在1921年10月创刊的《播种者》杂志上，呼吁救济俄国饥荒。由于大战和干涉战争的结果，俄国土地完全荒芜，农产品的生产减少了一半，加上1920年的歉收，遭到深刻的粮食危机。11月28日，东京府地区三十六个劳动团体和思想团体的代表响应小牧的呼吁，组成俄罗斯饥荒同情劳动会，不畏镇压，开始了救援活动。对革命俄罗斯的同情表现为具体的行动。从1922年1月开始，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创办的《前卫》杂志，每期都号召救援募捐，至同年11月已募集了约八千日元的救援金。干涉战争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救援活动就发动了反对干涉战争运动。4月，伦敦的对俄不干涉委员会向总同盟的铃木文治和松冈驹吉发出了促进日军从西伯利亚撤退的强烈要求。5月28日，总同盟在中央委员会上作出决定，要求不干涉苏联，开始通商，并将此项决议提交政府当局。6月，总同盟等二十五个劳动团体和思想团体组成“对俄不干涉同盟会”，提出立即撤退驻俄日军，开始通商贸易，救济饥荒的口号，开展了募捐运动和演说会。接着，9月间，对俄不干涉关西同盟会成立。5月的国际劳动节和10月召开的总同盟大会，都通过决议要求承认工农俄国。以劳动团体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在4月间召开的讨论苏维埃和帝国主义各国经济交流的日内瓦会议和大连会谈等形势下，扩大了对苏不干涉运动，走在其他各

---

①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3卷，第637页。

② “光明”：法文Clart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作家、人民战线首倡者巴尔布斯(Henri Barbusse)发起的国际和平运动组织。——译者

阶层前列提出了承认工农俄国的要求。

由于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等围绕苏维埃发生的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国内日趋高涨的撤兵要求，使日本继续驻兵已不可能。加藤友三郎内阁成立后，1922年6月12日，远东共和国通过国家通讯社"远东共和国通讯社"的安东诺夫（Antonov, V. G.）向日本政府提议恢复谈判，其条件是：苏维埃政府代表参加谈判和日本明确表示全部撤完西伯利亚驻军的日期。6月23日，加藤内阁判断，"鉴于内外形势，西伯利亚撤兵势难拖延；尤其一旦外国提议强逼撤兵，帝国政府之处境将愈加困窘。"因而决定全部驻军于10月底撤退完毕。撤兵从8月15日开始。与决定撤兵的同时，加藤内阁接受了共和国恢复谈判的提议，并同意苏维埃代表参加谈判。政府的打算是，以实行撤兵为由，争取有利条件，并让苏维埃政府也承认这些条件。

326 1922年4月起，谈判在长春恢复。欧美局长松平恒雄被任命为日本代表，远东共和国的代表则是后来担任驻东京代表的忠松（Jonson），苏维埃政府派来越飞（Aoffe, A.）参加谈判。日本方面打算先以大连会议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为基础，同共和国缔结基本协定，然后再就渔业协定，黑龙、松花两江通航问题，以及尼港问题等悬案进行谈判。具有首席全权代表资格的越飞，由于谈判已对苏维埃立场有利，就主张不以大连会议为前提，讨论范围不仅限于远东，而应扩大到整个俄国，包括欧洲部分。日本方面则宣称，与共和国达成协定后，即继续同苏维埃谈判通商协定，于是，双方进入谈判。越飞又进而要求明确表示北库页岛的撤兵期限，谈判便搁浅了，9月25日很快就决裂了。

已经开始的滨海州撤兵，于10月25日撤退完毕，共和国军队进驻了海参崴。11月14日，远东共和国决定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承认。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成立。结果是日本只能以苏联政府为谈判的对手，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承认苏联政府为俄国正统政府为前提了。日本又被赶进了死胡同。

三　越飞访日

长春会议决裂后，越飞立即前往北京和上海，开始了同中国建交的活动。1919 年 7 月，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宣布放弃沙皇俄国的既得权利。1920年后，双方互派外交使节，继续进行调整两国关系的会谈。1923 年 1 月 26 日，越飞在上海与孙文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就废除旧条约问题进行协商；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孙文同意苏军在外蒙古驻扎。身为东京市长，又是日俄协会会长的后藤新平，对中苏谈判的进展焦虑不安，为使日苏交涉走上轨道，取得加藤友三郎首相的默许，向越飞发出了邀请书。对此，内田外相以及松平欧美局长和小幡驻华公使等外务省首脑，根据同各国保持协调的方针，对日本抢在各国前头承认苏联一事表示消极，因而企图阻止越飞访日。内田外相让上海代理总领事田中文一郎以“身边危险”为理由，劝告越飞中止访日。越飞拒绝劝告，于 1 月 27 日从上海出发，2 月 1 日来到东京。日本官宪在越飞外出时检查他的携带物品，并禁止他使用密码电报等，拒不承认其外交特权。

后藤在给加藤首相的备忘录和向日俄协会总裁闲院宫载仁提出的《日俄协会会长辞呈》中，严厉批判了官宪的做法，并剀切说明了日苏谈判在日本外交上所具有的意义。他说：当此“英美两国喧嚷排日，与邻邦中国之关系亦颇呈险恶”之时，如果中苏关系密切起来，则将是“帝国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政策上一大失算，于对美政策也影响非小”。他对此担忧，认为打破这种困境，刷新日本外交的途径，就在于抢在各国前头建立日苏邦交。提议“今日果幸而对俄达成协议，各自约定疆域，实现彼此合作，则俄国势力所到之

327 处，可以控制中国的轻举妄动，可以防御美国的暗中活动，果尔则将恢复日俄协约的效用，并可兼收取代日英同盟的功用，一箭双雕，实是上策中的上策"[1]。以日苏合作为核心的后藤的新设想，乃是他一贯主张的新旧大陆对峙论在新形势下的再版，这种设想无非是向华盛顿体系的挑战。

尽管外务省首脑态度消极，并遭到官宪的阻碍，越飞访日仍然激起了促进对苏邦交的社会舆论。政友会虽认为承认苏联为时尚早，但革新俱乐部却主张立即承认苏联，宪政会的少壮派主张先承认苏联再缔结通商协定。无党派的安藤正纯在议会上向政府建议说，越飞访日是建立日苏邦交的良机。在实业界，同北洋渔业有实利关系的人也对日苏渔业谈判成功寄托希望，苦于1920年以来的萧条和对华贸易衰退的实业界，则对西伯利亚市场寄予期望。东京商工会议所长藤山雷太要求政府立即缔结日苏通商条约。2月22日，海军省向外务省提出了《关于迅速决定国防上对俄紧急方针的海军省意见》，对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已取得北库页岛油田利权一事提请注意[2]，并提议为获得北库页岛的石油，日本应缔结通商条约，必要时不妨正式承认苏联。

在日苏建交的社会舆论高潮中，3月7日，越飞向后藤以书面提出了日苏谈判的三项基本条件：(1)谈判中的相互平等原则；(2)正式承认苏联；(3)明确规定从北库页岛撤兵的期限。政府对此表示：第一条原则上同意；关于承认苏联一事则以解决尼港事件和履行旧俄国政府签署的旧条约和债务为前提；库页岛撤兵也有待于该事件解决之后。坚守过去的方针，不肯前进一步。

---

① 《后藤新平》，第4卷，第417，426—427页。

② 指1921年5月14日辛克莱石油公司与远东共和国所签订的关于开发北库页岛油田的草约。日本对此进行了阻挠。其后，苏联政府亦未批准此约。参阅马士和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655页。——译者

但是，苏维埃政权统一西伯利亚以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处境顿形恶化。1923年3月2日，苏维埃政府通告，苏维埃联盟成立以前的所有渔业条约一律废除。3月6日搭乘凤山丸轮船到达海参崴的日本旅客，以没有护照为理由，被拒绝登陆。还有，4月13日，禁止海参崴日本领事馆使用密码电报。日本已经被迫陷入如不同苏联建交，日本人在滨海州地区就无法进行活动的境地。4月20日，内田外相向后藤转达政府有意开始第三次日苏谈判。政府决定，如果苏维埃政府对解决尼港事件和履行国际义务表示足够的诚意，则无妨承认苏联。这一决定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基本方针。但通过后藤和越飞的会谈，苏维埃政府也于5月6日通知越飞，表示同意进行第三次会谈，并同意越飞进行正式的预备性会谈。于是，政府停止了后藤—越飞的会谈，而任命驻波兰公使川上俊彦担任谈判代表。川上—越飞会谈于6月28日在东京开始。越飞坚持以前提出的承认苏联和明确库页岛撤兵期限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川上则要求苏联对尼港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收买北库页岛或者给予长期开发石油、煤、森林的利权；履行国际义务等。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7月31日谈判停止。8月1日越飞起身归国。 328

四　日苏基本条约

1923年8月23日，加藤友三郎首相突然死去，9月1日，第二届山本权兵卫内阁在突然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混乱之中成立。与山本同属萨派的伊集院彦吉担任外相，内相则由后藤新平担任。在日苏谈判问题上对山本内阁的期待增强了。但是满载着救济震灾物资驶入日本港口的苏联船《列宁号》却被山本内阁逐回去了。代替越飞作为远东全权代表来到北京的加拉罕(Karakhan, L.M.)，于10月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表示希望开始正式谈判，但外务

省欧美局长广田弘毅和欧美局第一科科长东乡重德认为，在此遭受震灾、国力虚弱之时，日本轻易同意谈判，会给苏联以可乘之机，仍然没有积极的表示。内阁内部对于谈判的时间和条件意见也不一致，便推迟了答复。

1923年12月，山本内阁因对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狙击摄政宫（裕仁）的虎门事件引咎而倒台。1924年1月，脱胎于贵族院的清浦奎吾内阁成立。这时日苏关系的形势，对日本更加严峻。由于从1921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苏联恢复了经济上的稳定，苏联周围的邻国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土耳其、波斯相继承认了苏联。接着，从2月到3月，英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等国也承认了苏联。在中国，鲍罗廷(Borodin,A.P.)担任了国民党顾问，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共合作。特别是，3月底，中苏两国建交协定已接近达成，虽有美法两国一时阻碍，仍于5月底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所担忧的中国领了先，在对苏交涉问题上，日本明显地在国际上落后了。加之，由于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日美关系极度恶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松井庆四郎外相命令芳泽公使和加拉罕开始进行谈判。松井外相3月15日给芳泽公使的训令显示出若干让步的色彩：关于长期以来成为障碍的尼港事件只要求苏维埃政府以书面表示歉意，有关该事件的赔偿问题则以许给北库页岛及其他长期利权来解决；关于履行条约义务问题，不要求所有条约，只要求朴茨茅斯条约继续存在，并以提供北库页岛及东部西伯利亚的利权来抵消旧债务；如果这个条件和其他两三个条件取得完全谅解，日本就从北库页岛撤兵并承认苏联。经过数次交涉，5月5日，加拉罕要求开始正式谈判。政府任命芳泽为全权代表。5月15日，芳泽和加拉

329 罕在北京开始正式谈判。

这时，国内掀起了反对清浦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宪政会、

政友会以及革新俱乐部等护宪三派，在5月10日的选举中获得大胜。清浦内阁总辞职。6月11日，成立了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护宪三派联合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时期出现了。执行政党政治外交政策的是职业外交官、在华盛顿会议上担任过全权大使的币原喜重郎。

日苏谈判是护宪内阁从前届内阁接过来的重要外交课题。加藤和币原相配合，主要着眼于恢复邦交，批判过去的交涉大部都是着眼于谋求获得各方面的利权，并提出了揣度对方意向，采取"以从国家大局出发，贯彻主要要求为基础，其他问题必须由外交负责人相机处理"的现实主义方针①。7月24日，内阁决定了对苏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关于尼港事件不要求书面道歉，只要有歉意的表示即可；（2）对库页岛的利权，并不是作为尼港事件的赔偿，而是从对北库页岛的特殊经济关系观点出发提出要求；该地经营所获收益与苏联分享；（3）谈判成功后两个月以内尽速撤兵。这一方案比之以往的高压态度，是一个考虑了同日苏关系有关的形势的具有现实性的方案。

尽管这样，芳泽—加拉罕谈判在撤兵和北库页岛利权问题上还是难以进展。苏维埃方面要求协定达成后两周内撤兵，关于提供北库页岛油田利权，苏联虽从促进日军撤退和开发资源着想而予以同意，但日本方面要求提供油田的百分之六十，苏联则只同意给百分之四十。谈判一度停顿。1924年底，双方开始趋向妥协，1925年1月20日，签订了日苏基本条约（《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②和两个议定书。

基本条约规定了下述内容：（1）两国建立外交关系；（2）朴茨茅斯条约应仍有效，修改或废除其他条约；（3）修改渔业协定；

① 《加藤高明》，下卷，第608，610—612页。

② 简称《苏日北京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129，页。——译者

（4）在通商航海条约缔结前，保证居住、旅行的自由，保护生命财产；（5）停止相互宣传；（6）有关提供开发苏联领域内各种资源的利权等。在两个议定书中，双方进一步议定：（1）以1925年5月15日为期，日军从北库页岛撤退；（2）在四十至五十年内向日本提供北库页岛油田百分之五十的开发权，日本方面偿付总产量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作为报酬；（3）同样地，在四十至五十年内，在特定地区提供煤矿开发权，并由日本方面偿付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的报酬等。

出兵西伯利亚长达六年半以上的岁月，耗费七亿日元以上的国帑，付出大量人员的伤亡，由于日苏基本条约和议定书的签订，才算好不容易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侵略企图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军部依恃统帅权独立，一意孤行，日益与苏维埃全体人民为敌，结果是，即使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也没有抓住条件比较有利的时机而收场。后藤新平从新旧大陆对峙论立场出发，曾经为干涉战争摇旗呐喊，看到败局已定又摇身一变，布置日苏谈判，他说："今后，日俄两国国民若能密切其友好关系，则不仅能增进两国国民福利，完成欧亚民族共存共荣之大义，且日本之太平洋政策亦可赖以确立。"[①] 后藤所主张的"日苏亲善"也并非出自对其亲身表演的侵略政策之深刻自我批判，而只是借以确立帝国主义的太平洋政策，以对抗华盛顿体系的一种策略。真正保障日苏亲善的道路，仍在于建立能够控制此种帝国主义内外政策的力量和体制。

330

五　恢复日苏邦交和治安维持法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恢复日苏邦交，与此同时，着手建立对批

① 后藤新平：《日俄复交和太平洋政策的确立》，《外交时报》，第485号，1925年2月，第38页。

判天皇制国家及其帝国主义内外政策的言论和行动实行镇压的体制。俄国革命以后，他们对于共产主义蔓延到朝鲜、满洲，十分害怕，更不用说日本了。1919年，原敬内阁支持高尔察克、参与推翻苏维埃政权时，在其动机的背景中，已经有了对1918年"米骚动"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恐慌感[1]。1920年以后，日本单独驻兵西伯利亚的主要理由，以及日苏谈判中日本政府一贯要求禁止在日本和朝鲜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都是基于这种恐慌感。面对内外迫近的危机，日本统治集团在"三一"事件时制定了《政治犯罪处罚条令》，终于流产；在第四十五届议会上又把《取缔过激社会运动法案》提上议程；关东大地震时又公布《维持治安罚则》的敕令等等，着力整顿治安体制。但是，1923年12月的虎之门事件[2]、1924年至1925年不敬罪[3]激增以及通过护宪三派内阁制定普选法的趋势，使日本统治集团中从根本上确立治安体制的要求增强了。法务省和内务省从1924年年初起，就开始制定新的治安立法法案。

日苏恢复邦交，统治集团对共产主义渗透和扩展的恐慌感又加深了一层。虽然日苏两国在基本条约第五条中议定禁止相互宣传和破坏活动及对此类活动的支持，但日本统治集团并不认为这个协议能够抑制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在日本的渗透和扩展。从1925年2月12日起，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对日苏基本条约连续审议三次，集中讨论了第五条能否保证防止朝鲜独立运动和第三国际渗透问题。审查委员会总结报告提出："禁止宣传过激思想乃本次协定最重要事项之一，关系帝国利害至为密切，……如第三国际

---

① 细谷千博，前引文，第50—51页。

② 虎之门事件：即难波大助阻击摄政宫事件。——译者

③ 不敬罪：指危害皇室（包括天皇、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太孙以及神宫、皇陵）的言论和行动。——译者

运动之类活动，即按当局之见解，亦正属于应予禁止之列”，要求
331 “当局务须使俄国考虑协定之精神，忠实履行此种义务”。报告同时还强调指出：“严密警惕，采取最切实有效之措施，以取缔我国国内不稳思想之传布，犹属不胜切盼者也。”①

由于日苏建交而对治安心怀恐惧，这一点加藤护宪内阁也是一样。2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相在向第五十届议会提出治安维持法案的提案说明中指出，在近年显著发展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部分人与其外国某些同道共谋，或领得海外资金，策谋推行过激运动。”认为日苏建交的结果，“彼此来往频繁，将使过激运动分子获得各种机会。”② 2月23日，在众议院治安维持法案委员会上，小川平吉法相也陈述了同样见解。对日本统治集团来说，日苏建交是他们制定维持治安法的重要根据之一。

对此，站在反对治安维持法运动前列的核心力量是工人团体。1925年1月12日，总同盟关东地方评议会所属关东印刷工人会，获知准备法案动向后，首先作出决议表示反对。接着，总同盟、官业（政府企业——译者）劳动总同盟等巨大组织表明了反对的态度，1月30日，在关东地区集结了大约六十个劳动、无产者团体，组成了反对恶法同盟会。在关西地区，总同盟大阪联合会和日本工会联合会成了推动反对（恶法）运动的核心。2月11日以东京为中心，2月15日以大阪为中心，其后以提出法案的2月19日为高潮，各工人团体在全国主要城市展开了街头游行、演说、向众议院议员作工作等多种形式的反对运动。各种工人团体在反对治安维持法的口号下采取统一行动，并以此为中心集结农民、未解放部

① 小林幸男：《日苏基本条约第五条和治安维持法》，《人文学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10号，1959年3月，第162页。

② 《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5卷，第1141页。

落民①、朝鲜人等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这次反对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②

在过去曾经劲头十足地反对取缔过激社会运动法案的舆论界中，除《东京朝日新闻》外，此次一般反应是低沉的。但群众运动高涨、议院内自由主义议员的反对运动活跃起来以后，记者中的有志之士组成反对治安维持法记者同盟，通过坚决反对治安维持法的决议，并联合反对派议员开始了行动。在议院中，有革新俱乐部的清濑一郎、星岛二郎，宪政会的山桝仪重、中野正刚，政友会的山口政二等人反对法案，并向政府提出严厉质询，但治安维持法案仍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

治安维持法规定：取缔一切主张变革国体及否认私有财产制度的结社、运动及思想，对此处以十年以下徒刑或监禁，这就不仅是以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取缔对象，而是要镇压一切批判天皇制权力和日本帝国主义内外政策的思想或运动；它不仅阻碍日 332 苏亲善，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众目所瞩的新外交的主要精神，即由人民管理外交的道路也完全被堵死了。

第二节　币原外交

六　国际协调路线

护宪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外交，虽以币原之名称为“币原外交”，但其胚胎则形成于原敬的国际协调外交。原敬内阁的外交是，为了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

① 未解放部落民：指封建制度下，无居住、职业、婚姻的自由，生活极端恶劣的一些特定地区的人民。明治维新以后，虽在法律上获得解放，但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仍受歧视，迄今仍为日本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译者

② 木坂顺一郎：《反对治安维持法运动》上，《日本史研究》，第117号，第18，21页。

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的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特别把对美协调作为国际政策的核心。一面对美保持协调，一面用资产阶级的合理方法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原敬的这种外交是适应华盛顿体系的外交。币原由于担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为建立华盛顿体系出过力。他对"特殊权益"所作的那种特殊解释成了他作为适应华盛顿体系外交的要角而登场的护身符。华盛顿会议是在原敬内阁时期召开的，其闭会则是在原敬惨死之后接替政友会内阁的高桥内阁时期。这次会议签订了一系列条约，高桥内阁固不待言，就是继任的加藤（友三郎）、山本、清浦各届内阁也不能公开拿出显然违背国际樊篱即所谓华盛顿体系的对外路线。即便是号称最反动的清浦内阁，其外相松井庆四郎在第四十八届议会上也曾强调说：政府"十分尊重华盛顿会议所议定之各项条约及决议之精神，有意制定对华政策方面之必要措施"，"为此，应着重于国际协调，此固无须申述。"① 不过，清浦内阁所谓对华政策的"必要措施"，是从日中特殊关系出发，在认为必要时，"以自主的态度采取机宜的措施"，也就是在必要时要考虑对利害攸关的铁路警备等供给武器。尤其是对满洲地区，不仅对南满，而且要向北满采取"重新开辟前进道路之方针"，为此要支持张作霖，"在自卫上认为必要时采取机宜措施"②。清浦内阁表面上口称尊重华盛顿会议精神，但并没有放弃把满洲看作日本势力范围的想法。

币原喜重郎自1896年进入外务省，在以对美英保持协调为至上的外务省中，他是主流派；他与岩崎弥之助的最小女儿雅子结婚，和加藤高明成了连襟。1922年底，他以驻美大使为最后职务退出官界③，就任了护宪内阁的外相。作为外交的主张，他坚持外

① 币原和平财团：《币原喜重郎》，1955年，第256—257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页。

③ 官界：指职业官僚。——译者

交前后相承主义。所谓外交政策前后相承主义，按照币原自己的说法就是“一国政府公开对外国所作的约定，不管是否依据条约，也不论政府或内阁有何更迭，也不得因此种更迭而变更”。这种想法乃是十九世纪的外交观念。尼科松指出：“在第一次大战前”，亦即在十九世纪“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建立在始终不变的国家的、帝国的必要性上的，因此，这里就有一种认为外交是处于党争之外的假定”①。新外交产生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战争目的”进行激烈论争之中，而币原的外交观念却不是新外交而是十九世纪性的东西。他当了护宪内阁的外相，却不加入政党，也正是由于这种外交政策前后相承主义。他在政治见解上和宪政会总裁、又是护宪内阁首相的加藤高明接近，因而接近宪政会，但他却没有加入宪政会，也没有当众议院议员。1927 年，随着宪政会内阁的崩溃，他辞去外相之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宪政会系的同成会劝他入会，他不加入，反而加入了中立系的同和会，此中缘由还是在于外交政策前后相承主义，在于不可偏于一党一派的信念。

338

出任外相的币原以明确的形式摆出了适应华盛顿体系的外交方针。1924 年 6 月，他在大臣特任仪式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讲了协调外交的决心。他强调：“权谋术数之策略以及侵略性政策之时代现已完全过去，外交在于踏着正义和平的大道前进”，并在结论中说：“总之，日本将遵循并扩充巴黎和约及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诸决议等所明示或暗示的崇高精神，努力完成帝国的使命”②。接着，在 7 月间第四十九届议会的外交演说中，阐明他的外交原则：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以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

---

① H. 尼科松：前引书，第 2 页。

② 《币原喜重郎》，第 259 页。

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①。

币原所谓的"正当的权益"，不是在特定区域图谋排他性的独占势力范围，而是以条约为依据的权益；至于规定该项权益的条约是否在"正当"条件下缔结的，则是次要问题。维护这种权益正是币原所列举的各项外交原则的根本目的，而同各国保持协调和不干涉中国内政则是为了有效地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正如他在第五十届议会所说的，就是"中国由任何人掌握政权，以及采用何种宪法制度，吾人均无意滥加干涉"。② 这里包含两重意思：一方面是不干涉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内争，另一方面 334 是不干涉中国行使主权。这种不干涉主义，是鉴于日本在大战期间的干涉政策引起了中国及列强的强烈抗拒；断定由于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以及大战期间所积蓄的经济力，在对各国经济竞争中能够处于优势而得出的一种维护权益的手段。币原认为这种新手段才是维护日本"正当权益"的最好手段，但要使这种手段与目的形成一体则需要一定的条件。即：第一，是有界限的，即中国和中国人民收回权利的正当要求和行动不得"侵害"日本的"正当"权益；如果这种权益受到"侵害"，正如他在第五十一届议会亲口所说，则将"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第二是，资本主义体制全面保持稳定，各国之间的竞争只在经济竞争范围内进行，尤其是日本资本主义保持稳定，能够经得住同各国的经济竞争。第三是，由内阁控制住那个推行武断外交、双重外交、干涉内政的军部，确保外交一元化。

七　宇垣裁军和军制改革问题

在体制上保证币原外交持续稳定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否创立

① 《币原喜重郎》，第262—266页。

②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9卷，1929年，第550页。

使陆军(它在日本对外政策中，越出外务省和政府的方针，以武力为背景推进威压性大陆政策)、尤其是统帅服从国务管理的体制。这个课题，原敬在1920年曾设想通过废除天皇大权，控制参谋本部来解决，但由于突然惨死而未果。其后，它也曾是政党和民本主义者们以1922年第四十五届议会为中心，谋求与裁军问题一起加以解决的课题。在1922年裁军中，军部虽表现了某些政治上的后退，但对于军制改革则丝毫不许触动。1923年2月，在第四十六届议会上，革新俱乐部和宪政会曾试图把陆军裁军再推进一步，但因得不到政友会的赞成而失败。关于军制改革，加藤友三郎首相在这届议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军部大臣文官制，革新俱乐部由此乘势提出废除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议案，继第四十五届议会之后，又一次全场一致获得通过。陆军孤立了。如果这时政党团结起来，联合议会外的社会舆论，展开运动，就会能够把军部更加逼入困境。但由于政友会采取了礼节上赞成的消极态度，运动未能发动起来，致使陆军逃脱了虎口①。

但是，以关东大震灾为契机，新的震灾恐慌成为再次推进裁军的动因。护宪内阁陆相宇垣一成于1925年削减军官一千两百名、准士官以下三万六千名、军马五千六百匹，大约相当于四个师团以及若干部队。但宇垣裁军也和华盛顿会议以后的山梨裁军一样，由于集中精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机械化，充实航空队，创建坦克队和高射炮队，充实化学武器研究设施，改良枪炮，创设通信学校和汽车学校，开始实施青年训练等等，从而在这方面支出了经费，以致1925年度陆军预算的削减额才不过二十八万日元。宇垣对他亲手实施的裁军曾自我吹嘘说："一点毛病也没出，宏图就通过了。"他所说的"宏图"就是"走在裁军舆论之前"，"抢先作出英明的决断，

335

① 木坂顺一郎:《军部和民主主义》，第29—30页。

把缩减的部分转用到其它方面”，亦即“对国民舆论因势利导，用之于国家之革新”。宇垣进而利用裁军刷新陆军内部人事，加强军队与国民的结合。他通过裁军，对过去以长州阀为中心，在陆军内部专断独行的干部进行了人事调整，把陆大出身的有能力的军官配置在领导岗位，为日后国政“革新”集结核心力量；还把现役军官分配到中等以上学校施行军事教练，同时让退役军人担任指导青少年团，调停劳资纠纷和租佃纠纷，维持治安，使军队与国民相结合，以图谋扩大军队的国民基础。宇垣裁军是舍其名而取其实，对于统帅权独立和大臣武官专任制则丝毫也不许触动。宇垣的深远目的在于“革新”国政，即为建立总体战体制准备条件，而统帅权恰恰正是建立总体战体制的必要支柱。宇垣内心认为：“在国家非常时期，统帅权不单是指挥军队，而且是一种支配国民的权力。”[1] 继华盛顿裁军之后的宇垣裁军，表面看来，军部似乎在政治上更加后退，但实际上护宪内阁对军制改革根本不能插手，也就不能在制度上保障外交一元化。护宪内阁成立、币原就任外相后的十天，6 月 20 日，宇垣陆相在日记上写道：

“把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山东协定等让步再让步的屈辱外交说成是成功或适当，用这种自吹自擂的宣传来掩盖国民的耳目，欺人自欺的外交，其恶果马上就将在中国暴露出来。清算失败外交的时机即将到来。切望国民尽早对本国外交的失败有所觉醒，彻底加以清算，并着手别开生面。如再糊里糊涂敷衍下去，虚度岁月，国事就要危殆了。”[2]

币原外交自开始之日起，内部就有强烈的反对派，正如宇垣所指出的，中国形势确乎要发生新的震动了。

---

① 《宇垣日记》第 1 卷，第 459，469，498 页。

② 同前，第 470 页。

八 第二次奉直战争和郭松龄叛乱

1919年，中国南北和谈决裂，由此进入军阀混战时代。1920年7月，直系曹锟和吴佩孚联合奉系张作霖，把皖系的段祺瑞赶下了台。在直皖战争中获胜的张作霖进入北京，同吴佩孚等直系对立起来。有美英两国在背后支持的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方针，不仅加强了同张作霖的对立，而且带来了与广东政府孙文的对立，导致孙、张、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奉系张作霖的后台是日本。因此，奉直对立反映并激化了华盛顿会议上的日美对立，终于1922年4月造成武力冲突。这就是第一次奉直战争。结果，张作霖大败，退回奉 336 天（今沈阳——译者）。获胜的直系推举曹锟为大总统，企图统一南北。但直系的专横再次促成反直三角同盟，发展为1924年9月的第二次奉直战争。

第二次奉直战争成为币原外交对华不干涉政策的首次试金石。9月11日，币原外相声明："对中国内战持旁观态度，无意采取诸如对华干涉之类的措施。"① 优势的吴佩孚军有突破山海关、侵入东三省之势。日本国内舆论担心满洲出现危机，指责币原外交优柔寡断，要求支持张作霖。币原对奉直两派许诺不干涉内战，但同时提请他们注意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坚持不干涉内战，但坚决维护条约上的权益这个币原外交原则始终贯彻下去了。在优势中推进战争的直系欢迎币原的声明。张作霖眼看就要战败。在内阁中，甚至农商务相高桥是清也主张援助张作霖，加藤首相也批判不干涉主义是空论②。币原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第一，他认为坚持对内外声明的不干涉主义是国际信义问题。第二，他估计吴军要逼近奉天，就必须横穿南满铁路而同日本军守备队交

① 《币原喜重郎》，第292页。

② 同上，第293页。

战，吴军不会采取那样冒失的行动；他强调即使吴军统治了满洲，让他尊重日本的权益也并不是不可能的。第三，他预料直系内部吴佩孚和冯玉祥对立，吴军如在山海关进入战斗，则冯将起事，那时张作霖就可能恢复战斗力①。他的预料"猜中"了。10月23日，冯玉祥暗地勾结张作霖，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确立了在华北的统治。吴佩孚腹背受敌，逃往天津。次年，1925年1月，币原在第五十届议会上自夸对第二次奉直战争的不干涉主义的结果，强调说："现在我国的公正态度，已为中国国民及世界列强所公认，日中两国关系由此取得显著改善，同各国的相互信任亦得以加深。"② 不过，冯玉祥的政变，其背后是有导演的。陆军预备役大佐寺西秀武和张作霖顾问松井七夫大佐从张作霖那里要出一百万日元，对冯进行了策反，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大佐和亲日派黄郛也帮助游说，使冯倒戈③。

宇垣陆相后来在日记中记录了如下真相：关于第二次奉直战争，日本虽然希望张作霖胜利并扩展若于势力，但又担心，如果他把势力扩展到中原，有可能逃出日本的"掌心"。但直系如若获胜又将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统治。于是为了在两者均势发生变动之前，进一步巩固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对张作霖给了有形无形的支援。他还嘲笑那种认为冯玉祥政变"造成的新局面的展开是一种天佑"的人，乃是"愚蠢庸碌之辈"④。可见，即使在币原借以自夸其不干涉主义的第二次奉直战争中，双重外交也并没有得到清算。

337

中国军阀之间继续进行着分化和结合。在奉直战争中捞到胜利的张作霖，向直隶、山东、江苏扩张，冯玉祥则在苏联支持下加强

① 《币原喜重郎》，第294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73页。
③ 岛田俊彦，前引书，第42页。
④ 《宇垣日记》，第1卷，第488页。

了势力，掌握河南和内蒙而成为对抗张作霖的最大势力。1925年11月22日，驻扎在天津山海关间滦州地区的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勾结冯玉祥举行倒戈，要求改革东三省政治、张作霖下野，并向奉天进军。张军不断败退。当地关东军、日本居留民、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向政府要求增兵援张。在野党政友会召开临时干部会，要求加藤首相采取强硬手段，以阻止战火向满洲蔓延，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关东军开始向奉天集结兵力。币原反对出兵，命令吉田总领事向两军进行调停劝和。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奉陆军首脑的命令，对两军发出警告：如果日本权益受到侵害，则将采取必要措施。奉天知识界和学生支持郭松龄。在中国本部，学生也举行了支持郭松龄的示威游行。12月13日，郭松龄逼近辽河河口的营口对岸，张军放弃营口而退却。同日，白川司令官拟定方案，以满铁沿线三十公里为禁战区，呈报军部，并同时通知郭军。14日，宇垣陆相把白川上报的三十公里缩短为炮弹射程的十二公里，并命令向两军发出警告。15日，向两军发出这个警告。同日，在东京，陆军决定根据天皇统帅大权、即“奉敕命令”，实行出兵。从朝鲜及日本本土派出的日军在满铁沿线主要地区展开，援助张作霖军。郭松龄被奉军抓住枪决，郭军败退。不干涉内战的方针被冲垮了。币原在第五十一届议会上进行强辩，把这次派兵说成是“补充缺员”，还批判说，把这次“补充”说成是为阻止郭军军事行动而派兵，乃是恶意中伤，硬说贯彻了不干涉内战的方针①。币原确实反对出兵，但毕竟未能违抗敕令。只要统帅权俨然存在，那就不能克服双重外交，就无从保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九 “五卅”事件

中国形势从军阀混战时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斗争时期。近代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84—85页。

工人作为新斗争的旗手登上了舞台。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近代工人约达二百万人，但工人运动的真正开展则始于1922年。从1月到3月，香港海员对英国船主展开了罢工斗争。5月，工人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4年国共合作，继之，1925年爆发“五卅”事件，运动呈现突飞猛进的高涨。在运动发展期间，在5月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决议：“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①]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的反帝、反封建民族革命，由于工人阶级自觉而又有组织的参加，现已有了强有力的部队。日本帝国主义和币原外交不得不和具有新力量的中国民族革命正面对立。

338

“五卅”事件的开端始于1925年2月上海日本人经营的内外棉纺织厂[②] 工人反对解雇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罢工迅即波及其他日营纺织工厂。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认为这个斗争背后有共产主义者的领导，因而惊恐不已，要求中国官宪进行镇压；在华日本资本家要求陆战队登陆。显然，日方是企图用暴力镇压工人斗争。上海的罢工进而波及青岛、汉口、武昌、广州、杭州。尤其在青岛，那里有日营大康纱厂、内外棉、钟渊纺、富士纺、日清纺、长崎纺等纺纱厂，有一万七千名中国工人在这些工厂劳动。青岛的斗争从4月底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开始，发展到为抗议镇压工会运动而举行罢工，直至占据工厂。青岛处于张作霖势力之下，斗争遭到了血腥镇压。5月28日，日本政府从旅顺派出两艘驱逐舰到

---

① 录自《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13页。——译者

② 内外棉：全称是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所谓“内外”，指日本国内及国外，所属共有十九个工厂，其中三个在日本，十一个在上海，三个在青岛，另两个在我国东北。这里是指在上海的第八厂。——译者

青岛施加威压。5 月 29 日，一千七百名张作霖军队在日本指使下向占据工厂的工人开枪，造成了伤亡，并逮捕了许多工人。6 月 1 日，日本劳动总同盟得知此消息，派出二十名代表会见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并提出抗议，追究政府责任，认为日本进行武力威胁，并强迫中国官宪进行武力镇压，是干涉内政。对此，木村局长断言，这次罢工已超出劳资纠纷范围，并强辩说，由于日本人生命财产已陷入危险，才委托中国官宪维持治安，派出巡洋舰以防万一，这是理所当然的措施，算不上什么干涉内政①。

5 月14日，斗争正在青岛激烈进行，上海内外棉纺织厂突然发生日本职员向罢工工人开枪，造成一名死亡的事件。抗议枪杀事件的罢工浪潮扩大了，5 月 30 日，三千名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官宪开枪射击，造成伤亡二百五十名的流血惨案。抗议运动立即震撼了整个中国。6 月 7 日，在罢工浪潮中，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成了反帝斗争统一组织工商学联合会，11 日在各国列舰扬子江进行恫吓之中，集合二十多万人，召开了抗议大会。大会把对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归纳为十七条。其主要内容是：(1)立即释放被捕人员；(2)审判枪杀中国人的罪犯，日英公使向中国政府道歉；(3)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4)在租界内言论、集会、出版自由；(5)日英陆海军从上海 339 永远撤退；(6)收回租界；(7)撤消治外法权等。中国群众运动至此明确地举起了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和确立民主权利的旗帜。工商联合会从十七条中删除工商学联合会主张删去的罢工自由和撤消治外法权等项，提出十三条与前来调查“五卅”事件的外国公使团代表进行谈判。谈判决裂了。但是，反帝运动爆发后，波及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汉口、广东及香港等主要城市，使中国

① 臼井胜美，前引书，第 207—208 页。

政府不得不有所行动。6月2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向北京各国公使团递交了“沪案移京照会”①。同日，又向华盛顿条约签字国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咨文和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通知。

7月1日，北京各国外交团决定，撤换或申斥上海租界工部局——主管土木建筑和警察行政的机构——警察处长作为解决“五卅”事件的方案。但是，英国政府反对公使团的这个措施，尤其反对罢免工部局巡捕房总巡麦高云(McEuen, C.)。由于英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同外国公使团的谈判停顿了。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单独进行了谈判。8月，双方议定了下述条件：日本方面对中国伤亡者偿付一万美元，对罢工工人偿付约十万美元，解雇两名日本职员并承认工会等。英国政府对日本的单独行动很恼火，但日本纺织厂的罢工却得以解决，中国工人的抗议矛头就集中指向了英国。

华盛顿体系以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既得权益的存在为前提，而准备逐渐加以调整。“五卅”运动则提出了超越华盛顿体系范围的要求，展开了行动。在“五卅”事件中，以华盛顿体系为前提的币原外交暴露了其不干涉主义的界限，为了维护权益而要诉诸武力干涉了。

十 关税会议

“五卅”事件余烬未熄，1925年10月，中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关税的条约而邀请各国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要求收回关税自主权，并要求把因物价上升而实际降低的值百抽五从量进口税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点五。美英两国同意在废除中国各省境内厘金的前提下提高到百分之十

①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42页。——译者

二点五，日本则反对过早地一律提高，主张在高级商品和日用品之间，按品种高低制定等级税率，而日本大量出口的棉制品正是主要的日用品。由是日本与美英对立。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国曾约定下述各点作为妥协措施：(1)把实际正在降低的进口税率提高到实征百分之五；(2)条约实施后，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决定有关废除厘金的必要准备措施，以此为前提，对值百抽五的进口税增加百分之七点五的附加税；(3)在前项问题未解决前，由特别关税会议决定，一律征收从价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作为暂定措施。但对于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五卅"事件以后，中国舆论明确了反帝立场，反对召开不准备收回自主权的关税会议。学生们高喊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关税会议，涌向了会场。在中国舆论要求关税自主的高潮中，会议一开始，中国全权代表王正廷就要求各国尊重中国关税自主，撤销现行诸条约中对关税的任何限制，以此作为中国的原则立场，并提出如下方案。即：1929年1月以前，制定国定税率并废除厘金，在此以前，征收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的附加税，作为暂定措施。此时，日本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反对中国要求恢复关税自主的意向和各国同意提高关税的动向，就要在国际上孤立；如果同意高税率关税，则给1922年战后危机和震灾恐慌以来苦于全面入超的日本经济将带来严重影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外务省首脑以币原外相为首，策定了如下秘计。 340

"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曾经反对日本之等级税率提案，此次会议恐难指望列强赞同。此案不能通过，而一律征以百分之十二点五的高税率，则日本对华贸易将遭受重大打击。必须千方百计考虑实现等级税率之方策。为此，应由日本采取大大方方的措施，率先提议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然后对中国国民所向往的撤销不平等条约抢先迈出一大步。采取这一措施，中国将对日本的好意有

所反应，或将采用等级税率作为国定税率的原则；在某种情况下，为保全同日本的特殊贸易关系，或将出现缔结两国间关税互惠协定的可能性。除以此种坚决果断、真正划时代的外交政策参加此次会议，别无他法可以达到日本的目的。"①

按照这条秘计的路子，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在会议上领先向各国声明："有充分准备对关税自主权问题加以极其友好的考虑"②，表示出似乎理解中国立场的姿态。其实，日本政府已考虑到，承认中国的完全自主权乃是十年乃至十五年以后的事③。日本代表在自主权问题上为取得中国的"好感"而表现的真正意图是，要把华盛顿关税条约所规定的附加税限制在百分之二点五的范围内，作为1929年1月以前的暂定措施，这是上策；此策不成，则以百分之十二点五为最高限度，制定等级税率，这是中策。而且，对于附加税收的用途，日本的提案是，除用以代替过去来自厘金收入的基金、政府行政费外，在确立政府信用的名义下，还举出可以充作"清理现存各种无抵押、无偿还把握的债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收回以西原借款为主的不可靠的借款的本金。日本的态度是表面上装好意，骨子里则不外是帝国主义外交，是以冷酷而坚定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算盘为根据的。

341 1925年11月19日，会议根据中国的提案，"承认享受关税自主权的中国权利"，同意中国从1929年1月起实行国定税率。这一来，日本就无从施展其上述秘计了，会议的焦点集中在1929年以前的暂定措施上，日本的真正意图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日本关于暂定措施的提案与中国的要求相差悬殊。中国倒是对美国主张把附加税定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二点五的提案表示同感。币原外

① 《币原喜重郎》，第301—302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77页。
③ 臼井胜美，前引书，第138页。

相顽固坚持百分之二点五这条线，不肯退让。中国要求把税率提高到使附加税收增加到九千万元，各国也表示同意。这样，日本的孤立就很明显了。1926年1月，政府后退一步，决定下述方针，即以中国所要求的增加税收九千万元为前提，把附加税按类定为七级税率，最低百分之二点五，最高百分之二十五，并使之承认日本输出品中百分之五十以上列为最低税率。日本这一方针基本上得到各国承认。于是，日本得以在附加税所增加的收入中只担负百分之十九，其对华总输出约百分之六十被列入最低级，即附加税为百分之二点五。日本贯彻了华盛顿会议以来一直主张的等级税率的要求。此项决定是在1926年3月底达成的。但4月间发生了下述事态：由于张作霖的奉军镇压了郭松龄的叛乱，控制了北京，段祺瑞执政下台，负责关税谈判的当事者、中国全权代表团因而自然就不存在了。列强撇开中国，把非正式的会议延续到7月底，但北伐已经开始，在这种形势下，会议就无限延期了。关税会议仅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和规定七级等级税率上取得意见一致，至于新条约则连草案也未得制定就告终了。中国要收回关税自主权，还得花费直到1930年3月的时间。结果是，币原外交起到了维护日本对华贸易的作用。但在中国大震动已经开始，日本这个“成果”也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十一　北伐

“五卅”运动埋葬了军阀混战时代，使之成为过去。“五卅”运动所开辟的新时代，是反对封建军阀、反对背后操纵军阀的帝国主义的时代，是把反对封建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提上日程的时代。

在辛亥革命中未能建立民主统一国家的孙文，联合反袁派军阀进行了“护法战争”，不久，就向俄国革命学习，在接触“五四”运

动以来的群众运动过程中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11月，孙文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的马林(Maring, S. H.)，开始走苏联的道路。1922年8月，孙文同意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所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决定采取了联共政策。1923年1月，他同越飞发表联合宣言，随即派亲信人物廖仲恺伴同越飞访日，并让他向越飞请教，确立了建立党军的方针，并把蒋介石派到莫斯科，以准备建军。2月，孙文第三次建立广东军政府，并就任大元帅。另一方面，共产党在6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国共合作方针。于是，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改组国民党，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战略。11月，孙文发表北伐宣言，宣布打倒军阀和"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①，创立独立自由的国家，维护国家及国民的利益。但此举未待实行，孙文就在北京与世长辞了。

342

继承孙文遗志的国民党，在"五卅"运动高涨的形势下，7月间，在广东组织了以党中央常务委员汪精卫（汪兆铭）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虽已存在左右两派的对立，但容共左派掌握了政府实权。由于国共合作而势力扩大的共产党，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十六名中央委员中占八名、在二十四名候补委员中占八名，谭平山（组织部长）、林祖涵（农民部长)，毛泽东(宣传部代理部长)分别担任了重要职务。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党把培养国民革命战士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蒋介石是个有名的反共主义者。他一掌握军事实权，就在3月间把广东政府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命令最大的军舰中山舰和宝璧舰同时返回黄埔一事，马上断定是要策划政变，便反过来发动

① 见《总理全集》，第2集，民智书局，第63页。——译者

政变，镇压共产党，制造了所谓中山舰事件。接着，5 月，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整理党务案》和《国共两党合作办法案》，从中央委员会中清洗共产党员，并建立控制党内共产党员的体制，加强了右派的势力。掌握了军政两方面实权的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提议武力统一全中国，并计划北伐。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指出："北伐中暗藏着个人的权势欲，如果竟发生为北伐而诛杀工农之事，则北伐只能是一种军事上的投机"①，认为北伐为时尚早。但蒋介石不予理睬，在 6 月 5 日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上决定"迅速出师北伐"，7 月 9 日开始北上。

尽管国民革命军包藏着内部对立，但仍然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于 7 月11日占领长沙，9 月攻克汉口，10月进入武昌城，驱逐了吴佩孚的势力。11月，蒋介石占领南昌，提议把政府从广东迁移到南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反对蒋的提议，党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迁到武汉。1927年 2 月，国民政府迁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武汉。但是，以蒋为首的右派和武汉派的对立更加尖锐了。

各国担心革命军进攻他们权益集中的上海，1927年 1 月中旬，确定由日英美法四国共同集结四千至五千兵力到上海的计划。日本作好了出动陆战队一千五百名的安排。2 月 24 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时，发生了说是部分革命军士兵闯进日英美三国领事馆，伤害人身和掠夺物品的所谓南京事件。日本官宪没有进行抵抗，但英国和美国停泊江中的军舰却开炮进行报复，打死打伤了中国人。日英美三国公使立即在北京会商对策。他们不是对武汉政府，而是对蒋介石提出：(1)处罚负责人；(2) 书面道歉并保障外国人的生命；(3)赔偿损失等项要求，并决定如果不接受这些要求，即

① 此从日文转译，与中文原文文字颇有出入。中文原文见《向导》161 期，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 7 月 7 日)。不具录。——译者

343 发出限期通牒，采取适当措施。以此方案分别向本国政府请示。英国打算如果这些要求不被接受，就采取强硬的实力手段。币原外相根据派至武汉的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的报告，得知革命军内部蒋派和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他考虑的方策是，拉拢反共主义者蒋介石，使蒋压制共产派，统一国民革命。因此，币原制止了英国的强硬态度，反对发出限期通牒，以免把蒋介石逼入绝境。这就是说，币原担心蒋介石如果屈服于最后通牒，接受各国要求，则将遭到国内批判；如果拒绝，则又将与各国武力对立，两者都将把蒋逼进绝境①。在北京各国进行协商的同时，币原令上海总领事矢田与蒋方接触，要求蒋负责解决南京事件并维持上海一带治安。在这种接触过程中，矢田得知蒋介石正在策谋于3月21日占领的上海，解除工人武装并肃清国民政府内部的共产派。②

4月3日，在左派统治的汉口发生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暴行事件。对南京事件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日本竟命令六艘军舰中大约五百名陆战队登陆，保卫租界。4月7日，英国军队和共产派进入战斗状态时，日本也立即命令陆战队登陆参加战斗。在反共这一点上，日本和蒋介石之间没有任何对立。蒋介石没有辜负币原外相的期待。4月12日，蒋在上海断然发动政变，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镇压遍及蒋统治下的所有地区。而在另一方面，他与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联系，加强了与浙江财阀的勾结。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抗。19日，武汉政府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务，并决定讨蒋。国民革命内部的对立已进入一决胜负的关头。

南京事件后，各国驻华北的外交官员和军事机关也对治安担忧。4月6日，在天津的各国军队司令官会议上，一致同意把现有

① 《币原喜重郎》，第318—319页。

②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第38页。

四千兵力立即增加到两万五千。尽管英国政府强烈要求增兵，但已经看准国共分裂的币原却向美国看齐，表示无意增派陆军。币原外相指望通过支持蒋的反共主义，鼓励他镇压共产党，结果可以避免国民革命的锋芒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此目的，币原展开了接近干涉内争边缘的活动。

币原对形势的判断及其分裂国共的妙策看来奏效在望，但在国内却激起了一片批判呼声。1月14日，紧接着国民革命军夺回汉口租界后不久，对华关系密切的日华实业协会和大阪纺织联合协议会联席声明："吾人决信，对今日中国之无理行动，万一各国不能一致行动，我国也只好不得不单独出兵。"南京事件、汉口事件后，非难币原外交的舆论急速高涨。南京事件后不久的3月31日，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向政府和政党以及各界提出强烈建议，要求派出陆军与英美两国合作。政友会于4月2日痛击币原外交，并声明："当此政府……侈谈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万无一失，一味袖手旁观，因循敷衍之时，卒致发生南京事件，蒙受国辱，此国民不胜痛心者也。"① 汉口事件后的4月8日，宇垣陆相向若槻首相提出意见书：《关于维护帝国在华地位之研究》，讲到中国的"赤化"迟早要从直隶威胁到满蒙的危险性，断言今后继续靠"隐忍持重"政策不能阻挡大势，并建议通过各国协调，用实力来阻止共产势力②。

344

第三节　田中外交

十二　金融危机

由于中国革命的进展，币原外交的有效性受到内外的严厉责问；正当此时，国内支持币原外交的日本资本主义又发生着重大危

①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第52—54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2—94页。

机。1924年，世界资本主义靠所谓合理化即牺牲工人利益办法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即使在这种时期，还是单纯依赖政府保护而不讲究合理化的日本资本主义，已在不断暴露其矛盾。1920年以后，贸易逐年持续入超。出口额以1925年的约二十三亿日元为最高峰，此后就开始下降，至1927年降低到二十亿日元左右。尤其是对亚洲地区的输出，1920年约为十亿日元，在输出总额中占百分之五十一，至1927年竟降低到八亿四千万日元，占百分之四十二。中国的抵制日货也影响着对亚洲地区贸易的恶化。贸易收支赤字反映到外汇比价，大战期间日元牌价（每一百日元）曾达五十美元，到发生震灾的1923年，下降为四十五美元，1924年竟降到三十八点五美元。加藤护宪内阁的藏相滨口雄幸靠引入外币和外运黄金来极力恢复外汇行情。其结果，1925年上半年出口增加，日元牌价也恢复了，但银行对各企业大量贷款，而这些银行又靠日本银行和政府来支撑，这种旧办法依然毫无改善，因此，合理化依然没有认真实行。1926年，由于中国革命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贸易收支再度开始恶化。对中国的输出，从1925年的四亿八千五百万日元降到四亿两千一百万日元，日本经济再次呈现不祥之兆。

1926年1月，加藤首相死去，同属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若槻内阁的藏相片冈直温，同滨口藏相一样，靠外运黄金来谋求外汇行情的稳定；另一方面，为健全金融，向议会提出了震灾票据处理法案。若槻首相以大正天皇逝世、希望能使新天皇年代第一个预算顺利通过为理由，向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和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提议暂时停止政治论战，获得同意。但到3月间，执政党宪政会开始搞起宪本联盟（即宪政会与政友本党联盟——译者），政友会因而完全变成在野党，便对政府开始了猛烈攻击。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政友会对金融政策进行质问。这时，由于片冈藏相失言，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了。

345

在震灾票据法案审议过程中，各银行保有震灾票据的金额泄漏了，于是各方面对保有震灾票据的银行开始挤兑和收回债权。渡边银行也是其中之一，3 月 14 日下午 1 时，该行报请大藏次官停止付款。其后，经多方奔走的结果，到下午 3 时筹得结算资金，才得以不再停止付款。但正在出席议会的片冈藏相却公开宣布了渡边银行停止付款。3 月 15 日，渡边银行停止营业。接着，许多中小银行也陆续停业。3 月 22 日，藏相和日本银行总裁宣布了关于稳定财界的声明；次日，议会通过了震灾票据法案，金融危机才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对神户铃木商店贷出巨额资金的台湾银行开始暴露出其经营状况，以此为开端，金融危机又进入第二阶段。铃木商店债务四亿五千万日元，其中三亿五千万日元是台湾银行的贷款。该行开始苦于资金周转不灵，靠本市银行的短期通融勉强维持。3 月 27 日，台湾银行通知铃木商店停止新贷款，但该行的经营漏洞已无法遮掩，4 月 4 日宣布了台湾银行调整机构。台湾银行的漏洞导致了与台银有往来关系的中小银行停止营业。

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使金融危机的第二阶段进一步深刻化。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是 3 月 21 日，当时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正将告一段落。上海工人阶级以总罢工来迎接国民革命，这个行动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权益引入危境。4 月 1 日，股票暴跌。4 月 3 日，日本陆战队在汉口和中国群众冲突时，股票更加惨跌。

若槻内阁于 4 月 13 日决定发布紧急敕令案，由日本银行对台银给予无抵押特别贷款，即非常贷款，日本银行的损失则由政府给予两亿日元为限的补贴。此案提请枢密院审查，政友会认为这可是打倒若槻内阁的良机，便在枢密院展开活动。枢密院态度硬化了，顾问官伊东巳代治对补贴方案不加可否，却攻击政府的对华政策，假借审查补贴方案之名，寻求打倒币原外交之机。伊东说：政府打

算单从救济台银的漏洞来寻找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不够全面的，认为另一个重大原因在于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币原外交继续进行责难说：

"……由于我对华外交无一定方针，对居留民保护不周，多年以来，在中国刻苦勤奋之居留民，横遭暴民掠夺，丧失其财产，妇女遭受难言之凌辱，逃出时身着一衣，仅免于死，一文不名，陆续逃回长崎。又回乡无资，哀求免票乘车者数以百计。在贸易关系上，商业往来全部停顿，对华出口完全断绝，关西制造业行将出现闭厂停工之惨状。现内阁唯热心于一银行一商店之救济，对我在华居留民及对华贸易则毫无措施。吾等所目睹者，唯暴行之惨状，而政府则以镇压手段，禁止此类报道刊载于报端。"

346

"总之，吾敢断言，今日之危机乃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为救济一银行一公司，已耗去两亿七百万日元，今又增加两亿补贴，共达四亿七百万日元。拟将此项巨额负担归之于出自人民膏血之国帑，而对在华数万同胞全然不顾，一般国民对此将作何感想耶！环顾目前形势，到处思想恶化，瞻念前途，不禁悚然！"①

这个演说固然很不合时宜，但枢密院却采纳伊东的意见，否决了紧急敕令案。4月17日，若槻内阁总辞职。

台湾银行眼看救济无望，便于4月18日停止营业。于是小银行中也陆续停业。21日，第十五银行也终于停业。第十五银行是以宫内省为往来对象的大银行。在此前一天，政友会的田中内阁于20日成立，提出延期偿付紧急敕令案，提请枢密院审查。伊东巳代治对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寄予希望，支持了这个紧急敕令案。这就更加说明，枢密院的赞成与否，与其说是根据救济危机政策是否有当，倒不如说是根据对华政策的态度。22日，田中内阁发布

---

① 《伯爵伊东巳代治》上卷，第526—527页。

紧急敕令，为救济金融界准备了条件。4月25日，全国银行恢复营业，金融危机结束。

若槻内阁的崩溃，使币原外交暂告结束。币原外交并不仅是被迫而一时中断的。币原外交是以日本资本主义的稳定为其基础的，在金融危机中集中表现出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动摇了币原外交的基础。

十三　出兵山东

金融危机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原因是两方面，结果也是两方面。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合理化被提上日程，其中决定性的一环是树立金融资本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也成为必不可免的了。田中内阁的自赋使命便是改变币原外交，确立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政策。田中首相亲自兼任外相，外务政务次官则配以政友会的对华强硬论者森恪。

在倒阁过程中的4月16日，田中首相作为政友会总裁在该党总务会上演说，首先批判币原对第二次奉直战争和郭松龄叛乱的对策，对“发生在我帝国特殊地区满洲的动乱”，“极为冷淡”。他否定了币原从华盛顿会议以来所坚持的满洲是中国一部分，日本不具有概括的特殊利益的观点，而认为满洲是日本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地区。田中进而严厉批评说，南京事件和汉口事件是丧失国威，并攻击说：“至于政府所持的态度，认为中国赤化是他国的内争，与我国无关，实属荒谬绝伦。”①　347

田中内阁成立时，中国革命内部南京和武汉的对立已达顶点，北伐看来似乎就要停顿。但到了5月初，南京及汉口两政府军均

① 《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547—548页。

开始北上。与蒋介石通款的冯玉祥也自西向奉军进攻。5月下旬，山东直隶一带的攻防战已迫在眉睫，进展极为迅速。5月24日，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北军不利，主张对保护在华日人生命财产采取万全措施。5月28日，田中首相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奏请从关东军抽两千兵力派至青岛，获得天皇批准。币原外交曾把居留民的保护尽量委托给中国官宪，对于派出日军极为慎重，田中内阁则根本不谈其他方策，就极为迅速地决定派出日军。政府在出兵时声明："纯属为求在华日人安全之自卫上不得已的紧急措施"，并公开宣布"不仅对中国及其人民无任何不友好意图，对南北两军的任何部队也绝不干涉其作战或妨碍其军事行动"①。但是，铃木参谋总长向派遣军司令官乡田兼安少将下达的指示中，则除保护居留民之外，却有"为了保护国家及国军威信，或在完成任务方面遇有确实不得已之情况时，可以使用武力"一语②，默许当地日军超越保护居留民的任务而行动。

6月1日，派遣旅团开始在青岛登陆。北京的张作霖和南京政府均抗议说派出日军是侵害主权，武汉政府痛斥说这是二十一条的复活。由于日本对南京事件未加抵抗，中国人对日感情好不容易刚刚开始好转，至此再度恶化，排日运动开始呈现愈来愈烈之势。革命军继续进击，7月初旬，控制了山东省的三分之一，战火逼近山东铁路沿线。乡田司令官报请令青岛登陆军队进驻济南。7月7日，政府批准，并断然增派两千两百名。7月8日，乡田旅团到达济南。实际上并无居留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侵害的情况，山东出兵明显侵害中国主权，说是保护居留民，其实无非是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施加压力。进驻济南，结果对排日运动形成火上加油，抵制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6页。

② 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1930)，岩南堂书店，1971年重印本，第24页。

日货运动扩大到所有主要城市。

但是，北伐重新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内部仍然处于复杂变动之中。在武汉政府内部，新的国共对立在发展。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地区也相继出现反共军人镇压共产党的事件。由于南京政府对武汉进行经济封锁，由于与南京方面相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破坏，武汉国民党动摇，国共对立加深；7月28日，汪精卫等左派终于发表了国共分裂宣言。共产党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崩溃了。此后，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丧失扶助工农的性质，而加深了与资产阶级的结合。但是，决心反共的武汉国民党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并没有消除。武汉派的唐生智在北伐过程中掌握了湖南和湖北，在"驱共倒蒋"口号下向安徽、江西进军。北军孙传芳、张宗昌乘国民革命军内讧转入反攻，开始南下。8月初旬，国民革命军在徐州附近战役中吃了大败仗。8月11日，蒋介石声明：为促进国民党统一，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下野。蒋介石下野后躲去日本。山东地区已远离扩大战火的危险。8月30日，田中内阁声明从山东撤兵。声明中说："在中国，不仅此地，多数日本人居住的其他地区将来治安不稳，因而有再次危害日本人之虞时，帝国政府仍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自卫措施"①，公开讲明了将来有可能再次出兵。 348

十四 东方会议

通过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币原外交对立而成立的田中内阁，在外交方面最重要的课题就是确立取代币原外交方针的对华政策。尤其是，田中首相认为满蒙不同于中国本部，是日本的特殊地区；对于他来说，眼看北伐进展，制定对满政策更是刻不容缓的急

① 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1930)，岩南堂书店，1971年重印本，第39页。

务。日本作为满洲当权者而长年培植卵翼的张作霖，在第二次奉直战争后却开始脱离日本的控制，甚至对日本经营满洲开始采取挑战行动。他开始对抗满铁的经营，着手延长京奉线，使奉天—海龙—吉林联结起来，在满铁东侧修筑并行线；并计划连结京奉线的打虎山和通辽，在满铁西侧修筑并行线。他甚至已不甘心只在满洲当日本的傀儡，而梦想进入华北，掌握北京，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打倒张作霖的北伐正在进行，满蒙怎么办？怎样对待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

1927年6月，(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在回答田中外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谘询时强调说，张作霖在中国根本无人支持，并断言："始终以张作霖为唯一目标，凡事取决于此，乃极为短见，且属极不得计。"他极力主张，必须"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问题截然分开"。木村建议，挑选适当人物代替张作霖，以"东三省人之东三省主义"来对抗北伐①。在回答同一咨询时，芳泽驻华公使断定，内战对奉军不利，但无人可取代张作霖为奉系统帅。他在报告中说，即使奉军败退之后，也只能依然推举张作霖为满洲的当权者，除此别无他策②。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在6月6日上报陆军次官畑英太郎《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中提出了把满洲政权傀儡化的设想，想把东三省及热河特殊地区变成设有日本行政、财政及军事顾问的"自治"地区；并主张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这种设想，就让"帝国认为适当的人物"来实行，即使诉诸武力，也必须谋求实现③。上述方案都是想把满蒙划为日本势力范围，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具体方策却各不相同。

349

为了确定对华政策，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东方会议的筹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97—101页。

② 臼井胜美：前引书，第68—69页。

③ 参谋本部，前引书，附录解说，稻叶正夫："张作霖炸死事件"，第46—47页。

划者是森恪政务次官，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和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对此密切协助。他们打算“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割开……搞成一个特殊地区，使日本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和地区，”即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图谋在东方会议的名义下策划这种设想①。东方会议在外务省召开时，正当第一次山东出兵期间，自6月27日至7月7日，历时约十天。参加会议的人员，外务省方面有田中义一外相、森恪次官、出渊胜次事务次官、木村锐市亚洲局长、小村欣一情报部长、芳泽谦吉驻华公使、吉田茂奉天总领事等，陆军方面有畑英太郎次官、阿部信行军务局长、松井石根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武藤信义关东军司令官等，海军方面有大角岑生次官、野村吉三郎军令部次长等各方面人物，某些阁僚则作为观察员随时参加。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7月7日，田中外相宣示了八条《对华政策纲要》，可以说是会议的结论。对于当前的北伐，《纲要》主张排斥共产主义，与“稳健分子”结合，明确表示了分化中国革命的意图；并表明，如果“帝国权益及在华日人生命财产”遭到侵害，即采取“断然自卫措施”。7月7日这一天正是政府决定进驻济南之日。关于满蒙问题田中首先指出：“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对满蒙，不能不有所不同”，“尤其关于东三省，在国防以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确认并明白表示日本对满蒙将与中国本土区别看待。在这个前提下，外相表示：“凡尊重我在满蒙特殊地位”者将给予支持，而在动乱波及满洲，“对我特殊地位权益有侵害之虞时，则不论来自何方”，均决心为防卫而采取适当措施②。华盛顿体系否定在中国获取地区特殊权益，亦即否定势力范围，而东方会议的结论则完全是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就以这个《纲要》为基础而展开。但是东方

① 山浦贯一：《森恪》1940年，第599—600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会议对于如何对待张作霖及其他具体方策并未作出详细规定。唯其如此，反而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们留下了余地，使他们把自己的设想和方策作为《纲要》的具体措施而施展开来。

350　1927 年 12 月，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刊登了叫作田中在会后向天皇上奏《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一文，对东方会议的怀疑由此而扩及全世界。所谓“田中奏折”可能是伪造[1]，但文中所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利权”，这种设想，则不论“田中奏折”的真伪，大体上说中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程。

十五　对华不干涉运动

日本社会主义者和一部分先进工人，站在拥护中国革命的立场，为反对田中内阁出兵山东进行了斗争。工人们支援中国革命、同中国工人团结一致的运动，早在“五卅”运动时期即已开始。“五卅”事件前不久，由于日本劳动总同盟分裂而产生的评议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在 1925 年 6 月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从日本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工人的共同敌人这个观点出发，决定支持“五卅”斗争。评议会展开了对政府和纺织联合会的抗议活动和支援中国工人斗争的募捐活动，鼓励中国工人。为了加强双方的团结，派三田村四郎和山本悬藏二人到上海，表示支援。接着，1925 年 9 月 20 日创刊的共产主义小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一直报道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表示和中国工人站在一起。

北伐的开始，把日本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的关心深深引向中国革命。1926 年底重建的共产党自不待言，就是共产党影响下

[1] 稻生典太郎：《“田中奏折”的两三个问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63 年第 3、4 合期，《日本外交史诸问题》I，有斐阁，1964 年。

的劳农党(劳动农民党)，以及中间派的日劳党(日本劳农党)和右派的社民党(社会民众党)等刚刚成立的合法政党，对北伐的进展也寄以同情，反对出兵，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

1927年2月，国民党驻日总支部邀请劳农、日劳、社民三党及产业工人调查所、《无产者新闻》社等组织的代表，召开关于中国革命的恳谈会。会上提议建立一个"网罗日本各无产者党派并负有开展实际行动之责的"有关中国问题对策的委员会①。日本出席各代表协议结果，一致同意组织以下述要求为行动纲领的委员会，即(1)立即撤退驻华日军；(2)反对出兵；(3)撤销不平等条约；(4)承认国民政府；(5)否认张作霖的北京政府；(6)无偿归还特殊权益。这个委员会如果成立，是会成为拥护中国革命、反对干涉中国的统一战线组织的。

但是，日劳党和社民党却以参加协商此项协议的人并非党的代表，而是自愿参加者为理由，不肯决定党的态度。1月间，收回汉口英国租界后，要求出兵的舆论不断高涨之时，(日本)共产党在其合法出版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2月26日评论中，呼吁组织对华不干涉同盟。劳农党对此表示响应，于3月28日向各无产者团体提议组织同盟。日劳党虽然不反对三党对运动进行协商，却决定不参加同盟。组织统一战线的企图遭到了挫折。劳农党和评议会，在田中内阁成立后的4月20日，召集十几个团体成立了对华不干涉同盟准备会。在中国革命分裂的影响下，对华不干涉运动统一组织的建立更加困难了。社民党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日劳党6月1日发表声明，采取了骑墙态度，说："对南京派、武汉派不加区别，本一视同仁主义援助国民革命运动"，"因此，如谓必须与南京派合作或必须与武汉派合作，此类态度我党均将予以拒绝。"

351

① 《无产者新闻》，1927年2月19日。

共产党警告说，蒋介石正在同日本及列强进行着交易，强调“日本无产阶级必须反对一切帮助这个叛变者的阴谋”，并号召“要支援我们的朋友和国民革命原动力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等被压迫群众”，明确了支援武汉政府的立场①。劳农党赞成共产党。由于各党对中国革命（两派）的评价发生分歧，结成统一组织的希望就渺茫了，但从四月底开始，劳农党和日劳党展开了发表联合声明和共同主办演说会等一定程度的联合行动。不过，日劳党主张共同斗争限于干部范围，劳农党则主张把它扩大到群众，他们的联合行动也并未能克服这种对立，一个月左右就垮了。

（日本）国内的统一行动虽无进展，但中国革命却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澳大利亚工会的号召，太平洋有关各国的工会代表，从山东出兵前夕的5月20日到25日，在汉口召开了泛太平洋工会会议。冲破帝国主义政府阻挠而参加会议的有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苏联、美国、英国的工会代表。日本方面，有评议会的三田村四郎等五名参加。泛太平洋会议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革命的各国工人第一次国际联合会议。会议发出警告说：新的战争将首先在太平洋爆发，并迅速扩大到全世界，号召对这种世界大战的威胁进行殊死斗争，并通过了下述七项作为各国工会的纲领：（1）共同斗争，以制止太平洋沿岸各列强之间发动战争的危险；（2）反对威胁中国革命的帝国主义侵略并与之进行斗争；（3）支援太平洋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4）为打破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而进行斗争；（5）组织太平洋各国被剥削阶级真正团结一致的统一战线；（6）推进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联合行动；（7）为全世界工会的统一而斗争。②

---

① 《无产者新闻》，1927年4月2日、4月16日、5月28日、6月11日。

② 《现代史资料》第15辑，《社会主义运动》第2册，三铃书房，1965年，第744—746页。

第一次山东出兵刚一决定，各政党和有关组织就发起了反对运动。日劳党虽然指责山东出兵是帝国主义侵略，并指出它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的严重性①，但运动的方法则只是把实际情况告诉给群众，6月间，发起了"中国实情宣传周"，把力量集中在东京和关西的演说会上。劳农党和评议会等所组织的对华不干涉同盟准备会，则于5月31日集结二十几个团体正式成立了全国同盟，指责山东出兵虽然打着保护居留民的旗号，实际则是保护华北日本资本家的利益，是对中国革命的支柱武汉政府进行武 352 力干涉，并号召反对出兵、撤退派遣军②。全国同盟在6月和7月间发起"反对干涉中国周"，开展了反对出兵运动。8月间，为了实地观察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和日中两国人民的团结，曾计划派出代表，但是，来自各阶层的十一名代表从东京出发，沿途举办演说会，到达福冈，在此期间，全体代表均被逮捕，因而未能达到目的。社民党于济南派兵后的7月26日，发表了党的声明；次日，赤松克麿、松冈驹吉、宫崎龙介等三人向外务、陆、海三省提出抗议，要求根本改变对华政策③。

对华不干涉运动是继对苏不干涉运动之后的拥护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法西斯进行抵抗的最早的抵抗运动。由于（反动派的）镇压和未建成统一战线，这次运动未能集结广泛的群众，但对于图谋压制中国革命、确立满洲统治权的田中内阁来说，则是莫大的现实危险。加之，在2月20日施行的第一次普选中，无产政党获得了二十四万多票，有八名议员当选；在选举期间，共产党用传单和标语向群众发出号召，对于政府来说，这些都是不能默视的。早在第二次出兵山东之前，1928年3月15

---

① 河野密、赤松克麿、工农书记局编：《日本无产政党史》，1931年，第35页。

② 《劳动者》，第2卷，第6号，1927年6月。

③ 河野等，前引书，第361—362页。

日，田中内阁就逮捕了站在反对运动前列的共产党员等一千多人。接着，4 月 10 日，下令解散对华不干涉全国同盟的骨干组织劳农党、评议会和无产青年同盟。

十六　济南事件

1927年 8 月蒋介石下台后 9 月间，武汉政府并入南京政府，但国民党的内讧仍然继续不断。为了克服混乱，国民政府召回正在访日中的蒋介石。蒋介石在归国前，于 11 月 5 日会见田中首相。田中约定支持蒋的反共行动，同时劝他“不要太急于北伐”，要他首先加强长江以南的统治，努力根除共产主义。田中的内心企图，是要使国民党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讨伐共产党，由此而保全张作霖，以张为傀儡来保全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并扩大权益。在会谈约二十天前的 10 月 15 日，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奉田中之命与张作霖刚刚开始正式谈判，议订修筑满洲五铁路的密约。蒋介石赞同田中的反共主义，但同时又说“中国之实行排日，盖由于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之故”，反而批判了田中的援张政策，主张重新北伐，最后还说：“日本必须帮助吾等同志，完成革命，消除国民之误 353 解，如此则满蒙问题易解，而排日亦可杜绝”①，没有赞同田中的提议。

蒋介石回国后，于 1928 年 1 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 月，同冯玉祥及阎锡山会谈，结成共同战线；4 月 7 日发表北伐宣言。去年国共分裂后退出武汉的共产党，则在华南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或建立广东公社等等，与国民党进行着势不两立的斗争。因此，新的北伐已失去扶助工农的性质而成为蒋介石怀抱统一全国野心来打倒北方军阀的战争。北伐军的组成是，蒋介石第一集团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 102—106 页。

军十五万，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十五万，以及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三、第四集团军。4月10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北军孙传芳和张宗昌部已兵无战意，不断败退。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对战局进展担忧，于4月16日报请参谋总长出兵以保护山东居留民。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外务省上报了同样的意见。4月17日内阁会议，一如前次山东撤兵声明中所预告的，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25日，第六师团五千名在青岛登陆；次日，一部进驻济南。国民政府军追击败退的北军，于5月1日进入济南，市民欢呼迎接。2日，蒋介石也进入济南。

国民党军虽然平静地进入了济南，但5月3日就同日军发生冲突，演成巷战。同日晚，国民政府军撤退，战斗处于停战状态。但参谋本部接到发生冲突的报告后，就要求田中首相增派军队。4日，内阁会议决定并下令从关东军抽派一个旅团。同日，参谋总长命令第六师团福田彦助中将："对中国军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对此，福田师团长向参谋总长回报了下述情况："3日晚，两军代表会晤，取得暂时解决，但目前南方中国军在济南附近驻扎者至少有四万人，对我所怀恶意渐增"，并复电说："我们确信，目前正是日本对南方进行断然惩处，以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机，愿聆高见。"① 出兵的目的从保护居留民阶段发展到为保持国军威信的惩罚措施，事态正向严重阶段发展②。5月7日，参谋本部和当地派遣军为保持"国军威信"而开始策动。

5月7日下午4时，福田师团长根据参谋本部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和要求，限十二小时内答复。其内容共六项：（1）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2）胶济铁路军事运输权由日军司令官掌握；（3）解除第四十军武装，

① 参谋本部，前引书，第90、92页。

② 臼井胜美，前引书，第110页。

并严惩该军司令官及所属肇事人员；（4）蒋总司令前来日军司令部道歉；（5）禁止南军一切排日宣传等活动；（6）对（日本）军队和居留民所受损害以及对（日本）国家名誉所受毁损进行赔偿，由政府进行交涉。这种高压的要求，其真意决不是要同国民政府军达成和解。福田师团长在向参谋总长提出交涉项目的理由中说："我认为日军必须给南军以歼灭性打击，作为对以往中国侮蔑日本的总清算"，并报称已经把派遣军主力集结到济南东北地区①。十二小时的期限过了，国民政府无回答。8日清晨，派遣军按预定计划开始攻击。就在当地军提出上述要求的同一天，7日，参谋本部决定了《对华方策》。《对华方策》把济南事件说成是"中国人藐视日本的具体体现"，说日本对此必须"示以震惊整个中国之武威，根除彼等藐视日本之观念，以此向中外显扬皇军威信，并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表示了武力解决济南事件的态度②。次日（8日），《对华方策》提交军事参议官会议审议并获得通过。陆军从中央到当地派遣军，完全超越保护居留民的范围而开始了以全中国民众为敌的行动。同日（8日）下午，白川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对华方策》，此时据报，第六师团同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战斗，正在实行以武力贯彻要求；于是内阁会议就受制于派遣军的行动，决定增派一个师团。9日，向名古屋第三师团下达出动命令。开始攻击济南的第六师团于5月11日占领该市，连同第二次和第三次增兵，总计一万五千名日军控制了山东。

354

十七　炸死张作霖

日军虽以济南为中心控制了山东，但国民政府军迫近天津、北京，张作霖军败状已难以遮掩。田中内阁已势必把东方会议的《对

① 参谋本部，前引书，第96—97页。

② 同上，第99页。

华政策纲要》付诸具体实施了。1928年5月15日至16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商讨了对内战波及到满洲时的措施，决定向南北两军发出警告："战乱正向京津地区发展，如果此次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且有效之措施。"① 作为具体措施，内阁会议还决定：（1）表示希望两军讲和；（2）如果战乱扩展到京津地区，则阻止南北两军任何一方的武装军队进入满洲；（3）奉军如早期退至山海关以东关外地区，则无需解除武装；（4）在任何场合下均阻止南军侵入关外②。5月18日，矢田上海总领事把内阁会议决定的警告备忘录递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芳泽公使把备忘录递交张作霖，同时劝其迅速撤回关外。

早在4月20日，关东军就向中央呈报，为阻止战乱波及满洲，拟声明将采取"自卫手段"③，仿佛等不得阁议决定就开始了行动。如前所述，关东军在去年6月间就写出满洲"自治"论；济南事件前夕，5月2日，又向军中央提出，排除张作霖，"树立能顺应帝国要求的新政府"，并宣布满洲"独立"④。对满洲对策已经成竹在胸的关东军，从5月20日开始，就用京奉铁路把第十四师团派到锦州，着手准备把第四十混成旅团移驻奉天，并于5月18日把此项意图报告给军中央。对于关东军的此项行动，外务省担心对外关系方面问题，认为使用京奉铁路和向锦州出动为时尚早，表示不肯同意。铃木参谋总长考虑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遂命令关东军待机，等候另有指示。19日，参谋总长同田中首相会谈；20日，向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发出电训："21日可能向贵官发出奉敕命令，向附属地以外出动应在其后。"⑤ 预定21日发出的锦州出动奉

355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

② 参谋本部，前引书，第117页。

③ 同上，第619页。

④ 同上，第147页。

⑤ 同上，第121页。

敕命令改为22日；但到了22日也没有发出。田中首相未能作出向锦州出动的决断。

看来田中首相还打算把张作霖保存在满洲。5月13日和15日，满铁社长山本根据先前同张作霖的密约，达成了关于修筑吉敦延长线、长大线、延海线、洮索线等四条铁路的正式协定①。再则，向南京政府递交五·一八备忘录时，从黄郛外交部长向矢田总领事所表示的态度中觉察到国民政府将把北伐止于长城以南。可以认为，田中判断有利用张作霖的可能性。5月29日，国民政府在表面上强烈抗议五·一八备忘录是违反国际法，是干涉内政，但作为信使的金交涉委员对矢田总领事说他个人认为：（1）国民政府认为最高目的已经达到，换言之，即已经几乎达到了最后目的地；（2）奉军若能自觉，则相信国民军方面，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金委员的发言实际是通知国民政府军不会进入长城以北②。5月31日，田中首相决定停止出击锦州。陆续集结奉天、等待奉敕命令的关东军，对首相的决定表示强烈失望和不满。参谋长斋藤恒在6月1日日记中写道："有人认为，单凭个人意见来搞政治的现任首相，倒不如撤换掉，不能不深有同感，噫！"③

关东军的满洲"独立"计划遭到挫折。但这方面的策谋并未结束。关东军前任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企图暗杀张作霖，以预计这场暗杀将会引起的纠纷为契机，发动关东军来达到目的。计划在张作霖撤回满洲途中伺机而动。张作霖接受日本劝告撤回满洲，于6月3日深夜，乘特别列车离开了北京站。6月4日清晨5时23分，

---

① 吉（林）敦（化）延长线：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门江岸。长大线：自长春至大赉。延海线：自延吉至海龙。洮索线：自洮南至索伦。见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第84—85页。该书并称，此次密约计共五条铁路，除上述者外，尚有吉（林）五（常）线。——译者

② 臼井胜美，前引书，第139页。

③ 参谋本部，前引书，稻叶正夫，解说，第15页。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奉天，在京奉线和南满铁路交叉点上一声巨响，列车被炸毁了。关东军宣称这次事件的凶手是中国南方派的便衣队员，其实，这次爆炸是日军东宫铁男大尉奉河本大佐指示直接指挥，由本属朝鲜（驻军）的工兵队干的。张作霖旋即身死。但河本所期待的纠纷却没有发生。河本的阴谋失败了。与此同时，炸死张作霖事件也把田中首相企图保存张作霖，以加强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搞得灰飞烟灭。 356

十八　田中外交的崩溃

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不仅未能如愿保全张作霖，而且连续三次出兵山东和炸死张作霖事件在全中国范围内激化了反日浪潮，加深了对华政策方面国际上的孤立，导致了田中外交的终结。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于1928年6月18日就任奉天省督办，于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田中内阁对张学良约许给予支持，同时要求他对国民政府不要采取迎合态度。田中企图把对张作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张学良身上，以阻止南方势力对满洲的入侵。但张学良却于7月1日通电蒋介石，表示无意妨碍南北统一，并做出派代表致敬的行动。田中外相看到张学良不重视日本的劝告，再三对张学良进行工作，要他停止与南方妥协。8月，林权助特使奉田中外相之命面会张学良，威胁说，如有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情事，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①，但这也未能挽回张学良南北妥协的心意。1928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东三省一齐悬挂起来，国民政府的统一南北实现了。12月底，日本方面向张学良提出要求，要求推行已同张作霖缔结的修筑满蒙

① 臼井胜美，前引书，第159页。

四铁路协定，进行谈判。但张学良对此事竟回答说将与南京政府协商，不予理睬。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丧失了推行满蒙统治的支柱。现在，日本已陷入这种境地，要解决中国问题，包括满蒙问题在内，就必须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否则就不会有任何进展。

1928年6月9日，北伐军进入北京。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7月19日，向日本通告1896年的日清通商条约及1904年的追加条约无效。日本政府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早在3月已同国民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的美国，于7月25日抢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并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英国也在8月9日解决了南京事件。南京事件爆发当时，日美英三国中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友好的日本，甚至在解决这个事件方面也落在美英两国之后，在同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完全落后了。为了打开陷于僵局的对华政策，日本政府谋求各国理解日本对华政策并予以合作，尤其要同英国确立协调关系。枢密顾问官内田康哉被派去签订由美法两国政府倡议缔结的《非战公约》，田中首相向他授与《对华政策要旨》，并指示他向与会各国首脑进行活动。所谓《非战公约》，即《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1]，规定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8月27日，由美、英、法、意、德、日等十五国签订。外务省把济南出兵这类"为保护居留民之紧急措施"解释为与本条约无关[2]。十分明显，本来就默认行使侵略武力的各国相互缔结的非战公约，是不能成为阻止任何侵略战争的国际保障的。非战公约签订完毕后，内田全权代表根据政府指示向各国首脑解释山东出兵和对满政策，力求获得

357

① 又称《白里安—凯洛格条约》，见《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373页。——译者

② 内田康哉传记编纂委员会：《内田康哉》，鹿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第278页。

谅解，并特别对英国提议共同研究最适当的对华政策。但是，英国政府把对美协调看得比对日协调更重，因而对日本提议表示冷淡。田中内阁的期望落空了。

1928年间，从美国开始，德、意、荷、英、法等主要国均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日本对华政策在国际上的落后愈加明显。从国民政府来说，对日外交关系正常化的首要先决条件是要实现日军从山东撤兵并解决济南事件。关于济南事件以及南京事件、汉口事件的交涉，已从1928年10月开始进行，南京政府正不断取得国际上的承认，背后又有旺盛的排日运动支持，是决不会接受济南事件爆发时日军所要求的那样高压条件的。国民政府要求明确规定日军撤兵期限，并从要弄清对事件的相互责任的立场出发，不仅要搞清中国方面的责任，而且要求追究日军的责任，要求日方赔偿损失。日本政府让步了，几乎全面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主张。1929年3月28日，事件获得解决。5月20日，日本把济南派遣军撤回本国；6月3日，承认了国民政府。在连续三次山东出兵中，田中内阁从中国所得到的，仅仅是强烈的对日不信任。

田中外交不仅在中国遭到完全不信任，在国内也逐渐陷于孤立。反对第一次山东出兵时的是以社会主义者为中心的对华不干涉运动；对于第二次出兵，报刊论调也对田中内阁的失策和走向战争的危险有了批判的倾向；三次出兵的结果，使抵制日货运动日趋激烈，曾经批判币原外交而支持过田中外交的纺织界也开始现出了动摇。币原前外相在1929年2月的贵族院正式会议上挖苦地说：我担任外相时期，对南京事件，"并未特地出兵，日本人一个也没死"，尽管如此，"而在济南事件中，由于出兵，反而搞出许多伤亡"。他痛斥山东出兵"从根本上破坏了多年建立起来的日华两国友好关系"①。民政党于3月31日发表声明指出：尽管政府关于济

358

① 《币原喜重郎》，第370页。

南事件再三声明，说中国当局必须道歉、处罚负责人、赔偿损失以及保障今后之安全等四点，但一点也没有实现。并追究说："这恰似政府向中外检讨山东出兵之不是，无异承认过去之声明为不当而进行道歉"，声明历数其"罪责"说，连续驻兵两年，"耗费数千万日元之国帑，激起全中国之反感，陷旅华日人于危境，牺牲对华关系及南洋贸易，严重损害国家，失信于中外"，最后弹劾田中内阁"理应引咎辞职"①。

田中外交成了内外批判之的，而使其受到决定性打击的，则是与处理张作霖炸死事件有关之天皇对田中的不信任。炸死张事件的真相逐渐传遍了政界的上层。1928 年 11 月，田中首相接受西园寺公望的劝告，向天皇报告说："关于炸死张作霖事件，我想到我帝国陆军中多少有凶手的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进行调查。"天皇要求严肃国军军纪②。但陆军内部固不待言，就连政友会也强烈反对处罚有关人员。在内阁内部对此也无人支持。1929年 5 月中旬，田中首相向天皇作假报告，说调查结果，陆军内没有凶手。天皇申斥田中前后报告不一致，表示了极端不信任③。田中首相失去天皇的信任，被逼辞职。7 月 2 日，田中内阁垮台。陆军省对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处理，只是把主谋者河本大佐处以停职，把村冈关东军司令官编入预备役，把斋藤参谋长等人处以重禁闭。对有关人员只作轻微处分，表明军部中央已无力控制驻外机关，为此后默认军部驻外机关独断独行留下了先例。

---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29年 3 月 31 日。

②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和政局》，第 1 卷，岩波书店，1950 年，第 5 页。

③ 同上，第 10 页。

第十一章　十五年战争的开始

(1929—1935)

第一节　伦敦裁军条约和统帅权的争论

一　世界性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使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危机尖锐化了。危机首先激化了国内的阶级对立。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危机对策，促进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时把危机带来的损害转嫁给劳动人民，这就必然地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使阶级斗争激化起来。危机还毫不例外地袭击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而民族解放运动也更加高涨，威胁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英国早在1931年9月就已经停止实行金本位制，次年2月又制定保护关税法，同年7月，召开渥太华会议，企图靠英帝国内部经济区域化的办法来摆脱危机。由于美国和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着手建立各自的经济区以同英国对抗，于是，过去靠国际金本位制与最惠国条款来维持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便由此崩溃了。各个经济区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同时运用外汇管理、降低法定比价、高树关税壁垒、实行统制贸易、倾销等手段，开展了瓦解其他经济区和夺取市场的竞争。这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就比第一次大战前规模更大而且更加激烈。尤其是，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后进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危机促使法西斯主义抬头，这就使帝国主义的对立更加激烈。美、英、法等

"富国"可以靠加强已有的势力范围来建立自己的经济区，而拥有殖民地不多、经济力量和资源力量又薄弱的"穷国"，要想建立自己的经济区或广大地域的经济圈，就必然要走向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1931年9月，日本即已开始侵略满洲，企图建立日满经济区。不久，意大利和德国也加强国内法西斯体制，同时动手重新瓜分世界。

由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因世界性经济危机而崩溃，第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协调体制凡尔赛体系大大地动摇了。日本侵略满洲，向远东国际协调体制华盛顿体系挑战之后，又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向凡尔赛体系进行挑战。接着，德国和意大利也以建立欧洲新秩序为目标，开始了行动。这样，国际政治便以经济危机为转折点，从协调时代转入对立的时代。1933年6月至7月，国际联盟为讨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对策，在伦敦召开了世界经济会议，但以惨败告终，这就最清楚地表明了世界已进入对立时代。

360

世界性经济危机于1930年春波及到日本，正赶上当时民政党的滨口内阁实行解除对黄金的管制、产业合理化和紧缩财政政策，给日本资本主义以深刻的打击。生丝、棉纱、大米等商品行情和股票价格一齐暴跌，生产和贸易锐减。政府本想通过解除对黄金管制来恢复日本资本主义的元气，这种打算彻底破产了。中小企业相继倒闭，失业者充斥街头，农民生活极为贫困。经济危机也波及到台湾、朝鲜、满洲等殖民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当地的经济。危机对生活的破坏，必然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激化。劳资纠纷和佃农与地主间的纠纷空前增多，朝鲜、满洲、台湾等地燃起了抗日民族运动的烈火。

二 伦敦裁军条约

1929年7月，继政友会田中内阁而成立的、以民政党总裁滨

口雄幸为首的滨口内阁，其任务在于重振因田中内阁大手大脚的财经政策和对华强硬外交而陷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藏相井上准之助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是企图靠收紧银根和产业合理化来克服大战以来的慢性通货膨胀，进而断然解除对黄金的管制，使日本经济成为国际经济的一环，由此消除外汇行市的不稳和国际收支的恶化。要贯彻解除黄金管制的政策，就不能不对英美协调，用对外政策来贯彻井上财政的资产阶级合理性，就不能不搞协调外交。这样就成了币原外交的再度登场。

第二次币原外交的课题，第一是要改善因田中强硬外交而恶化了的对华关系，第二是要使伦敦裁军条约取得成功。在1925年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曾抢先各国表态，愿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但因第一次币原外交遭受挫折，具体谈判陷于中断。在此期间，各国相继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唯独日本落到最后。为了改善对华关系，就必须首先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币原任命其心腹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让他来担当这一工作，但佐分利刚把任务执行到一半，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于是政府又任命小幡酉吉为其后任，并征求国民政府同意（任命外交使节时，需征求对方国家的同意，是外交上的惯例），但中国以小幡曾参与筹划过二十一条为理由而拒绝了。佐分利的横死和小幡的任命，已经足以使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产生疑心了。另一方面，在国内，政友会和右翼则认为中国方面拒绝同意（任命公使），是对日本的侮辱，攻击币原外交软弱无力。

政府赶紧起用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为代理公使，让他担当关 361
税问题的谈判，终于在1930年5月签署了日华关税协定。协定的内容是，在正文中日本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相互约定给予最惠国待遇，在附属的换文中，约定在三年内（但杂品则为一年）按协定税率征税，废除陆境特惠国税率，废除中国的内地关税，加速清理

债务等。对这项协定的内容，因三年协定税率为时太短等，在日本国内也有强烈的不满，但人们期待由于达成了协定，日中关系将会得到初步改善，对华贸易也会有所发展。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不振和银价暴跌，致使对华贸易反而减少了。

这时，币原外交的另一个课题——伦敦裁军会议正在进行。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虽然对英、美、日、法、意五大海军国主力舰的比例、保有量及装备订立了条约，但关于辅助舰问题，却因意见不一，未能解决而遗留下来。因此，建造军舰的竞争就从主力舰转到辅助舰，这不仅给各国财政带来压力，而且加深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成了妨碍国际协调的重要因素。于是，1929年10月7日，英国政府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了举行伦敦裁军会议的邀请。

滨口内阁为了重整财政经济，正需要裁减海军，便立即答应参加会议。任命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相财部彪等四人为代表，并在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所谓三大原则：（1）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七成；（2）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七成；（3）潜水艇保持现有的七万八千吨；以此作为日本参加会议的基本方针。

裁军会议于1930年1月21日在伦敦召开。由于英美两国间业已达成协议，所以会议的焦点完全集中在日本对美国的比率上。日本方面按照既定原则，主张保有美国的七成，但美国主张按主力舰的比率，即日本保有美国的六成，因而会议迟迟不得进展。然而，后来彼此作了让步，至3月13日，美国方面提出了最后的妥协案。其内容是：日本对美的总比率为百分之六十九点七五，大型巡洋舰为百分之六十点二二，轻巡洋舰为百分之七十，驱逐舰为百分之七十点三，潜水艇为五万二千七百吨（与美国相等）。关于大型巡洋舰，由于美国推迟三艘新造舰只的开工，在召开下次会议的1935年底以前，日本对美比率保持百分之七十二点二六。日本的四名代

表经协商后，于3月14日就这项妥协案向政府提出请示。

政府接到请示后，立即研究如何复示。在财部彪海相出国期间兼理海相事务的滨口首相，命令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统一海军部内的意见。在海军部内，强烈反对日美妥协案的，是以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次长末次信正为中心的所谓舰队派。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一妥协案对日本不太重视的舰种虽给以比较有利的比率，但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大型巡洋舰和潜水艇则极力加以限制。潜水艇要从现有吨数减少三分之一，大型巡洋舰虽然在1935年以前可以确保对美国的七成，但此后则会低于七成。因此，即使日本能在下次会议上确保对美国的七成，但由于巡洋舰的建造需要三年时间，在此期间日本会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防上不安全。 362

舰队派局限于作战用兵这种狭隘的眼界，反对日美妥协案；而海军省首脑山梨胜之进次官和军务局长堀悌吉等军政派，则从包括政治和财政等广泛的见地出发，认为只好接受这个妥协案。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如果因为海军反对而使条约不能签订，海军将成为非难的目标，自己的处境也就十分不利。于是，他们取得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等海军元老的合作，劝阻反对派，各方设法调整部内意见。结果，在3月26日最高干部会议上，统一了海军的意见，即专从业务观点来看，反对妥协案，但如果只好妥协的话，则将以补充计划弥补其不足。

滨口首相在4月1日的阁议上，决定复示接受妥协案，经上奏批准后，立即通知了在伦敦的日本代表团。滨口在把这一复示提交阁议之前，曾给冈田、加藤、山梨等人看过，当时加藤并未积极表示反对。但是，到了第二天即4月2日，加藤却向天皇上奏，陈述了反对妥协案的意见。然而，接奉政府复示的代表团于4月22日正式在伦敦海军条约上签了字。这样，协调外交的舞台便从伦敦转移到国内，批准条约这一关就成了考验政党政治力量的试金石。

三　统帅权的争论

裁减海军问题的舞台一转移到国内，它就不单是兵力的问题，而且尖锐地暴露了天皇制国家内在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的争论。

在签订裁军条约的次日①，即1930年4月23日，第五十八届特别议会开幕。在当年2月20日举行的第十七次众议院选举中大败的政友会，提出伦敦裁军问题，对政府进行攻击。政友会批判的重点是：政府不顾军令部的反对而决定复示，“是关系统帅权之重大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否违宪”。统帅权独立是政党政治的最大障碍，由此看来，（政友会）把侵犯统帅权论作为倒阁的手段，这简直是政党的自杀行为。

国会中的统帅权争论，为反对条约派增添了力量。首先，以军令部为中心的海军部内反对派，试图卷土重来。加藤军令部长在讨论制定复示时，尽管态度消极，还是表示同意的；而当国会一旦发生统帅权的争议，他就突然改变态度，认为“兵力问题是小事，统帅权问题是大事”，甚至发展到公开否定政党政治。5月20日，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为抗议签署条约而自杀。进而6月20日，加藤军令部长又上奏谴责政府的措施，并直接向天皇提出了辞呈，[363] 海军部内反对条约的气势更加高涨。右翼也结成裁减海军国民同志会等团体，以决议、国民大会、讲演会、个别说服、散发文件等各种方法，展开了要求废除条约的运动。

统帅权争论的焦点，在于宪法第十二条的编制大权是否也包括在第十一条的统帅事项之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论述说，陆海军的编制与国家的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因此纯属国

---

① 原书误刊作“前日”。——译者

务，只有内阁才能当此辅弼之任①。许多宪法学者亦持同样意见，报纸也给予支持。对此，反对派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有的认为军队的编制是统帅和国务两方面共同负责事项，应由军令机关和国务机关共同辅弼；有的甚至认为第十二条规定的事项属于统帅权范围之内；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无视军令部长的意见而在裁军条约上签字，这是对统帅权的侵犯。

政府依靠元老、财界、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政府党和新闻界，尤其是期待通过裁军来维持和平的一般国民舆论等为背景，压制反对派的顽强抵抗，强行批准了条约。

海军部内围绕统帅权问题发生了纠纷，军政派同舰队派的对立，甚至激化到导致更换军令部部长、次长、海军次官的地步。但是，7月23日召开的海军军事参议官会议，则通过了一件上奏文书，意思是如果采取补充对策，则国防用兵大体无碍。这样，海军最后承认了伦敦条约。

海军部内的纠纷告一段落后，统帅权争论的焦点就转到了枢密院。虽然这时已经进入政党政治时期，但议会还是没有对条约的批准权。批准权依然作为"大权事项"掌握在天皇手中，但枢密院官制规定，天皇在批准之前须向枢密院咨询。当时，枢密院是在反对民政党一派的手中，对协调外交持批判态度的平沼骐一郎（副议长）、伊东巳代治（精查委员②长）掌握着实权，而且，条约精查委员中充斥着反对条约派，审查之难以进展可想而知。但是，政府以各方面的支持为背景，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枢密院的反对派也就终于屈服了，10月1日，条约在枢密院正式会议上通过；2日，正式获得批准。

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交换批准书的仪式。同日，美国总

① 美浓部达吉：《议会政治的研讨》，1934年，第102页。

② 精查，意思是详细审查；此处是职名。——译者

统胡佛、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日本首相滨口同时发表广播讲话，庆祝裁军条约缔结成功。滨口说，该条约给人类的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并祝福时代的发展已从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到达了一个国际协调和国际和平的“稳定时代”。

然而，由于这时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已因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告终结，国际协调主义的基础正在迅速崩溃。在国内，政党政治也已走向下坡而接近破灭。在祝贺条约签订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的11月 14 日，滨口本人就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恐怖势力的364 暗害，迅即一命呜呼，这正是协调外交破产的前兆。

裁军条约问题和统帅权的争论确是暂告结束。这件事本身就是政党内阁推行外交一元化的成功。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皇制国家的矛盾。不仅如此，正如狙击滨口的犯罪动机说是在于滨口侵犯了统帅权那样，统帅权问题激发了凭直接行动来改造国家的运动和军部的公开干涉政治；不久便造成了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变本加厉的开端。

四　国家改造运动

1930年夏，统帅权争论方酣之时，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结成了樱会①。这是一个“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如为此需要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的秘密结社。② 正象其宗旨所述：“政党者流指向海军之毒刃显然行将施之于陆军裁减问题”，结成樱会的直接动机在于伦敦裁军问题和与其相联系的统帅权问题。

① 樱会：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中佐至大尉级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法西斯团体。1930年 3 月建立，1931 年 10 月事件后自然消失。桥本欣五郎(1890—1957)："九一八"事变时与关东军紧密勾结，其后准备发动十月政变未遂。1936 年组织大日本青年党，自任党魁。"七七"事变后，任炮兵联队长、众议院议员。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译者

② 《现代史资料》第 4 辑，《国家主义运动》，I，三铃书房，1963 年，第 651 页。

樱会的宗旨和桥本的手记进而追根溯源，清楚地表明了军部对现状的认识和所抱的危机感。它强调说，由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国家观念减弱了，更由于共产主义思想的侵入，我万邦无比之国体正陷入危机。作为招致这种危机的凶手，他们举出：第一是罔顾民生而只知朝夕争权，堕落为资本家的走狗，腐败卑劣已极的政党；第二是不顾国家利益，一味追求个人私利的资本家；第三是推行追随外交，堕落为“国际妓女”的外交官。①

参谋本部第二部制定的对1931年形势的判断，破天荒地增加了决心改造国家这样一个重大项目，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先决条件。这表明，国家改造的纲领已通过樱会成员成为整个陆军的主张。

改造国家是与对外侵略，即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但在如何实行的问题上，在樱会内部意见也有分歧。分歧点在于是首先改革内部，还是首先对外行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桥本等人认为，靠现在这样软弱无能的政党内阁，对外行动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要改造内部，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从这种先内后外主义产生的计划，就是所谓“三月事件”②。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政变来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人政府。参与这个计划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等军部首脑，和以桥本中佐为首的樱会激进派以及右翼的大川周明一派。这个政变计划结果遇到挫折，但“三月事件”却给予国家改造运动以巨大的影响。第一，由于军部首脑带头以政变来实现 365 改造计划，便使类似的政变计划此后相继出现。第二，由于该计划受到挫折，使先内后外主义退居劣势，而先外后内主义则取而代之

① 中野雅夫：《桥本大佐的手记》，三铃书房，1963年，第15—16页。

② 三月事件：指日本右翼法西斯势力阴谋在1931年3月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政变计划以暴徒包围国会，制造混乱，乘机下达戒严令，把军队开入国会，强迫现内阁辞职。——译者

占了支配地位。后来就表现为满洲事变。

在陆军内部，正在形成一个不同于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幕僚集团的另一个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这就是与北一辉及西田税系统相联系的军中少壮军官集团。后来“二·二六”事件[①]的领导者们，就是从这些人中成长起来的。在海军中也形成了以藤井齐中尉为中心的国家改造运动的骨干，“五·一五”事件[②]的参加者，大都出自这些人。右翼团体也与军部并驾齐驱，投入了国家改造运动。起源于玄洋社和黑龙会的日本右翼势力，本来以对外强硬和向大陆发展为目标的排外主义或国权主义为基本方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把视线转入国内问题，陆续产生了以排斥打击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右翼团体。但是，这些右翼团体的大多数只不过是受雇于政党或资本家团体的单纯反动组织，充当打手角色而已。然而，自从经济危机前后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后，一些所谓革新右翼团体相继建立。急进爱国党、日本国民党、爱国勤劳党、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大日本生产党等就是这类组织。革新右翼团体的特征在于，它并不象过去的右翼团体那样仅止于鼓吹单纯的排外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党政治也进行一定的批判，主张改造国家。它们的作用在于依靠革新的伪装，把国民大众的力量引向反革命的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

第二节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者)

五　日本帝国主义和满蒙

确保所谓满蒙地区，即中国的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① 二·二六事件：参阅本书第十二章。——译者

② 五·一五事件：参阅本书第十一章。——译者

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即热河省，是明治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一贯的基本战略目标。特别在日俄战争以后，维持和扩大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成为关系到日本帝国主义死活的重要问题。

首先是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进而又作为投资场所，满蒙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例如，从满洲事变前夕的对满投资额来看，日本的投资额占各外国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三，日本对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十四集中在满洲。还有，满蒙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占着比其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地位。根据"帝国国防方针"，俄国一直是假想敌国，而满蒙则是对俄军事战略上的前进基地，尤其是俄国革命以后，作为"防止赤化的第一线"[①]，其重要性愈益增长。再则，正如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所说："满蒙问题如不解决，则对朝鲜的统治就难以真正实现，此乃在朝鲜的有识之士的一致意见"[②]，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确保满蒙，也是为稳定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是 1930 年间岛的抗日武装起义，它意味着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已建立了联合斗争的体制，使日本统治阶层大为震惊。 366

由此可见，确保满蒙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与统治阶层的期待相反，围绕满蒙的局势对他们却越来越不利了。继承张作霖的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合为一体，正在使满洲从属于中央。这样，过去那种想通过培植亲日政权使满洲成为特殊地区的满蒙政策，就完全不中用了。中国反而主要以铁路问题为中心，加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中国所计划的修筑包围满铁的铁路线，其背后有美国资本。正当世界性经济危机风暴之时，

① 《宇垣一成日记》第 1 卷，第 49 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资料编》（以下简称《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 年，第 106 页。

又来了中国的对日攻势，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据点满铁陷入了创业以来前所未有的萧条，这就使日本统治阶级越发增大了危机感。

六 穷途末路的币原外交

滨口首相遇刺后，由币原外相代理首相。因滨口病情恶化，内阁遂于1931年4月13日总辞职，14日，即由新当选为民政党总裁的若槻礼次郎再次出马组织内阁。币原留任外相，第二次币原外交得以苟延残喘。但是，由于外临中国的"革命外交"，内有强硬外交论的抬头，协调外交正在逐渐失去作用。

中国的"革命外交"，是以中国的统一和收回国家主权运动的高涨为背景，约从1930年秋开始，由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来推行的。王外长于1931年春发表了"革命外交"的实行方案，把收回国家主权运动划分为五个阶段，要迅速实现收回关税自主权，撤销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和租借地、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和沿岸贸易权等。根据重光代理公使4月14日会见王部长后明确的情况，租借地中包括关东州，而铁路利权中则包括南满铁路。①

重光觉察到事态非常严重，便立即回国，向外务省首脑详细汇报"革命外交"的计划，同时并商讨了对策。重光主张，为了对付"革命外交"，应进一步发展协调外交，由日本首先开始从根本上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个设想是打算通过由日本对"革命外交"作出善意的姿态，来躲避反帝运动的锋芒，使日本在中国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国内形势已经趋向恶化，内阁的政治力量减低，推进协调外交的基础正在迅速消失。经过商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目前情况下，"形势的恶化根本无法防止"，"尤其是从满洲的形势和日本军

①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每日新闻社，1953年，第86—87页。

部的态度来看，迟早不免要发生冲突”。重光提议，既然日中关系终究要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那就必须让它“塌塌实实地行不通”。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用重光的话来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全世界谅解日本在外交上的地位。币原外相和亚洲局长谷正之也都同意重光的这一提议。这样，“塌塌实实”这句话就成了外务省的口号①。满洲事变前五个月，外务省首脑部已经不得不承认协调外交的破产了。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尤其是以铁路问题为中心的满蒙统治危机的加深，对币原外交的批判高涨起来。1931年1月19日，本多熊太郎、西原龟三、松冈洋右、古岛一雄、大川周明等人召开外交恳谈会，打起了反对币原外交的旗鼓。当时正值第五十九届帝国议会召开，政友会在议会提出满蒙问题，攻击币原外交。其中松冈洋右提出了日美关系等五个问题，批判币原外交，驳斥它是“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他说，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②，以所谓满蒙生命线论来煽动危机感，在挑起侵略冲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右翼和军部也起来批判“软弱外交”，向国民宣传“生命线满蒙”遭到危机。而民政党方面则针对这种批判，发表了外交声明，以田中外交为例，对强硬外交论加以反驳。尾崎行雄、新渡户稻造等人则结成国民裁军同盟，呼吁裁减军备和国际协调。

于是，围绕着满蒙政策，举国舆论沸腾。在1931年春季以前，对华强硬论还不那么占优势，对协调外交的支持还相当顽强。可是从春天到夏天，满蒙的形势恶化起来，不断传来关于“排日”、“侮日”事件的报道，强硬论就很快增大了势头。7月2日，万宝山发生

① 重光葵：前引书，第90—91页。

② 松冈洋右：《动荡的满蒙》，1931年，第112页。

了满鲜农民冲突事件，接着，朝鲜各地掀起了对中国人的报复性暴行。这些事件一发生，政友会就责难政府说，事件的原因在于币原的“软弱外交”。政友会把总务长森恪等人派到满洲和朝鲜，让他们进行实地调查。森恪在调查报告中说，在排日方针之下，满蒙的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于土崩瓦解”，并作出结论说：“就是在所谓外交上，现在也已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要挽回这种局面，除发动国力以外别无他法”[①]。政友会以这个调查报告为材料，从9月3日开始在全国进行游说，向国民呼吁解决满蒙问题和刷新外交。军部和右翼团体也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方法，宣传满蒙生命线论，煽动国民的排外意识。特别是，7月18日，满洲青年联盟代表来到日本本土进行游说，一面会见政府、贵族院、政党、财界的要人，劝他们为解决满蒙问题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在各地召开演讲会，向国民宣传积极外交的必要性[②]。就连协调外交的担当者若槻首相因而也在7月19日的党大会上主张起强硬论来了。国民舆论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支持强硬政策，由此可见一斑。及至8月17日，带着军事侦探任务前去旅行的参谋本部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被中国东北军抓住并枪杀，即所谓的中村大尉事件一发表，强硬论便发展到顶峰。尤其是陆军，全体动员，煽动战争狂热。

368

七　柳条沟事件

处在反苏战略体制第一线的关东军，最敏感地感觉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作为克服危机的办法，企图尽早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其中心人物是1928年至1929年相继到任的高级参谋板垣

---

① 山浦贯一，前引书，第694页以下。

② 满洲青年联盟史出版委员会：《满洲青年联盟史》，原书房，1968年，第478页以下。

征四郎大佐① 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② 中佐。他们于1929年7月，以“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为名，前往北满进行参谋旅行，研讨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他们所制定的解决方策，就是试想“变满蒙为我国领土”，为此目的，以关东军为主体，“用谋略制造机会”③，对满洲实行军事占领，象合并朝鲜那样，向中外宣布把满蒙并于日本。

在陆军中央部门也研讨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1931年6月，参谋本部设立了以第一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的五科长会议，并拟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④。这个《大纲》的内容是：在今后一年内，必须隐忍持重，即使发生纠纷，也应尽量就地解决，在此期间让国内外彻底了解满蒙的实际情况和日本的立场。充分作好准备，然后转入军事行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设想，就这样作为整个军部的意图确定了下来。

然而，陆军的中央部门同关东军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分歧。前者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状况和国际形势不得不慎重行事，而后者则反映了当地的危机情况，主张立即断然采取行动。板垣和石原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大佐、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与中央部门的支持者们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推进策划。8月中旬，关东军的策划泄漏到消息灵通方面。由于风传出兵满洲，满铁股票暴跌，9月15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币原外

---

① 板垣征四郎(1885—1948)：日本法西斯战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鲜军司令官、驻新加坡方面军司令官。1948年12月，远东国际法庭处该犯绞刑。——译者

② 石原莞尔(1886—1949)：“九一八”事变策划者。1935年后历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战争指导课长、作战部长、关东军副参谋长、京都师团长等。1941年3月被编入预备役。——译者

③ 《资料编》第101页。

④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三铃书房，1964年，第164页。译者补注：中译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内部发行。

相："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提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于是，币原向南次郎陆相提出抗议说："此种作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① 南次郎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商议后，派参谋本部建川第一部长前往满洲，试图压制关东军的策谋计划。但是，建川本身就是赞成关东军行使武力的人物，加之，派遣建川的消息又很快由 369 桥本传给关东军的板垣，所以板垣和石原便决定在建川到达满洲之前断然实行其计划。这件事他们甚至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和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也没有说。

这样，9 月 18 日下午 10 时 20 分，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属河本末守中尉等，按照预定计划，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沟炸毁了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便以中国兵炸毁了满铁铁路轨道为借口，攻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则进攻沈阳城。板垣和石原在开始行动后，才把计划告诉了本庄繁司令官和三宅光治参谋长，请他们予以支持。于是，本庄下决心说："由本人承担责任来干吧"，便下令全面进攻。此时张学良正率领东北军主力移驻河北，由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未向关外增援一兵一卒。19日，一天之内，关东军占领了沈阳和长春。20 日，占领了安东②、营口、凤凰城③ 等满铁沿线重要作战据点。

八　满洲事变与双重外交

柳条沟事件是对若槻内阁协调主义外交政策的全面挑战，是典型的双重外交现象。19日晨，币原外相在家吃早餐时看报，才得知爆发了柳条沟事件④，其时关东军已经占领了沈阳。外交的

① 《币原喜重郎》，第 466 页。

② 安东：今丹东市。——译者

③ 凤凰城：现改称凤城。——译者

④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读卖新闻社，1951 年，第 171 页。

最高负责人对于对外政策的重要行动竟然毫无所知。在当地，驻沈阳总领事馆的森岛守人领事，向关东军强调以外交谈判和平解决的必要性，但板垣参谋却责问说："已经发动了统帅权，难道总领事还想干涉统帅权吗？"花谷少佐甚至拔出军刀，威胁说："对干涉统帅权者绝不姑息。"①

若槻首相听到事变爆发消息后，立即召集临时内阁会议，暂先确定不扩大方针，让陆军大臣通知关东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王正廷外长于 19 日向重光驻华公使提出了严重抗议。外务省对事件的处理方针是，由于事件是因炸毁南满铁路而发生的局部问题，应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重光公使根据这一方针进行了谈判，然而中国政府则认为直接谈判不可能解决问题，打算靠国际联盟的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于是，21日，中国正式向国际联盟提起控诉。重光向币原报告，南京的谈判已经中断。此后，币原虽曾不断疏通中国公使蒋作宾，试图继续进行直接谈判，但均无效。由于中国向国联提起控诉，同中国的矛盾就扩大成为同国际联盟的矛盾，币原外交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后来，日本便按照"能够在国际上维持面子"的原则，谋求解决这一矛盾②。

国际联盟收到中国控诉后，23日，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召开紧急理事会③。会议决定委任国联行政院主席向日中两国紧急通告，不要扩大事态，并"设法与中日两国代表会商，寻觅适当方法，俾两国能立撤军队"④。美国虽仍然在国联之外，但史汀生(Stimson, H.L.)国务卿却于 24 日向日中两国发出备忘录，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军队。对加害者的日本和被害者的中国发出同 370

① 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岩波新书，1950年，第 52—53 页。

②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和政局》，第 2 卷，岩波书店，1950 年，第 63 页，

③ 国际联盟理事会：我国当时通译作"国际联盟行政院"。——译者

④ 外务省情报部(编)：《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公报集》，1934 年，第 7 页。译者补注：译文参照《中日纠纷与国联》，第 46 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译本。

样内容的通牒，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联和美国对日本的绥靖态度。

日本政府在答复国联和美国的同时，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帝国政府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约定不扩大事态并逐渐撤兵。然而，关东军却不顾政府的公开许诺，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21日，北上占领吉林，10月8日，又南下轰炸了张学良的临时政府所在地锦州。现在，双重政府的局面已完全暴露出来，日本的对外政策陷于完全分裂。出渊驻美大使等人由于原原本本转达外务省的官方电报，竟被称为撒谎大使这样不光彩的绰号。日本的国际信誉一落千丈。

双重外交现象基本上是以统帅权独立为支柱的军部侵犯外交权而造成的，但在军部本身，其内部统制上也有问题。9月21日，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未经天皇裁可，擅自命令一个旅团进驻满洲就是一例。然而，军部中央不仅没有追究其责任，反而企图以事后承认来解决问题。由于22日阁议默认了越境出兵，并承认了出兵经费的开支，天皇也就批准了。

还有如下的例子。11月，关东军企图进攻齐齐哈尔，参谋本部担心向北满进军将刺激苏联，心想设法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于是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即把天皇统帅权的一部分，暂时委托参谋总长执掌，并据此下达所谓"临参委命"的命令。但是，即使这种非常措施，也不能阻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11月19日，第二师团占领了齐齐哈尔。这种以下犯上的作风，给军队内部带来了不统一，使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的现象加速发展起来。

在满洲事变扩大的刺激下，国内的国家改造运动有了发展。"三月事件"失败的樱会急进派勾结右翼的大川周明、北一辉及西田税派，再次策划政变，企图与满洲事变相呼应，一举建立军事政权。这个计划就是所谓"十月事件"，虽然没有实现就被发觉了，但却冲击了元老、政府、执政党等不扩大派及协调主义者，对"满洲事

变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①。在政党内部，也兴起了国家改造运动。当年11月，若槻内阁内相安达谦藏勾结民政党的中野正刚及富田幸次郎、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和床次竹二郎等人，图谋建立拥护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这就是所谓“协力内阁”运动。

早在事变以前，外务省就已经确认了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事变爆发后，政府努力“不扩大”事态，正是为了达到这种“塌塌实实”的目的。9月24日的政府声明极力表白：日军的行动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和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并非意图吞并的军事占领。甚至驻朝鲜军队的越境出兵，也被说成是在条约规定范围之内，企图用这种诡辩使之合法化。但是，随着关东军的侵略逐步升级，也就不可能“塌塌实实地行不通”了。 371

对于关东军独断独行所引起的双重外交现象，最感到难办的是在日内瓦的日本代表团。国际联盟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羡慕英国在1927年出兵上海时所采取的巧妙的外交措施。英国那次出兵是政府和军部事先商量好，充分研究了外交政策，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看准时机而断然实行的。而且在出兵的同时，在国联进行工作，使各国承认其出兵的正当性，完全堵死了各国进行干涉的途径。与此相比，日本的情况则是外交上无准备，军事行动先于中央的决策，外交被置于追随的地位，只好以招架之势为军事行动辩解②。

九　围绕满洲事变的国内动向

尽管若槻内阁对满洲事变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但枢密院和贵族院等的强硬派以及在野党政友会等却积极支持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在财界，日本经济联盟、日本工业俱乐部以及日本商工会议

① 中野雅夫，前引书，第185页。

② 杉村阳太郎，《国际外交录》，1933年，第146—149页。

所、日华实业协会等经济团体也作出强硬决议，开始出现支持改变对华政策的动向。国民大众的动向也急剧变化。伦敦条约时期，要求和平的呼声曾在国民当中占据统治地位。例如，若槻全权代表回国时，国民曾以狂热的欢呼来迎接，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国内，国民生活遭到破坏，政党内阁不仅对此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反而热衷于把危机转嫁给群众来挽救大资本家，甚至不断闹出贪污渎职事件，国民已对政党政治表示怀疑。这种国民意识的变化，对于转变对外政策，是一种有利条件。在把国内矛盾转化为对外危机，并培植国民的排外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方面，满洲事变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第一，所谓满蒙是花费“十万英灵，二十亿国帑”而获得的“圣地”，满洲事变用这种方式挑动了国民的传统感情。第二，所谓满蒙是“帝国生命线”，维护满蒙乃是“行使自卫权”，满洲事变以这种逻辑同国民利益的观念结合了起来。第三，所谓“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惩罚中国之不当”乃是“为了东洋悠久之和平”，满洲事变以这种歪理鼓舞了民族的使命。这一类理论通过报纸、杂志、唱片以及当时听众已达百万以上的无线广播等宣传工具煽起了国民的侵略狂热。大川周明所说的“国民在可以称之为国民的浪漫主义那种狂热中间，赞美并支持了关东军的态度”[1]，这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

372

当统治阶层的对华政策正在明显地转变为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时，反体制势力本应与此全面对抗，并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而他们又是怎样对待满洲事变的呢？

首先，(日本)共产党在满洲事变前夕，就对侵略满洲的行动有所警惕，以 8 月 1 日的国际反战日为中心，展开了反战运动。事件爆发后，马上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危机而发动的侵

① 《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三铃书房，1964年，第 696 页。

略战争，利用《赤旗》、《第二无产者新闻》等机关报及小册子等，号召开展反战斗争。但是，由于不断的镇压，党尚不成熟，或者由于犯了自己瓦解群众基础等战术性错误，未能组织有效的反战斗争。①

中间派的全国劳农大众党，也在事变爆发后的9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上决定成立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对华绝不干涉的声明。不过，实际上的反战斗争只是开了一些演讲会而已。

正当共产党和劳大党指出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战争，并起来展开反战斗争的时候，最有力量的无产者政党——社会民众党却反而肯定了满洲事变。策划满洲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指出："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当然有必要谋求平均国内财富，不过，只在本来就不富裕的我国范围之内……结局肯定是行不通的"，并强调说："总之，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乃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唯一途径"②。社会民众党则与军部的这种言行完全步调一致。他们从"确保日本国民大众生存权"的观点出发，肯定了满洲事变。社会民众党未能从工人阶级立场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正确方策，而是轻率地屈服于统治阶级的"生命线论"，迎合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几乎与社会民众党支持"生命线论"的同时，自由主义的经济评论家石桥湛山③，在自己主办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以放弃满蒙论为基调的大胆的对华政策，并从根本上批判了统治阶层

---

① 冈本宏：《满洲事变和无产政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1970年第1号，有斐阁，1970年，第110—111页。

② 《资料编》第103页。

③ 石桥湛山（1884—1973）：日本战败后加入自由党，历任吉田茂内阁藏相，鸠山一郎内阁通产相，1956年继鸠山一郎任自由民主党总裁并组阁，1957年因病辞职。——译者

的侵略满洲政策。① 他对构成"生命线论"的三个论据：（1）人口、土地（2）资源（3）国防，逐一进行了批判，并且指出：企图甚至"把政权力量也投进去"来确保满蒙，这种作法"至少在感情上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进而与世界列强为敌"，终将"重蹈德意志帝国之复辙"。他还说，只有正确认识"中国建设统一国家的要求"，并毫不迟疑地承认其要求，彻底实行真正的日华亲善，才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途径。国际法学者、东大教授横田喜三郎，也在《帝国大学新闻》上批判了军部的行使自卫权论，主张必须忠实执行国际联盟的劝告。此外，长谷川如是闲、吉野作造等自由主义者，也展开了批判侵略政策的论战。不过，这种少数人的批判呼声实在太微弱，竟淹没在占压倒优势的"生命线论"的大合唱声中，无人理会了。

373

十　中国的抵抗和列强及国联的动向

侵略满洲是向第一次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布局，即凡尔赛体系及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是一声号炮，宣告新的重新瓜分世界斗争从此开始。但是，无论列强还是国际联盟，对这个国际暴徒几乎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日本在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开始了侵略。

石原等满洲事变的导演者们在确定其策谋计划时是以下列判断为依据的：即使进击北满，苏联也不会采取行动，国际联盟也没有实力干涉满洲事态。美国不仅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在对自己势力范围中南美洲的反帝斗争感觉头疼。英国也正为金融危机对策忙得不可开交，以至 9 月 21 日先于各国放弃金本位制，而且被海军叛乱和印度独立运动搞得很伤脑筋。加之，由于

① 《石桥湛山全集》第 8 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1年，第 22—30 页。

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明显化，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协同步调几乎已不可能。不仅如此，对苏联抱有恐怖感的帝国主义各国，反而指望日本的军事行动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向中国渗透，不久将会发展为对苏战争，因而对日本侵略满洲不肯采取积极反抗措施。

国际联盟的措施也反映了列强的态度，同样是极其消极的。国联接到中国控诉后，向日中两国政府发出了不扩大事态的紧急通知，接着，9 月 30 日的理事会也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决议。不过，它却没有明确规定日军撤退的期限，而只是相信日本政府的声明，期待事件结束，是极为姑息的决议。尤其成问题的是，直到这个阶段，不论是国联或与国联步调一致的美国，都不认为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也不把中国看作是被害者。因此，国联的措施毕竟对日本是有利的。列强和国联对日采取绥靖态度，极为明显。国联成了西欧列强的工具，为维持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而发挥作用，各小国对此表示了不满①。

尤其是中国本身的国内形势，更为日本侵略满洲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国共对立，而且国民党内部也在分裂，在这种形势下，就不可能团结起来为对抗日本侵略而战。其原因，首先在于蒋介石政权的反革命政策。当年 7 月，蒋介石开始动员了三十万军队，正在开展进攻中国共产党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侵略满洲开始以后，蒋介石仍然采取不抵抗主义。在 9 月 23 日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他强调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静待国际公理的判断。"② 374

中国共产党在 9 月 22 日号召武装抗日，呼吁"组织群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号召"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予日本帝国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 2 卷，第 352—353 页。

② 录自《从九一八到七七》，《抗战的中国》丛刊第 3 页。——译者

主义以打击。"[①] 中国民众掀起了抗日运动，支持共产党的号召，并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依靠国联的政策。在上海，十万学生和三万五千名在日本码头作工的工人罢课罢工，还举行了十多万人的大规模抗日集会。10月，上海、北京以及全国主要城市都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抗日义勇军。还有以自发地辞去日营工厂职务的形式的抗日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及对日经济断交运动也高涨起来。日本对华出口急剧下降。民族资产阶级也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11 月 5 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抗日运动，镇压抗日运动，但在国民党内部，围绕抗日方针，意见分歧也加深了，蒋介石不得不暂时下野。

然而，中国民族内部分裂的原因并不仅在于蒋介石的反共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极左路线也是加深分裂的重要因素。1931年 1 月以后，由于侵略满洲，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进入了新的阶段；而掌握共产党领导权的陈绍禹等人未能正确地把握这一事实，却以当时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主要打击中间势力"和"拥护工人祖国苏联"为方针，因而未能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②]。其结果，他们未能把逼得蒋介石下野的民众抗日运动组织成为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反而使蒋（介石）一汪（兆铭）联合政权这个反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建立。

十一　史汀生主义

关东军不把国联和列强的绥靖政策放在眼里，更加扩大了军事行动，使政府关于"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的努力白忙一场。特别是10月 8 日关东军对锦州的轰炸，由于这是在满铁附属地以外的军

---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芝宽译，国民文库社，1956 年，第 171 页。

② 小野信尔：《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统一战线》，《讲座日本史》7，东大出版会，1971 年，第 254—256 页。

事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9日，国际联盟秘书长杜拉蒙(Drummond,J.E.)发表了关于防止事态恶化的第二次通告。从10日至12日，英、美、法、意、西各国驻日大使，对轰炸锦州提出了抗议。所谓满洲事变是日本"自卫行为"这种道理已经讲不通了。连过去一直信赖日本政府声明，采取绥靖态度的国联，也突然强硬起来，10月24日的理事会通过了劝告日军限期撤兵的决议。国联盟约规定，必须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才能成立，由于日本投了反对票，这项决议未能成立，但十三比一的表决结果，如实地表明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为打开这一局面，日本作出了一切努力。10月26日，政府发表第二次声明，强辩说，中国的收回国权运动和排日思想正在破坏着关系到日本国民生存的权益，在这种时候要求日军撤退，会使事态更加恶化，企图使军事行动的扩大正当化。① 事实上，在列强中，对日绥靖主义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在11月16日的理事会上，中国代表提议对日本应适用国联盟约第十六条(经济制裁)，但被否决。而且，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又使列强怀起发展成为对苏战争的希望，这就更加助长了对日绥靖主义。12月10日的理事会虽然通过了六项决议，但其中第五项的设立调查委员会，其目的在于使列强知道中国的排外排货运动等乃是"扰乱国际和平的原因"，是企图由此导致对日绥靖。此外，该决议还规定要日中双方撤兵和停止战斗行为等，但日本在接受此决议时，要求对战斗行为问题保留意见，理事会便通过了如下宣言，说日本"为直接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对于土匪及不法分子的活动不妨采取必要之行动"。结果是，日本可以假借讨伐"土匪及不法分子"之名，公然镇压满洲的抗日运动，同时扩大侵略行动。

375

于是，12月28日，关东军开始向锦州进击，1932年1月3日

① 《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文件汇编》，第41—42页。

占领锦州。事变爆发后不到四个月，就完全控制了东北三省。美国感到有从满洲资本市场被完全排挤出去的危险，态度就自然强硬起来。1月7日，史汀生国务卿宣布对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一概不予承认的所谓史汀生主义，谴责了日本的行动。然而，直到这个阶段，西欧列强也还不同意美国的强硬态度，各国对日态度仍不能统一步调。尤其是英国对于日本最为纵容，甚至还表示善意。这是因为，只要日本的侵略行动不超越与英国权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东北，中国反帝斗争的矛头就会指向日本，这对英国反倒有利。英国还指望日本起到制止中国革命和反帝斗争的进展，即"远东宪兵"的作用。英国保守派报纸《晨邮报》(Morning Post) 1931年11月30日论述说："对于辽阔远东的秩序和良好政治之实施，日本是唯一的主要因素"，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对日态度。

在美国内部，也有仍然不能采取对日强硬政策的情况。胡佛总统在10月中旬向阁议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备忘录中指出："满洲正处于不可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并强调说："其北方与布尔什维克俄国接邻，如果其侧面又出现——这也是有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就将危及我们的生存。"史汀生担心由于日本侵略满洲，"必然将给美国的贸易带来直接的物质损失"。美国一方面指望日本成为反共的壁垒，另一方面又感到它是争夺市场的敌手而有加以牵制的必要。除了这种矛盾之外，再加上对日战争准备不足，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不能显得干干脆脆。

376

第三节　在满洲建国

十二　满洲独立计划和币原外交的崩溃

关东军发动事变是要实现变满蒙为日本领土的计划，但在事变之后，又迅速从领有方案转变为所谓独立方案。这就是参谋本

部1931年度《形势判断》[1]中所说的从第三阶段向第二阶段后退一步。其理由在于：对主张建立亲日政权（第一阶段）的陆军中央表示妥协；考虑了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形势及对华关系；还有石原从满洲青年联盟等的"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思想体系受到了影响，等等。[2]于是，关东军就推行起建设满洲国的计划来。

新国家的元首决定拥立清朝已退位的皇帝溥仪（宣统帝）。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担任了把溥仪从他当时隐居其中的天津日租界拉出来的角色。币原得知正在搞拉出溥仪活动后，认为"这将成为将来帝国经营满蒙的严重祸根"，便于11月1日训令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阻止此项活动[3]。然而，尽管桑岛严加警戒，土肥原仍然于11月8日策动所谓第一次天津事件的暴动，并趁机把溥仪带到了满洲。这真是活灵活现的双重外交。不过，由于军部中央事后承认了当地军队的行动，而政府也于事后承认了军部的行动，所谓双重也就不成其为双重了，日本外交的特殊性正在这里。随着关东军稳步而顺利地推进建国工作，中央部门也就承认了它，于是既成事实就成为国家的方针。1932年1月6日，在陆、海、外三省的有关科长之间决定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要纲》，[4]声称"把满蒙与中国本土政权分开，使之成为一个政权的统治区域，并加以引导，使之逐步具有一个国家的形态。"陆军中央部门并把这一方针向当时正在东京的关东军参谋板垣作了指示。3月12日，这个方针在阁议上正式通过，其时已是满洲国成立之后了。

正当币原外交因满洲事变而走投无路之时，民政党内阁中的

---

① 指1931年4月参谋本部制定的《形势判断，解决满蒙问题》。所谓"第三阶段"，即占领满蒙。参阅《日本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36页。——译者

② 秦郁彦：《军法西斯运动史》，增补版，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第227—228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87页。

④ 《资料编》，第171—172页。

另一个支柱——井上藏相的紧缩财政政策也正在破产。自从英国停止金本位制以后，各国相继效法，国内外资本估计到日本将脱离金本位制，蜂起抢购美元。前此一直支持紧缩——合理化财政的财界，也开始要求改变财政金融政策。中国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列强和国际联盟的干涉也软弱无力，侵略满洲在出乎预料地顺利进377 行，这一连串有利形势，使要求改变内外政策的呼声逐渐增强。安达内相与政友会合谋的联合内阁运动，使第二届若槻内阁从根底上崩溃了。1931年12月11日，若槻内阁总辞职，币原的协调外交也同时告终。尽管民政党在议会里占绝大多数，但害怕军部和右翼反对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却奏请让第二大党政友会的总裁犬养毅出来组阁。

犬养内阁面临的课题是，在内政问题上改变财政经济政策，在外交方面解决满洲事变。12月13日完成组阁的犬养内阁，当天即宣布再度禁止黄金出口，转而推行积极的通货膨胀政策。停止金本位制，则外汇汇率就会下降，输出就将增加，就会刺激产业活动，就能恢复景气，这就是政友会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时确实好象有景气将要恢复的苗头，但最后国民对政友会积极政策的期待还是落了空，只得在萧条的深渊里不断挣扎。另一方面，疯狂抢购美元的财阀，则由于再度禁止黄金出口而如愿以偿，获得了巨大利益。于是，对政党的不信任和对财阀的反感在国民中间蔓延起来，酿成了一种使人们易于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

对于犬养内阁来说，比内政问题更难解决的是以满洲事变为中心的外交问题。起初不设专职人员而亲自兼任外相的犬养，与玄洋社的头山满和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文，有过亲密的交往，思想上接受了亚细亚主义的思潮，对中国问题怀有特殊兴趣。当他身为在野党总裁时，曾拼命攻击协调外交，是一个主张对中国采取积极态度的人，但却反对关东军的所谓独立方案。他之所以如

此，正如他在给元帅上原勇作的信中所说，是因为担心“以现在的趋势向建立独立国家推进，势必招致与九国公约的正面冲突”。[①]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是，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而在经济上建立日中联合的新政权，“只限于形式上分立政权，事实上则达到我国之目的”。组阁后不久，他就派心腹萱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中国，与政府要人进行谈判。然而，这项秘密工作竟被对中国主张强硬论、与军部保持密切联系的内阁书记官长森恪所察觉，而宣告失败。身为首相兼外相，却不通过正式外交机构，而不得不用私人使者来进行外交谈判，而且竟遭到阁员阻止，由此可见日本外交积弊的根深蒂固。

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前提，犬养首相还感到必须克服“上官之意不能贯彻于下僚……佐官一级之联合力量竟使上级自然默从的状态”，恢复对军队内部的控制。这是因为双重外交的原因之一正在这里。（犬养）把革新派[②]瞩望的荒木贞夫安排为陆相，也无非是希望靠荒木的人望来恢复对军部的控制。然而，荒木却搞“派阀人事”，把宇垣派的人物赶出军部中枢，而代之以本派（皇道派[③]）人物，结果和犬养的期望相反，使军队内部的派系对立越发激烈起来。荒木在人事安排上的更大弊病，是抬出元帅闲院宫载仁亲王来当参谋总长，利用皇族的权威，造成使统帅权处于优越地位的体系。他还安排自己一派的真崎甚三郎中将为次官，使之掌握实权。海军也与此相对抗，抬出元帅伏见宫博恭王来当军令部长，并把反对伦敦条约派的加藤宽治的嫡系高桥三吉中将安排当 378

① 岩渊辰雄：《犬养毅》，时事通信社，1958年，第200—201页。

② 革新派：泛指反体制的少壮法西斯军官或官员。——译者

③ 皇道派：日本法西斯军人中的一派（主要是青年下级军官），他们认为必须在拥护天皇的名义下，对现内阁进行武装政变，建立军部独裁。另一派则认为不经政变，也可以实现军部独裁，被称作“统制派”。——译者

次官，以强化统帅权。

犬养所忧虑的以下犯上的风气，在外务省内部也出现了。满洲事变以后，与军部的强硬外交相呼应，以白鸟敏夫情报部长为核心的“革新派”，勾结森恪书记官长和陆军省军事科的铃木贞一中佐等人，主张强硬外交，甚至对后来专任外相的芳泽谦吉也采取了反抗态度。于是，下届斋藤内阁外务次官有田八郎，为了便于控制省内，决定把白鸟调任驻瑞典公使。但是，白鸟竟不服从命令；加之，支持白鸟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在省内演成激烈的对立，结果落得有田次官竟以未能尽到控制外务省内的责任而引咎辞职。

十三　上海事变

犬养内阁的组成表示日本的统治阶层已开始支持强硬路线。这就助长了驻华军队和侨民的气焰。果然，内阁成立后不到一个月，战火就波及到华中的国际城市上海。上海是抗日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抗日运动的中心。那里不断召开市民反日大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展开抵制日货运动，其结果，上海进口商品中，日本商品所占的比例，1930 年平均每月为百分之十九，到 1931 年减低为百分之三，日本人所经营的工厂也被迫缩短工时或停业。1931年12月，除纺织业以外，各工业部门近九成的工厂，都被迫停业或关闭①。

目睹反日运动高涨，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于 10 月 9 日召开第一次上海居留民大会，通过了呼吁“为杜绝不法而横暴的对日经济绝交，应立即断然采取强硬而有效的措施”的宣言和决议，并分发给政府、政党和军部的要人。10月 27 日和 12 月 6 日，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会和全中国日本侨民大会先后在上海召开，要求断然实行积极的强硬政策。

---

① 上海居留民团(编)：《上海事变志》，1933 年，第 73、85 页。

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同日本侨民的对立，已使日中关系陷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在这里起了点火作用的，又是军部的阴谋活动。1931年10月上旬，关东军板垣参谋委托驻上海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请在上海发动事变，以转移各国视线"。第二年，即1932年1月28日傍晚，被田中所收买的中国人狙击了正在前来化缘的日莲宗僧侣一行。正在待机行事的右翼侨民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的三十多人，便袭击了被认为是抗日运动据点的三友实业社，并与中国警察发生了冲突①。

1月20日，上海日本侨民召开第二次大会，决议说："现在抗日暴行已达于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以期灭绝抗日运动"，并蜂拥赶到驻上海总领事馆和陆战队本部，督促政府下决心。② 同满洲事变与满洲青年联盟之间的关系一样，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焦点上的侨民，成了强硬外交的旗手。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同中国十九路军发生冲突，战火终于笼罩了上海。据说陆战队这一行动，是出于妒羡陆军在满洲的活动，企图在自己负责警备的地区上海立上一功。不过，关东军的独断独行不仅已经取得军部和政府的追认，而且天皇还在1932年1月8日下诏，嘉奖关东军的行动并给以鼓励。而这一次却不像满洲事变那样简单。这是在抗日运动的中心，对手又是抗日热情很高的国民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陆战队立即陷入苦战之中。海军不得不向陆军求援。2月5日，决定派去第九师团和混成旅团。

379

上海是一个国际城市，欧美在华权益集中在这里。英国在中国投资的约八成、法国的约九成、意大利的七成、美国的六成以上

---

① 田中隆吉：《上海事变是这样发动的》，《知性》增刊——《未公开的昭和史》，1956年，第182页。

② 《上海事变志》第37—38页。

都在上海。① 正因为这样，欧美各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表示了强硬态度。战斗开始的1月28日，美国驻日大使福白斯(Forbes,W.C.)马上向芳泽外相提出警告。29日，驻上海的英、美总领事开始出面调停，总算达成了暂时停战协定。战斗再度开始之后，他们也一再对日本提出了抗议。

蒋介石同满洲事变时一样，还是不派增援部队，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和依靠国联的政策。但是，由于第十九路军在中国民众热烈支持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继续陷入苦战。2月23日，阁议决定再增派两个师团，并组成了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随着事变的长期化，日本统治阶层开始怀起深刻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首先是在国际关系方面，尤其是担心对英美关系的恶化。高桥藏相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令人不寒而栗。"② 日本统治阶层还担心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把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都包括在"日华纠纷"这一概念之中而主张两个事变不可分割论。这是因为害怕凭满洲事变所获得的新权益也会丢掉。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直到现在的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③；高桥藏相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真是令人不胜担心。"④ 这些话都清楚地表明了统治阶层的危机感。对抗中国所主张的两个事变不可分割论和380"日内瓦"主义，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是把满洲问题和上海事变截

---

① C.F.雷曼：《各国对华投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译，1934年，第305，435，697，728—729页。

② 《木户幸一日记》上卷，东大出版会，1966年，第136页。

③ 《西园寺公和政局》第2卷，第201页。

④ 同上，第216页。

然分开，对于后者坚持“就地解决”主义。[1]这种努力由于“英美的谅解态度”获得了成功，在英、美、法、意公使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之下，日中两军反复进行了停战谈判，至5月5日签署了停战协定。于是，日本统治阶层所担心的危机才算暂时躲避过去。

十四　满洲建国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的宣战布告

上海事变是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地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调查团，以英国的李顿（Lytton，V.A.G.R.）爵士为团长，即将来到满洲。关东军的意图是，在调查团来到之前，造成既成事实。2月5日起召开建设新国家幕僚会议，着手实行这项计划。为了走走所谓建国是根据当地居民自发意志这种形式，关东军于2月16日把满洲事变过程中各地建立的傀儡政权代表召集到沈阳开会。其中中东铁路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吉林省长熙洽等人是反共慈善团体红卍字会的会员，这个团体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的尖兵，其背后有黑龙会和大本教在操纵[2]。板垣参谋等人也出席了会议，而提案实际是由关东军参谋部第四科所组织的自治指导部提出的。自治指导部虽然形式上以中国人为部长，但实际上其职员绝大部分由日本人担任，在各地组织了官方操纵的人民大会和群众游行，大肆推行“促进新国家建设运动”的活动。会议就国体、国号、政府组织法、保障人权条例等新国家的

---

① 黑羽清隆《上海事变录》，《历史学研究》第376号，1971年9月，第42—43页。

② 前岛不二雄：《军法西斯运动和大本教》，《日本史研究》第75号，1964年11月，第64页。译者补注：大本教，日本神道教之一支，十九世纪末出现，杀出口直（1837—1918）为教祖，经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发展，并与世界红卍字会相勾结。1933年以“皇道大本”为名改称昭和神圣会，法西斯倾向强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活动时，又改称大本爱善苑，派别很多，流布甚广。——译者

基本骨架进行讨论，于次日即17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18日，该委员会即发布独立宣言，声明完全脱离国民党和中国政府。[①] 后来李顿调查团所发表的报告书指出：对于满洲国的建立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的，是："一为日本军队之驻在，一为日本文武官员之活动"；并断定说，现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②]

完成了建国准备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于3月1日，以张景惠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声称"根据三千万民众的意向……同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被拉来当上执政的溥仪，也发表了讴歌"王道乐土"的执政宣言。然而，正如《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381 所表明的，实际统治则是"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之下，主要通过日本官吏"来进行，满洲国是个"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不折不扣的傀儡国。[③] 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官吏中，日本人所占的比例竟达五、六成之多。[④] 各行政机关的头头虽由满洲人[⑤] 担任，但国务院总务长官以及各部的次长、司长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省次长以下的主要职位，均由日本人把持。3月9日，与建国仪式同时举行了执政就任仪式的溥仪，在第二天就向关东军司令官约定，有关国防及维持治安、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等的管理和新建，均委托给日本，并向日本军队提供设施，以及聘请日本人当顾问等。这些约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同郑孝胥国务总理逐一缔结各项协定而具体化。日本通过关东军和日本人官吏完全掌握了满洲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实权。

---

①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参阅第356页以下。

② 国际联盟协会：《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1932年，第208页。译者补注：参见世界书局英汉对译本第307页。

③ 《现代史资料》7，第589页。

④ 驹井德三：《大满洲国建设录》，1933年，第141页。

⑤ 日伪统治时期称我东北居民为"满洲人"。——译者

犬养内阁虽然起先不赞成满蒙独立方案，但在萱野工作失败之后，也就逐渐承认了它。1932年1月12日，驻奉天森岛代理总领事电告犬养兼任外相："大势至此，唯有以新国家之建设为既定事实，从速就对外关系之善后措施确定一定之方针，尽力阻止外国方面之干涉以资确立帝国在满蒙的地位，舍此别无他法。"① 3月12日的阁议，通过了《处理满蒙问题方针要纲》，声称要"对满蒙……应逐步诱导，使它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并加以扩充，应以新国家为对手，谋求我国在满蒙权益之恢复与扩充"。② 同日，阁议所决定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并确认：为求"对外关系尽可能不发生障碍"，对满洲国暂不给予国际法上的承认，而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满洲国之间结成事实上的关系，以此来"努力实现并扩充帝国之权益，造成既成事实。"③ 4月26日，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签署了向满洲国提供两千万日元贷款的合同，这意味垄断资本的主流已追认了军部的侵略，并在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

然而，对满蒙的掠取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发表建国宣言的3月1日，中国代理公使向新上任的芳泽外相提出抗议说，日本分明在援助满蒙独立活动，日本政府必须对这种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行动负完全责任。于是，3月11日国际联盟临时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满洲新国家。

当国民党政府依然奉行不抵抗主义和依靠国联的政策之时，1931年11月27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省瑞金成立，并于1932年4月26日向日本发出了宣战布告。这个布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假借事变之名推进侵略的虚

① 《外务省的一百年》，下，第218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204—205页。

③ 《现代史资料》7，第495页。

382 伪性，从这时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最终战败，共产党始终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了彻底的抗战。对此，蒋介石则高唱“攘外必先安内”①，说中共为“心腹之患”，而日本的侵略则仅仅是“癣疥之疾”，一面对日本之侵略满洲采取不抵抗主义，一面对中共进行疯狂讨伐。6月间，在连续三次向苏区发动进攻之后，又动员五十万大军，开始了第四次围剿。

十五 “五·一五”事件

与币原外交相比，犬养内阁的外交政策虽然明显地倾向于积极外交，但基本上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框，由于顾虑国际关系，对正式承认满洲国还踌躇不定。1932年2月15日，即满洲建国前不久，犬养首相在枢密院会议上回答石井菊次郎顾问官的质问时，明确表示不承认满蒙的新独立国家。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听到这话后，写下他的感想说：“我想此事或将成为他日引起相当问题之因。”②

随着国民生活的贫困化，特别是农村危机的发展，对政党和财阀的不信任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分子肆无忌惮地干起来恐怖勾当。1932年2月9日，以井上日召为头头的血盟团员暗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3月5日，又暗杀了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接着，5月15日傍晚闹出了“五·一五”事件，受到藤井齐③影响的海军青年军官和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结成队伍，与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所领导的爱乡塾学员合谋，袭击首相官邸及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察厅、变电站等处，妄图使东京市区陷于混乱，乘机发布戒严令，造成改造国家的开端。

---

①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任外交部长宣誓会上的演说。——译者

② 《木户幸一日记》上卷，第139页。

③ 藤井齐：时为海军少佐，法西斯分子，参见本章。——译者

他们的动机，如同他们散发的《告日本国民书》中所指出："追逐政权党利的政党及与政党勾结、榨取民众膏血的财阀，还有维护政党财阀而日益加强压制的官宪，……腐败的军部，恶化的思想，苦于涂炭的农民、工人"，凡此等等，已使日本濒于灭亡的危机[1]；而对犬养内阁对外政策的不满，也是重要动机之一。他们认为"对共产俄国东渐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朝鲜处境也非常危险"，"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因此，"必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2]

这次行动仅只暗杀了犬养首相，其计划本身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一国首相在官邸被枪杀，这种事件对国内外震动很大。"五·一五"事件的最大效果，乃是由此结束了政党政治。元老西园寺与军部前辈及担任过总理的人们就下届首相问题反复商量和考虑的结果是，避开第一大党政友会的继任总裁铃木喜三郎，而奏请由历任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担任下届内阁首相。5月26日，即事件后第十一天，才成立了斋藤内阁。西园寺希望斋藤内阁能起"过渡内阁"的作用，心想待至事件风潮平息后再恢复政党内阁。然而与这种希望相反，斋藤内阁反而"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了。政党政治的崩溃，使协调外交的基础更加缩小。国际协调主义更加衰退，日本外交自身的矛盾愈益加深。 383

十六　1932年提纲

在国外，通过满洲建国而公然进行瓜分中国；在国内，由于"五·一五"事件而政党政治崩溃，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开始抬

① 《现代史资料》4，三铃书房，1963年，第103页。

② 《5·15事件陆军有关被告人员预审调查书》，昭和8年，第142号，《违犯取缔爆炸物惩处条例、杀人及杀人未遂》，第3册，陆103，201页。

头，这就给反体制运动带来严重的困难。

由于满洲事变的爆发，在无产者政党中也产生了与“生命线论”相呼应，并倾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趋势，侵略满洲的顺利进展，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社会民众党早就以“确保日本国民大众生存权”的民族主义逻辑肯定了对满洲的侵略。1932年1月，该党书记长赤松克麿更向党大会提出了新运动方针。其主要内容是：（1）尊重国体，（2）否定阶级国家观和扩大国家的统治机能，（3）否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明确其民族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国家社会主义的方针。这种新方针获得通过后，赤松一派进而主张解散党，结成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但未获通过，便退党而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党准备会。中间派的全国劳农大众党中，也有今村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从国家社会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彻底改革运动方针，但没有获得通过，他们便退党而同赤松等的新党准备会合流了。5月29日，这两个党的退党派结成了日本国家社会党。30日，全国劳农大众党领导下的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和社会民众党影响下的劳动总同盟中，也有了脱离同盟组织的集团，以此为中心，组织了国家社会劳动同盟，并投入国家社会党系统。日本国家社会党的纲领是所谓“基于一君万民的国民精神，以期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日本”，与军部革新派的理论同出一辙。

在国家社会主义派退党之后，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于7月24日合并，结成了社会大众党。社大党初期标榜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实现中国的民族自治，废除治外法权等对外政策，总的来说，是以反帝国主义为基调，坚守反战、反法西斯立场的。然而，到了后来，比如对“五·一五”事件中的青年军官表示共鸣，把他们当作“同志”而寄予期望等等，其反法西斯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样，当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总的来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色

彩减弱，反而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之时，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则一贯坚持反对战争的立场。不过，它们的运动每每犯极左冒险主义的错误，缺乏群众基础。在这种时候，为反战斗争提出新的指针的，是1932年5月共产国际发表的《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提纲》（1932年提纲）。这个提纲由三章组成，在第一章"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中指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更加激化，产生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为准备进行争夺太平洋霸权的新战争而整备武装；而且"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与对殖民地各国的奴役"和国内反动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接着，在"当前革命的性质"一章中，举出天皇制、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垄断资本主义三者是构成日本统治体制的因素，特别强调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天皇制的作用，并规定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断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最后一章"革命运动的现状和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中，指出必须揭露帝国主义反革命战争的"强盗性质"，揭露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国民权益"、"保护日本国民生命财产"等战争口号的本质等，指出了党在反战斗争中的任务。

为了遵循这个提纲，确立运动的新方向，日本共产党召集了全国代表会议。但在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由特务挑起的抢劫银行事件，全体干部被逮捕，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32年提纲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尤其全面地批判了满蒙政策，提出了"通过同已经解放的东方各民族最密切的合作，谋求日本的社会主义的繁荣"这一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相对抗，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个提纲也有一些缺点，它过分强调打倒天皇制，而忽视了法西斯的危险性；并主张重视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斗争的社会法西斯论等等。这种缺点与（统治阶级）政权的残酷镇压政策相结合，形成反战、反法西斯统一

战线未能结成的重要原因。

这样，反体制势力虽然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却未能拿到广大人民中间供人们抉择，对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几乎未起到什么影响。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大部分人反而被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逻辑所俘虏。

第四节　退出国际联盟

十七　日满议定书

斋藤内阁面临的外交课题，是解决承认满洲国问题。斋藤内 385 阁继承了犬养内阁的渐进主义。在6月1日召开的第六十二届临时议会上，斋藤兼外相说，现在还没到承认满洲国的时候。但是，要求立即予以承认的叫嚣越来越高。关东军、满洲国政府、满洲国协和会等开始大搞活动。在国内，财界主流通过对满贷款，实际上已承认了满洲国，各大报纸也开始主张立即承认。于是，6月14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

这种状况当然引起列强警觉。6月22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Lindley, F. O.）向外务次官有田八郎提出警告说："满洲国独立这件事本身，虽还不能马上就说是违反九国公约，但即便稍微支持一点独立，也会是违反条约精神吧！"并问道："（日本政府）是否要在李顿爵士从满洲归来之前就承认满洲国？"日本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代表团也来电说："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此间空气……颇为神经过敏"。并且指出："李顿调查委员会是由于日本的提议而设立的，尽管目前即将触及问题的核心，但如果在这之前承认了满洲国，则将对日本的行动掀起责难和攻击"，并请求延期承认，说："因此，至少在李顿报告书提出之前，应暂缓承认，给该委员会留点面子，并表明日本态度是公正的，将来即使否认报告书并发展到退

出国际联盟，也可稍许缓和各国的误解和反感”。①

直到这个阶段为止，外务省及政府的基本方针仍然是极力避免刺激国联的渐进主义。不过，外务省内部也正在发生走向否定协调外交和主张积极强硬外交路线的转变。7月6日，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被新任命为专任外相，这种倾向迅即增强。内田就任外相反映了斋藤希望得到军部支持的意向，而内田本身也是这样的人物，他认为“从日本国立场来看，满洲问题已不存在，有的只是承认满洲国问题。”② 因此，他一进入外务省，积极的强硬外交论就非常得势，这是必然的结果。在内阁会议上，内田外相支持荒木陆相关于退出国联的主张，在外务省内部，革新派官僚也抬头了，甚至连外务省情报部的科长也竟然力陈起退出联盟的绝对必要来了。

连续三个月对满洲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于7月4日再次来日。7月12日，内田外相在同团长李顿爵士会谈中表明了将正式承认满洲国的意向。而且，内田于7月14日向天皇报告了此事，8月25日，在第六十三届临时议会上表明：“政府已决心从速承认满洲国，目前正积极进行准备，一俟准备完毕，即将予以承认。”在回答政友会森恪的质问时，内田外相竟得意忘形地说，为了解决满蒙问题，“举国一致，即使把国家化为焦土，也决心贯彻这一主张，寸步不让”，使社会大吃一惊。外交的任务在于不要把国家化为焦土，就连这种自明之理也不顾了。于是，8月27日的阁议通过了《从考虑国际关系出发处理时局方针案》，声称要“站在帝国独自之立场，迈步推行满蒙经略，以此作为帝国外交之核心。”③ 内田外相所说的准备也在积极地进行，9月13日，枢密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日满议定书。

386

---

① 内山正熊，《满洲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国际政治》第43号，第166页。

② 《内田康哉》，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第334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206页。

于是，9月15日，派驻满洲的临时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了满洲国。日满议定书非常简单，由前言和两项条款组成。前言确认满洲国是根据居民意志自由建立的；正文确认日本的既得权益以及日满两国共同防卫满洲国，因此，同意日军驻扎在满洲。日满议定书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把对满洲的殖民统治加以合法化，使日本在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方面都得以排他性地独占满洲。

十八　李顿报告书

日本在李顿提出报告书之前毅然承认了满洲国，这意味着向国际联盟进行挑战。导致内田外相发表"焦土外交"演说的森恪质问演说中强调："承认满洲国不是单纯法律上、条约上的问题。这是向世界宣布日本的外交已取得独立自主，是日本在外交上发出宣战布告"，而日本"在外交上的宣战布告"，当然使它同国际联盟和列强的矛盾激化起来。

成为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于9月4日在北京写成，9月22日寄给国联秘书处，10月1日递交日本政府，其时日本承认满洲国已经半个月。这是一个包括十章、十八万字的庞大文件，另附有委员会专家所作九篇特别研究报告。报告书的结论说：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并强调说，满洲国并不是"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事实是，日军不宣而战，以强力侵吞并占领了确属中国领土的广大地区，以至作为上述行动之结果，则是该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脱离而宣布独立"。这就全面地否定了日本以往的主张以及承认满洲国的前提。但在另一方面，报告书又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和"生命线论"表示谅解，并指责中国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不合理与不合法，具有对日绥靖的一

面。报告书进而在最后两章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它首先承认“如何恢复原状，并非解决办法”，又说，“维持及承认满洲之现时组织，亦属同样不适当”；而代之提出解决办法的一般原则。这就是：（1）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2）树立中日间之新条约关系；（3）满洲自治；（4）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等等。并根据这些原则提议：（1）中国政府宣言，在东三省建立特别的行政组织；（2）缔结有关日本利益的日华条约；（3）缔结有关调停、仲裁法院、不侵略以及相互援助的日华条约；（4）缔结日华通商条约等等。关于东三省的未来，报告书设想把它作为非武装地带，以“外国人教官的合作”，组织特别宪兵队来维持治安，由自治政府的执政任命“日本人占充分比例”的外国人顾问，等等。关于有关日本利益的日华条约，则承认“日本自由参加对满洲的经济开发”，同时又企图否定日本“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统治该地区之权利”。关于日华通商条约则规定，中国政府有义务采取措施，禁止抵制日货运动。报告书中所提的解决办法，其目的是企图否定日本对满洲的排他性独占，同时把满洲置于列强共同管理之下，以维持帝国主义的权益，并把满洲作为反共的壁垒，以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 387

早在报告书发表以前，日本的对满政策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李顿委员会所容许的“自由参加对满洲的经济开发”的范围，因此，与国联妥协的余地极少。11月2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李顿报告书的意见书》，对报告书加以反驳。意见书强调说，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因此受到威胁；由于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及排外政策，受害最大的是日本；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在世界上无可比拟，是例外而又特殊的，“九一八”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未超出自卫权的范围，以及满洲国的独立是根据满洲居民的自发行为，日本正式承认，并未违反任何国际协定等等。

十九　退出国际联盟

1932 年 11 月 21 日，国际联盟召开理事会，审议李顿报告书。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发表演说，批判了李顿报告书，中国代表顾维钧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理事会以两国代表的争论相始终。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提议，报告书的审议被提交国联大会。12 月 6 日，召开国联大会，出于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而采取对日绥靖政策的大国，与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主张通过报告书、谴责日本并且不承认满洲国的小国集团明显对立。结果，大会于 9 日休会，把问题委托给一个十九人组成的委员会。

大国想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继续努力对日本绥靖，杜拉蒙秘书长和杉村副秘书长制定了妥协案。这个妥协案回避了迫使日本取消承认满洲国和国联通过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在形式上承认李顿报告书，对承认满洲国的问题，则只是笼统地表明反对的意向。但是，由于中国反对，在十九人委员会中，非难秘书长越 388 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个妥协案因而流产。美国新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 1933 年 1 月 15 日向各国发出了美国不承认满洲国的通告，表示出对日强硬态度。随着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国际联盟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同年 2 月 14 日，十九人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确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的报告。日本被逼入困境。2 月 17 日，内阁会议决定反对国际联盟的撤兵劝告案，同时决定日军进攻热河。这是因为热河省是内蒙古的一部分，满洲国成立时就把它划进领域之内，但该省主席汤玉麟对于隶属满洲国表现踌躇。1 月 3 日，日军已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就开始进攻热河，这就瓦解了对日绥靖政策的基础，使国联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21 日，国联召开最后的特别大会；24 日，以四十二比一（弃权一）通过了以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

地和承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为内容的报告和劝告。这四十二比一这个数字最清楚地表明了日本自取孤立的状态。

第二天，即25日，日本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五条第五项发表了陈述书。它强调说："共产化的中国，对欧美各国是个重大问题，与此相比，其他诸问题殆已失其意义"，并说："与中国完全脱离关系之满洲，乃是对远东共产主义危险之屏障，其真正之价值当为各国执政者所了解"①，极力宣传日军行动作为反共十字军和满洲国作为反共壁垒的意义，把侵略满洲加以正当化。不过，既然国联大会已经通过了报告书和撤兵劝告案，这个陈述书只不过是为了退出国联而准备的下场白。这样，企图避免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等等正面对抗，而把侵略行动加以正当化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和"事变的逻辑"，其破产已无可遮掩了。

3月27日，内田外相向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发出了退出国联的通知，十三年来，作为国联盟员及常任理事国在国联占有席位的日本，终于退出了。退出国际联盟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基调从过去的国际协调外交转变到了"自主独断外交的强硬路线"。然而，退出国联并不意味着日本在这个阶段已决心同列强全面对抗。相反，可以认为，日本统治阶层的目的倒是在于以退出国联来摆脱中国和支援中国的小国集团的牵制，取得"自由"，通过对列强的直接交易，诱使它们采取绥靖政策。而且，由于退出国联，日本也就摆脱了国联盟约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有关条约登记及公布的义务。这也可以说是从"国联协调外交"转变到"列强协调外交"，或者说是从"公开外交"转变到"秘密外交"。虽说如此，退出国联这件事本身仍然意味着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对立的激化，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

① 国际联盟协会(编)，《有关退出国联各文书》，1933年，第93—94页。

389 1933年2月以后，关东军为使满洲国臻于完整而展开了热河作战；4月，进攻华北；5月，占领了河北省通州。蒋介石对侵入华北的日军也没有进行积极的抵抗，反而与之妥协，于5月31日缔结了塘沽停战协定。由于这个协定，日本使国民政府默认了满洲国，同时使它同意在长城以南划定非武装地带。这种非武装地带对于后来搞分离华北活动（即使华北脱离中国领土——译者），搞走私贸易来扰乱中国经济等，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据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重要的协定，却是由关东军作为单纯军事协定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缔结的，外务省竟没有参与。

二十　广田外交

1933年9月14日，内田以年迈为理由而辞职，前驻苏大使广田弘毅继任外相。据说广田在接受就任外相时，曾向首相提出两项条件：（1）日本外交必须遵循退出国联的诏书；（2）日本的外交政策以外务大臣为主要推行者，而首相要极力予以支持，并得到了同意①。广田的意图是，要改善由于退出国际联盟而恶化的日本的国际地位，阻止国际上被孤立的趋势；为此，就必须排除双重外交的根源——军部对外交的干预，谋求外交的一元化。这就是退出国联后日本外交的一种模式，即广田"和协外交"的产生。

广田就任外相后不久，从10月3日至20日，斋藤内阁连续五次召开了五相会议（斋藤首相、高桥藏相、广田外相、荒木陆相、大角海相）。会议的目的是调整外交、国防、财政的关系，并制定退出国联后的外交政策大纲。这种阁内内阁的方式是斋藤内阁创始的。五相会议决定以下几点作为新的外交政策：（1）力求与日本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满洲国健全发展；（2）通过外交工作确立对各主要

---

① 《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1966年，第107页。

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要改善因满洲事变而恶化的对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等等。21日的阁议同意了五相会议的决定，并商定"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来贯彻我国之方针"，和"关于国防，要在不使我国受别国威胁及免遭外侮之同时，注意使国防与我国之国力相适应"①。这样，外相和藏相所主张的稳健论暂时成功地压制了军部所主张的强硬论。

当时，把持陆军中枢部门的是荒木贞夫陆相以及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将军们。他们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激烈的反共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因此，他们主张强硬论，即使同美、苏交战也在所不辞，尤其热衷于反苏战争。为了准备对美、对苏战争，他们还主张这样强硬政策，即在到1936年前后为止的期间内，增强军备，并在经济、财政、思想等方面实行全盘改革，来整备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这种强硬论一时受到压制，荒木因此失去部内的信任，不久称病辞职。不过，荒木的后退并不意味着陆军在政治上的退却。这是因为与唯心的、精神主义的"皇道派"相比较为现实主义的"统制派"正在一心想独揽军部的政治。 390

在海军中，八九月间的人事变动也把条约派②一扫而空，反之，反对伦敦条约的核心人物末次信正被起用为联合舰队司令等等，舰队派的势力由此增强。进而在9月26日，又修改海军军令部条例，缩小海军大臣的权限，削弱其在部内的统制力量，从而确立了使军令部占有优越地位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海军主张强硬论并同陆军竞争，造成了双重外交的根源，在五相会议上则主张军备权的平等，为废除华盛顿、伦敦两个条约作了部署。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276页。

② 条约派：指日本海军内部赞成伦敦裁军条约的一派，主要人物有铃木贯太郎，财部彪、冈田启介及后来的米内光政等。舰队派：指反对伦敦裁军条约的一派，主要人物有加藤宽治、末次信正、真崎胜次、山本五十六等。——译者

本来，广田的“和协外交”本身并不是“协调外交”的简单复活。日本既然以掠夺满洲而破坏了规定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九国公约，又退出国际联盟而向凡尔赛体系挑战，要使币原外交的原则——国际协调主义恢复起来，已经没有条件了。剩下的方策只有尽量同列强少发生摩擦，同时保持住满蒙的新领土和权益，并加以扩充。广田所标榜的“和协外交”正是这种东西。因此，广田外交就不能不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因素。即一面标榜同中国、苏联、美国以及各国保持协调，另一面却在《关于对华政策问题》中又明确表示：“要使中国追随（日本）帝国之方针，即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确保东亚之和平”①的方针。广田外交正是这样地充满着矛盾，是立足于军部所代表的强硬外交路线和外务省所代表的“列强协调主义”这两者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之上的。

然而，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以及缔结塘沽协定，国际紧张得以暂时缓和，又由于“过渡内阁”，国内政局得以暂时稳定，以这种形势为背景，广田外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关系的改善。即1934年7月，中国与满洲之间通车，1935年又实现了两国间的通邮，使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1934年7月，又使之同意降低关税，使恶化了的对华贸易得以恢复。广田外交打的如意算盘是：把“满洲国”的存在作为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承认，在这个前提下，谋求改善日中关系。不过，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与这种“和协外交”妥协的条件。这就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十分萧条，正为寻找对策而煞费苦心，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力量的扩大感到威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中外交关系迅速恢复，到1935年5月两国竟把公使馆升为

---

① 《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22页。

大使馆，互派大使。同苏联的邦交关系也得到了改善。1935 年 3 月 23 日，日苏两国对长年悬而不决的中东铁路达成转让协定，于是，隔着满洲而对峙的日苏紧张关系便大见缓和了。 391

但另一方面，“和协外交”的矛盾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1934 年 4 月 17 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之使命”，指责列强对中国的援助有碍于东亚和平的维持①。这个声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致批判。《华北日报》说：“所谓广田之协和善邻外交不过在打幌子，借此以缓和国际空气，而从事进行宰割我国耳”；《北京晨报》写道：“日本以占领满洲而完成了其第一步工作，现在第二步工作是要征服中国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还要掌握远东的霸权，这次的声明也不外是为了上述的第二步工作，把欧美各国的势力赶出中国，进而完全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②。斋藤内阁已经表露出日满华经济区的设想，后来近卫内阁时期公开化的“东亚新秩序”设想，其萌芽状态已在此时显露出来。天羽声明不过是暴露了广田外交的这种本质而已。

二十一　驻满机构改革问题

1934 年 7 月 3 日，斋藤内阁因“帝人”事件③而总辞职，7 月 8 日成立了以条约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广田留任外相。除广田之外，内相后藤文夫、藏相藤井真信、内阁

---

① 《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 25—26 页。

② 同上，第 39 页。译者补注：《华北日报》言论，见该报 1934 年 4 月 21 日社论：《日本竟干涉我国内政乎?》。

③ 帝人事件：即“帝国人绢”疑狱（受贿）事件，发生于1934年 7 月，至 1937 年 5月结束。日本垄断资本家通过贿赂抢购帝国人造丝公司股票，斋藤内阁某些大员因受贿嫌疑被起诉，后宣判无罪。——译者

书记官长河田烈等国维会①系统的“新官僚”占据了主要职位，是新内阁的特征。前内阁是建立在军部、官僚、政党诸势力平衡之上的，而冈田内阁虽以民政党为准执政党，其核心则是与军部勾结的新官僚。

军部干预政治，在冈田内阁时更加露骨，于是双重外交的现象也越发明显了。其典型的事例就是驻满机构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是满洲事变以前的悬案。在满洲，领事馆、关东厅、关东军等机关并立，分别属于外务省、拓务省、陆军省等不同的指挥系统；因此，对满行政缺乏统一，每每造成双重外交的原因。为此，研讨了统一机构方案，但因各省意见对立，未能轻易实现。及至满洲国发出建国宣言，为了统治满洲，迫切需要统一各机关。于是，1932 年 6 月 21 日，陆军、外务、拓务三省加上大藏省的四省次官会议，决定了《驻满特派总监府官制案》。但是，设置总监府这样大规模的统一机关，将有损于独立国的体面，因此，便于 8 月 8 日采取了使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兼任临时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的临时措施。9 月 15 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武藤临时大使就改成了驻满大使。这样，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各机关的统一，但只不过最高的头头归一个人来统一，下层机构照旧并立，分属各个指挥系统，因此被讥为“三位一体即是酸味一体。”② 于是，陆军就以林铣十郎留任陆相为条件，向冈田内阁要求实现驻满机构的一元化。1934 年 8 月发表了陆军的方案，其内容包括：（1）把现在驻满机构的三位一体制改为军司令官和全权大使的二位一体制；（2）全权大使受总理大臣的监督，只在有关涉外事项上受外务大臣的指挥监督；（3）

392

---

① 国维会（1932.1—1934.11）：系“九一八”事变后投靠军部之官僚集团，即新官僚集团。发起人有荒木贞夫、近卫文麿、后藤文夫。声称要“维新国运”，“纠正轻佻诡激之思想”，使“日本精神普照世界”。——译者

② 日语“三位”与“酸味”读音接近。——译者

在内阁中新设对满事务局，把拓务省所管一切事项移交该局管理；（4）在关东州设置知事，由全权大使指挥监督，等等，实质上是企图把军事以及外交、经济、行政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军部手中。外务省和拓务省强烈反对，分别制定各自的提案来对抗陆军。因此，问题就长期纠缠不清。当地关东厅的职员和警察官员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们决心总辞职，发动了猛烈的反对运动，关东军想要进行压制，二者之间甚至出现难免要发生一场内战的状态。但是，政府终于依从陆军方案提出了妥协案。问题接近解决，12 月 26 日，公布了对满事务局的官制，决定由林陆相兼任首任总裁。这样，陆军就全面地掌握了经营满洲的实权，而外务省和拓务省的权限则被大大削减。这个机构不久就逐渐扩大为兴亚院、大东亚省，成了军部侵犯外交权的第一步。

正当驻满机构改革问题发生纠纷中的 10 月 1 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表了题为《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的小册子。实际执笔者是统制派人物、军事科的池田纯久少佐①。这个小册子劈头就写了“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种蛊惑人心的话。它认为，由于列强的压迫，日本这样下去，无论政治或经济都将走投无路；这种危机感和这种非常时局，并不是只靠“协调外交活动”就能解决的枝节事态，而是“世界的非常时期”。以这种对现状的认识为前提，它主张树立以应付这种危机现状为目的的国防国策，并全面地改革政治经济机构。说明白些，就是一种立足于总体战思想的国防国家设想，正象文章中所说：“必须以真正的举国一致，对经济及贸易断然实行统制政策，并谋求获得新市场，恢复在中国的旧市场，以讲求突破危机的对策”②。这样，便把在国内进行全面改

① 池田纯久（1894—1968）：军法西斯分子。1935 年 8 月任军务局副局长，其后任中国驻屯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副参谋长。——译者

② 《现代史资料》5，第 576 页。

革的主张同积极对外政策的主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执笔者池田纯久说，这个小册子是统制派多年研究成果的精华①，而统制派这时已经占据了陆军省的主要职位。其中心人物是在3月份由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情报部）转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少将。据说在驻满机构改革问题上，他也是一个主张“坚决排除外务系统，不能放在外务大臣管辖之下”的强硬论者②。永393田一面通过朝餐会③取得新官僚和重臣阶层、财界等的支持，同时推进以现存统治体制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国家改造。

第五节　经济外交

二十二　对外倾销问题

由于退出国际联盟而踏上国际孤立化道路的日本，在经济方面也逐渐陷于孤立。“列强协调主义”在这方面也正在破产，其具体表现就是与退出国联同时发生的对外倾销问题。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各国贸易显著下降，全世界贸易总额降低到危机前的三分之一。争夺市场的竞争极为激烈。正因为如此，日本商品凭恶劣劳动条件和低工资在世界市场廉价大量推销，强烈地刺激了列强，遭到激烈的非难。1933年6月，英国产业联盟发表的报告书指出，日本“第一靠工资、劳动时间等劳动条件的不同，第二靠降低汇价、政府补贴、货运费用不合理的降低等等……开始推行蛮干的国家推销政策，以至使英国及其他各国蒙受重大损害”，并大声疾呼“日货充斥的威胁”④。

---

① 池田纯久：《青年将校和革新思想》，《昭和秘史》，第110页。

② 《外务省的一百年》，下，第247页。

③ 朝餐会：由“国维会”改组而来。——译者

④ 日本经济联盟会调查课（编）：《最近日本及英帝国经济关系的经过》，1933年，第129页。

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的1930年，日本贸易比前一年下降约百分之三十四。到了1931年，随着侵略满洲，中国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对华输出激减，因而贸易总额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于是，日本便向中国以外的市场，即印度及英国在亚洲的其他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译者)、澳大利亚、西南亚、非洲开始扩张，侵蚀欧美列强的市场。结果到1932年，输出额转而上升，1934年迅速恢复到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日本输出的增加并非来自世界购买力的增大，而是靠侵蚀其他国家的市场而实现的，因此当然要引起列强的反感。

对日本商品的扩张最感到威胁的是英国。1931年(英国)远东经济代表团的报告书说："如不进行根本变革，兰开厦就不能指望在亚洲市场上扩大贸易。……兰开厦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①]。日英两国在世界棉制品贸易总额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但1932年以前，英国一直掌握着棉制品输出的霸权。到了1933年，日本就取而代之了。尤其是兰开厦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市场，1913年时英国的输出额大约是日本的四倍，但1930年反倒降低到日本的六分之一[②]，甚至发生了这种情况：就在英国眼皮底下的印度，到1932年时，日本产品也超过了英国产品[③]。这样，1933年 394 2月，英国下院甚至通过了关于保护兰开厦纺织业的动议，最后竟至有人提出废弃日英通商条约和在全世界范围内抵制日货的动议。[④]

对于日本商品威胁性扩张的非难，不仅限于对外倾销问题，甚

---

① 英国远东经济代表团：《棉纺业代表的报告》，1931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第85页。

③ 文伯特·E·欣德马什(Hindmarsh)：《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1936年，第197—198页，第200页。

④ 日本经济联盟会调查课(编)：前引书，第2辑，第6页。

至还发展到提出模仿商标的不正当行为问题。例如，1933年12月，英国下议院一个议员说："日本商品的竞争颇为激烈，正在步步侵吞各国市场。结果是在自治领各国，以往从英国本国输出的陶器，现在即将被日货全部排挤掉，而且日本商品极其巧妙地模仿英国商标，因此，现在在海外买到日本商品的大部分人还误认为是买到了英国商品"①。

二十三　经济外交走投无路

为了对抗日本商品的扩张，列强用提高关税等办法来加强其保护措施。渥太华会议②结束不久，印度就以差别对待方式提高了棉布进口税。1933年4月，通告废除日印通商条约。6月，又对进口棉布实行了禁止性的增税。毋容置疑，在这背后存在着日英之间激烈的通商竞争。针对废除日印通商条约的强硬措施，日本也以不买印度棉花的手段相对抗，但为了调整日印通商关系，从同年9月开始在印度西姆拉举行日印通商会谈。会谈进展缓慢，直到第二年即1934年7月，才签订了新的日印通商条约，但日本的输出遭到大幅度的限制。英国的棉纺业主为了打击日本，对付日本棉布的急剧扩张，向日本棉纺业界提议订立棉布出口协定，并从1933年4月起在伦敦举行了日英棉纺业会谈。英国方面主张协定的对象应包括全世界的市场，而日本方面却主张只限于英帝国范围之内，双方互不相让，会谈遂于1934年3月破裂。于是，英国便在其整个殖民地范围内实行了棉布和人造丝织品限额进口制，这就大大抑制了日本商品的扩张。

---

① 日本经济联盟会调查课(编)：前引书，第2辑，1934年，第81—82页。

② 渥太华会议，指1932年7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的英帝国经济会议。会议缔结了十二项协定，扩大英帝国及其所属自治领、殖民地相互之间的特惠关税，以促进英帝国内部的贸易。——译者

日本出口商品的种类和范围扩大了，不仅限于棉织品、生丝、人造丝等纤维制品，而且从食品、玩具、陶瓷器、鞋类、帽子等杂品直到机械、纸张、玻璃等重化学工业方面的产品，这样，抵制日本商品的运动就不仅限于英帝国经济区，而且扩展到了全世界。关于日本商品带有威胁性的扩张情况，1934 年 4 月 27 日的《泰晤士报》有如下报道："1931 年英国进口的日本洋伞不过占洋伞总输入额的百分之十六，但现在四个人中就有三个人打着日本洋伞。十人中就有九人以上使用日本制的东西。用丝绸手帕的人十人中有十人都是用的日本货。一半以上的孩子玩日本制的玩具，用日本制的杯子喝茶。就连喝啤酒，在五杯当中也有一杯是日本制造 395 的"①。这样，各国便相继采取了限制日货输入的措施。宣布废除通商航海条约或通商暂行协定的国家，1934 年有葡萄牙、哥伦比亚、秘鲁；1935 年有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到 1936 年又有土耳其、暹罗等。至于虽未废弃通商条约，但采取提高关税、限额进口制等某些措施的国家，更是不胜枚举。1934 年 1 月 6 日，英国的权威报纸《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对日货进口实行限制贸易或提高关税的二十七个国家的名单，到 1934 年底，这个数字竟上升到四十个国家。②

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采取了强硬限制日货的措施。荷印是日本再度禁止黄金出口后日货以压倒优势进行扩张的市场，这就招致荷兰以至各国都怀疑日本是在实行南进政策③。事实上，荷属东印度以石油、煤、铁矿、锡、铅、锌、镍、橡胶、金宁等丰富的天然资源著称，乃是资源不足的日本垂涎

---

① 东京朝日新闻经济部（编）：《国际通商战》，1937 年，第 270—271 页。

② 欣德马什，前引书，第 200 页。

③ 国际情势研究会（编）：《世界是这样看日本的南进政策》，1937年，第 237 页以下。

之地。日本商品对荷印的扩张是惊人的。1929年以前还只占荷印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的日本商品，到1931年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1933年又超过百分之三十，超过了竞争对手英国和宗主国荷兰而跃居第一位。荷印政府于1933年9月实施非常时期进口限制令，以此限制日货进口，并限制了日营商店的营业权和日本海运业的扩张，这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而，1934年6月，日本与荷兰为调整贸易不平衡举行了会商。荷印方面主张把会商的中心议题集中在限制日本进口问题等具体问题上，而日本方面则主张讨论自由通商和尊重最惠国条款等原则问题。因此会议一开始就不见进展，12月21日，会商终于停止。日本缩小了代表团，代表长冈春一大使离开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各国所采取的这种抵制日货的政策，对于不得不全面依赖贸易的日本经济打击很大。政府于1933年7月在外务省设置通商审议会讨论对策，并于1934年3月16日宣布，不再承担有关废除进出口方面的禁止和限制的条约的义务，同时通告退出关税休战决议。[1]前者是指各缔约国之间原则上规定对进出口不加禁止或限制的条约，于1930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但到了1933年，多数缔约国均已退出，只剩下了日本和荷兰两国。后者指1933年5月12日通过的决议，约定在同年6月间召开的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结束以前，与会各国暂不采取妨碍国际通商的措施，但由于经济会议无限期休会，多数国家退出，已经有名无实。3月29日，(日本)修订了"输出组合法"(即"出口商会法"——译者)，加强了对倾销的管理及政府的控制。4月7日，又公布调节贸易及维护通商法，对各国限制进口采取了报复措施。外务省也计划扩充机构，改变亚洲局、欧美局、条约局、通商局的四局制，把亚洲局改组为东亚局，

396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281—282页。

把欧美局划分为欧亚局和美洲局，形成五局制。并与商工省的贸易局，工务局以及民间企业团体合作，推行通商外交、经济外交。但是，这也随着各国组成经济集团而逐渐无法推行下去。于是，与通商外交、经济外交走投无路的同时，对武力外交的期待就越来越强烈了。早在日印通商条约宣告废除之时，财界中要求转向武力外交的呼声已经很高。到了1935年，历来被认为比较稳健的关西财界，也公然主张："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从外务省转向军部"。下述言论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日印会谈、日荷(印)会谈、日英会谈，再加上中南美商业代表的派遣，迄今为止，虽靠着外务省，这样那样地采取了的种种办法，但一个成功的例子也没有。……这样搞下去，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索性随波逐流，和军部携起手来，确保东洋市场，倒是捷径，倒是有利。""照外务省这样东奔西跑，决确保不了东洋市场。""有钱搞会谈、派特使，还不如造军舰！"①

---

① 菱田友三：《财界传闻》，《改造》，1935年12月号，第310页。

397

第十二章　日中战争

(1935—1939)

第一节　国际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一、法西斯主义① 与反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思潮和运动，它为了死守濒于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对内否定议会制和政党政治，以树立赤裸裸的暴力独裁体制；对外否定现存国际秩序，重新瓜分世界，以建立所谓“生存圈”或“新秩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意大利以及波兰、葡萄牙、南斯拉夫和立陶宛等国，法西斯势力已经掌握了政权，加强了法西斯体制。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更加深化，法西斯主义势力开始再次抬头。1933年1月，以德国建立希特勒政权为始，接着，奥地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此外，在英、法、美等以民主主义传统自夸的国家中，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虽然尚未取得政权。到1934年12月，法西斯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竟然开起国际法西斯分子会议了。尤其是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纳粹党掌握了政权，法西斯主义便成为左右世界历史动向的重要因素。纳粹党对内强化独裁体制，对外则声称以建设欧洲新秩序为目标，开

① 法西斯主义：意大利语 fascismo 的音译，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公开恐怖统治，也指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思潮。——译者

始公然否定凡尔赛体系。1933年10月，（德国）继日本之后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3月，废除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并宣布重整军备；接着，1936年3月又废除洛迦诺公约，派兵进驻了莱茵区。似乎与德国这种行动相呼应，意大利也开始向凡尔赛体系挑战，1935年10月，侵入埃塞俄比亚，并于翌年5月吞并了它。国际联盟虽决定对意大利实行制裁条款，但由于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经济制裁实质上有名无实；与日本侵略满洲时一样。实际证明国际联盟在防止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美国还执行中立法，禁止对交战各国输送武器弹药或提供借款等等，对埃塞俄比亚坐视不救，实际上是帮助了意大利的侵略。

在亚洲，对凡尔赛和华盛顿两个体系的挑战也在继续进行。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① 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然后利用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的机会，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398

1938年3月，德国打出大日耳曼主义旗号，强行吞并了奥地利，同年9月，在英、法绥靖政策帮助下，缔结了《慕尼黑协定》，实现了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意大利也在吞并埃塞俄比亚之后，于1939年4月，吞并了阿尔巴尼亚。法西斯主义各国在各自进行侵略的同时，借世界新秩序之名，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开始互相合作。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罗马——柏林轴心"。同年11月，日本和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2月，继日本和德国之后退出了国际联盟。意大利在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同时，还承认了"满洲国"，德国也在次年5月决定承认。

① "华北工作"：日语"工作"一词有"有计划地施加影响"、"为达到一定目的而开展活动或进行策动"的含义。此处，"华北工作"指日本对我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译者

这样，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国家携手组成了共同战线，而苏联则在1934年9月加入了国际联盟，并在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通过了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提纲。国际政治开始逐渐向以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为基轴的新结构转化。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西班牙内战。

二　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与法西斯势力的迅速抬头相对抗，保卫民主主义与和平的反法西斯运动也高涨起来。在法国，1934年2月，由于“火十字运动”①等极右派集团发起暴动，面临法西斯分子专政的危险。工人用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相对抗，为了遏止法西斯主义，掀起了把工人阵线统一起来的气势。7月，共产党与社会党缔结统一行动协定；次年6月，在以城市中间阶层、农民等为基础的激进社会党和知识分子团体等也参加之下，召开了各反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联合集会，结成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总结了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反法西斯斗争之所以失败，以及这一斗争在法国何以成功等各国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理论化，明确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号召结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划时代方针。这一方针克服了第六次大会以来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主要打击中间势力论”，号召结成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包括农民、城市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等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方针立即贯彻到各国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中去。

法国的人民阵线由于有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得到了飞跃的发

---

① 火十字运动：Croix de Feu Movement，法国政治运动之一，1919—1920年，由德拉罗克上校（de la Rocque）创建，只吸收有战功的退伍军人，严格说来，不能算法西斯组织，一些领导人还参加了抵抗运动。1945年解散。——译者

展。1936年3月，社、共两党系统的工会联合起来；在4月总选举中，人民阵线派取得胜利；6月，成立以社会党的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内阁。这样，法国便得以事先防止了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扩张。

在西班牙，1936年1月，各个进步政党和工会也成立人民阵线，并在2月的总选举中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是，同年7月，军部、地主和教会等反动势力所支持的佛朗哥将军，对人民阵线政府发动了叛乱，法西斯主义与人民阵线的对抗便由此扩大到国际规模。德国和意大利称这次叛乱是"对文明之敌共产主义的圣战"，对叛军提供兵员、武器和弹药等等，公然进行援助。意大利力图在西班牙树立亲意政权，在地中海占据战略上的立足点；德国一心想在西班牙树立傀儡政权，从东西两侧压迫法国。西班牙共和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但国际联盟却照例未采取有效措施，英、法、美等列强则借口不干涉内政，默许德、意援助叛军，对政府军坐视不救。世界各地主张投入战斗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们对国联和列强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纷纷参加国际义勇军，与法西斯军队进行了斗争。但是政府军没能抵抗住得到德、意两国大规模援助的反革命军队的攻击，经过三年战斗之后，终于在1939年3月失败，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政权成立了。 399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进一步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正在进行的华北侵略，发表了呼吁停止内战和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开端。在朝鲜，1936年5月，成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祖国光复会"。还有，东南亚各民族也掀起了反法西斯运动。越南共产党于1936年7月暂时撤消了"打倒法国帝国主义"等口号，决定建立广泛的"反帝人民战线"。在印度尼西亚，1937年5月组成了以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为中心的反法西斯运动组织——"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为了达到

反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作为一种策略，该党还对荷兰和殖民地政府采取了协调政策。在菲律宾，1938 年 8 月，共产党也发表了《动员菲律宾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号召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① 这样，就为后来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抗日运动打下了基础。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明确指出，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是当前主要的战争煽动者，这就使日本与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为敌，使原有的矛盾愈益尖锐化了。

这些人民阵线运动的开展，对于日本的反战运动和革命运动当然也发生了很大影响。新村猛、中井正一和久野收等知识分子创办《世界文化》和《星期六》等杂志，介绍了各国的人民阵线运动。1936年 2 月，当时在莫斯科的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两人联名发出呼吁，号召展开"以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为基础的伟大国民运动"，作为"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恐怖下解救日本国民的道路"。并且以和平政策同统治集团的战争政策相对抗，

400 提出了"立即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和立即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对外政策。不过，在日本结成人民阵线的条件，无论从客观上或从主观上，都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共产党中央由于接连不断地遭受镇压，完全陷于崩溃，而理应成为人民阵线组织核心的社会大众党和劳动组合会议则受到了社会排外主义的侵蚀。

1936年 9 月，以加藤勘十为委员长、铃木茂三郎为书记长的"劳农无产协议会"为了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向社会大众党（社大党）提议实行无条件地联合。接着，在 11 月，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全评）决定了以社会大众党为中心，统一无产阶级政治战线和统一全国工会的方针。但是，社大党认为，"人民阵线运动是无视我国社会势力的不现实的斗争"而予以拒绝。在社大党领

---

① 谷川荣彦：《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史》，劲草书房，1969年，第107、284、407页。

导下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也没有响应“全评”的倡议。于是，劳农无产协议会于1937年3月组成了日本无产党。但同年12月15日，日本无产党、“全评”和全国农民协会有关人员四百名，因“人民阵线事件”被捕。同月22日，日本无产党和“全评”又遭到禁止，于是合法的左翼运动在日本消灭了，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第二节　侵略华北

三　满洲经营的停滞和“华北工作”的开始

由于侵略满洲所带来的军事通货膨胀，由于对外倾销，日本得以在各国之中抢先摆脱了危机。然而，这种“满洲带来的兴旺”却随着满洲经济建设的进展而逐渐衰退下来。日本在满洲的资本与国内资本互相竞争并对立，满洲供给日本的原料也减少了。由于日军侵略带来的战祸和1934年的大灾荒，再加上满洲国的残酷掠夺，农民陷于极度贫困，当地产业凋敝，满洲的商品购买力普遍下降，以南满铁路公司为首的日本在满投资的利润急剧下降。加以日本对满投资完全出于准备对苏战争的军事观点，因此，资源的开发毫无进展，把满洲当作原料供给地的希望也落空了。所有这些都是关东军经营满洲的矛盾的表现。①

经营满洲的矛盾，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在满洲建国的时候，数达三十六万人的地方军阀军队起来进行抵抗，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到了1934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的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分接受了

① 宇佐美诚次郎，《侵略满洲》，《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岩波书店，1963年，第233页以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1935年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因此，关东军仍然不得不继续苦于武装抗日斗争。满洲的抗日运动与朝鲜金日成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互相呼应，开展了广泛的反满抗日斗争。

401 日本企图组织"日满经济区"来对抗列强经济区的设想，迅速开始碰壁。侵略满洲不但未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摆脱危机，反而使危机更加扩大。陆军的"华北工作"无非就是为了在新的侵略中寻求突破口，以摆脱扩大了的危机。1935年6月，以梅津美治郎中将为司令官的中国驻屯军，以排日运动为借口，强行要求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签订了内容如下的协定：（1）撤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国民党）党部机关；（2）中央军撤出河北省；（3）禁止排外、排日运动等。同月，关东军以中国军队持反满抗日的态度为理由，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解散排日机关和援助日本建立军事设施①等，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缔结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由于河北、察哈尔两省变成非武装区，日军实际上得以把这个地区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以日中两国交换大使为顶点的"和协外交"，由于当地日本驻军的独断专行，也开始暴露出矛盾了。

"和协外交"陷于僵局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对英、美从属的加深。与日本侵略华北相对抗，英国开始积极援助国民党。1935年9月，英国派遣经济顾问李兹罗斯（Leith-Ross, F.）来到中国，打算通过币制改革强化对金融的统治。李兹罗斯曾在日本落脚，会见广田外相和高桥藏相，提议共同对华贷款等。可是，日本不仅对此予以拒绝，并企图阻止贷款的实现。这是因为，日本担心如果贷款实现，币制改革成功，中国就会走向统一和近代化，（日本）扶植中国地方政权以求分而治之的政策就会破产。当年11月，

① 指日军在察哈尔省境建筑机场和无线电台等。——译者

国民政府在英国借款援助下，断然实行币制改革。随后，1936年5月，美国也与中国缔结了白银协定，(国民党的)法币就与英镑和美元建立了联系。这样，中国财政形势好转，经济建设有了发展，这就促进了国民党政府对国内的统一，但另一方面，对英、美的从属关系却随之加深了。中国的这种状况给日本统治集团以一种危机感，迫使它重新研究对华政策。

军部早就反对广田的“和协外交”。《关东军对华政策》作出的判断是：中国的亲日态度是伪装的，“如果轻率地表示好意，中国人就会马上翘起尾巴来”，因此，为使中国真正服从日本，需要的倒是“我方的冷静态度”。[①]《驻满大使南次郎关于促进华北分离“工作”给广田外相的汇报》认为币制改革是中国“抛弃了以往伪装的亲日态度，又回到了露骨的排日政策”，并主张积极推行华北分离工作。[②]

广田外相与军部大臣之间交换意见，取得一致，1935年10月4日，决定了对华原则。即(1)必须使中国方面停止排日运动及其依附欧美的政策，并转而采取对日亲善政策；(2)必须使之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并停止反满政策；(3)必须使之协力排除赤化 402 势力的威胁。[③]广田外相依据这三项原则开始与中国谈判。10月，与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进行了两次会谈。中国方面提出下述三项作为日华亲善的基本前提条件，并要求予以彻底贯彻：(1)尊重完全的独立，废除不平等条约，履行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2)禁止一切非友好的行为；(3)立即停止除外交机关以外的一切单位的行动或任意的压迫手段。[④]作为外交原则，这些都是极为合理

---

①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1年，第309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309页。

③ 同上，第303页。

④ 同上，第304—306页。

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尖锐地冲击了广田外交以至日本外交的内在矛盾，即一面默认华北驻军的活动，同时又打算进行“亲善外交”的矛盾。这样，“和协外交”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

军部强行推进华北分离“工作”。“华北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要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成为特殊地区（即满洲化）；其具体的目标则是，控制被视为满洲抗日游击斗争据点的华北，使之成为反共壁垒，并取得华北丰富的国防资源。同年11月，土肥原对地方军阀宋哲元施加压力，要他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范围内组织“自治政府”。但是，这一企图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分化以及部下和民众的反对，未获成功。于是，土肥原指使日军的傀儡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军部炮制了冀东政权之后，又以武力为后盾，向宋哲元等进行策反活动。这一活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也获得了相当的成果。这就是，12月8日，国民党政府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机关，并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冀东政权本打算采取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合并组成华北自治政府的方针，但由于后者并未完全脱离国民政府，仍然接受它的领导，所以12月30日，冀东政权就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采取了独立政府的体制。日本通过这两个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北的统治。

军部的“华北工作”，正如当时外务次官重光葵后来回忆所说：“它与政府的外交方针毫无关系，并且无视外交方针，是在秘密之中进行的，外交当局也未能获知其实情”，[①] 可见这还是双重外交的现象。然而，仍和往常一样，这次华北工作也照例得到政府的追认，军部的政策上升为正式的国家一级的政策。1936年1

① 重光葵：《昭和之动乱》上卷，中央公论社，1952年，第93页。

月13日的《第一次处理华北要纲》重新承认了华北五省的分离，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从此由中国东北部（满洲）进而扩大到华北。但是，由于它同时使中国抗日运动更加高涨，也就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深化。

中国共产党继《八一宣言》之后，于1935年12月25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了新的抗日斗争方针。这个决议提出建立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和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学生展开了抗议活动，反对建立华北傀儡政权，组成了学生的救国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接着，中国各阶层人民分别组织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等，并于1936年5月，组成了全国群众抗日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呼吁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这样，日本的扩大侵略引起了中国抗日运动的新发展，日本外交陷入更深刻的矛盾。 403

四 国体明征① 运动与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通过华北分离“工作”，对华侵略进入新阶段时，在国内则开展了国体明征运动。在此前后，废除了华盛顿裁军条约，退出了伦敦裁军会议，内外政策都进一步法西斯化了。

1935年2月18日，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议员菊池武夫（陆军中将）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学说是叛逆思想。其目的是要借攻击美浓部学说——“天皇机关说”②，对元老西园寺以及内大臣牧野

---

① 国体明征：1935年4月，日本政府下令禁止美浓部达吉有关宪法的著作。8月及10月，又两次公布“国体明征训令”，禁止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宣布统治权的主体在于天皇。——译者

② “天皇机关说”：日本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学说，认为天皇是日本国家的机关，不是日本国家的主体。以军部为首的法西斯势力认为这个学说损害了日本天皇的绝对主义权力。——译者

伸显和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等“现状维持派”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而且，由于美浓部在报纸、杂志上，对法西斯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便成了以军部为中心的“革新势力”的眼中钉。28日，继菊池的攻击之后，众议员江藤源九郎(陆军少将)以“不敬罪”的罪名控告美浓部，与此相呼应，军部和右翼势力等一齐发动了扑灭“机关说”运动，政友会甚至向议会提出了国体明征决议案。于是，政府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决定要“铲除”“天皇机关说”。美浓部退出了贵族院，牧野辞掉了内大臣职务。美浓部的著作自不待言，凡属以“天皇机关说”的理论为基础的宪法书及法学概论之类一律禁止发行。“五·一五”事件已经使政党内阁实际寿终正寝，而国体明征运动则更破坏了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完全堵死了它恢复的道路。

“革新势力”通过国体明征运动遏止了政党政治，同时，也破坏了协调外交的每个成果，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挑战。“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对外政策方面迅速地增强了发言权的军部，借口华盛顿和伦敦两条约即将期满，无条约时代即将到来，高喊“1935年、1936年的危机”，强调要加强军备。尤其是海军一心要废除“屈辱条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担任冈田内阁海军大臣的大角岑生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末次正信等，要求(列强)海军力量的平等，说不惜与裁军会议决裂；进而更主张废除华盛顿裁军条约。一边说由于裁军条约期满，危机即将到来，一边又主张废除裁军条约，海军这种逻辑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海军发行小册子，举办讲演会或通过一般的报纸、杂志宣传自己的主张，大造舆论。陆军和右翼团体等同海军进行全面协力自不必说，就连政党也同声附和。政友会要求政府召开特别国会，正式决定废除华盛顿条约。民政党竟然也支持海军的平等要求。这样一来，冈田内阁在1934年9月7日终于决定废除华盛顿条约。

404

由于向法国、意大利呼吁共同废除条约遭到拒绝，政府乃于12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再次决定单独废约，并经枢密院审议，于同月29日，正式通告美国，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另一方面，同年8月28日，冈田内阁在首相、海相和外相的三相会议上，就日本在伦敦裁军会议预备会谈上的方针作出了决定，并在9月7日内阁会议上通过。其内容是：(1) 反对现行之(各国军舰)按比率(限定吨位之)主义；(2) 主张（军舰）总吨位一律平等；(3) 规定“不威胁、不侵略”的兵力的标准；(4) 退出现有条约等等。预备会谈从10月23日起在伦敦召开。日本代表持上述方针参加会议，美国则主张继续现行条约并一律削减二成，双方发生了冲突。11月27日，英国提出妥协案，但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预备会谈宣告决裂。1935年12月9日，伦敦裁军会议正式召开。日本方面的主张与预备会谈时完全一样，同英美的主张南辕北辙。国内舆论一到这个阶段，就一面倒地倾向于支持海军，持反对论的只有《东洋经济新报》和水野广德、芦田均、清泽洌等极少数人。这样，1936年1月15日，日本终于退出了伦敦裁军会议。

华盛顿、伦敦两个条约于1936年年底失效，日本完全脱离了凡尔赛、华盛顿两体系，而彻底走上了与此对立的“自主外交”路线。

第三节　日德防共协定

五　“二·二六事件”

当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立由于“天皇机关说”问题而激化时，以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为中心，军队内部的派系抗争也逐渐尖锐起来。及至1935年7月，荒木贞夫辞去陆相之后，在青年军官中享有威信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又被罢免，两派的对抗就越发激烈。8月12日，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军

务局长永田铁山——统制派首领，被(皇道派)视为罢免真崎的元凶。斗争的尖锐化至此达于顶点。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率领大约一千四百名士兵袭击首相官邸等东京市内要地，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杀害，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堪称奇迹的是，冈田首相竟然幸免于难，但一度传说他也已当场身死。① 叛乱部队随即占据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等政治、军事中心的永田町一带。他们的目的是要由皇道派建立军部独裁政权，断然进行"昭和维新"，以打开日本面临的内外405 危机。促使他们坚决进行大规模叛乱的重要原因是，农村的贫困和民众生活的艰苦使军队的健康和思想日趋恶化，以至由此使人产生了天皇制军队势将崩溃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由于对外政策陷入困境而益形强烈。尤其是，他们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感觉比一般人倍加强烈。日本占领满洲以后，苏联为了与之对抗，增强了远东军队的兵力，反之，关东军则迫于维持治安而不能专心准备对苏作战。加之，中国革命步步推进，大有危及华北之势。与日本的"华北工作"相对抗，抗日救国运动迅速高涨，其间，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这种状况激起了青年军官们的危机感，加之，叛乱部队主力所属的第一师团派往满洲的行期迫在眉睫，所有这些条件凑合起来迫使他们发动了武装叛乱。

面对大规模的叛乱，统治集团乱成一团。政府张皇失措，军事最高当局则策谋利用叛乱。混乱持续了三天，到了29日，叛乱才逐渐被镇压下去，部队归顺了。青年军官们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军部却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叛乱，更加加强了它的政治地位。冈田内阁总辞职之后，陆军立即对继任内阁的组阁工作进行干涉，凡被

① 凶手把冈田首相的堂弟误认为首相而杀死，因而冈田得以幸免，但当时却传说冈田已被杀身死。——译者

视为自由主义和协调主义的人物，均被排除于阁僚名单之外。经过难产、迟迟组成的广田内阁，由寺内寿一任陆相，搞了所谓军队的人事整肃，把“皇道派”统统赶走，代由“统制派”占据了重要职位。不过，这并不只是统制派的单纯复活，而是清算了军队内部的派系，形成了新统制派，以图达到军队统制一元化的目的。其阵容是以陆相寺内为首，外加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和教育总监杉山元为最高领导的新的军部独裁体制。五月间，继军队人事整肃之后，又复活了对政治进行干涉的有力武器——军部大臣、次官的现役武官制，夺回了对护宪运动所作的让步。进而，8月间，又在军务局新设了拟定政策的机构——军务科，明确了军务局作为陆相政治幕僚的地位。还建立了这样的体制：把以往分散在各部局的人事权集中到人事局长手里，以此加强陆相的权限；并修改军人著作规则，以统制内部的言论活动；陆军的政治要求则通过陆相统一进行。这样，陆军制止了下级军官的激进的国家改造运动，同时消除了派阀对立，实现了军队的一元化统制，在寺内—杉山—梅津的领导体制之下，稳健地推行着合法的渐进的国家改造。这种所谓新统制派路线发展下去就是东条独裁体制。

六　陆、海军的对立与国策的分裂

军部政治发言权的强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从此要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策大纲以及外交方针上。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为中心拟定了《国防国策大纲》，即所谓“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亦即“北进论”的方针。①但这种北进论并不单纯是只搞北进，而是“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可以说是“先北后南

① 《现代史资料》8，第357页。

406 论"。而且，在这种设想中，强烈地反映了驱逐英国，集结东亚诸势力，以"准备对美国进行大决战"的石原（莞尔）主义。对此，海军则拟定了《国策要纲》，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即所谓"北守南进论"。① 海陆军的主张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带到对国防方针的修改中来。陆军要把主要假想敌国限于苏联一国，而海军却主张加上美国，并且要把美国摆在苏联之上。结果，决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案，即"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② 可以说是美、苏并重。据此修改了用兵纲领，陆军以苏联远东兵力为目标，而海军则以美国海军为目标，各自提出了国防所需的庞大兵力。本来应该明确陆主海从，或海主陆从，确立一元化的国防方针，但这一点却含糊不清，这种二元的不分主次的国防方针，可以说等于"取消了国防方针"。③ 这种情况，在制度方面是统帅权独立和陆、海军统帅部分别直属天皇的统帅二元化矛盾的表现；在政策方面则是由于退出国联和华盛顿体系，自取国际孤立的必然结果。

1936 年 8 月 7 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根据这个新的国防方针，决定了《国策基准》。这个文件虽然是以对外政策为中心来确定今后"根本国策"的，但却首先把"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既把南进论承认为正式的国策，又同时承认了陆军所主张的北进论。同日决定的《帝国外交方针》又把"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发展"作为当前"外交政策的重点"。④ 这是一个将陆、海军的对立意见兼收并蓄、因而是

---

① 《现代史资料》8，第 354 页。

② 同上，第 356 页。

③ 林三郎：《太平洋战争陆战概史》，岩波新书，1951 年，第 10 页。

④ 《现代史资料》8，第 363 页。

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方针。

8 月 11 日，外、藏、陆、海四省之间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确定了对中国的政策。其内容包括：建立“防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带”；攫取国防资源并扩充交通设施，以加强对苏战备；对南京政府则引导其走向“反苏附日”，并通过缔结防共军事协定、日华军事同盟，以及派遣政治、军事顾问等等，露骨地表示了要把中国实际变为日本附庸的意图。冈田内阁时期，曾把重点放在制止中国的依附美英政策，而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总的说来则是把着力点移向反苏、反共。其原因首先是国际政治结构有了变化。日本对华侵略扩大；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并进驻莱茵区；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等等；与这种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攻势相对抗，反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共同战线也正在日趋形成。407 1933 年 11 月，美国承认了苏联。1934 年 9 月，苏联取代退出国联的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①。还须指出：苏联与西欧列强接近，与此同时，苏联与中国接近，以及中国内部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的政策，以及中国全国要求国民政府“联共抗日”的呼声日趋强烈等等。与这种形势变化相对应，日本强调反苏、反共，其企图是要以此来离间苏联与列强，离间苏联与中国，以阻止国共合作。

广田内阁在建立应付脱离华盛顿体系和太平洋无条约时代的新的对外政策的同时，也相应地着手整顿国内体制。这一点，在《国策基准》中已经用“庶政一新”这种提法明确表示出来，而在 8 月 25 日的内阁会议上，则把“庶政一新”加以具体化，决定了七大国策，即：(1) 充实国防；(2) 刷新和改善教育；(3) 改革税制；(4) 安定国民生活；(5) 振兴产业及发展贸易；(6) 确立对满洲的重要

① 日本、德国分别于1933年 3 月及10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译者

政策；(7) 整顿和改善行政机构等。总之是按照军部的要求，为准备总体战而建立高度国防化的国家体制。11月27日的内阁会议，根据这一国策，确定了1937年度预算案，它是一个比上一年度增加二成、数达三十亿日元之多的庞大预算。其中，军事费占全年度支出将近一半。这样庞大的支出，要用数达五亿日元的增税和发行八亿日元以上的公债来维持。这种财政通货膨胀政策，立即引起物价暴涨，使国民生活愈益艰苦。

七 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与"日德意防共协定"

由于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新阶段。通过这两个政权，日本推进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其中之一就是冀东"特殊贸易"①。1934年后半年以来，冀东沿海一带走私贸易猖獗，日本驻外军部注意到这种贸易，便指使傀儡政府搞起这种"特殊贸易"来，据说只要付出正规关税四分之一的检验费，就允许卸货，可以说是(伪)政府公认的走私贸易，企图以此巩固冀东政权的财政基础，诱使冀察政权合并，并压迫中国经济，使国民政府同意减低关税。1936年2月12日，"特殊贸易"开始实行，冀东政府的财政状态由此好转。冀东地区卸下的走私商品，不仅进入华北，甚至远销江南。这些商品几乎全是日本货，由于公然走私，据说大连的滞销货竟一扫而空，结果搅乱了中国市场，压迫了中国企业。由于公然走私，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当然锐减，而关税收入大部是英、美列强对华贷款的担保，所以"特殊贸易"的实施，不仅引起中国而且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对。加之，冀东地区成了制造和贩卖鸦片、海洛英等麻醉药的基地，因此，日本在道义上也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随着"华北工作"的开展，以

① 特殊贸易：指走私贸易。——译者

前所谓"日中经济合作"的方针却变成名为"开发华北经济"的经济侵略方针。1935 年 12 月，满铁子公司——兴中公司建立；随之，各种开发公司相继成立，对华北资源进行掠夺。 408

随着侵略华北日甚一日，抗日运动也高涨起来。1936 年 8 月至 9 月间相继发生了"成都事件"① 和"北海事件"② 等暴力事件。日本政府想乘机解决日中悬案，调整陷于僵局的日中邦交。于是 9 月 5 日，外相有田八郎向驻华大使川越茂发出指示，川越大使遂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开始谈判。日本方面不仅要求解决暴力事件，而且强迫国民政府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实行共同防共、华北经济提携及减低关税等等，作为"对调整邦交具体表示诚意之确实证据"。③ 对此，中国方面提出了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其中包括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政府和停止走私等等。④ 抗日运动的高涨已使国民政府在对日妥协上不能比上述条款走得更远了。谈判不见进展，加之，11 月 14 日发生了关东军唆使蒙古军侵入绥远省的事件⑤，中国对日态度更加强硬。12 月 3 日，会谈终于破裂。广田内阁对华政策完全破产。

在对欧外交方面，广田内阁的矛盾也日渐深化。按照《帝国外交方针》，广田内阁决定把反苏反共政策作为重点，其具体办法则明确指出这样的方针，即与"在国防上和对赤化的政策上以与我方保持协调为有利"的德国相提携，以此牵制苏联。早在 1935 年 5、

① 成都事件：1936 年 8 月成都民众反对日本强设领事，愤而击毙二名日本人。——译者

② 北海事件：1936 年 9 月上海人民纪念"九一八"，遭军警镇压。其后，广东、汉口、上海均发生日人被杀伤事件。北海事件，指日本人中野在广东北海被杀。——译者

③ 《现代史资料》，8，第 297—299 页。

④ 同上，第292页。译者补注：塘沽停战协定，1933 年 5 月 31 日签定。上海停战协定，1932 年 5 月 5 日签定。

⑤ 指日本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进犯绥远五原及绥东地区。——译者

6 月间，日本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已同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级的里宾特罗甫开始了关于缔结同盟的会谈。参谋本部考虑到满洲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苏联的军事威胁以及防止国体所不容的共产主义攻势等等，从这些观点出发，痛感签订协定的必要，对缔结同盟劲头十足。这一决定日本前进方向的重要外交谈判，不是通过正式外交机关，而是由参谋本部通过驻外武官来进行的，这充分显示了日本外交的矛盾。后来，重光葵曾把双重外交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武官不服从大使和公使的监督，直接与军部最高当局联系，同驻在国的政府机关进行谈判。[①] 重光指出的是在中国的事例，与军事还有关系，而这次交涉的舞台是在欧洲，而且是纯粹的外交事务。由此也可以看出，军部介入外交权的程度越发严重了。

此后，谈判进入协定内容具体化的阶段，才算转到外务省手里，走上正式外交谈判的轨道。政府看到共产国际赤化工作的主要目标从欧洲转向东亚，成为对日满两国安全的直接威胁，成为日本贯彻亚洲政策的重大障碍[②]，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德合作便积极起来了。于是，谈判顺利进展，11 月 25 日签署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

409

协定表面上标榜的是对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要互相合作，采取防卫措施。但秘密附件则明确以苏联为对象，约定日德两国一方与苏联进入战争状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动；非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政治性的条约。苏联得知这一事实后，立即对已经谈判完毕、只待签字的日苏渔业条约拒绝修订。日本煞费苦心修订的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时，外务省曾声明，此协定的缔结并不意味形成“特殊的国际集团”。然而，在签署该协定的前一个月，德国

① 《昭和的动乱》，上卷，第 140—141 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 351 页。

与意大利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在这种状况下与德国合作，就只能是意味着投身于国际法西斯主义阵营。(日本)统治集团指望靠对德合作来摆脱退出国联以来的国际上的孤立，但是，加入法西斯主义阵营，反而使这种孤立更加深化。

第四节　日中战争

八　重新研究对中国的政策

1936年1月制定的《处理华北要纲(第一次)》，正式把分离华北承认为国策，这是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要纲》还决定把“华北工作”完全交给在华驻屯军。同年5月，陆军根据这个决定，把驻华兵力从过去的两千名一举增到五千名。公开讲的增兵目的是“在华北防共”和“保护日本侨民”，而骨子里也有这样的意图，即通过增强兵力，把天津军司令官升格为“亲补职”[1]，与关东军司令官同级，使关东军不能插手华北。也就是企图把不服从中央驾驭，动辄独断专行的关东军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满蒙一带，实现华北政策的一元化。[2] 也可以说，是一种为消除双重外交的苦肉计。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件事却成为日中全面战争的重大原因。

广田内阁在对华政策走投无路之时，在国内政治方面也面临了窘境。掌握内阁主导权的军部，一面推行扩充军备计划，同时主张以七大国策为先决条件，改革议会制度和行政机构，其目的是要全面否定政党政治，确立缩小议会权限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对此，就连政党势力也都表示反对，政友会的滨田国松在第七十届议

① 亲补职，日本旧制，指由天皇直接任命之官员，如国务大臣、宫内大臣、内大臣，陆海军的大将等。——译者

② 藤原彰：《日本法西斯主义与日中战争》，(《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岩波书店，1971年，第282页。

会上严厉谴责军部对政治的干预。军部与政党的对立也反映到内410阁内部，因此，广田内阁于1937年1月23日终于宣布总辞职。

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被选定为继任首相。这是指望既是陆军前辈，又受政党欢迎的宇垣来消除陆军与政党之间的对立。然而，陆军却认为宇垣是断然实行大规模裁军的始作俑者，而且与重臣[①]集团及政党关系密切，是一个现状维持派，就拒绝推荐陆相人选。因此，宇垣内阁终于流产。陆相林铣十郎代之组阁。政友和民政两党没有一人入阁，完全是军部占主导地位的内阁。外相最初由林首相兼任，不久，任命驻法大使佐藤尚武为专职外相。佐藤外交的任务是，改善目前完全陷于僵局的对华关系。有田外交所推行的调整日中邦交工作也由于关东军的独断专行而失败，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监禁了来到西安监督地方军阀围剿红军的蒋介石，迫使他立即实行抗日救国、停止内战。这个事件的结局与日本的愿望相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的这种动向，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研究对华政策。

1937年1月，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其归国述职的报告中说："帝国过去对华所具有的威力，最近日渐显著减弱"，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在国内，帝国不统一"。[②]（报告）说，广田内阁由于军部与政党的正面冲突而倒台，宇垣内阁由于军部的反对而流产，都显示了统治集团内部对立的加深，这种对立直接反映到对华政策上，影响到中国的对日态度。报告接着指出，英国的对华亲善方针正在稳步取得成果，中国实际上正在趋向统一。须磨还转达了外交部长张群的谈话，即日本如不考虑："(1)消除过去的不当作法所造成的既成事实；(2)保证今后杜绝此类行动"，则力图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并在平等立场上达到和平目的的蒋、汪等对日本有了解

① 重臣：第二次大战前，专指曾经充任过总理大臣者。——译者

② 《现代史资料》8，第419页。

的人物，其处境将日益不稳，而抗日派的势力将反而增强。[1]这时，军部本身也开始自认"华北工作"的失败，主张修改对华政策。特别是1月25日，参谋本部作出决定："对于中国之统一运动，帝国应始终以公正之态度对待，华北分离工作应予停止。"[2]

这样，日本不得不大幅度地修改过去的对华政策。4月16日的四相会议决定了新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及《华北指导方策》。这些政策在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这一点上，和去年8月制定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并无不同，但其具体办法则可以看出有了相当的改变。即去年是着重于"分离"，而新的一年则"主要靠促进各项经济工作，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或有可能扰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然而，这毕竟只是放弃了政治分离政策，并不是连把华北实际上作为特殊地带以扶植日本权益这种经济侵略政策也放弃了。 411

根据这种对华方针，政府在谋求调整日中邦交的同时，还想改善对英关系，并进而谋求调整日美邦交。眼前同英国谈判的目标是中国问题、金融问题和贸易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目标是想缔结一项政治协定，使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优越地位，而对在华中、华南占优越地位的英国，则要求承认日、英平等。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满铁对英借款即将到期，要转期续借，并进而重新实行对华共同投资。关于第三个问题，目标在于对日、英贸易发生利害冲突的中南美及近东市场，重新缔结通商协定。然而，由于林内阁辞职，继之卢沟桥事件爆发，这种新外交政策，还未及实施就夭折了。

九　卢沟桥事变

本来就没有人望，并受到政党反对的林内阁，声称要惩罚政

① 《现代史资料》8，第417页。

② 同上，第384页。

党，搞了所谓"吃完了就溜之乎也式的解散（国会）"①。然而，由于在总选举中遭到惨败，还想重整旗鼓蝉联下去，遭到政党的倒阁运动，终于在5月31日总辞职。这是一个仅仅维持了四个月的短命内阁，它清楚地显示了"帝国的不统一"。解决国内的矛盾成为统治阶层最重要的紧急课题。于是，便只好由元老手中的王牌——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出来组阁。由于林内阁特别好玩弄阴谋诡计，近卫的登台，一般说来，给人们以清新的印象，国民对该内阁寄予很大的期望。

历届内阁遗留下来的问题堆积如山，摆在近卫内阁面前。在外交方面，要消除双重外交、调整日中邦交和改善与列强的关系等等。广田弘毅再次就任外相，继续推行佐藤外交规定下的路线。不过，日中关系的紧迫情况与日俱增，新"协商外交"几乎没有发挥效用的余地。

绥远事件以来，抗日运动进一步激化，西安事变以后，一致抗日的形势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也取消了曾一度答应日本的修筑铁路和开发铁矿等权益。再则，驻华日军的增强，使日中关系愈发紧张。从5月末开始，反对日本擅自增兵的学生抗议运动如火如荼，长达一月。日本在丰台新派驻了一个大队，而丰台是北平郊区的铁路交岔点，而且与中国二十九军的驻地宛平县城相距仅五、六公里，所以，日军驻扎丰台，就造成了容易引起日中两军纠纷的条件。

7月7日夜间，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紧邻宛平县城的芦沟桥附近演习，其时，不知从哪里飞来了数发实弹，一名士兵失踪。那个士兵不久就归队了，可是日军却以这个突发事件为借口，开始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了暂不扩大事

412

① "吃完了就溜之乎也式的解散(国会)"：1937年3月31日，第七十届议会即将结束，林铣十郎内阁突然以"整顿政党"为理由，解散议会。——译者

件和就地解决的方针。7月8日夜间，参谋总长命令在华驻屯军司令官："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兵力"。[①] 9日，参谋次长指示在华驻屯军参谋长："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就地解决事件。[②] 在当地，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大佐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奔走交涉，7月11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订立了停战协定。

但是，就在同一天，内阁会议却决定从关东军派出两个旅团，从朝鲜派出两个师团，并从国内派出三个师团。这是因为，陆军虽一度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至10日又秘密决定派兵，并提请内阁审议。在陆军内部，对事件的处理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对华一击论"，主张乘机给中国一次打击，一举打开华北政策的僵局，以杉山陆相和梅津次官为中心，参谋本部的第三科（担任作战和编制）、中国科和陆军省的军事科等均属此派。"对华一击论"这种思想的根子里，潜藏着对中国的极端简单看法，比如中国科一个中佐等人就说过，"国内动员的声势，或者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③] 反之，以参谋次长多田骏和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及参谋本部第二科（指导战争）和陆军省军务科等，则主张"慎重论"，担心如果派兵，则将陷入长期战争，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国交战，专注于当前的对苏备战。整个陆军，不分（陆军）省、（参谋本）部，分成对立的两派，这件事显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窘境，而这是由于侵略满洲，日苏、日华矛盾扩大而带来的外交政策上的分裂造成的。这种对立，由于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石原莞尔的让步而暂时消除，陆军决心派兵。然而，不能不看到，在这次决定派兵的背景中，还有随着卢沟桥事变发生而迅速抬头的、

① 《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3页。

② 《资料编》，第256页。

③ 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信社，1962年，第85页。

政府、政党、财界和新闻界中的强硬的“对华膺惩论”。例如，在内阁会议中，铁道大臣中岛知久平（政友会）和邮电大臣永井柳太郎（民政党）等政党出身的大臣竟提出：趁着这个时候，把中国军队彻底打垮了算了，诸位意下如何？这种强硬论比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①]到了这个时期，满洲事变当时的那种政府、政党、财界持慎重论、军部持强硬论的公式已经不适用了。驻日美国大使格鲁（Grew，J.C.）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现阶段，在内阁、军部、外务省、新闻和工商业者之间，对于无论如何也必须制止日本在华北地位的继续衰落，似乎已经有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②]内阁会议不费什么周折就决定了派兵，也是因为有了这种背景之故。

413 内阁会议决定派兵的11日晚，政府发表声明，说由于中国方面完全拒绝了在北平的谈判，因此，下“重大决心”“向华北派兵”[③]，并决定将此次事件称作“华北事变”。当天夜里，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集贵、众两院代表和财界代表，要求他们合作以解决事变。近卫的意图在于“对于中国，首先要威胁一下，表现出日本举国一致。”[④]

十　中国事变

中国方面也坚定了抗战的决心，用以对付日本的强硬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团结一致，“抵抗日寇的新进攻！”。[⑤]7月17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了“最

① 风见章：《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1951年，第34页。

② J. C.格鲁：《在日本的十年》，石川欣一译，上，每日新闻社，1948年，第279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366页。

④ 《西园寺公与政局》第6卷，第33页。

⑤ 录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0页。

后关头"① 的声明，表示了抗战的决心。日本方面以冀察政权为谈判对手，图谋扩大在华北的势力，但国民政府则反对就地解决，坚决主张通过中央政府一级的外交谈判来解决。

这样，就地解决的方针也行不通了。7 月 26 日，参谋总长闲院宫② 载仁亲王指示在华驻屯军行使武力，27 日，对国内待命中的三个师团下达了动员令。28 日，日军按预定日期开始总攻击，立即控制了冀察政权的根据地——平津地区。外务省东亚局、海军以及陆军中的不扩大派，趁着战斗告一段落，开始活动，想通过日中两国政府间的直接谈判来实现和平，并进而全面调整邦交。其谈判的试行方案是，放弃自塘沽协定以后日本在华北炮制的大部分既成事实。当然，作为交换条件，毫不含糊地提出实际承认满洲国、缔结日中防共协定和停止排日等"和协外交"的要求。不过，从提出取消冀东、冀察两政权等看来，比以往的强硬主张确有相当让步的内容。然而，由于军事上的意外成功，陆军内部趾高气扬，强硬论占了上风，根据让步方案的外交谈判只能秘密进行。因此，谈判的角色由民间人士来充当，原上海总领事、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拿着这个试行方案与国民政府亚洲局长高宗武进行了谈判。但是，由于驻华大使川越茂无视外务省的训令，自行直接出面谈判，船津的活动就失去了意义，而且由于军事侵略已经扩大到上海，这项和平谈判便以失败而告终。

8 月 9 日，在上海市内巡逻的海军中尉大山勇夫被中国保安队枪杀，这个事件竟成了第二次上海事变的导火线。对华北支持不扩大方针的海军，在自己势力范围的华中却对扩大战争积极起来。

---

① 蒋的原话是："此事（指芦沟桥事件）能否结局，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译者

② 闲院宫：德川时代日本皇室四亲王家之一。四亲王家是伏见宫、桂宫、有栖川宫、闲院宫。——译者

特别是当地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向军令部上报了如下的强硬意见："要想以武力打开日中关系的现状"，仅仅惩罚华北的第二十九军是没有效果的，必须设法使"当今中国的中央势力屈服"，因此，"最好派遣陆军五个师团控制上海和南京。"[①]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接此报告后，在11日的四相紧急会议上提议派出陆军并获得通过，13日，内阁会议决定从国内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与日本的动态相对应，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抗战体制。于是，8月13日，上海陆战队与中国军队之间遂启战端，"华北事变"扩大到了华中。米内海相在14日阁议上说："既已至此，事态不扩大主义消灭了，华北事变已变成日华事变"，主张必须发表政府声明并占领南京等[②]。实际上，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主义既已破产，就必然要转向全面战争。于是，8月17日阁议作出决定："放弃过去所执行的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所必需的各项准备及对策。"[③] 9月2日又把"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9月4日，当第七十二届临时议会开幕时，天皇下达敕谕说："朕之军人现正排除万难，致其忠勇。是不外敦促中华民国之反省，以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实际上这是一篇宣战书。[④] 在这次议会上，通过了突破二十亿日元的临时军费，并通过立法，决定军需工业动员法也适用于中国事变。8月31日，以八个师团编成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是寺内寿一大将），以代替原来的在华驻屯军，使之"占领平津地区及附近要地，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更于11月17日制定了新的"大本营令"，规定除战时之外，在事变时也可以设立大本营。20日，根据此项规定设立了大本营。

414

---

① 《现代史资料》9，第186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21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370页。

④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474页。

中国方面也以第二次上海事变为契机，加强了全面抗战的体制。8月13日，南京政府发表了《抗日自卫宣言》,[①]同时设置了“国防最高委员会”。15日，向全国发布了总动员令。同日，中国共产党也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抗日方针。这样，大致以8月中旬为界，日中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

十一　事变的逻辑

向全面侵略战争的转化，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

第一，与中国的矛盾激化了。芦沟桥事变以来，国共合作的趋势日益高涨，到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而迅速具体化。次日，即23日，蒋介石接受宣言书并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红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新四军，日本最害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日本现在陷入了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的境地。

第二，扩大侵略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开始积极援助中国。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隔离侵略者！”的演说。6日，国联总会通过决议说，“日本的行动是违反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的”。随着日本军事行动在量和质上的扩大，与列国的利害冲突也加深了。加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对中国市民及俘虏干出大量的暴行和残杀事件，即南京惨案等等，日军的残暴行为和不加区别地轰炸不设防城市等罪行，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世界各 415

① 当系指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所发表之“自卫宣言”。——译者

地掀起了抗议日本暴行的运动。

第三，全面战争压迫国民生活，使国民的不满与不稳日益增大。为了进行正式的战争，就必须向国民宣传忍受艰苦，以激发斗志，把国民的精力集中到战争中去。因此，政府自 9 月中旬开始掀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然而，假"事变"之名发动战争，又是内务官僚自上领导的官办运动，那是无法激发国民自发的热情的。近卫首相慨叹日军士气的低落，反而吃惊并羡慕中国军队的爱国心和抗日精神的旺盛①。假"事变"之名来掩盖真正的战争，其矛盾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

实际上是无可争辩的战争行动，而形式上硬要说成是"事变"，这种矛盾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而开始暴露，对战争的进行产生了种种障碍。因此，政府于 11 月上旬，在内阁设立了委员会，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对中国正式宣战的问题。研究结果指出，正式宣战的有利方面是：（1）给中国方面造成日本誓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深刻印象；（2）能够制止第三国向中国提供武器及其他军需品；（3）可以加强国民的决心，巩固团结，等等。与此相反，正式宣战的不利方面则是：（1）与全中国人民为敌，这与过去日本声明过的，即日本的军事行动在于敦促南京政府的觉醒，对广大群众不怀敌意的逻辑是矛盾的；（2）将更加激烈地遭受违反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的谴责；（3）给全世界造成日本侵略中国的印象，使世界各国对日气氛更加恶化；（4）由于美国运用中立法和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重要物资的来源可能被切断，从而会使今后继续战争，特别是维持国民生活陷于困难；（5）失去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战后难以恢复，搞不好就会被第三国所夺去；（6）很有可能使中国的抗日救国气势更加激化；（7）在现阶段宣布战争，师出无名，将使国民深怀疑心

① 《西园寺公与政局》，第 6 卷，第 101—102 页。

等等。①根据这种"损益计算书"，政府作出了不发布宣战书的结论。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发布宣战书所受的损失远远超过所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才把企图以武力实现国家利益的行动，亦即只能是战争的行动，罩上了一个"事变"的面纱，想要借此使之正当化和合理化。

416

十二　战争的长期化及其矛盾

投入大量兵力，给中国军队以打击，一鼓作气使国民政府屈服，日本这种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后盾的中国军队，顽强地进行抵抗，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多次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战争违背了当初的预测，日益陷入长期化，而且，当地驻军照例无视参谋本部的指示，擅自扩大战线。

天皇制国家这种日本所特有的权力结构所造成的矛盾，即国务与统帅分裂的矛盾，在日中战争中再次暴露在人们面前。政府不能了解军队的战况，给外交政策及财政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均带来了障碍。近卫首相心想设置包括首相在内的指导战争的大本营，以此作为使国务与统帅一元化的一种方策，但陆军却不同意，于是设立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以期达到调整政略战略的目的，但它只是一个联席机关，"统帅与国务完全背离，宛如两个东西"的状态丝毫没有改善。②国务与统帅、政府与军部的矛盾，由于陆、海军统帅的二元化，以及军政与军令、军部中央与驻外军部，直至陆军统帅内部的分裂等等而更加激化。就这样，反映出对华政策一筹莫展，天皇制国家内在的对立倾向更加扩大，对华政策的混乱更加深了。

苏联的对华援助大力开展后，陆军统帅部就急欲早日解决事

① 《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大出版会，1966年，第296—315页。

② 近卫文麿手记，《失踪的政治》，朝日新闻社，1946年，第24页。

变。1937 年 9 月 20 日，参谋本部上奏天皇说："11 月间苏联将有所动作，因此，希望在此之前积极地解决事变。"[①] 接到此项奏文后，10 月 1 日召开四相会议作出决定："此次事变应以军事行动之成果及恰当之外交措施，互为表里，尽速予以结束。"并确定了"以不拘泥于过去情况的划时代地调整国策为条件，进行外交谈判"的方针(《中国事变处理要纲》)。[②] 政府根据这一方针，委托德国调停实现对华和平。11 月 2 日，广田外相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Dirksen, H.v.)出示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其内容除增加"承认内蒙自治政权"外，大体上沿用了船津辰一郎以前所提出的交涉条件。11月 5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 O.P.)向国民政府转达了日本的条件。正当蒋介石指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关于日中纠纷的九国会议作出具体的对日制裁措施，因而对和平谈判不感兴趣。但九国会议结束，期待落了空，蒋介石乃同意谈判。然而，占领南京的

417 第二天，12月 14 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重新研究了媾和条件，由于各阁僚的要求，又加进了新的条件，狄克逊一看这些新加的条件就说，这样一来，中国方面是不会接受的。占领南京的胜利气氛使媾和条件苛刻起来，但不容忽视的是，军需产业资本家们在背后捣鬼，暗暗期待事变的扩大和战争的长期化。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经济已日渐走向军事化，日中战争的爆发更促进了这种倾向。政府为了进行日中战争，编制了庞大的军事预算，同时还制定了《临时资金调整法》、《输出入品等临时措施法》和《关于适用军需工业动员法的法律》等，计划扩大军需生产。由于庞大军费的发放和(经济)统制立法的实施，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军需工业飞速发展。老财阀把生产重点转向军需工业，垄断进一步加强，与国家权力的勾结也进一步加深；而另一方面，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新兴财阀抬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478 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 370—371 页。

头，与军部和官僚相勾结，推进了侵略政策。这样，向战时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的军事化，成为阻碍解决日中战争和尽速实现和平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中央政府一级在进行和平谈判，而另一方面，当地驻军却同时进行着扶植傀儡政权的活动。9月至10月，关东军一手炮制了"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11月22日，这三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委员会"。12月14日，华北方面军又在北京一手炮制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二年（1938年）3月，华中方面军在南京炮制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华北方面军相对抗。这种分割中国的活动是阻碍对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原因，但当地驻军所造成的这些既成事实，却照例旋即得到中央的追认。

1938年1月，蒋介石送来了对日本和平谈判的答复，说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不清楚，希望提出更具体的提案。1月15日，联席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会上陆相以及海相、外相、内相等大部分出席人员都主张停止谈判，唯有参谋次长多田骏一人坚决主张继续谈判。参谋本部担心对前景心中无数就糊里糊涂地陷入长期作战，会削弱对苏的战备。主张停止谈判者的判断则是，南京陷落以后，蒋介石政权已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可以说一推就垮了"，这种时候"应极力排除半途而废之解决，……和姑息的妥协。"① 侵略战争的进展，已到了不能自拔、不能草草讲和的阶段。正如下述主张停止谈判的理论所表明："不管怎么说，日本军队杀了七、八十万中国兵，而今即使突然改变态度，说是要握手言和，也不会是真心实意地言归于好。……身为战胜国，却说赶紧来和好吧，……和盘托出自己的底，这就等于向国内外宣传日本的国内情况已困难到

---

① 《现代史资料》，9，第104页。

这般地步……，对日本非常不利。……恐怕(日元)汇价就要暴跌，公债就要暴跌，给经济、财政带来不信任，……买不到东西，物价上涨，闹出搅乱内政的乱子。……象今天参谋本部所希望的那种干法，为国家计，令人不胜担心。"① 这是文相木户幸一的发言。

恰如近卫首相自己发牢骚："参谋本部实在太软弱"②，政府是主张强硬论的，反之，统帅部却主张继续谈判论。这场初看之下不免令人感到奇异的争论，终以统帅部担心政权更迭而妥协始告结束，最后决定停止和平谈判。于是，次日，即16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新政权之成立和发展"，完全堵死了和平谈判的道路。政府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归国，驻日中国大使许世英也离职返国，日中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完全断绝，从此两国在形式上也进入了战争状态。

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一开始，政府便采取统制言论和思想、强化治安机构和对批判战争的势力加以镇压等措施，迅速整备适应侵略战争的总体战体制，到1938年4月1日又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这个法律，以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最有效地发挥国家的总体力量，"统制并运用人力和物力资源"为目的，为达此目的，在必要时赋予政府公布敕令之权，是一种委任立法。在公布该法的同时，制定了"电力国家管理法"。这两个法律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统治牢牢树立起来了。

十三　宇垣外交

在发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后，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十三年以后指导战争计划大纲》，即在1941年以前四年之间，

---

① 《西园寺公与政局》，第6卷，第210页。

② 同上，第216页。

维持对华持久作战，并在此期间完成对苏、中两国作战的准备。[1] 2月16日的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不扩大战线的方针。然而，这一方针也由于当地驻军独断专行、积极作战而被践踏。不久，统帅部也转而主张积极论了。4月间，为了包围并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连结华北、华中两傀儡政权，开始了徐州战役，5月19日占领了徐州。然而，不仅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连日军一手炮制的“新兴政权”也不得民心，成为毫无群众基础的空架子。这样，企图靠培育傀儡政权来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失败了。

近卫首相认识到这一失败，试图通过改组内阁来修改对华政策。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直接负责的广田外相被撤职，任命宇垣一成继任外相。宇垣提出了四条入阁条件，得到了近卫的同意，即（1）内阁的强化与统一；（2）外交一元化；（3）开始对华和平谈判；（4）视情况取消1月16日的近卫声明。[2] 宇垣一上任，立即开始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对手的非正式谈判。6月26日，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举行预备谈判。可是，日本方面提出的和平条件袭用了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二次补充方案，条件太苛，是中国方面万难接受的。尤其是以蒋介石下野为先决条件，乔辅三表示强烈不满。9月1日，中国通知结束谈判。宇垣搞的和平谈判就这样草草失败了。

宇垣外交的另一个课题是，改善随着对华侵略的扩大而逐渐加深了对立的日英关系。7月26日，宇垣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Craigie, R.)开始会谈。克莱琪大使说，日本虽然声明尊重外国权益，而在中国却正在不断地侵犯英国的权益，并提出恢复这些权益是会谈的重要课题。克莱琪认为，由于日本不执行尊重权益的声明，英国无法缓和对日的感情。对此，宇垣反驳说，因为英国的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32—533页。

② 《宇垣一成日记》，2，第1240—1241页。

态度恶劣，刺激了日本的国民感情，给解决问题造成了困难。军部和右翼势力展开了反英运动，表示反对日英会谈，外务省的少壮事务官也要求外相停止日英会谈，说："与公然高唱援蒋的英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这是自己向全世界赤裸裸地表明日本腰杆子软弱。"[①] 会谈一直延续到宇垣辞职为止，共进行了五次，结果双方只是互相抱怨一番，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这样，宇垣几乎一事无成，于9月30日辞职。辞职的直接起因是兴亚院问题。

近卫内阁在去年九月前后就计划建立一个"对华中央机构"，以谋求对华政策一元化，早日解决由于国务与统帅不统一和军内分裂而陷入僵局的日中战争。1938年1月，企划院宣布成立东亚事务局的方案以后，法制局和外务省也宣布了各种设想，引起了纠纷。纠纷的原因是，陆军企图通过对华中央机关独掌对华政策；而外务省则担心自己的权限被缩小，拼命反对。因此，设置了五相会议，作为对华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而设置对华中央机关一事便一时消声匿迹。然而，随着侵占地区的扩大，进入大规模推进扶植亲日中央政权和设立国策公司的计划等政治、经济侵略阶段，就尤感有必要设置对华综合机关。于是，8月中旬左右，问题再次提出，军部与外务省的对立又表面化了，但结局外务省让步，制定了《对华院要纲》。然而，宇垣反对把对华院的对象领域扩展到非占领地区，认为这是"要抽掉外交系统的中枢"，反对这一妥协方案，并以此为理由提出辞职书。[②]

"对华院"按照当地军队的意见改名为"兴亚院"，于12月16日公布了"兴亚院"官制。兴亚院是以首相为总裁，以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各大臣为副总裁的"对华中央机关"。总务长官由柳川平助中将担任，政务部长由铃木贞一少将担任，陆军掌握了实权。

420

① 《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3，第353页。

② 《宇垣一成日记》，2，第1262页。

这样一来，外务省的权限便更加缩小了。

十四 东亚新秩序声明

放弃“不扩大战线”方针、决心开展徐州战役的大本营，又制定了开展汉口和广州两战役的计划。这次战役的目的是，打击南京失陷后迁都汉口的国民政府领导中枢，攻占华南要地广州，切断蒋政权的重要补给线，以使国民政府屈服。7月14日，日苏两军在苏满边境的张鼓峰发生冲突，危及日本原定计划的实施，但因8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事件也大体上得到解决，便于8月至9月间先后开始了汉口战役和广州战役。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并于同月27日占领了武汉三镇。然而，国民政府又把首都由汉口迁到重庆，抗战态势并未崩溃，所以这次作战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是徒然扩大了战线。由于这两个战役，日本兵力的投入已达极限。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在这两个战役结束时竟达二十四个师团、一百万人以上，国内仅仅剩下一个师团(近卫师团)。由于准备对苏战争的兵力也转用于中国战场，因而在朝鲜只配置了一个师团，在满洲只配置了八个师团。对此，苏联在远东的兵力达到二十八个狙击师和十八个航空兵团。① 从把苏联做为头号假想敌国的国防方针的目标来说，对苏战备的劣势极其令人忧虑。这样，陆军在汉口、广州两战役之后，已无力继续进行攻势作战，不得不转入“政略进攻——战略持久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那年5、6月间所作的讲演《论持久战》中就预见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由于攻占广州、武汉，日本军队的“战略进攻”和中国军队的“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将结束；其后日军即转入“战略守势”，而以游击战为主的中国

---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52页。

则转入"准备反攻的时期"。在第二阶段，日本的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①] 这是毛泽东作出的估计，这一预见已完全证实。

与此相反，"华北事变"开始时，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那些吹嘘只用一个月就能结束的"对华一击论者"的设想，却完全落空了。不用说一个月，费了一年半的时间，而且投入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也没能解决，终于不得不采取"长期持久的态势"。诚然，到1938年秋，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是日军所统治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点（城市及其周围）和线（铁道和公路干线），除此之外的地区，到处都遍布抗日据点，中国军队展开游击战，给日军以威胁。

转入"政略进攻"的标志是11月3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这个声明一方面断定国民政府已沦为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却说，倘若它放弃以往的抗日政策，改变人事结构，有意"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那么日本政府是不会拒绝的。[②] 这就不加掩饰地修正了先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自我宣告了扶植伪政权政策的失败。该声明并宣布，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确定不移之方针"，这一点在日本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声明说，建设东亚新秩序，"渊源于我肇国之精神，此事业之完成乃赋与现代日本国民之光荣天职"，这是把日本一己之原则强辩为普遍性原则、并由此使瓜分世界正当化的法西斯主义外交观念的宣言书。作为外交观念的东亚新秩序具体化为外交政策，则是同年11月30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③]。按照这个方针，

421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2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1页。译者补注：中译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6—277页。

③ 中译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9—283页。——译者

所谓东亚新秩序，不单是一个经济区，而是建立一个范围很广的统治圈的设想，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

作出这个声明是有其背景的。亲日派、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从"和平救国"的立场出发，批判"抗日救国"的路线，日本为利用他来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了活动。宇垣的和平活动失败之后，急于早日解决事变的陆军，着力从事这一活动。一方面，武汉三镇沦陷后，在国民政府内部，正如毛泽东所说，"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抬头，所以对汪精卫的工作迅速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12月20日，汪精卫逃出重庆到达河内。22日，与汪精卫的逃亡相呼应，近卫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声明首先谈到"与中国的有识同忧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然后作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列举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①，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汪精卫在河内向重庆政府展开宣传活动，预计国民政府内部的和平趋势将会高涨，然后在日军非占领地区的中国西南部（云南、四川、广西和广东四省）将会建立起新政府。然而，尽管汪精卫呼吁，汪派的要人们却不为所动，汪精卫反而被骂作卖国贼，撤销了他的副总裁职务，连国民党党籍也给开除了。这样，汪精卫完全陷于孤立，通过对汪精卫进行活动而开展的政略进攻遂告失败。

第五节　外交的混乱

十五　加强日、德、意协作问题

在凭武力征服中国方面遭到失败的日本，一面对中国进行"政略进攻"，同时又力图通过强化法西斯轴心来打开日中战争的僵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7页。译者补注：中译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86—288页。

局。这就是自1938年以来历时大约三年，一直成为争论焦点的三422国同盟问题。这个外交过程，集中地暴露出日本外交的矛盾和混乱。

此事的开端始于1938年1月，里宾特罗甫向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少将探询关于缔结同盟问题。纳粹自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稳步而顺利地加强了国内的独裁体制，1937年11月决定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法西斯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动，继在亚洲侵略满洲、在非洲吞并埃塞俄比亚之后，渐渐转向欧洲。德国为了排除英、法的抵抗和干涉，企图与日本和意大利建立军事同盟。

过去，进入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对华贸易曾迅速上升；德国国防军在传统上是亲苏的，并曾通过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团，援助过国民政府。这就是一面通过防共协定与日本维持合作关系，另一面又支援日本的敌方这样一种矛盾的关系。希特勒考虑到德国对华援助政策妨碍日德军事同盟，于1938年2月，图谋改变对华政策，更换了国防军首脑集团，掌握统帅权，同时罢免了外交部长牛赖特（Neurath, K. F. von），任命里宾特罗甫继任该职，承认了满洲国，停止了对华武器援助，撤走了军事顾问团，进而撤销了驻华大使。这是为了讨取日本特别是日本陆军的欢心，以达到缔结军事同盟的目的。

日本接到德国的提案后，立即大感兴趣，尤其陆军最积极主张加强合作。陆军的意图是，通过加强防共轴心，来挫退苏联介入日中战争，以至"挫退其侵略东亚的企图"，此外，"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并"使美国至少保持中立态度，可能的话，诱使其倾向亲日"[1]。由于日中战争长期化，对苏战备濒于破产，需加以充实；同

---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第63页。

时要牵制美、英、苏，使之停止援华，以谋求收拾事变，即所谓“借助外力的策略解决”，陆军寄希望于三国同盟者在于此。这年1月以后，谈判一直在里宾特罗甫和大岛之间进行，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被当作局外人，不得预闻。7月，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东乡才从大使馆人员口中得知谈判的情况。东乡认为，三国同盟不仅对解决日中战争不会起作用，恐怕日本反倒会被欧洲战争所利用而受到连累。他向宇垣外相申述意见，要求结束缔结同盟的谈判。陆军认为，东乡这种反对论者担任驻德大使，是缔结同盟的障碍，企图把他赶走。10月18日，东乡被调任驻苏大使，大岛武官晋升为驻德大使。

7月19日的五相会议决定了加强日、德、意合作的方针。接着，8月12日的五相会议决定讨论外务省拟定的草案，但因板垣（征四郎）陆相主张推行“里宾特罗甫方案”，审议就延期了。“里宾特罗甫方案”的目标是缔结不仅针对苏联，而且广泛针对“第三国”的坚强的军事同盟。8月26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外务省对此加以修改的方案。主要修改之点是：在前言中写上“加强对共产主义破坏的防卫……”把防卫对象只限定于苏联，并将原案的自动参战义务改为经过协商决定。① 德国的目的是，希望牵制英法，结成坚强的军事同盟，而日本却担心对英美关系的恶化及卷入欧洲战争，所以做了如上的修改。 423

于是，电令驻外机关根据这一修正案着手谈判。然而，围绕着修正案的解释，陆军与外务省之间有分歧，这就成了纠纷的原因。外务省方面的解释是以苏联一国为对象，而陆军方面的解释则是主要针对苏联，但不排除以“第三国”为对象，并以此向驻外机关发出了训令。② 于是，为了统一解释，外务省于9月9日制定修正案，

① 《现代史资料》，10，第179页。

② 同上，第180页。

并提请陆、海、外三省协议会审议，但因修正案把对象明确限定于苏联，冲淡了军事同盟的性质，陆军方面认为这是阉割了8月26日五相会议决定的主要精神，拒绝参加审议。这样，加强防共协定问题陷入了僵局。9月30日，宇垣外相借兴亚院问题而辞职。内大臣汤浅仓平评论说："宇垣失败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结论上往往脚踩两只船。"① 宇垣的摇摆外交是，既想靠强化同德国的合作来打开日中战争的僵局，而又不愿因缔结同盟而把对英美关系搞坏了，反映了日本外交进退两难的困境。

11月1日，德国正式提出了条约草案。11月11日的五相会议通过了促进早日缔结日德意三国协定，并决定参考德国方案，迅速制定日本方案。此时，新外相有田八郎作了谅解性的说明："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加入苏联方面则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并提出《关于加强日德意防共协定问题》，得到了与会全体人员的确认。② 外务省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第二次修正案。但大岛武官对此案提出了抗议，认为只把苏联作为对象，与8月26日五相会议的决定相差甚大；重要的国策仅在两、三个月之间就改了，使人难以置信；已经按照以"第三国"为对象的方针，向德国提出谈判，今又变更方针，"事关我国威信"。五相会议对如何电复大岛进行了研究，因首相生病缺席，成了四相会议。会议开了几次，但因陆相与外相意见对立，得不出结论，转年，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总辞职。

十六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复杂离奇"的声明

在重重矛盾压迫下，近卫内阁被迫辞职，继由枢密院议长平沼

① 《西园寺公与政局》，第8卷，第10页。

② 《现代史资料》，10，第189页。

骐一郎组阁。有田外相留任，但以加强防共协定问题只限于针对苏联为条件，并获得了平沼的同意。[1] 平沼内阁刚成立后的1939年1月6日，德国向意大利和日本重新提出了三国同盟方案。其内容，实质上与去年11月1日提出的方案几乎没有变动，仍然是要把英法也包括在对象之内的军事同盟。有田外相接到德国正式提案后，先与陆军当局进行协商，制定了如下方针，并在1月19日的五相会议上获得通过。其内容是：（1）三国同盟是针对苏联的，但根据情况也针对“第三国”；（2）武装援助，在针对苏联的情况下自不待言，在针对第三国时，是否进行援助，以及援助到何种程度，则须视情况而定。[2] 外务省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日本的方案。该方案实质上也把苏联以外的国家包括在对象之内，这一点对以前的方案作了很大变动；它企图借此达成协定，同时并考虑“在努力减少我国可能蒙受的不利之同时，应对外说明，这仅仅是反共协定的强化，以减少可能来自第三国的恶劣影响”，是外务省当局的苦心之作。[3] 然而，德国对发表协定的效果比协定本身的效果更为重视，所以日本与德国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不是单单改动词句的小动作就能解决的问题。

424

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执行日本外交的主体缺乏统一。天皇也为此忧虑，在决定采纳妥协案以后，立即让平沼首相确认两点，即驻外机构不服从训令时应召回或作适当的处理；协定内容如须再作更改，即停止谈判。平沼向天皇呈上了五相会议全体人员署名的保证书。[4] 既然天皇如此亲自叮嘱，就必须作出周密的安排，以防驻外机关独断专行。有田外相不再用过去以电报发训令的作法，而

① 《西园寺公与政局》，第7卷，第258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第99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8页。
④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第112页。

采取派遣由外务、陆军和海军组成的特使团的办法，直接传达训令。特使团于2月下旬前往意大利和德国，向白鸟、大岛两位大使传达了训令。然而，两位大使不仅不服从政府的训令，反而向外务省提出要按照德国的要求，以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为对象，包括武力援助在内。外务省草拟了电复训令，命令按原定原则执行，并提交3月13日的五相会议审议。除外相以外，其他四位大臣都主张“在不改变根本宗旨的原则下，总得对大岛和白鸟提出的意见也作出一点让步”，而有田则认为“要让步就势必改变根本原则”，两者意见对立，会议没有结果。继而，在同月22日的五相会议上，又重复了同样的争论。结果制定了一个妥协方案（第二案），训令驻外机关，如按原训令执行，德、意两国仍不同意时再提出这个方案。可是，大岛、白鸟两位大使却根本不执行原训令（第一案），而立即按照第二案开始了谈判。两大使并答应里宾特罗甫外长和齐亚诺外长，在德、意与英法开战时日本也负有参战的义务。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训令，超越权限的独断专行。然而，由于陆相板垣的强烈反对，政府既未能停止交涉，也未能召回两位大使。

425

到了5月，德国外交部条约局长高斯（Gauss, F.）提出了妥协案。该妥协案说明这个条约是反共协定的引伸，是防御性质的等等，表面上表现了若干让步，但实质上却和过去的德国方案一样。5月7日，五相会议研究了高斯方案，陆相和首相主张立即接受，外相和海相对此表示反对，两者意见对立，会议没有结果。此后又开过多次会议，但双方对立相持不下。

对日本迟疑不决急不可待的德国，5月22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钢铁同盟），并着手准备侵略波兰，为了孤立波兰而开始接近苏联。陆军对此种形势焦虑不堪，一面封锁天津租界，恶化对英关系，一面唆使右翼势力掀起反英运动。甚至散布说计划利用右翼暗杀亲英派重要人物和陆相单独辞职，搞垮内阁等，从侧面施

加压力，催促缔结同盟。然而，德国对同日本结盟的希望已经淡薄，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防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这意味着原先为了牵制苏联而加强防共协定的目的已经彻底告吹。于是，8月25日的五相会议决定停止三国条约的交涉，继而于28日，平沼内阁留下所谓"欧洲的天地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这种殊不可解的词句而总辞职。这个"复杂离奇"的声明，把日本外交的身影——在对华政策上走投无路、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瞬息万变的形势所播弄而失去了方向性和统一性的日本外交的身影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了。

十七　诺门坎事件

当靠加强反共协定来从策略上解决日中战争这个企图碰壁之时，军部又在南北两方面进行了军事行动，由此更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

首先，海军根据1936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外交方针及国策的基准，公然推行南进政策。当年9月，任命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为台湾总督，终于把长期以来由文官占据的台湾总督一职改由海军武官担任。并于1938年4月，在总督府内新设了海军武官府，主要负责筹划南进政策。1939年2月，海军占领海南岛；3月，宣布将新南群岛（南威岛）[1]置于台湾总督府管辖之下。随着日本的军事行动向西南太平洋扩张，加深了与在这个地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美、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对立。同年7月26日，美国通告废除日美通商条约。日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之处甚多，特别是日中战争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绝大部分要靠从美国输入，这个通告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通告对当时正在举行的日英会谈也

---

① 南威岛：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岛屿之一。——译者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年6月14日，日军借口抗日恐怖行动激化，武装封锁了天津英租界。为了这个问题，有田外相和英国大使克莱琪自7月15日开始了日英会谈。由于英国的绥靖态度，会谈一时进行得颇为顺利，但是以美国通告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为转折点，英国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8月21日，会谈终于破裂。还有，6月下旬，荷属东印度也对日本的棉制品、棉布和陶磁器等的输入定额采取了削减一半的措施。

426

当由于大力推行南进政策，与西欧列强的关系日益恶化时，在北方，关东军与苏联、蒙古之间挑起诺门坎事件，使日苏关系也恶化了。上年7月张鼓峰事件(苏满东部国境日苏两军的冲突事件)以后，由于日满军队小规模地侵犯边界，日苏间一直保持着紧张情况，特别是满洲西北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诺门坎附近，因为国境线不明确，满洲国(实际是日本)与蒙古之间主张不一，因而是容易引起边界纠纷的地区。攻占武汉后，陆军停止了对中国的进攻，采取长期持久作战的态势，决定集中全力充实对苏战备的方针。参谋本部害怕在对苏战备尚不充分的时期内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对关东军也传达了“绝对不要理会边界纠纷”的根本方针。可是，关东军违背中央的方针，对边界纠纷采取了强硬态度。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对下属的防卫司令官发布《满苏边境纠纷处理要纲》，① 指示以对苏蒙军队的“不法行为”予以“彻底惩罚”为根本方针，而对“不法行为”的认定，则全凭当地司令官来判断。就是说，只要当地司令官“自行”断定是越境，就要视为“不法行为”给以“彻底惩罚”，这简直是在鼓励边界纠纷。果然，5月11日，在诺门坎南部地区，“不法越境”的蒙古军队与满洲国军队进入了交战状态，发展到日军与苏军间局部战争的地步。事件扩

① 《现代史资料》，10，第106—107页。

大的直接原因仍然是照例的老模式，即当地军队独断专行和军部中央的姑息纵容与缺乏统制力。参谋本部唯恐发展成为正式的对苏战争，特意召回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出示《诺门坎事件处理要纲》①，并指示不扩大事件，通过外交谈判加以解决，但矶谷却拒绝接受"要纲"。关东军还无视参谋本部的方针，更进一步投入兵力，扩大了战争。其结果，包括死伤、失踪和战病的人员在内，牺牲达两万人之多。主力军第二十三师团等死伤率近八成，遭到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打击。② 到9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诺门坎事件这才得到解决。不过，这次战争的结局是日本彻底失败。陆军认识到，在现代装备上与苏军差距显著，更加感到必须充实对苏战备，因而急欲解决日中战争。

---

① 《现代史资料》，10，第121页。

② 《战史丛书・关东军》，朝云新闻社，1970年，1，第713页。

427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

第一节 重新瓜分世界的设想

一 大战爆发与日本外交

平沼内阁留下了"复杂离奇"的声明而辞职之后，陆军大将阿部信行组织了内阁。统治阶级对于阿部内阁的期待仍然是遏制陆军，谋求外交一元化。

在阿部内阁成立后不久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突然袭击。于是，英法的慕尼黑政策，即牺牲小国捷克斯洛伐克，企图避免与德国作战，使德国进攻的矛头对准苏联的政策彻底失败了。对波兰缔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宣布对德宣战。第二次欧洲大战由此开始。德国迅即控制了欧洲。9月28日，德国决心与苏联缔结友好条约，以瓜分波兰。此后，(德国与英法之间)一直处于虽已宣战却没有战斗的"奇妙的战争"状态。这是因为，德国方面指望英法的绥靖政策，而英法则图谋组织反共十字军。同年11月的苏(联)芬(兰)战争是结成反共十字军的极好机会。为了防备德国的进攻，苏联向芬兰提出缔结以交换领土修改边界为目的的互助条约。然而，企图使德国进攻苏联的英国却挑唆芬兰拒绝苏联的提议，并煽动其对苏开战。于是，11月30日，苏芬战争一开始，国际联盟立即把苏联定为侵略者，并决定开除其盟籍。英法两国决定乘此机会派出正规军队，组织反共十字军。然而，不久苏联与芬兰缔结了条约，这一企图也就落空了。

欧洲大战一爆发，阿部内阁就发表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暂时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阿部内阁的课题是，维持同英美的协调，同时解决处于僵局状态的日中战争。政府在9月13日发表的基本政纲表明了"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的方针，这是企图改变平沼内阁的对德依存外交。满洲事变以后，曾屡次叫嚷"自主外交"，但当时所谓的"自主立场"，意味着摆脱对英美的协调外交。现在再次出现的"自主立场"，却意味着摆脱对德国的依附，而对英美保持协调。这就反映了失去主体性和方向性的日本外交的现实状况。

428

外相最初由首相兼任，9月25日，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任专职外相。这是由于野村吉三郎属于海军内部的稳健派，在美国政界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指望他来改善对美关系。野村外交面临的课题是，从处理(中国)事变和日本经济问题的必要性出发，改善对英美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同已通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美国之间的关系。该条约定于1940年1月26日失效，可以预料，一旦失效，即将限制对日输出，并进而发展为全面禁止对日输出。如此则不仅给战争的进行带来障碍，而且对日本经济存亡本身也将是个威胁。于是，从11月4日起，开始了野村、格鲁会谈。野村以尊重美国在华权利和开放长江下游(解除禁止各国船只通航的措施)为条件，提议缔结新通商条约；对此，美国主张应把在中国"通商上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作为新通商条约的基础。只要日本不根本改变对华政策，就不可能缔结新的通商条约。这样，日美交涉于12月22日停止，野村外交遭到挫折。次年(1940年)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失效，此后，进入了日美无条约时代。

在调整对美邦交方面遭到失败的阿部内阁，在设置贸易省的问题上也显示出其政治力量的局限。随着世界危机的爆发，集团经济的倾向增强，通商贸易困难，为了对付这种状况，财界提出了

贸易行政一元化的要求，陆军从确立总体战态势的角度出发，对此也表示支持。及至美国通告废除通商条约，设置贸易省的要求就更加强烈。10月3日内阁会议通过了企画院所制定的设置贸易省要纲。但是，外务省从外交一元化的观点出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这是由于设置兴亚院等等，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被夺去，唯恐设置贸易省将进一步削弱其权限。外务省高级官员几乎全部都提出了辞呈。面对外务省这样强烈反对，政府遂放弃设置贸易省的打算。内阁会议上已经决定的方针，由于事务部门官僚的反对而撤回，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内阁统制力量的薄弱。这样，无论在外交方面或内政方面都显露出软弱无能的阿部内阁，仅仅执政四个多月，就不得不辞职。

二　欧洲战局的展开和武力南进论的抬头

1940年1月16日，继阿部内阁之后，成立米内光政内阁。曾担任过三次外相的有田八郎被选任为外相。有田外交的任务是，在与建设东亚新秩序不相抵触的限度内，谋求调整同英美的邦交，这是他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制定的路线，也是从野村外交继承下来的外交方针。但是，东亚新秩序，其前提就是要同维持华盛顿体系的英美两国决裂，所以，建设东亚新秩序同对英美协调终究是难以并存的。

429　有田外交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确保荷属东印度资源问题。在同重要物资输入国——美国调整邦交上遭到失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又已失效，在这种时期，确保荷属东印度的资源，无论对进行日中战争，还是对确立经济自立体制，就都是紧急的、必须解决的课题。第二次大战一爆发，阿部前内阁就已担心，一旦德国入侵荷兰，英美两国恐将对荷属东印度实行保护占领，为了对此采取预防措施，已经和荷兰政府开始谈判。有田八郎就任外相后，立即通

过驻荷兰大使石射猪太郎，向荷兰政府提出保护荷属东印度的要求，但遭荷兰拒绝。①

在持续着"奇怪的战争"的欧洲，至1940年4月初，才开始逐渐显出新的进展。德军突然侵入丹麦和挪威；5月，进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包围了比利时边境上的三十五万英法联军。六月初，英法军只好在海、空军掩护下，从敦刻尔克②撤退到英国本土。接着，德军把矛头转向法国，于6月14日占领了巴黎。

在这种形势下，5月20日，有田外相向荷兰政府提出了锡、橡胶和石油等十三种重要物资及其数量，要求保证对日输出。③在当地进行交涉的石射大使在给外务省的电报中说，政府的这种做法"大有在临终者床边讨债之感"。④

一方面，由于被德军闪电战的辉煌战果搞得眼花缭乱，曾经一度消声匿迹的三国同盟论重又抬头。这是因为看到荷兰和法国已投降，英国也如风前残烛，便企图乘机同德、意结盟，一举解决日中战争，进而强力推行南进政策。而在内政方面，各派政治势力看到近卫文麿于6月24日声明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倡导新体制运动，便各自怀着自己的意图跃跃欲试。陆军期望模仿纳粹，建立一国一党制，在国内加强法西斯体制，同时与德、意合作，策动侵略南方，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正是以陆军为核心的革新派的设想。

另一方面，日中战争的解决仍然不见端倪，数达八十五万的日本军队被拖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泥沼般的长期消耗战中。如前所述，武汉、广州战役以后，陆军采取了"持久战略"的态势，图谋依靠

---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6卷，第72—74页。

② 敦刻尔克：法国第三大港，在北部边境，紧邻比利时。这次溃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被称为"敦刻尔克大溃退"。——译者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27页。

④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太平出版社，1972年，第303页。

策略和阴谋手法来结束战争，同时确立了强化对苏战备的计划。1939年9月，创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也是为了统一对中国的战略和策略，有效地实现上述目的。同年12月，陆军还决定充实军备的修正计划，把当时已膨胀到八十五万人的在华兵力削减到五十万，企图腾出预算和资财来充实对苏战备。[①]这样，1940年3月，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首脑会议便决定了主动撤兵的方针。这就是：如果在1940年内不能解决"中国事变"，则从1941年初开始，逐步从中国撤兵，到1943年，把兵力压缩到上海三角地带及华北蒙疆地区。[②]这等于是自认武装侵略遭到失败。然而，主动撤兵的打算此时已行不通了。因为，从上年冬至1940年春，中国军队已从防御转入了大规模的进攻。即便撤兵，也必须先给中国军队以打击，挫败其反攻意图，不然连确保占领地区也靠不住了。因此，中国派遣军一反陆军中央的方针，要求实行进攻作战，并增强兵力。后来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畑俊六在日志中写道："即就为把政策与战略紧密联系起来处理中国事变而言，此时在中国也有采取积极行动之必要"[③]，中国派遣军的这种逻辑，军部也不得不同意。这样，当年4月决定增加二个师团并扩大战线。充实军备的修正计划刚制订四个月，就不得不重新修改。日军已陷入欲退不能的地步。

关键的"策略攻势"的进展情况也不佳。3月30日，与陆军决定主动撤兵的同时，在南京，以汪兆铭为代理主席的"国民政府"举行了还都仪式。除主席之外，空出几个重要职位，用来引诱国民政府要人叛变，但到头来它仍然不过是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等傀儡政权的合流，远未达到分裂蒋政权并使之屈服的预期目的。汪兆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627页。

② 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社，1952年，第13页。

③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629页。

铭逃出重庆不久，陆军已意识到对汪"工作"的局限性，便通过据称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这个人进行和平工作。后来尽管判明宋子良这个人是假的，怀疑这是重庆方面为了阻碍汪政权的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谋略，但急于结束日中战争的陆军仍继续致力于这种枉费心机的工作。9月下旬，借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之机才停止了谈判。这样，不仅陆军，整个日本统治集团所指望的和平"工作"，被中国方面的谋略愚弄达半年之久，终归完全失败。

这样，对华政策在政策和战略上都一筹莫展，直到开战的第四年仍毫无解决的指望。在当年2月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议会上，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说："无视现实，徒以圣战之美名为掩饰，罔顾国民之牺牲"，批判政府对华政策之无谋和缺乏责任感，尖锐地抨击了"缺乏国民支持"的官僚政治和官僚外交的缺陷。① 作为政党人士，这种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议会和政党已经失去了把这种理所当然的批判反映到国家政治中去的机能和气魄了。

正当日中战争完全陷入僵局之时，在欧洲战线上，德国展开闪电战，战果辉煌，立即使陆军心向往之。不惜主动撤兵而"朝思暮想的大本营"也"另打起主意来，生怕误了一班车"，"整天盘算缩减在华兵力"的陆军省军事科也对强行南进论着了迷。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六科（负责有关英、美、法、意事务），新设了南方班，有关作战和情报人员陆续被派到南方去进行视察旅行。②

431

三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对米内内阁的性格——维持现状心怀不满的陆军，利用1940年7月16日畑（俊六）陆相的单独辞职策划倒阁。结果近卫文麿再次组阁。前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就任外相。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的

① 《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36页。

② 种村佐孝：前引书，第14—16页。

任务是要"应付世界形势之骤变",在内外政策上实行一大改变,一举解决日中战争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矛盾。7月26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以下述内容为根本方针的《基本国策要纲》,即"建设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在国内确立"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第二天(27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适应世界形势发展而处理时局的要纲》中更具体地阐明了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方针政策。这就是南进政策和"强化与德、意的政治联合"。关于南进政策,列举了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当时归日本委任统治的内南洋和东北部的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及法属岛屿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决定了武力南进政策,即如果日中战争结束自不待言,即使未结束,"若内外形势发展至特别有利地步,则行使武力以解决南方问题"。天皇透露感想说:"近卫首相似乎打算把因中国事变失败造成的国民不满情绪转移到南方去……。"① 中国派遣军的一个参谋指出:"如今东京已无人注视中国事变,都被世界形势闹花了眼,努力的目标分散开了",并慨叹道:"对国力的准确估计,以及对战争目的限度的坚持业已置之不顾,包藏祸根的新外交政策已经海阔天空地推行开来"。② 自己点火并扩大的战争,自己无法收拾,却指望依靠别国的军事成功来进一步扩大侵略,这种乘火打劫、凭借外力的态度,清楚地显露出法西斯时期日本外交的特征。

《基本国策要纲》明确阐述了对外政策的根本观念,即"皇国之国策,乃基于八纮一宇之建国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1938年11月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中曾部分显露的皇道主义思想体系,这次和盘托了出来;它标志着日本已最终走上"皇道外交"这种

①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812页。

② 堀场一雄,前引书,第459页。

日本特殊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外交。而且，以这种“皇道外交”的观念为基础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种野心勃勃的设想产生出来 432 了，其范围远远超过第一届近卫内阁时的“东亚新秩序”的设想，包括了东亚全区，进而包括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区。

而且，这个要纲避而不用以往外交文件中所使用的“帝国”一词，改用“皇国”一词，这一点也是划时代的。这是因为，“皇道外交”的目的，原则上是要把亚洲各民族从欧美帝国主义的旧秩序统治下解放出来，建设保障亚洲永久和平和繁荣的新秩序，所以忌讳那个会使人联想到旧秩序的“帝国”一词；是为了用大亚细亚主义这一普遍观念来掩饰“皇道外交”的妄自尊大。不过，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并非孙文所说的大亚洲主义，即“以王道为基础……，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①；它只不过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来取代西欧帝国主义，以新的“不平等”来取代旧的“不平等”而已。同时，它与1938年至1939年出现的各种东亚新秩序论，即以“王道主义”和“五族协和”为核心的“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也是不同的。在这些东亚新秩序论中，还可以看到对日本的妄自尊大至少还有些自我抑制，试图制止正在侵略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并努力探索新的亚洲联合的原理。但在充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体系的工具而登场的大亚细亚主义中，则完全看不到这种思想上的联系；地区规模越扩大，其思想内容反而越贫乏。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体验中，已经吃透了日本本位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中国人，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现在的日本版的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以侵华战争为开端，进而征服亚洲和控制整个亚洲经济的垄断主义”，而且，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目的在于“首先炮制满洲国，接着再相继炮制华北国、华中国、华南国、华西国、印度国、澳

---

① 黄季陆主编：《总理全集》，演讲，戊第80页。——译者

大利亚国和西伯利亚国，把这些国家作为日本这个东亚大帝国的行省。"①

四 日、德、意三国同盟

"大东亚共荣圈"不可缺少的前提，是日、德、意三国同盟。近卫组阁之先，在与陆、海、外三相预定人选举行的荻洼②会谈中，确定《适应世界形势发展而处理时局之要纲》，其基本方针是"适应世界形势之骤变，迅速建设东亚新秩序，谋求加强日德意轴心"，并经7月27日的大本营一政府联席会议作出正式决议。这样，缔结三国同盟便成了松冈外交所面临的课题。松冈看到外务省的人员在米内内阁末期制定的加强合作方案，表示不满，据说只批了一句他惯用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原件退回了。③他认为要想靠加强同德意的合作来解决日中战争和实行南进政策，这种不冷不热的合作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同德国结成生死与共的坚强联盟。自从1938年7月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五相会议决定加强防共协定的方针以来，外务省首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尽量不刺激英、美、法等国，保留与这些国家协调的途径，同时牵制苏联，以利于解决日中战争。同外务省主流派的这种传统想法相比，松冈外交的想法在本质上是很不相同的。

433

松冈出身职业外交官，却脱离外务省而加入了政友会。他曾批判币原外交是"屈让保守的外交"，充当退出国际联盟的主要角色。后来又脱离了政友会，在取消政党运动中显露头角，并叫嚷断然实行"昭和维新"等等，作为一个出身于外交官的人，其经历与众

---

① 江公怀：《日本人的亚细亚论》，收入玉嶋信义编：《中国之眼》，弘文堂，1959年，第44—45页。

② 荻洼：地名，在东京市，近卫文麿住宅所在地。——译者

③ 栗原健：《天皇一昭和史备忘录》，原书房，1970年，第145页。

颇有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松冈负责法西斯时期的日本外交是最适合的人物。

外务省7月16日的方案，其目标是："在不参战范围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合作"。松冈批评这个方案是温吞水不解渴，在7月30日制订了新的合作方案。① 该案规定："如德意方面要求军事援助以对付英国，帝国将在原则上表示同意"，毫无遮掩地以军事同盟为目标。

另一方面，德国自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以来，已不再急于缔结德日同盟，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此时又开始重新表示关心。这是因为，1940年4月以后的闪电战已发展到要向英国本土进行登陆作战的阶段，处于僵持状态。而且，美国加强了对英援助，对德参战的可能性也增大了。因此，作为德国，就有必要借助与日本结盟来牵制美国，阻止其参战。

9月7日，斯塔玛（Stahmer, H.）特使来日，终于开始了结盟的会谈。德国方面的意图大致如下②：关于对英战争，德国不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德国所要求的是，日本用一切办法来牵制美国，扮演阻止美国参战的角色。德国则承认日本是东亚的政治领导者。而且，德国准备在缔结三国同盟以后，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的中间人"。以上是德国方面关于结盟的意见，大体上是松冈外相可以同意的。对于日中战争尚未解决、却必须挑起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新任务的日本来说，在各种意义上都指望三国同盟会提供有利的条件。对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德、意方面的胜利和南洋地区各宗主国——英、法、荷的彻底失败乃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为此之故，也必须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而且，日本一旦推进南进政策，就必然要有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精神准备。而三国同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第346—349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52—453页。

盟则有可能牵制美国使之对日实行绥靖政策，并停止援助蒋介石。倘若如此，日中战争也许不难解决。对松冈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德国承担了使日苏接近的仲介之劳。因为如果日苏关系得到改善，北方无后顾之忧，日本就能放下心来倾注全力侵略南方，这样，日德双方意见一致，谈判顺利进行。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434

这个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互相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权"，是一个"打破现状势力"（即法西斯势力）重新瓜分世界的协定。三国约定："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①]，是一个军事同盟。这样，亚洲的侵略战争和欧洲的侵略战争就以三国同盟为媒介结成一体，朝着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发展起来。当时在野的币原喜重郎批判说："图谋依靠德意来增加我国的利益"是"抛弃了自主自力主义"，"它与依靠美英论一样，其前提过于独断专行，未免是轻举妄动"。[②] 但是，在签订条约的同日，天皇发布诏书，封锁了一切批评。松冈说："一旦签订此同盟，则今后我国外交以此同盟为轴心之运用，将恰如往年之日英同盟"[③]。日本的外交路线再次作出重大的转变。

五　新体制运动

在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定为外交基本方针的同时，《基本国策要纲》又把完成"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定为内政的根本目标。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第二天，即28日晚，近卫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大讲"世界历史的大转变时期"缔结三国同盟的意义，

---

① 见《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279页。——译者

② 《币原喜重郎》，第513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79页。

同时呼吁确立适应这种重大时局的“万民翼赞的举国新体制”。这样，重新建立国内政治体制就成为近卫内阁的第二个课题。

早在1940年6月，近卫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后，就倡导新体制运动，其目的是要借助这样一种政府，即“取得与原有政党不同的、扎根于全国民众之中的国民组织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力量之支持的政府”来抑制军部，以克服双重外交以至双重政府现象。① 不过，近卫的新体制设想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首先，说是以国民为基础，但近卫本身就是五摄家② 之首，即使在宫廷贵族中也是门第显赫的近卫家族的户主，因而距离国民大众不啻十万八千里。而且，要建立能够抑制军部的强有力的国民组织，就必须扶植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国民运动。而承认这种运动，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否定以天皇为首的等级统治秩序。一方面残酷压迫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另一方面又想搞扎根于国民运动中的国民组织，这就是个大矛盾。新体制运动本来的目标是打算树立举国一致的强有力的新党，但是，由于原有政党的相继解散而出现了无党时期，和由于下达敕令命近卫组阁，这种新党设想就流产了。③ 近卫放弃新党设想而改取翼赞会方式的最重要原因，是所谓“幕府式的存在”这种非难。在无党的情况下，如果建立新党，就必然成为一国一党，而这是违反一君万民的国体原则的。这样，新体制运动就不能不在天皇制这堵大墙前面遭到挫折。

435

1940年10月12日建立的大政翼赞会，是这种新体制运动的终局，但它与近卫当初的设想已相距万里。近卫在成立会上说：“本运动的纲领总的来说就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可以说，

① 近卫文麿，前引书，第25页。

② 五摄家：指近卫、鹰司、九条、二条、一条等五家可以充任摄政或关白的贵族，确立于镰仓时代，至1884年（明治十七年），根据《华族令》改为公爵。——译者

③ 风见章，前引书，第221—222页。

除此以外，没有纲领或宣言。”正如近卫传记的作者所说：“实际上，新体制诞生之日即其寿终之时。”① 可是，这种“已经死亡的新体制”，仍然受到了顽强的攻击。攻击主要来自观念右翼②，官僚、特别是内务官僚，垄断资本，及原有政党人士等四种势力，其论据是所谓翼赞会“违反宪法”，“是赤色的”。在这种攻击下，近卫对大政翼赞会进行了改组。由此，翼赞会在人事、机构以至财政方面都显著削弱，完全成了行政辅助机关。近卫曾侈谈：“发扬政治理想和政治意识”，“把国民的总力集结到政治上来”③，但这类事是根本无法指望的。不仅如此，新体制运动最大的目标，即抑制军部，实现国务和统帅的一元化，也失败了。

这样，对总体战不可缺少的要求，即“发挥国民的自发的总力”④ 和国务与统帅的一元化，同维护天皇制秩序的要求发生矛盾，一下子就挫折了。于是，近卫一面推行新体制运动，同时打算由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或设置最高国防会议来统一政策和战略，并向陆军提出了这一要求，但陆军对这两个方案都拒绝了，而代之以恢复 1938 年 1 月以来一直未召开过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可是，这不但无助于调整国务和统帅的关系，反倒成了使国务从属于统帅的机关。新体制运动的希望既已落空，此后就再也没有控制军部独断专行的办法了。于是，国务与统帅之间的矛盾，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危机的深化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展开。

然而，靠天皇制的官僚机构来完成了对国民的一元化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体制运动几乎完全达到了它的目的。这就是，新

① 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下，弘文堂，1952 年，第 201 页。

② 战前日本右翼团体分为观念右翼与革新右翼两派。观念右翼，即日本主义派，如“赤化防止团”、“黑龙会”等；革新右翼，即国家社会主义派，如“犹存社”、“神武会”等。——译者

③ 矢部贞治：《近卫文麿》，下，弘文堂，1952 年，第 142 页。

④ 同上。

体制运动解散了所有独立的政治结社——政党，与此同时，以首相为总裁、以地方长官为地方支部长的大政翼赞会，由内务官僚组成的町内会和部落会，还有作为翼赞会外围团体的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和农业报国联盟等组织都出现了，无论在地区上或在行业上，日本国民都被编进官僚统治的罗网之中。 436

作为“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的一环，《基本国策要纲》还规定了“官场新态势”，并于1941年1月修订了《文官任用令》和《文官分限令》①，制定了《敕任文官铨衡委员会令》。其中与外交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把高等文官考试的行政科和外交科合并为划一的行政科。外交官和一般行政官无须加以区别了，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外交路线的改变。这样，1893年制定的对外交官、领事官的考试制度（后来一直以此培养推行现代的合理外交的人才），实际上也废除了。而且，1940年12月6日，近卫内阁还设置了统制思想和言论的机关——情报局，外务省情报部也被并了进去。这样，外务省就更加失去了其独特性和独立性。

六 武力南进

日本统治集团看到德军攻势使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认为这是打开对外政策僵局的最好机会。第一，这将完全切断援蒋道路，可使日中战争得以结束；第二，西欧列强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减弱，可以乘机入侵东南亚，建立自给体制。

1940年6月，日本政府要求法国和英国停止输送援蒋物资。对此，法国的维希政府②答应全面封锁法属印度支那运输线并同意

① 文官任用令：有关一般文官任用资格的法令。文官分限令：有关一般文官身分待遇的法令。——译者

② 维希政府：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的傀儡政权，于7月2日迁都维希。——译者

（日本）派遣监视团；至7月，英国答复将封锁缅甸运输线三个月。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派遣了以西原一策少将为团长的监视团，但西原一策除接受监视任务以外，还从参谋本部接受了这样的指示：说服法属印度支那方面，使之答应向日军提供补给，允许军队通行和使用机场等等。这是在7月27日的《处理时局要纲》中正式决定的，而正式决定武力南进之前，陆军已把"南中国方面军"从中国派遣军中划出，拨归直属于大本营，以"适应形势变化，对第三国进行战备"，亦即对英、法准备作战。①

西原遵照参谋本部的意见，开始了交涉，但印度支那总督却不肯答应。现地交涉陷于僵局，于是，陆、海、外三相协议结果，决定改变由中央一级进行谈判。从8月1日开始，松冈外相和驻日法国大使阿尔塞纳·安里（Arsène-Henry, Charles）进行交涉。在谈判中，日本方面除要求缔结政治军事协定之外，还迫使缔结经济协定，要求对"有关通商及企业等事项，给予与法国、法国人和法国物资同等的待遇"②。法国方面起初不肯同意，后来以日本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宗主权为条件，决定接受日本的要求。8月30日，松冈和亨利相互换文。有关细则则委交当地交涉。437 日本方面的代表，除西原之外，还有参谋本部的第一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富永恭次是强硬派的中心人物，所以他以交涉拖延为借口，擅自指令南中国方面军准备攻占印度支那北部，对如何设法行使武力进行了种种策划。因此，在煞费苦心的细则协定即将签字之时，由于9月6日一部分军队擅自越境，弄得只好再从头重新作起。

但是，日本政府却把越境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之于法国方面的拖延，决定以9月22日零时为限，不管协定签订与否，也要进驻，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79—80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6卷，第204页。

如果法军进行抵抗，就行使武力，坚决达到目的。后来，西原和法国驻军司令官马丁（Martin）之间达成了协议，武装进驻的条件不复存在。可是，在印度支那边境待命的日本部队，却无视中央的指令和西原少将的要求，强行武装进驻，结果，日法两军于9月23日开始了战斗。据说，当地军队的这种擅自行动系富永恭次和南中国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等强硬派策划的。他们所以坚持武装进驻，是因为生怕一实行和平进驻，就会以外交和财政的理由对兵员数目施加限制。由于印度支那军的投降，战事于9月25日结束。日本的强硬干法使美国和英国更加警惕。9月26日，美国宣布禁止出口废钢铁。10月18日，英国重新开放缅甸公路，开始输送援蒋物资。

由于英美，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攻势，"摆脱依附英美的态势，确立自给的态势"成了紧急课题。① 特别是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宝库——荷属东印度，作为"大东亚经济圈的一环"是必须确保的地区。8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不仅要密切帝国和荷印的经济关系，而且还要确立我国在荷印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的交涉方针②，并任命商工大臣小林一三为驻荷印特派大使。9月13日，日荷（印）会谈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译者）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在美国强硬对日政策支持下，不肯屈服于日本的要求，交涉迟迟不得进展。10月20日，政府召回了小林代表。以后，政府任命原外相芳泽谦吉为驻荷印特派大使，于1941年1月重新开始交涉，但2月6日，芳泽代表即不得不向外务省报告说："我认为不依靠武力终不可能使荷印成为东亚共荣圈之一员"③。此后仍继续进行了交涉，到6月17

① 《资料编》，第324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40页。

③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第222页。

日终于停止。

在1940年9月以来的对荷印交涉中，虽然也曾达成有关二百万吨石油及某些物资的协议，但日本所期待的重要物资却几乎全未能确保。另一方面，美国对日禁运措施日益加强，并联合英国支持荷兰，对日荷交涉中的日本施加压力。这就使松冈外相痛感："如不触及对英美之关系，则从根本上打开对荷印关系毕竟几乎是不可能的。"[①]

早在1936年至1937年间即已展开反法西斯运动的东南亚各民族，当日本一开始公然发动武装南进时，就一致展开反抗斗争。1940年9月，在印度支那，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武装游击队，袭击了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兵营。在印度尼西亚，1941年8月，"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揭露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法西斯本质"，呼吁人民对日本提高警惕。[②]

在此期间，通过宋子文对重庆进行活动失败以后，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日华基本条约草案》和《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日华基本条约》是与汪政权之间缔结的条约，它意味着对汪政权的正式承认。政府的目的在于，可能的话，使重庆政权"屈服合流，组成新的中央政府，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新中国的新中央政府。"[③] 因此，决定把（对汪政权的）正式承认推迟到11月末，在此期间对重庆进行工作。松冈外相寄希望于浙江财阀钱永铭（交通银行总经理）这条线，但重庆特使带来的中国方面的前提条件是，明确约定日方在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军并停止承认汪政权。这是日本方面不能同意的，所以松冈外相断定，钱永铭"工作"也和宋子良"工作"一样，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谋略，决定结束此项活动。于是，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6卷，第97页。

② 谷川，前引书，第122、292页。

③ 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上，原书房，1967年，第146页。

11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和汪精卫（伪）行政院长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了汪政权。承认这个"几乎毫不具有新中央政府实力"的汪政权，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日本的坚决态度，给重庆的动摇分子多少施加点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使新中央政府对帝国紧急强化总体战所必须的各项施策一心一意地进行合作，以讲求用兵养兵（用军事力量储备更大的军事力量）之策"。[①] 这种企图已写在和基本条约同时缔结的冗长的附属秘密协约、协定和换文之中，一言以蔽之，是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然而，由于正式承认了汪精卫傀儡政权，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对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僵化了。

第二节　日苏中立条约和日美谈判

七　日苏中立条约

1940年7月27日决定的《处理时局要纲》规定"加强与德意的政治团结"，同时"谋求大踏步调整对苏邦交"。三国同盟缔结后，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外交课题就是把后者付诸实现。

早在1939年11月，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就曾向阿部信行内阁的野村吉三郎外相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东乡的意图在于以此削弱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寻求解决日中战争的线索；同时，以此向美国施加压力，以利于调整日美邦交工作的展开。[②] 陆军内部，在诺门坎吃了败仗以后，对苏强硬论也销声匿迹，"北守南进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参谋本部，从切断援蒋的西北通路、以导致解决日中战争这种战略观点出发，主张缔结日苏互不

① 《杉山笔记》，上，第145、150页。

② 东乡茂德：《时代的一面》，改造社，1952年，第132页。

侵犯条约的论调正在抬头。而且，以驻意大使白鸟敏夫为中心，外务省的革新派和革新右翼所倡导的亲苏外交论也盛行起来。这种亲苏外交论所设想的是，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相呼应，日本也应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此为基础结成与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相抗衡的日、德、意、苏四国协约，以图对抗英美维持现状的势力，建立世界新秩序；这种设想很快就同松冈外相所推进的大设想沆瀣一气了。① 对于这种设想，野村外相和其后米内内阁的有田八郎外相都因其将使（日本）同英美的关系更加恶化，曾表示反对。因此，陆、海、外三省的事务当局协商的结果，采纳了在政治上靠拢程度比"互不侵犯条约"更轻微的妥协方案，制定了"中立条约案"，取得了外务省首脑的同意。这样，政府于 1940 年 7 月，通过东乡大使向苏联提出了中立条约的方案，但未及苏联答复，米内内阁就倒台了，这个问题就移交给继任的第二届近卫内阁了。

8 月，接到了苏联的答复。其要点有三。第一，取消北库页岛石油和煤炭的利权；第二，缔结条约，保证不参加敌对同盟及不进行侵略；第三，通过中立条约，日本将可以向南方积极扩张，从而获得极大利益，而苏联却要承担同中国和在太平洋拥有重大利害的国家之间关系恶化的危险，要求日本政府对此点予以说明。对于日本所希望的停止援助重庆政府问题，则避而不答。东乡大使的意见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即使向苏联让步，取消北库页岛的利权，也应缔结中立条约；但松冈外相却决心在新的设想下就对苏邦交的调整问题进行谈判，便召回东乡大使，停止了中立条约的谈判。②

所谓松冈的新设想是，先缔结三国同盟，然后通过德国的斡旋订立日、德、意、苏四国协约，以四国协约为压力，迫使美国退出亚洲，以解决日中战争，并使日本的南进政策顺利展开。松冈的这种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 5 卷，第 237—238 页。

② 同上，第 251—261 页。

设想，与后藤新平曾经提倡过的“新旧大陆对峙论”颇有类似之处，由此可见，他肯定受到曾师事过的后藤的影响。①

于是，首先“以将来把苏联拉入同盟为前提”，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② 10月3日，作为“三国同盟订立后的外交追击战”的进度计划，外务省制定了《调整日苏邦交要纲草案》，这是松冈大设想的具体化。③ 其内容是：向苏联作若干让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使苏联承认内蒙、华北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日本则以承认外蒙、新疆和中近东方面为苏联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而且，为使苏联一道参加建设世界新秩序，缔结日、德、意、苏四国同盟。10月30日，新任驻苏大使建川美次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Molotov, V. M.)，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然而，莫洛托夫却回答说：作为苏联来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不同时收复失地，也就是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南库页岛如果不能收复，就不能考虑，所以希望就“中立条约”进行会谈。但前提条件是取消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石油和煤炭利权。松冈外相接到莫洛托夫答复后，认为不能考虑取消北库页岛利权，反而训令建川大使，要他向苏方提议收买北库页岛。结果，遭到莫洛托夫的拒绝，日苏交涉停顿了。 440

可是，在三国同盟谈判的过程中，松冈曾得到斯塔玛特使的允诺，所以当日苏交涉时，便指望德国出面斡旋。然而，德国在缔结三国同盟前不久的7月，就已决定对苏发动进攻，因此，德国的斡旋已几乎无望。同年11月，莫洛托夫和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在柏林举行会议，当时，里宾特罗甫曾提出调整日苏邦交问题和四国协约的提案，但在芬兰问题和巴尔干等问题上，两国意见对立，

① 三轮忠公：《松冈洋右》，中央公论社，1971年，第166—167页。

② 近卫文麿：《向和平的努力》，日本电报通讯社，1946年，第23页。

③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第265—267页。

德苏会谈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德国放弃了四国协约的设想，最后决心进攻苏联。12月8日，希特勒发布巴巴罗萨①作战令，指令在第二年即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

这样，德国的斡旋已不能指望，而为了推行南进政策，北方的安定却成了刻不容缓的课题。因此，松冈决心亲自出国进行交涉。1941年3月，他踏上了访欧的旅途。他首先途经莫斯科，接着访问了德国和意大利，4月，再度访问莫斯科，进行正式的日苏会谈。谈判的焦点是北库页岛利权问题，结果，以"应在数月内努力解决"此问题而达成协议，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

日苏中立条约共有四条，内容是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和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结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他方保持中立等等。在附属文件中还互相约定，日本保全和不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苏联保全和不侵犯满洲帝国的领土。

这样，多年以来成为悬案的日苏邦交调整，几经周折终于实现

441 了。但当初那种把三国同盟扩大为四国协约的设想则完全破产。不仅如此，在枢密院审查时，发生了《日苏中立条约》与《三国同盟条约》矛盾的问题。顾问官南弘曾质问道："按照日、德、意同盟条约，德、苏发生军事行动时，日本必须支援德国。而按照这个(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在德苏交战时则应保持中立，这里没有矛盾吗？"对于这种质问，松冈外相回答说"在法理上是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由日德进行协议，但日本将以自主的立场作出决定"。②松冈在这次审查委员会的答辩中还说，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③。反之，美国则断定，这是以日苏接

① 巴巴罗萨计划(Barbarossa Plan)：希特勒侵苏作战计划的代号。——译者

② 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第150页。

③ 同上，第151页。

近来加强日本的南进政策，从而对日本更加警惕，使后来的日美交涉更加困难。批评松冈外交是"不循常轨，形同儿戏"的币原喜重郎听到缔结《日苏中立条约》的消息后说："搞外交并非耍杂技"，批判这个条约使日本处境愈加困难。[1]

八　德苏开战与日本的对策

1941年6月22日，早有预谋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付诸实施，三百万德军一齐侵入苏联领土。由于德苏开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在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外更增添了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战的性质。正是如此，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Churchill, W.S.）发表广播演说，称苏联为盟国，并提出要援助苏联。美国也于8月2日开始对苏经济援助。

德苏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意味着日本对世界的设想彻底破产，迫使它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对外政策。因为，"三国同盟是以日、德、苏三国合作为前提而缔结的"，而"由于德苏开战，这一前提消灭，苏联加入了英美阵营，我国便面临必须以美苏两国为敌的最险恶的事态"[2]。

德苏要开战的情报在四、五月份就已经传到了日本，但直到6月5日才从驻德大使大岛浩那里得到了"德苏开战现已必不可免"的确切情报[3]，政府和军部这才慌忙地研究起日本的对策。陆军内部议论纷纭，有主张与德国呼应乘机进攻苏联的"即刻北进论"，也有主张乘德苏开战之机而南进，确立自给自足态势的"即刻南进论"等等。但结果则归结为作好南北两面战略准备，俾能适应形势，恰当使用武力的机会主义的妥协论，制订了称为《适应形势发

---

① 《币原喜重郎》，第517页。

② 《向和平的努力》，第30页。

③ 《资料编》，第426页。

展的国防国策》的陆军提案。另一方面，海军也立足于传统的北守南进主义，决定了《对德苏新事态的措施》。德苏开战第二天，陆海军当局调整意见，结果原则上按照陆军提案制定了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要纲》的陆海军提案。6月25日起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恳谈会，首先决定批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关于促进南方施策》，接着研究了适应德苏开战的国策基本方针。会上对军部提案始终表示反对的是松冈外相。松冈于22日得知德苏开战的消息后，立即上奏天皇，建议对苏开战，仿佛竟把前不久他亲手缔结的《日苏中立条约》忘得一干二净，在联席恳谈会上也主张应当暂时停止南进政策，发动对苏战争。尽管松冈反对，28日的联席恳谈会还是通过了《帝国国策要纲》。但到了30日，德国正式要求日本参战，在当日召开的联席恳谈会上，松冈又反复主张对苏开战。德国的参战要求，暴露了三国同盟与《日苏中立条约》的矛盾，但是，满脑子卑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①的松冈，竟连这个矛盾也看不见，说什么"英雄善于回头，我辈前曾讲过南进论，但今天却必须立即转向北方。"②尽管松冈顽固地反对，30日的联席恳谈会最终还是通过了避免立即介入德苏战争的提案。7月2日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也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其内容有"加快向南扩张的步伐，并视形势的变化解决北方问题"，"为达此目的，必须排除任何障碍"，亦即为了达到向南方扩张"同英美不辞一战"；而且，如果德苏战争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则"行使武

① 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历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反对意大利的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但他认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谋术数。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后来被法西斯和一切反动派所利用。——译者

② 《资料编》，第460页。

力解决北方问题”。[①] 由此，日本比《基本国策要纲》更进了一步，决定了向南北两面进行武装扩张的方针，实质是为走向“大东亚战争”铺平了道路。

近卫文麿在其手记中写道，德国发动对苏战争是继《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的第二次背叛行为，因此，“当时，日本方面当然就有权利、也有理由重新研究三国同盟问题”，[②] 正是应当根据这种观点重新研究。但日本当局却丝毫不肯从大局着眼，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对外政策，始终囿于向德国一边倒的近视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争论，结果轻率地决定了南北并进论，自己惹起了近卫所担心的与美苏两国为敌的“最险恶事态”。

九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即刻北进论”被驳倒了，但认为“德苏开战确系日本千载难逢之良机”，“应伺机进攻苏联”的想法，在统治集团中却是共同的。[③]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俄国一贯是它的假想敌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所谓“共产主义正在向全世界散播其罪恶种子，总有一天得揍它”这样一个危险的国家[④]，是“企图破坏我国国体的……不共戴天之敌”[⑤]。正因为如此，在《帝国国策要纲》中写道：“秘密进行对苏武装准备”，“如德苏战争向有利于帝国方面发展，就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以确保北面之安定。”根据这个《要纲》规定，在“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的名义下，推行了迅速增强在满洲和朝鲜的日军军备的措施，亦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苏战备。 443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 531—532 页。

② 《向和平的努力》，第 25 页。

③ 《资料编》，第 464—465 页。

④ 同上。

⑤ 《木户幸一日记》，上卷，第 232 页。

关于动员的规模，在陆军部内也有意见分歧。对北进持慎重论的陆军省军务局反对大规模动员，担心由此会立即转入对苏战争；而主张积极对苏作战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则制定了大规模的动员计划，并取得了东条陆相的批准。于是，7月7日，下达了"关特演"动员令，极其秘密地从国内向满洲和朝鲜等地输送了大量的兵员、马匹和武器。据说这是陆军创建以来最大的动员。关东军的总兵力由此倍增，兵员达七十万、马匹达十四万、飞机达六百架。另一方面，在国内和朝鲜的各要塞也采取了战斗态势，建立防卫总司令部，防备以滨海州为基地的苏联轰炸机空袭本土。不过，当时防空态势极为虚弱，连参谋本部第四科（主管要塞、防空）也认为，如果二、三十架飞机轮番轰炸，东京就将化为灰烬，甚至怀疑能否对苏开战。[①] 而参谋本部则不仅制定了"用兵计划"，而且还以田中作战部长为中心制定了战争指挥计划，决定了《对苏战争时满洲国处理要领》，并作了《关于发动武力解决时对占领区行政管理的研究》。

参谋本部决定"以苏联远东总战力减少一半作为发动武装进攻的条件"，8月上、中旬，苏联远东地区的地面部队，因德苏战争向西开拔，特别是飞机和坦克减少到了三分之一，（日本）抓住这个机会，编制了8月下旬开始作战的日程表。不过，苏联红军第四部所属谍报员、以德国新闻特派员名义来日的佐尔格(Sorge, R.)和以近卫的顾问兼评论家尾崎秀实为中心的谍报集团，早就把这个计划报告给了莫斯科。因此，（苏联）远东军并未象日本所希望的那样向西开拔，日本预定对苏进攻的主要地点——东部的乌苏里、北部的阿穆尔地区反而加强了防卫力量。虎视眈眈、企图伺机进攻苏联的参谋本部也逐渐焦急起来，对苏强硬论再次抬头。但

---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340页。

是，此后德苏战争不见进展，年底以前是不能指望苏联屈服了，于是参谋本部于8月9日决定，不管德苏战争进展如何，也要放弃1941年内武装解决北方的想法，而集中力量作好在南方对英美的战争准备。“关特演”本身是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中止武装发动以后仍然使庞大的军队驻扎在满洲，以牵制苏联的后方，则是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的。自此，日本也就自己放弃了日后对苏联抗议的权利；在对英美的战争中，苏军继续驻扎，牵制了日本的后方。 444

此时此地，日苏战争得以避免，这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归趋及其后世界历史的动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苏联能够乘此在莫斯科战线上成功地进行了反击，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势力的胜利。在这个胜利的背后有着佐尔格和尾崎等谍报集团的献身活动。他们为了阻止日苏战争的爆发，把从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和德意志大使馆那里得到的情报通报给苏联。1941年9月14日，他们又把日本停止对苏攻击的情报送往莫斯科。根据这个报告，苏联才得以把一部分远东军转移到莫斯科战线以保卫首都。然而，这是他们送出的最后情报。1941年10月，佐尔格集团相继被捕，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和军机保护法等罪名被起诉。1944年11月，佐尔格和尾崎被处死刑。他们通过谍报活动投入了反战运动和和平运动，以亲身活动显示了战时反战斗争的一种有效方式。

由是，一旦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无望，政府内部就出现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北方问题的动向。7月18日内阁改组，对苏强硬派的松冈外相被解职，丰田贞次郎代之继任外相，就是这种动向的表现。而且，8月4日的联席会议决定了《对苏外交谈判要纲》①。其内容

---

① 《资料编》，第487—488页。

是，向苏联方面明确说明日本决定履行中立条约的义务，以此要求苏联同意停止援蒋；确保北库页岛利权事业的顺利经营；不向第三国割让、出卖苏联领土或提供军事基地等。然而，德苏开战后不久，松冈外相曾对苏联驻日大使斯麦塔宁（Smetanin, Constantin）说过，日苏中立条约一旦与三国同盟发生矛盾，中立条约即行失效，而且日本的“关特演”使苏联产生了严重的对日不信任感。事到如今，又说要遵守中立条约，苏联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光为日本打算的提议。这样，行使武力或外交谈判两种手段都行不通，北方问题终究未得解决。

十　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

根据6月25日决定的《关于促进南方施策》，进驻南部印度支那已是既定方针。这是“以防卫东亚安定为目的而安排的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军事性结合”①，其具体内容是要求使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金边、西贡等八处航空基地和西贡、金兰湾两处港湾设施以及对日本军队的驻扎提供方便，如果不答应，便“行使武力以达我国的目的”。②

这种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是作为《基本国策要纲》的战略核心而设想的。统帅部的战略设想如下：在日本的生命圈的南方各地区，近来英美荷结成对日共同战线的倾向日益增大，南方各国和重庆445政权对英美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加强。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则日本对南方的战略态势将日益不利，对南方各国的“政治威力”将相对削弱，从而日本维持国力所必需的物资将更难获得，对“中国事变”的彻底解决也将更加困难。为了打开这种局面，至为重要的是首先巩固（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整个地区的军事地位，继而控制泰国，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31页。

② 同上，第534页。

以此确保东亚的战略要地。由此或可使英、美、荷死心不再压迫日本，并给重庆政府以打击，以找到解决日中战争的突破口，进而或许有助于打开日荷谈判。所以只有尽快抓住时机实行“战略上先发制人之措施”，才能避免同英美作战，“此即不战而胜之上策”，这就是统帅部下的结论。①但不久便证明了这种判断完全错了。

政府决定暂先通过外交谈判，向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提出要求，若不答应就实行武力进驻，于7月12日电令驻法大使加藤外松，同维希政府谈判，限20日以前取得法国方面的答复。把答复期限限制在20日，是因为军队已以20日为期作好出发的准备，所以，要求在军队开始进驻之前取得法国方面对各项要求的同意，以避免武装进驻。②另一方面，陆军解散了进驻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印度支那派遣军，重新编成了直属大本营的第二十五军（司令是饭田祥二郎中将）作了进驻的准备。与此同时，又把一度从中国派遣军中独立出来的华南派遣军降格，重新划归中国派遣军隶属。③军队编制的重心也向南方转移了。

7月14日，加藤大使奉命与维希政府开始谈判，另一方面大本营陆军部于19日向第二十五军发出了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命令。维希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23日，双方就有关进驻的当地细则达成协议。这样，日军从7月28日开始进驻，于29日签订了关于共同防卫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法议定书》及有关军事协定的换文。

日法谈判所以越过法国驻日大使而直接同维希政府进行，其理由是因为日本政府十分怀疑安里大使是戴高乐派，唯恐谈判的内容被他完全泄露给美英方面，从而刺激美英。不过，当时美国已

① 《资料编》，第448—451页。

② 同上，第532—533页。

③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331页。

经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日本方面的慎重考虑也就无济于事了。美国获知（日本）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计划后警告说，这将成为日美谈判的严重障碍。罗斯福总统于7月24日暗示野村(吉三郎)将禁止对日输出石油，同时劝告日本停止进驻，并提出使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的提案。而当日本果真强行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时，罗斯福就于7月26日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446 英国和荷印当局也如法炮制。英国并于同日通告废除《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印通商条约》和《日本缅甸通商条约》。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7月28日，荷兰又公布停止《日荷石油协定》，美国也于8月1日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

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会引起英美方面的一系列的报复措施，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近卫曾认为，为了使日美谈判得以继续，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可能的话，还是停下来好。"松冈外相也说"如果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石油、橡胶、锡和大米等就难以弄到了"，主张北进论。① 然而，陆海军却一致认为"荷印姑且不论，若是法属印度支那决不会有多大障碍"，在这种主张压迫下，近卫终于同意了强行进驻。② 军部自不待言，就是近卫也万没料到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抗措施。特别是美国的全面禁止输出石油，对日本是个沉重的打击。7月31日，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晋谒天皇，陈述意见说："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与其这样，莫如马上动手，除此别无他途。"③ 面对全面禁输石油，在对美战争问题上从来一向持慎重态度的海军部内，也认为与其坐待石油"愈来愈少"，莫如先发制人，

① 矢部贞治，前引书，第308页。《资料编》，第460页。

② 有田八郎：《人家称我笨老八》，光和堂，1959年，第155页。

③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895页。

首先开战，这样强硬论抬头了。

十一　日美会谈

随着日本对大陆的侵略，由满洲事变扩大到日中战争，日美对立日益尖锐起来。1940年11月，美国的天主教神父乌尔歇（Walsh, Bishop James E.）和唐拉福特（Drought, Father James K.）来到日本，会见近卫的朋友、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就调整日美邦交问题交换了意见，由此揭开了日美谈判的序幕。翌年3月，由两个神父和井川忠雄以及陆军省军务局军事科长岩畔豪雄等人制定了（日美）私人商定的谈判方案，即所谓日美谅解方案。4月16日，野村大使和赫尔（Hull, C.）国务卿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以日美谅解方案为谈判的基础，于是，民间外交升格为政府间的外交，开始了正式的日美谈判。日美谅解方案的内容是：（1）日本政府声明：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而且，以此同盟为依据之军事义务，仅当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国家的攻击时始得履行之；（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偿，将政权和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劝告蒋政权实行和平；（3）日美间进行通商和金融合作；（4）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物资；（5）谋求太平洋的政治安定，等等。赫尔国务卿同意把这个日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同时要求日本同意以下四原则：（1）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2）不干涉内政；（3）机会均等；（4）维持太平洋的现状。野村大使同赫尔会谈后，致电政府请示，但电文并未涉及赫尔所提的四原则。可能唯恐一开始就提出四原则，政府会对初次谈判感到为难。 447

兼管外相事务的近卫接到请示电报后，在4月18日召开"大本营一政府联席恳谈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协商。其时正当日中战争及各方面外交政策穷蹙无路，近卫自不待言，陆海军也都很起

劲。但因当时松冈外相正在访欧，会议决定，等外相回国后再决定日本方面的态度。4月22日，松冈回国，对以日美谅解方案为基础开始进行日美谈判，表示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固然来自外相本人未曾与闻就进行了野村—赫尔会谈，安排了日美谈判，但主要原因则在于违背了他自己所设想并一直推行的外交政策。他自己的日美谈判方案是，把苏联引进三国同盟结成四国协定，靠这种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势力来使美国屈服。他认为："现在美国的对日感情已经极端恶化，并不是仅仅拍拍马屁就能恢复过来的。只有我们毅然决然的态度方可避免战争"，这正是以他那套战争边缘的冒险外交主张为基础的；[1] 在松冈看来，日美谅解方案是根据"卑躬屈膝的态度"而来的。因此，为了把它改成"毅然决然的态度"，他制定了三条原则：（1）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亦即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并在5月3日的联席恳谈会上提出了以此三原则为基础的修正方案。这个修正方案对日美谅解方案在某些地方作了重要的改动。首先，日美谅解方案对根据三国同盟的日本军事援助义务试作狭义的解释，而修正方案则对此明确表示要严格加以适用。其次，全部取消了前者美国劝告蒋政权恢复和平的条件，而主张让美国承认近卫三原则、《日华基本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等。此外，还删除了南进时不行使武力及有关日美首脑会谈的部分。

5月12日，由野村大使把这个修正方案转告美国方面。6月21日，美国将表明基本立场的文件面交野村大使，这个文件对三国同盟、日中和平和在南方地区机会均等等问题表示了严峻的态度。此外，在同时发表的口头声明中还指出，松冈外相等亲轴心派人物是

---

① 《资料编》，第340页。

调整日美邦交的障碍。

7月10日和12日，联席恳谈会审议了美国的方案。会上，松冈强烈谴责"美国的口头声明恰似把日本视同保护国乃至属国"，主张停止日美谈判。① 会谈结果决定要求美国撤回口头声明，本此方针制定了答复方案，但由于强硬主张停止谈判的松冈和首相以下各阁僚之间的对立，内阁内部无法统一，加之，外相和野村大使的关系也恶化了，近卫首相认为照此下去，日美谈判无法继续下去，便决定罢免松冈。于是，7月1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商请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就任外相，组成了第三届近卫内阁。 448

十二　赫尔备忘录

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不久，就强行进驻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这种"不辞同美英一战"的武力南进政策，归根到底，是与日美谈判矛盾的。由于进驻南部印度支那，美国态度强硬起来，日美谈判立即遇阻。为了打开这种局面，近卫决心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并于8月7日将此意指示野村大使。但是，美国虽然赞成进行首脑会谈，但认为必须以前所提出的四原则为基础，先进行预备会谈。

看到日美谈判陷入僵局，军队内部的主战论便更加强烈起来。陆海军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经联席会议作了若干修改后，在9月6日御前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要领》规定，"至十月上旬左右，若仍未达到贯彻我方要求之目的时，则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在这种条件下，下了开战决心。《要领》在附件中还列举了"对美(英国)谈判中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要求"，而这些要求与美国的基本主张大相径庭。② 由于这一决定定死了条件和期限，使

① 《资料编》，第472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44—545页。译者补注：中译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335—336页，译文略有改动。

政府同美国的谈判受到很大的束缚。10月上旬这个期限，也是按军事作战行动计划推定的，是按照统帅主导、军事优先这类惯例决定的产物。

9月20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调整日美邦交谅解方案，并通知了美国。10月2日，美国对此作了答复，重复了以往的要求，即确认赫尔四原则；撤走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并明确表明日本对三国同盟的立场等。与日本的主张依然距离甚大，日美首脑会谈前景十分悲观。接到美国答复的日本终于不得不作出最后抉择。在10月12日的五相会议上，丰田外相说，如果对驻兵问题口气委婉一些，谈判还有妥协余地。但东条陆相却认为驻兵问题寸步不能让，主张停止谈判。海相及川古志郎虽对开战不太起劲，但也不积极表示反对，听任首相作出决断。然而，近卫却说“现在要说究竟怎么干，只能说靠外交来搞。对于战争，我是没有自信的，只好请有自信的人来干。”① 自从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以来，决定并推行了造成日美对立的一系列政策的近卫，却回避作出最后的决断，10月16日，终于辞职了。这表示了近卫优柔寡断的个性，同时也象征着“无责任体系”的天皇制国家结构。

449

这样，以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为赌注的最后抉择，就交给了下一届的东条英机内阁。东条内阁于10月18日成立，东乡茂德就任外相。东条内阁连日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在11月1日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三种方案：（1）卧薪尝胆，竭尽全力避免战争；（2）决心立即开战，把一切政策战略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针之下；（3）在决定开战的前提下，作好战争准备，同时继续执行外交政策。结果采纳了第三种方案，并据此决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其内容是：（1）决心对美、英、荷开战，武

① 《杉山笔记》，上，第346页。

装进攻的时间规定为十二月初，在此之前完成作战准备；（2）对美谈判继续到12月1日午前零时，如果在此之前谈判成功，即停止武装进攻。[①]野村大使和来栖三郎特使一同担任对美谈判任务，在此期间，陆海军积极作好战争准备，联席会议陆续决定了有关开战的各项计划，日美谈判至此已经只是准备战争的烟幕和争取时间了。

11月26日，国务卿赫尔向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递交了对日本方案的答复，即所谓赫尔备忘录。其内容之严峻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第二项中提出了十条作为日美两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其中列举了无条件地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兵，否认满洲国政府和汪兆铭政权，放弃在华各种权利，实质上放弃三国同盟等等。这是要求必须恢复满洲事变以前甚至义和团事件以前的状态。日美对立是围绕着东亚、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对立，因此，作为半世纪以来这种对立的总决算，日美谈判的焦点是从中国全面撤兵问题。然而，对日本统治集团来说，这种要求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因为，正如东条陆相在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所说："如果完全屈服于美国的主张，则中国事变的成果势必付诸东流"，不仅如此，而且也将"危及满洲国，进而危及对朝鲜的统治"。[②]从阁僚们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从中国撤兵，不仅从政治、军事观点来说，即使从经济观点来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生死攸关的问题："日军一旦撤退，不要说维持日本人的企业，就连日本人的安全也难保"，"驻兵对在华企业是必不可少的"。[③]统治集团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活问题偷换为日本国民的死活问题，以ABCD（美、英、中、荷）的包围阵势正在威胁着日本的生存来煽动国民的危机感。

---

① 《杉山笔记》，上，第378—379页。译者补注：中译文见同上，第359—362页。

② 《资料编》，第534页。

③ 东乡茂德，前引书，第206页。

第三节　大东亚战争

十三　对美、英开战

在27日的联席会议和28日的内阁会议上，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既然不能放弃几年来的大陆政策，就只有战争一途，因而只是审议了有关开战的事务手续。29日，根据天皇的旨意，召开了由担任过总理大臣者参加的重臣会议，但这不过是一次单纯的说明会罢了。重臣之中三分之二主张"对美忍受，维持现状"，三分之一主张"只好对美开战"，但全部发言中没有一个说应该接受美国的提案。① 于是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以11月5日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为依据的对美谈判，终于未能达成协议，帝国决定向美、英、荷开战"。由此，外交阶段宣告结束，日美对立转入武力阶段。在递交赫尔备忘录的11月26日午后6时，日本机动部队② 就已经悄悄地从南千岛的根据地单冠湾出发开向夏威夷。但是，外务省对作战行动却一无所知，只是让它"敦促美国反省，提出质问，直到最后时刻，进行谈判，以掩饰我方的企图。"③ 因为有宣战问题，东乡外相问到开战日期，但杉山总参谋长却含糊地回答说，约在下星期日左右；永野军令部总长则说采用偷袭形式；伊藤整一军令部次长还要求谈判要一直进行到战斗开始之前，以扩大战果，却始终不愿讲出战斗开始日期。但因东乡强烈主张，事先通告在国际信义上是绝对必要的，结果在12

---

① 《杉山笔记》，上，535页。东乡茂德，前引书，第253页。

② 机动部队：在海军方面，指以航空母舰为中心，配合高速战舰，具有机动性的进攻部队；在陆军则指拥有战车、骑兵、炮兵等兵种的机械化部队。此处指前者。——译者

③ 《资料编》，第593页。

月4日的联席会议上，海军方面才向外相提议，把通告日期定为12月8日午前2时30分（日本时间）。[①] 其实，早在12月2日，陆军和海军就已经通知有关部队，开战日期定为12月8日。

这样，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一齐行动，揭开了十五年战争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当日拂晓，到达夏威夷海面的日本机动部队，于上午3时20分（夏威夷时间为7日上午7时50分，华盛顿时间为7日下午1时20分）袭击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沉了正在港内停泊的主力舰四艘，重伤四艘，此外，还击毁击伤飞机二百三十架。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由此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南方的陆军部队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宋卡[②] 和哥达巴鲁[③] 登陆，以新加坡为目标向南推进。

通告结束日美谈判的时间，虽曾一度决定为8日上午2时30分（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12时30分），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偷袭的效果，统帅部主张再推迟三十分钟，结果定在8日上午3时（华盛顿时间7日下午1时）。但因事务上的差错，实际上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向赫尔国务卿递交最后通牒的时间是8日上午4时 451 20分（华盛顿时间为7日下午2时20分），即在袭击珍珠港一小时以后。即便没有差错，按照预定时间通告对方，那也仅仅是在开始袭击之前的二十分钟，仍将不免受到"偷袭"的谴责。美国已在1940年底前后成功地破译了日本的密电码，事前早已获知日本最后通告的内容，但关于偷袭珍珠港计划的密码电报却没有破译，所以，虽然察觉到日本开战的决心，却完全没料到会偷袭夏威夷。

同日，日本向美英两国正式宣战，并发布了宣战诏书。当时，按照12月4日决定的《关于对待荷兰之办法》，未向荷兰宣战。这

① 东乡茂德，前引书，第256—257页。

② 宋卡：在今泰国南部。——译者

③ 哥达巴鲁：在今马来西亚境内，与泰国接壤处。——译者

是为了要把荷属东印度完整无缺地攫取到手，① 另一方面，美英两国也于同日对日本宣战。9 日，中国国民政府也对日、德、意三国宣战。12 月 11 日，德意两国对美宣战。同日，日、德、意三国缔结了以共同对美英作战和不单独讲和为内容的协定。次年 1 月 18 日，又签订了日、德、意军事协定，强化了法西斯轴心。这样，日中战争发展成对美英的战争，以太平洋战争为媒介，把亚洲的战争和欧洲的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次大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1942 年 1 月 1 日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这就明确规定了第二次大战的性质是法西斯主义轴心与反法西斯主义联盟之间的战争。这一天，以美、英、中、苏为中心的二十六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② 确认了 1941 年 8 月 1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发表的《大西洋宪章》③ 诸原则。大西洋宪章显示了美英两国关于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的基本设想，这种设想是建立在以下原则基础之上的，即（1）不追求领土；（2）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3）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各民族横遭剥夺的主权和自治权；（4）世界贸易及原料的取得享受平等待遇；（5）为改善劳动条件，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进行国际合作；（6）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亦不虞匮乏；（7）公海航行自由；（8）禁止使用武力，确立永久之安全保障制度和裁减军备等。联合国在确认这些原则的同时，还约定动员一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抗击侵略国家，为此，要相互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等。这样，日本就使自己陷入与全世界为敌的境地。

---

①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4，《大东亚战争、战史外交》，1971 年，第13 页。

②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 342—344 页。——译者

③ 同上，第 337—338 页。——译者

十四　战局的转化

开战前不久，陆军所制定的南方作战计划，其目的在于摧毁美、英、荷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确保南方重要地区；其方针则是"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力求在短时间内达到作战目的"。[①]这种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取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继8日的夏威夷和马来亚两次战役之后，陆军部队于10日在吕宋岛登陆，海军航空部队击沉了英国东洋舰队的两艘主力战舰。12月中，先后占领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到了1942年，又攻占新加坡、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占领了俾斯麦群岛和帝汶岛等西南太平洋的岛屿。这样，按照最初的计划，经过半年的战斗，把几乎东南亚的全部地区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但是，这种辉煌的初战胜利，只不过是钻了当时盟军采取首先对付德国的防御态势的空子而取得的；不久由于联合军整顿态势，发动了主力进攻，这种胜利便瞬息之间归于泡影而破灭了。 452

连日中战争都无法对付的日本，根本没有独立进行大东亚战争的自信，也没有能力。联席会议在临战前所决定的战略设想完全是凭借外力的，即倘若德、意在欧洲战线上迫使英国屈服，那么，美国也会丧失战意。[②]因此，在作战计划方面，也是"力争在短时期内"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然后再视形势而定，是一种极端机会主义的计划，根本没有第二阶段以后的作战计划。可是，第一阶段作战一结束，就需要马上赶快制定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海军方面认为"大东亚战争的主要战役"是在太平洋方面，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结束战争的办法唯有使美国丧失战意，实现这一目的的方策则是占领美国对日发动反攻的最大据点澳洲，进而攻占夏威夷。这就

---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589页。

② 《杉山笔记》，下，第82—83页。

是所谓太平洋速决战论。对此，陆军却从持久战的观点出发，主张太平洋守势战略论。即在太平洋正面控制大规模的进攻作战，维持第一阶段作战的现状，而防备1943年以后预想中的敌人大规模攻势，采取长期不败的策略和战略态势。然而，陆军对于结束战争也并没有明确的估计，其持久战的设想也是来自"姑且采取不败态势，再考虑下一步……指望德国胜利的这种内心凭靠外力"的想法。而且，陆军还背着解决日中战争这个多年以来的老问题，打算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之后，把对美、英的作战主要交给海军，自己则回手重搞原来的大陆国防，准备对苏作战，特别是专注解决日中战争问题。这样一来，结果是"左思右想，也找不到结束战争的门径"。并且把"太平洋作战为主"论和"大陆作战为主"论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陆海军的意见，在文件上撮合起来，"用这种形式制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并在3月7日的联席会议上通过。①

在《战争指导大纲》上达成妥协的陆海军，在外围战略要地作战问题上也达成了妥协，确定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群岛和萨摩亚群岛各战略要地作战。其目的在于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系，断绝美澳军队的反击企图。首先，作为前哨战，在1942 453 年5月开始进攻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但是，运载登陆部队的船队被美军飞机发现，日美两国海军的机动部队在珊瑚海发生了海战。结果，进攻莫尔兹比港的作战停了下来。接着，六月又计划进攻太平洋中部要地中途岛。这是以当年4月18日美军空袭东京为直接动因的海军坚决主张的作战，目的在于封锁美军从夏威夷方面对日本本土进行机动作战。可是，日本机动部队遭到中途岛基地的航空部队和美国机动部队的迎击，丧失了四艘主力航空

①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518—520页。

母舰和许多飞机，遭到沉重打击。这次中途岛海战的失败，成为战局的转折点。

与《战争指导大纲》同时通过的《世界形势判断》估计，美英转入“对轴心国的大规模攻势”“可能要在1943年以后”①。可是，这种估计完全破产，盟军于1942年8月即迅速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登陆，开始了反击战。经过大约半年的激烈攻防战之后，日军于1943年2月撤出瓜达尔卡纳尔，此后，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便转入盟军之手。

与此同时，在欧洲东部战线，战局的主导权也逐渐转移到联合国方面。即1942年8月，德苏两军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斯大林格勒攻防战，次年，即1943年2月初，三十万德军全军覆没，德国由此在东西两线都丧失了主动权。

十五 “大东亚共荣圈”

12月8日，与宣战诏书同时发表的政府声明声称：“此次帝国不得已对南方各地区采取新行动，对该地之居民绝无任何敌意，唯欲排除美英之暴政，使东亚恢复其明朗之本来面貌，互相提携，同享共荣之乐。”12月10日的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美英之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发展而可能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为大东亚战争”。政府再三强调，“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完全相反。

早在开战前的11月5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贺屋兴宣藏相就说过：“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暇顾及当地居民生活，暂时将不得不执行所谓榨取之方针”。11月20日联席会议所决定的《南方占领

① 《杉山笔记》，下，第67页。

区行政实施要领》，清楚地表明了所谓"圣战"的真实目的。它所规定的基本方针是："对于占领地区目前实行军政，以利于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并确保作战部队之自给"，并规定"竭力利用留存的原统治机构"，"使之忍受不得不涉及国民生活的重压"，"避免导致当地居民独立运动过早爆发"等项要点。① 既然日本占领区行政管理之目的在于"获得国防资源"和"当地军队的自给"，这种实际情况与政府所标榜的崇高理想显然远不相符，事实上，日本占领地区保存了旧殖民地权力机构，实行了残酷的宪兵政治。除军政当局御用团体以外，一切政治、文化、劳动团体均遭禁止，稍有批判军政言行的人立即被捕入狱。在这些地区拥有权益和重要经济部门的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的资本均被日军当局接收，但这些财产却并未归还给当地人民，而是以"委任经营"为名交给了以三井、三菱等为首的日本资本。军政当局和日本企业实行了残酷的掠夺政策，牺牲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一味强制增产战略物资。②

454

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南方占领地区，而是普遍存在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所有地区。早在1938年即被纳入东亚新秩序范围，本来就意味着"大东亚共荣圈"雏型的朝鲜、台湾、满洲和中国占领地区，也在"大东亚战争"前后确立了以国民总力朝鲜联盟、台湾皇民奉公会，满洲帝国协和会和新民会等为中心的殖民地法西斯体制，加强了对人力、物力的掠夺。这样，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无非是取代西欧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体制，哪里是什么"共荣圈"，乃是地道的"共贫圈"。

---

① 《资料编》，第578、587页。译者补注：中译本参阅《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1931—1945)，第412—413页。

② 谷川荣彦：《东南亚的民族革命》，现代亚洲、非洲丛书，第3卷，三省堂，1971年，第86—87页。

“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乃是用“亚洲人的亚洲”这种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体系来粉饰的，正如东条首相所说：“建设大东亚之根本方针，实渊源于日本肇国之大精神，使大东亚各国及各民族各得其所，根据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谋求确立共存共荣之秩序。”①日本统治阶级所想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极端自私的、日本本位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归根结底，无非是要使日本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合理化，使日本立于顶端的帝国主义等级统治秩序合理化。

十六　大东亚省的设置和对亚洲外交的消灭

在初战胜利的形势下，政府更加加强了国内的统治体制。先后制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和《战时刑事特别法》等，广泛限制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并成立大日本翼赞壮年团作为“国民组织的核心”，同时把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和大日本青少年团等组织都置于翼赞会之下，并把部落会和町内会等并入翼赞会，整顿了它的基层组织。1942年4月，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举行了“翼赞选举”。议会成了名副其实的“翼赞议会”。这次第二十一届总选举，自1937年4月的第二十届总选举以来，实际已相隔五年，是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的首次总选举。这是唯恐国民对战争政策的批判和不满表面化，因而延长议员任期来搪塞，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国民已完全被排除于对 455 外政策的决定过程之外，外交丧失了国民的基础。“翼赞选举”的目的还在于对具有“分离倾向”的议会进行“刷新”，利用首战告捷来唤起国民的主动性，用来拼凑积极协助战争的力量。选举以后，众议院的全体议员被禁锢在所谓翼赞政治会这种官办“政党”之中，除此以外的政治结社和政治活动则一律加以禁止。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6页。

军队侵犯外交权是产生双重外交现象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前已多次指出，而其顶点则是大东亚省的设置。随着对美英开战，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完全改为战争这种武力手段，外务省大有“无事可作之感。”① 特别是初战告捷，在外务省内部也产生了“战时外交无用论”，在这种状况下，军队和革新官僚们便企图更进一步侵犯外交权。1942 年 2 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之间就开始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② 的设置方案。9 月 1 日，内阁会议决定了旨在“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的《大东亚省设置案》。东乡外相反对此案而辞职，枢密院审议此案时，深井英五和石井菊次郎等顾问官认为，区别对待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国，是对它们的蔑视，会使共荣圈内的独立国和希望独立的国家感到失望，造成对日不满情绪，妨碍建立新秩序。而且，这个方案有被敌国谋略利用的危险，把日本外交分为两个部分，在处理事务上会造成诸多不便和阻碍，因此表示反对。但最后除石井顾问官以外全体一致通过了政府的原方案。于是，1942 年11月 1 日，公布了《大东亚省官制》，并据此设立了大东亚省。结果，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全都并入该省，外务省的权限缩减了一半。不但如此，由于设立了大东亚省，“有关东亚地区的外交和有关其它地区的外交被分割开来，外交权一分为二，形成了按地区设立两个外务省的不可理解的奇怪现象，换言之，外交方面弄出来两个辅弼大臣”。③ 而且，虽然设立了大东亚省，而对亚洲政策的一元化问题并未因此得以解决，军部、大东亚省和外务省仍在继续闹争权夺利。因为，有关南方占领地区的政务实权虽掌握

① 东乡茂德，前引书，第 280 页。

② 《外务省的一百年》，下，第 701 页。

③ 《昭和的动乱》，下卷，第 165 页。

在军队之手，而在“纯外交”领域中，外务省仍保持有发言权。本来，把“纯外交”置于大东亚省权限之外，固然是由于外务省的强烈反对，但也未尝不是出于缓和东亚各国反抗的考虑，其真实用意则在于：“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1] 正是由这种用意可以看到，军部设立大东亚省 456 这样一种内政机构及其对亚洲外交的基本态度。东条首相的下述言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有外交观念乃以对立之国家为对象，此种事实在大东亚区域内则不存在，而只有以我国为领导者之外交”；“我国外交正是由于大东亚圈内和圈外而实际上分成两个，故其措施不同乃属当然。”[2] 这就是说，外交乃是对等国家之间的交涉，与弱小国和后进国之间是不能有外交的。

十七 “绝对国防圈”

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取得胜利，并掌握东方战线主动权，立即转入了大反攻。在北非战线上，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美英联军也转入反攻，同年5月，二十五万德意军投降。在意大利，由于反法西斯斗争的激化和战局的恶化，摇摇欲坠的统治阶级企图依附美英维持自己的统治体制。同年7月，（意大利）国王罢免墨索里尼，成立了巴多格里奥新政权。新政权于9月8日向联合国提出无条件投降，法西斯轴心的一角崩溃了。

掌握了全部战局主动权的联合国，连续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和战后处理问题。1943年10月19日到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就对日德作战的必要措施进行了协商。这时，斯大林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首次暗示，德国一旦投降，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接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三国首脑于11月22

① 《外务省的一百年》，下，第712页。

② 深井英五，前引书，第257、264页。

日至26日在埃及的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共同宣言，内容是：(1)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2)把满洲和台湾等归还给中国；(3)使朝鲜独立；(4)将坚持进行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① 接着，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承认伊朗独立并尊重其主权、以及苏联对日参战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太平洋战争方面，盟国的反攻也日益激烈。1943年5月，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守卫部队全军覆没，接着，同年11月，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塔拉瓦两岛，1944年2月，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沃托两岛的守卫部队相继遭到悲惨的覆没。

这样，被迫完全处于守势的日本，在1943年9月30日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今后战争指导大纲》，不得不改变战略。因为以前所采取的那种长期立于不败的政策战略指导方针，由于盟军的激烈反攻，现已完全破产了。这个大纲的"方针"是：(1)以在1943年到1944年内决定战局为目标，确定必胜的战略态势，同时迅速增强决胜的战斗力，特别是增强航空战斗力；(2)进一步加强同德国合作，同时谋求对苏关系的好转；(3)迅速确立决战态势，同时强化大东亚团结等等，而在"要领"中则明确规定了"应坚决确保的重要地区"，其范围是把千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包括在内②。然而，却几乎完全没有确保这个"绝对国防圈"的自信。在会议席上，原(嘉道)枢密院议长质问："有确保绝对国防圈的自信吗？"对此，永野军令部总长回答说："今后如何不知道，对战局前途没有把握"。据说海军这种没有自信的悲观说

457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07页。——译者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8—589页。

法，使会场顿时紧张起来。① 在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这种场面：枢密院议长发言谈到“陆海军不能同心协力，实在不好办。”对此，嶋田海相愤慨地说：“真没想到，身居枢要地位，竟会说出这种话来。”② 随着战局的恶化，陆海军的对立也表面化了，暴露出战争领导体制的缺陷。例如，在船只分配和飞机生产计划等问题上，陆海军的争执闹得不可开交。关于飞机生产计划，主管部门之间闹得怎么协商也不行，最后天皇出来说情，让双方本着互让精神圆满解决，才算达成了妥协。③

十八　抗日运动和大东亚会议

“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企图的一种粉饰，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由于残酷的掠夺，生产停滞，居民生活遭到破坏，这就激发了亚洲各民族对新统治者的斗争。

在越南，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越盟），自 1941 年 5 月以来，展开了抗日、反法西斯斗争；在菲律宾有“人民抗日军”、在马来亚有“反法西斯自由联盟”各自站在斗争的先列，威胁着日本的军事统治。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苏加诺和昂山等民族主义者们，一面向日本的军政统治实行妥协，同时又与地下组织联系，推行独立运动。④

面临这种事态的日本，在 1943 年 5 月 31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为了应付盟军的猛烈反攻，《大纲》虽然主要“着眼于加强东南亚各国家各民族的战争协作，以贯彻大东亚战争”，⑤但不得不对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运动采取绥靖政策，

① 《杉山笔记》，下，第 471 页。

② 同上，第472页。

③ 《太平洋战争陆战概史》，第 132 页。

④ 谷川：《东南亚的民族革命》，第 87—88 页。

⑤ 《杉山笔记》，下，第 410 页。

为使协助战争，约许承认其独立和自治。所以，《大纲》明确承认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承认在马来和印度尼西亚有步骤地实行自治。这样，同年8月，在缅甸成立了以巴莫为首的独立政权，10月，以劳雷尔为总统的菲律宾共和国成立。但是，这两国的独立乃是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外交权以及军队的编制权、统帅权均掌握在日本手中①。

458

"大纲"还决定召开"大东亚会议"，以使"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在联席会议上，还曾提出召集各地区各民族代表，组成大东亚同盟，召开经济会议等方案，但均因将有损同独立国之间的关系；平等对待缅甸和菲律宾，将使中国（指汪伪政权——译者）和满洲国不满；在当前形势下，召开经济会议，反而会引起纠纷等等，未予通过。于是，1943年11月5日和6日，召集"独立国"的代表在国会议事堂开了大东亚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是，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首相代表旺·怀他耶功、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劳雷尔、缅甸首相巴莫，而所谓自由印度政府②的首脑苏巴斯·昌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等则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但那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字句。会议的目的在于夸耀贯彻战争的决心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世界性宣传效果"③，但结果事与愿违，会议以暴露"大东亚共荣圈"的内部分裂而告终。原定出席会议的泰国首相銮披汶最后表示"拼着不干首相"也不参加，

① 《杉山笔记》，下，第388—390页、434—435页。

② "自由印度政府"：指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苏巴斯·昌德拉·鲍斯在新加坡建立的伪政权。——译者

③ 《杉山笔记》，下，第496页。

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拒绝出席会议的背景是当时泰国反日气氛浓厚，如果强令出席会议，很可能发生内乱。泰国政治上的这种不稳定也影响到缅甸作战，甚至“有可能成为东洋的意大利”，所以在联席会议上提出，必要时采取“以实力解决”的强硬政策来处理泰国①。这样，“大东亚共荣圈”在盟军进攻之前就已经从内部开始崩溃了。

十九　对中国政策的改变

太平洋战争无非是用暴力来解决因侵略中国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尽管太平洋战争初战告捷，而最关紧要的日中战争方面，却全然没有解决的苗头。11月15日，对美英开战前不久，联席会议决定了《关于促进对美、英、荷、蒋战争终结的腹案》，确定了“对于中国，要运用对美英荷的战争，特别是作战的成果……谋求削弱其抗战能力……积极运用政策战略手段，以促进重庆政权的屈服”的方针，但开战后的12月24日联席会议却唯恐当前急于对重庆开展和平工作，会被对方“抓住弱点”，便决定当前只限于进行谍报工作，等待对方屈服的方针，即《关于伴随形势发展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② 这个方针是根据一种乐观判断决定的，即认为对美英初战的胜利，将使蒋政权发生动摇，对方很快就会屈服。这种判断不久就证明是错误的，但1942年3月7日的联席会议，仍然确定继续进行谍报工作。会上，东乡外相批评说：“只凭部署谍报路线来完成任务靠不住，难道军事上没有什么办法吗？”但统帅部回答说：“如果只是中国，凭军事来搞，并不是搞不了的，不过，既有北边又有南边，在这种情况下，攻占重庆实际上办不到。”③ 既然卢沟桥事

459

① 《杉山笔记》，下，第501页。

② 同上，第82—84页。

③ 同上，第52页。

件以来费时四年半也未能使其屈服，而在被迫处于多面作战阶段，攻占重庆根本不可能。事实上，此后，大本营曾命令中国派遣军准备进攻重庆，但因盟军反攻加剧，很快就不得不停了下来。针对统帅部的回答，东乡外相主张应该在外交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但田边参谋次长和铃木企画院总裁等认为"对中国越急于采取措施就越会使它翘尾巴，"表示反对。既然无论在军事上或在外交上都已无计可使重庆政府屈服，那么，可以说对华政策完全束手无策了。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战连胜，一切进展顺利，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可能解决重庆问题，就决定了《关于伴随形势发展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可是，后来形势并不有利，特别是西南太平洋方面的战况已变得令人忧虑，欧洲轴心方面的战局也变得不利，加之，美英的反攻愈益激烈。另一方面，在国内，人力、物力资源几乎已达到极限，生产的扩充也不象想象那样取得推进；北方问题，对苏关系还得时刻警惕。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准备持久战，贮备"抗击力量"，就必须设法在某一方面腾出手来。于是，只好改变对中国的政策。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为了贯彻大东亚战争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① 这个方针是，"帝国认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译者）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应专心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正如参谋总长杉山元所说："不彻底进行作战，而以对重庆的谋略工作来完成对华全部问题的处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另一方面，正象大东亚相青木一男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心日渐背离日本，（汪伪）国民政府正在逐渐弱化，长此以往，恐不无发生不测事态之可能。"② 所以，此时应"排除一切对重庆有所留恋"，同时，以参战

① 《杉山笔记》，下，第321—322页。

② 同上，第181页，319页。

为契机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以上就是改变对华政策的理由，也就是第二次“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它无非是自我宣告以往政策的破产。

《方针》决定，为了强化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日本应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其自发的活动，并谋求修订日华基本条约和附属规定，进而废除或调整租界和治外法权等等。于是，1943年1月9日，460 日本和汪伪中华民国之间签署了关于合作完成战争的《日华共同宣言》、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等协定，同日，汪政权向美英两国宣战。关于汪政权参战问题，在联席会议上曾有不同的意见，即认为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国民会因而遭受美英轰炸反而有损无益；在军事上反而是个累赘，等等；最后则认为由此可以强化（汪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笼络民心……重视使国民思想趋于一致之效果”而得到承认。① 然而，结果并未产生日本所期待的效果。占领地区的中国人大都对汪政权的参战漠不关心，反而认为这个政权的傀儡性由此更增大了。而且，1月11日，美英两国与国民政府（蒋政权）缔结了废除治外法权条约，日本方面的措施因而也毫无效验。于是，日本于同年10月30日与汪政权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其目的在于试图以废除1940年强逼汪政权签定的日华基本条约，缔结平等的条约来掩盖汪政权的傀儡本质，借以笼络中国民心。在附属议定书中甚至约定，战争结束后撤走日本军队。然而，这一系列的“对华新政策”既然是一种欺骗，“维持中国方面的面子而不放弃实权”来使对战争予以合作，则所谓“加强（汪伪）国民政府，赢得占领地区内的民心，并使非占领地区民众倒向过来”等，就根本没有希望。②

① 《杉山笔记》，下，第156页。

② 同上，第308，321页。

第四节　战败

二十　总体战体制的矛盾

随着战局的恶化，日本的战争体制上的矛盾到处暴露出来。这是进行近代战争所不可缺少的总体战体制未经确立，便把自己赶进了长期的大规模国家总体战的日本对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总体战体制上的漏洞，首先表现在战争经济方面。本来，生产力不及美国十分之一的日本经济，根本就无法经得起以联合国为对手的一场大战。原材料和劳动力立刻出现不足，生产急剧下降。为了确立自给自足的势力范围，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发动了对美英的战争。而获得的南方地区，也由于对劳动力和资源进行的残酷而无计划的掠夺，逐渐失去了原料供给地的意义。随着战局的恶化，海上运输能力减弱，这就加速了原材料的不足。同时，由于动员了大量的兵力，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急剧减少，成为生产力降低的重要原因。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实行了征用制度，动员学生，以至对朝鲜人、中国人实行强制劳动，但仍解决不了劳动力的不足。再则，关461于战争经济计划的制定及其运用未能实行一元化，也是日本战争体制的致命伤。陆、海军统帅二元化的矛盾，在军需生产上也表现出来，生产计划对立，互相争夺资材、产品的情况，随着战局的不利而更加激烈。于是，政府于1943年11月设立了军需省，打算把军需生产，特别是飞机的生产一元化起来，但军需省本身却成了陆海军斗争的场地，军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丝毫也没有得到解决。

总体战体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把国民的自发力量调动起来，但所谓天皇制国家这种特殊的日本权力机构却阻碍了这种条件。新体制运动碰到了天皇制这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政翼赞会搞了精神动员化，想唤起

国民的自觉性，结果也失败了。初战的胜利，虽然得以使国民的战意一时高涨起来，但不久战局恶化，国民生活受到压迫，国民的自觉性随即消沉下去，甚至变成消极抵抗。统治阶级对此不得不苦思焦虑。东条首相声称视察民情，甚至视察了老百姓的垃圾箱，也无非是这种苦思焦虑的表现。

再则，天皇制国家的原则也妨碍了总体战体制的核心——战争指导体制的确立。近卫所称"日本政治最大难题"的国务和统帅的一元化以及行政机关的相互调整，在东条体制下依然未能解决。一身兼任首相和陆相，并企图以《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等等来加强首相权力的东条，更进一步兼任了军需相。这样，东条企图以把权限集中于个人的办法来解决国务与统帅的矛盾及行政的多元性，1944 年 2 月又亲自兼任参谋总长，并使绰号"东条副官"的嶋田海相兼任军令部总长，以此谋求军政和军令以及陆军和海军的统一。既然用大本营一政府联席会议等组织来试图突破明治宪法的作法已经失败，就只好用东条式的个人集权办法来解决天皇制国家和总体战体制的矛盾，但这种办法也自有其局限性。[1] 东条自己后来也不得不坦率地说："对于海军统帅问题根本不能染指。"[2] 这种办法反倒引起海军内部对东条的反抗，嶋田海相在部内完全成了架空的人物。

二十一　和平工作

总体战体制未及确立便稀里糊涂地陷入总体战的日本，在外交战略方面也从来没有固定的方针。在对美英开战前不久的 11 月 15 日，联席会议决定《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腹案》，虽然作了大体上的估计，但在结束战争问题上却一味指望德意的军

① 信夫清三郎：《战后日本政治史》I，劲草书房，1965 年，第 29—30 页。

②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条寻问录》，新闻社，1949 年，第 149 页。

事力量，是典型的凭借外力的打算。开战外交本应与终战外交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战时外交应该作为两者的媒介发挥机能。但这种通盘考虑的外交战略未经确立，就在“依靠欧洲战局之发展”这种机会主义的、毫无主体性的战争指导计划之下，闯进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1942年元旦，东乡外相向外务省职员进行训话，强调战时外交的重要性，说：“必须在日本最有利的时机结束这场战争，”说明了准备结束战争的必要性。[1] 可是沉醉于初战胜利的日本统治阶层对这种意见根本不加理睬，不仅如此，甚至在外务省内部也出现了战时外交无用论。在这种气氛中，外交的主导权由军部掌握着，不久，随着大东亚省的设立，外务省的权限大减，事实上外交已经不存在了。

462

在战局有利展开的阶段，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出过和平的问题。在东乡提出早日实现和平的同一天，前来贺年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对东乡也说过：“只有尽快结束战争，对日本说来才是上策，希望务必朝着这个方向去作，但必须解除东条大将的总理职务。”[2] 2月10日，天皇指示东条，要充分处理好“获得南方资源的问题”，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失时机地结束战争”。[3] 此外，1942年2月15日，攻陷新加坡时，也有人提出应该乘机媾和的意见。不过，这种和平的设想只不过是所谓“在适当时机结束战争以保卫战果”的“保卫战果和平论”[4]，它与“扩大战争论”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到了1943年，战局急剧恶化，在欧洲战线上，轴心国方面也完

---

① 东乡茂德，前引书，第281页。

② 同上。

③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945页。

④ 信夫清三郎，前引书，第26页。

全被迫处于守势，凭借德意的军事主导来结束战争这种设想开始破产，于是外交重新受到重视。当时，在结束战争方面剩下的外交途径只有对苏关系。继东乡和谷正之之后就任外相的重光葵，根据6月19日联席会议决定的《关于当前对苏施策》所规定的方针，开始进行日苏交涉。重光葵外交的意图是，通过解决北库页岛利权问题和渔业问题来改善日苏关系，调停德苏间的和平。9月30的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了这一方针，驻苏大使佐滕尚武并向苏联政府提议派遣特使。但苏联认为对德国或轴心国完全没有休战或讲和的可能，拒绝了派遣特使的提议。由此，企图凭借调停德苏和平来打开局面的重光外交失败了。

进入1944年，战局更加恶化，美军的反攻已达到绝对国防圈的中心，特鲁克群岛和塞班岛相继遭到袭击。到了这个阶段，和平运动就迅速转变为打倒东条内阁运动。因为要积极开展和平活动，就必须把外交权从军部手中拿回来。于是，近卫、木户等宫廷贵族，若槻、平沼等重臣派，冈田、米内等海军集团以及池田成彬、滕山爱一郎等财界主流开展了反东条运动。东条虽曾企图通过改造内阁来巩固政权，但由于木户宫内大臣所提让重臣入阁这一条件未能实现，7月18日终于辞职。在此前一天，塞班岛的守卫部队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日本便进入了毫无希望的抗战阶段。　463

二十二　保卫成果的和平论

东条内阁在一种“宫廷革命”形式下垮台之后，由小矶国昭和米内光政等陆海军元老联合组阁，于7月22日成立了小矶内阁。在这次政变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臣集团对新内阁所期待的是，通过政权更迭或许能打开走向和平的道路，对于和平既无清楚的估计，也无具体的方策。小矶组阁时所抱的战争指导设想是用军事主力打一次确有把握的胜战，然后不失时机地结束战争，转入和

平。米内也认为新内阁是继续推行战争的内阁，停战、和平应交给下届内阁来搞。[①] 这样，立足于“保卫成果的和平论”而继续进行战争，就成为小矶内阁的任务。

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小矶国昭最伤脑筋的是国务和统帅的问题，前任东条曾以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来弥补因宪法的约束而造成的指导战争上的缺陷，但这种靠集中权力于个人的方法也是有限度的。于是，小矶选择了改革制度的办法，向陆海军提议修改大本营令或以单行军令来让首相参加大本营。但军部不同意，小矶于是又在7月31日联席会议上提议设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并经8月4日联席会议通过。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等六人组成，是一个制定战争指导方针并谋求调整政策和战略的机关，但对统帅事项则全然不能问津，实质上仍不过是联席会议的延长。

由于马里亚纳失陷，1943年所决定的、以确保“绝对国防圈”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完全破产。为了应付新的事态，1944年8月19日，有天皇出席的最高指导会议作出《世界形势判断》并据此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新的《战争指导大纲》写道：“依靠与作战相呼应的彻底的对外政策，期求世界战局政局的好转”[②]，日本统治阶层面临军事上的破产，才注意到战时外交的重要性。重光外相兼任大东亚相，随着日美开战而停止活动的外交重新复活起来，重点是对苏政策和对重庆的工作。

关于对苏政策，早在东条内阁末期已由重光外相开始进行，1944年3月30日，日苏之间缔结了关于出让日本在北库页岛的石油和煤炭利权的议定书，以及关于日苏渔业条约延期五年的议定书。在小矶内阁内留任的重光外相，在“继续维持中立关系、进

① 小矶国昭：《葛山鸿爪》，小矶国昭自叙传刊行会，1963年，第785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03页。

而谋求邦交的好转”，并“努力尽速实现德苏和平”的方针下，进行了对苏交涉。①9月4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派前首相广田（弘毅）为特使对苏进行谈判，并将此意向苏联提出，遭到苏联拒绝。464
“利用苏联努力扭转形势”的政策一开始就触到暗礁。②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在呈给外相的意见书中指出：英美苏三国团结坚固，无隙可入，在这种时候派遣特使，企图仰赖苏联的力量来挽回塞班失守以来的颓势，这种作法是“对形势估计也太差了”。③

在此期间，战局之恶化与日俱增。8月上旬，关岛、狄尼安岛的守卫部队全军覆没，10月初，美军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开始了截断日本和南方联系的战役。在莱特湾海面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惨败，丧失了它的主力。在缅甸战线、中国战线上，日军也都开始节节败退。11月初，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开始空袭日本本土。在这种形势下，早在10月10日的会议上，即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Harriman, W. A.）约定将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于11月6日发表演说，谴责日本是“侵略国”，使日本统治阶层大为震惊。现在的情况是，慢说调停德苏和平，就连维持日苏中立关系也靠不住了。11月16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估计苏联会废除中立条约，但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对策，仅作出以“无策为上策”的结论而告终。④

另一方面，对重庆的工作也毫无出路。前述《战争指导大纲》曾决定“迅速发动有领导的政治工作，设法解决中国问题”；8月30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决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要纲》，由首相和外相这条线来统一对重庆的工作；9月5日的会议进而确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04页。

② 同上。

③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5《大东亚战争·终战外交》，第64页。

④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65年，第660页。

定了和平条件。[1]这个条件是，除满洲以外，几乎全面向中国让步，全部取消1933年塘沽协定以来日本从中国所获得的"成果"，是一个大幅度的妥协方案。按照这一方针，通过周佛海和缪斌等人的活动，谋求与重庆政权讲和。不过，这已经完全行不通了。中国已经参加了1942年1月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不单独对日媾和；又参加1943年11月27日的开罗宣言，决定（日本必须）归还满洲和台湾并无条件投降。另外，日本的军事作战也陷入困境。1944年5月开始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2]，虽然一时取得成功，11月间占领了桂林和柳州等美国空军基地，但由于大规模作战，占领地区兵力单薄，八路军开始全面转入反攻，日军的后方受到威胁，1945年春只好再次退出。

这时在中国存在着两条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避免同日军决战，企图尽量减少消耗，为战后的政治统治保存兵力。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四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由于日军展开大规模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465 史迪威（Stilwell J. W.）将军唯恐中国战线崩溃，曾向蒋介石建议，把美国援助的部分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加强反抗日本的力量，但遭到了蒋的拒绝。于是，罗斯福总统提议任命史迪威担任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但蒋介石不仅拒绝了这一提议，而且要求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军队参谋长之职务。罗斯福生怕中国战线崩溃，曾一时支持了史迪威，但待由于中共军队的奋战，日军的战败已成定局时，便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罢免了史迪威，任命亲蒋反共的魏德迈（Wedemeyer, A.C.）将军来接替。通过维持蒋政权，把中国置于自己势力

---

① 《败战的记录》，原书房，1967年，第163—164页。

② 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为了救援侵入南洋的孤军，并图谋以中国大陆为垂死挣扎的基地，日本急需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译者

范围之内，战后美国的这种远东政策和以此为背景的国共内战的图景，大体上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日本的“依靠彻底的对外政策，期求世界战局政局好转”的企图就这样失败了。对小矶内阁来说，为了结束战争，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在本土决战中给敌人以打击，并以此为契机来实现和平。1945年1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三次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决定了确立适应本土决战态势的方针。小矶内阁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决战非常措施要纲》，组织国民义勇队等，作出了本土决战的态势。为了实行本土决战并以此为契机来实现和平，确立战争领导体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3月16日，小矶首相根据特旨被批准列席大本营会议，但其身份只不过是个观察员。因此，小矶想利用杉山陆相调任第一总军司令官的机会，亲自兼任陆相。但陆军以军部大臣按规定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为理由，拒绝了首相的提议。在东条独裁统治下曾被翼赞政治会所禁锢的旧政党势力也重新开始活动，小矶内阁企图借此把作为战争指导体制基础的政治力量聚集起来。3月30日，旧政党势力解散了翼赞会，组成了新的大日本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的任务是发动自下而上的国民运动，以此“迅速集结一亿国民的团结合作，把国民运动直接与战场联系起来”。旧政党势力或多或少地恢复了独立性，但没有政治自由的国民对此当然漠不关心。小矶内阁启发国民自觉性也归于失败，它的指导战争的设想便完全碰了壁。这样，4月5日，小矶内阁辞职，只留下一句话：下届内阁应是大本营内阁。木户宫内大臣认为，此问题与推荐后任首相有关，乃与陆、海两相和两位总长进行个别会谈，就大本营内阁的设想征求意见，但陆海两相和两总长皆以统帅和国务实行一元化，“在宪法上是困难的”为理由，全都表示反对。① 显然，只要不修改

① 服部卓四郎，前引书，第878页。

宪法，就不可能确立指导战争体制，明治宪法体制与总体战体制的矛盾是关键问题。

二十三　波茨坦宣言

小矶内阁总辞职的1945年4月5日，苏联通告日苏中立条约不能延长。同年二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进行会谈，决定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对日参战并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等等。4月5日的通告乃是为对日参战所作的布局。现在，"保卫成果的和平论"已完全破产，结束战争设想的焦点，已只是"维护国体"了。

466

1945年初，美军开始进攻菲律宾，日本的失败已指日可待。为了听取关于结束战争的意见，天皇分别接见重臣。自2月7日至26日，从平沼骐一郎开始，各位重臣分别向天皇奏陈了意见。多数重臣都说应加强对当前战争的指导，以取得战果，在有利条件下媾和，唯有近卫文麿说："很遗憾，最坏的事态已经必定到来"，"从维护国体的立场而言，比最坏的事态更令人忧虑的，是随之而将发生的共产革命"，主张"应该尽快采取结束战争的办法"。① 这是对国民的命运和亚洲各民族完全不负责任，只顾一昧为"维护国体"而鼓吹及早实现和平，就这一点而言，它是"典型的天皇制和平理论"。②

4月7日，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继任组阁。这是以结束战争为任务的最后一届战时内阁。垄断资产阶级在铃木内阁内也安插了代理人，担任经济方面的阁僚，为战后的统治作了布局。

铃木内阁一方面高呼"完成大东亚战争"、"一亿玉碎"，驱使国民在本土决一死战；另一方面，又推进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终战"活

---

① 《木户幸一关系文书》，第292页以下。

② 信夫清三郎，前引书，第62页。

动。6月8日，御前会议决定，确立"举国一致，俾能适应皇土决战"的态势。[①] 6月23日，政府制定了"义勇兵役法"和"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但是，本土决战体制正在从内部逐渐崩溃。例如，6月8日的御前会议上就有过这样的报告："对军部和政府之批评日益强烈，不断引起对领导者信赖感之动摇……在敢斗奉公精神不够昂扬之庶民中，……有消极自弃之风气。在起指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中，追求和平之焦躁情绪正在暗中泛滥……"。[②] 同时，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部，其状况也是"不同日本合作的态度逐渐表面化，其中有的势将导致敌对化"[③]。为了应付这种事态，7月17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尽快承认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独立"，[④] 但是，这种敷衍办法，已经不能制止"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崩溃了。5月7日，依为支柱的"盟邦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铃木首相、东乡外相以及海军寄希望于冲绳决战，企图以冲绳的牺牲来换取对统治阶层有利的和平。但是，6月23日，冲绳守卫部队全军覆没，这种企图也随之落空。

另一方面，关于就"终战活动"，7月10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派遣赴苏使节》，天皇命令近卫访苏，请求苏联调停实现和平。7月13日，驻苏大使佐藤向苏联政府提议派遣近卫特使，但这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即将出席波茨坦会议。7月18日，苏联答复拒绝日本派遣特使。于是，企图靠苏联的调停来实现有利和平的如意算盘以及（日本）统治阶层对形势的估计不足，统统暴露出来，结束战争的设想破产了。

467

7月17日，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会晤的美英苏三国首脑，讨论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5页。

② 《败战的记录》，第268—269页。

③ 同上，第268页。

④ 同上，第280页。

了对德处理方针，同时也讨论了对日政策，7 月 26 日，以美英中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投降。盟国要求日本的投降条件是，排除军国主义，限制领土，严厉惩处战争罪犯，复兴和增强民主主义，经济上准许维持非军事性的工业，以及为了保证上述目标实现起见，在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的地点，由盟军占领等等。然而，波茨坦公告不单是对日本的劝降书，而且表明了以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基础的对日处理方针。因此，公告所列十三条条件，不仅对日本，对于盟国也是具有约束力的。

政府接到波茨坦公告后，于次日（27 日）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对公告进行了研究。军部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但东乡外相判断，苏联未在公告上签名，因此苏联对日本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中立；另外，盟国对过去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有所缓和，所以主张不从正面拒绝公告，而应当先看一看今后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态度。会议同意了东乡的意见。可是，铃木首相屈服于军部首脑的强烈要求，于次日（28 日）发表声明说："政府不认为（公告）有何重大价值，只能不予理睬。吾等唯有誓将战争进行到底"。①

二十四　战败

铃木首相的"不予理睬"的声明通过新闻报道传遍全世界，联合国认为，这就是拒绝波茨坦公告。东乡外相认为，公告是有条件的投降，尚有交涉余地，至 7 月 30 日还训令佐藤大使委托苏联出面调停和平。然而，公告明明写道："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它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允许。"在结尾中又说："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② 这是要求"有条件的无

① 服部卓四郎，前引书，第 920 页。

②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77—78页。——译者。

条件投降"，而且是最后通牒。由于日本政府不理解这一点，结果使国民蒙受了更大的牺牲。8月6日，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杀伤市民近四十万人。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政治意图，是要掌握占领日本的主动权，但日本政府为美国投掷原子弹造成借口也应负有很大的责任。虽然投下了原子弹，政府仍未下定决心投降。直到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才感到事态严重。8月9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了接受公告的问题，尽管如此，仍然无意接受无条件投降。东乡外相主张一个条件（以维护国体作为保留条件接 468 受公告）；陆军主张四个条件（除维护国体以外，还要把保障占领的范围、兵力和时间缩小到最低限度，解除武装和惩罚战犯责由日本自主地进行等作为条件），二个方案对立，未能得出结论。正在会议争论期间，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炸死居民达十二万人。因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得不出结论，就把审议移交给了内阁会议，但长达八个小时的内阁会议也未能作出结论，终于召开了御前会议。当天午夜近十二时，在宫中地下防空洞里召开的天皇临席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东乡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与阿南陆相的四个条件方案仍然对立，争吵不休。因此，铃木首相遂请求天皇裁断。天皇采纳了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根据这一决定，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公告"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在此种理解下，"帝国政府接受此公告"。联合国对此回答说："自投降时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从属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日本统治形式最终应取决于日本国民自由表达之意志……。"①接到这一答复后，日本统治阶层又发生了分裂。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于12日晨一起上奏，反对接受联合国条件。当天，反复召开了内阁会议、皇族会议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都未能作出

---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27—635页。

结论，再次把问题移交给了御前会议。最后的御前会议于14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召开。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的主张是，若照联合国回答那样接受公告，是不能维护国体的，应该再同联合国进行交涉。如果不能保证维护国体，即使一亿人民"玉碎"，也必须继续战争。针对这一主张，和平派的逻辑则是，只有接受公告才能维护国体。[①] 是靠接受公告来维护国体呢，还是靠彻底抗战来维护国体呢？反正，在日本统治阶层头脑中只有一个维护国体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互相争论，力图以自己的方案作为最后的抉择。这是国务和统帅的矛盾所造成的最后局面，这个最后局面只能靠天皇的决断才能解决。于是，天皇判断："关于国体问题，我想敌人也都承认，万无一失"。根据这种判断，决定接受公告。[②] 同日晚十一时发布了"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的《终战诏书》。次日（15日）正午，天皇亲自作了"玉音广播"。

满洲事变以来，长达十五年的战争，夺去了国民的生命，破坏了国民生活，带来了精神的颓废。据复员局和经济安定本部的报告，仅"大东亚战争"死者即达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不仅日本人，由于半个多世纪的侵略和奴役，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以及亚洲各民族人民一再犯下了不可估量的罪孽。这就是近代日本外交史的总决算。

---

① 东乡茂德，前引书，第351页。

② 《战败的记录》，第290页。

第十四章　占领

(1945—1952)

第一节　美国的对日政策

一　美国的世界政策

以日德意轴心国为对手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英苏"大同盟"，随着胜利在望和处理战后问题提上日程，就因利害对立而开始分裂。通过战争而发展为超级帝国主义的美国，一心一意地策划统治世界的设想。

1942年7月，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赫尔指出，美国因为有自己的"巨大经济力量"，所以"必须在走向国际经济关系新秩序的过程中取得领导权"，并强调，特别从"国家本身纯粹的利益"来说，这个领导力量是必要的。国务院经济部长霍金斯(Hawkins, H.C.)指出：经过战争，生产膨胀了，但"美国国内市场却不能无限地吸收所有的生产。"他极力主张："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广大的国外市场。"国务院战时经济部长塔夫脱(Taft, C.)也预言："我国的金属资源已经罄尽，石油也很快会用完，因而，五十年后，我国将同英国一样，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输出，以支付一些必需品的代价"。为了销售产品和确保原料，美国已需要广大的市场了。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于1944年7月强调说："(美国)的新国境将从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①……扩大到遥远的中亚

① 明尼阿波利斯：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上。——译者

细亚。"①

为了追求这种利益，美国对战后世界着重要求两点。第一，美国要求打破战前、尤其是1929年经济危机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已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体系。他们企图进一步推行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凭强大的经济力量来统治世界市场。第二，美国企图扼杀可能推翻其利益的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解放势力。曾任世界最大棉业公司安德逊·克莱顿公司董事长并在罗斯福时代进入了国务院的克莱顿(Clayton, W. L.)，在杜鲁门时代的1946年11月强调说，美国"除了两样东西——煤和石油以外，几乎所有重要的金属和矿物都毫不夸张地需要输入"，因此，"在国外所拥有的这些原料将发生些什么变化，是美国举国关心的事"。美国认为，对付革命，要把维护资本主义作为最高使命。1946年9月，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雷登(Braden,S.)指出，"私有财产制度"乃是"文明的屏障"。1946年11月，大通银行的查理·杜威(Dewey, C. S.)强调说，在今天的世界上，"企业分属于三种意识形态"，一是苏维埃制度，一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企业制度"以及"不属于前两种的第三者"，而他自己则为了"自由企业的未来"而注视着"这第三集团"的动向。底特律银行的约瑟夫·道奇(Dodge, J. M.)于1947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在于政府统制下的所有权将取代私人企业的范围"，并警告说，社会主义和政府统制将走到"某种形态的极权主义"②。

美国，一面作为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保卫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企业的领导国家，一面又作为一个为其自身资本主义

① G. 柯克(Kolko)：《战争的政治，1943—1945年的盟国外交与世界危机》，韦登费尔德与尼科森公司，1969年，第252—254页。

② 乔伊斯(Joyce)/G. 柯克合著：《权力的界限——1945—1954年的世界与美国对外政策》，哈珀·罗出版公司，1972年，第13,24页。

经济而要求开放市场，打破战前帝国主义经济集团的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在战后世界。美国为战后世界国际秩序而设想的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是和美国这种意图分不开的。美国既把联合国塑造成一个轻视小国，在大国一致原则下，由大国进行统治的国际机构，又利用在安全保障理事会上的否决权和在全体会议上形成多数派，企图以此把联合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称作世界经济上的联合国，而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摩根索（Morgenthau, H.）则提出设想说："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可以由实业家根据企业的原则来经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分别把总部设在华盛整和纽约，就最鲜明地象征着美国企图统治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意图[①]。为了保障战后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所集中寄托希望的这两个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落得成为美国统治世界的手段。

二　美国对亚洲的政策

把遥远的"中亚细亚"都认为是"新国界"的美国，高度重视亚洲的民族革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了在整个亚洲持续统治达数世纪之久的欧洲殖民帝国。亚洲广大人民对企图取代欧洲帝国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抵抗，同时集结在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为民族革命而奋起进行了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始终一贯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争，从华北到满洲广泛进行了抗日武装斗争。把日本视作不过"癣疥之疾"，而把共产党视作"心腹之患"的蒋介石，对围剿共产党比对抗日更加热衷。在印度支那，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越南独立同盟，自1941年以来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在菲律宾，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从1942年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游击斗争，

471

① 乔伊斯/G.柯克哈著，前引书，第16页。

而在1945年3月美国解放菲律宾以后，则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还薄弱，苏加诺和哈达一面与日本的军政实行合作，一面进行了谋求独立的工作。在缅甸，昂山一面同日本的军政妥协，同时也进行了争取独立的工作，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领导了1944年以来的统一战线，并在1945年3月发动了武装起义①。美国害怕亚洲的民族革命将给战后亚洲的国际关系带来革命的变动，便企图利用推翻了亚洲殖民主义旧秩序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投降的机会，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描绘战后亚洲国际关系的蓝图。

1945年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一般命令第1号》，指示各战区的日本军队应向谁投降，并寄给有关各国。《命令》指示：中国（"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应向蒋介石投降；满洲、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朝鲜、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日本军队应向苏维埃远东军最高统帅投降；缅甸、北纬十六度线以南的印度支那、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荷属新几内亚等地的日本军队应向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投降；婆罗州、英属新几内亚等地的日本军队应向澳大利亚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国委任统治群岛、小笠原群岛及太平洋上其他岛屿的日本军队应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最高统帅投降；日本大本营和日本本土、与此邻接之各小岛、北纬三十八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应向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最高统帅投降。规定"只有上述各指挥官是受权接受投降的盟国代表，日本军队只向上述指挥官或其代表实行投降"。②

---

① 谷川荣彦：《东南亚的民族革命》，第85—88页。

② 日本管理法令研究会：《日本管理法令研究》第1卷第1号，1946年5月，法令条文第17—26页。译者补注：中译文录自《一般命令第一号》，《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4—205页。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苏联参战的8月9日，号召中国所有的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并呼吁“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① 解放区抗日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在日本投降的8月15日，对美、英、苏三国发出备忘录，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分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他并强调说，因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朱德 472 接着指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他进而要求“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②

《一般命令第1号》对受降司令官在指示中使用了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或者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等职名，唯独对蒋介石则用了他个人的名字。美国很了解蒋介石热衷于围剿共产党而不热心于抗日，也很了解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内部由于投机和不正当收益以及隐匿物资而腐败透顶；（中共）他们恰恰反而在人民中培植了革命的势力。然而，美国政府也深知蒋介石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是有用的。罗斯福说过：“在（我们）与俄国在政策上严重对立之时，（国民党的）中国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们一边”。国务院把国民党中国视为“远东地区重要的稳定因素”。美国政府把已在走向崩溃的国

①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9页。——译者

②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5年，第31—32页。文中之“同盟国”，在本书中统译作“联合国”或“盟国”。——译者

民党中国打扮成"强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作为四大强国之一给它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英国首相邱吉尔严厉批评说，这是"地道的滑稽剧"，美国政府还想在战后的世界政策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蒋介石政权。因此，美国便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接受日军的投降和收缴日军的武器资财。但是，就从这一瞬间开始，原来因抗日战争而停下来的内战，又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了。

让印度支那十六度线以北的日军向蒋介石投降，也是为了阻止革命力量的扩展。很明显，是要让十六度线以北的蒋介石与十六度以南的东南亚司令部最高司令、英国人蒙巴顿(Mountbatten, L.)一起，恢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旧统治。杜鲁门在 8 月 24 日就向访问华盛顿的戴高乐保证，印度支那将归还法国。

以三十八度线为界，把在朝鲜的日军投降分为南北两半，也反映了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在十五年战争期间，朝鲜人民在 1932 年建立了红色游击队，1936年组成了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由此，以满洲为主要舞台而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将唤起朝鲜人民的革命起义，而参战的苏联一旦南下进入朝鲜，朝鲜的革命力量将集结响应。美国把包括古都汉城在内的朝鲜南半部掌握在手里，阻止日军的武器和资源转入革命力量手中，想以此牵制朝鲜的民族革命。

473 美国企图在亚洲各地阻止民族革命的发展。《一般命令第 1 号》就是美国向亚洲革命发出的第一个概括性的反革命宣言①。

三　美国的对日政策

美国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打算利用投降的日军，把日本的将来托付给保守势力。

---

① G.柯克:《战争的政治》，第 600—603 页。

国务院在对日战争开始前后，就开始研究了战后的对日政策，特别是国务院在1944年1月设置的战后计划委员会，作为这个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使战后对日政策的制定有了划时代的进展。委员会于5月间决定了政策文件《合众国的对日目标》，并设想了下述对日政策。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1）使日本不得成为对美国及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威胁；（2）为了美国的利益，将在日本建立尊重别国权利和日本国际义务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基本目标，把日本战后的发展决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日本实施投降条款，作为其发动军事侵略的报复，使之接受占领下的严格训练；第二个阶段是实行严密的监督，随着日本表示与别国和平相处的愿望和能力，对其逐渐放松限制；第三个阶段是使日本在和平的各国国民中恰当地完成自己的责任，也就是接近美国最终目标的时期。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里，一方面要为防止日本侵略而奠定必要的国内及国际基础；另一方面，要实行军事监督以阻止重新武装，通过经济统制、报纸、广播、电影、学校来鼓励民主思想，根除超国家主义团体等手段，阻止战争潜力的发展，并准备培养"稳健分子"或"自由主义的政治因素和自由主义思想"。委员会的政策奠定了对日政策的雏型，并于12月通过国务、陆军及海军三部所组织的政策调整委员会而成了政府的政策[①]。

预计中的对日军事占领，其任务就不仅单纯限于保证履行投降条款，而且具有领导日本的改革和培养其承担者这种广泛的任务。过去的战后军事占领，都是为了保证履行投降条款或媾和条约的消极的保证占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占领，则第一次确立了包括广泛进行改革的积极的占领形态。这种变化的原因在

① 休·博顿(Borton)：《日本投降前美国对战后日本的计划》，东亚研究所特刊，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第33—34页。

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具有民主主义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的性质，从而要求军事占领能保证法西斯不致再度扰乱世界和平。就474 美国的对日占领来说，它还包含着美帝国主义不让日本再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危险的竞争者这样一种要求。政策文件《合众国的对日目标》正是以后者为基础，以前者为外衣而表示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基本点。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杜鲁门就任总统，美国的对日政策更加朝着战后计划委员会所策划的方向推进。罗斯福大都是在自己的指挥下开展外交活动，而杜鲁门在外交问题上则大都依靠国务院。帮助国务卿斯退丁纽斯(Stettinius,E.)处理对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是战前曾任驻日大使的"知日派"格鲁。他相信"即使给日本移植了民主主义，也将以混乱告终"，他确信"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不适合于日本"①。在格鲁指导下，美国的对日政策越来越倾向于把日本的将来寄托给自由主义稳健分子。

蒋介石政权日益加速崩溃。于是以格鲁为中心的知日派乃不仅把日本的将来寄托给稳健分子，而且开始打算把日本作为亚洲稳定势力的中心。格鲁一向就对中国的将来不抱希望。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Forrestal, J.)曾在5月1日质问陆军部长史汀生："对于俄国在远东的影响，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要不要有一种力量来对抗其影响？如果有必要，那么这个力量应该是中国，还是日本？"② 美国政府内部对亚洲政策出现了分裂。以格鲁为中心的知日派被称为"日本派"，而打算把中国作为对亚洲政策中心的人物，则被称为"中国派"。后者的中心人物是著名的反日主义者霍恩贝克(Hornbeck, S.)。然而，让日本在亚洲政策中究竟占什么地

---

① 柯克，《战争的政治》，第544页。

② 沃尔特·米利斯(Millis)(编)，《福雷斯特尔日记》，瓦伊金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59页。

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四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美国在设想对日政策时，是把单独占领日本，把持对日政策作为前提的。然而，在实际单独占领日本以前，美国还不得不经过一场对苏联的激烈斗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向美国保证，德国投降后即参加对日作战时，在提出的参战条件中就讲明了对日政策。这个参战条件问题是向两个方向发展的。一方面是，斯大林要求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库页岛南部领土和在满洲的权益——保持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并使该港国际化；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南满铁路。与此同时，还主张由苏联领有千岛群岛。他提出这一要求的根据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和将来对日关系上的安全保障，而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则在于对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侵略的报复权利。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他向俄国国民发出了如下号召：

“日本早在 1904 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俄国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即库页岛——译者）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475

斯大林指出：“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并举出了对苏干涉战争的例子，还列举了张鼓峰事件和诺蒙坎事件，强调说：

“1904 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

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①

库页岛南部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割取的领土，但千岛则不仅指择捉岛以南，而且包括得抚岛以北的整个群岛，都是国际公认的日本的合法领土。斯大林也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因此，他对库页岛南半部要求“归还”(return)，而对千岛群岛则只能要求“移交”(hand over)。无论千岛群岛对苏联来说有多么大的战略价值，但趁战胜之机迫令日本割让合法领有的领土，第一，这是违反大西洋宪章的。苏联也公开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而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项原则中，有两项主张不扩张领土和“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② 割让千岛的宣言无视有关国民，即日本国民所自由表明的意志，违反了大西洋宪章的宗旨。第二，这违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所制定的不兼并、不赔偿的原则，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斯大林却想诉诸俄国国民的落后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实现其脱离社会主义原则的领土兼并。这是同社会主义原则毫无共通之处的民族主义偏

476 向，是大国利己主义。但美国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谈中，却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中国的国民政府也在8月签署的《苏维埃社

① 斯大林：《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清水邦生译，国民文库，第209种，国民文库社，1953年，第209—211页。译者补注，中译文录自：《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页。

② 《大西洋宪章》，《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37页。——译者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民国友好同盟条约》中予以承认。

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斯大林一方面要求割让千岛及库页岛南半部和满洲的权益，另一方面则积极要求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和管理。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波茨坦宣言上签了字，并于8月11日（莫斯科时间）由莫洛托夫外长向美国大使哈里曼提议，在占领日本时盟国最高司令应设二人，把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任命为最高司令，与麦克阿瑟元帅并列，以此征求（美国的）意见。哈里曼说"绝不能接受"而加以拒绝。于是，斯大林便退让一步，于12日任命捷列维扬科中将为苏联的驻日代表。14日（华盛顿时间），美国政府发布的《一般命令第1号》指定千岛为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受降的地区之一，但这并不是整个千岛，而是把美苏海军作战地区的分界线以南划归美国太平洋舰队管辖。斯大林不仅要求整个千岛，而且还要求将北海道的北半部（留萌至钏路一线以北，包括这两个城市）也由苏联远东最高司令管辖。他指出，关于北海道北半部的问题，"众所周知，自1919年至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因此，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上没有任何占领地区，俄国的舆论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因而"这个问题对于俄国的舆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斯大林的要求是想象德国一样对日本也实行分割统治。这种要求虽然是意图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导国家之一而自豪地对波茨坦宣言所倡导的日本民主化进行彻底的监督，但他却试图诉诸俄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实现这种分割统治，这里仍然显示了他的民族主义偏向。美国接受了斯大林关于千岛的要求，但却断然拒绝了对北海道的分割统治。

早就决心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看到苏联的动向，其决心更加坚定。8月12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最高统帅，13日，向麦克阿瑟发布了有关占领日本的手续的命令。命令指示："自投降之

时起，统治国家的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限即从属于阁下，为完成投降条款，阁下可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进而指示：“阁下应对为在日本强制实行投降条款而由有关盟国分派的所有陆海军行使最高命令权”。杜鲁门接着在14日发布了《一般命令第1号》之后，又于18日批准了国务、陆军、海军三部的政策调整委员会所通过的有关占领日本基本方针的文件：《战后占领日本本土的各国部队的组成》。该文件强调说，关于对日本的占领，美国将同参加对日作战的各盟国进行协商，各盟国将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及统治和占领政策的制定，美国则负责实施占领政策，因此各占领国所提供的部队将编成统一的部队，由美国任命的司令来指挥，并把日本作为一个单位(unit)来统治，而不象德国那样划分占领地区。21日，美国政府呼吁各盟国，参加设想的对日占领的国际管理机构——远东咨询委员会。29日，杜鲁门向麦克阿瑟送达了概括阐述对日占领的基本政策——题为《日本投降后合众国初期的对日政策》的文件。这样，对日本的占领在表面上采取了由盟国共同占领的形式，而实质上则以美国的单独占领而开始。

477

第二节 占领和占领政策

五 占领政策

战败的日本将被置于盟国军事占领之下，但实际上占领部队尚未进驻。日本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期间，想要决定将来重建的方向。统治阶级最焦思苦虑的是怎样保存天皇制的问题。8月15日，天皇广播了《终战诏书》，但对“战败”却只字未提，反而强调说：“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他国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以天皇诏书发动的十五年战争，把亚洲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而在这里却一味掩盖这次战争的侵略性，企图完全回避他自己对战争的责任。他

还认为，日本并未战败，而是为了从"残酷之炸弹"下拯救"人类之文明"才结束战争的。天皇还断言："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波茨坦宣言并未肯定维护国体，把这一切委之于"国民所自由表明的意志"，而天皇竟把维护国体作为既定事实加以广播。为了压制抗战派而实行投降，即使有强调维护国体的必要，但只强调维护国体，而对于适应波茨坦宣言的民主化纲领却只字不提。在这次天皇广播中，仍然贯穿着直到战败的最后时刻，还要顽固地保持全能君主面皮的天皇制理论。

无论是决定投降的铃木内阁，还是接替铃木内阁于 1945 年 8 月 17 日成立的东久迩宫内阁，都把心思倾注在维护国体方面。继天皇广播之后，铃木内阁发布内阁告示，强调说："今国民所应一致努力者在于维护国体"。8 月17日，东久迩宫内阁首相稔彦王在其首次首相广播中，只字不提"战败"，而用了"收拾"战局这种说法。并强调这一切都是托庇于"国体之恩"，竟把战败也利用"国体"来加以庄严化。甚至对于曾在日本铁蹄蹂躏之下的中国人民，他还要求"互相不计胜败"进行交往。28 日，他会见内阁记者团时强调说："我相信全体国民总忏悔是我国重建的第一步，是我国团结的第一步"，企图完全抹煞统治阶级对战争的责任。

激烈战争的变化使(日本)国民战战兢兢，而战败和投降则是出乎意料的结局。国民不知所措，完全陷入"虚脱状态"之中，而面对被敌国占领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命运，只好在新的不安之中度日。而且，从战败那一天起，国民的生活就开始急剧恶化。战争期间勉 478 强支撑过来的国家统制，随着战败而崩溃，通货大幅度膨胀，国民生活必需品不能实行配给，反而流入黑市。国民为当天的生活到处奔波，已没有心思考虑如何重建日本了。

民主势力本应站在国民的立场上给国民指出重建的方向，但它们还未从战争期间的镇压中恢复过来。许多社会主义者还身在

缧绁之中，幸免逮捕而能自由活动的人们，也只刚刚摆脱孤立和分散状态而想要恢复相互间的联系。

政权依然掌握在保守势力手中。战争末期，1944年7月间，策谋打倒东条政权的集团，和在1945年2月策划实现和平的集团，构成了战后政治主体的主流。他们大都是美国所期望的“稳健分子”，他们充当了政权的负责人，和前来占领日本的盟国打交道。

六　占领的开始和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1945年8月28日，美国先遣部队飞到厚木机场。接着，30日，麦克阿瑟飞到日本。日本被置于军事占领之下。为了掩饰单独占领，美国要求盟国派遣占领部队，但除了英联邦派了少数部队到广岛县的吴市以外，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盟国始终未派一兵一卒。苏联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美国司令官的指挥之下。中国虽然被分派进驻名古屋，但蒋介石对内战忙得不可开交，根本谈不上派出占领部队。于是，美国基本上完全实现了单独占领。

9月2日，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投降书。从这时起，日本的天皇和政府的权力就从属于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了。

明治维新以后七十年来，以世界史上罕见的速度发展并扩大的“大日本帝国”，于此崩溃了。日本帝国主义所获得的台湾、朝鲜、满洲、库页岛南半部以及南洋各岛等全部殖民地，一下子都被剥夺了。北方的千岛和南方的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以及冲绳岛，尽管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而不是殖民地，也被剥夺了。以亚洲“霸主”自诩的大日本帝国，被推回到半个世纪——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日本。战前领土六十七万八千平方公里中的百分之四十三，一刹那间就丧失了。现在，日本人被封闭在三十八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面积还不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四十万平方公

里)。也就是说，在这块与加利福尼亚州大致相同的土地上却住着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人口六百九十万人的十一倍以上的日本人。9 月12 日，麦克阿瑟接见美国记者团时说："这次战争的结果，日本已沦为第四流国家"。

正如把"战败"一词故意称为"终战"一样，日本政府把"占领军"一词也故意说成"进驻军"。这是为了遮掩天皇权力从属于麦克阿瑟这一事实，继续维护国体的光荣。 479

七 总司令部

占领部队空降日本时，美国为防备万一，曾部署了实行军事管制(直接统治)的准备。刚刚签订投降书的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惊慌万状，向总司令部请求取消军管。准备实行军管乃是为了防备日本国民的抵抗，但是美国并没有遇到这种抵抗。与中央政府已经毁灭的德国不同，盟国毕竟还是承认日本政府的存在，签署投降文书也是与日本政府之间进行的，因此，麦克阿瑟理解到，如果不以日本政府为媒介而实行直接统治，将给日本国民带来极大的不安。他接受日本政府的要求，取消了军管，对于日本的占领统治，确定了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针。

总司令部的正式名称是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 SCAP)，但关于总司令部的构成，麦克阿瑟则受到华盛顿的全权委派。他首先在身边起用了巴丹集团。所谓巴丹集团，是战争初期麦克阿瑟被日本军打败、从菲律宾的巴丹撤至澳大利亚时与麦克阿瑟一起撤退的军官们，人数据说有十四名或十七名。其中，在麦克阿瑟身边起重要作用的是惠特尼(Whitney, C.)准将和威洛比(Willoughby, C. A.)准将。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统治是以总司令部和作为实力部队的第八军为两翼来进行的，前者组成民事幕僚部，

后者组成军事幕僚部，惠特尼是前者的核心局—民政局(GS)局长，威洛比则担任后者的政治部队即负责情报的参谋第二部（G2）部长。律师出身的惠特尼和纯属军人的威洛比，分别代表美国的民间精神和军人精神，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民主主义的前进类型和反动类型，对麦克阿瑟竞相表示忠诚。按照波茨坦宣言，麦克阿瑟负有必须使日本民主化的最高任务，因此，在占领初期，较多采纳惠特尼的献策，进行了改革。

筹划并推动改革的中心人物是罗斯福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虽然身处美帝国主义的范围内，但体会到对法西斯进行斗争的民主主义理想，因而体现了波茨坦宣言的精神。他们抱着使命感，想在日本实现波茨坦宣言的宗旨，为此精力充沛地进行活动。不过，他们在这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于美国来说，对日战争的早日结束是出乎预料之外的。美国本来预定在1945年11月发动九州南部的登陆作战（奥林匹克战役），在1946年3月发动关480 东登陆作战（王冠战役），来结束对日战争，但原子弹的投掷和苏联的参战导致了日本提前投降。美国还没有完全作好对日占领的准备。新政派的人物还没学好日语，对日本的风俗习惯也几乎还未研究。然而他们又必须在有限的占领期间内完成日本的改革。因此，他们十分焦虑，要与时间竞赛，也没有余力去注意日本方面的意见和反应，就想把改革政策强加于日本政府。围绕着总司令部的军人精神和民间精神的对抗，也给改革政策带来了混乱。在占领组织中担任骨干的麦克阿瑟亲信的军人们，每每对改革政策漫不经心，不甚了解。经济科学局本是指导财政经济政策的重要机构，但据说第二任局长、身经百战的麦卡特（Marquat, W. F.）少将最关心的却是如何复活日本的职业棒球团。他们相互嫉妒，为了排挤对方而策划阴谋。他们的这种对立与思想上的对立纠缠在一起而更加激化了。人事常常变动，随着定期升级而来的调动

频繁也使改革受到不少限制①。

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体现了波茨坦宣言的新政派人物毕竟还是跨过不相信能把民主主义移植到日本的格鲁和知日派而前进了。总司令部是在陆军部的管辖之下，国务院在总司令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反而很小。国务院派来约翰·谢伟思(Service, J.)和乔治·艾奇逊(Atcheson, G. J.)两人在总司令部充当政治顾问，但这两个人都不是日本派而是中国派。日本派在日本投降过程中对决定对日政策曾有很大影响，但在实施改革阶段却失去了它的影响。

日本方面与总司令部相对应的机关是终战联络事务局（终联）。这个终联是在占领军进驻之前的8月26日，作为外务省的省外一局而设立的，最初由外务官僚冈崎胜男担任局长。10月25日，总司令部发布指令，停止日本的外交职能。接着，31日，指令全面停止日本国外的外交活动。虽然外交职能已经停止，但外务省这个机构却保存了下来。外务省保存下来的最大职能，是要为即将到来的媾和作好一切准备。11月，外务省设置和约问题研究干事会，于1946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始讨论媾和对策。政务局估计占领时期将为二年，因此媾和时期将在1947年下半年，而条约局则认为将在五年以后②。随着内阁情报局的废除，外务省于1945年12月再度开始情报活动，并为此设置情报部；1946年3月，为了准备将来恢复外交活动，又设置了培养外交官的外务省研究所。

八　占领政策

481

总司令部的改革政策从言论政策开始。1945年9月10日，总

①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经济上的回顾》，见C. K. 古德曼(Goodman)(编)：《美国对日占领回顾》，《国际研究》，东亚研究丛刊，第2辑，亚洲研究中心，堪萨斯大学，1968年，第12—13页。

②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7，《旧金山和约》，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第21—22页。

司令部发布了关于言论及新闻自由的指令，明确表示对言论只允许“最小限度的限制”，同时要求“禁止妨碍公共安宁的报道”。总司令部的这种态度立即暴露了他们对民主主义的特殊见解。他们一方面批判日本政府过去对言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企图封锁一切被认为是不利于占领的言论。总司令部的检查极其严格。如果是军事占领，当然要对言论自由加以一定的控制，但总司令部对言论的控制却远远超过了军事占领所要求的程度。对于只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自由，他们是保护的，但对于批判他们所企求的秩序的言论则毫不客气地加以取缔。他们完全禁止向国民报道原子弹带来的惨祸，在工潮盛行时也常常禁止这方面的自由报道。总司令部对言论的控制，在压制日本人民自发的自由、民主的活力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美国政府在9月22日公开发表的政策性文件:《(日本)投降后合众国初期对日方针》中，概括地说明了改革政策。占领的目的在于实现“解除武装及非军国主义化”。解除武装是走向非军国主义化的前提条件，而非军国主义化又具有“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这两个侧面。非军事化是要清除军国主义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大力压制那种体现军国主义及侵略精神的制度。民主化则要向日本国民中导入代替旧制度的民主主义制度(基本人权、议会制度、和平经济)，如果说前者是破坏过去，那么后者可以说是建设未来。民主化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在日本建立“和平而负责的政府”。美国在占领中实行间接统治，这是“打算利用日本现有的统治形式，而并不是要支持它”，因此，并不是要最高司令官“压制进步性的改革，支持天皇或其他日本政府机关”。

然而，9月27日，麦克阿瑟把天皇邀请到总司令部并会见了他。看到日本国民对天皇忠贞不二，麦克阿瑟认为，不能只是“利用”天皇，而且还要“支持”他，这是对日本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

最方便的方法。麦克阿瑟既然表明了支持天皇的意图，也就表明了要把“进步性的改革”控制在一定限度的意图。

美国究竟要把民主化政策推进到什么程度，日本保守势力对此深感不安，看到麦克阿瑟会见天皇，就放心了。而在公开发表的《对日方针》的刺激下，美国政府虽有着手进行民主化的意思，但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宣言的意义却并不理解。东久迩宫内阁拒绝废除压制性法令和释放政治犯，因此，当总司令部要求废除包括禁止自由议论天皇在内的一切压制性法令和释放政治犯时，它就不得不总辞职了。10月9日成立的币原内阁，由于其前任内阁所标榜的维护国体的口号已行不通，就反而打出所谓“确立民主主义政治”的口号，想抢先实行民主化，并把民主化局限在自己希求范围之内。但是，总司令部毫不客气，于10月10日发布了五大改革令(解放妇女、工人团结权、教育的自由主义化、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经济民主化)，并以此为开端，连续发出了关于民主化的指令。 482

当在总司令部中筹划改革政策的美国新政派人物越过了本国的日本派时，也就越过了日本的自由主义稳健分子，日本派正是企图把日本的未来寄托在这些稳健分子身上。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的稳健分子每每试图对总司令部的改革政策进行抵抗。币原内阁的首相币原喜重郎曾是币原外交的推行者，是最典型的稳健分子之一。因为币原内阁打算抢先着手改革也是抵抗的一种形式，所以当总司令部进行改革而要修改宪法时，币原内阁的国务相松本烝治就拿出松本方案来对抗，死不松口。总司令部逐一排除这种抵抗进行改革，但这些都说明，新政派人物的波茨坦精神和日本稳健分子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同时也表明，为了在日本贯彻波茨坦精神，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必须拿出什么样的强制手段。总司令部的强制手段固然有些是出于新政派为抢时间的焦虑；但对日本来说，强制的最大意义则在于波茨坦精神同日本

稳健分子的自由主义之间有很大分歧，因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这一深刻的事实。这种强制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总司令部在日本人民中间拥有能够适应、或者想要适应改革的势力。在总司令部内，也并不是都感到焦虑而急于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中级职员中，也有想要积极同日本人对话的人物；他们有的对于司令部打算实施的政策，在日本人民中会受到什么样的抵抗，能够准确地作出判断[①]。他们信心十足地排除日本政府的抵抗，并确信日本人民对他们的支持而进行了改革。总司令部的政策有时起到抑制日本人民自发的、自由的民主活力的作用，但也有时在日本人民中激发了民主化的思想和行动。只有当这种思想和行动超越了总司令部的意图而向前挺进时，他们才断然表示了压制的态度。

九　军队的解散

解散军队是民主化政策的前提，而要解散国内外达五百八十九万的军队，确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国内军队的解散进行得还算顺利。10月15日，麦克阿瑟趁废除军部统帅机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之机，发表声明说："日本全国武装兵力解散问题今已告终，483 日本军队已不复存在。"并宣布说："从任何意义来说，日本均已不能算作世界强国。"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变成了第一、第二复员省，但为了准备他日重新武装，总司令部在复员省中留下了日本军队的核心[②]。

国外部队的解散和复员，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驻

① 赫伯特·帕辛(Passin)：《占领的遗产——日本》，东亚研究所特刊，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版，第13页。

② H.E. 怀尔兹(Wildes)：《东京的台风——占领及其余波》，麦克米伦出版社，1954年，第307—309页。詹姆斯·E·奥尔(Auer)：《日本海军力量在战后的重新武装，1945—1971》，普莱格出版社，1973年，第69页。

外官兵约有三百万——加上非官方人员约有六百五十万——，有的被定为战犯；有的即使可以复员，也被扣留从事强制劳动；接运复员人员的船只配备有时拖期；战败的苦头，这些人尝的最多。其中有些横遭厄运，在当地被卷入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尤其是那些被驱使充当反革命武装力量的人们。

在朝鲜，占领三八线以南的美军，企图让日军官兵和日本官吏维持当时的治安。但因朝鲜人强烈反对，美军这一打算未得实现。

在中国，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内战势在重新开始，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各地展开了对日军武器和资材的争夺战。《一般命令第1号》指示，日军要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投降，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把共产党军队视为匪军，警告日军说，如果向共产党军队交出武器资材，就是日军的严重失信。日军在各地遇到共产党军队来解除武装就进行抵抗，江苏省扬州北部地区的日军守备队，直到1946年还在共产党军队的包围下继续抵抗。不少投降的日军官兵被国民党军队用来围剿共产党军队。山西省的阎锡山不仅为了利用日军的武器资材，而且为了利用日本军民的技术而把他们扣留下来，迟迟不让他们复员。

在越南，英军在"法律和秩序"的幌子下利用日军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革命（民族独立）终于1945年9月2日发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但格雷西（Gracey, D. D.）将军指挥下的英军旋即在西贡登陆，在北纬十六度线以南地区解除了日军武装，释放了盟国俘虏及扣留者，并企图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手里。卷土重来的法军在英军援助下，赶走了革命政权，于9月23日掌握了西贡市的统治。越南人民对此进行了抵抗。格雷西将军严厉要求日军维持法律和秩序，并担起解除越南人武装的任务，还威胁说，日军如果犹疑，就定为战犯。日军就这样被强行

纳入反革命的部署之中，但日本士兵中也有参加革命军而同英法军队作战的。

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哈达等民族主义者领导的独立活动，484 于1945年8月17日，发表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但是，9月29日，在盟军荷属东印度司令官格利斯特逊指挥下，英国和荷兰的军队在雅加达登陆，他们为把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交还给荷兰而开始了战争。对此，印尼军进行了抵抗。格利斯特逊命令日军攻击共和国统治的万隆及其他城市。从11月至12月，英荷军和印度尼西亚军的攻防战日益激烈，许多日军官兵被卷入两军的冲突之中。然而，在这里，也有投入印度尼西亚军而参加了捍卫共和国的战斗的日本兵士。

把六百五十万名横遭厄运的官兵和非官方人员遣送回本国，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撤退援助厅编辑的《撤退援护记录》形容它是“人类经验中最广泛的集团人口大移动”。从南朝鲜、满洲、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支那、泰国、婆罗洲、西里伯斯、新几内亚、太平洋中部各岛的撤退大体在1946年内搞完，从北朝鲜、苏门答腊、爪哇（印度尼西亚）、缅甸的撤退大体在1947年内搞完。只有库页岛和西伯利亚的苏联地区推迟了，很快就成了很大的政治问题。

十　天皇制的解体

从外地复员的军民经受了苦难的岁月，而在日本，总司令部正在加速民主化。

1945年10月10日，总司令部命令释放狱中社会主义者。他们分别开始了旨在结成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其中，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天皇制”口号，立即使对天皇制的议论沸腾起来。为了把日本的民主化控制在自己所要求的范围之内，总司令部决心必须早日完成民主化。

使总司令部加速民主化的另一个理由是，形势要求设置占领日本的国际管理机构。美国最初提出的远东谘询委员会，苏联尤其不赞成。苏联所要求（设置）的不是谘询机构，而是位居总司令部之上的决策机构。10月30日，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远东谘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邀请苏联参加，但苏联没有参加。斯大林认为，在对日政策上，美国把苏联"不是当作盟国的一员，而是当作卫星国来对待"。驻东京的苏联代表也不隐蔽自己的不满，说他受到的待遇犹如"一件家具"。美国表示了若干的让步，但最后决定权却保留在自己手中。在这个条件下，决定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设立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来代替远东谘询委员会。可是，如果这个对日管理机构实际成立起来，总司令部将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因此，总司令部认为，必须在对日管理机构成立以前把民主化确立下来。

以10月10日五大改革指令为开端的民主化措施，进而发展到解散财阀、土地改革，至12月15日又发出了国家与神道分离的指令。21日，总司令部发表声明，强调说，迄今为止，最高司令官已就"废除直接间接对日本国民施加恶劣影响之一切障碍，发出了各种指令"，而"关于神道之指令则是对新政府应采取何种形式之最后推进措施"，"今后发布之指令，大体将属于为使彻底理解和履行前已明确宣布之基本公约所必需者"，这就是宣布民主化已告一段落，天皇制已经解体。即"今后之最大问题，乃日本国民及彼等所选出之官员如何掌握这些指令之精神"，因此，"今后，教育和领导应在本司令部的业务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485

关于对日管理机构问题，12月16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正在作出结论。26日，会议结束，决定设立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但总司令部却在对日管理机构设立之前抢先声明，日本民主化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28日（日本时间）宣布设立对日管理

机构，总司令部又发表声明说："由于一系列的指令，（日本）旧体制的外壳已被一一剥除，封建制度的魔掌已逐渐除掉"；它列举了对"基于天皇制的强权统治的基础"所给予的打击，并强调说，"这样，借助现已被取消或被摧毁之前述各种旧体制并通过封建官僚进行之统治，乃天皇制所赖以形成"，"因此，随着此类统治之废除，天皇制也将被摧毁并消灭"。总司令部在对日管理机构成立之前，抢先指出天皇制的基础已经消灭，实际上是想完全取消这项基本任务。总司令部既不顾日本国内民主化的要求，也不顾国际上民主化的要求，就想把日本的民主化限制在自己的主动和范围之内。

十一　制定宪法

由于宪法的制定，为民主化而进行的改革基本即将达成。而宪法的制定也体现了总司令部在对日管理机构成立之前抢先下手的方策。

宣称天皇制已经解体的总司令部，于 1946 年元旦让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①。天皇在宣言中否定了"把天皇看作是活神仙，并把日本国民看作是比其他民族优越，进而认为日本民族具有应当统治世界之天命的虚构观念"。对于自己的战争责任，天皇则仍然只字不提。不过，否定了支撑旧天皇制的侵略思想体系，也就是自我宣布改变国体，就此而言，"宣言"是划时代的。麦克阿瑟立即发表了自卖自夸的声明，说对天皇的宣言"非常高兴"，并强调说，天皇"将对日本国民的民主化发挥领导作用"。他公然豁免了天皇对战争的责任，反而认为天皇是站在民主化前列的旗手。

486

豁免了天皇战争责任的总司令部，却对日本国民开始采取开除战争责任者公职的措施。围绕着开除公职的问题，总司令部分

① "人间宣言"：人间，日语意为人类，人。即天皇发表声明，否定天皇之"神格"，而承认自己是普通人。——译者

裂为两派。G2① 希望以去年 12 月关于天皇制已解体的宣言作为民主化政策的结束，反对采取开除公职措施。GS② 则主张，虽然天皇制解体的基本工作已经完毕，但为了彻底实行民主化，还要继续推行民主化政策，因而要求采取开除公职措施。最后，GS 占胜，但两者的夺权斗争却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公开化了。

从 1 月 4 日开始的开除公职，大体施之于保守阵营，民主阵营受到的打击不大。民主阵营一时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召开了创立或重建的大会，但还是远远落后于形势。共产党把占领军说成是"解放军"，误解了"占领"实际上是美国的单独占领，未能明确认识到占领政策中早已暴露的美国民主的局限性。共产党继续高喊打倒天皇制，却追随总司令部搞的天皇制解体的脚印亦步亦趋，未能正确地向国民讲明其意义。共产党在前一年的 12 月 8 日，在全国各地召开了追究战犯的人民大会，志贺义雄高喊："只有共产党为反对战争而继续坚持了斗争"，但对自身未能阻止战争这种阶级责任没有作深入检查，反而主张与"一亿人总忏悔论"实质相通的"一亿战犯论"，结果脱离了国民群众。共产党和社会党都主张建立统一战线，但因互相争夺领导权而未能建成。多数国民寄希望于曾同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野坂参三的国际主义精神。1946 年 1 月 12 日迎接他回国，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指望能结成统一战线，但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互不信任无法消除，统一战线运动终归失败。

总司令部继续把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继续推行了彻底民主化的工作，可是，远东委员会将于 2 月 26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这就促使他们下了新的决心。远东委员会章程决定："凡规定日本国的宪政机构或根本变革其管理制度，以及规定全盘变

① G2：即前述之驻日美军第八军参谋第二部。——译者

② GS：即前述之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译者

更日本国政府的指令，只能在经过远东委员会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发出”。总司令部认为，为了不让远东委员会插手日本的“宪政机构”，必须抢在远东委员会开会之前，用制定宪法的方法把日本的宪政机构的方向确定下来。

于是，总司令部命令币原内阁提出宪法修改方案。从去年就已经开始考虑宪法修改方案的币原内阁，于2月1日向总司令部提出了由松本烝治国务相草拟的题为《宪法修改要纲》的修改方案。然而，总司令部对这个立足于天皇主权论的《要纲》的保守性加以批判，并单独另行开始草拟一个草案。草案很快即在2月10日拟就，并经麦克阿瑟批准。草案（即所谓“麦克阿瑟草案”）规定，在主权在民的原则上，实现“君主立宪制”。松本国务相和外相吉田茂虽仍坚持《要纲》，进行抵抗，但是无用。总司令部要求币原内阁在20日前答复是否赞同麦克阿瑟草案，并威胁说，若不见回答就向国民发表麦克阿瑟草案。他们确信，大多数日本国民将支持麦克阿瑟草案。币原内阁要求延宽期限，以便讨论是否同意。21日，麦克阿瑟邀请币原首相，强调说：“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改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天皇的地位”。25日，币原内阁终于决定同意。3月6日，公布了新的《修改宪法草案要纲》。

487

远东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于2月26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这时，总司令部已经成功地让日本政府采用了麦克阿瑟草案。币原内阁的书记官长楢桥渡后来才明白，“这个宪法乃是天皇制的避雷针”①。

1946年6月20日起召开的第九十届临时议会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于10月7日取得贵众两院的通过，于11月3日公布，

① 佐藤达夫：《日本国宪法诞生记》，大藏省印刷局，1957年，第76页。

并从1947年5月3日开始实行。日本国宪法（新宪法）改变了旧宪法的天皇主权说，确定了国民主权："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同时"国政来自国民严肃的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关于外交方面则着重明确了以下各点：

第一，作为日本国家的基本原则，新宪法强调了和平主义。新宪法的前言表明了日本国民对和平主义的决心。

第二，新宪法放弃战争，在第九条中誓约"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从而得出了"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结论。据说这个第九条是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经币原首相主张而加入的，他就其意图作了如下的说明：

"宪法如此规定，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任何宪法中都没有前例，在仍然继续对原子弹及其他强有力的武器进行研究的今天，竟要放弃战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梦想。但谁也不能保证，将来随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不会发明比原子弹的破坏力还要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新武器。到了那个时候，几百万军队、几千只舰艇、几万架飞机都将完全丧失威力，在短时间内，交战国的大小城市通通变成灰烬，数百万居民一个早上全被杀光，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今天我们高举宣布放弃战争的大旗，在国际局势的辽阔原野中虽然是特立独行，但是，全世界早晚会从战争的惨祸中觉醒过来，终将同我们共树一帜，从遥远的后面追赶上来，这种时代是会出现的。" 488

丸山真男在介绍币原的这个发言并探讨其历史意义时说："它预见到第九条在热核武器时代的新意义，毋宁说是把国际社会中的先锋使命托付给了日本"①，币原的这个设想，在考察第九条的

① 丸山真男：《关于宪法第九条的若干考察》，《世界》第235号，1965年6月，第54—55页。

意义时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在确定新宪法的第九十届临时议会上讨论第九条时，却几乎只讨论了自卫权的问题。其后，币原内阁换成了吉田内阁。吉田首相的说明是极其含糊其词的。他有时说“作为自卫权的战争、以及交战权，均已放弃”，对自卫权本身似乎是承认的；有时又说“似乎行使国家正当自卫权的战争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我认为这样一种想法是有害的”，似乎连自卫权本身也否定了，结果，政府的官方见解就归结为，根据法律原理，虽然有自卫权，但按照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不保持战斗力”、“不承认交战权”，因此“不能进行自卫战争”。

第三，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新宪法赋予国会监视和监督外交之权。国会中作为常任委员会而设置的外交委员会，在其日常工作中监视并监督外交；预算委员会则通过审议预算来监视并监督外交。条约的审议也是外交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对特别重要的条约（例如媾和条约或安全保障条约）的审议则由特别设置的特别委员会来担任。条约的缔结与处理一般外交事务同属内阁的事务，但规定内阁“必须在事前或根据情况在事后获得国会的承认”，因此条约只有取得国会的同意才能批准。批准则是通过天皇“认证”批准书才算完毕。不过，天皇的“认证”是要通过内阁的“建议和承认”来进行的，所以这也不过是流于形式的一种仪式罢了。与规定条约需经国会同意的新宪法的条款相对应的，是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所缔结之一切条约及国际协定应尽速在秘书处登记，并由秘书处公布之”，还规定，“当事国对于未经依本条第一项规定登记之条约或国际协定，不得向联合国任何机关援引之”①。联合国宪章不是象过去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八条那样，只谈条约登记与“约束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58页。——译者

力”的关系，而是干脆说不登记者“不得援引之”。二者的不同在于，国际联盟对未登记的条约的法律地位还有争论，而联合国则为了消除争论的余地，对于有无约束力则完全听任各国自行决定，只是当事国不能在安全保障理事会或国际法院这类联合国机构中援引未经登记的条约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虽然有这样的差别，但联合国宪章显然是国际联盟盟约的延长，而在试图防止秘密外交和秘密条约，实现外交的民主管理方面，两者则是一致的。

489

新宪法还留有含糊不清的问题。天皇在外交上的国事行为除了认证批准书之外，还有公布条约，认证大使及公使的国书，接见外国大使或公使等。这些固然都是要在内阁的建议和同意下来进行，但特别是接见外国大使或公使等，使人容易发生仿佛天皇是处在“元首”地位的错觉。天皇同外国元首之间互致庆吊电报，或者出访各国同元首联欢，都给人们以似乎天皇是代表国家的元首的印象。虽然留有这样含糊不清的问题，但新宪法勾消了天皇的大权，并与解散军部一起废除了统帅权，这就使日本日后恢复独立、恢复外交时能够排除过去的双重外交，创造了法制上的条件，这一点在外交史上是划时代的。

十二　媾和提上日程

占领日本的基本任务已告结束。麦克阿瑟在1947年年初回顾说：“去年正是法制改革的一年，在文明社会发展历程中，几乎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时期”，并指出，“为了提高个人的权威和福利，为了在日本建立自由社会而决定实行的各种改革，其能否成功，最终的关键在于日本国民本身履行自己新的政治责任的方法，在于国民选择的领导者的性格，以及该领导者是否忠实地保护神圣的国民权利并力求伸张国民的利益”。麦克阿瑟所谓的“法制改革”虽然局限在美国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内，但它正在实现波茨坦宣言所

要求的“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和“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①

土地改革通过1946年2月的第一次实施和10月的第二次实施，基本上推翻了地主制度。工会法早已于1945年12月公布，并于1946年3月开始实行。在实施新宪法的1947年上半年，法制改革也接近完成。与新宪法一起构成国家制度的地方自治法，于1947年4月公布，与新宪法同时实行。为了在新宪法之下建立议会而制定的请愿法和国会法，分别于3月和4月公布，并与新宪法同时实行。组成新的自治体和国会的首长及议员的选举在4月间相继进行，5月间召开了第一届国会。第一届国会指定社会党的片山哲为新宪法之下的第一任首相。为了组成与立法机关并行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于4月公布了行政官厅法和法院组织法，并与新宪法同时实行。稍后，为了培养新宪法之下的政府机关职员以代替天皇制之下的官僚，又在10月公布了国家公务员法（于1948年7月实行）。其间，为了推行新的教育制度，于4月实施了教育490 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六三制）；为了工人的劳动条件而于9月实行了劳动基准法；为了解散财阀，于7月和12月实行了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过度集中法；为了废除作为“民间国体”的家长制度而修改了民法，于12月公布，从1948年1月起实行；为了建立新的警察制度的警察法，于12月公布，从1948年2月开始实行。日本国民根据其“自由表明之意志”，在1947年上半年基本上建立了具有和平倾向及负责的政府，并在1947年后半年至1948年初期间，使这一工作趋于完成。这时，美国该提出媾和问题了。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77—78页。——译者

麦克阿瑟在1947年初，感到占领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仅如此，他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占领德国领土莱茵地区的经验确信，长期占领势必引起被占领国民对占领国民的强烈反感。因此，他认为应该提出对日媾和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日本的经济状况仍然非常不好。在以"二·一大罢工"① 为中心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下，1947年初的日本动荡不安。麦克阿瑟认为，为了解决日本的经济混乱和社会不安，也必须媾和；必须全面解除占领时期对日本实行的封锁，使日本完全回到世界贸易中来。虽然从去年 3 月已恢复了贸易，但限制仍很严格，并不足以解决日本的困难。2 月底，美国内务部长和议员团一行从国内前来东京访问时，他就对他们谈到对日媾和的必要，并派总司令部政治顾问艾奇逊返回华盛顿汇报了对日媾和的意见。

在华盛顿，以曾在战争末期在战后计划委员会中参与策划对日政策的博顿（Borton, H.）为中心，开始在国务院设置的委员会里起草对日媾和草案。它是以美苏协调为前提，内容严峻，规定在今后二十五年内禁止日本重整军备，把日本的政府和经济置于联合国的监督和监视之下。

然而，在对旧轴心国的媾和上，对德媾和已陷入了僵局。1947 年 2 月 10 日的巴黎和约实现了对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芬兰的媾和，但接着在莫斯科讨论对德国及奥地利媾和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却在 3 月 10 日陷于破裂；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的伦敦外长会议也同样破裂。在这种对德媾和陷于僵局时，美国无法使对日媾和具体化。华盛顿政府也就无法就对

---

① "二·一大罢工"，1946 年下半年起，日本各系统工人不断举行罢工，至年底发展为全国性的"共同斗争"，并计划在 1947 年 2 月 1 日举行全国无限期总罢工，因 1 月 31 日麦克阿瑟亲自下令禁止而遭受挫折。直接参加此次斗争的职工达四百五十万人。——译者

日媾和问题给东京的麦克阿瑟作出答复。

3 月 17 日，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媾和意见。他强调说，“我们与日本谈判媾和的时候已经临近”。他指出，媾和以后仍须继续对日本进行控制与领导，但这应由联合国来担当。他并没有想把苏联排除于对日媾和之外。关于对日媾和采取的形式，麦克阿瑟和本国的博顿委员会都是要全面讲和。正当麦克阿瑟公开发表对日媾和意见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宣布冷战①，把战时的“大同盟”彻底引向了分裂和对立。于是对日媾和成了悬案，占领长期化了，而且，媾和的形式便开始迅速向单独媾和（多数媾和）方向发展下去。

491

第三节　冷战和占领的长期化

十三　冷战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逐渐变成了“战争国家”。“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 这个词是美国著名记者弗雷德·库克(Cook, F.J.)模拟“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的②，说美国的军部“以前并不决定国策，其任务只限于执行国策”，而现在则是军部以大企业为后台，“对考虑与决策施加影响，决定群众的态度，并开始统治议会”。在战争期间的 1944 年 1 月，通用汽车公司的查尔斯·威尔逊(Wilson, C. E.)建议，大企业同军部要通过“永久的战争经济”结合起来，要求大企业任命退役大校作为联络员与军部进行联系，并主张“议会的作用必须仅仅限于只决定必要的资金”。当时库克就指出，军国主义已在美国建立起来。当美国拥有原子弹时，他又指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军

① 指 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参见后文。——译者

② 弗雷德·库克：《战争国家》，笹川正博译，《三铃丛书》46，1962 年。

部万能的时代已经出现。”当战争刚结束不久，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建议要就原子能问题同苏联签订协议而被驳回时，库克又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已变成了军事外交”。军部为了维持“军部万能时代”，不仅向大企业，而且向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派出了代表。国务院也不例外，毋宁说军人对国家机关的侵入在国务院最为显著。这样，就更有可能形成“军事外交”，库克是这样说的：

“……文官在迅速地销声敛迹。虽不能说已经‘绝种’，但至少，他们在过去的‘生息土地’上，正在成为默默无闻的少数种族。这种现象最显著地表现在国务院，把军人看作是外交工作的监督，已很快成了国务院的习惯。《华盛顿星报》在1947年2月报道：‘国务院的二十名行政官员中，有十人是最近几个月从军部调来的’，两三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在报道‘希尔德林（Hilldring, J. H.）上将被任命为助理副国务卿’时说：‘该助理副国务卿是带着国防部的二十六名助手前来赴任的’。早在事态如此清楚地发展之前，1947年1月的《陆海军公报》杂志就直截了当地把事态说成是‘如今，陆军事实上控制了外交’。军部侵入外交‘圣地’这一事实将产生的结果，只能是‘美国外交带来了强硬的军事性格，几乎丧失了进行和平外交的余地。’……” 492

——然而，世界的局势还未紧张到必须开展“军事外交”的程度。苏联在集中全副精力于战后的复兴。世界局势还不是那么紧张，却要展开军事外交，以维持军事万能的时代，这就只有人为地制造威胁，迫使国民感到不安，此外，别无他法。为了制造威胁，军部就利用苏联（作为借口）。就这样，“使用巧妙的恐怖战术，以迫使国民相信，美国正处于与苏联即将交战的紧急关头，国家的生存正面临危机”，其结果是“虽然当时在战后的世界上还未出现好战的风潮，但美国人则已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这种恐怖

战术正是冷战战术。麦克阿瑟后来离开日本，当了雷明登·兰德公司的总经理，1957年在斯佩里·兰德公司股东大会上发表演说，库克介绍了其中有趣的一段。

"政府以时局严重为名，经常把我们置于不安之中，煽动爱国狂热。如果国民不是盲目地同意政府所要求的庞大预算，政府就说，可怕的外国势力或者隐藏在国内的恶劣势力要毁灭我国。然而，回过头来考虑一下，这种非常事态似乎完全没有发生，甚至可以说只不过是胡思乱想。"

把冷战作为恐怖战术来宣布，这就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说。他说，希腊和土耳其正处在共产化的危机之中，为防止这一危机，他要求四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并强调必须从"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强加于各国自由国民的各种极权主义制度"中，"保卫他们的各种自由制度及其对侵略的态度"。他第一次使用了"自由的国民"这个词作为与共产主义国家对立的概念，号召维护"自由"，宣称要对共产主义进行全世界规模的斗争。这种冷战战术的具体目标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开始扩展到全世界的革命风浪中保卫资本主义世界。

接着，4月2日，美国又在安全理事会上通过了下述协议：把战前日本委任统治的太平洋各岛指定为战略地区，交由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该地区的统治国。把日本的委任统治地改为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在战争期间就有这个打算，它向联合国提出托管制度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正如用所谓"盟国占领"这种假象来掩盖美国单独占领一样，美国对日本旧委任统治地的单独统治，也是用所谓联合国集体负责这种假象来掩盖的。美国宣布冷战之后不久，不等对日媾和，就单方面地处理了日本的旧委任统治地，这表明冷战体制已很快开始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起

493

来。[①] 很清楚，即将来临的对日媾和早已倾向于单独媾和了。

十四　总司令部和冷战

尽管麦克阿瑟后来把向国民煽动"爱国狂热"的恐怖战术斥之为"胡思乱想"，但在作为最高司令官而君临于日本的当时，他也同样在日本国民中煽动了这种"胡思乱想"。《芝加哥太阳报》特派员马克·盖恩(Gayn, M.)曾参观过占领下的日本，说麦克阿瑟和总司令部有一种身处"第一道防线"的紧张情绪。[②] 他们这种紧张情绪，既与面对苏联有关系，也与日本阶级斗争的激化有关系，比在本国更为敏感。

1946 年，日本国民为生活而挣扎着。管理仍然紊乱，配给品奇缺，物价无止境地上涨。币原内阁于 4 月 22 日总辞职，但继任内阁却一时未能成立，出现了政治上的空白期，直到 5 月 22 日才成立了吉田内阁。

美、英、中、苏四国组成的对日理事会，于 4 月 5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麦克阿瑟在开幕演说中声称，"已经采取了履行波茨坦宣言所倡导的各项原则的一切措施"，企图根本不理这个理事会。理事会本是总司令部的谘询机关，然而总司令部并不打算征求英国和苏联的意见来解决日本国民所面临的困难，而是要利用理事会作为攻击苏联的场所。在日本政治上的空白期内，要求粮食的日本群众一再组织游行队伍包围首相官邸。共产党员总是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5 月 15 日，总司令部政治顾问艾奇逊在对日理事会上声明："美国不仅在美国国内，即在日本也不欢迎共产主义，我

① J. W. 道尔(Dower)：《被占领的日本与美国的潮，1945—1950》，收入E. 费里德曼、M.塞尔登合编：《美国的亚洲—亚洲与美国关系驳议》，文横书店，1971年，第155—164页。

② 马克·盖恩：《日本日记》，井本威夫译，《筑摩丛书》12，筑摩书房，1963 年，第204 页。

没有必要在此重申。”这个声明也就是盖恩所说的“第一次正式攻击，即认为日本的动荡不安，其背景是苏联。”总司令部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的态度立刻严厉起来。群众要求粮食的游行于5月19日发展成为粮食五一节了。麦克阿瑟在第二天，即20日，发出命令禁止游行，并对“在有组织的领导之下以集体暴力进行威胁的倾向有所增长的事实”发出了警告。他企图使未来的日本走上“中庸之道”。9月2日，他在纪念日本投降一周年的声明中，一面排斥“极端的意识形态”，一面强调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果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与思想的重建，那么对于谋求波茨坦宣言所企望的伟大的中庸之道的人们来说，一定会有不少的损失”。波茨坦宣言所指示的是要由日本国民自由表明的意志来决定日本政府的形式，并没有指示要采取“中庸之道”。麦克阿瑟如今已把波茨坦宣言降低为“中庸之道”，并把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摆到占领政策之上了。

494

1947年，在共产党和“产别会议”①（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领导下，从去年以来开展的官厅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使日本国内大为震动。麦克阿瑟新年致词中所强调的“自由社会”，其主张中就有了鼓吹中庸之道这种特殊内容。麦克阿瑟在二·一大罢工的前一天禁止了这次罢工。在这个禁止罢工的声明中，他下令说：“在当前日本如此贫穷和衰弱的情况下，不容许运用这样致命的社会武器”，并强调，“与眼前的总罢工有关联的人只不过是日本国民中的极少数分子”，还指出：“而且，这少数人却有可能象前不久由少数人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破坏一样，把大多数人投入灾祸之中”。他把共产党和具有战斗性的工会比作过去的军部。他命

① 产别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8月19日成立。当时包括二十一个产业系统，一百六十三万职工，与右翼之“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对立。其后，“产别”内部分裂，一部分人组成“新产别”，“产别会议”则于1958年2月解散。——译者

令吉田内阁进行总选举。新宪法在眼下的5月3日即将实行，总选举意味着将组成新宪法之下的国会。总司令部的GS就“公正的民主投票”发表了见解，强调不投共产党的票，对选举加以干涉，并公然开始把美国的民主主义强加于日本。在此以前，新闻界一直把社会党和共产党称为“民主势力”，现在则改称为“革新势力”，开始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排除于民主主义之外。4月25日投票的结果是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6月1日，成立了社会党与修正资本主义的日本民主党的联合内阁，即新宪法下的第一届内阁。麦克阿瑟在总选举后和新内阁成立后两次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支持“中庸之道”、“中间道路”和“中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右翼和左翼的“极权主义”之间的中庸；所谓“中道”，就是在自由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折中”。这固然是把不同的内容胡乱联接在一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说法都显露出，麦克阿瑟对共产党在总选举中遭到排斥是很放心的。

总司令部在与日本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开除了部内的“共产主义者”。对那些以新政派人物为中心而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人们，麦克阿瑟给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他形容这次开除是“麦卡锡(McCarthy, J. M.，参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之前的麦卡锡主义”。许多进步主义者离开了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显著地开始走向反动。总司令部用自身的反动化来推行占领政策的反动化，在这方面，他们也走在了华盛顿政府的前头。杜鲁门开始在华盛顿政府内拘捕共产主义者是在1949年，约瑟夫·麦卡锡本人掀起一场大风波是在1950年，而总司令部则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迫害“异端”[①]了。

① 原文为“魔女狩”，即witch hunt，欧洲中世纪教会把“异端”分子指为“魔女”，进行迫害。——译者

495

十五　被肢解的媾和政策

当总司令部正以身居第一道防线中的心情同日本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之时，华盛顿政府已在研究日本的经济独立问题了。当麦克阿瑟把日本的经济独立列为目的之一而提出对日全面媾和问题之时，华盛顿政府已经为解决日本经济独立问题而提出把对日媾和引向单独媾和的政策了。华盛顿政府的政策已经同这种倾向联系了起来，即与冷战政策相结合，在长期占领之下，把日本变成亚洲的工厂。

日本经济复兴所以一直没有走上轨道，固然由于日本政府和财界未能实行有效的政策，但也由于容许日本应有的经济水平一直未能确定下来。战败之时，1945 年 11 月，以总统个人特使身分来日的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Pauley,E. W.)宣称："除维持最低限度的日本经济所必需者外，均一律拆除"。所谓"最低限度"，他解释说，"这意味着不高于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生活水平"。1946 年 6 月，为了汇总赔偿计划的最后报告，鲍莱再度来日，于 11 月向总统提出了报告，并指出，日本因赔偿而"解除产业武装"之后所能容许其拥有的生产水平应是日本开始十五年战争之前的 1926—1930年的水平。然而，由于美苏两国的对立，赔偿计划不易取得一致意见。日本在满洲的工业设施原则上应归属于中国，但却被苏联扣留并运回本国。美苏两国围绕是否把苏联扣留的部分列入赔偿计划发生了对立。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得出结论，美国便于 1947 年 1 月宣布，决定即使在与苏联及其他盟国未能达成协定的情况下，也立即开始从日本征收赔偿，并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征收中间赔偿的计划，即授权麦克阿瑟可在应征收的日本赔偿中，征收百分之三十以下，作为中间赔偿。指令实际于 4 月 30 日发出，这只是征收中间赔偿，可见问题仍未解决。

然而，日本的实际情况使美国感到有必要对赔偿计划本身进行重新研究。占领给美国国民带来不小的负担。虽然占领费是以“终战处理费”的名义由日本政府来负担，但从1946年3月开始的日本小规模出口已不足偿付日本政府请求进口的粮食价款，只好作为援助，由美国的财政来负担。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副局长本菲尔德(Benfield)于1947年1月9日指出：“对日占领使美国国民每年要负担一亿八千八百万美元的税款”。尽管援助的贷款最终要由日本作为欠债来归还，但美国当前则不能不力求日本经济尽快独立起来。日本经济的独立，作为美国企业的商品和资本侵入日本市场的前提来说，也是必要的。1月24日，陆军部为重新研究赔偿计划，把一直处理德国赔偿问题的斯特赖克(Strike, C.)任命为对日赔偿评价委员。斯特赖克调查团网罗十一名第一流的工业技术公司的代表，在二·一大罢工前夕的1月28日来到日本，2 496 月18日以谈话形式发表了调查结果。斯特赖克团长说，即将向华盛顿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其基本内容是同意日本“国民将拥有在国内能自给自足，并能从外国进口原料的经济”，如暂以1950年作为目标，则1950年至1951年的工业水平应相当于“1935年时的日本人的一般生活水平”，因此，“这个报告同鲍莱方案有本质上的不同”。调查团反对为使日本“民主化”而进行的一切改革，说这将给“迅速达到独立的过程”带来“多余的困难”①。美国开始脱离“(占领)初期的对日方针”，并开始背离波茨坦宣言。与苏联一起批判美国对日政策的澳大利亚，开始攻击这种放宽赔偿政策所表明的美国单方面的对日绥靖政策，称之为“被肢解的媾和政策”(piece-meal peace policy)②。在实施日本新宪法的5月3日，麦克阿瑟

---

① 柯克：《权力的界限》，第512页。

② R. N. 罗斯克兰(Rosecrane)：《澳大利亚外交与日本(1945—1951)》，剑桥大学出版，1962年，第72页。

把（日本）国旗"归还给日本国民"，表示同日本国民和解，并允许在皇宫和国会大厦等地悬挂国旗。

美国这种"被肢解的媾和政策"进一步贬低了新政派人物在制定对日政策中的地位。斯特赖克调查团也是如此，"被肢解的媾和政策"大都是根据美国派代表团来日和调查确定的。新政派人物对前来日本的调查团虽然感觉怵惕，但对日政策却逐渐不通过他们而决定下来。新政派人物地位的降低与对日政策背离波茨坦宣言是相辅相成的。

十六　民族问题的提出

"被肢解的媾和政策"在冷战政策下，是与单独媾和政策一脉相承的。1947年5月8日，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Acheson, D. G.）在克利夫兰的德尔塔市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欧亚两大陆的最终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建德国和日本这欧亚两大工厂"，并强调，即使四大强国意见不能一致，为了实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复兴，美国也必须立即开始采取可能的行动。很清楚，在对德采取行动之后，接着就将对日本采取行动。

在5月8日同一天，国务院设置了政策计划委员会，作为制定世界性冷战政策的机构，并以曾任驻苏大使、对苏联有研究的凯南（Kennan,G. F.）为主席。凯南把美国的对苏政策叫作"遏制政策"①。其意图是要把共产主义遏制在苏联国境以内。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l, G.）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鼓吹由美国提供援助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7月2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保障法。国家安全保障法把陆海空三军统一起来，新设立国防部，并创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作为保障国家安全

497

① 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意思是要把"共产主义势力""遏制"在现有范围之内。——译者

的最高决策机构。9月2日，美国政府同美洲十八个国家签订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里约热内卢条约）①，着手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域性集体安全保障体系。

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政策，苏联于1947年10月5日与东欧七国及西欧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宣布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其第一次会议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公开承认世界已分裂成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两个阵营"，并号召各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主权，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阵营。

日本共产党可能是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号召的影响下，在1947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大会上，首次提出民族独立的问题。大会针对国际形势中"世界将被某一国的庞大垄断资本所统治的倾向"，指出"全世界的各民主主义势力，正在致力于维护本国主权，确立完全的独立与世界的和平"，并强调日本"正在被觊觎为外国资本的市场，因而也就正在受着最强烈的影响"。大会修改了过去的行动纲领：第一，要求"严格实施波茨坦宣言"；第二，主张"由人民来复兴经济和实现日本的完全独立"；第三，设想"组成广泛的民主战线，建立民主人民政府，反对反人民、反共的政府。"这样，共产党开始初步克服了曾把占领军误认为"解放军"的错误，但仍未能克服以前的国内革命论方面的缺点，即不提民族独立，只是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号召移植过来。野坂参三就曾说过：与其对抗占领政策，不如对抗国内保守势力来实现"日本的完全独立"，"国营的人民管理"才是"确保我国民族独立的途径"。把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战线单纯地规定为"民主战线"，也是这种缺点的表现之一。日本国内还没有找到真正对抗冷战和美国对日政策的道路。

---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519页。——译者

十七　日本政府的媾和设想

与共产党相反，片山内阁已经开始适应冷战了。麦克阿瑟的媾和意见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希望。1947年8月6日，片山内阁经阁议决定，把原来由外务省秘密进行的媾和对策准备，正式提上内阁议事日程，在外相领导下设置了国际委员会，并在外务省设置审议室，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社会党的片山首相把整个媾和对策完全交给了民主党的芦田均外相。芦田是外交官出身，日本政府的媾和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芦田的意见。

芦田外相在阁议决定之前的7月26日向行将回国的乔治·艾奇逊大使递交了反映日本政府对媾和的希望的文件，并请他转达华盛顿政府。芦田的意见书列有下述各项希望：(1)希望媾和会议不强制媾和，并在有日本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其内容应是日本能主动接受的；(2)希望媾和条约以大西洋宪章或波茨坦宣言所宣示的国际法准则为基础来制定；(3)希望媾和条约由日本自己来履行；(4)从安全保障的角度考虑，非武装的日本有必要加入联合国，因此希望规定尽快加入联合国；(5)媾和之后，占领军即使撤退，如有充分的警察力量则能维持国内治安，因此希望允许按人口比例相应增强警察力量；(6)希望废除占领下的在日外国人的特权地位；(7)关于波茨坦宣言所说的"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的归属问题，希望充分考虑日本本土与这些岛屿之间所存在的历史、人种、经济、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关系；(8)在决定赔偿时，希望允许日本经济的独立和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平；(9)为了帮助日本的恢复并对世界的复兴和安定有所贡献，希望对日本的贸易、海运、渔业等经济活动不加限制等等。[①]芦田在同一天也向GS局长惠特尼提出了同

①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7，第32—34页。

样的意见书，但艾奇逊和惠特尼都答复说碍难接受这个文件。然而，芦田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通过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局长铃木九万，于9月13日向即将归国的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Eichelberge, R. L.)提出了新的意见书。

芦田向艾奇逊和惠特尼提出的意见书，其设想还以非武装为前提，国内治安靠警察力量来维持，来自国外的危险，则靠联合国的力量。而在向艾克尔伯格提出的意见书中，对来自国外的危险则表示了要依靠美军力量这种新的设想。吉田茂当时不在内阁，但不久即再次担任首相，并把芦田意见书的宗旨加以具体化，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最初，据外务省的许多人观测：如果媾和后盟军留在日本，将会象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被占领的先例那样，成为一种为了保证履行和约的保障占领的形式。但是后来，我方也观察到：由于美苏关系进一步紧张，保障日本安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美国的看法也逐渐向'日本的安全保障是国际安全的一环'的方向转变。并且，日本本身的看法也倾向于：与其依赖在当时看来还不太可靠的联合国，则莫如直接依靠美国，以便在媾和后暂时保持国防。"

不过，吉田在此文之前不久曾写道："当时美国政府似乎对媾和后保障日本安全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设想"。而日本政府能够从他那里听到美国意见的艾奇逊大使，据说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日本的安全保障虽还没有成为现实的问题，但作为美国来说似乎有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日本向联合国要求保障其安全是适当的"。因此，吉田所谓依靠美国保障日本安全的想法是察觉到美国对安全保障的设想有所变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今日读来多少不无疑问。虽然如此，吉田对芦田向艾克尔伯格提出的意见书的内容还有如下的叙述： 499

"意见书的内容是：首先表明了日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

内骚乱镇压下去，然后说：'当此国际的不稳局势日益加甚之际，我们认为保障日本独立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以防备第三国的侵略，一方面从陆海两方加强国内的警察力量。日本国民希望至少在联合国能够按照宪章的规定实际发挥其机能以前，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个文件的设想是：美国应保持其驻在日本周围的兵力，一旦有事时，日本应提供可供美军使用的国内基地。所以虽非积极希望美军驻扎日本，但其方向却和后来形成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础的想法完全一致。"①

后来发展成日美安全保障体系的日本安全保障设想，其核心内容是在这时就形成的。

十八　冷战的开展和美国的对日政策

1948年，美国大力展开了冷战。上年12月伦敦外长会议的破裂，对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起了决定性作用。美、英、法三国与比、荷、卢三国一起把苏联排除在外，讨论了对德政策，于1948年6月1日，达成了包括德国参加马歇尔计划在内的重建德国计划的协定；接着，6月18日，西德实行了货币改革。24日，苏联断然封锁柏林以相对抗。东西方的关系顿时紧张。美国设想未来的战争是同苏联的"全面战争"(total war)，便以垄断核武器为其前提，制定了以运载核武器的空军为中心的军事战略。并设想全面战争的主要舞台是在欧洲，便于6月决定把B29飞机编队派往英国。1949年4月，为了与西欧十一国一起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而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着手组织包围苏联的军事同盟。对此，苏联首先于6月通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始批判想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南斯拉夫以整顿自己的阵营，1949年1月，宣布与

---

①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3卷，新潮社，1957年，第111—114页。译者补注：译文录自中译本第73—75页。

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六国一起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在冷战中把"亚洲的工厂"日本放在什么位置上，这是美国冷战政策的重要一环。虽然麦克阿瑟在1948年例行的新年祝辞中强调"日本的改造和重建已接近完成"，而华盛顿政府却正在重新研究"日本的改造和重建"问题。1月6日，陆军部长罗亚尔(Royall, K.) 在旧金山的演说中表明了美国新的对日政策的方向。他说："美国陆军的对日政策正在修改，俾能对付任何侵略威胁"，并谈到"我们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主义，使 500 之独立，并由此而在阻止远东可能发生的下一次极权主义战争中发挥作用"，最后，他坦率地说："对于日本的占领，当初的广泛使日本非军事化的方针和要把它建设成独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由于"当初的方针"已经把日本改造得适合于美国的利益，就在这个前提下，把"当初的方针"彻底转变为"新方针"。

概括地提出美国"新方针"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凯南。他从对苏战略的思路中考虑了对日政策，在去年年底向国务卿提出了意见书，又于1948年3月来日，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对意见书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其要点如下。

第一、日本应与菲律宾同为太平洋地区美国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两者若对美国保持友好，美国的安全就不会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

第二、要使日本成为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就必须促进日本经济的复兴，使日本对远东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积极作出贡献。占领政策的重点必须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复兴方面。这个重点的转移并非来自规定民主化的投降条款，而是来自媾和谈判的推迟。因此，美国在改变占领政策的重点时，没有必要征求远东委员会的意见，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开除公职的措施必须

逐渐放宽并尽快结束。尽管有远东委员会各国的反对，也必须大体停止赔偿。

第三、但并不急于媾和。因为日本这时还不能独立行事。尤其日本现已完全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这一点是致命的。如果美国政府认为理应保护日本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那么，对现在的状况置之不理，那就"简直是发疯"(simply madness)。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使日本能够担当起独立的重担。在缔结和约之前，美国必须在日本留驻战术部队，但其数量及其对日本财政负担以及对日本人生活和经济的有害影响，必须控制在最小限度。日本的警察机构和海上保安机构也应加强。

第四、在缔结和约时，条约应是简单的，并且是一般性的，而不应是惩罚性的。

第五、美国应长期保持冲绳，因此，美国必须对冲绳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承担责任。

第六、媾和以后，美军是否继续留驻日本，应留待将来决定，但东北亚的安全保障问题如能得到苏联的一般性谅解——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媾和以后就不需要留驻美军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北亚，苏联不会发动公开的军事进攻。日本安全的最大危险，是日本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在日本共产党夺取政权时，苏联军队可能在最终定局方向起某些辅助性的作用。因此，日本最需要的不是外国军队的军事基地，而是国内的治安机构。①

与夸大宣传事态、煽动人们对冷战的不安的美国军部见解相比，凯南的见解是相当冷静的。他还相信有同苏联就对日媾和取得谅解的可能性。他的意见书经国务院作了若干修改之后获得通过，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讨论。

---

① G. 凯南:《1925—1950 年的回忆》,巴坦图书公司,1969 年，第 388—415 页。

在此期间，华盛顿政府也按照新的对日方针来推行政策。3月3日，陆军部发表了去年11月派到日本的斯特赖克调查团的第二次报告书，即所谓《斯特赖克报告书》。它强调“有必要加强日本的工业”，因此，“建议不要‘以赔偿方式’拆除日本能够有效利用的生产设施（除主要军需设施外）”。接着，3月20日，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Draper, W. H.）率领以政府要员和化学银行经理詹斯顿（Johnston, P. H.）为团长的工业代表团来日，5月18日，陆军部发表了工业代表团的报告书，即所谓《詹斯顿报告书》。它指出，“在不影响日本有用的和平生产的条件下，能够拆除的生产能力是不太大的”，比斯特赖克调查团更进一步力主必须放宽赔偿。其间，5月1日，根据总司令部的指令，成立了海上保安厅，5月27日，华盛顿政府终于派遣杨格（Young, R.）调查团来日，决心领导日本走向经济独立。以联邦准备银行的杨格为团长，由七名财政金融专家组成的调查团，着手制定使日本经济独立的计划。3月，日本内阁已由片山内阁换为芦田内阁。总司令部劝告芦田内阁实施稳定经济的十项原则，芦田内阁于7月20日公布了劝告的内容。然而，芦田内阁实际上不知所措，加之，首相芦田均本人和相当于副首相的西尾末广都与昭和电工行贿事件① 有牵连，遂于10月7日垮台。

在总司令部内，GS同G2的对立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二·一”大罢工后不久，据说当时的吉田内阁某要员就开始与G2取得联系，策划把GS的副局长、新政派的卡迪斯（Kades, C.L.）赶下台。G2探知GS的要员参与了昭电行贿案，便想借揭发此案把卡迪斯赶下台。他们的策划取得了成功。芦田内阁垮台，卡迪斯怀着失望的

① 昭和电工行贿事件：指日本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为获得复兴金融金库贷款，向首相、官僚、议员等二千余人行贿事件。1948年6月，国务大臣西尾末广等一百多人被捕起诉，芦田内阁因此总辞职。12月，芦田本人也被捕起诉，这幕丑剧至1958年以判决芦田集团无罪结束。——译者

心情归国，与此同时，GS 的领导权也就垮了。与（美国）国内的军部万能相呼应，在占领（日本）的政治方面，便也树立了 G2 和军人政治的领导权。

十九　道奇路线

502　在芦田内阁垮台后上台的是同G2步调一致的第二届吉田内阁，于 1948 年 10 月 19 日成立。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凯南的意见书决定了对日政策。对日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在结束占领之前，使日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强化和稳定起来，并设法使日本对美国友好。为此，设想如下：（1）总司令部应尽量把责任转移给日本政府，缩小本身的规模；（2）在日本组织十五万名的国家警察队（national police force）；（3）按日本的步调和方法来改革日本；（4）把对日占领的心理上的负担减轻到最低限度。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对日政策的决定，把占领政策的决定权完全从东京移到了华盛顿。新的对日政策的最初制定者凯南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因此国务院的地位也提高了，仿佛可以和对总司令部有管辖权的陆军部相对抗了。不过，在国务院内部占据重要地位的，已经不是过去的日本派，而是从对苏战略角度来考虑对日政策的新集团了。

华盛顿政府虽然制定了新的对日政策，但日本政府连稳定经济十原则也不能实施。华盛顿政府认为，为了实施新的对日政策，当前有必要对日本政府进行直接而强有力的领导。这种强有力的领导的必要性，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更加不可缺少了。中国革命在 1948 年秋有了飞跃发展，解放军在第九次攻势中终于 10 月

① F.S.邓恩（Dunn）：《媾和与对日处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 年，第77—78 页。

31日不流血地进入了东北(满洲)的首府沈阳。蒋介石的统治大为动摇，因而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就勿庸置疑地提高了。12月8日，华盛顿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实行稳定经济九原则①，并决定派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Dadge, J. M.)来日，以公使的资格担任总司令部财政顾问，直接指导日本政府来执行。杜鲁门总统在道奇动身之前接见了他，强调说，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日本经济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②。

1949年，麦克阿瑟在新年祝词中强调说："如今日本复兴计划的重点已从政治移转到经济"，并允许日本国民无限制地使用国旗。1月23日总选举，执政的自由党以压倒多数取得胜利。麦克阿瑟对此评价说："这次选举是在亚洲历史的一个危机关头对政治上的保守观点给予了明确而又具有决定性的委托和信任。"他现在已不提倡"中庸"，而提倡"保守"这个概念了。来到日本的道奇4月以后就不容分说地强制实行九原则。总司令部企图镇压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的一切抵抗。 503

强制实行九原则的道奇路线以平衡财政结束了通货膨胀，以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比率，把稳定了的日元与美元联系起来，并进而通过美国经济把日本经济同国际经济结合起来，从而把日本的工业力量作为亚洲的工厂，形成为美国世界政策而动员的姿势。为了动员日本的工业力量，美国把日本工业从以国内需要为主转变为以出口为主，强制压缩国内需要，实行饥饿输出；为了接

① 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其内容包括加强税收、严格限制贷款，冻结工资、加强外汇管理、加强强制征购粮食、对美汇率单一化、增产重要物资、实现预算平衡等。其实质是牺牲工人、农民和中小工商业，以扶植日本垄断资本，并使之从属于美国。——译者

② 柯克：《权力的界限》，第522页。

国际市场价格出口产品，就要求实行合理化和大企业的集中生产。日本垄断资本在道奇路线下打下了恢复的基础，而美国强制日本实行饥饿输出的意义则在于，当实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时，为了维持垄断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回避经济危机而控制本国工业设备的扩大，企图把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力量一起动员起来。日本作为亚洲的工厂，其作用在当时就是为美国在亚洲承担马歇尔计划。

二十　亚澳各国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批判

从所谓《斯特赖克报告书》到九原则指令，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同时显示了美国对日"被肢解的媾和政策"的新发展。

美国"被肢解的媾和政策"的新发展和对日新政策，再度引起亚洲、澳洲各国的不安。澳大利亚、菲律宾、中国等国家都批判说，日本的复兴并没有不会再行侵略的安全保障。英国有影响的杂志《经济学家》在1948年 4 月30日一期上摘录了他们的批判，指出"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而遭受打击和尝到苦头的澳大利亚人或中国人，对美国政府的对日新政策担忧，并质问美国政府，日本工业一旦复活，将会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该杂志并要求说："美国计划使日本成为经济上能够自立的生产国，这虽然很有见地，但必须采取保障措施，使日本在经济复兴之时不具有挑起可怕的新战争的能力。对于这种保障问题，美国拟采取何种措施，应当在适当时期表明。"

然而，对美国和日本进行特别严厉批判的则是中国的学生和民族资本家。1948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学生展开了反日反美运动。民族资本家采取了同一步调，香港的中国制造工业联合会也与之相呼应。共产党统治下的学生也行动起来了。以学生为主力的反日反美运动，从 5 月至 6 月席卷了整个中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Stuart, J.T.)于6月 24 日报告说："现在反美情绪非

常广泛，这势将凝结成对我们试图努力强化日本的抗议。”

二十一　日本中立的设想　504

日本国内对美国的“被肢解的媾和政策”和对日新政策的批判，发展为中立的设想。

1948 年 7 月，东西两大阵营的八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担心因柏林危机而加剧的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和战争危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发表了要求和平的声明。在这个声明的影响下，五十五名日本科学工作者于 1949 年 1 月发表了《日本科学工作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声明》。其署名者之一、朝日新闻社社论主笔笠信太郎，在 1949 年 2 月 14 日的报纸上刊登了题为《精神上的独立》的社论，指出“不是依靠自己而是求助于这样那样的外力，这种毛病在战后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并强调“现在正在经受着因依靠外力而尝到的苦头，这固然是因为我国国民缺乏坚定的独立意识”，但“已宣布为和平国民的（我们的）战后大方针，并不能依靠某种外力来贯彻，而只有彻底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之上，坚定精神的态势，才能确保得了”，他最后说，只有日本的“中立化”才是“与我和平国民应走的道路相符合的”。对和平的设想第一次与中立化的设想结合在一起了。

革新政党广泛采纳了这种中立化的设想。社会党于 1949 年 4 月 16 日在第四届大会上发表的宣言中，强调必须使日本成为“坚持中立国立场并带头在世界上放弃武装的绝对和平国家”。共产党在 1947 年底提出“维护主权，完全独立”和“严格实施波茨坦宣言”的口号，以此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受到了群众因占领长期化而满腹不满的民族主义感情的支持，在 1949 年 1 月的总选举时一跃而获得了三十五个议席，6 月 19 日，第十五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以“完全独立”与“确保中立”为基本方针的媾和纲领。然

而，共产党并没有把为实现"完全独立"而"严格实施波茨坦宣言"这一口号加以具体化，来与占领政策相对抗，而是试图根据德田总书记所谓的"九月革命论"来进行抽掉了民族独立内容的国内革命。继续强制实施道奇九原则的总司令部，对共产党抢先开始镇压，自7月至8月，连续发生了国营铁路总裁下山定则被拐骗后的暗杀事件；东京中央铁路线三鹰驿的电车突然驶出事件；福岛县东北干线松川驿附近列车翻车事件，利用这三大事件给共产党以很大的打击。于是共产党陷于混乱，媾和战线因而也乱了马脚。

第四节　亚洲的革命与事实上的媾和

二十二　亚洲革命的发展

继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之后，由于德国陷于最后分裂，冷战因而达到了一个顶点。9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成立。9月21日，美英法三国把对西德的军管交由民政部门管理。在日本，总司令部也分别于6月和12月对占领军的实力部队第八军的机构进行两次改革，把占领部队改变为战术部队，同时缩小了第八军为管辖地方而设置的地方民事部的权限，扩大了日本的地方自治权。

505

但是，这时在国际政治中发生了改变冷战局面的两个事件。9月23日和25日，美苏两国分别宣布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进行冷战的最大武器——原子弹的垄断破灭了。在亚洲，中国革命终于胜利了。在年初，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革命军于1月31日攻陷北平（北京）；4月20日，开始全线渡过长江；5月25日占领上海；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便在北京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欧洲和亚洲的这两件大事迫使美国不得不对

其世界政策加以重要的修改，而以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亚洲革命席卷整个亚洲，同样给美国的政策以深刻的影响。

在东北亚，朝鲜在激烈地动荡。朝鲜比德国还早，于1948年即已分裂。8月15日，在南朝鲜举行了大韩民国（韩国）政府的成立仪式。9月9日，在北朝鲜宣布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苏联军队于年底的12月26日从北朝鲜撤退完毕，美军于1949年6月29日留下军事顾问团而撤退完毕。在美苏两国军队撤退前后，朝鲜统一运动活跃起来，1949年6月25日建立祖国统一战线，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开始了飞跃的发展。韩国的李承晚政权面临着危机。1948年丽水和顺天发生军队叛乱事件，南朝鲜武装游击斗争从此活跃起来，李承晚政权的危机由此更加深刻。在1950年5月30日的韩国总选举中，由于南北统一派势力扩大，使执政党的大韩民国国民党遭到致命的失败。

在东南亚，与日本同被美国倚为太平洋地区冷战体制支柱的菲律宾，也激烈动荡起来，并震撼了英法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据点——马来亚和印度支那。菲律宾虽然于1946年7月4日独立了，但胡克团（人民抗日军）① 在独立后依然继续进行斗争。政府遂于1948年3月11日宣布胡克团是非法组织，并开始全面的武装镇压。然而，胡克团并不屈服，与政府进入作战状态，并于1950年3月29日，在成立八周年时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转而发动了大举进攻。4月1日，政府把整个菲律宾置于军事管制之下。马来亚从1946年4月1日起，作为马来亚联邦在英联邦中获得了自治权，但从1948年6月开始，因反英游击斗争的激化而动荡起来。6月18日，英国宣布整个马来亚处于非常状态，7月23日，宣布马来亚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然而，游击斗争仍不见衰微，1950年4月8日，英国

① 胡克，菲律宾他加禄语 Huk 的音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的简称。——译者

为了认真对付游击队，任命布里格斯(Briggs)将军为马来亚作战司令官。印度支那的动荡最为剧烈。1946年3月6日，法国在河内协定上虽然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但由于6月3日法国以反动的保大派组织了交趾支那临时政府，[506]胡志明的反法活动再度开始。9月14日巴黎协定虽然约定停止军事行动，但因法国违反协定，反法斗争更加扩大。12月9日法国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于是长期的第一次越南战争由此开始。1949年7月7日，法国终于成立了寄身于法兰西共同体内的保大的越南国(南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立。对此，胡志明于1950年1月14日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作为亚洲革命先驱的中国，还于1949年11月倡导由世界工联(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了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特别是以中国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身分出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生动地讲述了革命胜利的经验，向亚洲展示了中国的路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十三　重新提出对日媾和

由于亚洲革命的进展，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濒临危险，便策动太平洋各国共同来对付革命。1949年9月3日，英国驻东南亚专员麦克唐纳(Mac Donald, M. J.)来日，至11日离日，一直同麦克阿瑟和吉田首相进行会谈。同时，英国外相贝文访问华盛顿，不久，法国外相舒曼也赴美，一起同国务卿艾奇逊进行会谈，对日媾和问题便作为使太平洋各国团结一致的重要一环而提出来了。

美国也从两个方面的理由特别考虑了对日媾和具体化的问题。第一个理由是亚洲的革命。面临中国革命成功和东南亚革命形势的发展，美国于1949年8月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提出新的政策，不再支持国民政府，而要在“中国的邻国”遏制“中国

对邻国的攻击"①。这样，在中国革命成功和东南亚革命形势发展的冲击下，美国便仓皇着手过去一直没有顾及的冲绳建设。不过，对美国来说，最要紧的还是把日本置于自己阵营之中。因此，美国便开始把具体实现对日媾和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二个理由在于"被肢解的媾和政策"存在着矛盾。通过"被肢解的媾和政策"来实现的日本复兴，随之必然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中来。回到国际社会，具体说就是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协定，这必须得到盟国的赞同。1949年5月，美国就日本参加国际协定的问题要求远东委员会采取积极的措施。8月又再度提出，但对美国的"被肢解的媾和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各国都表示反对。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美国遂不得不把"被肢解的媾和政策"改为总括性的媾和政策。

9月17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就促进对日媾和取得一致意见。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国务院着手制定对日媾和草案。国务院下定决心，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如果不能取得苏联同意时，就实行单独媾和。国务院东北亚司司长艾利森（Allison, J. M.）于12月4日明确表示："德国的经验表明，即使苏联不参加也丝毫不妨碍美国对日媾和的决心"。对日媾和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于是对日媾和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结束手段转化为反对亚洲革命的反革命手段。

507

12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概括汇总美国对亚洲革命的政策文件NSC—48/1，从这个文件中考察了对日政策。NSC—48/1文件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权力的扩大，对我们来说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败"，并强调，"如果共产主义进而席卷东南亚，我们就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其影响将扩及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中近东以及那时暴露于危险边缘的澳大利亚将受到影响"。

①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1944—1949年》，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递交信件（迪恩·艾奇逊），第3—17页。

东南亚如果被攻陷，那么中近东和澳大利亚则也将被攻陷，这就是所谓"多米诺理论"。多米诺是一种类似扑克的西洋骨牌游戏，如果一个输了倒下，就起连锁反应，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美国把它用作国际政治上的术语，日本则从"多米诺式倒法"译为"将棋子倒理论"①。NSC—48/1 文件按照这种多米诺理论，考察了亚洲的革命。NSC—48/1 文件为防止多米诺式的悲剧寻找对策，强调亚洲革命的后盾是苏联，因而苏联才是我们的"目标"，"中国也好，苏联的卫星国也好，我们都不认为它们是单独的(individual)国家"，为了从两个方面来支撑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威胁的东南亚，便想到了日本和印度的重要性。在威斯康星大学讲授日本历史的约翰·道尔(Dower, J. W.)认为，日本是东亚的多米诺的最后王牌，在这个意义上，把日本形容为"超多米诺"(superdomino)。对这个"超多米诺"的日本，NSC—48/1 的政策大致如下：

第一、日本是在远东引起战争的复杂因素(a Far Eastern warmaking complex)中的主要因素，日本如果参加苏联集团，苏联在亚洲的基地则将成为足以使世界的势力均衡转化为对美不利的力量的源泉。

第二、日本勤劳的人口与潜在的工业力量，在亚洲的潜在能力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第三、日本在军事上与琉球以及菲律宾一起，作为"亚洲沿岸岛屿链条"(the Asian offshore island chain)，其地位处于构成美国"战略防卫线"(line of strategic defense)第一线。为了阻止苏联的侵略，美国必须在亚洲维持最低限度的地位，因此也就必须维持亚洲沿岸岛屿链条的现状。这个战略防卫线是美国无需投入大

① "将棋子倒理论"：日本将棋类似中国象棋，据说是由遣唐使传到日本的。所谓"将棋子倒"，是把棋子稍留间隔立着摆成一行，捅倒头一个棋子，其他棋子便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译者

规模兵力而与共产主义者对抗的第一线。

第四、为了把日本固定在防卫的第一线上，就必须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引导日本走上经济自立的道路。为了自立，对日本来说，中国大陆的传统市场是必要的。“日本经济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必须禁止对中国提供战略物资，但“合众国对日本自然贸易关系进行干涉，恐将造成对日本的深刻敌意”。美国必须一方面允许日本进行与西欧同样的对华贸易，另一方面则“必须鼓励日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南亚及东南亚在内，开辟日本的新市场”。

第五、日本如果打算避免过度依赖中国资源，而战前那种从朝鲜和台湾供给资源的可能又已减少，那就必须从东南亚进口粮食和原料（主要是棉花）。为此，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是东南亚粮食和原料的出口必须增加到相当的程度；第二是缅甸和印度支那等粮米输出国在政治上必须恢复稳定；第三是要在稳定的东南亚各国进行有关灌溉、排水、运输等广泛的农业开发事业。从“稳定”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印度支那是使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使印度在南亚——能够作为“非共产主义国家”而存在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六、在政治上，“这种保持改革计划精神的中道政权（a middle of the road regime）”，“作为合众国的同盟者来说，终将证明较之极右的极权主义政府更为可靠”。这种中道政权“毫无疑问会希望与共产主义集团维持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没有公然敌对关系的现状下，它虽然将抗拒“与美苏任何一方利害完全同一化”（complete identification either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Soviet Union），但正是这种中道政权的持续存在，将提供可能，使日美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并使日本对内外共产主义压力保持抵抗能力。

第七、正因为如此，美国在日本的非军事目标(non-military objectives)是，在媾和前后帮助民主势力的发展和促进经济上的稳定。因此，美国必须一方面把对日本统治过程中的干涉压缩到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则应提出劝告和援助，以保护对日占领的基本成果并使之永远存在，从而必须促使日本成为各国国民共同社会中的和平而独立的成员①。

509 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中道政权”，是介于共产主义和“右翼极权主义”之间的政权，与过去曾把日本的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称作“中道政权”的含义是不同的。NSC—48/1文件在美国开展其对日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约翰·道尔指出，这个政策文件企图“维护一条日本后来未被允许采取的道路，即实现一个不是两极的亚洲而是一个多极的亚洲的中间道路(the middle road in a multipolar, but not bipolarized Asia)”；在亚洲革命巨大冲击下只好自认“失败”的美国，没有表示决心要把日本同“共产主义集团”隔开，反而同意日本采取不与美苏任何一方同一利害的中立立场，在以媾和后的日本独立和自行选择政策为前提的条件下，美国是如何苦心焦虑，使日本作为其战略防卫第一线，走向与美国阵营友好。第二，这个文件把日本作为亚洲工厂所起的作用从欧洲转入亚洲，在战后第一次试图把日本与东南亚连结起来。这种连结，后来在日美经济合作中得以体系化。如果说，战前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是突破欧洲帝国主义各国殖民统治的单独的帝国主义侵略，那么，战后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则是协助美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实行遏制政策的反革命行动了。

12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NSC—48/1文件作了补充，

① 理查德·B·杜博夫(DuBoff)：《商业思想与对外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越南》，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集》第五卷，短评，诺姆·乔姆斯基和霍华德·津恩(编)：烽火出版社，1972年，第21—23页。约翰·道尔：《战后亚洲的超多米诺：在美国国防部文件内外所见的日本》，前引书，第104—106页，114—116页。

进而编制了NSC—48/2文件。NSC—48/2文件指出："合众国的政策的前进方向，在于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它特别重视印度支那的激烈动荡，强调"对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必须特别注意"①。

1950年初，麦克阿瑟在新年祝词中指出，1949年"是占领下的管理继续大幅度缓和的一年"，在日美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媾和"(de facto peace)，并强调，宪法第九条的规定并不否定"不可侵犯的自卫权"，唤起了日本国民对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注意。中国革命的胜利，加上苏联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日本所面对的大陆出现了广泛的共产党地区。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麦克阿瑟当然要唤起日本国民对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注意。不过，去年年底的NSC—48/1文件似乎甚至还要承认日本的中立立场，日本国民怎样具体行使其"不可侵犯的自卫权"呢？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

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的演说中规定美国在亚洲的防卫圈(defensive perimeter)是阿留申—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这是把去年年底NSC—48/1文件所划定的美国亚洲战略防卫线公开发表出来的。对日本重整军备过程进行分析的美国政治学家马丁·温斯坦指出，美苏两军双方撤退之后，朝鲜也有成为一个"缓冲地带"(a buffer zone)的可能性②。 510

二十四 越南革命和日本的基地化

NSC—48/1文件竟打算承认日本的中立立场，而越南革命

① 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集》第1卷，第38—39页；《纽约时报》本，巴坦图书公司，1971年，第9页。

② 马丁·温斯坦(Weinstein)：《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1947—1968》，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71年，第47—48页。

的飞跃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却使美国改变了这种设想，决心把日本确定纳入自己的阵营。

1950 年 1 月 17 日，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接着，29 日，苏联也承认了。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但却不能坐视共产主义向其周围地区扩展。美国把中苏两国的态度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

1 月 31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Bradley, O.)、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Collins,J. L.)、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Sherman, F.)、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 (Vandenberg, H. S.) 等三军四首脑来日，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归国之后，布莱德雷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我们为了阻止共产主义不越出中国境外，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汇报了关于防卫东南亚的军事方面的问题"，同时表明了美军将长期留驻日本的意图。对于作为战略防卫第一线的日本，美国开始对它赋于具体的内容。为了长期留驻，为了维持把战术部队留驻在日本的现有特权，美国军部甚至对对日媾和也开始表示有难色了。

2 月 27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关于印度支那的报告书 NSC—64 文件。这个文件从美国立场出发，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本质作了如下的分析：

"共产主义者侵略印度支那威胁，只不过是我们所料到的共产主义者企图占领整个东南亚计划的一个方面。如所周知，缅甸内部很薄弱，(共产主义)可以不遭到强力抵抗而进行侵略，并推翻缅甸政府。但印度支那则是最直接受到威胁的地区。而且，这个地区又是唯一拥有欧洲大部队，目前正与当地部队一起向共产主义侵略军进行武装斗争，而又与共产主义中国接壤的地区。因此，必须把在印度支那边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这个决定，当作比阻止共产主义者向东南亚其他部分侵略更为广泛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来

加以考虑。”

如果印度支那被攻陷，那么缅甸就危险，这无疑是多米诺理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正是根据多米诺理论而强调了印度支那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们最后把印度支那称作“东南亚的关键地区”，并指出：“因此，国务院和国防部应把保护合众国在印度支那 511 地区的安全保障上的利益作为优先事项(as a matter of priority)，并为此目的而制定一个采取一切可能实行的手段的计划。”①

2 月 7 日，美国承认南越，以对抗中苏。3 月16日，把第七舰队派到西贡，断然实行示威。4 月 10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关于《东南亚的战略评价》的备忘录。他指出：“从合众国的战略观点来看，保全从日本至印度支那的沿岸岛屿这个锁链，对合众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并强调：“东南亚是自日本南下至印度大陆遏制共产主义线上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建议“采取长期的措施，以求从远东非共产党地区安全地向日本及其他沿岸岛屿提供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的来源”②。

日本成了美国反对越南革命的最重要的反革命战略基地。5 月 8 日，美国同意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开始公开干涉越南革命，随之，正象《美国国防部文件集》所说：“被直接卷入越南地区正在发展着的悲剧”，而日本也就作为向美国提供基地的合作者而承担起反革命的任务。

二十五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日本

中国以批判的眼光注视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一贯主张对日实现全面媾和。1949 年 7 月 7 日，正在从事建立新政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共同宣言中主张：“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

① 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集》，第 1 卷，第 361—362 页。
② 同上，第 363—366 页。

的目的”而尽快实现对日媾和。苏联也要求全面媾和。11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宣布苏联外交基本方针的演说中，强调了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

然而，美国竟表示决心单独媾和并企图把日本拉进自己阵营，这就促使中苏两国缔结同盟条约。1952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及日美两国“相互勾结”的“新侵略”，两国特别着重下述两点：其一就是建立反对侵略的军事同盟，其二则是为防止侵略于未然而迅速实现对日全面媾和。中苏条约体现了中苏两国的两手政策，即一方面促进对日全面媾和，另一方面如果终于出现单独媾和，则作为军事同盟以防备日美两国的侵略。

中苏两国的对日军事同盟，使日本很震动。总司令部在日本国民中加强煽动，宣传所谓中苏两国、尤其是苏联的威胁。为此，512 他们借题发挥，提出了从去年以来成了政治问题的苏联扣留俘虏的问题。

战败时日本国外的官兵与侨民的遣返工作，在1947年中已基本完毕，但从库页岛及西伯利亚的苏联地区的遣返大大地延迟了。1949年2月，被扣留者家属团体全国协议会召开了促进全国（被扣留者）一齐归国大会。4月，众参两院决议将在年内遣返完毕。5月，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说，在我国“保守反动势力正在把这个问题当作反苏反共宣传材料的今天”，希能公布留苏日本人的情况及其遣返计划。同月，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俘虏的日军官兵有五十九万四千名，其中七万零八百八十名已于1945年在战场上释放，自1946年12月至1949年5月1日共遣返四十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名，从今年5月至11月之间，除现正审查其战争罪行的一部分人员外，所余九万五千名俘虏

将全部释放。对此，总司令部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曾经宣布，截至1948年底，尚被扣留的人数为四十万八千七百二十九名。总司令部宣布的数字与苏联宣布的数字之间相差很大，因此，日本国民尤其是被扣留者家属始终感到不安。

总司令部在对日理事会上提出遣返问题，不断攻击苏联。把对日理事会根本不放在眼中的总司令部，使理事会处于长期不能工作的状态。从1948年至1949年召开的五十三次会议，有四十七次没有议题，每次都是不到一分钟就散会了。然而，从1949年12月21日的第一百零一次会议起，总司令部则一直精心操纵理事会对苏联进行攻击。苏联代表捷列维扬科(Derevyanko, K.N.)于1950年1月4日，抗议总司令部"企图利用对日理事会加强反苏宣传"，并在第一百零四次特别理事会上带领随员退席。4月，苏联政府宣布：去年所说的九万五千名俘虏已经遣返，"所有剩余日本俘虏的遣返工作现已结束。"对日理事会主席美国代表西博尔德(Sebald, W.)于5月反驳说：按照苏联宣布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认为，有三十七万四千名以上被扣留的日本人已经死亡"。在严寒的库页岛和西伯利亚死亡的被扣留者究竟有多少人？苏联没有发表，但焦急等待被扣留者回国的家属却是为数颇多的。

美苏两国围绕遣返被扣留者问题的争吵和总司令部对苏联的攻击，给日本国民灌输了强烈的反苏情绪。被扣留者服定额劳役和用共产主义洗脑筋的处境，在日本国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激起反苏情绪的因素。俘虏的劳役尤其在缅甸的英国军队中是苛刻的；对俘虏洗脑筋，美英各国对德国俘虏也搞过，英国甚至对宣誓反对纳粹的俘虏给予优先遣返的权利，因此这并不是只有苏联才这么搞的特例。不过，总司令部和日本的新闻广播则只举苏联的例子，有组织地、大量地加以宣传，把日本国民的憎恨引向苏联。

另外还有反苏宣传的材料。在日苏中立条约还有效的期间，513 苏联竟单方面废弃条约而向日本宣战，割取日本固有领土千岛作为参战的代价，参战后进入满洲作战的苏军官兵在各地掠夺日本人的财产，凌辱妇女，这些都成了培植日本国民反苏情绪的因素。苏联废弃日苏中立条约而参战，本来是美国要求苏联对日参战的结果，而最初破坏日苏中立条约的则是企图趁德苏交战来进攻苏联的日本。但是，把日苏中立条约问题作为反苏宣传而提出的人们，却总是隐瞒所有这一切事实，而单单强调苏联单方面废弃条约。不过，割取千岛和苏联官兵在满洲的行径，的确应由苏联负责，俘虏死亡问题也是如此。反苏宣传为美国把日本变成基地和实现单独媾和铺平了道路，但苏联本身也必须负相当的责任。

二十六　国内围绕媾和问题的分裂

当美苏两大阵营在媾和问题上开始分裂时，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全面媾和与单独媾和的分裂。

曾于 1948 年底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了声明的科学工作者，在 1950 年 1 月15日又以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名义发表了新的声明。声明认为，媾和问题“将最后决定日本的命运”，并强调通过全面媾和“走自主独立的道路”的必要。然而，各革新政党却都处在混乱之中。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949 年 12 月决定并发表了《对媾和问题的一般态度》，主张“全面媾和、中立、反对军事基地”等和平三原则，但因党内派系对立，在 1950 年 1 月的第五次大会上，分裂为左右两派，虽然在 4 月的第六次临时大会上恢复了统一，但已经大大丧失了战斗力。

共产党于去年 6 月发表媾和纲领，主张“完全的独立”和“确保中立”，但 11 月间野坂参三向《赤旗报》记者解释媾和纲领时，既主

张“严格中立”，又谈到媾和后的“国土防卫”问题，说“日本的国土要由我们日本人来防卫”，并对此加以解释说：“如果联合国真正是由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领导，并能确保世界和平，那么也可以考虑日本参加联合国并完全接受联合国的保障”。然而，(日本)共产党于1950年1月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使去年以来的混乱更加混乱。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批判(日本)共产党不积极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党内便围绕如何接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而陷于混乱。德田总书记在4月向第十九次中央全会提出的纲领草案中，突然撤销了去年以来的“严格中立”的要求，反而强调“我们的方针中不能有所谓中立主义”。

社会、共产两党的混乱，也给争取全面媾和与中立的运动带来了混乱。这就自己捆住了手脚，在这重要时刻未能组织有效的斗争。

政府和财界不顾革新政党的混乱，开始决心走向单独媾和。514 1956年1月10日，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川一郎与前来访日的美国巡回大使杰塞普（Jessup, P.）进行恳谈时说：“我们希望早日全面媾和”，但“如果迟迟不能实现，则希望与其中多数国家媾和”。1月23日，吉田首相在第七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强调：“当然任何人都希望全面媾和，不过这要由国际上的客观形势来决定，就我国的现状而言则是无可如何的，”把全面媾和或单独媾和的问题完全寄托于“国际上的客观形势”，而实际则是表示同意单独媾和。他可能不知道美国正处心积虑地要把日本拉进自己阵营，因而打算同意日本走“多极性亚洲的中间道路”，但无论如何，他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风度，对于日本的抉择未能以日本舆论为后盾，向美国提出强有力的主张。

二十七　半媾和

美国虽然决定以日本为其反革命战略基地的方针，但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使之基地化，则还在继续争论。国务院主张，为了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就必须首先媾和。国防部则主张，为了使军队长期留驻日本，就必须维持当前的占领特权。争论一时难以求得一致，1950年3月，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Vorhees, T.)为使两者妥协提出了"半媾和"(half-treaty)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日本在名义上恢复主权，对民政行使权力，但美国将留下总司令部与占领部队继续对日本政府实行潜在的统治。沃里斯这个提案使国务院和国防部得以妥协。美国遂确定了对日媾和政策①。

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吉田首相继承了1947年芦田意见书的设想。虽然发生了中国革命这种新事态，但他估计，中国既没有空军和海军，在经济上也尚未稳定，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构成对日本的直接威胁。他判断，威胁仍然是苏联，不过，日本周围有美军驻扎，一旦有事，向美军提供日本基地，就能防止苏联的威胁。他估计，朝鲜有可能成为缓冲地带。这种估计更加坚定了上述判断②。

美国在何时和用什么办法使吉田首相接受了半媾和方式，这一点还不清楚，不过，吉田首相已转而采取了使美军留驻日本本土的方针。4月25日，带着吉田首相的绝密使命赴美的池田勇人藏相，于5月3日与道奇会见，就单独媾和与媾和后美军留驻日本本土问题进行了谈判。池田提出："如果美国政府不便提出美军继续留驻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从日本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办法"③。

515

① 邓恩：前引书，第88页。

② 渴斯坦：前引书，第49页。

③ 池田勇人：《财政平衡》，附《回忆占领下的三年》，实业之日本社，1952年，第222—234页。宫泽喜一：《东京·华盛顿的密谈》，实业之日本社，1956年，第39—59页。

4 月 27 日，华盛顿政府任命共和党的杜勒斯(Dulles, J. F.)为国务院顾问，并委托他负责处理对日媾和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满洲并炮制满洲国时，杜勒斯曾表示赞同，认为这对苏联将起着防御障壁的作用——这是美国著名东方学者欧文·拉铁摩尔(Lattimore, O.)在北京同杜勒斯一起进餐时听他这样说的。① 据说在杜勒斯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圣经》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反共斗士杜勒斯在对日媾和上取得领导地位，这就暗示对日媾和的反革命色彩将愈加浓厚。杜勒斯就任之后的 5 月 10 日，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科伊(McCoy, F. R.)就通告远东委员会各国，声明停止征收中间赔偿。

美国一面准备对日媾和，一面研究对付苏联拥有原子弹和亚洲革命所带来新形势的新的全球战略。早在 1 月 31 日，杜鲁门总统就针对苏联拥有原子弹而发出制造氢弹的命令，同时，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制定军事、外交政策。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进行工作，于 4 月 7 日经国防部长签署，向总统提出了报告。12 日，总统委托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实行该报告制定政策所需费用进行估算。估算尚未完毕，据国务卿艾奇逊的回忆录说，“4 月25日，在总统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这份报告已作为NSC—68文件而成为周知的国策。”②《美国国防部文件集》介绍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政策文件，但 NSC—68 文件却仍被视为绝密，其内容无法详知。不过，根据艾奇逊的概括，其内容大体是：弥补西欧阵营的弱点，同时形成对付苏联的“实力地位”(situation of strength)，以此为基本目标，因而主张增强西欧阵营的军事力量，使之能够对付游击战争以及其他一切战争。NSC—68文件第一次在美国军事

---

① 艾伯特·阿克塞尔班克(Axelbank)：《黑星照耀日本上空》，塔特尔本，1973 年，第 182—183页。

② 迪恩·艾奇逊：《创业记—我在国务院的年代》，图章书店，1970 年，第 488页。

战略中引进了“有限战争”(limited war)这个概念。

NSC—68文件所设想的美国全球战略，依然以在欧洲与苏联对抗为其中心。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的美国，在亚洲追求的目标着重两点：其一是，干涉越南革命，在“中国的邻邦”遏制亚洲革命，同时把法国从亚洲的殖民地战争中解脱出来，使之把防卫力量放到欧洲。另一个目标则是同日本媾和，并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反革命基地。

二十八 外交的复活

准备好对日媾和的美国，不等媾和就部分地恢复了日本的外交权。这是“被肢解的媾和政策”的必然归宿，也是事实上媾和的进展。

终战联络事务局于1948年2月改名联络调整事务局，并从外务省的一个外局改由总理厅管理，到1949年6月遂被撤销。先取消“终战”而加上“调整”的字眼，接着连事务局本身也撤销了，这是“被肢解的媾和政策”指导下实际媾和活动的进展在机构方面的表现。到了1950年，美国竟公开允许日本的外交代表驻在美国。4月19日，由于实施了驻外事务所设置法，日本政府便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檀香山五处开设了在外事务所，于5月10日开始工作。外务省为了向国民宣传即将媾和，于6月1日发表了题为《战后日本的演变》的外交白皮书，表明了单独媾和的方针。

为了准备即将媾和，麦克阿瑟对共产党加强了镇压，6月6日发出了开除共产党中央委员公职的指令。开除公职的对象现在已从军国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了。

6月17日，杜勒斯飞抵羽田机场，立即飞到韩国进行视察，21日回到日本后，开始制定对日媾和的具体方案。他向吉田首相要求日本重整军备。吉田后来写道：“当时，我明确表示反对重整军

备”，并举出了反对的三个理由：第一是，战败的日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作到”能和美国匹敌的进步的高度武装；第二是，“就国民思想的实际情况而论，已经完全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后盾——心理基础”；第三是，“对于曾经被迫参加毫无理由的战争的国民来说，还有不少战败的创伤，许多善后工作还没有结束。”[①] 重整军备问题仍是悬案，连日来与各界代表进行会谈的杜勒斯，于6月24日下午去京都休养，而25日早晨，战争爆发的紧急电报就从朝鲜发到了东京。

第五节　朝鲜战争与单独媾和的实现

二十九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反革命宣言

朝鲜的和平统一运动一直继续到1950年6月19日。但是，濒临危机的李承晚政权镇压了和平统一运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可能受到李承晚的挑衅，号召在整个朝鲜实行武装的革命的统一。6月25日，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全线展开了革命的统一战争。朝鲜的战争起初是内战。但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炮制的韩国，决心进行军事干涉，于是组织了联合国军，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开始进行反革命战争。由内战开始的朝鲜战争，竟发展为被称作“朝鲜战争”的国际战争了。 517

然而，杜鲁门总统不仅对朝鲜的革命战争开始了反革命的战争，还进而决心对整个亚洲的革命进行反革命干涉。他在6月27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公开说，首先要夺取朝鲜，“掩护和支持韩国军队”。其次，他又提到台湾。统一了中国本土的人民革命军队对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正准备进行最后的打击，台湾眼看就要陷落。

①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2卷，第160—162页。译者补注：译文据中译本第101页。

杜鲁门对此指出，共产党政权如果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的职务的美国部队”，并公开说将出动第七舰队。第三，他还提到菲律宾，公开说：“我已指示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及加速对菲律宾政府的军事援助”。第四，他还提到印度支那，公开说，他已指示加速供给法国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法国部队建立密切联系。①

杜鲁门这个声明，是美国继日本投降时所发《一般命令第1号》之后的第二个反革命宣言。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意味着不只是在朝鲜的反革命，而且是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反革命的一环。协助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因而也就意味着协助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反革命活动。

三十　对日媾和七原则

派到朝鲜去的美军首先是驻日的第八军。7月8日，麦克阿瑟为填补第八军调出后的空白，指令日本政府建立由七万五千人组成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把海上保安厅的编制从一万名（实际人员八千五百名）增加到一万八千名。警察预备队于8月10日成立，而美国则希望这支预备队能发展为正式军队。吉田首相虽然刚刚对杜勒斯表示反对重整军备，但他却起用前陆军中将辰巳荣一为顾问，开始了重整军备的准备工作。当时参与日本海军重建工作的詹姆斯·奥尔（Auer, J. E.）根据与辰巳及当时有关人员的谈话记述如下：

“他（吉田）虽然认为警察预备队与其说是警察队，倒不如说是将成为军队，但在接受创建警察预备队的要求时，吉田却选择文职的增原惠吉担任预备队长官。果然，增原最初并没有理解警察预

① 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译者

备队的真正性质。于是吉田就把他在1936年至1938年担任驻伦敦大使时的大使馆武官、原陆军中将辰巳荣一找了来。吉田要求辰巳提供意见。本来规定大佐以上的人是不准入队的，但吉田却劝他再次穿上制服担任警察预备队的长官。辰巳答应协助吉田，在预备队创建时期，他每天和总理会谈，在吉田任内作为军事顾问竭尽全力进行了工作，但却没有就长官的职务。据说辰巳认为，旧军队的高级军官应负战争责任，应该由年青而又有经验的人来主持新的组织。 518

辰巳作为军事顾问，商讨了日本为适应美军迅速撤退而需要作的工作。辰巳认为，有必要建立警察预备队，而且它将不只是警察，而将成为军队组织。这些想法，都为吉田所接受，结果，辰巳又对起用中佐以下的旧陆军军官一事取得吉田的支持。接着，他又不顾增原及新任长官林敬三的激烈反对，获准起用全体大佐"。①

其间，美军在朝鲜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麦克阿瑟对韩国军队的行动感到不满。他逐渐感到，与其加强韩国军队的武装，莫如加强日本的警察预备队更为必要，便把这个想法汇报给本国政府②。

美国还动员了日本的经济和技术，为朝鲜战争服务。媾和后的首任驻日大使墨菲评论说："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将四个岛变成了一个大的供应基地"，并指出："如果没有这一招，朝鲜战争就打不下去。"他进而举出了日本把海员和铁路人员派到朝鲜的事实，并强调："这是绝密，如果联合国军没有熟悉朝鲜情况的几千名日本专家的协助，要呆在朝鲜，必然遭到各种困难。"③ 为战争的

---

① 詹姆斯·E·奥尔，前引书，第72—73页、274页。

② R. K. 索耶(Sawyer)：《朝鲜军事顾问团：战时与平时》，美国政府印刷局，1968年，第167、169页。

③ R.墨菲(Murphy)：《军人外交》，双日出版社，1964年，第347—348页。

“特需订货”（联合国军以及美国经济合作局对日本物资的特殊要），到年底已达一亿四千九百万美元，日本的生产到了10月首次突破了战前的水平。然而，特需订货同时加强了垄断资本。1951年2月，签订一千美元以上特需合同的公司有一千八百家，而七十一家大企业则占了合同额的一半以上。而且，接受一百万美元以上大宗订货的公司只有三十三家，其合同额竟占了特需合同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八。特需订货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对垄断资本的复活起了很大作用。

7月14日，吉田首相在第八届临时国会施政演说中，声称要对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的行动给予“合作”。美国图谋促进对日媾和，于11月24日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美国采用了与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分别进行讨论对日媾和问题的方针。对旧轴心国的媾和，按照发表波茨坦宣言的波茨坦会议决定，首先应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即美英法中苏五大国外长会议按大国一致的原则来处理，而根据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则首先要由五大国中的受降签字国来处理。因此，主张全面媾和的苏联和中国认为，对日媾和问题应先在美英中苏四国外长会议上讨论。而主张单独媾和的美国则认为，应先在按多数表决原则处理问题的远东委员会上讨论。美国确信这种作法可以靠多数表决强行通过它自己的意见。美国采取这种远东委员会的方式，并且个别地进行谈判，先取得西欧各国的同意以图孤立苏联。此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作为未予承认的国家而排除于谈判对象之外。七原则共包括当事国、联合国、领土、安全保障、政治及通商的规定、请求权（赔偿）、纠纷（有关请求权的纠纷）等七个项目。它把对日媾和的当事国规定为“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有意进而缔结条约的一切国家”，从而表明了单独媾和的方针。关于安全保障问题，七原则规定，“在联合国制定出令人满意的有关对安全保障承担实质

519

性责任的其他规定之前，为了维持日本领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日本和美国及其他国家之间继续分担其责任”，企图以日本同意的形式，使美军得以继续留驻。同时，美国的意图在七原则规定以外也表现出来了。对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美国根本不当作问题看。对于日本的重整军备，美国也不想加以任何限制。美国为日美两国考虑了安全保障问题，但它对于亚洲、大洋洲各国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的安全保障问题却丝毫也没有考虑。贯穿于七原则的课题就是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

亚洲、大洋洲各国，尤其是菲律宾、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对于美国使日本重整军备而又不采取预防措施的设想表示不满。为了平息这些国家的不安，并且把这些国家纳入美国的安全保障体系，美国配合对日媾和条约及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进行了关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奥新安全条约》(ANZUS条约)的谈判。从事这一谈判的杜勒斯，把从日本南下至冲绳、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广大的安全保障网称为“沿岸岛屿链条”①。“沿岸岛屿链条”这个词是1949年NSC—48/1文件最先使用的，而杜勒斯所说的地区已不仅限于沿岸岛屿，而是扩展到了大洋洲。

三十一　全面媾和运动受挫与单独媾和

在日本国内，和平问题谈话会于1950年9月发表了题为《三论和平》的长篇声明，从理论上考察了和平共处问题，再次强调了“中立不可侵犯”的原则。然而，社会、共产两党的混乱更加深了。共产党于10月提出武装斗争，开始完全脱离国民。社会党在1951年1月的第七次大会上，在原有的和平三原则上又加上了“反对重整军备”，提出和平四原则，但要求接近西欧阵营的右派对此发生

① J.弗罗姆(Fromm)：《现在日本将要发生什么事？——杜勒斯访问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1年4月23日。

520 动摇，于是党内又争吵不休起来。社共两党的统一行动根本没有希望，1951 年夏虽然掀起了要求把奄美大岛和冲绳归还给日本的运动，但却未能把它同本土的全面媾和运动联系起来，因此，全面媾和运动终以未能组织有效斗争而结束。尤其重要的是，工人阶级要以政治罢工来领导全面媾和运动，但社共两党都未能提出和实行这个重要的战术。

在国外，中苏两国强烈反对对日媾和七原则。1950 年 11 月20 日，苏联向美国发出了系统批判七原则的备忘录。12 月 4 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对美苏争执中的对日媾和谈判发表意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最后并说：“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①

然而，以吉田首相为首的保守的政界和财界，对于来自国内外的批判却一概充耳不闻，只是一味地走向单独媾和。向美国提供基地，并允许美军继续留驻的媾和，这只能是单独媾和。在 1951 年 1 月至 2 月，杜勒斯来日时，他们就向杜勒斯表明了这个意思。

杜勒斯和吉田就媾和后美军继续留驻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围绕日本重整军备问题，两者却发生了对立。为了击退苏联的侵略，杜勒斯要求要有十个师团三十五万的陆上部队。吉田正在把辰巳荣一作为顾问考虑重整军备的问题，因而对重整军备本身并不反对，但他反对杜勒斯所要求的那样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于是，杜勒斯和吉田提请麦克阿瑟来裁决。麦克阿瑟支持了吉田，吉田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已往的谈判情况来看，我已经意识到，关于日本为防务而

① 《新华月报》，1950 年 12 月号，第 334 页。——译者

努力的问题不向杜勒斯特使作任何表示，而想只就日美协定达成协议的如意算盘，是万也办不到的。另一方面，对方则强烈希望知道和约成立后，日本在努力加强防务的第一阶段即将建立地面部队的腹案。于是，经过多方考虑之后，把我方的方案告知了对方，即充实并增强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由治安省之类的机关予以统辖。这个治安省的设想是从前就有的，这个方案似乎使杜勒斯感到一定程度的满意。"①

这就是说，吉田答应了逐渐增加防卫力量，而他之所以反对大规模重整军备，除了在朝鲜战争前夕的6月所举出的三个理由之外，特别还有两点。一方面是，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开始了资本的强行积累，吉田企图把重整军备限制在这种强行积累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他又企图以牺牲强行积累而开始重整军备为借口，从美国得到经济援助，进一步促进强行积累。对于吉田来说，为了把重整军备控制在自己所希望的速度上，宪法第九条是 521
有用的。

1月29日，财界的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产业协会、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易会、中小企业联盟、日本经营者联盟及经济同友会等八团体联名向杜勒斯提出了《关于媾和条约问题的基本要求书》。财界八团体提出：第一，关于媾和的方式，"如果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时与多数国家缔结媾和条约"，则赞成单独媾和；第二，要求尽快并完全回到国际社会中去；第三，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作为"巩固的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确立以前的措施，要求"保证"由"美国始终防卫日本的安全"，在这个保证之下，"希望日美相互间达成协议，使美军留驻日本"，并约定"为此提供必要的基地"，进而指出，"日本准备建立为防卫国土所必需的最低

①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3卷，第119页。译者补注：译文据中译本第78—79页。

限度的防卫组织”，这个“防卫组织完全是日本方面的自主机构”，但“关于其装备”，则希望“美国给予强有力的援助”。财界八团体表明了重整军备的意志，并打算以重整军备为前提，与美国缔结具有互相援助内容的地区性安全保障协定。

2月6日，吉田首相的政敌鸠山一郎与政界的石桥湛山及石井光次郎、原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财界的高碕达之助及小林一三，一起会见了杜勒斯。鸠山虽然还在被开除公职期间，但杜勒斯还是会见了他。两天后，他们联名向杜勒斯提出了包括重整军备在内的概括性的媾和意见书。

送别杜勒斯回国之后，吉田首相于2月14日在第十届国会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对波茨坦宣言与单独媾和关系陈述了意见。他极力主张：“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将来的媾和条约则希望把日本视为完全的独立国，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因为其基本原则不同，也就必然会出现分歧”。他这恰恰是把从“战败国”到“完全独立国”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从而否定了日本所接受的波茨坦宣言。他违背了由波茨坦宣言开始的战后民主主义，企图把日本国民拉进美国阵营。

4月18日，吉田首相与再次来日的杜勒斯会见时作证说，即使在宪法第九条之下，也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重整军备。吉田的意图并不是忠实于宪法第九条反对重整军备，而是要把重整军备坚决控制在自己所希望的速度上。杜勒斯还会见了最高法院院长田中耕太郎，也取得了同样的证词。22日，杜勒斯会见天皇。杜勒斯确认，日本统治阶级基本上一致支持美国的媾和政策。媾和的态势已大体就绪了。

三十二　日美经济合作

美军继续留驻日本，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这种对日媾和政

策的另一个侧面，就是要使日本经济对美国的防务生产采取积极协助的态势。对欧洲的共同防务生产态势，美国靠以法国外长之名命名的舒曼计划来推进，并于1951年4月18日，签订了《关于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条约》①。所谓日美经济合作，正是要在亚洲建立这种共同防务生产的体制。 522

1951年5月16日，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麦卡特(Marquat, W. F.)把日美经济合作计划通告日本政府。日美经济合作是要"使日本与欧洲及其他南半球各国一样，参加美国的紧急筹措计划"，并且是以这样对现状的认识和对将来的估计为前提的，即"现在的日本拥有过剩的生产力，在地理上也处于有利地位，紧急筹措计划当局对日本有充分的需要，这种需要将来还会急剧增长"。为了使日本政府接受这个计划，麦卡特威胁说："如果日本因某种理由不能对这个国际计划给予协助，对于确保为了维持国内消费水平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将有影响"。日美经济合作的具体计划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消费品的生产，这是"美国公司在重新开始生产这些产品之前的暂时现象"；第二是"特需物资"的生产，这是为了使美国的产业能够"一面生产军需品，一面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消费品的生产能力"；第三是输往东南亚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的生产，这是为了当"现在正尽全力从事军需生产的国家不能自给"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业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东南亚的原料生产和增强其工业力量。"

日美经济合作中的"特需物资"生产，与朝鲜战争的特需区别开来，称作"新特需"。特需与新特需，不仅在目的上有所不同，而且订货的内容也不同。特需是紧急收购，从不计较价格，而新特需则必须通过"价格竞争"来提供，是以美国国内的批发价格为标准

①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193页。——译者

来订货的。因此，新特需比特需更要选择大企业，并要求企业的合理化。5月30日，第一次新特需向日立制作所发出订货，垄断资本通过新特需进一步走上了复活的道路。

日美经济合作把日本置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欧阵营共同防务生产体制之中，并且作为共同防务生产的重要一环，确定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美国对日媾和政策的意义，通过日美经济合作而更加具体，更加清楚了。

吉田内阁早就急于建立日美经济合作的国内体制。总司令部运用占领的权力，对日本政府发出的指令已达一百六十四道。由于围绕朝鲜战争战略战术上的对立，麦克阿瑟于4月11日（华盛顿时间）被杜鲁门总统免职，其后任李奇伟于5月1日根据总司令部的指令，授权日本政府重新研究日本政府以前发出的政令。吉523田内阁任命七名委员，组织了政令咨询委员会作为咨询机关，其中有两人是财界代表，即东京的芝浦电气公司经理石坂泰三和日本化学制药公司经理原安三郎。委员会于5月1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先讨论了放松开除公职令问题。6月20日，吉田内阁着手解除开除公职，第一次即宣布解除包括财界人物在内的二千九百五十八名。接着，7月10日，吉田内阁宣布，解散财阀已经完毕，并解散了保有股票整理委员会。原被开除公职的鸠山一郎也于8月6日解除了处分。

第六节　媾和条约与安全保障条约

三十三　安全保障的设想

媾和的准备已经完成了。1951年5月8日，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政策性文件NSC—48/5，从而概括地确定了对日媾和的基本方针。NSC—48/5文件把“促使亚洲有关国家的发展，

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亚洲)的安全保障”，作为美国当前亚洲政策的当务之急；其中，又把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作出贡献”定为对日政策的中心课题，要求在对日媾和中采取如下政策：

第一、根据总统已经决定的意旨，要努力抓紧使尽可能多的参加对日战争的国家赞成总统的意见，以迅速着手进行对日媾和工作。

第二、根据总统决定的要与媾和条约同时缔结的意旨，尽快着手与日本进行关于双边安全保障协定的谈判。

第三、要援助日本，使它在经济上独立起来，能够从事对合众国及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及劳役。

第四、媾和后继续采取以下措施：

(1)采取措施，以使顺利地从占领状态转入恢复主权。

(2)为了顺利地建成一个有效的军事制度，应帮助日本组织、训练和装备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

第五、媾和后采取如下措施：

(1)援助日本发展特定的军事力量。

(2)援助日本大量生产日本及亚洲非共产党地区所需要的低价军需品。

(3)采取一切可能实行的措施，使日本加入联合国和参加地区性的安全保障协定。

(4)制定适当的心理计划，使日本人离开共产主义(away from communism)走向自由世界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2月制定的NSC—48/1文件，曾 524 打算承认日本同共产主义地区保有“正常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关

① 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集》，第5卷，第23—24页，116—117页。

系”；而一年半之后的NSC—48/5文件中，却要求把日本同共产主义地区隔离开。这是因为以越南革命的发展为契机而提出了对亚洲（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以志愿军名义参战，致使美国的对日政策急转直下。美国为了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作出贡献”，在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想要通过与日本缔结“双边安全保障协定”，使日本加入联合国，把日美安全保障协定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其他地区性安全保障协定以及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结合起来，把日本纳入美国的世界规模的安全保障体系之中。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当联合国会员国受到武力进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之前，有行使个别或集团的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并不是在自卫权的名义下承认分裂世界的地区性安全保障协定，但美国却故意曲解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建立安全保障机构以遏制共产主义，并使之合理化。

要求加入联合国，把日美安全保障协定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吉田首相和美国也是一样的。他试图把日本的安全保障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结合起来，从而促进日本加入联合国，并把日美两国作为联合国中对等的合作者，以日本的安全保障作为美军留驻的理由，同时使美军对日本的防卫承担义务。但是，围绕安全保障协定的日美交涉表明，吉田的要求是不能实现的。美国参议院于 1948 年 6 月 10 日通过的范登堡决议所决定的方针是，美国只参加“基于持续的、有效的自助及相互援助”的集体协定。美国要担负防卫日本的义务，就必须以日本的“自助”即重整军备为条件。吉田保证逐渐增加防卫力量，继起用原陆军中将辰巳荣一之后，又起用了原海军少将山本善雄为顾问，开始重建海军。但是，逐渐增加防卫力量的保证并不能满足杜勒斯的十个师三十五万名地面部队的要求。杜勒斯虽然同意美国协助日

本的安全保障，但却拒绝承担防卫日本的义务，从而拒绝了日美的对等关系。吉田的设想破灭了，于是（日美）安全条约就不得不作为不平等条约来缔结[1]。（日美）安全条约成了尚无自卫力量的日本为保障日本和“远东”的安全而保证向美国提供基地的条约；成了日本保证逐渐增加自卫力量的条约；成了当日本拥有自卫力量时才能与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结合起来的“暂定措施”的条约；成了没有双边性的不平等条约。吉田面临的课题就在于，一方面强化自卫力量，另一方面把（日美）安全条约同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结合起来加入联合国。

三十四　旧金山媾和会议

媾和会议从1951年9月4日（日本时间5日）至8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印度和缅甸因反对美国的媾和政策，没有参加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特别对与媾和条约一起缔结的日美安全条约提出批评说：“它没有表明，这是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决定。”缅甸则对放宽赔偿表示不满。中国则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没有受到邀请。对这两者究应邀请哪一方？美英的意见发生了对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国主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则表示反对，结果决定两者都不邀请，将来由日本选择究竟与哪一方缔结和约。中国既未参加对日媾和，这就意味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仍在继续；而在缔结媾和条约时却要由战败国的日本对战胜国的中国政府进行选择，这种决定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无视中国国民的权利。苏联出乎预料地参加了媾和会议。参加国共有五十二个国家。

525

① 西村熊雄：《改定新版安全保障条约论》，时事通信社，1960年，第26—30页。

杜鲁门总统在开幕式上的演说中指出，对日媾和条约“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和解的条约”，强调“媾和条约承认，日本作为主权国应当拥有自卫权，并且根据联合国宪章，应当拥有参加与其他国家共同防卫的权利”，而打开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道路，则是这么作的前提，他极力主张，这是“这个条约的核心”。①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会议一开始就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波兰代表威尔布洛夫斯基(Wierblowski, S.)指出：“遗憾的是，在战争中蒙受最大牺牲的国家的代表却没有出席会议”，他强调：“这里没有一开始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战斗的代表”②。但是，主持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拒绝把苏联的提案列入议程。

亚洲各国并没有隐瞒对媾和条约的不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虽然参加了媾和会议，但也与缅甸一样，对放宽赔偿的媾和表示不满。菲律宾代表罗慕洛 (Romulo, C.) 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盟国把日本的殖民地和海外资产作为“战利品”而没收了，但其“受益者则几乎都是大国”，并痛切地说，“支付赔偿乃是遭受日本破坏的小国取得补偿其损失的唯一方式，而本条约对赔偿却严加限制”，因此，“可以说，就小国的要求而言，本条约实际是宽容的条约；但就大国的要求而言，则显然是惩罚性的条约。”③

美国正是以“大国”的姿态，把自己的意旨强加于媾和条约之中。媾和条约第三条允许美国以托管的名义半永久性地对冲绳实行军事占领。第五条 c 项和第六条 a 项实际上允许美国以保障日本安全为名，继续对日本本土实行军事占领，为媾和后缔结日美安全条约埋下了伏笔。

526

9 月 8 日(日本时间 9 日)，签订了媾和条约(《对日和约》)④。由

① 外务省：《旧金山会议议事录》，1951 年，第 6—14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③ 同上，第 234—245 页。

④ 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 333，393 页。——译者

于吉田首相保证“迅速就赔偿问题开始谈判”，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在条约上签了字。苏联、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参加会议共五十一个国家，其中四十八个国家在条约上签了字，再加上日本共为四十九个国家。媾和条约签字后五小时，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①。

吉田首相向10月11日开幕的第十二届临时国会提出了这两个条约，要求予以承认。15日，他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讲了日本的“基本外交路线”，说希望日本在“坚决投靠自由国家群”的同时，“能够站在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为世界和平和世界自由作出贡献的立场上”。这话的意思是，对中国政策的要点在于扩大自由国家群与中国的接触，从而给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众以接触自由阵营空气的机会，而唯有同文同种的日本，才愿意率领自由国家群扩大与中国的接触②。吉田看来打算按照他那套对日中之间传统关系的理解来处理对中国政府的选择问题；不过，这里且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吉田内阁有如何的看法，仅从所谓“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之类的想法来看，就可说明，即使战败之后，他仍然抱着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大国意识，早就在梦想作为亚洲的大国来领导亚洲之日的到来。参众两院分别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两个条约。众议院于10月26日，参议院于11月18日，分别通过了这两个条约。11月18日，吉田首相立即向天皇提出批准书并得到了天皇的同意。

三十五　日台条约

中国强烈谴责媾和条约。1951年9月18日，外交部长周恩

① 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33，393页。——译者

② 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27卷，第315—316页。

来为沈阳事件（满洲事变开始的柳条沟事件）二十周年发表的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敌视中苏”两国的条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条约①。

日本不得不下决心对中国政府进行选择。媾和条约第二条 a 项对朝鲜问题也只谈到“承认朝鲜的独立”，因此究竟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是与大韩民国建立正式邦交，也任凭日本来选择。但是，总司令部强制日本选择韩国，从 1951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让日韩两国在总司令部外交部召开预备性会谈。同日，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明了日本承认韩国的方针。在选择中国政府的问题上，美国的压力更为露骨。美国威527 胁说，如果日本不选择中华民国，（美国）参议院就将不批准媾和条约。12月间来日的杜勒斯强迫吉田首相说：“日本应同台湾仅就其‘事实上’控制的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邻近诸岛——缔结条约”，并敦促说：“关于对台湾政府没有控制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留待将来再行决定”。吉田首相屈服于这一高压，在 12 月 24 日写信给杜勒斯，保证日本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准备缔结恢复正常关系的条约”，“无意同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缔结两国间的条约”。他在信上写明，将要缔结的日台条约“适用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现在统治和今后将要统治的一切领土”，从而完全接受了杜勒斯方式。转过年来，1952 年 1 月 16 日，日美两国政府公布了吉田信件。②

这封信激怒了中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于 1 月 23 日痛斥吉田信件是“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③。

① 《新华月报》，1951 年 10 月号，第1233 页。——译者

② 菊池育三：《两个秘密外交文件》，《揭穿日台条约的虚构》，《朝日亚洲评论》，1971 年，第 3 号，第 72—76 页。

③ 《新华月报》，1951年 2 月号，第 62 页。——译者

吉田内阁不顾中国的抨击，从1952年2月20日开始了日台条约(《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的谈判，并于4月28日签订了条约。条约的换文规定，条约的适用范围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的和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今后将控制的一切领土"这种说法，是预定国民政府将反攻大陆的词句，清楚地表明日台条约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反革命条约。

三十六　帝国主义外交的复活与议会政治的空洞化

媾和生效的日子临近了。随着媾和的生效，媾和体制便将以安保体系的方式开始活动，日美两国全力以赴地完成安保体系的最后工作。

1952年1月，吉田内阁的经济审议厅长官周东英雄向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麦卡特重申了对日美经济合作的决心，保证"日本在合众国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援助下，恢复和建设军需工业，(向美国)提供军需品和战略物资，从而为合众国重整军备的计划作出贡献，并以此确保和增加健全的美元收入"，还进一步保证："日本将沿着合众国经济援助计划的路线，对东南亚的开发给予更积极的合作"①。

财界积极策划了向东南亚的扩张。2月12日，东芝总经理石坂泰三和函馆船坞董事长加纳久朗等财界的有志之士，组织了亚洲经济协力会。提到日程上来的计划有开发菲律宾的拉拉普矿山和阿帕里铁矿，开发印度加尔各答西北奥里萨州的铁矿石和粘胶煤矿区及建设炼钢厂等等，日本钢管公司的经理河田重谈到在印度建设炼钢厂的问题时说："德国、英国及苏联也在活动，所以如果

---

① 柯克：《权力的界限》，第533页。

528 日本不搞，这些国家就要来插手了”，强调了资本输出竞争的紧迫性。这样，日本在日美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很快就开始推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张计划。

2月13日（日本时间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编制了关于“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侵略”的报告书NSC—124/1，探讨了对日政策在东南亚政策中的意义。NSC—124/1文件在探讨东南亚在美国亚洲政策中的意义时指出：“印度支那具有远比朝鲜更为巨大的战略上的重要性”，接着并谈到了东南亚和日本的关系。

“东南亚的陷落预先表明，与共产主义统治的亚洲地区进行友好交流，在经济上对日本将有明显的利益。从东南亚的贸易中排除日本，将给日本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从而会增高日本对合众国的依赖程度。因此，如果失去东南亚，特别是失去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就将给日本带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致使对阻止日本与苏联集团将来势将发生的和解造成极大的困难。”①

日本真是一个超多米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担心，一旦马来亚和印度支那②共产化时，1951年5月NSC—48/5文件所确定的对日政策有可能会倒退到1949年12月的NSC—48/1文件中的政策。这样，日本的命运便与东南亚共产化的根源印度支那②的命运——对于越南革命的反革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安全条约第一条所说适用范围是“远东”，当前尤其是指印度支那。根据安全条约，日本要为留驻日本的美军提供基地，在当前来说，首先就是为反对越南革命提供反革命基地。

作为规定安全条约实施细节，日美两国就基地的提供和使用进行了谈判。起初，日本政府认为基地的提供和使用与国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把协定拟为须经批准的方案。美国却

① 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集》，第1卷，第375—381页；

② 原文为“印度尼西亚”，从上下文看，当系“印度支那”之误。——译者

要求订立秘密协定。经过协商，可能是作为双方的妥协方案，决定作为只是在行政机关范围内缔结的、不需经国会批准的国际协定，即“行政协定”①。这样，就缔结了《日美行政协定》(日本与美国之间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而缔结的行政协定)；但是，作为示范于去年6月签订的行政协定《北大西洋公约（NATO）缔约国关于其军队地位的协定》，尽管具有同样的目的，但却规定需经批准。美国为什么以不同态度对待这两个协定呢？是因为构成日美行政协定基础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一个“暂行措施”，所以也就认为行政协定是暂时的，才限定在行政机关范围内来缔结的？无论其理由如何，日美行政协定对日本国民来说，具有足以左右其日常生活的内容，因此当然应该必须得到国会的承认。2月28日，签署了协 529 定的吉田内阁，向国会作了报告，但报告并没有讲到行政协定的全部内容，结果是，尽管在野党在国会上一再进行质问，吉田内阁仍然噤口不谈的协定全部内容，却在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由于发生了这种事态，在野党议员便从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全体退出会场，并发表联合声明，采取了对外相冈崎胜男提出不信任案等对抗手段，但仍未能争取国会不承认行政协定。行政协定一事生动地刻画了政府与保守政党已经使议会政治流于空洞化了的事实。

3月20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媾和条约与安全条约。两条约于4月28日生效。日本的安全保障体制便以帝国主义外交的复活和议会政治的空洞化作为两个车轮而转动起来了。

---

①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27卷，第329—332页。西村熊雄：《改定新版安全保障条约论》，第81页。

530

第十五章 安保体制

(1952—1965)

第一节 日苏复交

一 单独媾和路线的挫折

1952年4月28日，由于媾和条约生效，日本恢复了独立。本来，战争状态对美苏两国仍在继续，对美媾和，只是"半媾和"，独立也不过是"半独立"。这种"媾和"只是"半媾和"、"独立"只是"半独立"，其意义集中地表现在《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上。《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的本质在于其片面性和不平等性，在于被改称作"驻日美军"(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in Japan)的美国军队无限期地驻在日本和整个日本国土的基地化。日本国民仍然必须把完全恢复独立作为自己的课题。不过，即便日本只是在形式上"独立"了，其意义也还是相当大的。它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媾和表明，美军继续留驻不得不采取"条约"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美国国防部才曾反对媾和，结果，情愿同意与要求媾和的国务院妥协，而采取了所谓"半媾和"的方式；但是，这种采取"条约"方式的日美关系，却有可能使日本通过修改条约来改变"半媾和"与"半独立"的实质。

第二、日本由于"独立"而恢复了"外交权"。其意义主要有二：其一，有了参加国际体制的可能，这就为复活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国际体制，特别是帝国主

义的国际组织，对于恢复或复活帝国主义所具有的意义，只要看看“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恢复英、法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复活德、意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便可一目了然。其二，使日本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外交政策。日本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仍然是依赖、从属于美国的国际政策，尽管如此，却可以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这就能够形成修改日美关系中的“半媾和”、“半独立”实质的一个动力。

第三、媾和也给反体制运动带来了一定的自由。在媾和会议 531 前夕的1951年9月3日，总司令部对共产党实行新的大镇压，正是为了对日本由于“媾和”而“独立”加以防范。在媾和条约生效后的第一个“五·一”节——1952年5月1日，共产党散发一向被禁止发行的机关报《赤旗》，从而获得了合法性，这也是由于“媾和”，日本获得“独立”的结果。《安全条约》规定：“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美军要进行“援助”，[①] 为美军干涉革命留下了道路，但是，对于日常的运动，美军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加干涉的，运动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眼看“媾和条约”快生效了，吉田内阁急忙建立独立的体制。在国内政策方面，由于有了“五·一节事件”[②] 的冲击，便首先着手制订治安立法。7月21日实行了《防破法》(《防止破坏活动法》)，同时成立了公安调查厅。重新武装也在进行。在“媾和条约”即将生效的1月31日，吉田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谈到了新建“防卫队”的方针。3月6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又声明：“为了自卫的军事力量是不违犯宪法的。”关于军事力量问题，由于受到在野党的反击，他做了修正发言。他故意把“自卫力量”和“军事

① 《日美安全条约》第一条，《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4页。——译者

② “五·一节事件”：指1952年5月1日日本全国138万人集会游行示威事件。在东京，示威者在皇宫广场遭警官队镇压，二人死亡，多人受伤。——译者

力量”加以区别，说：“即使是为了自卫而拥有军事力量，也是违反宪法的，由于需要修改宪法，所以不搞重新武装。”但在暗中却推行着建设“防卫队”的计划。于是，8月1日，政府合并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而新设了保安厅。4日，吉田首相以保安厅长官的资格向保安厅干部训话，强调说：“新设保安厅的目的，是建设新国军。”并鼓励说：“要成为新国军的基础。”9月，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出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藏相池田勇人和同行者宫泽喜一，接受了美国财政部长斯奈德(Snyder, J. W.)和国务卿顾问道奇关于增加军备的要求并愿提供援助的暗示。[1]据说美国“从正面提出日本的防卫问题，这还是第一次。”[2]10月15日，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接着，解除了旧职业军人开除公职的处分，并把他们录用为保安队干部。

吉田内阁在急于整顿国内体制的同时，还忙于参加国际体制。重视日美经济合作，并企图从中得到美国资本对日援助的吉田首相，在财界代表人物中物色驻美大使，5月，决定由原日本银行总裁、东京电力会长新木荣吉担任。作为新型外交代表的“财界大使”，由此诞生。接着，从5月到8月，又相继决定了驻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巴基斯坦、印度、巴西和泰国等国的大使。还有，5月29日，当然是在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同意日本参加；8月14日，日本正式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因此，池田藏相和宫泽喜一出席了当年秋天召开的年会。参加国际体制的最重要行动则是加入联合国。6月19日，吉田内阁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16日签署的关于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第二

532

① 1952年9月4日池田勇人与斯奈德、道奇会谈，决定了美国对日军事援助的基本方针。——译者

② 宫泽喜一：前引书，第150页。

项规定，加入联合国"将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荐以决议行之。"在安理会，苏联拥有否决权。苏联既然拒绝签署媾和条约，从而与日本之间仍然继续着战争状态，当然不会赞成日本加入联合国。9月18日，苏联果然在安全理事会上对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行使了否决权。日本加入联合国，从狭义上来说，是为了实现吉田首相要把美军留驻日本同《联合国宪章》第51条联系起来的政策；从广义上来说，是为了实现日本参加国际体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政策。由于苏联行使否决权，这一政策终于失败。这意味着吉田首相的单独媾和路线以挫折而告终。结果，吉田首相就面临着重大的矛盾，为了完成单独媾和路线，不得不转入以恢复对苏邦交为目的的全面媾和路线的轨道上来。

二　美中对抗和《共同防御条约》（简称 M.S.A.）

这时，在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的史蒂文森，于1953年1月就任总统。由于苏联拥有原子弹、中国革命胜利和美军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等，杜鲁门时代的"遏制政策"破产了，因此，艾森豪威尔政权打算利用"顶回政策"①，挽回"遏制"的颓势并积极反共。"顶回政策"不外是企图通过对抗的方法，伺机颠覆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使资本主义重新复辟的侵略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在1953年1月27日发表的关于新政权外交方针的首次声明中，就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各国称作"敌人"，强调美国的重要政策之一就在于"使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月发表的一般咨文中，也强调应该重视亚洲问题，对中国采取对抗姿态，同时明确表示要改变过去依靠第七舰队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采取不阻碍蒋介石军队进攻中国本

---

① 顶回政策，即 Rollback Policy，意思是，不仅要"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而且要通过顶回等手段来使"共产主义势力"退回去。——译者

土的方针。这表明，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正在把冷战舞台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主要敌人，并已开始采取行动了。其背景则是，艾森豪威尔政权断定，由于朝鲜停战，“中共正在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印度支那”。①

继解除台湾的“中立化”之后，美国在亚洲的“顶回政策”还表现为，1953 年 10 月缔结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并随之而整编和加强南朝鲜军队，以及加强亚洲其他反共国家的军队等。这种整编和加强反共军队的背景，是由美国提供武器、军事指导及美元，以加强受援国的军队，使他们承担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代理战争”的战略。这一战略，正如早在 1952 年 11 月总统选举中就已经 533 表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这种对亚洲基本态度的具体化。其中还隐藏着这样的新殖民主义意图，即吸取朝鲜战争的经验，在亚洲的战争中减少美国的兵员损失，同时利用军事和经济援助，使美国能更容易地控制受援国。为了使亚洲亲美各国的军队标准化和规格化，以便实行“代理战略”，美国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的步兵学校，开始对十七个国家的三百余名军官进行训练，日本保安队也有六十名入学受训。

美国首脑们认为，在以美中对抗为枢纽的“顶回政策”中，日本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资源贫乏，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日本就会与共产主义阵营妥协而采取中立主义。②杜勒斯国务卿在他的关于外交方针的首次声明中认为，苏联在亚洲的目标在于统治拥有巨大工业力量的日本，如果日本进入共产主义阵营，苏联、中国和日本结合起来，形势就会变得极其艰巨，大力强调了日本的重要性。美国之所以要促进日本加强军备，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的。事实是：1953 年 5 月，杜勒斯国务卿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联席

① 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集》，第 1 卷，第 85 页。

② 道尔，前引书，第 101 页以下。

会议上就已表示，要根据《共同防御条约》(MSA) 向日本提供援助的意图；此后，在 7 月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又为日本建立十个师团的设想一事出席作证；8 月，在访问南朝鲜归途中，又来到日本，要求吉田首相对日本的防卫做出努力。美国副总统尼克松 11 月 9 日在东京会馆的演说中也谈到：(1) 1946 年美国使日本非武装化是错误的；(2) 加强日本保安队是必要的，露骨地表现了要重新武装日本的热情。

吉田政府对美国这种美中对抗政策和重新武装的要求，基本上只是唯命是从，毫无通过对中苏的和平外交来解决单独媾和的矛盾的积极表现。但在表面上，吉田政权却认为，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应该由日本自主地决定，强调了日本的“自主性”。这既是为了避开反对重新武装的革新势力和公然主张重新武装的保守势力的双重责难，也是为了反过来利用宪法第九条，避开美国加速重新武装的要求，而想要根据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逐步地、分期地重新武装。政府这种逐步重新武装的姿态，在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中显示出来。共同防御条约援助的企图是对受援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而受援国则必须承担一定的军事和政治义务，从而加强对美国的依附。美国曾想把这种援助强加给各国，但印度尼西亚和伊朗认为这将危害民族独立而加以拒绝。在日本以左派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站在前列，社会舆论也强烈反对共同防御条约。但是，日本政府和财界则生怕朝鲜停战一旦实现，美军特需就会剧减，有招致经济危机之虞；从这种考虑出发，想以接受共同防御条约援助作为回避之策的空气十分浓厚，而且也有意靠 MSA 援助来实现重新武装，扶植军事工业。[1] 实际上，经济团体联合会 (“经团联”)，在 1952 年 10 月作为军事与工业联合体的制度化的第一步，

534

① 宫泽喜一，前引书，第 177 页。

建立了防卫生产委员会，并于1953年初就制订了重新武装的计划。改进党和1953年3月从自由党分化出来的鸠山自由党，也都主张在美国军事援助下，推行长期的防卫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5月，美国发表声明，MSA援助没有附带条件；由此，日美两国政府便从7月15日开始了正式谈判。但是，把军事要求放在优先地位而要求赶快重新武装的美国，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了把日本陆军增加到三十万人的要求，致使把经济要求放在优先地位打算逐步重新武装的日本方面大为不安。为了调整两国的意见，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池田勇人于1953年10月1日前往美国，2日与美国副国务卿助理罗伯逊（Robertson,W.）进行了会谈。其结果，达成了下述原则性的协议：（1）在三年间把日本陆军增加到十八万人；（2）日本用日元购买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即剩余小麦，而以由此积累的日元充作发展军事工业的资金。日本仅仅承担了扩军的义务，而没能得到最渴求的纯经济援助。不仅如此，在日本积累起来的巨额剩余农产品销售价款反而成了（美国）支配日本外交的重要因素；而且，剩余农产品的涌入扰乱了日本农业，造成了打击日本粮食生产的后果。

《日美共同防御条约》(MSA)于1954年3月8日签订。由此，通过《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而开始的重新武装日本，以及把日本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保障体制就基本上告成了。根据MSA协定，政府和执政党在1954年6月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还设置了航空自卫队、陆海空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防卫大学等等。

三　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战争赔偿

美国的美中对抗政策，不仅促进了日本的重新武装，而且大大

左右了日本的东南亚政策。自1950年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以来，美国便介入了印度支那战争。随着战争的激化，军事援助也急剧增加，至1954年已达十一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军费百分之七十八。美国这种印度支那政策，背地里是有帝国主义打算的，即这里有要把印度支那搞成美中对抗政策的前沿阵地的军事要求；有控制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等战略物资的经济考虑；还有被称作“多米诺政治”即“倒将棋子政治”的战略理论等等。这种理论在1950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中首先提出，并明确 535 写在1952年初题为《美国关于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之中。其要点是，威胁东南亚的根源是“共产中国”，如果不能阻止这种“侵略”，不用说整个东南亚，就连日本也会受到“涉及生死存亡的压力”。因此，日本便受到重视，在亚洲的“多米诺”之中作为“超多米诺”而与东南亚连为一体。[①]

这种“多米诺”理论，是如何充满着虚构的货色，以及它怎样用作美国在亚洲的反革命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这些，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正是从这种多米诺理论出发，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提出要求，而吉田政府也就追随了这种要求。吉田首相在自己的著作《十年回忆》中是这样写的：

“我素日所考虑的东南亚对策，……概括说来，就是美国方面更大胆一些，向东南亚提供资金，日本方面以技术经验参加这项工作。虽然这不免稍有‘善为己谋’之嫌，然而却是我理想中的日美合作，进而言之，是自由主义阵营共同的东南亚对策的主要目标。……在新加坡，组成一个反共政策之类的本部，由日、英、美、法、荷等有关各国提供人力或物力，展开一个规模巨大而且行之有效的反共攻势。”[②]

---

① 参议员格拉弗尔版：《美国国防部文件》，第85页；《纽约时报》本，第27—28页。

②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卷，第191页。

吉田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以《旧金山和约》所规定的战争赔偿为立足点而开始了。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的特需剧减和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深刻的经济萧条；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冷战政策，中国市场被封闭了：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和财界希望利用赔偿向东南亚市场进行扩张，以实现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赔偿谈判中，财界代表以谈判代表团全权代表的身分，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对菲律宾，由津岛寿一、永野护和村田省藏；对印度尼西亚，由小村中和津岛寿一；对缅甸，由稻垣平太郎；对南越，由植村甲午郎出头谈判。谈判在1952年12月首先从印度尼西亚开始。从1953年后半年起，政府才对谈判特别加起劲来。从9月到10月，派外相冈崎胜男前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越等四国谈判赔偿问题。11月底，又派大野胜巳公使前往菲律宾，12月底，派倭岛英二公使前往印度尼西亚，作为常驻代表推动谈判。按照冈崎外相的说法，“1954年应当是东南亚年”，赔偿问题谈判的进展在1954年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月，大野公使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P·加西亚(Carcia, C. P.)签署了在二十年内对菲律宾偿付四亿美元的协定草案。但是，由于菲律宾政界对赔偿额和偿付期限不满，特别是以加拉罗·M·莱库特(Recto, C.M.)参议员为首的民族主义派的强烈反对，这一协定终于形同废弃，问题仍有待解决。

同缅甸的赔偿谈判也有了进展。缅甸出于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立场，曾经与印度一起，未出席旧金山和会，也没有缔结对日和约；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独立后的内战，经济遭到破坏，为了有助于恢复经济，采取了对日缔结和约、从日本取得战争赔偿的政策。1954年8月，缅甸工业部长兼外交部长吴觉迎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结果暂先签订“日本赔偿两亿美元并向合办事业投资五千万美元，期限均为十年”的协定。11月5日，两国政府

正式签署了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缅甸赔偿问题的解决，对日本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一、它给因赔偿问题未得解决而停滞不前的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打开了窗口；第二、建立了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立足点；第三、对尚未解决赔偿问题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给予了相当的刺激。

在草签缅甸赔偿协定的时候，吉田首相强调说："对于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日本来说，找到东南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并表明抱负说："希望以赔偿之名，首先从缅甸入手，再迅速扩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态度等于招供了（日本）垄断资本利用赔偿来向东南亚市场扩张的帝国主义企图。

就在这时，1954 年 11 月，吉田首相以战后日本首相的身分，首次访问了华盛顿。其目的在于寻求美国精神的和物质的援助。首相访美，与"财界大使"一样，成了日本外交的新花样。吉田首相和杜勒斯国务卿在共同声明中把日本的东南亚赔偿政策说成是"日美的共同利益"而表示欢迎。而且，通过这一共同声明，吉田首相要求美国对于"共产主义者们企图削弱亚洲各自由国家政府的活动，并使其失去信任的努力"，"应进一步加以考虑"。这种要求，证实了日本想"诱导"中国"开放"，"离间"中苏的帝国主义野心。吉田首相在他所写的《十年回忆》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如果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国民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那么，把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拆开 (detach)，也不一定是空想。……引导这个国家同苏联共产主义分离，重新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不仅有利于共产党中国本身，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引导共产党中国采取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只有依靠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说明，共产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国民、东南亚的开发以及世界经济，都是尽善尽美的政策，我们必须致力于妥善地引导共产党中国

国民的工作。我认为，在地理上、历史上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我国，是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①

537 吉田首相的中国观，是地地道道的时代错误的典型，它只能是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共同蹂躏半殖民地中国的形象，即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再现。这里没有一点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也没有正确的理解，有的只是帝国主义的大国意识。

四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正当吉田政府追随艾森豪威尔政权的美中对抗政策，实行重新武装，并复活自身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时候，世界局势开始明显地从紧张向缓和的方向转变，美国的“实力地位”的基础开始动摇了。

紧张局势缓和的重大原因之一，是亚洲和阿拉伯各国的动向。以印度为首的这些国家，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为寻求和平开始联合起来了。因为战争对于完成他们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是巨大的障碍，而且无论参加美、苏哪一个阵营，都会助长国际紧张局势，并危害民族独立。他们的这种立场，集中表现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三地带论”中。“第三地带论”是尼赫鲁总理在 1953 年 2 月的议会演说中所使用的话，显示了印度希望建立一个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地带的外交目标。

西欧各国也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为寻求对美独立和缓和冷战政策而展开了活动。朝鲜战争在美国的压力下，虽然给西欧各国带来了广泛的军备扩张和暂时的军需繁荣，但反而随着通货膨胀和繁重税收，却招致了国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军事工业的扩展压迫了和平工业，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压迫了军事工业。就这样，从 1951

① 吉田茂，前引书，第 266—267 页。

年后半年到 1952 年，西欧各国的苦恼表面化了，“要黄油，还是要面包?”成了深刻的问题。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于 1952 年 4 月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从此开始批判美国，并呼吁“摆脱美国政策，实现西欧独立。”

亚洲和阿拉伯各国以及西欧各国的这种动向，正说明美国的“实力地位”已开始动摇。苏联对此加紧追击，开始展开了和平攻势。以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为转机，苏联建立了以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为中心的集体领导体制，展开积极的和平外交。与此相呼应，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在 1953年 5 月，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在野工党也全面支持这一建议。一般地说，为了迅速解决国际间的纠纷，实现国际协调，不是由专业外交官而是由元首、首相或外交大臣来进行直接谈判这种意义的首脑会谈，在世界外交史上，从 15 世纪左右就已经实行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中，由丘吉尔建议大国首脑进行会谈，以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纠纷，则是第一次。这种外交交涉方式，连同两大阵营内部的首脑会谈和新兴各国间的首脑会谈，成为战后外 538 交的特征之一。就在这种情况下，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对于公开保证朝鲜停战而当上了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来说，也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的。

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对 1953 年 8 月苏联声明拥有氢弹进行报复，美国于 1954 年 1 月，由杜勒斯国务卿在演说中提出以利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为中心的综合战略，即所谓“新面貌战略”①，并企图以此为立足点，策动各国对印度支那采取“统一行动”。在印度支那，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人民解放军的抵抗和反击加强了，特别是在越南，法军的处境日益恶化。1954 年 3 月，胡志明军队

---

① 新面貌战略：即“new look policy”。——译者

开始对越南北部、法军大军事基地的象征奠边府进行了包围战。法国自身已经失去挽回战局的力量。同月 29 日，杜勒斯声称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大门”，呼吁继续战争并要求西方采取统一军事行动，但遭到国际舆论的反对而终于失败。4 月，为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和朝鲜问题，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同时，以奠边府的陷落和公开保证结束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 P.)内阁的建立为契机，7 月 21 日签署了日内瓦协定。

日内瓦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即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对世界和平来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8 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却认为，日内瓦协定“难免导致东南亚的丧失，使共产主义取得重大进展，是个灾害”①。美国之所以没有签署这个协定，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为了对付这种“灾害”，美国一方面在 9 月间纠集泰国、菲律宾、英国和法国等七国，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另一方面则从 1955年 1 月初，违反日内瓦协定，开始向保大政权提供军事援助。杜勒斯甚至还企图以日本、南朝鲜和台湾为中心，组成“东北亚条约组织”(NEATO)。

尽管美国采取这种紧张政策，紧张局势趋向缓和的动向却日趋强烈。1954 年 6 月，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之间，以及周恩来和缅甸的吴努总理之间，都提出以提倡尊重各国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为外交的基础。以此为开端，由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巴基斯坦和缅甸组成的“科伦坡集团”的五国，也积极活动，计划召开亚非会议(A.A.)。这个集团，在 1954 年 4 月召开的五国总理会议上决定，为维持亚洲和平，在必要时，要讨论采取共同行动。因为会议的地

① 《美国国防部文件》,《纽约时报》本，第 14 页。

点是在科伦坡，所以就被称为“科伦坡会议”。亚非会议在1955年4月于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占世界陆地面积百分之二十的二十九个国家，拥有世界人口百分之五十五的各民族代表，历史上首次会聚一堂，就反殖民主义、民族自决、完全独立和世界和平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保证互相合作。他们提出了包含以上各点的“万隆十项原则”，一个被称作“万隆精神”的新潮流在国际形势中诞生了。 539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以及前此丘吉尔的提议，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于195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亲切协商，表现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这不外是由于核武器和制导武器，以及飞机的异常发展而形成了“恐怖的均衡”局势，产生了认为如果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则除了“废墟的胜利者”以外，再没有胜利者这样一种条件的反映。这次会谈带来了被称作“日内瓦精神”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的一个转折。此后，美苏对立的重点便从军事方面急剧地转向了经济竞赛方面。而且，以这次会谈为契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内部也开始动摇。1955年11月，北约成员国挪威表示反对设置外国军事基地和重新武装西德。以此为开端，1956年初，北约成员国冰岛也要求美军撤退，继而牵连到包括英、法、意等北约组织的动摇加深了。但是，开始动摇的尚不只是北约组织。

为了对抗北约组织，于1955年5月建立的被称为“红色北约”的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也在“铁板一块的团结”中开始产生了裂痕。即苏联在1956年2月的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确认推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同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随着斯大林偶像的被破坏，东欧各国对苏联大国主义压迫的不满以及对本国亲斯大林政权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不满也爆发了。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

10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先后发生了反苏、反政府的暴动。

五　日中友好和反对基地运动的展开

这时，在日本人民中间开展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新运动。

吉田政府虽然反对日本人参加 1952 年 4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但当时正在欧洲旅行的参议院议员、绿风会①成员高良富与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及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不带护照就访问了苏联并出席了经济会议，呼吁日本经济必须与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并表达了日本国民对和平的渴望。归途中，他们于 6 月前往中国，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筹备会"，并缔结了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是第一个日中民间协定，贸易额虽然微乎其微，但却打开了日美两国政府执行的美中对抗政策的第一个突破口，开创了日中关系的新阶段。由于高良等人的要求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大力协助，从 1953 年 3 月起，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得以开始回国。这是日本政府未能办到的事。5 月，政界、财界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组成了调整"日中、日苏邦交筹备会"，接着，在朝鲜停战协定缔结后不久的 7 月 29 日，国会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另一方面，中国虽有走向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情，但因吉田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便把吉田政府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把逐渐增加民间接触、以逐渐汇集成政府级接触这种"积累方式"作为对日政策的基调。1953 年 10 月，中国政府接待日本议员团访问北京，缔结了第二次日中贸易协定。

在日本，由于朝鲜停战，特需剧减，又由于 1953 年10月吉田政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经济萧条日益加深。一方面，扩大日中、日

---

① 绿风会：由参议院保守派议员山本有三等人于 1947 年组成，主要成员有旧贵族院议员、产业资本家、官僚及官办"农业会"系统人员，也有保守派文化界议员参加。——译者

苏贸易以克服萧条的呼声开始高涨；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缅甸等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对日本也有所刺激。于是，从1954年8月开始，日中贸易运动和恢复日中、日苏邦交运动突然活跃起来。9月，财界和政界中的有识之士组成了以促进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的东西方贸易为目的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中苏两国也在十月的联合声明①中，表明了对日关系逐步正常化的意向。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对正在访问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强调“和平共处”，并声明有意缔结日中互不侵犯条约。10月底，应日本红十字会及其他三个和平团体的邀请，中国红十字会的李德全女士来日，受到了国民的热烈欢迎。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恢复邦交运动，“调整日中、日苏邦交筹备会”，于10月发展成为“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其中，除议长风见章之外，还有村田省藏、平塚常次郎这样的财界实力人物也都参加了。

与这种恢复邦交运动发展的同时，把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的斗争与要求日本真正独立和和平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斗争也积极开展起来了。其典型就是1952年11月石川县内滩村村民奋起反对为建立美军打靶场而征收土地的斗争。这次斗争不仅是要求补偿，而且是反对建立基地本身的首次群众斗争。它不仅限于被害地区的村民，竟发展为整个国民的斗争，从1953年5月到9月达到了高潮。村民和前来支援的工人、学生，甚至静坐在美军的试射炮弹下面进行了斗争，但由于村民上层得到补偿金而妥协，警察进行了大力镇压，当地居民的政治和民族觉悟还不够高等，斗争终于遭到挫折。不过，在反对基地的斗争中，内滩斗争的先驱意义是巨大的，此后在日本各地都发生了反对基地的国民抵抗。自由党的政治家宫泽喜一写道：“要说到全国性的斗争，那么内滩问题是个

---

① 指1954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声明》，见《新华月报》，1954年第11号，第32页。——译者

开端，自此，基地问题便成了潜在的反美思想的温床。它不时与谴责政府的'逐步重新武装'交织在一起，这种民心所向是'旧金山和约'签订时，即仅仅一年半之前，连想也没想到的。"①

541 实际上，驻日美军基地的总面积，到1953年1月，已达到了14万公顷。如果再加上因基地而受到影响的周围的市、町、村，基地面积，据说相当于整个四国岛。基地是造成农民和渔民破产、风纪败坏、美军暴行和飞机噪音公害等深刻社会问题的原因，激起了广大国民的反基地感情。1953年3月，立川和横田等28个基地周围的代表聚集起来，在横须贺召开"保卫基地的孩子全国大会"，就是这种感情的表现。害怕反基地和反美感情扩大的日美两国政府，在9月间部分地修改了《日美行政协定》，对美军及随军人员在执行公务以外对日本人所犯的罪行，承认日本有权进行审判。

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从1954年春天以来，也发展到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地位。3月，美国在比基尼环礁强行试验氢弹，"第五福龙号"因此受害，该船电台台长久保山爱吉身死。以这件事为直接导火线，超党派、全体国民和平运动高涨起来。以安井郁为秘书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签名运动全国协议会"，到11月为止，征集了一千八百二十万人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签名。

这些人民运动的内在感情是人民对吉田政府的不满，反对吉田政府无视人民利益，采取对美屈从政策，并企图复活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不满，由于政府执行不民主政治而更加强烈。1953年2月，吉田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辱骂右派社会党的西村荣一是"混蛋"，招致众议院通过了惩罚首相动议和对内阁不信任案。在三月的大选中，革新政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势力激增，使保守势力受到威胁。进而，1954年初，发生了以造船、陆地运输贪污为中心的一系列贪污案件，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因有牵连被检察当

① 宫泽喜一，前引书，第174页。

局逮捕。吉田首相为了营救佐滕，竟于4月玩弄出所谓“发动法相指挥权”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硬独裁措施，遭到了舆论的反击。

6月初，为了强行通过警察法案，吉田又制造了日本宪政史上未曾有过的国会乱斗事件。财界日益要求停止保守势力的内部纷争，建立强有力的稳定政权，对失去民心的吉田内阁已经感到没有指望。在保守的政治家中，在财界的支持下也掀起了反吉田的、建立保守新党的运动。以重光葵和松村谦三等人的改进党，三木武吉和河野一郎等人的日本自由党，以及自由党内的反吉田派鸠山一郎、岸信介和石桥湛山等人为中心，在1953年11月，组成了以鸠山为首脑的日本民主党。该党固然是复杂的派阀联合组织，但同以官僚政治、秘密外交和逐步重新武装等为特征的吉田自由党及其政府相对抗，提出了大众政治、国民外交和通过修改宪法来重新武装等基本方针。该党的成立说明了吉田内阁和自由党日趋孤立。从1948年10月以来历经六年的吉田内阁，终于1954年12月垮台而总辞职。吉田内阁由于一味推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未能解决单独媾和的矛盾而垮台了，这个课题便遗交给了12月10日成立的鸠山内阁。

六　恢复日苏邦交和加入联合国　542

鸠山内阁根据民主党的基本方针，在外交方面提倡展开自主的国民外交，表示开展对中苏贸易和往来的态度；在内政方面，则宣布废除大臣官邸和禁止公务员与工商业者打麻将牌和玩高尔夫球等措施以争取民众好感。再加上鸠山开朗性格的个人魅力，在国民中唤起了“鸠山热”。1955年2月大选，民主党上升为第一大党。3月19日，第二届鸠山内阁成立。鸠山首相提出的最有特征的政策，是修改宪法和日苏复交。他公开表明自己的信念说：“为了国家的名誉也不能拥有军队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因

此，打算修改(宪法)第九条。”早在1952年9月，他在日比谷公会堂首次宣布“回到政界”以来，就一直主张修改宪法并恢复日苏邦交。在他看来，两者是成龙配套的。他在自传中这样说：

“我从首次宣布‘回到政界’以来所主张的修改宪法和日苏谈判问题，大体是从如下设想出发的：

当时，美国杂志上大书特书：‘1952年(昭和27年)是美苏战争的危险年’。就是说，无论苏联还是美国，最初扩充军备都是1952年，所以这一年最容易发生战争。我在养病期间也最担心这件事。

如果美苏爆发战争，那么，日本便会成为战场，苏联将立即攻击日本。因此，我认为与苏联的邦交必须尽速正常化。于是，在9月12日首次‘回到政界’的演说中也谈到了这件事，并主张应该在不威胁，不侵略的情况下谋求和平。为了谋求和平，既须由集团体制来维持‘世界和平’，又须由各国在各个地区弥补弱点。因此，各国有必要拥有自卫的军备。——这些就是我的主张。而吉田先生则说：即使拥有保安队乃至警备队，日本也绝对不拥有军队。

对于这种说法，我开始抨击说：‘吉田先生这种说法是白马非马论’。因此，修改宪法和日苏邦交正常化，好象是两个问题，其实本来就是套在一起的问题”。①

这就是说，日本应当在“集团安全保障”中，亦即在联合国中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卫的武装”；为了加入联合国，就必须实现恢复日苏邦交以取得苏联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而为了重新武装，就必须修改宪法。恢复日苏邦交，本来是为走向全面媾和开辟道路，但按鸠山的说法，则只不过是单独媾和与重新武装路线的补充物。②

---

① 鸠山一郎：《鸠山一郎回忆录》，文艺春秋社，1957年，第116—117页。

② 信夫清三郎：《吉田政权的崩溃》，(1954年)，《法政论集》(名古屋大学)，43号，1968年3月，第76页。

鸠山内阁站在这种立场开展了内政和外交，但在修改宪法方面，由于1955年2月大选中，以左派社会党为首的革新势力确保了三分之一议席，足以阻止修改宪法，未能达到目的。唯其如此，这次大选的历史意义很大，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维护宪法意识的高涨，这种高涨是以国际紧张走向缓和，国内恢复日中、日苏邦交运动、反对基地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发展等等为背景的。但是，鸠山政府推行重新武装，其速度比前内阁更加快了。根据《日美行政协定》，美国驻军的劳务、作业、用品、运输、通讯和服务等所需经费，由日本与美国各自承担一半，而根据1955年4月与美国商妥的防卫费分担决定，日本方面分担的费用由过去的558亿日元减为380亿日元，其代价则是，保证增强陆海空军，履行生产喷气式飞机的预算外合同，扩建立川和横田等五个机场的跑道等各种加强防卫措施。鸠山内阁执政两年期间，自卫队总兵力从十五万二千人增加到二十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二人，并且在MSA援助的基础上改善了装备。1955年7月，政府还同意（美国）驻日美军运进"诚实的约翰"原子炮。但是，出乎日美两国政府的预料，反对核武器的舆论十分强烈，运进核弹头这件事才算被阻止住了。

另一方面，由于修改宪法遇阻，鸠山内阁就把政治生命寄托在实现日苏复交上，并进行了日苏谈判。关于日苏谈判，一贯亲美的吉田自由党表示强烈反对，在执政党的民主党内部，意见也有分歧。1954年12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声明"准备实现日苏关系正常化"。1955年1月，苏联驻日代表团多姆尼茨基(Domnitsky, A.)致鸠山首相的信中也体现了这个意图。鸠山政府乃乘此机会开始了谈判。1955年6月，日本全权代表松本俊一和苏联全权代表马立克(Malik, Y. A.)在伦敦开始谈判，到9月中旬共进行了十五次。但是，由于两国对领土问题意见分歧，会谈遇到了障碍，其后一时停顿。双方对领土问题的对立点是：日本方面主张(1)、要求

归还南千岛群岛和齿舞、色丹诸岛；(2)、南库页岛、北千岛群岛可按旧金山和约让给苏联，但其归属须由原盟国进行协商后决定。而苏联则主张(1)同意归还齿舞、色丹诸岛，但其他地区则是苏联领土；(2)反对由原盟国协商决定南库页岛及北千岛的归属问题。

在此期间，人民大众反对鸠山政府实行重新武装的政策、要求和平的斗争在不断高涨。1955 年 2 月，为反对运进“诚实的约翰”原子炮和扩大美军在北富士的练兵场而掀起了激烈运动。5 月，砂川町全体居民团结一致，奋起斗争，反对扩大立川美军机场。6 月，在全国拥有 35 万会员的母亲大会，聚集两千名代表召开了全国大会，要求充实社会保障，撤除军事基地和禁止原子弹氢弹等。8 月，在禁止原子弹氢弹签名运动全国协议会的号召下，来自各个阶层、职业和党派的五千名国内代表和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五十余名国外代表会聚一堂，在广岛召开了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此外，还开展了援救“松川事件”① 被告者运动和解放被歧视部落运动② 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民运动的发展，也反映到革新政党内部，导致了社会党内两派的统一和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共产党在 1955 年 7 月的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六全协)上，对该党的极左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家长制的个人崇拜，进行了公开的自我批评，③ 谋求该党的改造和支援者的扩大。社会党内两派也在 10 月决定实现统一，并肯定日本还是一个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不完全独立的国家，提出了日本应采取不卷入美苏两大阵营纷争的独立自主外交等等。

544

---

① 松川事件：1949 年 8 月 17 日在东北干线松川站附近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反动当局认为由日共破坏所致，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经最高法院驳回一、二审有罪判决后，1963 年宣布全部无罪。——译者

② 被歧视部落解放运动：要求废除对部落居民的差别待遇运动，战前以“水平社”为主体，故称“水平运动”。——译者

③ 《日本共产党的五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1972 年，第 38 页。

面对着国民运动和革新势力的发展，财界要求确立长期而稳定的保守政权，迫使保守阵营进行统一和加强。随着经济力量的恢复，财界对政界的指导力量日益加强。正是由于财界的指导力量，民主党和自由党因争夺主导权和党内复杂的派阀抗争经历了许多迂回曲折，终于合并组成了自由民主党。保守势力的联合和社会党内两派的统一，结束了战后长达十年的多党时代，形成保守与革新的单纯对立，并以二比一的力量对比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对于保障财界所希望的保守政权长期独裁化和政治反动化形成了一个起点。[①] 1956 年 1 月，财界主脑决定建立“日本经济重建恳谈会”，以便财界向政界统一提供政治捐款，认为“把资本作为一个整体，与单一的保守政党公开沟通渠道，以资推行旨在重建经济的强力政治，谋求政局的稳定，现在已经是这种时期了”。

由于自民党的建立，内阁执政党的派系分野发生了变化，因而鸠山内阁提出了总辞职。1955 年 11 月 22 日，建立了第三届鸠山内阁。该内阁在 1956 年初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例行国会上，利用保守势力联合后占优势的力量对比，强行通过了以修改宪法为目的的《宪法调查会法案》，并在 5 月通过了以加强军备为目的的《国防会议法案》。在外交方面，政府对与中国进行民间交流和贸易采取默认政策，表现了向自主外交前进的姿态，但对中国方面在1955年 8 月、11 月和 1956 年 1 月三次提出的邦交正常化的呼吁却未作出响应。之所以如此，政府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追随美国的路线。而社会党醉心于日中之间“积累方式”的成果，忽视了展开强有力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在另一方面，鸠山首相从其所持观点出发，对日苏交涉却表现了积极的热情。他表示决心说：“我作为政治家的使命，在

---

① 内田健三：《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政治记者的证词》，岩波新书，1969 年，第 84 页。

于日苏交涉和修改宪法”,“特别是日苏复交,希望在我的任期内一定要予以解决。”① 而且,在195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申请加入的各国中,除日本、蒙古、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之外的十六个国家都一起加入了联合国。而日本等国则由于苏联的反对还是未能加入,这件事使他更痛感到日苏交涉的必要性。日苏交涉在1956年1月重新开始。3月,无限期休会。此后,从7月31日起,以重光葵外相为首席全权代表再度恢复谈判。但是,由于日本国内情况的影响,没有取得丝毫进展。在自民党内,鸠山首相和河野一郎等人持早日妥协论,而亲美的原自由党系的吉田—池田勇人派则持反对论,两派尖锐对立。重光外相本人由于根深蒂固的对苏不信任感,则主张优先解决日苏间诸悬案的慎重论,对交涉不热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劲地给它泼冷水。”② 这种不统一被称为“二元外交”,成了党内反主流派攻击的对象。他们想利用这一点把鸠山赶下台。美国则支持反对论和慎重论,以“经团联”会长石坂一郎为中心的财界主流,也由于对美国的顾虑和对“共产主义渗透”的警惕,对日苏交涉持消极态度。此外,1956年9月6日,以“经济团体连合会”会长石坂一郎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为代表的财界四团体八十四个志同道合的人联合向自民党提出了鸠山首相立即引退的要求。

对于这种情况,河野农相愤怒谴责财界插手政治,鸠山主流派则反而加强了鸠山访苏的决心。鸠山首相认为,不必坚持领土问题(要回国后和择捉),只要日本加入联合国,“在这个舞台上当然可以商谈国后和择捉的问题”。③ 从这种信念出发,1956年10月,

① 河野一郎:《因为是现在,我才要说》,春阳堂书店,1958年,第5页。

② 松本俊一:《莫斯科上空的彩虹——恢复日苏邦交记录》,朝日新闻社,1966年,第164页。

③ 鸠山一郎,前引书,第196页。

他带病亲自飞往莫斯科进行谈判，并于10月19日好歹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这个宣言并不是媾和条约，仅仅是结束两国战争状态，恢复邦交。关于领土问题悬案，也只写明在和约缔结后把齿舞、色丹归还日本。缔结媾和条约，依然作为以后人民的课题遗留下来。11月，临时国会通过了日苏关系的议案，但在众议院正式会议表决时，自民党内反对派却以集体缺席表示不满，而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则全部表示赞成。

由于日苏恢复邦交，日本得以在195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从吉田内阁到鸠山内阁，由于政治主体的转变，单独媾和的矛盾才得到了解决。日苏复交排除了美国和国内亲美势力的反对论和慎重论，也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在这种"人民性"的意义上，鸠山外交与一味追随美国的吉田外交有所不同，具有自主性的一面。但是，对于鸠山内阁来说，日苏复交只不过是单独媾和与重新武装路线的补充；对他们来说，剩下的课题就是"名正言顺地重新武装"并为此而修改宪法。在这一点上，同革新势力的全面媾和路线，即否定单独媾和和安保体制，主张拥护和平宪法和中立外交，则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亲美保守势力和财界主流对日苏交涉是消极的乃至是反对的，对交涉结果未能解决领土问题也很不满。他们向鸠山首相施加压力，使他不得 546 不下台。1956年12月23日，成立了以石桥湛山为首的内阁。但是由于他患病，这一内阁短命而终。政权转移到了岸信介手中。1957年2月25日，岸内阁成立。

第二节　改订安全条约

七　外交三原则及其矛盾

岸首相与战后历任首相不同。战后历任首相——币原、吉田、

鸠山、石桥对"大东亚战争"均持批判态度，岸首相则是一个在战争期间当过东条内阁商工大臣和国务大臣，还干过军需次官，战后作为战犯，在巢鸭监狱关了大约三年的人物。1957年7月，岸首相改造了石桥内阁留下的原班人马，巩固了以岸—佐藤荣作兄弟派阀和河野一郎—大野伴睦派为中心的势力，外相则邀请财界巨头、举足轻重、并不断介入政治的藤山爱一郎来担任。"财界大臣"的诞生，与财界大使和首相朝拜华盛顿同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新花样。藤山和岸之间，在对美、对中姿态和日本的自主化等问题，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他的入阁是垄断资本积极意图的反映，是一方面要以他为负责人来修改由于单边性和不平等性而与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现状不相适应的《日美安全条约》；从财界立场出发来开创"日美新时代"，另一方面则想实现对东南亚市场的扩张。

体会到这种意图的岸政府，在1957年9月发表了外交蓝皮书，表明了政府的基本态度。这个蓝皮书的目的是对国会和国民表明政府对当前世界形势的认识和基本态度，同时具体说明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它同战前以编年史体裁搜集日本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协定，以及与外国纠纷有关的外务省声明等等那种单纯外交文件汇编的《外务省公报集》是显然不同的。政府在蓝皮书中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保持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等三点做为日本外交三原则。但是，恰如下述事实所表明，这个三原则中交织着财界的帝国主义野心和矛盾。

首先，关于"与自由主义各国保持协调"。政府虽然把对美国协调作为核心，重视了对南朝鲜和台湾的协调，但却在"日美新时代"的名义下，开始朝着以修改《安全条约》为中心，调整对美关系和日本的自主化前进。1957年6月，岸首相访问美国，在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的会谈中，提出了修改对日本不平等

性很强的现行《安全条约》、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的行政权、放宽美国对日货进口的限制以及东南亚开发基金等问题，就是上述动向的表现。可是，美国却一概置之不理，仅仅建立了一个“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不仅如此，美国还以既定方针，即以撤退驻日美军 547 作为交换条件，给日本加上了增强军备的义务。

另一方面，岸内阁还着手改善对韩国的关系，即致力恢复邦交，但这也未见成效。从 1952 年 2 月以恢复邦交为目的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以后，1953 年 4 月和 10 月，又先后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谈。历次会谈的特征是，韩国方面以日本对过去的压迫和掠夺表示道歉为先决条件；而日本方面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第三次会谈时，日本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竟恬不知耻地说，日本统治朝鲜，修筑铁路，开拓农田，兴修水利设备等，给了朝鲜好处，并没有掠夺和压迫朝鲜，因此激怒了朝鲜，会谈在两周内就破裂了。

日韩会谈此后中断了近五年，但到 1958 年 4 月又开始了第四次会谈。发生这一变化的背景是，面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中国的跃进、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韩国的旧态依然等不利情况，美国企图利用日韩协调，让日本来代替美国在韩国的地位，以对付这种不利局势；而正在复活帝国主义的日本，则企图利用对韩协调和代替美国的地位来向韩国扩张。1958 年 6 月，第四次会谈的首席代表泽田廉三与旧朝鲜总督府有关人员聚会时说：“如果我们不能（继日中和日俄战争之后）第三次把三八线推过鸭绿江边，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这是日本外交的任务。三八线是韩国的生命线，也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些话正好反映了岸政府的姿态。第四次会谈围绕着“李承晚线”以及对北朝鲜希望归国者的遣返等问题，双方意见产生了对立。1959年 6 月，会谈终于破裂。“李承晚线”是 1952 年 1 月韩国李承晚总统以国

防为理由而划定的范围很广的海洋主权线，是违反国际法的擅自主张的东西。韩国政府以保护水产物等为理由，一直禁止日本渔船进入李承晚线，并拘捕了违禁的渔船。撤销这条线，保证日本渔船的安全作业，是日本政府这些年来的课题。

关于三原则中的“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也可以说情况是一样的。从1957年5月到6月，岸首相历访缅甸、印度、台湾等五国；11月，又历访南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九国，致力于建立亲善关系，并提出了亚洲开发基金的设想和设立技术研究中心等提案。但是，这个开发基金的设想，是以从美国借来的资金谋求日本对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扩张，并借以表示日本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关于这一点，《岸信介传》的作者，记述了岸首相的如下想法：

“东南亚现在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无论是为了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履行其义务，或为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或为了确保复兴了的日本经济的市场，东南亚对日本来说，其重要性都是很大的。用日本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各新兴国家确立经济基础，同时扩大日本的市场，由此而在政治上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方向就是今后日本外交前进的道路。”①

548

岸信介的这种设想，得到了泰国和台湾等反共亲美各国的赞同，不过，缅甸、锡兰和印度等中立主义各国却投之以严厉批判的目光。这些国家感到，在曾经是战犯的岸首相设想中，有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性格，并认为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才是确保亚洲和平的关键，从这种立场出发，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

还有，在外交三原则中的“以联合国为中心”方面，岸政府派藤山外相参加了1957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联合国大会，对各参加

---

① 吉本重义：《岸信介传》，东洋书馆，1957年，第292页。

国积极进行工作，取得了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政府还向该大会单独提出了关于促进裁军谈判及停止核试验的决议案。但是，处于西欧提案和苏联提案两者之间的这个日本提案，仅仅得到一个"不偏不倚"的批判而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上被否决。在1958年7月的黎巴嫩问题上，岸政府也暴露了外交三原则的矛盾，受到了舆论的批判。这是指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后，美国出兵黎巴嫩，藤山外相对此表明向前看的态度说："希望尊重阿拉伯民族的自主权，早日实现撤退美英军队"，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但是，当安理会提出黎巴嫩问题时，自民党内外认为日本这种态度会恶化对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强烈反对意见。此外，杜勒斯国务卿又对当时正在访美的藤山外相进行强硬谈判，岸政府慌了手脚，在7月16日安理会表决美国提案以前，向日本代表表示态度说，要支持美国提案。这充分表现了左右摇摆的外交作风，也暴露了岸与藤山设想不同及由此而造成的不统一。

八　敌视中国的政策

岸内阁在推行上述的外交三原则的同时，还推行了与此互为表里的敌视中国政策。这种政策的背后，除了岸本人的顽固反共主义之外，还有这样一种意图，即对美国造成"反共基地日本"和"反共亲美的岸信介"的印象，以有利于修改《安全条约》。岸首相就任以后，一面反复重申无意承认中国和恢复邦交，一面又在访问东南亚时顺便跑到台湾，并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说什么对于"中国大陆现在不幸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对于中华民国的困难处境，不胜同情"，煽动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态度，也贯穿在下述日中贸易和中国国旗事件等问题之中。

鸠山时代缔结的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于1957年5月到期，可是，岸内阁不同意派遣谈判代表，以至中止了协定。但是，曾

把1956年夸耀为"高天原景气"[①]的日本经济，由于生产过剩和国际收支恶化，到第二年，即1957年的后半年，便跌落到"锅底景气"了。财界和国民对日中贸易的要求高涨。此外，1957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上，英国主张大幅度放松对华出口的限制，并且不顾美国的反对，单独放松了限制，想要积极打进中国市场，这也不能不使日本贸易界惊慌起来。就这样，在强烈要求开展日中贸易的情况下，"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便于1957年7月发展成为"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为了进行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会谈，同年9月和1958 2月，先后向北京派遣了代表团，3月，达成了第四次协定。这时，以八幡制铁所为中心的日本钢铁使节团也与中国五金公司缔结了钢材和钢铁原料的长期换货协定。但是，岸内阁害怕美国不愿意，对发展日中贸易持消极态度。于是，在对日中贸易积极的财界人士中，传出了不满之声，说"外务省好象是美国国务院的日本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政府对前来日本的中国商务代表团悬挂国旗一事提出了抗议。岸内阁立刻慌了手脚，以未恢复邦交为理由，采取了不承认中国悬挂国旗权利的方针。中国对此项措施十分愤怒，于1958年4月13日废弃了第四次贸易协定，停止履行约达450亿日元的进出口合同。

就在这时，在长崎又发生了中国国旗事件，事态进一步恶化了。这就是，5月2日，在长崎市内百货大楼展出的中国邮票展览会上，反华暴徒撕下中国国旗的事件。中国方面当然对这一事件异常愤慨。5月9日，陈毅外长激烈地批判说："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岸首相非但不向中国方面表示歉意，反而采取抗拒态度，反诬说："中共才是不友好的。"

---

① "高天原景气"：高天原是日本神话中的圣地，是诸神住的地方。日本资产阶级以此比喻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假繁荣。——译者

两国政府间的对立立即升级。5月10日，中国方面终于提出了全面停止日中贸易的方针。11日，日中渔业协定谈判也遭到拒绝。7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警告说："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

就这样，日中关系中断了。1958年8月，社会党参议员佐多隆忠访问中国，为打开这一局面刺探中国的意向。中国政府对他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做为打开日中关系的前提条件。即：（1）立即停止并不再出现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碍恢复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此外，关于长崎国旗事件，中国还要求（1）由日本政府代表团在现场重新升起中国国旗；（2）惩罚撕下中国国旗的犯人；（3）向北京派遣政府代表团，表示道歉。对此，日本方面并没有采取足以满足中国要求的措施。就这样，这个"政治三原则"与"政经不可分原则"一起，成了后来制约日中关系的基本原则。

岸内阁的敌视中国政策，也表现在越南赔偿问题上。根据1954 550 年7月的日内瓦协定，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停战线，被分成南北两部，并规定在1956年7月以前实行选举，实现南北统一，以保证越南的独立与和平。但是，美国企图把南越置于控制之下，使之成为"遏制中国"政策的前进基地，自1955年以来一直违反协定，一方面对南越保大政权及其后的吴庭艳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指使吴政权拒绝没有胜算的南北统一选举，把临时分界线变成了国境线，使民族分裂完全固定化起来。人民要求越南独立、统一、和平，这种希望被美国残酷地打碎了。而且，吴庭艳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凡向政府稍加批评，即被扣上"越共"的帽子，肆意逮捕监禁。这个政权还想从农民手中夺

回1946年至1954年第一次越南战争期间经胡志明政府的土地改革而分得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地主。对此，在以越南的谷仓—湄公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各地农民起而反抗。这种反抗与城市和其他地区在政府镇压下而不得不进行地下斗争的人们结合起来，在民众反抗政府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日益发展，他们反抗政府的游击战也日益加强。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反人民的、独裁的吴庭艳政权，岸政府却想要偿付高达五千五百六十万美元的战争赔偿。如果向战祸比较轻微的南越偿付赔偿，那么对于损害极大的北越就更应该偿付相当的赔偿。在越南北方，主要由于日军残酷掠夺粮食，从1944年末到1945年，饿死者达二百万人以上。① 但是，岸政府对这些事却置之不理，而在1959年5月13日，只与吴庭艳政府缔结了赔偿协定。在国会里，虽然就所谓"三只鸡二百亿日元"② 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是，政府和执政党却在11月25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在反对强行通过该协定的社会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该协定。接着，在12月21日的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又强行停止质问，并于12月23日通过了这个协定。这种强行通过，与1956年2月宪法调查会的情况一样，是践踏议会制民主，把通过国会对外交实行民主管理变成了一句空话。如此不择手段地强行通过赔偿协定，其背景是政府和财界隐藏着下述的意图，即利用赔偿这个手段打进接受美国庞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南越市场，同时支援吴庭艳政权使之免于崩溃，以配合美国的分裂南北越南和美中对抗政策。

---

① 亚非研究所编：《越南解放史资料》〈1〉，劳动旬报社，1970年，第413页。

② 三只鸡二百亿日元：二百亿日元，恰合五千五百多万美元。此语当系讽刺岸信介政府这次对南越的赔偿只换来三只鸡。——译者

九　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正当岸政府这样鞠躬尽瘁热中于敌视中国政策之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则通过"新面貌战略"的展开，在中国四周的冲绳、韩国和台湾等地推行着美军基地的核武装化。这个战略是1954年至1957年间为求得"健全经济与强大军备的均衡"而炮制出来的综合战略，是以杜勒斯国务卿所谓"美国能在希望的时候、希望的地点施加大规模报复"的"大规模报复"理论为依据的。由于这种战略的展开，促进了导弹的发展及核武器的小型化和常规武器化，推进了美军基地的核武装化。1957年5月宣布："斗牛士"地对地战术导弹部队的先遣队已到达台湾，并将在冲绳建设"奈基II型"导弹基地。同月，韩国陆军当局也宣布，在过去三年里，陆军第27师一直在进行核武器的机动演习。另外，在茨城县水户市外的美军射击演习场，进行了使用模拟炸弹的小型核弹空投训练。1958年10月，在冲绳已配备了两个营的"奈基"部队。 551

在这种开展"新面貌战略"和核基地化的形势下，岸内阁对宪法第九条提出了新的解释，并进一步扩充军备。1957年4月，岸首相在国会答辩中，改变了以前吉田和鸠山两政府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发表见解说："拥有为自卫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自卫权的具体内容，是不违反宪法的"，摆出了要在"自卫"的名义下无限制扩军的姿态。这种说法后来一直成了自民党政府解释第九条的基准。岸首相进而在5月7日的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答辩说："如果在自卫权范围以内，那么，拥有核武器也是可以的"，给拥有战术核武器留下了后路。政府在5月的国防会议上，决定了所谓"逐步整备有效率的防卫"的基本方针，并在6月，作为长期增强军备计划的一环，制定了以"整备骨干防卫力量"为重点的"第一次防卫力整备计划"（1957—1960年）。从1957年

度起，防卫厅把研究导弹作为第一重点，1957 年 12 月又决定购入“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日本军备的增强，加上美军远东基地的核武装化，为撤退驻日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创造了条件。1958年初，美军地面部队撤退完毕。这种事态意味着，日本军备的增强已从过去的量变转化为质变，随着美国地面部队的撤退，自卫队已可代替美军，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岸内阁就这样沿着美国的新战略路线推行军备扩张，并由于自民党在 1958 年 5 月大选中获胜，对长期而稳定的保守政权增加了自信，于是提出修改《安全条约》，作为“日美新时代”的第一步。

岸首相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决定设置的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于 1957 年 8 月正式成立。在 9 月 4 日的第二次委员会上，日本政府提议，把《安全条约》中未曾明确规定的《安全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明确起来并进行换文。结果，9 月 14 日，藤山外相和麦克阿瑟大使在外务省交换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的文件》。换文确认，《安全条约》应服从联合国宪章；并规定，根据《安全条约》驻在日本的美军，当为“维持远东和平与安全”而出动时，其行动应只限于行使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集团自卫权，从而把驻日美军的行动权限制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之内。① 吉田首相曾念念不忘要把《安全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联系起来这个任务，通过这次换文基本上得到解决。岸内阁乃进而打算对《安全条约》作彻底修改。还想把《行政协定》改成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相同的协定，也列入了计划之内。

但是，关于如何修改《安全条约》，岸首相与藤山外相的想法不同。岸信介考虑的方式是，以承担除海外派兵以外的防卫义务为条件，制定两国对等的、双方承担义务的新条约；而藤山则警惕新

552

① 朝日新闻安全保障问题调查会(编)：《日美安全条约的焦点》，《朝日市民教室丛书》第10种，《日本的安全保障》，朝日新闻社，1967 年，第 53—54 页。

条约将给日本增加新义务，认为现行条约所规定的租借基地协定性质只好如此，主张在新条约中明确美军在日本的防卫义务，并对美军向远东的出动与核武器的运进加以限制等等，其目的主要是修改现行条约的单边性。这种分歧在后来激烈的安保斗争中，虽曾极力加以抑制，防止表面化，但它却逐渐变成了两人政治决裂的主要原因。①

1958年9月，藤山外相访美，在与杜勒斯国务卿的会见中正式提出修改《安全条约》问题。杜勒斯也表示同意。美国去年拒绝修改《安全条约》，而现在又同意，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希望更进一步促进日本适应美国的“新面貌战略”而增强军备。杜勒斯国务卿在欢迎藤山外相访美的谈话中说：“现在的日本与刚制定安全条约时不一样了，自卫力也加强了，从这点来看，《安全条约》可以重新研究”。而且，面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新中国的跃进，以及苏联洲际导弹（ICBM）的发展等情况，美国希望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日本关于修改条约的要求，来确保日本的对美合作并促进其扩张军备；其二，日本人民对不平等的《安全条约》日益不满，美国有必要稳定面对这种不满情况的日本保守政权。

取得了美国同意的藤山外相，在1958年9月30日第三十届临时国会的演说中正式宣布将要开始修改条约的谈判，同日，又在接见记者时作了乐观的估计：“希望能在下次国会提出新条约，以此为目标进行谈判。”这里，他并没有把人民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激烈斗争等估计在内。但就在这一天，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以代表身分起来质问，明确表示反对修改《安全条约》，并强调要废除《安全条约》，确立以日、美、中、苏为中心的新安全保障体制。

于是，1958年10月，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在东京开始，举 553

① 冈田任雄，《政治的内幕》，有纪书房，1959年，第185—189页。内田建三，前引书，第128—129页。

行了两次正式会谈。会谈期间，岸首相表明了所谓“制订相互防卫条约型的新条约，把冲绳和小笠原纳入日本防卫义务范围”的设想。随之，社会党和社会舆论认为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增大了，掀起了强烈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的影响下，这个问题在自民党内也成了重大政治问题。正在这时，政府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第三十届临时国会提出了“警职法”修正案①，企图用来对付安保斗争。由于这个法案是赤裸裸地反人民、反民主主义的，于是以社会党和总评为首，四百万工人、妇女、市民、农民和学生等，奋起进行斗争，摇撼了岸内阁的基础。人民运动的高涨也波及到自民党内，以松村谦三、三木武夫等人为中心的反主流派，对政府的做法开始表示不满。“警职法”终因在国会未完成审议而成了废案。此外，在自民党内，情况也在复杂化：对“警职法”的批判与对《安全条约》谈判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反主流派强烈主张慎重，池田派等中间派则大谈修改为时尚早。在舆论的批判中，党内各派阀的实力人物看到岸政权寿命不长，他们的想法便开始趋向一致，先让岸信介搞完修改《安全条约》，然后结束其政治生命。他们开始关心的已经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方法来掌握主导权了。在日本的政治风云中，外交完全转化为“内争”了②。这样，政府当然不会积极进行对美谈判。从10月初起，仅仅进行了三次会谈，毫无进展。

十　安保斗争

对于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中苏两国早就反对，并要求废除《安全条约》和日本的中立化。1958年11月，中国在陈毅外长的声明中，希望日本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苏联也在12月的备忘录

---

① 警职法：即“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主要内容是，为对付紧急事态，警察官有权即刻采取强制、审讯、搜索、检查等手段。——译者

② 内田健三，前引书，第140页。

中，保证尊重日本的中立。中苏两国要求日本中立，对日本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到了1959年，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高涨起来。2月，“拥护宪法国民联合”等五个团体发表了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共同声明，接着召开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国民大会”及“废除《安全条约》、推进和平共处、日本和平大会”。3月间，召开了有一百二十四个团体的六百二十名代表参加的大会，组成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大会提出的中心口号是“以国民之力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并争取废除”。社会党、总评和中立劳联等十三个团体被选为国民会议的干事，共产党也被允许作为观察员列席。“全学联”因采取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被排除在外，但在某些地方组织里，仍然同共产党一起正式参加了。4月，国民会议发起了第一次统一行动。

这时，在日中两国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批判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以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团长身份在北京访华的浅沼书记长，于3月12日谴责美国企图使台湾和冲绳美军基地核武器化，并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浅沼的这次谈话，成了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日后长期论争的种因。自民党干事长福田赳夫听到后立即批判说，他“有负众望，不负责任，冲击了国内国外”，向正在北京的浅沼拍发了抗议电报。在社会党内，右派也对浅沼谈话进行责难；加之，两派对修改《安全条约》意见分歧，他的谈话加深了刚刚合并不久的左右两派之间的鸿沟，并由此导致1960年1月民主社会党的建立。不言而喻，自民党和社会党右派对浅沼谈话的批判言行，对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起到了牵制作用。 554

面对安保斗争的高潮，在政府和自民党中，以1959年6月的内阁改组为契机，围绕着内阁和党执行部席位而展开的“内争”愈

加活跃。在各派阀中，池田派与岸—佐藤派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为修改《安全条约》分担责任的主流派。反之，河野派则大谈"安保花道论"①，转为迫使岸引退的反主流派。但是，及至9月，自民党内总算大体统一了意见，政府又对美国进行交涉。在1960年1月6日，修改谈判终于完成。19日，岸首相在华盛顿签署了新条约，并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

新条约的正式名称是：《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另附有关实施细则的五个附属文件，和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一个协定及两个附属文件。关于驻日美军地位的协定，其正式名称是《关于根据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的安全保障条约第六条的设施和区域及在日本国的合众国军队的地位的协定》。它以1951年6月19日签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关于其军队地位的协定》(《伦敦协定》)、及1959年8月3日签订的《美国和西德之间关于驻西德美军的地位的补充协定》(《波恩协定》)为标准，总之，是把过去的《行政协定》(指1952年2月28日签订的《日美行政协定》——译者)改订成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一样的东西。关于《行政协定》，最受到批判的是刑事裁判权问题。这个问题在1953年9月29日的改订议定书，即《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日本与美国关于修改"日美行政协定"第十七条的议定书》中，已将《行政协定》的属人主义，改取属地主义②，大体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相同，得到了解决。

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各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

---

① "安保花道论"：花道是日本歌舞伎舞台两侧演员上下场的通道。"安保花道论"，意思是要求岸信介在修改安全条约后，即行下台。——译者

② 属人主义：指以罪犯所属国籍为准，即不论犯罪地点是在本国或外国，均按其所属国家的法律判处。属地主义，则以犯罪地点为准，即不论罪犯属何国籍，均按犯罪地点所在国家的法律判处。——译者

拥有兵力和不拥有兵力的区别，说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相同，其实还是有限度的。新的"地位协定"适应日本在防卫上作出的努力，废除了防卫分担费，此外，尽管作了某些修改，或缓和了一些刺眼的表现，也只是作了部分的修改，实质上仍然继续了《行政协定》。只有一点，新协定规定："须由日本国及合众国按照各该国法定手续加以承认，并互换通知此项承认的公文"，在日本则需经国会批准。在谈判《行政协定》时，日本方面最初曾主张需经国会批准，但因美国反对，作了让步，成为无需经国会批准的 555 《行政协定》，此事在国会里遭到多次批判。这一次，也许是吸收了上次教训，政府明确表态说，新协定，"与原行政协定不同，是作为国家间的协定而缔结的，因此，必需经国会批准。"但是，美国方面却坚持新协定在法律上仍然是两国政府间的行政协定，仅仅向议会做了个报告，就算完了。

《安全条约》是，旧条约无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平等的，单方承担义务的东西，从两国之间对等的条约这种观点来看，是不成其为条约的，只不过是租借基地的协定而已；而新条约，至少在表面上或许可以说具备了两国对等的、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形式。新旧条约的共同点是：（1）许可美军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和地区；（2）美军常驻日本；（3）美军不只是为了日本的安全，而且为了远东的安全也可以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等等。其主要不同之点是：（1）明确了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2）明确了美国防卫日本的义务；（3）明确了在日本行政权管辖下的领域内，日本保卫美国的义务；（4）在服从（日本）宪法规定这一保留条件下，规定了逐渐增加自卫力量的义务；（5）扩大了协商的范围，即使对条约的实施或在远东安全发生威胁时，也可以进行协商；（6）确定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合作；（7）条约有效期规定为十年，并规定其后在废除时要事先通告；（8）新规定了事前协商制度；（9）明确了冲绳、小笠

原与条约的关系；(10)删除了内乱条款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到1960年，包括日美《新安全条约》在内，美国先后与四十二个国家缔结了《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里约热内卢条约》[①] (1947年)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等八个共同安全保障条约。这些条约的共同目标，是缔约国联合抵抗武装进攻。在这方面词句上不同点是：《北大西洋公约》和《里约热内卢条约》均规定缔约国对武装进攻可以立即进行反击；而其他各条约则规定，在反击时"须按照本国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这是出自杜勒斯国务卿的考虑，其实并不是为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宪法，而只是为了避免争论战争权是在总统和内阁，还是在议会，是出于为了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考虑。因此，对美国来说，这些条约上的不同点是不成问题的，美国如何运用条约，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利益。[②]

关于《新安全条约》，在日本最受重视而议论纷纭的问题，是条约中所说的"远东的范围"。因为根据其范围如何，日本被卷入与己无关的、美国的战争的危险性会扩大的。特别是围绕着台湾海峡，美中之间充斥着一触即发的险恶空气，日本会不会也被拖进纷争？这种不安在国民中间加强了。1960年2月开始的安保国会上，论战的最大焦点集中在"远东的范围"这个问题上，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用说在野党，就是在自民党内，松村、河野等反主流派也严厉要求政府明确"远东的范围"，强烈反对把远东地区包括在共同防卫的对象之内。对此，政府有时说："中国沿岸的金门、马祖两岛包括在防卫范围之内"，有时又规避说："不能讲包括在内或不包括

556

① 即《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1947年9月20日)，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519页。——译者

② R.A.保罗(Paul)：《美国海外军事义务》，拉特格斯大学出版，1973年，第14—29页。

在内”，直到最后，这个问题也是含混不清，而强行定下了岸首相在2月26日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上所表述的下述政府统一见解，即：“所谓远东，大体上是指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的地区也包括在内。”

正是《新安全条约》的这种危险性质和政府的暧昧态度，激发了国民的不安，成为反对《安全条约》斗争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两三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成了斗争高涨的条件。这是指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洲际导弹试验，接着在10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以此为转折点，美苏关系进入了新阶段。1958年1月缔结美苏文化协定，就是其最初的征兆。次年4月，冷战政策的推行者杜勒斯国务卿辞职，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形势随之更加成熟。7月，尼克松副总统访问苏联。9月，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亲自赴美进行回访。这一连串的事实教育了日本国民，使他们认识到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是完全违背国际形势发展的。而且，1960年5月，美国U2型间谍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东西方首脑会谈因此流产，这件事清楚地暴露了美国的侵略政策，也暴露了美国U2型飞机驻在日本这一事实，结果对安保斗争火上浇了油。

另一方面，1960年4月掀起的韩国人民的“四月起义”也给安保斗争以很大的刺激。从1948年8月以来，韩国在美国的控制下，一直执行着李承晚总统的独裁政治，再加上经济崩溃，人民的不满日益加强。“活不下去，要改变政治”，成了人民中的暗语。1960年3月总统选举中，李承晚派的舞弊成了导火线，人民的不满爆发了。4月18日，汉城掀起以大学生为中心的大示威，以此为信号，反政府运动爆发了。4月26日，十几万市民拥到总统官邸，迫令李承晚辞职。在群众示威下，这个独裁者也终于不得不屈服，于27日辞职了。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声援也鼓舞了安保斗争。中国外交部在

岸首相等人出发前往华盛顿签署《新安全条约》之前，发表了《关于日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声明》（1960 年 1 月 14 日——译者）。条约签字后不久，北京召开了反对日美军事同盟大会。会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说，"日本人民的斗争，还打乱了美日反动派尽速缔结军事同盟的时间表，"高度评价了这一斗争的意义，并说，"日本人民这一斗争规模的宏大和深度，……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①，支持了正在日本不断高涨的反对斗争。1960 年 4 月，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严厉谴责"这个条约，不仅威胁中国和苏联的安全，而且首先直接威胁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安全。"② 此后，与日本的斗争相呼应，从 5 月到 6 月，以北京为开端，中国各地连日举行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5 月 9 日，北京召开"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③，一百多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反对修改安全条约运动的火焰到处在燃烧。应当怎样评价这一群众运动呢？由于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但这确实证明了（中国人民）民众心理的集体表现和有组织行动的习惯。

在这种内外条件支持下，日本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日益高涨。至 1960 年 3 月，参加国民会议共同斗争的组织达一千六百三十三个。4 月 26 日，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统一行动，举行了向国会请愿、集会和示威。国会收到的请愿书达到十七万封，参加请愿人数达三百三十万人，成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5 月 9 日，国民会议又进行第十六次统一行动，目标是解散国会和不信任岸内阁。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涨使保守阵营感到危机，内部引起动摇和分裂。财界主流所支持的岸首相和自民党主流派，竟不顾要求慎

---

① 《新华月报》，1960 年第 3 号，第 164—165 页。——译者

② 同上，第 8 号，第 30 页。——译者

③ 同上，第 10 号，第 126 页。——译者

重审议《安全条约》的反主流派和中间派的反对，使出了强硬手段和镇压手段。这就是，5 月 19 日深夜，他们把警察拉进众议院里，排除在野党议员的反对，玩弄骗子一般的鬼把戏，未经正当手续，就单独强行通过了条约。这是强行通过的花招，显然是不顾议会政治常规的暴行，是对民主政治的践踏。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急剧地沸腾起来。抗议强行通过条约的 5 月 26 日示威，其规模之大，被形容为“空前的国会示威”。

不过，另一方面，反对《安全条约》诸势力，对形势的评价和战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反而分裂了斗争目标。在代表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者和研究者的主导下，斗争的重点脱离了阻止修改《安全条约》，反而转到反对强行通过拥护议会主义方面。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本来是民族解放与和平的运动，却变成保卫民主主义味道浓厚的市民运动。6 月 4 日，以工人罢工为中心的统一行动，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进行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革新势力以及国民会议，都没有足以对抗那些学者和研究者主张的理论。“六·四”统一行动要求坚持“井然有序”，结果未能给岸内阁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全学联”主流派把着眼点放在安保问题上，并明确规定以参议院自然承认《安全条约》的 6 月 19 日前一天作为斗争目标。但是，一方面由于“全学联”主流派的主观主义，对形势估计盲目乐观，行动方针也简单；另一方面由于要求坚持“井然有序”的革新政党和国民会议采取了排除“全学联”主流派的方针，全学联主流派被处于孤立地位。[①]

另一方面，岸首相和自民党主流派，在财界、特别是“日经联”的大力支持下，一面等着 6 月 19 日条约在参议院“自然生效”，一面指望在那一天来日本访问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对他们的政权伸

① 信夫清三郎：《安保斗争史—35天间的政局史论》，世界书院，1961 年，第 279—313 页。

出救援之手。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因U2型间谍飞机事件，未能实现访苏计划，便决定转而巡视东南亚反共各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作为这次巡视的一环。美国政府对日本国内形势乱成一团很不放心，曾提出拟中止总统访日。但是，岸首相和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却指责安保斗争是“一部分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的阴谋”，对形势作了乐观的分析，[①]特别是拘泥于日本对国内外面子的岸首相，恳切请求总统访日。但是，事态极为严重。6月10日，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Hagerty, J. C.)为商谈总统访日来到日本，受到以学生和工人为主的群众的包围。事件发生后，岸首相害怕人民运动闹大，便强烈要求防卫厅长官赤城宗德出动自卫队。据赤城说，这是6月13日或14日的事。赤城认为，自卫队不是为了让它来打自己的人——日本人而建立的，以此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6月15日，国民会议依靠工人的实力，组织了统一行动；而“全学联”主流派则与许多学生一起冲进了国会院内，当场与警察机动队发生冲突，造成了东大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的悲惨事件。政府害怕这个事件成为导火线，“他们会在艾克访日的19日聚集几万人，搞出一次大规模的国民葬礼”，“社会形势也许会为之一变”，终于在6月16日不得不决定请求艾克延期访日。[②]

6月18日，以“阻止批准《安全条约》，打倒岸内阁，要求解散国会，反对非法镇压国民大会”为中心，三十多万群众聚集在国会周围。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6月19日，《新安全条约》由于参议院的“自然承认”而通过，21日，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得到批准。完成了使命的岸首相，害怕再继续执政会遭到人民的攻击，便在23日宣布辞职。这件事与新条约被迫推迟签字、美国总统被迫中止访日等，都是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重大成果。反对《安全

① 《朝日新闻》社编：《日本和美国》，朝日新闻社，1971年，第204页。

② 内田健三，前引书，第157页。

条约》的斗争，在群众发挥力量之大与持续时间之久上，是现代日本历史中划时代的，为现代日本历史开辟了新的前景。但是，此后政局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保守阵营手里，7月19日，第一届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在这一点上，阻止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算是终于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阻止批准《安全条约》的势力在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过程中，逐渐丢弃了应当粉碎单独媾和和《安保》路线而争取全面媾和与恢复日中邦交的目标，并由于把重点转向拥护"民主主义"，分散了斗争的目标和力量，未能给岸政权以决定性的打击。①

第三节　日韩条约

559

十一　日韩会谈

在安保斗争中，池田首相是岸内阁中对人民斗争一直采取高姿态的一个人。但是，在斗争高潮的冲击下，就任首相后，便把宫泽喜一等"新保守派"拢在身边来推行政治。为了平息安保斗争的余波，缓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分裂群众和革新势力，把群众重新控制在保守势力统治的手中，他们一面采取低姿态，一面提出了"所得倍增计划"。而且，作为新安保体制具体化的一环，着手打开日韩关系；并对中国坚持"两个中国"论和实行"政经分离政策"；对内则推行军国主义化。

1960年9月，池田内阁派外相小坂善太郎前往韩国，打开第五次日韩会谈的路子。"四月起义"后的韩国，于1960年7月进行大选，李承晚时代的执政党自由党遭到惨败，在野党民主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接着，8月，国会选出尹谱善为总统，建立了以张

① 信夫清三郎，前引书，第601页。

勉为首民主党政权，成立了所谓“第二共和国”。但是，在该政权的面前，庞大的失业队伍、粮食不足、工矿业衰退、外汇不足等深刻的经济问题堆积如山。张勉政权希望通过引进日本资本来克服经济危机，便摘下了李承晚时代的“反日”招牌，转而采取“对日接近”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打倒李承晚而有了信心的人民，相继组织了工会和社会团体，在不断发生学生运动的同时，各地频频发生了劳资纠纷、集会和示威等。8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又提出通过南北联邦制实现朝鲜统一的提案。北朝鲜在朝鲜战争的废墟上，政府和人民结为一体，一直在以“自力更生”精神和“千里马”的气势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以朝鲜战争前国民生产总值最高水平的1949年为100，那么到1960年就增长为361了。生产的比例，也由原来的农业占优势到1960年转变为71比29，工业占了优势。以北朝鲜的这种发展为后盾的金日成提案，冲击了南朝鲜人民，他们要求统一朝鲜的形势也迅速成熟了。池田内阁提出的对韩政策，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骨子里是想排除金日成的统一提案，使朝鲜的分裂永久化，以巩固作为对抗大陆前线基地的韩国。1951年以来，特别是1955年以来，韩国一直是取得“高速成长”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以及劳动力的来源地。池田内阁提出对韩政策，也隐藏着加强韩国，使之继续充当市场和提供劳动力的意图。

第五次日韩会谈，就这样在1960年10月开始，一直继续到次年5月，但却始终停留在围绕会谈的优先讨论事项的预备会谈阶段。这时，自民党内以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兄弟为中心的亲韩、亲台派，于4月在党内组成了“日韩问题恳谈会”。5月初，田中角荣和

560 其他八名成员访问韩国，谋求从侧面促进日韩会谈。但是，5月16日韩国发生政变，日韩会谈因此中断。以朴正熙少将为中心发动的这次政变，其背景是：韩国人民的斗争使张勉政权陷入危机，以

至发展到公开批判美国；还有，以学生为先锋的、自下而上的南北统一运动，也空前高涨，以至一般警察力量已无法镇压下去；如果南北学生会谈得以实现，和平统一运动取得成果，那么南朝鲜的反共体制就会彻底崩溃。政变是在美国默许下进行的。朴军事政权一手掌握了立法、司法、行政等全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了独裁统治。在朴政权发表的《革命公约》的开头宣称："以反共为国是之第一义，重新整顿并强化迄今为止只停留于形式上的口号的反共态势。"①

这时，美国则是肯尼迪在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从1961年1月起登上了政权的宝座，但是，对美帝国主义来说，内外形势并不轻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高涨起来的民族解放斗争，又扩展到非洲。1960年，有十七个国家相继独立，被称为"非洲年"，世界殖民体制的崩溃已进入决定性阶段。由于这些新兴国家的加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已增加到九十九个国家，相当于第一次全体大会时的两倍。而且，其中亚非集团四十五个国家，占接近全体成员国的半数，成了联合国中最大的势力。其中大部分是原为殖民地而独立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怀有戒心，为了维护本国独立和世界和平，对美苏两阵营采取中立主义的立场。美国能够任意操纵联合国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处于东西两阵营前沿的亲美反共政权在不断动摇。1960年4月，李承晚政权的崩溃；日本的安保斗争的高涨和岸政权的下台；1960年8月，老挝的政变和中立主义政权的一度成立；12月，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由于维持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和对各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美国的黄金不断外流，1958年，美元危机已很明显，到了1960年，黄金储备已降低到180亿美元以下，显露出

① 佐藤胜巳、梶村秀树、樱井浩合著：《朝鲜统一的酝酿》，三省堂，1971年，第211—224页。

爆发美元危机的症候。

正是这种状况，才使打着“打开现状”旗号的肯尼迪得以当选为总统的重大原因，也是他推行美国新军事战略，即“灵活反应战略”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原因。这种战略是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在紧急特别咨文中正式表明的，即企图运用各种武力来对付核战争、有限战争和特殊战争等各种战争的战略，也是企图遏制社会主义各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之下，新兴各国的政权也都成了“多米诺”理论的对象。从1960年到1963年，美国政府把以南越为主的亲美各国的“暴动兵力”增加了五倍。对于日本，美国政府则要求建立足以应付非核战争和游击战争的力量，并要求协助美国保卫美元以消除美元危机，也就是替代美国向韩国等亚洲反共各国提供援助。

561

这时，池田首相与吉田、岸首相一样，也前往华盛顿朝拜，与肯尼迪总统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就是为了确认上述的对日要求。在这次会谈中，两国首脑认为，日美关系进入了“日美伙伴关系”时代。这种关系与岸内阁以纠正日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目的的“日美新时代”不同，它意味着正在取得经济高度成长的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已经达到了参与和协助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阶段。同时，这也是池田首相企图夸耀“日美对等”的大国意识的表现。特别是关于日韩问题，两人在6月21日的游艇会谈中的讲话是富于象征性的。即池田首相强调说：“韩国对于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比中国问题更为重要”，并强调作为“反共防波堤”的韩国的重要性说：韩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最接近日本，“处于制日本之死命的地位，特别是如果釜山赤化了，对日本的治安将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最后说：“对于韩国的反共体制，日本不能不寄予极大的关心”。听到这些话，肯尼迪总统表示赞成说：“我的心情同你是完全一样的”，并强调指出：“就是从美国来说，也打算劝韩国尽速

实现日韩邦交正常化。”池田首相所说的“决心认真对待日韩问题”的话，据说就是由这次与肯尼迪会谈中受到很大启发的结果。①

在韩国，朴政权与日美两国政府一样，对日韩会谈表现了积极的态度。朴政府企图通过解决对日请求权问题从日本引进资金，弥补美国援助的减少部分，以摆脱经济危机。池田内阁承认了朴政权，1961年10月开始进行第六次日韩会谈。两国都选了财界代表人物当首席代表，由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杉道助和前韩国银行总裁裴义焕分别担任，这就象征了会谈的经济侧面。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大，日本财界作为施加压力的团体，对政治的发言权加强了。象赔偿问题一样，财界代表亲自出马担当外交问题的直接指挥，显示了他们对于日韩会谈的非同寻常的欲望和外交的阶级本质。196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后被称做“箱根会谈”），以及当时的腊斯克（Rusk,D.）—池田会谈和朴总统访美进行的朴—肯尼迪会谈等又进一步促进了日韩会谈。例如在腊斯克—池田会谈中，腊斯克国务卿强调韩国问题是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中心课题，并认为：“南越正陷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之中，韩国如再受挫折，就会关系到美国的威信”，要求“改善东亚的形势是日美的共同目标，所以希望日本尽早与韩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对韩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进行合作。”1962年10月，朴政权的实力人物、韩国政府的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金钟泌和日本外相大平正 562 芳，就日本对韩国的偿付和经济援助等问题交换了秘密备忘录（金—大平备忘录）。这是越出民主管理外交的秘密外交的表现。韩国的对日财产请求权问题，通过这个协议原则上解决了，关于渔业问题、“李承晚线”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谈判也有了进展。

随着日韩会谈的进展，在韩国，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先锋的反

① 伊藤昌哉：《池田勇人及其生和死》，至诚堂，第147页。

对运动日益发展。他们认为，以微少的款额做代价就容许日本企业进入韩国，是再度危害本国独立的对日屈服政策，从而奋起表示反对。在我国，在所有的民主性的群众集会上也几乎都提出了反对日韩会谈的口号。在国会里，以社会党为中心的在野党，也尖锐地追究"金一大平备忘录"。他们认为，日韩会谈是要把朝鲜的南北分裂永久化，是以日本垄断资本统治韩国为目标的，因而表示反对。不过，反对日韩会谈的斗争一直未出现大的高潮，这反映了安保斗争遇挫后革新势力的分化和对立。

十二　"政经分离"政策和"两个中国"论

对打开日韩关系表现积极的池田内阁，在对待中国方面，则从经济考虑出发，企图在"政经分离"的条件下促进日中贸易，但在政治上却立足于"两个中国"论，虽不象岸内阁那样露骨，但基本上仍然追随美国，坚持敌视中国的态度。池田首相对形势的下述认识和思想方法在这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认为：由于日本和中国大陆，"在历史上和传统上，具有特殊的关系"，"在日本，对中国具有亲近感的人是不少的"，所以，对于中国，日本同"超出必要的反感支配着舆论"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有必要"在中共和美国之间架设桥梁，为此影响美国舆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从日本的整个贸易量来看，其可能性(中国的有效需要)是无足轻重的"，"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两者截然分开来同中国进行往还，并没有任何不妥。""对台湾政府，则不要忘记战争结束时的恩义，还是维持友好关系为好。""承认中共和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这种经济问题不同，完全是政治问题"，所以这"不仅仅是东京一北京的问题，莫如说是世界问题。"因而要与中国"立即恢复邦交，作为亚洲自由阵营的一员来说，则是不正确的。"①

① 伊藤昌哉，前引书，第175—178页。

池田首相在1960年1月，在岸内阁担任通产相时曾说过："批准《新安全条约》之后，应该打开日中关系"，但就任首相后，却对日中问题采取了静观的态度。中国方面对池田内阁也没有立即进行批判，希望同日本人民联系，并希望安保斗争向日中复交运动方向发展，因而以灵活的态度对待日本。1960年7月，为了祝贺总评建立十周年和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前来日本；8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日中贸易促进会的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了日中贸易三原则，同时表示了打开对日关系的愿望。贸易三原则是：(1)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2)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中国方面虽然认为，所有民间协定均须由双方政府加以保障，但又采取了即使没有协定，如果条件成熟，也可以个别地缔结民间合同的立场。据周总理说，这个三原则"是从同岸信介敌视中国政策进行斗争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根据这个原则，隔了两年之后，1960年12月，又重新开始了友好商社方式的贸易。但是，池田内阁却认为缔结政府间的协定就"意味着恢复邦交"而持否定态度，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在1960年10月的第十五次联合国大会上，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支持了所谓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决议案。这次联合国大会被称为"风暴大会"、"非洲大会"。如前所述，十七个非洲新兴国家参加了联合国，是一次显示了亚非集团抬头和美国控制衰落的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案，美国所提的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暂时搁置案"，仅以四十二票赞成，三十四票反对，二十二票弃权这种微小差别获得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态度显然是在对历史潮流倒行逆施。但是，在1961年的第十六次联合国大会上坚持要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美国，看到硬要坚持过去的"暂时搁置案"是困难的，便援引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所谓"大会对于重要问

563

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会员国三分之二之多数决定之。"[①]的规定，提出了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重要事项"的决议案。日本也是该提案的联合提案国，帮了大忙。实际上，想出这个"妙计"的人是外务审议官岛重信，小坂外相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美，把这个"妙计"告诉了腊斯克国务卿，据说腊斯克一听到，就拥抱小坂表示谢意。[②]

尽管如此，到了1962年，日中贸易仍然有了进展。这是由于池田内阁的高度经济成长政策，产生了设备过剩和生产过剩，产业界要求扩大日中贸易的呼声加强的反映，是宫泽等池田亲信集团的经济合理主义设想的反映，[③]也是政府畏惧敌视中国政策会招致国民不满而威胁政权基础的结果。5月，池田首相本人强调要推进日中贸易，并企图通过与中国首脑接近的松村谦三和古井喜美等自民党内的亲中国派，沟通与中国政府进行联系的渠道。这些亲中国派，希望通过与同文同种的中国保持友好以维持亚洲和平，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除了石桥湛山和宇都宫德马之外，大都是从个人的或情感的动机出发，似乎都缺少具体政策提案。[④]他们在1960年底组织了日中问题研究会，从而在党内活动中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原则性和连续性，逐渐对决定党的政策具有影响力。564 1962年9月，松村访问中国与周总理会谈，就"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⑤]取得了一致意见。10月，高崎达之助也访问了中国，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以"政经不可分"的一

① 《联合国宪章》，《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40页。——译者。

② "国民外交"研究会编：《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史——从战败到越南战争》，三一书房，1967年，第227—228页。

③ 宫泽喜一：前引书，第152—167页。

④ 福井治弘：《自由民主党和政策决定》，福村出版，1971年，第311页。

⑤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17页。——译者

致意见为基础，交换了关于综合贸易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以两国代表名字的字头命名，称做“LT 贸易”（廖一高崎贸易）。其内容是，未来五年间（1963—1967年），以每年平均递增约一亿美元的规模扩大日中贸易，日本方面的主要输出商品是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业机械和成套设备等，中国方面的输出品是煤炭、铁矿石、大豆和盐等。

这个协定，正如高崎自己所说，它“成为恢复日中邦交的第一个约束力”，唯其如此，在松村访华的9月上旬以后大约三个月里，以池田内阁为中心，自民党和财界都围绕着日中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其影响也波及了美国和台湾。对于在缔结LT贸易协定（廖一高崎贸易协定）中所表现的日本对中国的接近，美国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和警惕。1962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次日美贸易经济委员会上，肯尼迪总统发表演说，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他说：“为了不使中共在亚洲进据支配地位，应该怎样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呢？”“这是直接处于前哨地位的日本和美国最关心的事情”，强调了遏制中国的必要性，并要求日本协助。1963年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上，美国又强调了低估中国的危险性和遏制中国的必要性，并要求日本援助南越。

池田内阁虽然在政治方面，即遏制中国政策方面追随美国，但在经济方面，在财界和政界弥漫着对日中贸易的积极姿态和乐观趋势的支持下，却与美国并不那么协调。即使在政府中，特别是通产省，也表现了积极的姿态。财界中的积极派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80%依靠大陆贸易（包括中国东北）的关西厂商和财界人士。LT贸易（廖一高崎贸易）从1963年初就出现了顺利的开端。当年度日本（对华）进出口的平均完成率是92.8%。同年8月，第一次对华出口的成套设备，“仓敷人造丝”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赊销出口，也获得了政府的批准。此项合同约为七十四亿日元，中国

方面在五年内付清，年利5.5%。10月，又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在LT贸易（廖一高崎贸易）的推动下，日中贸易呈现出飞速扩大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事态招致了国内外的反中国派和日中贸易消极派的反对。在财界，以石坂“经团联”会长和足立正“日商”会长为代表的消极派，一向就反对采取这种会触怒华盛顿和台北的作法来集中精力搞对华贸易，在普遍的对华友好气氛中，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和平攻势的不信任。①在政界，1956年建立的半官半民的日华协力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自民党内的右派岸信介、佐藤荣作、贺屋兴宣、石井光次郎和福田赳夫等人，也强烈反对日中贸易的发展。与这种状况相呼应，台湾政府也发动了对日的激烈攻势。1964年1月，台湾政府声明政府机关停止购买日货，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这种压力而惶恐不安的池田政府，委托前首相吉田茂调整日台关系。吉田在2月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总统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归国以后，又在5月取得政府谅解之后，写信给张群秘书长，其内容虽以“私人信件”为理由没有公开，但其中无疑是作出了在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时，不得使用进出口银行资金的保证。②继“吉田书简”之后，在7月，大平外相又访问台湾，努力改善关系，结果，台湾政府解除了停止购买日货的决定。

这种事态表明，池田内阁的对华贸易政策，该是多么朝三暮四，所谓“政经分离”就是政治优先，一遇到美国和台湾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能贯彻执行下去的局限性，同时还暴露了政府所说的“两个中国”论的矛盾。池田内阁一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治着中国本土这一事实，但另一面又承认蒋介石政权统治着台湾，站

---

① 福井治弘，前引书，第301页。

② 朝日新闻社编：《资料·日本和中国·“1945—1971年”》，《朝日市民教室丛书》，《日本和中国》，第8种，朝日新闻社，1972年，第196—197页。

在“两个中国”论的立场上，打算通过积累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便为将来打开邦交，对扩大日中贸易作出响应，但其立场的局限性和矛盾已经十分清楚。除非站在中国政府所主张的“政经不可分”和“一个中国”的立场上，不然，日中贸易的真正发展和邦交的正常化都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池田政府和财界自己扼杀了日中贸易飞跃发展的幼芽，而向东南亚寻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以及原料市场，并推行了为此铺平道路的东南亚外交。1961 年 8 月，政府与印度缔结贷款协定，决定在两年间提供八千万美元贷款。11 月，池田首相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泰国。翌年 1 月，政府与泰国缔结关于特别日元处理的新协定，将1955年协定的有偿贷款九十六亿日元改为无偿贷款。1963 年 3 月，政府与缅甸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有关贷款的换文。其内容是重新讨论赔款，提供无偿援助一亿四千万美元，并贷款三千万美元。同年 9 月，政府决定给予印度尼西亚以机械另件和医药品为中心的一千二百万美元，作为紧急援助，另一方面，池田首相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63 年 5 月，由于池田首相的撮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Rahman, T. A.）在东京就马来西亚建国问题进行了会谈。1964年 6 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首脑又在东京举行了会谈。这种对东南亚的外交，对于池田来说，不外是“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的一环。他在 1962 年 11 月访问欧洲各国的时候，由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发展受到启发，加强了这一设想。根据这一设想，以日本为首，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亚洲各国互相交换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如果经济成长政策取得成功，就能建立广大的繁荣地区”，“这将成为对付中共的巨大力量。”这种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再加上池田政权所推行的军国

566

主义化和高度经济成长政策，从这里可以看出复活了的帝国主义的“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十三　池田首相访欧和大国意识

可是，无论是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还是“新大东亚共荣圈”迷梦，都具有很大的矛盾和一定的局限。高度经济成长要求扩大市场，但是，特别是敌视中国的政策，大大限制了对中国贸易的发展。池田首相继1962年大平正芳外相访欧之后，于11月，同样抱着扩大对欧洲贸易的目的，踏上访欧的旅途。他在三周之内历访西德、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与荷兰各国，展开了经济外交。法国总统戴高乐把池田首相比作“半导体的推销员”。

池田首相的访欧，在各种意义上给日本外交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第一、它把对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开始的部长级“协商外交”，扩展到了欧洲。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协商外交，是在1961年6月开始的，对欧洲各国的协商外交则是在池田访欧的第二年，即1963年开始的。5月与英国，6月与法国，11月与西德分别开始进行，一直进行到1964年。日本方面的出席者，1961年6月与美国进行协商时，有外相、藏相、通产相、农相、劳动相和经济企划厅长官等多人参加。同月，与加拿大进行协商时，仍有藏相、通产相、农相、外相和经济企划厅长官等多人参加。而在与欧洲各国协商时，在对方国进行协商，则由外相出席；在东京进行协商，则由首相和外相出席。第二、池田首相的访欧导致日本对欧外交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新的性质。在过去的外交中，也有对欧美的外交。不过，过去对欧美的外交大都是从对亚洲的外交中派生出来的。换言之，对欧美外交虽然也具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但每多不过是对亚洲外交的函数（随着亚洲外交的变化而变化——译者）。池田首相的访欧开创了新的开端，与过去作为亚洲外交函数的对欧美外交不同，而

是具有名符其实的独特性的对欧美外交。

第三、池田首相的访欧，以高度经济成长为后盾，使日本从作为亚洲一员的意识，进而开始具有与美国及欧洲一起形成自由阵营三大支柱的大国意识，使日本进一步挺身强化反共体制。事实上，12月间，池田首相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即在第四十一屆临时议会上阐明信念的演说中讲到："通过访欧，我主张应以北美、西欧及日本为自由阵营的三大支柱，建立牢固的合作体制。"他这种言行，既是夸耀日本惊人的高度经济成长和国民的高度教育水平等等，也是和他所说过的"日本是大国"；炫示大国日本不应采取中立主义，而应作为自由国家的一员，受到中国和苏联的"畏敬"等联系在一起的。

十四　军国主义化的进展

在物质上支持大国意识成长的，是与高度经济成长并行的军国主义化的进展。池田内阁固然不象岸内阁那样露骨，但基本上是继续推行同样的敌视中国政策的。这个政策，正如吉田内阁以来历届政府所进行的，被用来作为在国内推行军国主义化的堂皇招牌和动力。因为通过敌视和遏制中国政策，制造远东紧张局势，可以此为借口大力推行重新武装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政策。

军国主义化的重心，当然就是按照美国的战略加强自卫队。到1961年底，自卫队总兵力达到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陆上有十三个师团十四万五千人，海上有舰艇四百六十九艘十二万八千吨，空中有一千一百架飞机。1967年7月，池田内阁决定了《第二次防卫力整备计划(1962—1966年)》。其基本设想是："把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前提的综合战略设想作为基础，以陆海空三个自卫队的均衡整备作为目的"。这种设想，早在1959年7月，赤城防卫

厅长官就已经明确说过。从这一观点出发的“第二次防卫计划”，其任务是进一步充实“第一次防卫计划”的“骨干防卫力量”，其目标是要“能够有效地对付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以下的侵略，为此确立防卫体制的基础”。与此同时，还重视“紧密结合国土和国民的防卫力量”的建设。关于这一点，据说除公开文件以外，还违反政治上的民主管理，附有如下秘密了解事项。即“努力实行有关提高国民防卫意识、基地对策、整理有关法案、推行冷战对策和关于发展防卫产业等措施，对于必需物资的储备、道路的修整，以及运输、通讯、建设、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计划都要从国防方面加以考虑，并就组织全国规模的民间力量问题进行研究。”① 也就是说，遍及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全面地重新军国主义化，这就是“第二次防卫计划”的秘密目标。

按照“第二次防卫计划”，陆上自卫队以美国准备核战争的五群制原子师为标准，改编成十三个师团，减少兵员，提高机动性四倍，增强火力二倍。航空自卫队决定引进“基地防空地面警戒系 [568] 统”和《奈基Ⅰ型》地对空导弹，并在现有的北部、中部方面部队之外，新增设西部方面部队。海上自卫队为防备核动力潜艇的出动，重视反潜武器的装备，决定装备构成反潜鱼雷的反潜火箭。而且，自卫队还恢复了战前的称呼，复活了战前师团和舰队的名称。这完全是他们自我主张的那种毫不含糊的军队的自卫队。

这种自卫队依附于美国，被置于美军指挥之下，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了日美合作态势，以遏制中国、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各国。诚然，自卫队的武器、舰船和飞机的大部分是在我国组装的，但其设计和规格却都是美国制的，军官也大半都是留学美国的，连下级军官和士兵也都是接受驻日美军和美军教科书训练的。而且，自卫

① 藤井治夫：《自卫队的作战计划——从防卫到进攻》，三一书房，1971 年，第 112—113 页。

队的最高指挥权，虽然根据自卫队法名义上由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但实际却掌握在驻日美军手中。其最好的例子就是1962年10月古巴危机时，驻日美军进入警戒状态，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进入了相应的状态，而池田首相却在四小时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一事件虽然也显示了日美两国军队合作的态势，但以共产阵营为目标的日美合作体制，则在《三矢作战计划》和《飞龙计划》中表现得更加十足。《三矢作战计划》的正确名称是《昭和38年度综合防卫图上研究实施计划》，是假想"昭和3x年7月19日黄昏，被认为包括中共军用飞机在内的、北朝鲜方面的轰炸机群，突然奇袭韩国的主要军事基地和城市"而战争爆发时，研究日美两军如何共同作战的计划。在这里，自卫队与美军一起自动地进入战斗出动状态是不用说了，而且还明确了攻击敌国国内基地、"占领"千岛和库页岛的方针，甚至考虑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必要性。而且详细研究了发生战争时所应实行的日本战时体制，这种战时体制意味着自卫队事实上的政变。① 三矢研究于1963年2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拟制，于同年6月完成，是在绝密情况下搞的，但在1965年2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被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揭露出来。"三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作为1964年度日美共同作战计划的《飞龙计划》。

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就是这样以自卫队的加强和发展为核心而进行的，其背后，则暗暗推行着集复活军国主义政策之大成的篡改宪法运动。改宪运动的领导者当然是执政党自民党。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长田中角荣，1962年2月6日在会见访日的美国司法部长、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时提议说，是否能由美国向日本提议，以冲绳归还日本为前提，修改日本宪法，俾能实行

① 藤井治夫：《自卫队，这个武装力量》，三一书房，1970年，第83—97页。

核武装和重整军备？这就自我暴露了该党所进行的改宪活动的本569质。自民党在1964年1月，提出了所谓“以在国民中造成改宪的舆论为目的，举党一致展开活动”的方针，以支持政府的宪法调查会的改宪活动。1964年7月，宪法调查会向政府提出了最后的报告，调查员的大多数是改宪论者，其中十八人早在1963年9月，就已经向高柳贤三会长提出了题为《修改宪法的方向》的意见书，并公诸于世。其中强调，现行宪法是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必须制定自主的宪法，天皇应成为国家元首；修改宪法第九条，俾能向海外派兵和向国民征兵等等。这完全是把军国主义强加给国民。实际上，自卫队的前身，即警察预备队的创设过程，就是美国占领军强制日本重新武装最典型的表现。而自民党和保守势力所谓的“强加论”，只是说“重整军备的‘强加’我们不理”，完全是一种极端唯我所需的主张。

十五 《日韩条约》的缔结

上述日韩会谈和对华关系中所表现的池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和在“第二次防卫计划”及“三矢研究”中所看到的军事政策，其共同特征与吉田、岸两届内阁一样，就是追随美国，与美国合作；就是复活并整备帝国主义体制。从属于美国的基本原因，首先是通过《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完全被纳入了美国的军事战略体制；而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日本垄断资本对美依赖的程度增强了；因此，只要日本谋求进行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就不得不主要指向亚洲从属于美国的各国，从这一点，也就可以肯定日本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从属性同盟。池田外交的这种性格也可以用来说明佐藤荣作内阁的外交政策。

11月9日，佐藤内阁成立。它是1964年10月池田首相以长期疗养为理由表示要辞职之后，自民党内围绕总裁宝座展开剧烈

派阀斗争的结果。佐藤内阁是在对池田内阁的内政和外交日益不满的自民党内右派支持下，集这些人的希望于一身而出现的。随着对安保斗争不愉快的记忆日渐淡薄，右派势力又加深了对于强权统治的怀念。在内政方面，他们要求与批准ILO87号条约[①]同时，有利地制订国内方面的法规；把防卫厅升格为国防省；复活纪元节和实现对原地主的赔偿等。在外交方面，则要求把敌视中国的政策贯彻到底；答应美国早就要求的核动力潜艇的进港等等。但是，由于池田内阁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就被说成是"无所作为的池田内阁"，招来了这些人的不满。正因为如此，佐藤内阁肩负着他们的期待，超越池田内阁的路线而大力推行，在外交史上也开辟了一个新时期。

内阁成立时，佐藤首相就外交方面说："在亚洲以展开积极的自主外交为基调，解决冲绳、日韩和日中问题"，"贯彻和平共处的外交。"但在实际上，所谓"和平共处外交"只是在口头上说说，以岸信介和佐藤兄弟等人的亲韩、亲台派为主力的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比池田内阁更加后退，始终贯彻岸内阁时代那种露骨的遏制与敌视中国的政策。例如，1964年11月，政府不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等人的代表团以日本共产党第九次大会的来宾身份入境。同月，外相椎名悦三郎在国会上公开说，"列入重要事项这种方式"就是为了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12月，政府和自民党首脑不准该党议员参加预定访华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的国会议员团。进而在1965年2月，政府又以限于先前"吉田书简"的约束为理由，对池田内阁时代已经同意的日本纺织公司对华延期付款出口的维尼纶成套设备，以及日立造船公司对华延期付款出

570

① ILO87号条约：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87号条约指关于"结社自由、保护团结权"的条约。——译者

口货船等，不许使用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因此，这些合同均被作废。据说中国打算订购的大型成套设备，全部转向西欧各国去订货了。中国方面谴责佐藤政府的这种态度是“敌视中国政策的又一个严重表现”①，日中关系急剧地走向恶化。

对于佐藤政府反动的对华政策，自民党内反主流的亲中国派和社会党内的左派，为了促进日中复交和日中贸易，在政界开始了积极的、有组织的活动。1965 年 1 月，以右派的亲台、亲韩派为中心建立了“亚洲问题研究会”（A 研）。为了与此相对抗，自民党内的亲中国派，也在同年 1 月把过去的“日中问题研究会”发展为“亚非问题研究会”（A·A 研）。亚非问题研究会以松村、宇都宫和藤山等人为中心的二十四人为召集人，以数达一百零四人的自民党议员为会员而开始活动，对中国问题、越南问题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抗问题等当前的外交问题，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藤山在岸内阁时代当过外相，是 60 年“安保”的推动者之一，但在中国问题上与岸信介等亲台派有区别。藤山对中国的动机和关心，“与其说是出自政治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他承认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但却认为，承认中国政府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是将来的事，首先要树立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不过，他与松村和宇都宫等人一起，逐渐走向促进日中贸易和日中复交。这种倾向在三木武夫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作为佐藤政府的外相，其立场是矛盾的。

社会党左派以佐佐木更三派与“和平同志会”等为中心，组成了“亚非研究会”（A·A 研究会）的党内亲中国集团。反之，日本共产党围绕着国际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之间却加深了对立，它对日中复交运动也变得消极了。两党的对立，从 1965 年底开始公开化，1966 年 3 月，以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宫本显治为团长的党代表

① 《新华月报》，1965 年，3 月号，第 140 页。——译者

团访华与中国领导会谈破裂，两党的对立遂成定局。

佐藤政府一方面实行露骨的敌视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则贯彻对美友好与追随的政策。1965年1月，佐藤首相前往华盛顿朝拜，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了会谈。约翰逊在1963年11月因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而升任总统，1964年秋在总统选举中获胜，1965年1月起正式就任总统。在这次会谈中，约翰逊总统要求美日协调，对以支援韩国和南越为主要内容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自由世界的防卫”进行合作，并要求日本应成为这一协作体制的核心。佐藤首相对此表示了同意。这一点，在1月13日的共同声明中也明确表现出来。承认“太平洋伙伴关系”，就进一步发展了池田时代的“日美伙伴关系”。它意味着日本承担了取代美国的任务，从而对亚洲各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更加积极起来。“太平洋伙伴关系”具体化的第一步，就是促进日韩会谈。美国对于推进这一会谈表现了非同寻常的热心，对日韩两国、特别是对韩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其背景则是迫于下述情况。

571

1964年1月，中国和法国恢复了邦交。以美苏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战后东西方关系，至此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不用说法国，就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言权也提高了。2月，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友好关系，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紧箍咒开始管不住了。还有，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和柬埔寨也脱离美国而倾向中立主义；具有同样倾向的印度尼西亚与亲美的马来西亚之间的对抗状态日益加强。南越的局势对美国来说，也在日趋恶化。尽管美国从1955年以来，就不断地给予吴庭艳政权以庞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因为这个政权实行独裁的、反人民的政治，遭到人民唾弃，最后连美国也抛弃了它。1963年11月，美国政府支持的军部发动政变，把它彻底推翻。而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则以遵守日内瓦协定、打倒亲美傀儡政权、建立民族民主政府、实行中立和

平外交等为目标，展开斗争，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势力日益强大。1964年，解放阵线控制的区域竟达到了整个南越领土的五分之四，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吴庭艳）政府控制的区域则处于连"点和线"也说不上了，只能说是"点和空"这种不利状况之中。这种情况说明美国的越南政策已经归于失败。但是，美国却把责任转嫁于"越共"，即解放阵线，和"北越的侵略"，企图以此为借口，通过直接介入谋求扩大战争，以摆脱困境。正如美国国防部秘密报告书所表明，1964年8月，因美舰侵入越南北部领海内部而造成的"东京湾事件"，不外是美国为了制造借口而策划的阴谋。①

但是，为了扩大越南战争，美国就必须确保外国、尤其是日本的合作。因为日本不仅作为美军的综合后方基地很重要，而且因为它是在亚洲能够代替美国，向韩国和其他亚洲亲美各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唯一国家。从"东京湾事件"前后，美国一面要求日本同意核动力潜艇进港并援助南越与韩国，一面开始公开地施加压力以促进日韩会谈。1964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助理邦迪(Bundy,W.P.)访问日韩两国，以简直就是恫吓的语气向日本强调日韩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就显示了这种苗头。关于美国的这种压力，《今日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的共荣》一书的作者指出，美国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是想让日本在东亚作为"马戏团领班"(ringmaster)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该书这样写道：

572

"关于这一点，1965年确实是个分水岭。在这时，美国陷入了越南的泥沼，为了保卫美元，开始议论削减对南朝鲜这样国家的对外'援助'。为分担这一地区的维持秩序费用，便对日本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华盛顿就归还冲绳问题与东京开始了会谈。约翰逊强烈要求促进长达十三年之久、一直处于跛行状态的汉城—东京间

---

① 《美国国防部文件》，《纽约时报》本，第5章。

的‘正常化’会谈。”①

但是，美国之所以为日韩会谈而焦虑，不仅在于上述原因，其中还有朴正熙政权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因素。通过1961年的政变而建立的朴正熙军事政权，在1963年12月举行了“还政于民”，但是，以朴总统为首的二十一名阁僚中，却有十九名是军事政权的参加者，因此所谓“还政于民”不过是虚有其名。加之，以一小撮高级官僚和大商人为中心，非法致富和贪污极为猖獗，牵连政府的贪污行贿事件不断发生。人民群众的不满当然愈益增大，而且由于朴政权经济政策的失败和韩国经济的破产，这种不满更加扩大。朴政权从1962年度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企图摆脱经济危机。但是，这个计划却造成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即它并不是从根本上改革靠军事性很强的美国援助来维持的经济结构，货币改革和国内外资金的筹措等也问题重重，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农、工业生产都停顿在日本统治时代的水平以下，大部分农民每年都苦于“青黄不接”的粮食不足，而且经常存在着数百万失业者和半失业者。②这种情况正是使朴政权走向第六次日韩会谈的主要原因。但是，人民却强烈反对这一会谈。这种情绪在1964年3月终于发展成为“反对屈辱外交”的激烈的示威游行。在汉城，美军司令官亲手宣布非常戒严令，致使日韩会谈最后不得不中断。

美国所以急于重新开始并推进日韩会谈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韩国的这种形势。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财界也都希望会

---

① J·哈利戴(Halliday)/G.麦科马克(McComack)合著：《今日的日本帝国主义：大东亚的共荣》，企鹅图书公司，1973年，第34页。

② 中川信夫：《韩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日韩问题——日韩条约给谁带来了好处?》，青木书店，1965年，第33—38页。佐藤胜巳等：前引书，第224—231页。

谈早日成功。1960年以来，随着"经济高度成长"的进展，日本资本向韩国的扩张急剧增大。1962年和1963年，日本在韩国的出口中占第一位，在进口中仅次于美国而占第二位。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韩国，对于日本资本来说，不仅是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而且是过剩资本的投资市场，是获得廉价而出色的劳动力的绝好场所。因此，作为这些的前提条件，财界迫切希望日韩会谈达成协议。①

573 就这样，日韩会谈在中断了大约八个月之后，于1964年12月，在佐藤内阁任内，开始了第七次会谈。会谈在全副精力下以高速度进行。1965年2月，椎名外相飞往汉城，反复进行会谈，终于草签了《基本条约》。4月又草签了有关渔业问题、对日请求权问题、侨居日本的朝鲜人的法律地位问题等协定。6月22日，竹岛（独岛）的归属问题留待日后解决，就在东京正式签署了《日韩条约》。从1952年的第一次会谈到第七次会谈，足足花费了十四年之久的日韩会谈，在第七次会谈中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缔结了条约。这种迅速进展的直接关键，就是下述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扩大，和日韩两国对此的紧密响应。

十六　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

从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以来，美国就着手准备在军事上直接介入越南。11月，首次让初期的攻击型核动力潜艇《海龙号》开进佐世保，为美国核装备舰艇开进日本港口打下了基础。1965年1月，又决定让韩国派兵两千名前往越南。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中苏对立的激化和美苏和平共处的进展，在2月7日开始轰炸越南北部，决心扩大战争。3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① 樋口雄一：《日本垄断资本对韩国的经济扩张》，亚非讲座，第4种，《日本和朝鲜》，劲草书房，1965年，第136页以下。三猪信邦：《日本经济的动向和日韩经济合作》，《日韩问题》，第27—32页。

在南越的岘港登陆，一再加紧增派美军。这样，由美国向南越政府提供武器、美元和指导的、使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特殊战争”，就发展成为美军直接从事战斗的“局部战争”，“南越内战”就发展成为“越南战争”，整个越南领土都变成了战场。

为了取得对其战争政策的合作，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了积极的策动。1965 年 4 月，约翰逊总统的特使洛奇（Lodge, H. C.）前来日本与佐藤首相会谈，强调美国的战争目的是“反对共产主义侵略，保卫越南”，并要求进行合作。同月，美国务院的政策计划委员长罗斯托（Rostow, W. W.）也前来日本，与财界人士、工会界和学生等广泛进行接触，商讨越南问题。此外，3 月，日本驻英大使松本俊一以日本政府特派大使的身分，被派往印度支那三国。美国政府对他的归国报告及日本有关越南战争的新闻报导表示强烈不满，对此进行了牵制。这个松本报告是该大使 4 月 23 日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以证人身分所谈的有关视察印象和估计等等，对越南战争作出了尖锐而正确的判断。其要点是：（1）“越共”（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虽然与共产主义不无关系，北越的援助也是事实，但其核心却是南越内部的激进民族主义；（2）美国轰炸北方的效果是有疑问的，继续轰炸北方将刺激中苏；并导致全体越南人进行反抗。

日本政府和财界则照搬美国有关战争的观点和报道，接受美国的要求，采取了支持战争政策的态度。为了协助美军作战，佐藤内阁在 4 月提供了一千四百名大型登陆艇（LST）驾驶员。这种大型登陆艇虽然挂着美国国旗，却是由日本人驾驶，用来从日本向南越运送凝固汽油弹和弹药。南越使用的凝固汽油弹百分之九十是在日本制造的。4 月，椎名外相更公开宣称支持美国轰炸北方，接着，5 月，佐藤首相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另一方面，朴政权也在 3 月向南越派军队，表明了协助美国的态度。就在这种情况下，列 574

忙地举行日韩会谈并达成了协议。

由于《日韩条约》的缔结，韩国人民反对该条约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在日本，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也同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结合起来，出现了高潮。韩国人民把《日韩基本条约》看成是屈辱的卖国条约而继续加以反对。由知识分子、学生、基督教徒、天道教徒和农民团体等广泛的各阶层组成的"反对对日屈辱外交的全体国民斗争委员会"，在《基本条约》签署后不久的3月1日声明中指出，如果按《基本条约》所说"旧条约(1910年的《日韩合并条约》)根本并非无效的，那么，不仅由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侵略韩国根据旧条约是合法的；而且结果是我国政府主动承认了3·1独立运动也是由不安分的朝鲜人掀起的暴动这种解释"，从而揭发了朴政权和《基本条约》的卖国性质。① 而第七次会谈日本首席代表，也是财界代表的高杉晋一，1965年1月7日，在日本外务省会见记者时，也象第三次会谈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一样，说什么"日本虽然曾统治过朝鲜，但是做了好事"，这段话恰恰证明了上述揭发的正确，因而激起了朝鲜民族的愤慨。可是，朴政权对高杉晋一等的发言却不闻不问，竟在7月的第五十一届临时国会上，不顾人民的反对，提出批准《日韩条约》的议案。当时处于反对斗争前锋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政府和执政党共和党便利用这个机会强行单独通过了这个批准条约的议案。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更加高涨。朴政权竟发布卫戍令，镇压了示威游行。

韩国人民的反对条约的斗争，促进了日本的反对条约运动。在此之前，国民的关心主要集中在越南战争上，在韩国的斗争刺激下，转而更加集中到《日韩条约》上来了。反对越南战争，同时又反对《日韩条约》，站在这个斗争前列的是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

---

① 佐藤胜已等，前引书，第232—233页。

中心的群众团体，和对这些"旧左翼"持批判态度的"新左翼"各团体。"新左翼"虽然分成许多组织，但对于把有名无实的议会制民主主义看得至高无上，以这种观点来开展人民运动的"旧左翼"，他们都感到不满，而要求人民的直接的民主主义。他们还认为，日本人是原子弹的受害者，而现在却变成了对其他民族的迫害者，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奋起进行反战和平运动。他的代表组织是，以1965年2月越南战争扩大为契机，由作家小田实和开高健等人建立的"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1965年8月15日，"越平联"通宵达旦召开了以"思考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讨论会，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版反对越南战争的广告，采用这种"旧左翼"运动中未曾见过的崭新方法，积极地开展了和平运动。 575

另一方面，社会党和总评为了把青年们的力量组织到反对越南战争和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中来，也在1965年8月建立了"反战青年委员会"("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并阻止批准《日韩条约》青年委员会")，同时还提倡采取"桥式"[①]阻止批准条约的斗争方式，即社会党系统的"阻止核潜艇进港、粉碎《日韩条约》全国实行委员会"和共产党系统的以粉碎安保和贯彻诸要求为目标的"中央实行委员会"之间，互派联络员来谋求斗争的扩大与加强。9月12日，又在东京的晴海，集聚十三万五千人，召开了"粉碎《日韩条约》中央大会"。这样反对《日韩条约》斗争的根子在于，人们断定：随着该条约允许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朝鲜，将使南北朝鲜的分裂永久化，并将使协助美国推行越南战争政策的日韩同盟建立起来，这就将使亚洲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佐藤政府看准了韩国人民的反对斗争快要平息下来，便于10月5日召集临时国会，提出了批准《日韩条约》的议案。政府和自

① 桥式：在两个系统之间搭桥以取得联系。——译者

民党特别害怕国会审议会把《日韩条约》的本质暴露在国民面前，于是，精心策划一套战术，力求不再重演“安保斗争”的故事。但是，在国会审议时，暴露了日韩两国对条约的解释有重大的区别。《基本条约》第三条写道：“确认大韩民国政府……是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对此，韩国政府认为，它自己的管辖权包括整个朝鲜全境，强调日本不能与北朝鲜发生关系。日本政府则主张，韩国政府的管辖权仅限于38度停战线以南，在“北方”存在着事实上的“权威”，虽然无意与“北方”建立邦交，但却主张象对待中国一样，以“政经分离”的方式对待。这表明日本政府要搞“两个朝鲜”，使朝鲜民族的南北分裂永久化。

在议会外面，10月12日社会党等组织在东京主持召开了阻止批准条约的集会，参加者达十万人以上，声势大为提高。10月下旬起，向国会要求废除条约的请愿示威连日拥向国会。11月6日共产党系统的群众集会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与此同时，社会党和总评主持的群众集会也在东京召开。政府和自民党害怕国会审议拖长、国民反对条约的运动会更厉害，为了在短时间内结束审议并使条约“自然成立”，便在同一天（11月6日），在众议院《日韩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实行了强行通过。在国会，除了民社党之外，社会、共产、公明等各在野党，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接连提出动议，阻止条约议案提上议程。9日，社、共两党的两个实行委员会共同召开了阻止批准条约的集会，反对安保条约时期的“共同斗争”又一次出现了。12日，自民党终于使出了所谓“议长动议”这种史无前例的、无视议会民主主义章程的手段，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仅仅用三十五秒钟的表决就强行通过了条约。13日，在东京明治公园召开了有十万多人参加的“粉碎《日韩约条》国民统一行动中央抗议集会”。以此为开端，在全国，有三百万工会会员举行政治罢工，抗议自民党和政府的暴行。但是，自民党在12月4日和12日，又在参

议院特别委员会和正式会议上，实行强行表决，不待“自然承认”就使《日韩条约》通过了。

这里，1959年《越南赔偿协定》和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时所出现的那种以横不讲理、强行通过的办法来破坏议会政治的范例又一次出现了。每当重复一次这种暴行，都只能使议会制民主主义更加有名无实，使人民更加对议会不信任。毫无疑问，这里，真正的责任在于政府、自民党和支持他们的财界等保守阵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了无视人民利益、无视其他民族独立和国际和平的政策，而且对国民一味掩盖其本质。他们只会采取这种不民主的政治姿态，让“多数这种暴力”大显神通而强行通过，除此别无伎俩。面对这种保守阵营，人民反对《日韩条约》的斗争，虽然围绕着阻止批准条约也曾出现过高潮，但是，由于革新势力的对立和内部分裂已经形成——例如与中苏对立交织在一起的社共两党的对立，围绕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发生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等等——，未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运动。此外，日韩问题的复杂性，再加上佐藤政府所谓“为了与一衣带水的邻国友好”这种单纯的宣传，使更多的人民难以正确理解日韩问题，这也阻碍了反对日韩条约运动的扩大。

尽管如此，反对《日韩条约》斗争与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却使国民得以放眼观察历史和世界，迫使他们从经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被害者意识出发，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转向和平运动，使他们觉悟到日本充当对越南、朝鲜及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的迫害者与战争同谋者的作用，成为促使国民运动发生质变的契机。这一点，再加上保守阵营对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蹂躏，又促使国民不得不由此重新考虑战后的民主主义了。

577

第十六章　亚洲的核安全保障

(1965——1972)

第一节　越南战争与日本

一　越南战火扩大

美国实现了日韩关系的调整，取得了日韩两国的合作，就指望以短期决战来取胜，日益把越南战争升级，使之发展为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代化的庞大战争。1967 年 1 月初，南越的美军已达四十七万三千人，超过了朝鲜战争最盛时期的四十七万两千人。此后，美军又继续增加，至 1968 年 8 月则达到五十四万九千人。西贡(南越)政府军也扩充至六十万人，还有泰国以及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的“外国人部队”，达五万三千人。这些部队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它们装备有尖端科学技术的最新武器，甚至使用毒气和毒药，推行大规模的“索敌击灭作战”和“绥靖计划”。后一种方法是美军最重要的战略之一，即用前一种方法扫荡农村之后，派进工作人员，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办法。为了施展掌握人民群众这种最好的招数，动员了大约百分之九十的西贡军和四分之一的美军，此外尚有约四万人的“绥靖计划干部”，花费了两倍于1966年度南越政府预算的费用。另一方面，为了使北越丧失战斗意志，以削弱南越解放力量的战斗力，便加紧轰炸北方。为轰炸北方而投入的飞机架次，由 1965 年的五万五千架次增至 1966 年的十四万八千架次，所投炸弹总量亦由三万三千吨猛增至十二万八千吨。

直接作战费用由四亿六千万美元增至十二亿美元。

但是，尽管如此，美国的这些战争努力却全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原因当然在于美国的战争政策是对越南民族的侵略战争，是与几乎整个越南人民为敌。此外，其主要原因还可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美军的战略以远程射击和轰炸为基础，而象南越战场敌我不易区别、对方又以游击战、或近战来对付的情况下，这种战略 578 就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战能力，甚至会把非战斗人员也卷入牺牲之中，反而增加了民众的反感。而且，由于美军是以最新式武器为中心的重装备，不得不分出很多兵力从事运输、补给和保管，这就大大减少了实际战斗人员。据称美军七个人当中就有六个人担负"后方勤务"，只有一个人投入战斗。因此，不管有多少美军，用多么优良的武器来装备，面对着有大多数越南人民积极支持的、广泛开展勇敢的游击战的解放力量，也难以获得预期的战果。

第二，美军和西贡军队日益腐败，厌战情绪加深。任何侵略军，只要陷于长期战争和战局不利的局面，其内部就必然会出现腐败、对立以及厌战情绪。随着战争的激化，美军士兵中吸毒及杀害长官事件与年俱增，就是一个例子。在西贡军内部，士兵逃亡事件层出不穷，据称仅 1967 年，每月就有约一万名士兵向解放军携械投诚。

第三，"绥靖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军无视农民的要求和利益，使农村遭到破坏，引起了农民的反感，再加上那些去做农民工作的西贡军队及绥靖计划干部的无能和厌倦情绪。他们一遭到攻击，就马上丢下工作逃跑。在这种情况下，绥靖计划根本不可能充分实施，在越南粮仓湄公河三角洲的大约三千个村子中，1967 年度的计划实施对象，只不过是二百五十个村子。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 R. S.)在 1966 年 10 月 14 日的备忘录中承认，"绥靖计划说来是后退了"，与两年前乃至四年前相

比，“我们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毋宁说是恶化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得不承认，1966年对北方的轰炸，几乎都没有取得超过1965年的成果。

这样，美国的军事战略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至1967年底，战局的主导权已基本上落入解放力量手中，而美军方面已陷入不能发动决定性战略进攻的境地。南越政府作为美国的傀儡，已经失去人心，只能仰赖主子的刺刀和美元苟延残喘。而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政府势力下，由于独裁政治和经济危机，民众的反美、反政府运动在不断高涨。

二　日本对越南战争的合作

对于美国这种扩大侵略战争的政策，佐藤政府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支持与合作。随着越南战争的激化，美国核潜艇越来越频繁地开进日本港口，政府每次均予同意，表明了对美国合作的态度。美国的核潜艇，自1964年11月开始驶入日本以来，1965年曾有六艘开进佐世保港，其中于8月份驶入港口的“大鲹鱼号”，是属于579 “长尾鲨鱼号”那一级的美国海军中最新型的装载有核潜艇专用的反潜导弹，这本是一般常识，但尽管如此，佐藤政府却声言“‘大鲹鱼号’进港时没有装载反潜导弹”，反驳了革新势力对此的非难。

然而，为了确保日本政府的进一步合作，和说服对美国战争政策持批判态度的日本新闻界及社会舆论，美国政府还进一步积极进行了活动。继1965年12月美国副总统汉弗莱(Humphrey, H. H.)访日以后，美国总统特使、巡回大使哈里曼也于1966年1月来访，要求日本政府对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谋求越南和平的工作，给予支持与合作。虽然佐藤首相答应全面合作，但据二月份发表的美国众议院调查团的亚洲报告(美国亚洲问题调查报告)的说法则是：“日本政府虽然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但因新闻界几乎

一致反对而不能全面地支持美国”。为此，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舆论工作，以前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Bundy, McGeorge）于1966年5月来日为开端，副国务卿助理威廉·邦迪也在1966年内先后四次来日，为美国制造舆论。

为了报答美方的努力，佐藤政府答应对从“实力地位”出发谋求和平，提供全面的合作。1966年1月，外相椎名悦三郎为签订日苏航空协定和日苏贸易协定访苏，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了越南问题，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和平的积极态度”，奉劝苏联方面也为和平采取积极的行动，就是佐藤答应对美全面合作的一个具体表现。佐藤政府为了探索实现越南和平的条件，还委派横山正幸为特派大使，于1966年2月至5月访问了法国、波兰等二十三个国家。另一方面，通过1967年初众议院大选，佐藤首相加强了执政的信心，把1967年下半年作为“出访的季节”，从6月底访问韩国开始，至10月间，历访台湾、南越、澳大利亚等亚、澳十二国，所到之处都表示支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立场。作为这次出访的最后总结束，佐藤首相访问了美国，于11月14、15两日会见约翰逊总统，“表明了支持美国谋求正当和公正地解决越南争端的立场”，“表明了希望河内方面应就（美国）停止轰炸北方而采取相应措施的见解”，并谈到“在访问东南亚时，对于自由世界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干涉与渗透所作的努力，看到了广泛的支持”。这正表明，他对美国侵略越南、美国的战争政策及其失败，毫无正确的认识，满脑袋只有靠“实力地位”取得和平的幻想和冷战思想。

佐藤政府这种对美合作，与把日本变成美军重要综合后方基地，亦即成为美军补给、修理和休养基地，以及“越南特需”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南特需订货除了美军直接特需的砂袋、伪装用的各种颜料及丛林鞋等之外，主要还有修理飞机、军舰和武器等劳务特需；韩国、台湾等特需国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为补充美国民用 580

而向其输出日本商品等等。准确的总数虽然难以摘到，但仅以被称作我国从越南战争中受惠最大的1966年来说，估计在二十亿美元收益中，特需收入就有十二亿美元以上。据称，在战争期间的其他各年，特需收入也达十亿美元左右。不言而喻，越南战争特需订货成了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巨大动力。越南战争中的特需，再加上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援助及朝鲜战争中的特需，对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46年至1968年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十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从1950年至1960年间，由日本提供的"军事供应"总额达六十亿一千二百万美元①。日本的军事工业不仅已经能够作到"自主生产"自卫队装备的大部分，而且还能制造适应东南亚特殊需要的武器——可在水田和沼泽地带行驶的水陆两用坦克及橡皮船等小型舰艇或适合亚洲人需要的小型步枪等。②1967年，据称日本曾以"金属加工机械"的名义，向菲律宾秘密输出了可以年产子弹一百五十万发、价值相当五百万美元的成套设备，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③

在这种情况下，佐藤内阁于1967年3月公布了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1967—1971年度），此项费用达二万三千四百亿日元，其主要目标是：(1)确立自主防卫体制，促进武器的国产化；(2)采用核与无核两用的奈基II型地对空导弹，为实现核武装创造条件；(3)采用把重点从迎击转向海外出击的新式Fx型战斗机；(4)通过陆上自卫队的直升飞机化与大量装备装甲运输车辆，促进其机动化等等。对于政府来说，核武装问题并不是宪法上的问题，而是个政策上的问题。因此，是否实现核武装，取决于对和平势力的力量对比。

① 道尔，前引书，第120页。

② 哈利戴，前引书，第11—12页。

③ 阿克塞尔班克，前引书，第43页。

另一方面，佐藤政府还谋求加强遏制中国的日美合作体制。对于政府来说，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进行合作，完全是一回事。而中苏关系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局面，这也是使美国能在越南搞战争升级的主要原因。美国利用了这一事态，从 1965 年开始，把它的全球战略重点移到东亚，把美中对抗当成越南战争的核心，企图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佐藤政府也从这一观点出发，积极对美国提供合作和开展亚洲外交。1966 年 4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发起召开第一次开发东南亚部长级会议，另一方面，又于 6 月参 581 加了由韩国政府倡议，有台湾、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参加，在汉城召开的第一次亚洲太平洋地区部长级会议。

1966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称这一事态为“亚洲的新风”而表示欢迎。同日，约翰逊总统也根据新的形势，发表《太平洋国家宣言》，表明了美国对亚洲的基本政策。在这个宣言中，美国强调，它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决心遵守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并关心日韩关系正常化、日本经济复兴、亚洲太平洋地区部长级会议的召开等正在形成的“亚洲新形势”。

佐藤政府进而于 1966 年 9 月，在日韩经济阁僚恳谈会上，讨论了日本向韩国五年计划提供合作的方法；11 月，参与筹划了作为亚洲第一个地区开发银行的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大会；12 月，又参加设置东南亚农业开发基金。1967年 4 月，日本与太平洋的财界人士设立太平洋经济委员会。5 月，与约翰逊总统的太平洋国家宣言相呼应，三木武夫外相提出了亚洲大洋洲圈的设想。这样，如前所述，从 1967 年 6 月至 11 月，佐藤首相就抖擞精神访问了亚洲、大洋洲和美国。佐藤政府这种积极外交，首先表明了在越南战争特需及其它因素支持下的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所取得的进展；其次，它也包含着这样一个意图，即佐藤政府一面靠纠合亚洲亲美反共诸国，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实现其对美合作，同时，在美国忙于

越南战争而被迫减少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时，扮演取代美国的角色。由此一面对美国的战争政策提供合作，另一面又对这些亲美国家实现经济扩张。

三　反战运动

与佐藤政府对战争进行合作的政策相反，日本的革新政党和工人、知识分子、妇女、学生及其它一般市民诸团体所采取的立场是，认为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侵略；日本是战争的同谋者，是对另一民族的加害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日美两国政府进行谴责，展开了反战运动。从1965年2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开始至同年年底，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首，"越平联"、新剧人会议等市民文化团体、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等妇女团体以及"全学联"等，分别举行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动员的人数总计达一百五十二万之多。其间，向美国驻日大使馆等的抗议运动也很活跃。针对美国核潜艇开进日本港口而掀起的抗议，也遍及全国各地，至1965年底，参加者达二十三万六千人。与1965年相同，1966年美国核潜艇驶来日本也有六次，但其停靠地点却由佐世保扩展到横须贺。5月30日，又有高速进攻型的核潜艇开进横须贺。由于该港距东京不远，人们担心这可能是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等核舰队开进该港的先兆。为此，直至6月3日该核潜艇离港，社会、共产两党582及革新团体在当地连日召开集会强烈抗议，进行示威游行，民社党和公民党也因核潜艇未能确保其安全性等，对核潜艇来日表示了遗憾。

1966年6月29日，美军竟然轰炸起过去曾当作"圣地"而被排除于越南北方轰炸目标之外的河内和海防，于是学者、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等也都奋起以各种形式开始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活动。"越平联"于8月召开了"日美市民会议"的国际会议，日本方面有

“越平联”代表小田实、同志社大学教授鹤见俊辅等学者、知识分子参加，美国方面有反战活动家霍华德·津恩(Zinn, H.)和戴毕德·尼克莱诺尔兹等参加，并通过了《日美市民反战和平条约》。条约的内容是反对越南战争：(1)对核武器、凝固汽油弹及其它武器的研制与使用拒不合作；(2)对煽动战争的一切教育及宣传活动拒不参加；(3)反对包括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在内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4)反对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总评也在9月间召开“秋斗中央总决起大会”，向国际自由工联、世界工联等世界各国的主要工会组织，发出了“为结束越南战争，希望尽量采取联合行动”的呼吁，并于10月21日，以“反对越南战争”为中心口号，领导了全国规模的罢工。日本的工会组织为反对战争而举行罢工，这还是第一次；为反对越南战争而进行罢工，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另外，有个叫作“反对越南战争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是个有几十人的无政府主义集团，过去一贯对反战、和平运动持不满、不信态度，这次也于同年10月打入日本唯一制造机关枪的企业——日本特殊金属公司，散发“停止武器生产”的反战传单，11月又在制造步枪等枪炮方面有代表性的丰和工业公司散发了反战传单。

到了1967年，随着战争的升级，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也更加高涨，不仅现有团体和著名人士，还有许多普通市民也自发地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反战斗争。例如，由日立市的青年教师发起，有约一百名公司职员、学生、家庭妇女等参加，于1967年6月建立了《反对越南战争市民之声》组织，开始向美国报纸写信反对越南战争的活动。此外，还开展了这样一些活动，如胸前戴着“美国从越南撤手!”、“反对越南战争!”等口号的标记、徽章或羽毛之类去上班；通过来日休假或转道回国的美军士兵，把呼吁实现越南和平的英语画片送给美国的母亲们，等等。1967年7月，横滨市长飞鸟田一

雄、京都市长富井清等全国革新派市长会的五十名市长和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京都府知事蜷川虎三，也发表反战呼吁，要求"美国立即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并由战争双方进行谈判，以谋求迅速解决"。地方自治体首长就越南战争共同发表见解，这还是第一次。还有，佛教徒的反战活动也开始了。《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祈愿会》，于1967年3月发表了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北越的呼吁书，并开展了把它的英译本寄给全世界佛教徒的运动。该会是583 在京都清水寺管长①、浅草寺贯首②、圆觉寺管长等各宗派的头面人物五十人的赞同下建立的。

1967年8月，越南战争犯罪调查日本委员会举办的"越南战争犯罪东京法庭"，在东京开庭。原来，由于英国伯特兰·罗素勋爵(Russell, B.)的倡议，1967年5月曾在斯德哥尔摩举办过"国际法庭"，日本也有代表参加，而"东京法庭"则是它的日本版。立命馆大学校长末川博等二十三名知识界人士担任"审判官"，委员会两次听取派往北越的调查团等的"证词"，研究从现场搜集来的武器等"物证"，对日美两国政府宣判"有罪"。对预定以观察员身分前来参加东京法庭的外国人，外务省不准入境。总评和中立劳联为反对越南战争，要求立即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群岛，也于10月21日在东京、大阪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联合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所属会员及学生、市民约有二十万零五千人参加。同日，与总评系统的统一集会相呼应，以日高六郎为代表召集人的"10·21反对越南战争国际统一行动市民、文化团体"，也在东京清水谷公园集会，约有二千一百人参加。同日，为响应总评的呼吁，在英国、美国、巴西、东德等世界各地，也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成为国际反战统一行动日。

① 管长：佛教中管理一个宗派之长。——译者

② 贯首：佛教天台宗最高僧职。——译者

这种反战运动的高涨，也鼓舞了自民党内的反主流派。亚非研究会的松田竹千代和川崎秀二，于1967年5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质问三木外相："难道不应要求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吗?"批判了政府的外交态度。反主流派的藤山爱一郎，也于6月向三木外相表示，反对佐藤首相访问越南。但是，佐藤政府和自民党主流派在欢迎战争的财界的支持下，根本不想改变其对美国战争政策所持的支持与合作的态度。

四 美国国内矛盾的激化和日本

美国的战争政策至1967年底已告失败，它不但已失去了决定战局的主动权，而且还面临着战争所造成的美元危机的激化、美国国民不满情绪的增强和反战运动的高涨。据说从1961年至1971年，美国在越南耗去的战费竟达两千亿美元，其中，1965年以后，每年达二百五十亿美元，这就加剧了美元危机。结果造成美国经济停滞，捐税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削减。约翰逊政权所许诺的通过扩充福利设施来"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终于成为画饼。另一方面，美国对越南的政策不但不能顺利推行，而且广大国民也日益看清了它的侵略性。在国民当中，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日益不满，并不奇怪。学生和青年由于侵略战争而被赶到战场上去，黑人士兵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战场上也遭受歧视，他们的不满和反战思想在迅速高涨。1967年10月16日，以学生和黑人为中心，在美国三十个城市举行了反战示威，接着21日又在华盛顿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 584 的反战集会，示威队伍在国防部大门前静坐抗仪。这些都是人民反战的表现。

这种美元危机的加剧，国民的不满和反战意识的增强，和战争政策的失败，成为加深美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内部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对立表现为国会和政府内的"鸽派"和"鹰

派"之间的政策辩论。两派的特点在于，鹰派总是主张扩大战争，把战争进行到底，而鸽派则清楚地知道战争的侵略本质以及美国并不能取得胜利，所以主张缩小战争规模。而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三个互相对立的集团，第一个是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中心，是从鹰派分化出来的，被称作"感到幻灭的鸽派"，他们主张对这场打不赢的战争加以限制，逐步缩小战争的规模。第二个集团是希望扩大战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派往越南的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 W. C.)等军部及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等鹰派。第三个集团以约翰逊总统为首，包括副国务卿助理邦迪、空军司令布劳恩(Brown, H.)等白宫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摇摆于前两者之间。这三派争论的焦点，大体是关于美军投入的规模、轰炸北越的效果、扩大轰炸北越及扩大南越的地面作战等。这种对立的最初表面化，是在1966年10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视察前线归国后，批评了战争政策的基本方向，向总统建议缩小战争规模。随着战局的不利，这一对立日益加深，终于发展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于1967年11月提出辞呈。

这时，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于1968年1月30日开始发动春节攻势。解放力量在一千公里以上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占领了北起17度线、南达金鸥半岛的一百四十个市、镇的大部分。攻击或占领了许多敌军司令部、空军基地、广播电台等。解放阵线不仅发动军事攻势，同时还发动了政治攻势，组成了争取建立民族民主政权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革命的临时行政机构，还结成了分化南越政府军官兵的组织。能够发动这样军政一体的庞大攻势，乃是由于具备了下述的条件：第一，解放阵线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坚持进行民族独立战争，另一方面又在解放区实行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有益于人民的各种社会改革，从而得到大多数人民的积极支持，人民自己拿起武器，和解放阵线一起并

肩战斗；第二，解放军拥有人和、地利的有利条件，能够得到关于敌人的正确情报，依靠坚强有力的人民自卫组织，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不断地进行有利的战斗，等等。春节攻势当然使美军和西贡军队遭受了重大打击。美国鸽派参议员麦卡锡承认春节攻势的成功，并说："美军的越南政策的一切前提都是错误的，美军在南越恐怕得不到军事上的胜利。"

585

美军在春节攻势中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约翰逊政权内部的对立，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对政府的谴责更加强烈了。其表现之一，就是1968年3月12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中，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参议员麦卡锡获得了民主党总得票数的42%，成绩之好远远超出预料，而约翰逊总统却仅得到49%的选票。实际上，根据哈里斯舆论调查的结果，美国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率，在1968年2月初，为74%，而到了3月中旬，则急剧下降到54%。3月16日，鸽派参议员肯尼迪也宣布作为民主党指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在春节攻势中遭到失败后的一系列事态的严重冲击下，约翰逊总统便决心在地面作战中，不再实行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升级。3月22日，总统突然召回威斯特摩兰司令，命他转任陆军参谋长，就是这一决心的表现。加之，那些被称为"贤达"的元老层的人们，也改变了对战争的态度，这也必然有力地冲击了总统。约翰逊总统终于在3月31日通过电视广播，向全体美国国民声明，将缩小轰炸北越的规模并退出政界。这一声明，正象越南战争的全部过程已清楚表明的，正是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特别是在春节攻势中的战败和冲击下，战费增多，随之而使美元危机激化，美国政府和统治阶层内部对立的加深，国民不满的增强等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面对这种事态的佐藤政府，一面配合美国政府的步调，表示希望越南实现和平；同时也明确表示了"对和平实现后的越南战后复

兴，日本也将提供积极合作”的意向。佐藤首相和三木外相在国会回答在野党的质问时答辩说，第一，日本也将参加实现越南和平的国际会议；第二，如果被邀请，日本乐于向停战监督委员会派遣由文官充任的政府代表。这里，丝毫看不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和日本对战争合作的反省，而只能看到日本垄断资本指望实现和平后侵入越南的如意算盘。不仅如此，向停战监督委员会派遣日本政府的代表还是一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危险道路。财界也开始准备越南战后的布署。以植村甲午郎为会长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于1968年12月邀请西贡政府主管复兴工作的国务部长武国淑访日，商谈对南越复兴提供合作的计划；由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二十四个公司组成的国际农业开发公司，也计划向南越派遣调查团。这些象鬣狗一般贪婪的大企业，已经趁着越南遭受战火破坏赚了满把钱，现在它们又开始活动，想要趁着实现和平，借参与建设与复兴从中捞上一把，并想把估计埋藏在南越沿岸的石油资源抓到手里。

另一方面，反战运动进一步高涨。1967年1月大选中显出的多党化现象和1970年日美安全条约到期时应如何抉择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政党系列化的进程。截止1968年10月的第三次国际反战日以前，社会、共产两党为反对美国核潜艇及航空母舰开进日本港口曾采取了二十多次统一行动，在第三次国际反战日，在十七个都道府县的四十九个地方进行了共同斗争。不过，这些共同斗争都不过是“一日共同斗争”，是“桥式共同斗争”，并不是通过经常的共同斗争组织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在1968年底反对美国核潜艇“潜水者号”驶入佐世保港的斗争中，共产党方面反对社会党系统逐渐急进化的反战青年委员会参加，由此两党的共同斗争便中断了。如果说这种政党系列化是反战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特征之一，那么，另一个特征就是由各政党系列化派生出来的各斗争

586

组织迅速扩大，其反战运动和社会活动日益活跃。这一背景里有如下情况，即佐藤政府自其成立以来直至1969年为止，为了维护政府、自民党和以财界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的利益，继强行通过违反ILO 87号条约法案的四个反动的国内法修正案之后，又强行通过了农地赔偿法案、日韩条约的和与此有关的三个法案、防卫二法修正案、特别保健法案、国营铁路运费修正法案、城市重新开发法案、大学管理措施法案等一系列与国民利益有重大关系的法案和条约，使得议会制民主更加徒具虚名。这种有名无实的议会制民主，对于坚持"通过议会来实现和平革命"的合法主义把议会制民主主义绝对化了的在野党革新势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现有革新政党所掀起的议会外的群众行动，也每每与议会制民主自相矛盾，并常常被用来作为重建党和扩大党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工人、学生和市民对议会制民主日益有名无实的情况感到失望，要求对政权进行政治、社会的根本改革，日渐采取激进的、特殊的行动，他们推行的反战运动也是其中的一环。其主要的一些例子是，1967年10月至11月间，阻止佐藤首相出访南越和美国的斗争；以及1968年1月间反对美国航空母舰"企业号"驶入佐世保港的斗争；3月间反对修建成田①机场，反对开设王子②美军医院；6月间抗议美军飞机在九州大学院内坠毁的斗争；9月间冲进立川③的美军基地；10月间国际反战日的新宿④斗争等。

---

① 成田：在千叶县北部，1966年开始在该市的三里冢修建新国际机场。——译者

② 王子：在东京都北区中央。——译者

③ 立川：在东京都西部。——译者

④ 新宿：在东京都新宿区西南端。——译者

第二节　亚洲的核安全保障与归还冲绳

五　经济侵略

正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坑，美元危机及其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加深的时候，日本政府和财界则在积极推行其对亚洲各国的经济侵略。战争赔偿成了(日本)经济侵略的桥梁。赔偿的接受国和金额如下：缅甸(二亿美元)；菲律宾(五亿五千万美元)；印度尼西亚(二亿二千三百万美元)；南越(五千五百六十万美元)，总计达十亿二千八百六十万美元。此外，放弃赔偿请求权而代之以“经济合作”的名义实际接受赔偿的国家，有老挝、柬埔寨、缅甸①、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六国，总计达四亿六千三百三十四万美元。如果再加上对中国的赔偿，那么就会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额。据说日本在战争中杀害了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中国人，使六千万人无家可归，造成了六百亿美元以上的损失。②但是，日本不仅对中国没有偿付任何赔偿，就是对上述亚洲各国，也是狡猾利用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窘境，迫使它们实行妥协，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赔偿，这一点和西德的情况大不相同。西德对遭受纳粹迫害的许许多多的人，实行了大规模的赔偿，其中包括对于遭受纳粹杀害的个人及幸存者的赔偿，而且还从联合国接受对纳粹罪犯的起诉权，举行了公正的审判。③

日本政府和财界巧妙地利用赔偿来扩大出口，确立发展重化学工业的基础，同时，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转嫁美元危机，巩固了向亚洲扩张的基础。由于赔偿不是用现金，而是用商品，是赠送机

① 放弃赔偿请求权六国中的缅甸，疑为泰国。——译者

② 爱德华·弗里德曼和马克·塞尔登合编：《美国的亚洲：亚美关系驳议》，神殿图书公司，1971年，第188页。

③ 阿克塞尔班克，前引书，第20页。

器或成套设备等等，这就成了再输出的契机，而为了维持再输出，就需要谋求国内经济的成长，这就成了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起因。赔偿还起了另一种作用。给南越的赔偿就是个典型。日本站在冷战政策的立场，转嫁美元的危机，从而起了援助亚洲各国反共亲美政权的作用。然而，到了1965年以后，日本对亚洲的政策已经跨出了“赔偿外交”和单纯为美国效力的范围，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经济、技术援助和投资、贸易方面发挥了积极性和自主性。其背景一方面是，美国因在越南战争中陷于窘境，迫切要求日本为它代劳；另一方面则是，越南特需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随之增加了对原料资源的需要，增加了对亚洲各国的贸易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财界试图在政治和经济上推行更积极的对亚洲政策。这样，1965年就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例如，从1959年至1968年的十年间，在日本对外援助的总额中，出自政府的为十九亿一千一百万美元，出自民间的为三十亿三千七百九十万美元，试拿前后两个五年来比较，两者在后五年中都超过了前五年的两倍。到了1970年，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而占第二位的援助提供国。在它们提供的援助中，亚洲地区所占比例最大，1968年，日美两国对外援助的64.8%是提供给亚洲的。1965年以后，日本的直接投资也急剧增加，自1951年至1968年的投资总额共达十九亿五千五百万美元，其中60%是1965年以后的投资，亚洲在其投资总额中占17.8%。对外贸易额也从1960年的八十五亿五千五百万美元增至1968年的二百五十亿九千六百万美元，其中对亚洲各国的出口额达到四十四亿二千万美元（占34.1%）。正是在日本对 588 外政策转折点的1965年，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后来成为人民党领袖和总统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Bhutto, Z. A.），把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索尔兹伯格对日本向亚洲各国大肆经济扩张，在1972年3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

评论说:“由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非常高,所以日本的企业家们正以过去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将军们万也没想到的方法,迅速地攫取市场”。

日本对亚洲各国实行经济扩张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亲美反共国家。经济扩张包括经济、技术援助和投资,政府称之为“经济合作”,但实际情况与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相距甚远,其中包含着控制接受经济合作国家的经济,损害其民族独立的侵略性逻辑。这一点,在日本政府和财界对亚洲各国中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特别重视的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表现得最为明显。

日本在缔结日韩条约时,约定以十年为期,向韩国赠款三亿美元,提供贷款二亿美元、民间商业贷款三亿美元以上。但是,规定动用这些赠款与贷款时,必须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这里就蕴藏着用来作为直接干涉韩国财政的手段的危险性;同时,由于这些赠款和贷款是用日本的产品和劳役来提供,这就成了日本商品输出的突破口,为日本垄断资本获得巨额利润提供了保证,其背面则具有压抑韩国民族企业的危险。而且贷款的利息也很高,欧美各国贷款的利率一般为3%,而日本则是3.75%至4.75%。到1970年10月为止,日本已向韩国赠款一亿五千万美元,提供财政贷款一亿一千三百五十八万美元,民间商业贷款三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美元。这成了吸引直接投资的诱因,到1970年9月,日本投资已达四亿七千八百一十九万美元。这项款额仅次于投资十一亿九千五百七十一万美元而占第一位的美国。

韩国的朴正熙政权在经济建设中采取了积极的对外借款政策,结果使该国需要支付利息的借款总额在1971年6月达到了三十五亿美元的庞大数额,等于国民每人负债一百一十二美元,大约相当于每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对于生活本来就艰苦的国民来

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① 因此，朴政权便转而减少借款，采取积极引进外国资本的政策。政府对外国企业在用地、动力、劳动力等各方面，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并对外国企业输入原材料及把利润汇回本国也不加限制，甚至还减免所得税、法人税、财产税等，对外国资本采取了无以复加的优待措施。1969年以后，以三菱、三井两个财团为首，日本垄断资本向韩国的扩张特别显著，其原因也在于此。这样，日本垄断资本就控制了韩国的钢铁、造船、水泥、电力、机械、石油、化肥、合成纤维、纺织等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就使韩国资本系列化，使之与日本资本建立了承包关系。例如，三菱和金财阀、三井和三星财阀、日立和乐喜财阀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日本资本还利用韩国恶劣的劳动条件，最大限度地榨取“廉价优质的劳动力”，攫取了巨额利润。日本资本的这种活动和日本政府对韩经济援助，也是造成韩国一小撮大资本家及高级官僚的贪污、暴富，脑满肠肥，与人民群众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②

这种情况恰恰表明，日本在“经济合作”、“经济援助”名义下，对韩国所进行的只能是经济侵略，当然要引起韩国人民对日本的批判和反日斗争。他们对日本深怀警惕，在日韩会谈时就已显示出来。根据 1970 年 3 月发表的朝鲜日报社的舆论调查结果，对于“你怎样看待日本”这一问题，竟有多达 97% 的人回答说：“应该警惕”。

日本这种经济侵略，对于其它亚洲国家也可以说是一样的。例如，对于日本政府和财界当作“东南亚的关键”而十分重视的印度尼西亚，其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盛产橡胶、锡和石油等多种农、矿产

---

① 俞仁浩：《企图把韩国经济置于从属地位的日本经济援助的内幕》，李燮汉编：《38度线》，第 1 号，1972年 5 月，第30页。

② 金炳植：《现代帝国主义与南朝鲜》，未来社，1972 年，第 251—266 页。佐藤胜巳等，前引书，第 237 页。

品，并拥有大量劳动力，而且地理上亦距日本较近，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日本政府和财界早就想通过战争赔偿，窥伺侵入印度尼西亚的机会。只是由于苏加诺政权奉行严厉的反帝国主义政策而未能得逞。可是，由于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印度尼西亚的政局为之一变，代替苏加诺，成立了以苏哈托（Suharto）将军为核心的政权。苏哈托政权是由受过旧日本军队训练的将军和受过美国训练的被称为“巴克莱·马非亚”的技术官僚联合组成的，和旧政权不同，它打算大量接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引进资本，以谋求其政治上的稳定和开展经济建设。这对于日本政府和财界来说，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参加第七次日韩会谈、缔结日韩条约的首席代表、财界领袖高杉晋一把这说成是“天佑”。日本政府和财界怀着侵入印度尼西亚，取代美国和支持苏哈托政权等目的，进行了积极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1966年至1969年，日本对苏哈托政权的援助总数达三亿二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其中包括贷款和赠款二百五十万美元，仅次于美国的五亿六千五百二十万美元而占第二位。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都是想以此为媒介，促进其资本输出，日本亦不例外。以经济援助为立足点，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急剧增加，特别是想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竟造成了“向印度尼西亚冲锋”的局面。1969年 690 11月，日本的投资总额为一亿一千零八十七万余美元，仅次于占第一位的美国（三亿六千六百二十七万余美元）。日本资本侵入矿业、农业、林业、商业和制造业等各个部门，投资的形式也有单独投资、合办企业等不同类型。这样的投资和经济援助，在其促进印度尼西亚经济的稳定与开发的背后，包藏着侵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权的问题。首先，关于投资，日本也和美国一样，是集中在构成印度尼西亚经济中枢的矿、农、林业等原料部门，所以随着投资的不断积累，就隐藏着控制其经济的危险性，并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

其次关于经济援助，第一，对苏哈托政权的援助和美国对南越政府的援助一样，具有浓厚的进行冷战的政治援助性质；第二，日本的援助不是用现款而是用商品，结果就形成强制推销日本商品，而其价格却高出国际市场标准价格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三，由于援助致使贪污事件大大增加，等等，这就是援助带来的主要问题。①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情况，也与印度尼西亚大体相同。美国《时代》杂志在1970年3月2日一期上，以《向东南亚的新侵略》为题，指出由于日本的经济侵入，在东南亚的"丑恶的美国人"的形象将为"丑恶的日本人"所取代，东南亚的"人民深感正在遭受经济上的侵略"等。1970年1月8日的《每日新闻》，也就日本侵入这些国家的情况及反日情绪的高涨，登载了该报特派记者发自曼谷的报告。

报告说："二十八年前，日本人是穿着军装、带着刀枪，唏拉哗拉地闯入泰国的。今天的'日军'，则是用算盘装备起来的。日本经济士兵装备的子弹眼睛看不见，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被日本经济帝国主义的子弹打中——这种不安使泰国以及东南亚人感到焦虑。……近几年内，一定会在东南亚某个地方发生烧毁日本大使馆之类的事情。海外贸易振兴会被投掷石子，日本运输省的观光导游站被暴徒的泥脚所践踏，发生诸如此类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到来。只要在东南亚住一住，亲眼看看这种危险的'反日'浪潮的高涨，就能相当准确地预言这类事态必将发生。"

在菲律宾，很快就发生了相当接近这一预言的事态。从1970年初，在马尼拉掀起了以学生、工人、农民为中心的一系列反美、反政府示威浪潮，其中一支示威队伍于1月17日提出了"矿物资源的掠夺者——美国和日本"等口号，蜂拥闯到驻马尼拉的日本大使

---

① 谷川荣彦，前引书，第300—309页。

馆，抗议由日本援助建设化肥工厂。这种事态在东南亚其它国家也无法保证不出现。

正是上述日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侵略，成了1969年11月佐藤首相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以及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变为亚洲安全保障的重要原因。

591

六 日美联合声明

尼克松于1969年1月接替约翰逊就任总统，但等待他的却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和国内的美元危机、反战运动等所暴露出来的经济、政治矛盾的激化。他提出的政策目标是结束战争，重建荒废了的美国经济，解决国内的分裂和社会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不得不采取自觉限制过分承担义务和过分介入的对外方针。这个方针首先表现为战争的"越南化"政策。所谓战争的"越南化"就是谋求加强西贡军队，同时继续保留支援它的美国海空军，而逐步从南越撤出费用特别浩繁、形成反战运动主要原因的陆军兵力。越南化的政策扩大成美国在整个亚洲的政策，1969年7月，由尼克松总统在关岛提出"关岛原则"，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其要点是：（1）美国遵守条约规定的一切义务；（2）当核国家威胁美国的盟国时，美国向其提供保护；（3）发生核威胁以外的侵略，根据条约规定受到请求时，美国提供军事、经济的援助，但遭受直接威胁的国家，为了自卫，也必须承担提供人力资源的主要责任。这些原则表明，对总统来说，并不是保证美国履行防卫条约的约定，而是提供援助的约定；总统谈到的是，以往的各种防卫条约，乃是在一旦发生核进攻这样特殊情况下而需要的；此外，还表明，总统打算"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等等①。关于这第三点，换言

① 保罗，前引书，第24页。

之即上述的第三项原则，乃是当遭受核武器以外的常规武器袭击或国内发生叛乱时，要以美国的美元、武器和军事指导为主，加强这些亚洲国家自身的防卫力量，由各该国自己担负起保护自身的主要责任，其本质上不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尼克松政权的对日政策也是以这个观点为条件的，即更加强烈地要求日本扩张军备并代替美国援助亚洲各亲美反共国家。面临1970年行将到期的“日美安全条约”问题和归还冲绳问题，美国方面所持的态度也是以尼克松主义为基础的。

在日本，修改安全条约的问题，也与对越南战争的合作和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交织在一起，从1966年起开始成为政界争论的焦点，并逐渐日趋重要。1968年7月，自民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决定自动延长安全条约。12月，为了实现自动延长召集推进安保国民会议。这些措施是与自民党主流及佐藤政府的态度，即以安保体制为基础，在越南战争中继续对美合作并继续推行敌视中国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在爱知揆一外相于1969年3月1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所作关于日台条约的说明中，就已露骨地表现出来了。外相竟公然声称，根据该条约，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甚至还否定缔结条约时的吉田内阁所作关于该条约仅适用于当时台湾政府统治地区的解释，承认了台湾政府对“中国本土”的管辖权。政府的这种态度，成了自民党内围绕对华政策而加深对立的重要原因。 592

民社党虽然基本上也站在承认安全条约的立场，但在1969年2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把美军在日本的长期驻扎改为一旦有事的驻扎，并组织了修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关于对华政策，该党虽然持“两个中国”论，但要求“重新探讨可谓（日本）追随美国的象征的对华外交政策”，主张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以实现中国加入联合国、扩大日中贸易等，谋求改善日中关系。公明

党于1968年1月发表了在七十年代分阶段取消安全条约和实行非武装中立的政策。关于中国问题，该党的态度是"一个中国"论，主张承认中国政府，但为了保护日本在台湾的权益，则又表示"在废除日华和平条约等问题上，没有必要由我方采取积极的措施"。社会党则为预先防备"1970年修订安全条约"，于1968年12月，与总评系统的群众团体一起，组成了反对《安全条约》、保卫和平、民主全国实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社会党主张"废除日台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恢复日中邦交"，但因在1968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遭到失败，未能展开强有力的推动日中复交的运动。共产党虽和社会党一样，主张废除日台条约和承认中国，但由于已经处在对立中的日中两国共产党，围绕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自1967年7月以来断绝了关系，所以日共陷于无法大力推动日中复交运动的处境。另一方面，共产党与其所属的群众团体一起，于1965年组成废除安全条约、贯彻各项要求中央实行委员会，开展了废除安全条约和实行军事中立的运动。

归还冲绳问题也和修改安全条约一样，成为争论的一大焦点。在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支柱"的核基地冲绳，随着越南战争的激化，不断向越南出击的B52型战略轰炸机造成了噪音公害，美军士兵杀害当地居民的事件等连续发生，长期苦于殖民地军事统治的当地居民的不满和要求复归祖国的运动与日俱增。当地居民早就持续地开展了顽强的反基地和要求复归祖国的运动，迫切希望在没有核武器和军事基地的情况下复归祖国，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在日本本土，随着冲绳作为越南战争基地的真相日益暴露，以革新势力为中心，支持冲绳县民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对于今后仍想要保持冲绳基地的美国来说，再也不能继续无视冲绳和本土居民的这种动向了。一向把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力量，当作保障日本及远东安全的主要支柱的佐藤政府，也不得不向

593

美国提出了归还冲绳的要求。直至1969年初为止，佐藤首相关于冲绳的核武器问题和基地问题，还是抱有“无条件地开始归还谈判”的态度，但是就连自民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难以实现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于是1969年3月，在国会的答辩中，就明确了以“撤出核武器，和本土一样”为目标，来和美国进行谈判。

与美国之间进行的归还冲绳谈判，通过1969年6月至9月爱知外相的两次访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Rogers, W. P.）的来日，及其后在东京举行的事务性谈判，除了冲绳核武器的处置问题以外，达成了协议。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方面主张，（1）由于核武器的配置属于最高军事机密，所以不能答应撤出；（2）关于将来运进核武器的问题，按照安全条约规定，连日本本土都可以运进核武器，如果单单对冲绳作出禁止运进的约定，则是实际上修改了安全条约，表示反对。而且，自民党内的鹰派，美国国防部和驻太平洋的军队、韩国和台湾的各政府方面，也都强烈反对“撤出核武器”。这样，在对美谈判上摇摆不定的佐藤政府，便对明确规定核武器问题这一点干脆死了心。1969年11月，访问美国的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之间，以安全条约和归还冲绳问题为中心进行会谈，并于同月22日发表了约束今后日美关系和日本外交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美两国努力争取于1972年内实现归还冲绳。但关于撤出核武器问题，却处理得十分暧昧。在联合声明的第八款中，仅仅记载美国总统“向总理大臣保证，在无损于美国政府关于日美安全条约的事先协商制的立场，在不违背前述日本政府政策的情况下，实现归还冲绳”。佐藤政府认为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在1972年归还以前，把冲绳的核武器撤走，归还后则和本土一样，适用无核三原则，不得运进核武器。然而，在美国政府方面，却根本没有作出这种解释的保证。而且，象佐藤首相于1969年2月5日在国会答辩中所表明的那样，对政府来说“运进核武器不是

宪法上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所以，以后无核三原则这种政策本身也有被轻易推翻的危险性。总之，在日美联合声明中，不要说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就连“撤出核武器，和本土一样”的保证，也根本找不到。

七　亚洲的核安全保障

但是，日美联合声明中的问题还不仅于此。这里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安全条约中事前协商制流于形式和该条约质变为对亚洲的核安全保障。在联合声明中，佐藤首相和尼克松总统表明了两国政府坚持日美安全条约的意图，同时，佐藤首相还谈到，“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是关键性的”，“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还有，该首相于日美联合声明发表的当天，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说，为了韩国和台湾的防卫，“对于日美安全条约中的事前协商，将采取向前看和迅速决定态度的方针”，表示对美国的要求并无异议。这正是由首相自己承认，事前协商制已成一纸空文。佐藤首相的这种言行表明，政府为了保护日本在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权益，把这些地方的“安全”，视同日本的安全，并作出积极的姿态，想要取代根据尼克松主义而打算拖延其对亚洲所承担的义务的美国，以日美安全条约的名义，自己直接介入这些地区的防卫及革命问题。这种态度受到了美国的欢迎。曾任驻日大使的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Johnson, U. A.)于1970年1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就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的想法显出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594

爱知外相在1970年2月23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也说什么“安全条约所说的远东的范围，从一般的概念上来说，地理概念以外的那些日美两国都关心和具有利害关系、有助于两国安全

的地区，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这种随心所欲地明显扩大远东范围的事实，和1968年3月财界首脑木川田一隆提出的“马六甲海峡防卫论”，都表明佐藤政府和财界不仅对韩国和台湾，而且对日本资本集中的东南亚各国，也以日本的“安全”为理由，采取了企图介入的姿态。原来以日本本国的防卫和镇压国内革命为主要目的的安全条约，随着日本作用的增长，现在可以说已变成以介入亚洲各反共国家的防卫和革命问题为目的的对亚洲的核安全保障。

以日美联合声明为开端，中国和北朝鲜掀起了声势汹猛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尤其是中国的谴责，还波及贸易方面。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对友好贸易代表团提出的日中贸易四条件，具体表明了在贸易方面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根据这个立场，与台湾、韩国、南越各政府在投资、经济援助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及另外四个公司，被排除于日中贸易之外。

在日本，以社会党为首的各在野党，都从各自的立场指出了日美联合声明所具有的危险性。然而，基本上取得了归还冲绳约定的政府和自民党，却于1969年12月的大选中取得压倒的胜利，获得三百议席，对即将于1970年6月到期的日美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取得了有利的条件和信心。另一方面，在野党中，疏于艰苦踏实的日常工作的社会党，急骤降至九十席，其他各党也均无进展。在野党虽然和各群众团体一起，开展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但已未能组织象1960年时那样大规模的斗争，未能阻止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

成功地实现了归还冲绳约定和安全条约自动延长的佐藤内阁，便开始着手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以完善日美安全体制。1967年以来，自卫队的陆上兵力虽占世界第二十二位，但构成自卫队核 595 心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则分别占世界第六位和第七位，其综合军事

力量列居第七位。自卫队的火力装备，达到日本帝国军队在1942年最高峰时的七、八倍。其整个兵员数目虽然不多，但军官、准士官所占比例颇大，一旦需要，就可以把兵力增大四、五倍，与希特勒当权时的德国军队十分相似。就是这样一支自卫队，佐藤政府还想进一步加强。1970年10月，在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的主持下，发表了《防卫白皮书》和第四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1972—1976年）。《防卫白皮书》的发表，是政府企图使自卫队在事实上具有正当性的最初的重要尝试。这个白皮书尽管没说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但却在提出以"自主防卫"为基本方针的同时，强调决定对核武器和进攻武器则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以保万全，强调日美安全体制的必要性和所谓"专守防卫"。

但是，从第四次防卫计划和其他的事实来看，所谓"专守防卫"是大可怀疑的。第四次防卫计划以战斗机、潜水艇等核与非核两用的进攻型武器为中心，费用达五万二千亿日元，相当于第三次防卫计划的两倍，是一个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如果在这个计划实现以前，日本仍然还是一个非核国家，那么它的军事力量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强的非核战斗力的水平。而且，中曾根防卫厅长官还于1970年12月指出，日本的防卫圈是"日本沿岸地区及其周围"，这就露出了无限扩大防卫范围的危险性。因为，所谓"周围"常常可以被认为处在外国的"威胁"之下。中曾根的这个发言，与前述爱知外相想要扩大安全条约"远东的范围"的发言，以及自卫队、自民党鹰派及财界的马六甲海峡防卫论如出一辙。1969年，日本自卫队的舰只自1945年以来首次通过马六甲海峡，参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联合演习，与这种"专守防卫"决不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防卫白皮书虽然否定了核武装，但这也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真的不打算实行核武装，那末就应该批准防止核扩散条约。政府和自民党虽然到1970年才勉强同意在这个条约

上签字，但又以该条约把日本当作“二等国”对待为借口，直至现在还反对批准它。而且，日本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1970 年 7 月访日的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Laird, M. R.），据称已从日本政府当局那里得到日本将于 1980 年代开始实现核武装的可靠消息。防卫厅也在搜集有关以核导弹装备自卫队的研究资料。①

佐藤政府如此谋求大规模地增强具有进攻性、侵略性并以实现核武装为目标的自卫队，其背景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美国根据尼克松主义，逐步从亚洲撤军，要求日本增强军事力量来代替；第二，日本为了将来能够保护其在韩国、台湾和东南亚各国的权益，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第三，根据上述两点，打算以行动表明 1969 年 11 月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的宗旨；第四，准备对付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国内革命势力的发展。自卫队，尤其是陆上自卫 596 队的装备、训练和加强，虽然主要是为国内的安全，但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和防备朝鲜纠纷那种危险性，就从过去那种对付国内叛乱的类型转变为对付游击战争类型的暴动了；② 第五，以军需产业为首的日本财界，要求增强自卫队。到 1969 年底，日本已能生产所需弹药的百分之九十七，飞机、坦克、枪炮、舰艇的百分之八十四，到 1970 年时，武器生产额已达机器总生产额的百分之十二。

八　归还冲绳

闯过了延长安全条约问题的佐藤政府，现在又忙于谈判达成归还冲绳的协定。谈判是以1969 年11 月的日美联合声明为基础，从1970 年 1 月开始，至 1970 年秋，经过归纳出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便转入整理这些问题的阶段。主要的问题是冲绳美军基地的处置、美国资产的处理、冲绳居民对美国的请求等。进入 1971 年

---

① 阿克塞尔班克，前引书，第 57 页。

② 温斯坦，前引书，第 117—121 页。

后，归还协定的谈判加紧进行，从2月下旬，便进入了对问题焦点进行最后探讨的阶段。谈判如此迅速进展，反映了政府和执政党的意图及支持它们的美国方面的态度，就是至迟也要赶在预定于6月底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之前签字，以造成一个有利的政治形势。关于谈判的内容，日本国民包括冲绳居民在内，只知道一鳞半爪，国民的怀疑与愤怒不断高涨。

在冲绳当地，以革新势力为中心的多数居民中，充满了愤怒和抗议的情绪。革新势力提出了“粉碎日美联合声明路线下的归还冲绳”的口号，1971年4月28日冲绳日那天，归还冲绳协会在那霸市召开了县民总决起大会，约有五万人参加。归还协会的代表说，“对于在县民和国民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冲绳问题谈判，我们不能不深感愤怒，向这样的归还协定作斗争，乃是归还冲绳运动必然的归宿”。琉球政府主席屋良朝苗在讲话中也说，“愿倾全力以实现不致在将来留下悔恨的归还”。5月19日，工会和民主团体对归还冲绳谈判表示抗议，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除了“全军劳”、教职员会、“自治劳”、“新闻劳协”等拥有罢工权的五十四个工会组织的五万四千人之外，再加上“官公劳”等组织的退休者，罢工参加者的总数达七万人。在这次总罢工中，公立小学、中学、高校全部停课，此外，那霸市四分之三的公共汽车停止行驶，那霸市政府以及市町村的官署也关了门。

在日本本土，社会、公明、民社各党代表于5月27日分别同佐藤首相会谈，就归还冲绳协定提出了要求。社会党提出了撤走一切核武器和毒气、不许美军从冲绳自由出击、撤走进攻用武器和撤退特种部队等六项要求，作为保证实现“撤走核武器，和本土一样”的最低要求。公明党提出的要求是，协定签字前应向国民公布其内容，也应在国会进行审议，协定上应写明撤走核武器及禁止再运进核武器的措施等。民社党要求在协定中应包括基地的职能要和

597

本土一样、无核三原则也适用于冲绳等。4月28日冲绳日那天，全国各地举行了统一行动，要求全面归还无核、无基地的冲绳，废除日美安全条约。

冲绳协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签署的。1971年6月17日，签字仪式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进行，并通过卫星转播了电视①。然而，该协定的内容与冲绳和本土人民的要求却大相悬殊。

第一，协定中并未明文规定保证"撤走核武器"，仅在协定第七条作为日本向美国偿付撤走核武器所需费用等的理由之一，间接地载明归还冲绳乃是"联合声明第八款所说在不违背日本政府政策的情况下实现"。仅此一点并不能消除要求撤走核武器的国民的疑虑。

第二，关于美军基地的调整和缩减问题，至归还冲绳时，只归还和部分归还了三十四处，而主要基地几乎都原封未动。这样，在施政权归还以后，冲绳整个土地上军用地所占的比例仍为百分之十二点三，仅仅减少了百分之二点五。实际上，冲绳群岛正象一般所说的"基地中的冲绳"那样，其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四点八为美军所占用，而在冲绳本岛，美军占地比例竟达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二。除非大规模地削减基地，否则即使嘴上讲安全条约在冲绳也和在本土一样适用，也不过仅仅是形式上的"和本土一样"而已。美国派驻琉球群岛的高级专员兰珀特(Lampert, J. B.)中将，于1970年1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明确指出，"归还冲绳本身并没有根本改变冲绳基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们的冲绳基地，仍将作为核心的防卫手段而继续存在"，这表明美军仍能自由使用这些基地。美军拨款六千万美元，作为直到1976年为止加强冲绳基地的费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

① 东京在首相官邸，华盛顿在国务院，由爱知外相和罗杰斯国务卿在两份协定上同时签字，并通过卫星转播了实况。——译者

第三，关于在冲绳驻扎的由第三海军陆战队、第七心理作战组、陆军第一特种部队和太平洋陆军情报学校四单位组成的美国特种部队，由于它们已超出了安全条约的范围，在国会里曾一再受到在野党方面的追究，但根据协定，仅仅停止在陆军情报学校中训练第三国军人，其他特种部队在归还后仍然同意继续驻扎。

第四，根据日本的电波法，是不准外国政府和外国人在日本设置广播局的，但却允许“美国之音”和进行英语广播的美国“远东广播”在归还冲绳后五年内继续播送。“远东广播”虽然表面上是民间团体的广播，但实际上它与特种部队的第七心理作战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五，关于确保美军用地问题，为了在归还冲绳之后也能使美军继续使用，日本政府便以软硬兼施的政策对待居民，一面大幅度提高政府付出的地租，以便易于同个别土地所有者签订出租合同，598 一面对于坚决拒绝签订出租合同的土地所有者，则以特别立法强制征用其土地。而且在解决美军用地的同时，还采取了一并解决能够强制确保自卫队用地的措施，这就是“关于冲绳公用地等暂定使用之法律草案”，它于1971年12月30日在第六十八届国会开会之初就通过了。

第六，关于对冲绳居民近三十年在美国军事统治之下所受美军难以估量的巨大的物质和人身损害的补偿，例如旧金山和约以前的人身损害、军用地的恢复原状、渔业权等方面的补偿问题，仅规定由美国政府对和约前被接收的军用地而未曾支付复原补偿者及那霸军港内被海水淹没的土地给予补偿。

第七，关于美国资产的接收和对美偿付的问题，面对着要求高额偿付的美国，日本政府简直一筹莫展，甚至用美国政府占领地救济拨款修建的琉球政府楼房和琉球电力等三个公司，本来无需偿还，却也让日本政府买下来，向美国付出了总数达两千万美元的巨

款。这笔款项，正象协定中所写，并不是精确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高度的政治考虑”算出的一笔“顺便敲竹杠”的钱。而且，关于这笔款项，还达成了这样一个密约，即本应由美国政府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复原补偿费等，也要由日本政府来代为支付。1972 年 3 月 2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的横路孝弘和楢崎弥之助两议员根据外务省的极秘电报，揭露了这个密约，佐藤首相等起初还矢口否认，但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了。

第八，关于归还的区域，成问题的是尖阁列岛（中国名为钓鱼岛）。关于这个列岛的领有权，无论中国或是台湾都与日本之间有争议，在归还冲绳协定签字那天，美国国务院就把该岛的主权和施政权明确区别开来，归还给日本的只是施政权，以此表明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尖阁列岛是位于冲绳本岛西南约三百公里的无人岛，其领有权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 1966 年了解到其周围海域可能蕴藏着石油。此外还有该岛的战略地位问题，所以从归还冲绳前后开始，围绕其领有权问题的争论，特别在日中之间激化了，今后也还有可能更加严重起来。日本政府的立场以 1971 年 3 月 8 日外务省提出的基本见解为代表，声称自 1885 年以来，尖阁列岛不仅是无人岛，而且经“慎重确认”中国的统治没有达到过这里，日本于1895年 1 月 14 日，“内阁决定在当地建立界标”，正式纳入日本领土，即根据“无主土地的先占权”而领有了该地。自民党自不待言，就连社会、共产两党在内的各在野党，也都支持这一立场。对此，中国方面于 1970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谴责日本拥有领有权的主张，并于 1971 年 5 月 1 日，抗议美国把该岛包括在冲绳的范围内归还给日本。《七十年代月刊》编辑的《钓鱼台事件真相》为中国和台湾立场辩护，从历史上、国际法上进行研究，明确指出：钓鱼台群岛远在十六世纪的明朝时，即已列入中国版图；根据林子平所著 599

《三国通鉴图说》[1]（1785年）的记载，该列岛从不属于琉球等，是很清楚的；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则把该列岛同台湾一起夺来；其后，该列岛在日本统治下被置于"台北州"管辖之下，并不包括在"琉球"之内，等等。[2]在日本，也有持与此相同立场的说法。[3]但是，日本政府在1970年底至1971年初，就已经事实上获得了尖阁列岛，并将其列入了防卫范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初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4]

综上所述，归还冲绳协定是在日本政府屈从、片面让步，并使冲绳居民遭受重大牺牲的情况下签署的，真正从我国国民利益和安全保障方面来看，其中包藏着许多重大问题，所谓"撤走核武器，和本土一样"、"冲绳本土化"，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实际却正是保障了"有核，有基地，次于本土"和"本土的冲绳化"。在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甚至还就向冲绳配置自卫队问题签订了协议，这就使自卫队不仅在本土，而且在冲绳也作为美军的补充兵力，站到亚洲安全保障的前线基地。

不难想象，冲绳居民的大多数对于归还协定和本土的政府，是大失所望和深感愤慨的。被本土政府邀请参加归还协定签字仪式的屋良主席，没有参加这一仪式，以此表示不满。而且，就在同一天，冲绳县祖国复归协会主办的"抗议签订无视县民的归还协定县民总奋起大会"，分别在那霸、名护、八重山三处召开。这种反对归还冲绳协定的斗争，在协定签字以后，仍然改用"阻止批准"的形式顽强地继续展开。祖国复归协会要求重新进行日美谈判，于11月

---

① 林子平所著《三国通鉴图说》；林子平（1738—1793）江户时代的经世学家。熟悉外国情况，提倡开发北方以御沙俄入侵。《三国通鉴图说》写成于1785年，用图表说明朝鲜、琉球、虾夷三国地理，旨在普及海防知识。——译者

② 《七十年代月刊》编辑：《钓鱼台事件真相》，香港，1971年，第1—12页。

③ 井上清：《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说明》，现代评论社，1972年。

④ 哈利戴，前引书，第97页；阿克塞尔班克，前引书，第51—52页。

10日再次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

在本土，为审议并通过归还冲绳协定及有关法案，于10月16日召开了第六十七届临时国会。各党的代表从11月6日起开始在众议院提出质问。在野党方面认为并不是真正和本土一样的归还，从这种立场出发，就撤出核武器、缩减美军基地、向冲绳派遣自卫队等问题，向政府进行了追究。在11月11日开始进行审议的冲绳协定特别委员会上，社会党的楢崎议员于16日提出了一个爆炸性问题，怀疑岩国①的美国海军基地贮藏有核武器，使政府十分狼狈，同时也加深了国民对冲绳基地撤出核武器问题的疑虑。自民党害怕在特别委员会上对此问题的深入审议，将使协定的本质暴露于国民面前，以及国会会期一旦届满，协定将不能通过，便于11月17日，在审议未了的情况下，决定再次采取强行通过。这样，至1971年12月底，自民党和政府就依仗多数，相继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和有关法案。

从1957年对越南的赔偿协定开始，政府和自民党无理强行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议案，其中包括1960年的日美新安全条约；1962年的（美国）政府占领地救济拨款和占领区经济复兴基金 600 归还协定和对泰国的特别日元协定；1965年的日韩条约；直到这次1971年的归还冲绳协定。对于舆论大有分歧的对外政策的抉择，它们不是依靠国民的真正理解与支持，而是只从以财界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的利益观点出发，凭借在议会中蛮不讲理的“多数的暴力”来作出决定。内政方面，可以说也是如此，被强行通过或和单独表决的议案，数目惊人。政府及自民党的这种政治行动，不仅导致议会主义更加徒具虚名，助长了国民对议会政治的不信任和不关心，同时也促进了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化和对战争的合作、重整军备、经济侵略等政治、外交的反动化。

① 岩国：在山口县东部。——译者

第三节　恢复日中邦交

九　遏制中国政策的破产

正当安保问题、归还冲绳问题吸引了日本国民注意力的时候，在归还冲绳协定签字一个月后的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亲自发表声明，说"尼克松总统定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显而易见，尼克松访华将给美中关系以至国际形势带来重大的变化，同时也将给日本以深刻的影响。他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访问中国呢？

尼克松总统就任以来，虽然大叫大嚷地推行战争的越南化政策，但却与政府的宣传相反，以失败告终，并未能扭转美军与西贡军队对解放军所处的劣势。1969年6月，民族解放阵线以解放区为基础，建立了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进一步巩固了它的政治力量。因越南化政策失败而十分焦虑的尼克松总统，企图从柬埔寨和南越两边夹击，消灭边境线上的解放力量根据地，以扭转败局。1970年初，美国开始轰炸由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中立的柬埔寨。3月，又乘西哈努克出国之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唆使亲美的军事首脑朗诺和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4月底，美军和西贡军队为了歼灭边界沿线的南越解放军侵入柬埔寨，扩大了战火。对此，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积极支持下，在政变后不久，即在北京与柬埔寨的左派力量"红色高棉"联合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开始了反击。该阵线得到柬埔寨广大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解放区，把朗诺政权封锁在金边和另外几个城市中。这显然是尼克松的失算，但他为了掩盖这一点，却又在1971年1月底至2月初，命令美军和西贡军队侵略老挝南部。然而，这也受到老挝爱国战线部队的反击而遭到惨败。

这样，尼克松总统不仅战争政策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在美国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危机的激化和大规模的反战运动。1969 年 3 月，他在特别咨文中提出，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最优先课题，并倾全力加以推行，但是，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后，甚至编制赤字预算，企图恢复景气，但也未奏效，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失业率仍不降低，眼见 1971 年度的国际收支就要出现大幅度的赤字。而且由于越南战争，常用麻醉药者及与之相关连的犯罪，也大为增加。国内的反战运动也日渐高涨，首先是在 1969 年 10 月和 11 月的反对越南战争日，各地有一千万以上市民参加，对战争表示抗议。针对向柬埔寨、老挝的进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 1971 年 4 月，猛烈地批判了政府。接着，以华盛顿为中心，各地举行了反战示威。从越南归国的士兵也第一次参加了示威，有的人还把在侵越战争中得到的勋章当作"耻辱的象征"干脆扔掉。

只要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尼克松总统就无法摆脱这种困境。而且，在那些被美国用来作为侵略越南和封锁中国的基地和后方的一些亚洲亲美反共国家，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地，以战争为契机，人民的反政府斗争与政局不稳也严重起来，对美国来说，事态的发展也甚堪忧虑。例如，在菲律宾，1969年 3 月，以阿马多·格雷罗（Guerrero,A.）为中心的菲律宾共产党亲华派，领导建立了新人民军，以吕宋岛的农村为中心，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开展了强有力的游击战，另一方面，工人、农民和学生等，也不断掀起反政府和反美示威，使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政权陷于困境。在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对于从美国那里得到的不完全的独立、不彻底的社会民主改革、深刻的土地问题的不满增大了，并且还受到了越南解放力量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刺激，等等。①

① 阿马多·格雷罗：《菲律宾的社会与革命》，浦兰·塔拉出版，马尼拉，1971 年，第296页。

泰国的情况，可以说也和菲律宾一样，成为“第二个越南”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泰国爱国阵线领导人民顽强继续反政府的游击斗争，并有扩大的趋势。在韩国，对朴政权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不满，以知识分子、学生为中心，在人民当中，也高涨起来，说不定何时就会爆发。然而，由于美元危机，尼克松政府已不能对这些政权给予足够的支援，因此，它就不得不改变构成其对亚洲政策基础的美中对抗和越南战争政策，以谋求稳定这些亲美政权。

这时，在中国，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基本上进入收尾阶段，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革斗争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国内形势一起，对外政策也走向正常化。政府602把在文化革命中召回的驻外大使重新派往各驻在国，从有可能的方面改善关系，以1970年10月和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为开端，接着又和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建立了邦交。在11月的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虽然美国、日本等国仍以“重要事项”提案，再次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阿尔巴尼亚“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却在联合国的历史上首次获得多数支持。此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小国家迅速增加，至1971年6月，终于出现了这样划时代的事态，即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超过了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国家。

然而在其反面，中国在对内和对外方面，都面临着许多困难问题。其主要的是：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和行政机关一起被破坏的共产党组织的整顿和重建问题。第二，克服经济特别是农业停滞的问题，例如，粮食生产量在1959年是二亿七千万吨，而1971年却不过二亿四千万吨。第三，军队的领导成了经济停滞和地方割据的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中，在行政机关、党组织和生产部门等单位，军队和革命委委会一起掌握了领导权，但军队在本质上并不适合于对行政和经济的领导，它不仅成了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而且军队的领导与地方工业的发展相结合，也成了地方割据的原因。①第四，美苏对中国的包围圈和在军事力量上对苏联的劣势问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加上来自苏联方面的包围，腹背受敌的中国领导集团对“从半月形包围圈扩大为满月形包围圈”感到神经紧张，尤其是苏联，在中苏边界上配备了百万大军，威胁着中国。在1968年的捷克事件中，中国看到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而在1969年3月和8月两国在中苏边界上的军事冲突中，又痛感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如何应付对美苏两国两方面的正面作战，克服对苏联的劣势，乃是中国的重大课题。

根据中国这种实际情况，尼克松总统开始摸索美中和解的道路。从中国的原则来说，美中走向和解的道路，也就是美国走向放弃台湾的道路。从1953年至1965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十四亿二千万美元的援助。从1965年至1969年，美国在台湾的私人投资达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尽管如此，却还要推进美中和解，这对于尼克松来说，乃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要推行他自己宣布的尼克松主义，从越南及亚洲各国逐渐撤军并削减对外援助，而又要继续保持美国在亚洲的统治和影响力，那就首先要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如果可能，还必须以灵活的、和平的方式，遏制中国革命对亚洲各亲美国家人民的影响。还有，对尼克松来说，为了重建荒废了的美国经济，拥有七亿五千万人口的未来的中国市场，也有巨大的诱惑力。

据说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后十天，就指示要 603 采取措施与中国接触，进行对话。同年7月，他部分放宽了对华贸易和学者及新闻工作者等去中国旅行的限制。12月，宣布把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经常性巡逻，缩小为临时性的巡逻。1970年1

① 具岛兼三郎：《林彪的垮台与今日之中国》，日中邦交正常化九州文化人协议会出版，1972年，第30—34页。

月，长期休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又在华沙重新开始，解冻看来似乎正在加速，但因美军于4月进攻柬埔寨，会谈又中断了。然而，从10月至11月，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分别向中国领导转达了尼克松要实现美中和解的坚定意向。

可以推测，从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在中国的领导层中，围绕着对美政策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想要乘此机会与美国和解，回避两个方面的正面作战，避免增加国防费用，推进其经济建设的毛泽东、周恩来派和始终不想与美帝国主义"妥协"，而要加强国防，挽回对苏联、美国的军事劣势的林彪等一部分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对立就是这种尖锐的对立。结果是前者占了优势，确定了对美和解的路线，而作为其第一个步骤，则是在1971年4月，通过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乒乓球队的宋中秘书长，发表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爆炸性声明。这个"乒乓外交"和财界大使、首脑会谈等一样，也是战后外交的一个新特点，以此为契机，确定了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到北京，商定尼克松的访华计划。7月15日，总统自己发表了将要访华的声明。这被说成是"两年来总统亲自铺平的道路和三个月准备的结晶"，一般认为是尼克松的权力政治的思想、势力均衡政策和为1972年总统选举作准备的表现。但是，正象直到发表访华声明这一整个过程所清楚说明的那样，从根本上来说，这次访华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和由于战争而激化了的美国各种内外矛盾的结果。无疑这意味着美国冷战政策的破产，而这种冷战政策是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的，即二十多年来规定美国亚洲政策和对日政策的遏制中国、美中对抗的政策，和镇压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政策。

尼克松的访华声明，给国际形势以深刻影响，再与中国巧妙积极的外交相配合，就使世界各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被通过了。中国坚持自己的原则，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第二天即26日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谈到"中国永远不做欺负别国的超级大国"的决心，表明了中国外交的重大原则。这一原则，在1972年2月的美中会谈中，也得到了贯彻。 604

美中会谈是1972年2月21日至27日，在访华的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首脑之间进行的。其内容虽然全然不详，但据称是"认真坦率的会谈"，会谈的结果于27日在上海发表了历史性的美中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中双方一致认为，国际争端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同时指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双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第三国在这一地区确立霸权，还指出，双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等等。然而，在台湾问题上，则仅限于分别写明两国的主张，谈到对于中国方面的一贯主张，美国方面"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驻台湾的美军"。关于印度尼西亚①问题，也是分别写明了双方的见解。这样，在美中两国之间，虽然也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但两国从对抗进入对话的阶段，无论如何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成了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然给予决定性的

① 印度尼西亚疑为印度支那之误。——译者

影响。

十　恢复日中邦交

日本在1970年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后，政界关心的问题就从安全条约转到恢复日中邦交的问题上来了。1970年9月，公明党系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建立。接着，在12月，以自民党反主流派的藤山爱一郎为会长，又成立了超党派的组织——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议联）。藤山自1965年以来，与松村谦三、宇都宫德马等一起，作为亚非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一直在致力于实现恢复日中邦交。1971年2月，社会党和总评也建立了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佐藤政府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1971年1月，佐藤首相在第六十五届例行国会上所作施政方针的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正式名称来称呼北京政府，并表示希望扩大日中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不能无视同台湾的友好关系。

然而正当此时，美中之间的乒乓外交、美国政府的促进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措施、尼克松的访华声明等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美中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尼克松越过日本政府发表访华声明这一天，正值我国第六十六届临时国会开幕，佐藤首相虽然对尼克松决定访华表示欢迎，认为这有助于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但他对于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在野党方面的攻势，却仍然没有摆脱过去那种消极的姿态。不过，这时在国会中要求通过日中复交提案的动向比以前有所增强。7月20日，日中议员联盟商定了要求日中复交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提案，这就表明就连多数自民党议员也都支持向前看的对华政策。在野党方面也赞成这个提案，但因以亲台派为中心的自民党执行部的反对，这个提案终于未能通过。另一方面，公明党的访华团于7月2日，与中日友好协会的代表签署

605

联合声明，为日中复交提出了积极的五项条件。这就是在过去的作为日中关系正常化前提条件的政治三原则之外，又加上美国从台湾地区撤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并驱逐蒋帮两条。10月2日，以藤山为团长的日中议员联盟访华团，也与中日友好协会的代表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了日中复交指针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承认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3）所谓“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4）必须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国民党政府的代表。

这样，面对日趋强大的要求日中复交的潮流，佐藤政府在姿态上虽然也有微妙的变化，但它仍坚持过去的“两个中国”论，反对在联合国“接纳中国，驱逐台湾”，在1971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还和美国一起反对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充当了“反重要事项和双重代表制”提案的提案国。这个提案与过去把中国加入联合国指定为“重要事项”的提案相反，而是把驱逐台湾指定为“重要事项”，以阻挠从联合国中驱逐台湾。但它毕竟难以对抗大多数国家，而以失败告终。佐藤政府这种与时代潮流倒行逆施的态度，引起了在野党的严厉追究，并加深了执政党内的对立。社会、公明、民社各在野党，在正在开会的国会上，以政府的外交完全失败为理由，向参众两院提出了对福田赳夫外相的不信任案。此案虽在两院均被否决，但在众议院，以自民党反主流派的藤山为首，包括宇都宫德马、川崎秀二、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河野洋平、西冈武夫、菅波茂、山口敏夫等对华积极派的十二名议员，因不满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表决这个不信任案时没有出席会议。这件事和在联合国对策的失败，都是对政府的一个冲击，成了迫使政府修改对华政策的契机。10月28日，佐藤首相在回答公明党议员的质问时，说“我想，日本军阀在中国留下的爪痕，恐怕是愈合不了的”，并说要“对过去作坦率

的反省”，作为日本政府来说，这是第一次正式承认对中国的战争责任，表明道歉之意。佐藤首相还谈到，“日台条约的处理，将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加以解决，但由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日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基础”。尽管如此，却仍未表示出想要积极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

这时，财界却比政府先走一步，改变了态度。从1953年至1969年间，财界向台湾投资达六千三百万美元；但在围绕中国的新形势下，即使牺牲台湾，他们也希望迅速与中国恢复邦交，发展经济交流。实际上，同拥有七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发展经济交流的可能性很大，作为距离最近的市场，对于大企业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尤其是由于尼克松政权采取积极的美元防卫政策，致使日美之间经济上的矛盾增大，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痛感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事实上，在1970年，日中贸易的总额已达八亿二千万美元。从石油、天然气、炼钢用焦炭等原料供应方面来说，拥有广大国土和海域的中国，对于日本经济也是不容忽视的。何况，稍一踌躇，就有可能搭不上围绕着中国市场的国际经济竞争的列车。

606

进入1971年，财界开始对华接近，而中国方面也希望对政府和执政党有很大发言权的财界转变方向，并着力做了这方面的工作。4月，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身份来日的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王晓云，与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富士银行会长岩佐凯实等财界的实力人物举行了会谈；以此为开端，9月，为参加松村谦三葬礼而来日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与财界实力人物举行了会谈，相互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月，以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为团长的关西财界的大型代表团访华，在和中国方面举行的会谈中，代表团表示只承认“一个中国”。周总理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却指责说“对佐藤政府已经不抱希望”，严厉谴责“佐藤追随美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甘心充

当美国提案的联合提案国”。11月，以前专卖公司总裁东海林武雄为团长、木川田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为顾问的东京经济界访华团，也前往中国。

周总理关于“对佐藤已不抱希望”的讲话，在对待保利书简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佐藤首相的大管家、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于1971年11月委托访华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给周总理带去一封信件，呼吁就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府间的谈判。周总理认为保利书简与“台湾独立论”有关，是一封骗人的信，拒绝接受。事实上，佐藤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继续采取暧昧态度，在1972年2月底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甚至连首相和外相在这个问题上的答辩也不一致。这就暴露出气数已尽的佐藤政权担当不了适应国民愿望、打开日中关系的重任。国民深感有更迭政权的必要。3月，政府在国会上承认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政治三原则，作出了向前看的姿态，但日本国民和中国方面都对此不加理睬了。而且，政府对于环境污染与公害、消费品物价与土地价格暴涨等问题，也暴露出束手无策的窘相，已无法掩盖其病入膏肓的症状了。国民的不满高涨起来，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革新势力在地方政治中的势力增大和市民运动的发展。佐藤首相只是死死抓住政权不放，以准备迎接1972年1月和尼克松总统在圣克利门蒂商定的归还冲绳日。1972年5月15日，庆祝了冲绳的归还以后，7月6日，终于在任期未满而已濒于崩溃的情况下，实行了总辞职。

对于新任首相问题，在自民党内，围绕总裁的人选进行了激烈的派系抗争，结果指定了佐藤派的田中角荣。作为自民党亲韩、亲台派的有力人物，他曾在这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但不论其观点如何，田中新内阁的紧急课题不拘怎说就是实现恢复日中邦交。7月 607
7日，田中首相表明了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同一天，外相大平正芳也认为，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有必要在一定时期由

首相或外相访华，并说，“日中关系正常化一旦实现时，就不能设想日台条约继续存在”。其背景则是财界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也增强了积极性。自1971年初以来，财界就表现向中国靠拢，由于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尼克松访华，使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强。就连过去对日中复交十分消极、甚至一直持反对态度的经团联会长植村甲午郎，1972年5月也在经团联第三十三次定期大会上说，“实业界人士访华的增加，从历史潮流来看，乃是势在必然”，“两国之间人员交流的积累，将促进邦交正常化”。由于6月间佐藤首相声明引退，财界看到日中复交很快就会实现，便从过去的目标迈进一步，即从打开日中关系进而集中考虑复交后的日中经济关系了。8月，以新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人士访华团访问了中国。

对于日本的这种态度，中国方面的反应也十分迅速，7月9日，周总理发表谈话，对田中内阁的态度表示欢迎。中国方面对日中复交的条件和态度，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基本相同，特别希望与邻国日本开展经济交流，建立和平关系。由于日中首脑向前看的讲话，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形势便迅速发展起来。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访日期间及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代表肖向前等的积极活动，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形势。他们精力充沛地与财界、政界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代表，反复进行了恳谈，并在7月22日与大平外相的正式会谈中，正式邀请田中首相访问北京。

对此，台湾方面对日本的攻势也激烈起来。7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沈昌焕谴责田中内阁关于要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表态，是“违背国际信义和遵守条约义务”的，接着，行政院长蒋经国也于8月8日发表声明，说“国府为保卫主权和国民的权利，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田中内阁的态度并没有动摇。

在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当中，实行了超党派的配合。自民党于7月24日成立了作为总裁直属机构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有316人参加。这是自民党内的多数，排除党内拥护台湾派的反对，采取大幅度的向前看行动的表现。社会、公明、民社各党，也支持了田中内阁对中国的政策。特别是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自民党的古井、田川等人，都作为面临日中会谈分别传达两国首脑态度的信使，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对于把日中复交置于最优先地位的在野党，则持批判态度，8月7日，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提出，应以实行中国方面所提出的、包括废除日台条约在内的日中复交三原则为前提，来推进恢复日中邦交，并批判说："置日中之间的根本问题于不顾，而急于推进日中复交，这种作法不能同意"。但是，共产党在这日益高涨的日中复交的气氛中，为了避免陷于孤立，也改变了态度，于9月9日，对政府的日中复交方针表示了赞同。 608

以这种超党派的支持为背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等组成的日本政府代表团，于9月25日访问了中国。他们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首脑多次举行会谈，并于9月29日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了邦交。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同时，"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日中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然而，这个声明也是"求同存异"精神的产物，它举出了双方的一致点，而保留了不一致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解决日中之间的一切悬案。例如，联合声明没有直接以法律形式，说明日中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关

于日中复交三原则，日本方面也没有明确表示“承认”；关于日台条约，只字未提。还有，连台湾也包括在内的日美安全条约所指的“远东的范围”与这个声明的关系，以及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和这个声明的联系，也是不清楚的。今后，是否遵循这项声明的原则，解决这些悬案，并实现两国政府所同意的事项，就要看两国政府和人民努力如何了。

这样，日中两国恢复邦交，和美中关系正常化一起，对于缓和亚洲的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大意义。如同过去二十多年间日中关系的历史所表明，实现日中复交的动力，在日本来说，是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贸易而斗争的、以革新力量为首的人民群众和一部分保守派政治家。但尽管如此，在日中复交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掌握主导权的却并不是他们，而是长期追随美国、站在单独媾和和安保路线的立场上，坚持推行遏制中国和敌视中国政策的政府、自民党和财界。日中邦交正常化，在客观上对他们来说，乃是矛盾的，它意味着他们敌视中国的政策和单独媾和、安保路线的破产。但是，在日中谈判中，他们却没有对此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中战争中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但对战后一贯奉行的敌视中国政策，不要说向中国方面道歉，就连自我批评也没有做。当他们发现，只要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就将失去国民的支持，并加深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时，他们的态度根本不是改变构成其敌视中国政策基础的单独媾和与安保路线，而只是改变了对华政策而已。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日本单独媾和，反对日美安保体制，但由于 609 需要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日中会谈中便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没有涉及日本政府单独媾和与安保路线同日中复交的矛盾。日本政府和保守势力巧妙地利用中国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向国民宣传中国也承认了日美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则要给国民留下这样一

种印象，仿佛实现了日中复交的日本政府是爱好“和平”的。实际上，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正在推行第四次防卫计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规模的扩军和军国主义化，力图取代美国，向亚洲各国进行经济侵略，在朝鲜和越南实行民族分裂政策。日本外交的基调，正在于取代美国，实行亚洲核安全保障的路线。但是，日本这种政策，不仅在日本人民中，而且在亚洲各民族和各国人民中，已经产生深刻的矛盾，引起了他们的反对。越南战争清楚地表明，亚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统一与和平的斗争，将要发展得更加强大，他们的革命能量是不容忽视的。

日本外交史分期表

II 1919—1972 年

大时期 指导原则	中时期 分期		课题	特点	小时期 分期		开始的标志	特点
帝国主义的扩张	2	1918—1931	维持帝国主义体制和实行反革命干涉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实行反革命对抗，并以国际协调来维护帝国主义权益（武断外交与协调外交的交织）	1	18—22	出兵西伯利亚	反革命干涉战争和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新旧外交的矛盾
					2	22—27	参加华盛顿会议	以推行国际协调和对华不干涉政策来维护帝国主义权益
					3	27—30	出兵山东	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武装干涉和满蒙地区特殊化
					4	30—31	参加伦敦裁军会议	协调外交的复活及其因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的革命外交而陷入僵局
	3	1931—1945	广泛地区统治圈的形成	打破现状而形成世界新秩序，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深，与社会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对抗，向整个亚洲的侵略及其破产（法西斯外交的确立与破产）	1	31—33	满洲事变开始	强制推行满蒙分离政策，日满经济区的形成，双重外交尖锐化
					2	33—37	退出国际联盟	以退出国联和分裂华北向国际协调体制挑战
					3	37—40	日中战争开始	企图建设东亚新秩序，开始侵略整个中国及陷入僵局
					4	40—41	缔结三国同盟	参加法西斯轴心，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矛盾的扩大
					5	41—45	对美英开战	以往矛盾的总清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破产

（续）

由波占领到独立	1	1945 — 1947	非军国主义化	执行波茨坦宣言与独立相联系的时期，非军国主义化政策的实行（波茨坦宣言的完全实施）	1	45	战败和签署降书	占领的开始与对日管理机构的建立，天皇制的解体
					2	46—47	天皇发表“人间宣言”	创建新的国家制度和完成政治改革
	2	1947 — 1952	实现媾和	波茨坦宣言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分裂，由于改变占领政策而使占领长期化并拖延媾和，贯彻波茨坦宣言实现全面媾和与美国主张实行单独媾和的对立，以单独媾和告终，建立日美安保体制（半占领，半独立）	1	47	宣布杜鲁门主义	冷战开始，日本成为亚洲的工厂，被肢解的媾和政策开始
					2	48	罗亚尔演说	占领政策从政治改革向经济复兴的转变，占领的长期化
					3	48—49	发布九原则指令	日本作为亚洲工厂进入冷战体制
					4	49—50	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声明对日媾和	亚洲的革命与提出对日媾和，媾和事实上完成，军事基地化
					5	50—51	朝鲜战争爆发	决定单独媾和与建立安保体制，日美经济合作
					6	51—52	媾和与安全两条约签字	确立安保体制，开始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续）

帝国主义的复活与扩张	1	1952 | 1965	在安保体制下重建帝国主义	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参加国际帝国主义体制和扩张军备，实现经济高度成长等，以整备国内体制（日美安全保障）	1	52—54	媾和与安全两条约生效	参加国际帝国主义体制，利用赔偿进行帝国主义侵略
					2	54—56	缔结共同防御条约	通过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和建立自卫队而实行"分阶段的重新武装"
					3	56—60	加入联合国	扩充军备，修改安全条约，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4	60—65	签订新安全条约	建立"自主防卫"体制，经济高度成长，养成大国意识
	2	1965 |	通过扩大安保体制实现帝国主义的扩张	向亚洲各国进行经济侵略，及把安保体制发展为亚洲的核安保，以保障这一侵略（亚洲核安全保障）	1	65—69	签订日韩条约	介入越南战争，向韩国及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侵略
					2	69—72	日美联合声明	安全条约自动延长，归还冲绳，第四次防卫计划开始实行，随之导致核安保化
					3	72—	恢复日中邦交	纠正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推进资源外交

① 分期表是表明近代日本外交史的发展阶段，并表示各阶段特点的。近代日本外交史开始于1868年，当时，幕藩体制崩溃，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由此形成了新的外交主体。从1853年柏利来目到1868年，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下，被迫从大君外交转向近代外交的时期，也就是向近代日本外交史过渡的时期。在本表（分期表I）中，用══表示这一划分。

② 从1868年到现在的外交史，如以外交主体的性质为标准，则可以战败与媾和为两个时期而划分为三个时期。本表（分期表II）中，用━━表示这一划分。1945年以前为“战前期”，是天皇制的官僚和军部与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形成重要的外交主体，不久出现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的时期。从1945年至1952年的“被占领期”，是日本的外交权在军事占领下从属于占领权力的时期。从1952年起，由于媾和与恢复邦交而形成的“战后期”，是资产阶级政党与财界构成外交主体的时期，它们由于天皇制在美国占领下解体，因而在政治上确立了主导地位。

③ 各时期外交的发展阶段，分作大时期、中时期和小时期三级，相互之间又有机地联系着。其分段标准如下：

“大时期”，按发展阶段中外交的指导原则的转变来划分。这里所谓指导原则，是说近代国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维持独立乃至扩张，即对外的欲望及行动的倾向。

“中时期”，指在一定国际、国内条件下，外交的指导原则具体化为外交课题时，按其中心课题的转变来划分。

“小时期”，是按完成中时期的外交课题所确定的当前目标及其实现方法，亦即按外交政策的转变来划分。

索　　引

说　　明

一、本索引原文条目系按日文假名五十音图顺序排列，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改按中文汉字笔画顺序排列，并对个别勘误作了更正，其中《　》均根据原文索引译出。

二、条目按第一字笔画分先后，画数相同的则按起笔笔形“一”“丨”“丿”“丶”“㇇”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条目，字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字数相同的，再按第二字的笔画排列。以下类推。第一字是外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的条目，排在最后。

三、字体采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汉字，以及文化部和文改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选用字。个别日本人名，凡没有中文汉字的，则直接引用日文汉字。

四、条目后面的数字，表示该条目出现在原书中的页码。页码后附“f”表示标题。

—译者—

一　人名索引

一　画

二　画

〔一〕

〔丿〕

三　画

〔一〕

四　画

(一)

五　画

〔丨〕

六　画

〔一〕

〔丨〕

七　画

〔一〕

〔丨〕

九　画

十　画

〔丿〕

十一画

〔一〕

〔丨〕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

十八画

二　事项索引

一　画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J〕

五　画

〔一〕

〔丨〕

六 画

(一)

〔丶〕

七　画

〔一〕

八　画

〔丨〕

九　画

〔丨〕

〔丿〕

〔丶〕

十 画

〔フ〕

十一画

〔一〕

〔丨〕

十二画

十三画

〔フ〕

十四画

〔一〕

〔丶〕

〔フ〕

十五画

〔一〕

〔丨〕

〔丿〕

十六画

十七画

十八画

十九画

二十画

二十一画

译者后记

《日本外交史》一书出版于1974年，每日新闻社发行，八位学者合作编著。主编信夫清三郎（1909— ）是知名的日本政治史、外交史专家，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清战争》(1934)、《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说》(1942)、《近代日本外交史》(1942)、《大正政治史》(四册，1951—1952)、《大正德谟克拉西史》(三册，1954—1959)、《安保斗争史》(1961)、《战后日本政治史》(四册，1965—1967)等。《日清战争》一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日本统治者列为禁书。目前正在著述《日本政治史》，已出两卷。其他编者如：中山治一著有《日俄战争以后》(1957)等书，藤村道生著有《山县有朋》(1961)、《日清战争》(1973)等书，在日本学术界也颇知名。

这本书运用大量资料，比较客观而系统地论述了1853至1972年间(起自日本被迫“开国”，止于日中恢复邦交)的日本外交活动，着重分析日本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作者认为，战前日本一直存在着以军部和外务省为代表各自为政的双重外交体制，这一论点在日本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原书第183页说：1895年的《马关条约》确定了日本对琉球群岛、从而也确定了对钓鱼岛（即所谓“尖阁列岛”）的领有权，这与史实不符。《马关条约》并未涉及琉球，钓鱼岛也不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而是我国台湾省的一部分。

本书由原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同志集体翻译，参加校译工作的有：聂长振、吕万和、马黎明、林爱菊、王家骅、周启

乾、王金林、邢镇风等同志。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明确史实，加了一些注释，并校正了几处刊误，个别词句有所删节，涉及中文史料之处尽可能作了查对。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缺乏经验，译文、译注错误或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问题研究所
1979年9月1日